The ful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in Biao Incident

林彪事件
完整調查



歷時20年的調查

對100多位當事人知情者的反復採訪

100多幅珍貴照片

全景式展示9.13事件不爲人知的內情

舒 雲 著

第三版

明鏡出版社

www.mirrorbooks.com

The Complete Investigation on Lin Biao's Incident

(1)

Published in 2006 by Mirror Book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1-932138-42-0

by Shu Yun

Chief Coordinator Ho, Pin
Cover by Yi Hua

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 11514-0366, U. S. A.
TEL:(516)338-6976 FAX: (516)338-6982

Web: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目錄

● 上冊

● 下 册

第三部　人民大會堂

全景式的大曝光
——《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序

● 王年一

我剛剛讀完了舒雲的新著《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受到很大的震撼，有很大的感動。此書以 40 萬字的篇幅，全面描述了林彪事件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角角落落。舒雲採訪的對象有百人之多，常常是不為人所注意的人物（小人物、當事人的家屬、技術人員）。我在捧讀時，腦中常常浮現這樣的畫面：舒雲手拿採訪本，凝神傾聽被採訪者的敘述，一一記下，時而高興，時而煩惱。舒雲成年累月，熱衷於此，吃了多少辛苦，勤奮而頑強地寫出"真相"。

所有接觸過林彪事件的人，不論觀點如何，都有一個共識：疑點太多，且難於破解。研究林彪事件，何者最為重要？

用一句老話來說，要"以事實爲根據"。事實是根本，是生命，是第一位的。對同一個事實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畢竟"事實勝於雄辯"。充分的、確鑿的事實可以說明一切。中國史學界過去討論過"論從史出"和"以論帶史"的問題，結果認爲史學研究只能"論從史出"，離開了事實只能胡說。舒雲女士正是抓住了根本，她努力在弄清事實上下功夫。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一本書，就是她心血的結晶。不管林彪事件如何複雜，在事實面前，一切胡說無所遁形。"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舒雲著眼於、著力於採訪、調查，但並不摒棄別人的發掘。幾方面的素材揉合在一起，乃成"全景式的大曝光"。把一切放在陽光下，讓世人判斷。

在"九一三"之夜，吊詭之事甚多，茲略舉書中說到的一二：林豆豆發現林宅異常，一再把有關情況報告了八三四一部隊的負責人，並且提出了阻止林彪"坐騎"行駛的諸多切實可行的方案。這些方案，事發時一條也未實行，警衛部隊眼睜睜地看著林彪的專車從身邊駛過。我親耳聽到林豆豆傾訴心中的鬱悶：八三四一部隊是中央警衛部隊，負有警衛林彪之責；八三四一部隊在北戴河有幾個中隊，人多勢眾，武器精良，訓練有素，怎麼就攔不住一輛小轎車？又，八三四一部隊北戴河負責人向中央彙報了林豆豆的揭發後，中央竟指示林豆豆跟林彪上飛機（在場有很多人，可以作證），林豆豆問這話是什麼人講的，答曰：中央首長。再者，我們至今弄不清以下問題：在1971年發生"九一三"事件後，中國爲何

不派人到蒙古失事現場去作調查？中國爲什麼不要回飛機的"黑匣子"？爲什麼不要回失事現場的物品？如此一再違反國際慣例，令人驚詫。舒雲在書中詳列事實，提出了這些問題。

我想趁此機會講講另外一個問題。有幾位朋友問過我同樣的一個問題：且不論林彪的功過是非，處於矛盾主要方面的毛澤東，爲什麼要與老戰友、老部下林彪分道揚鑣呢？我的看法是，一生中嗜權如命的毛澤東，怕軍隊坐大而尾大不掉，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毛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講到"蘇修"說我們的"九大"是"軍閥官僚體制"，毛輕輕地反駁了。由此可知，毛已注意到這方面的反應。他注意到中央委員會中軍人不少。確實不少。在中央政治局中，在中央委員會中，軍人都有相當多的人數。"軍委辦事組"的成員大都是林彪的老部下。中央各部委的負責人，不少是軍人。更爲引人注目的是，各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的核心，也大都是軍人。幾方面加在一起，軍人的勢力就非常可觀。在"打倒一切"的怒潮中，顯得軍人風頭更健。這種局面本來是毛澤東本人造成的。眾多的軍官爲執行毛澤東號召的"三支兩軍"任務而離開了軍營。各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的頭頭，都是按照毛澤東提出的"軍、幹、群"三結合的原則進入"革委會"，又經中央批准的。"軍委辦事組"的成員，都是毛澤東認可的，他們之所以權勢很大，那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代理中央軍委的職權的。專制獨裁的毛深知"有軍才有權"，他看到軍隊勢力膨脹，不由得不安起來。他幾次說他要抓軍隊了。

毛又認爲軍隊右傾，“支持保守派”。他在 1967 年 8 月 4 日致江青的信中說到：“現在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軍分區（即師級）以上的幹部支持右派”。這是對林彪的嚴厲指責。雖然林彪的方針是“毛主席畫圈我畫圈”，但是林不可能事事與毛的意見一致。林彪還有另一個方針，就是“大撒手”，軍隊的很多具體事務他並不管。就是這樣，多疑的毛還是難免心生疑竇。經過林彪一夥反對張春橋的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不能容忍了。“文化大革命”是毛的命根子，他斷然不能允許任何人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幹將張春橋。他認爲反對張春橋就是反對他毛澤東。毛澤東私下裏對姚文元說到：廬山會議是“八月逆流”。他與林彪幾十年的師生情、戰友誼就此決絕。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就用心地執意地收拾林彪了。經毛批准成立的中央宣傳組織組，充分證明毛已把中央大權交給江青一夥。毛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又自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引自中共中央黨校陳登才主編的《毛澤東的領導藝術》第 28 頁，軍事科學出版社 1989 年版）。毛澤東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

不要把林彪事件小覷了，不要以爲這只是林彪一家和黃、吳、李、邱四家的事，它涉及到空軍、總參謀部、廣州軍區、“四野”，涉及到我們對毛澤東的瞭解，涉及到我們對專制獨裁體制的認識。弄清楚這個問題，對中共有利，對中國人民有益。

千秋先生在網上發表了《傾聽歷史的聲音——評林彪事件》，文章末段說：“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中顧委常委向鄧提出，趁他們這些老人還在，還歷史一個眞面目，爲林平反。鄧拒絕了，他說：這是要林還是要毛、要共產黨的問題，沒的談。”這個史實的眞實性，無法得知。仔細琢磨，可以看出鄧大人未否認林彪是冤案，他只是從“革命的功利主義”出發，否定了爲林平反。“沒的談”，是鄧的語氣。思考的透徹和行事的舉重若輕，也具有鄧的特點。

我們無權也無心爲林彪平反，我們卻有權呼籲大家來關注這件大事。我們追求的是公平和正義。千秋先生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什麼時候大家都清醒了，中國才有希望。”中宣部前部長朱厚澤爲紀念胡耀邦 90 冥壽而在《炎黃春秋》第 11 期上發表了《呼喚陽光政治》，也有這個意思。他說：“在陽光政治中，歷經議論、紛爭、對話、交流、討論，人們是能取得共識，最終獲得相互認同的回答。”善哉斯言！

（2005 年 12 月 10 日於北京西郊家中）

《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的創新之處

● 舒雲

"文化大革命"已經被徹底否定,"文革"中的大案小案基本都翻了案,惟獨九一三事件鐵打不動,所有的髒水繼續潑在林彪頭上。

請細細品讀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現已查明,林彪背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極其秘密地私自調動三叉戟運輸機,直升機各一架,開槍打傷跟隨多年的警衛人員,於9月13日淩晨爬上三叉戟飛機,向外蒙、蘇聯方向飛去。……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敢於那樣猖狂進攻,反黨、反"九大"路線,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這個黑後台。陳伯達路線,實際上就是林彪、陳伯達路線。在九屆二中全會以前,第一個堅持設國家主席、陰謀策劃向黨進攻的

是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第一個站出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的,是林彪。審定那個"欺騙了不少同志"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八條語錄的,也是林彪。

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印發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以此證明林彪一夥的政變是早有預謀的。

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印發中央專案組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

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印發《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

這個中央文件裏,關於林彪的錯處很多。

是私調三叉戟運輸機嗎?林彪是第二號人物,毛澤東不坐飛機,林彪就是專機第一號人物,整個專機師都在為他服務,他想坐專機還不是隨便坐,還用私調嗎?

是林彪開槍打傷他的警衛人員嗎?否!是警衛人員自傷!

陳伯達如何猖狂進攻?他的調子遠沒有汪東興高。

如果說林彪是陳伯達的黑後台,為什麼在審訊陳伯達時,根本就不問有關林彪的情況?為什麼1980年審判"兩案",把陳伯達劃到江青集團中?

第一個堅持設國家主席的,怎麼是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都在政治局常委上提出設國家主席,林彪並沒有

提。誰聽林彪說過要當國家主席？更何況是毛要林當國家主席。

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的林彪講話，是毛首肯的，怎麼就成"突然襲擊"？

是林彪把陳伯達編的《林副主席語錄》劃掉，根本沒有印發。恩、列、毛的語錄由汪東興印刷，也沒有散發，如何能"欺騙不少同志"？

完全是顛倒黑白。

僅此種種，至今在中國的公開出版物中，林彪依然被妖魔化。那麼民間關於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是個什麼狀況呢？文革史專家王年一說，雖然九一三事件披露了很多材料，但關鍵的材料缺失。加上大量僞造的材料，使九一三事件的很多結論是完全錯的。

現在看，如果單說九一三事件本身，只有不到一天的時間，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資料。而且當事人沒有一個歷經全過程，都只接觸到短短一段。當然，要提九一三事件，就不能不說到 1970 年的廬山會議，不能不說到毛澤東南巡，也不能不說到九一三事件中的各種反常現象。本書作者在近 20 年的時間裏，查閱大量史料，反復走訪了 100 多位當事者，去僞存眞，獲得很多驚人的發現，本書將對九一三事件作顛覆性的總結。

（1）一般說，1971 年 9 月 12 日夜，是葉群接到周恩來電話，才改變第二天早上 6 點走的決定，連夜出逃的。實際上葉群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後，還"安靜"了半個小時。這半

個小時葉群在幹什麼？無人回答。作者發現，周恩來警衛披露周恩來在接到張耀祠報告後，特意回到人民大會堂的新疆廳，叫與會的政治局委員誰也不許離開，也不許接電話。周恩來出來後佈置警衛嚴密封鎖新疆廳，不許外面的人進去，也不許裏面的人出來。裏面有誰？有黃永勝。葉群得知周恩來要來北戴河，又得知北京封了飛機，按常理她應該問問黃永勝，看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可是卻找不到黃永勝了！辦公室沒有，家裏也沒有，哪裏也沒有。黃永勝怎麼可能找不到？於是葉群認爲黃永勝被抓起來了，她才臨時決定連夜走，把已經服了安眠藥的林彪從床上拉起來，大叫快走，有人來抓你了。

（2）設國家主席，本不是問題，毛澤東爲什麼要講六遍？過去認爲，毛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而林彪堅決要當國家主席。但作者發現，毛澤東把"不當"和"不設"分開了，"不當"是堅決的，"不設"不但不堅決，還多次說過你們願意設就設，毛甚至設想了主席和副主席人選。根據吳法憲、邱會作新披露的材料，毛讓林當國家主席。這就可以解釋爲什麼政治局五個常委中，林彪、陳伯達、康生、周恩來都同意設國家主席，也可以解釋汪東興在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代表八三四一部隊堅決要求毛澤東當國家主席，如果毛堅決不設，誰敢提設？是欲擒故縱嗎？

（3）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汪東興是個什麼角色？他比陳伯達跳的高，還"誤導"了黃吳李邱，但毛澤東卻讓他過了關，而把陳伯達打成反黨集團，這是爲什麼？作者發現汪東

興是個神秘人物，是他傳達的毛讓林彪當國家主席的意見，政治局會上說過，會下也與黃吳李邱說過。這就使廬山會議上的很多事情好解釋了。但是毛不會把意圖全盤端給汪東興，汪既然得知毛同意設國家主席，當然積極鼓吹讓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怎麼卻成了反黨綱領呢？

（4）是林彪想當接班人嗎？作者採訪並研究了史料，發現並不是林彪想當，而是毛硬要他當。1966 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毛幾次要林到會，林彪就是不來，藉口有病躲在大連。林彪爲什麼不來？因爲毛給江青的信，對林 518 講話感到不安，說從來沒有這種提法。如果僅是家信，也就罷了，偏偏毛讓周把信送給林彪看。林彪的 518 講話完全是按毛的調子，卻成了"罪過"，換誰也不會再出山了。可是林彪爲什麼又出山了呢？毛讓機要秘書徐業夫給林彪打電話。推測毛的意思，林那篇 518 講話，是馬克思主義的文件，要印發八屆十一中全會，並傳達全黨。這不就等於給林彪的 518 講話"平反"了嗎？再就是毛說你不來我就不開會，林彪左右不了，他也不想被宣佈爲接班人。於是他匆匆到會，講了這個意思。果然大會文件有這個意思，而且新華社確實沒有宣佈。但 8 月 18 日毛接見紅衛兵，劉少奇站得遠遠的，林彪站在毛身邊，這還用宣佈嗎？

（5）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的林彪講話是"導火索"，引發了絕大多數中央委員對張春橋的攻擊，最終引發毛大怒，釀成九一三事件。起因是 8 月 17 日張春橋在最後一次憲法討論會上，不僅否定了林彪提出的三個副詞，還故意把林彪比做赫魯曉夫。激怒了吳法憲，吳拍桌子，大吵，會後馬上打電話給北戴河的葉群，葉群馬上報給林彪，又激怒了林彪。再開會時，吳在林支持下準備反擊，張春橋卻不說話了，通過了三個副詞。張春橋得到高人指點了嗎？但林以爲抓到了張的小辮子。而且毛故意在林面前說讓張春橋當總理，這才有了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林彪批張的講話。毛南巡時說林的講話他事先不知道。中央關於《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中說：林彪上了廬山，不去請示毛主席，在 8 月 22 日下午的常委會上，也沒有表示要在大會上講話。在事先沒有向毛主席、黨中央請示報告的情況下，8 月 23 日，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會議上，第一個跳出來，發表了突然襲擊。而據作者考證，毛事先知道，還同意林彪不點名地批張春橋。毛爲什麼出爾反爾？這一切都是爲了放長線釣大魚嗎？

（6）毛在廬山上的名言：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沒人想到毛指的就是直升機想炸平廬山。其實在廬山上平一塊直升機場，是爲了接送中央委員上山，選址的人並不知道選在毛住房的上邊，於是毛開始疑心。

（7）毛拿陳伯達當替罪羊，實際上是對著林彪。但毛卻在《我的一點意見》中說，我和林彪都認爲……包括九屆二中全會公報，特意提到"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在會上講了話。到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根據會議的議程，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根本看不出"電閃雷鳴"，甚至江青都認爲葉群犯了錯誤，林彪沒有什麼。

（8）爲什麼在九屆二中全會上華北組首先跳出來？因爲華北組有陳伯達和汪東興。陳伯達在中央負責華北地區，到華北組情有可原，爲什麼汪東興也擠到華北組？致使華北組簡報引發200多位中央委員一致聲討張春橋？

（9）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簡報，毛澤東認爲是一個反革命簡報。毛認爲四、五號簡報還沒有出，爲什麼華北組搶先出第六號簡報？這中間有陰謀。作者詳細披露了簡報出台的過程，通過李雪峰秘書黃道霞之口，證明不是一個反革命簡報。以後李雪峰、鄭維山以及華北組簡報都被平了反。陳伯達反革命集團只剩下陳一人。更有意思的是陳伯達在定罪時是林陳反黨集團，1980年審判兩案時卻成了江青集團中的主犯，這是小孩子做遊戲嗎？

（10）陳伯達編馬列語錄並沒有散發，而毛《我的一點意見》說他欺騙了200多中央委員。沒散發如何欺騙？

（11）中共中央在《粉碎林陳反革命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中，說九屆二中全會召開前，7月中旬，陳伯達一反常態，特意穿上軍裝，竄到中蒙邊境活動。他在李雪峰、鄭維山陪同下，到處接見前線駐軍，召開群衆大會，發表講話，製造聲勢。他的這些活動是做給蘇修看的。甚至說陳伯達在林彪支援下，拉攏和聯絡李雪峰、鄭維山等人，喪心病狂地進行反革命遊說，爲林陳反革命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篡黨奪權作準備。

這完全是胡說，陳伯達視察華北，是中央和毛同意的。因爲華北幾省的頭頭都是軍人，陪同陳視察，怎麼就成了陰謀呢？因爲毛認爲華北軍隊多，陳與軍隊“勾結”，想造反。

（12）廬山會議後，毛非常活躍，而林彪卻沒有任何活動，坐在北戴河的黑屋子裏等“死”。

（13）1970年底，毛讓林見斯諾，想讓林彪暴露。林就是不見。毛非常生氣，才有了與斯諾那一段“四個偉大討嫌”的話，從中可以看出毛對林彪的態度。

（14）毛說葉群喜歡聽小道消息，可是毛爲什麼不查小道消息的來源？小道消息都來自汪東興。其次，葉群爲什麼願意打聽小道消息？因爲毛常常說話不算話，一件事情對張三這樣說，對李四那樣說。葉群只能打聽汪東興那裏的小道消息，明瞭毛的意圖，以此緊跟。這也可以說明林彪一貫的思想，不想獨樹一幟，只想跟著毛亦步亦趨。

（15）毛說林不見他，其實廬山會議後林想方設法想見毛，當面說清楚。爲了通過江青見到毛，甚至最討厭照相的他任江青擺佈照相。但毛就是不見。

（16）毛澤東爲什麼南巡？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採取了那麼多措施，而林彪卻在“冬眠”，毛不得不南巡，打草驚蛇。毛爲什麼第一站選武漢？因爲他認爲劉豐是林彪“死黨”。毛與劉豐大講林彪，卻又嚴格對林彪封鎖。但實際上毛希望劉豐透露。毛在武漢等了幾天，劉豐沒有報告林彪。他只能繼續到南昌、長沙，讓廣州軍區傳達到師以上幹部。這是爲什麼？因爲廣州軍區是林彪的“老窩”，兩千多名師以上幹部中總會有人報告林彪。林彪聽了還能穩坐釣魚台嗎？果然，9月8日，林立果在接到廣州軍區空軍副參謀長顧同

舟的報告兩天後，回到北京策劃殺毛。

九一三事件前，林立果的活動很多，林彪的活動依然沒有，那麼林彪知道林立果的三個方案嗎？沒有證據。倒有證據表明，9月12日林彪提出要見尼克松。

（17）以前關於九一三的文章，毛南巡和林立果的動作是各寫各的。所有的研究者都沒有把毛的行動和林立果的行動放在一起看，雖然包括汪東興的文章也簡單提到毛對林立果的行動有所察覺，但無人深入。作者第一次把兩者放在一起，驚人地發現毛的每一步都在林立果剛剛議論之際，好像毛有千里眼順風耳一般。毛到杭州，正是林立果議論如何殺毛的時候，毛分外警覺。林立果說炸專列，毛馬上命令專列轉移，汪東興還提出在專列上搭個棚子防曬（實際是防轟炸）。林立果說炸碩放橋，碩放鐵路沿線馬上派部隊巡邏，嚴查鐵路涵洞、橋樑。毛突然調回專列，緊急開往上海。林立果想燒上海虹橋機場的油庫，汪東興命令油庫加雙崗，毛澤東到了上海不下專列，隨時準備出發。最後毛突然回到北京，怕林立果轟炸中南海，白天到了豐台，卻一直到天黑才回到中南海。……這一切都說明，林立果身邊有毛的耳目。這是一個重大的發現。

（18）林立果的三個方案都沒有展開。9月12日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打破了林立果殺毛的企圖。林立果只好採取第二個方案南逃廣州。還在研究南逃名單時，周下令封鎖飛機，只好採取第三個方案北逃蘇聯。這中間有很多疑點，毛突然回到北京，誰報告了林立果？這才使林立果連夜飛往

北戴河。這個以前被忽略的細節，經作者採訪和研究，給予了令人信服的回答。爲什麼林立果的三個方案都沒有展開，更充分地說明了毛有內線。

（19）過去包括"兩案"審理，都只認定只有一張林彪手令。而作者在採訪中最先發現，林彪手令有橫豎兩張。那麼林彪手令是林彪寫的嗎？作者分析了林彪手令的內容、語氣、筆跡，認定大有模仿的嫌疑。

（20）林豆豆爲什麼沒有向林彪報告？八三四一部隊副團長張宏要報告，爲什麼被姜作壽阻攔？林彪到底知不知道逃往蘇聯？如果有人報告他，他還會不會走？

（21）林豆豆反復做林彪警衛秘書李文普的工作。但李文普不相信，他認爲豆豆有精神病。李文普爲什麼在去山海關機場的中途下車？他說是因爲聽林彪問伊爾庫茨克有多遠，這成了林彪叛逃蘇聯的惟一證據。林彪真的說過伊爾庫茨克有多遠嗎？李文普下車後爲什麼又自己打自己一槍？李文普不承認自傷，但他自己又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說子彈擦前胸到左臂。他從右車門下車，如果背向車門，應該擦後胸到左臂，如果面向車門，應該擦前胸到右臂。僅此一點，就證明李文普是自傷。

(22)作者第一次詳細披露了寫有《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小本子是如何被發現的，並提出種種疑問。據李偉信說，這個小本子被于新野拿到北戴河了，但爲什麼卻在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裏？別的有字的紙都燒了，爲什麼單單留下這一個本子？而且旁邊還放著個張著大口的空包，像要準備裝走

又沒來得及似的？

（23）爲什麼江騰蛟9月13日就自首了，他在監獄裏態度最好，待遇也很好，想吃豆腐腦兒就有豆腐腦兒。這中間有一系列疑問，他僅是一個軍級幹部，爲什麼毛要幾次說他不好，不能重用？是不是苦肉計？爲什麼江騰蛟在林立果策劃"兩謀"中最積極，王飛等都在潑冷水，認爲不可能，而江騰蛟提出一個又一個殺毛的計劃，也不管可行不可行。林立果是個毛孩子，而江騰蛟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啊，怎麼也如此幼稚？是想讓林立果留下罪證嗎？

還有李偉信，在法庭上說感謝組織上給他配眼鏡。江青秘書閻長貴進了秦城監獄，眼鏡馬上就被沒收了，而李偉信提出配眼鏡，居然給他配！李偉信是直升機上惟一活著的人，他又一直在林立果身邊，好多證詞都是關鍵證詞，就是他證明林立果說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計劃。

（24）毛讓攔截直升機，說不行就打下來，決不能讓飛出去。但爲什麼不讓攔截三叉戟？從北戴河到山海關機場，八三四一部隊完全可以把林彪扣住，也完全有條件不讓飛機起飛，爲什麼最後林彪還是坐著飛機飛走了？

（25）林豆豆報告八三四一部隊後，爲什麼上邊讓林豆豆也上飛機？

（26）林豆豆未婚夫張清林爲什麼提出要抓葉群和林立果？林豆豆爲什麼說林彪是被"劫持"？林彪知不知道逃往蘇聯？爲什麼最後他主動上了飛機？

（27）關於二五六三叉戟飛行員之謎，從未有人披露過

潘景寅在從西郊機場起飛前，吃了安眠藥。筆者採訪到西郊機場安政委，他在送潘景寅上飛機前，潘親口對安說他吃了安眠藥。這個舉動說明潘對"兩謀"毫不知情。

爲什麼毛說潘長得像他的大兒子毛岸英？1967年七二O事件，毛從武漢逃出，他專門選了潘景寅的飛機，從此毛再也沒有坐過飛機。也就是說，潘是最後爲毛駕駛飛機的飛行員。

1980年，鄧小平在回答美國《基督教箴言報》總編輯的提問時說，潘景寅是個好人。鄧小平爲什麼這麼說？

（28）林彪飛機是先起火後迫降，還是迫降後起火？是導彈打的還是定時炸彈爆炸？爲什麼潘不等機組全部上來就開動飛機？爲什麼不耗掉一些油就急急忙忙迫降？60公里外就有一個機場，爲什麼卻迫降在野外？失事飛機應該怎樣調查？爲什麼中國沒有派專家到失事現場？

（29）作者最先提出黑匣子的問題，並開始研究。三叉戟的黑匣子在誰手裏？蘇聯對失事飛機如此積極，爲什麼又一聲不吭？蘇聯退休的克格勃頭目說聽當地的蘇聯老百姓說，林彪座機飛到了蘇蒙邊境。蘇聯的雷達幹什麼吃的？爲什麼聽當地老百姓說？據作者考證，林彪座機飛不到蘇蒙邊境。

（30）有人說林彪座機在山海關機場加上了油。據作者考證，林彪座機在山海關沒有加上油。這在9月13日林彪座機起飛後沒多久就搞清了。據空軍航行局局長尚登峨說，當時在指揮所李德生就反復讓山海關機場查，到底加了多少

油？能不能飛到伊爾庫茨克？尚登峨查明後回答，山海關機場沒有加上油，飛不到伊爾庫茨克。

（31）為什麼殲擊機沒有打下直升機？是飛行員技術不行，還是故意不打？因為50年代初有一架英國客機被中國飛行員誤傷，中國飛行員被判了刑，全空軍通報。那時直升機都是專機，誰敢打直升機？

（32）據1980年"兩案"審理，沒有發現黃吳李邱與"兩謀"有聯繫。換句話說，黃吳李邱對"兩謀"毫不知情。在審判"兩案"中，審案人員逼黃永勝警衛參謀費四金做假證，黃永勝9月12日在京西賓館見到了林立果，費四金堅決不做，否則，黃吳李邱和"兩謀"就說不清了。

林立果搞"兩謀"為什麼不依靠黃吳李邱？

這種種疑點，都是我們需要搞清楚的。

引 子

1971年9月13日發生的林彪事件，被史學界稱為中國最大的政治之謎。

其實九一三事件本身並不複雜，就是跑了兩架飛機。後起飛的直升機，被直升機飛行員陳修文以生命為代價，飛了回來，迫降在北京郊區。先起飛的三叉戟，越過國境後，企圖迫降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機毀人亡。

正大紅大紫的中國第二號人物怎麼說跑就跑了呢？

1972年初，彭德懷在監獄裏得知。他難以置信。林彪一家為什麼要跑呢？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怎麼會謀殺毛主席？怎麼成了可恥的叛徒，一下子從天上掉下來？黨和國家究竟發生了什麼事？[1]

陳伯達回憶："十大"公報點了林彪的名，我一無所知，還以為林彪也關在秦城監獄。到1980年審判時，給我看起訴書，我才知道林彪在1971年竟想謀害毛主席，乘飛機逃跑摔死了。我非常吃驚，這是真的嗎？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倒就倒了，再怎麼也不應該這樣做嘛。[2]

林彪事件不要說關在監獄裏的陳伯達吃驚，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大吃一驚。回想那時的中國，林彪是多麼“紅”啊。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被確定爲毛澤東的接班人，一躍成爲中國第二號人物。1967年2月1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批判“二月逆流”的會上說，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遊擊！[3]

那個時候，毛、林之間是多麼“如膠似漆”啊。

1969年4月，“九大”會上，林彪作爲毛澤東的接班人，被破天荒地寫進黨章。

而不過兩年多的時間，“接班人”居然偷偷地逃跑了。

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明顯感到，老人家加速衰老了。九一三事件後，一連幾個月，他煩躁不安，罵人，摔東西，吃不下飯，睡不好覺，甚至不想見任何人，面孔一直板著，不再像以前主動說話。[4] 到1972年1月中旬，毛澤東突然休克，差點被死神拽走。[5]

至於九一三事件，更是迷霧重重。林彪、葉群和林立果是一回事嗎？林立果和葉群是個什麼角色？毛澤東和林彪的分歧從什麼時候開始的？1971年8月，毛澤東爲什麼要南巡？林立果的“三個方案”林彪知道嗎？“林彪手令”是林彪寫的嗎？“林彪手令”怎麼會有“橫”“豎”兩張？黃吳李邱這“四位大將”知道“兩謀”嗎？林彪哪兒也不去，爲什麼又自己上的飛機？“伊爾庫茨克有多遠”是誰說的？林彪警衛秘

書李文普爲什麼突然中途下車？又爲什麼自己打自己一槍？飛行員潘景寅爲什麼不等機組人員到齊就起飛了呢？鄧小平爲什麼要說潘景寅是個好人？三叉戟爲什麼要迫降在溫都爾汗？又爲什麼機毀人亡？林彪的真正死因是什麼？是否遭到導彈襲擊？是否飛到了蒙蘇邊境？機上是否發生了槍戰？是先起火後墜毀嗎？右機翼上的大洞是怎麼回事？是否有人安放了定時炸彈？迫降時飛機上還剩多少油？黑匣子在誰手裏？爲什麼中國強調飛機迷航，誤入蒙古境內？爲什麼沒有提出派專家到現場調查？爲什麼沒有把遺體遺物要回來？……

太多太多的爲什麼，使九一三事件在30多年後，仍是濃霧緊鎖的“廬山”。

註釋：

[1] 參見王焰等著《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版，736 頁

[2] 採訪陳伯達兒子陳曉農筆記，2006 年 4 月

[3] 參見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 1987 年 7 月版，834 頁

[4] 參見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 年，177-186 頁

[5] 參見李靜主編《實話實説豐澤園》，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0 年 6 月版，447 頁。

第一部

誰識廬山真面目

"文化大革命"進行到1970年的夏天，已經亂了四個年頭，毛澤東最初並沒有想耗費這麼長的時間。1967年他巡視大江南北時就多次說過，"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結束，然後開"九大"。不幸，1969年4月，"九大"開過了，"文化大革命"卻仍然停不下來。到1970年廬山會議前，毛澤東還在考慮結束"文化大革命"。國家和人民都需要安定，這從積極籌備四屆人大可以看出來。但歷史並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廬山會議不僅沒有結束"文化大革命"，反而成了令國內外震驚的九一三事件的導火線。



雲遮霧罩的廬山　　舒雲攝於1999年8月.廬山



江青第一任秘書閻長貴　　沈中攝影





我身後的湖位於廬山上，毛澤東曾在湖裏游泳。

許雲提供，攝於1999年8月，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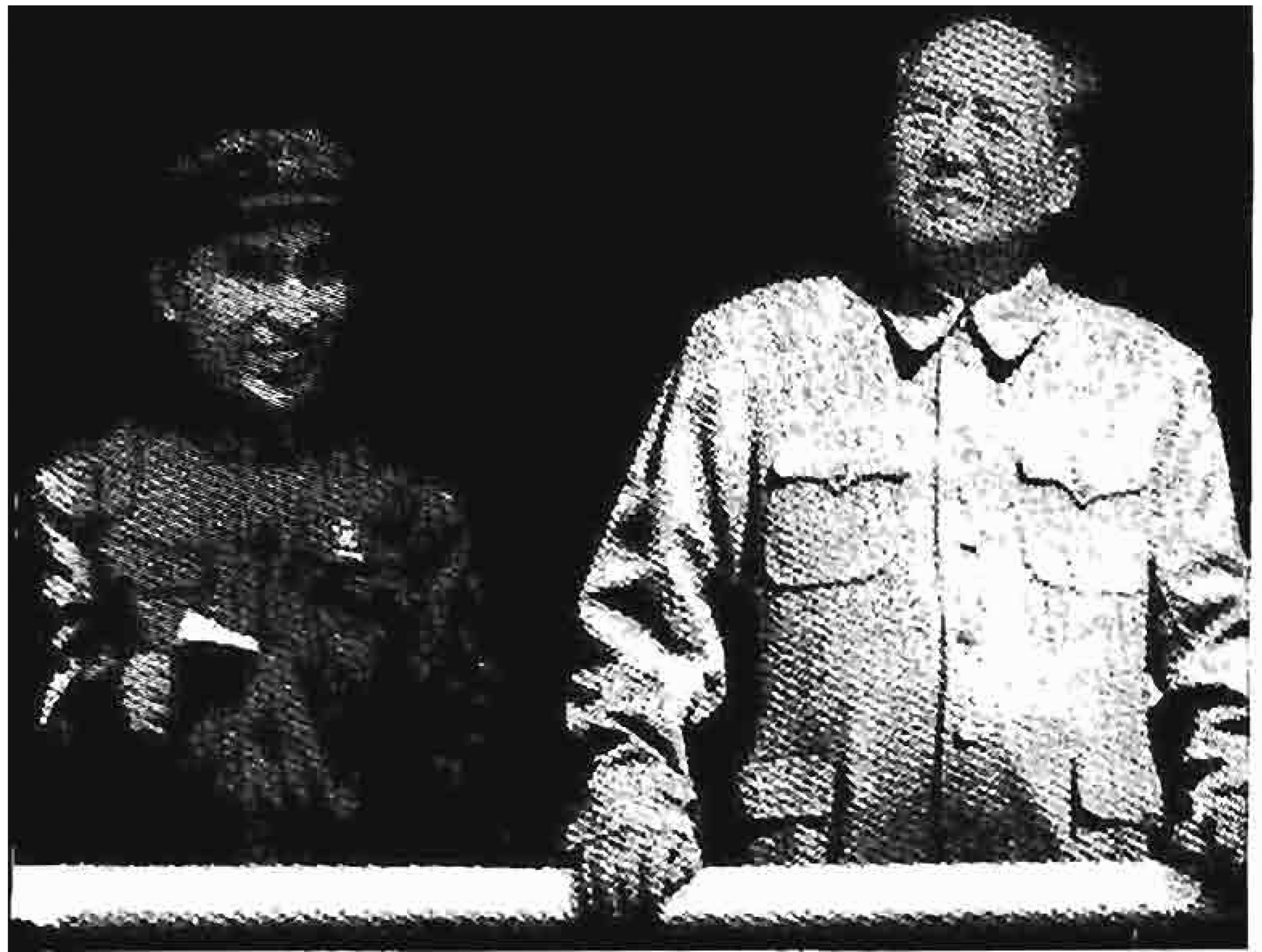


廬山上的九屆二中全會舊址。

許雲攝於1999年8月，廬山







"文革"初期，林彪在公開場合總要揮舞毛主席語錄。

林彪家人提供



攝於1967年5月1日上午，此照片未發過，由閻長貴提供。從左到右：閻長貴（江青機要秘書）、王宇清（毛澤東警衛員）、許春華（江青護士）、張素蘭（江青服務員）、王保春（陳伯達秘書）、吳旭君（毛澤東護士長）、葉群、江青、林彪、李志綏（毛澤東保健醫生）、徐業夫（毛澤東機要秘書）、孫占龍（江青警衛員）。最後六人已經去世。



陳伯達，攝於1949年開國大典。
陳曉農提供



王秉璋在接受我的採訪。
舒雲提供，由王秉璋兒子王友民攝影，北京



王秉璋，曾任空軍副司令員、國防科委主任，2005年10月含冤去世。
舒雲攝於2000年，北京



第一章
迷霧籠罩

1970年夏天，廬山突然被封

夏天的避暑勝地廬山，正是遊客絡繹不絕的季節，橫空卻飛來一道“封山令”。

軍隊“接管”了整座廬山，大批全副武裝的戰士日夜在山林裏巡邏。遊客自然被擋在山外，但是廬山上還住著成百上千的老百姓，怎麼辦？無一例外都受到嚴格的“一刀切”。一旦被政治這把“刀”切下來，立即“押送”出山，甚至山上的幾名和尚也被“騙”到山外。

江西省從南昌、九江選調了大批的技術工人，加緊整修廬山上的大小別墅。還專門培訓了“絕對可靠”的廚師、司機、接待等服務人員。紀律如鐵，不准寫信，不准打電話，更不准透露自己的去向。[1]

1970年8月15日晚，王良恩（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打電話，問正在安徽調研的李德生到廬山開會，是回北京再去，還是直接從安徽走，李德生說直接去。[2]

江青秘書楊銀祿回憶：8月18日下午，江青在辦公室裏看文件時，打鈴叫我，說準備過兩天到外地去，什麼時間走，到哪去，去幹什麼，都不能說，總之一切要保密。要我們立即做出發的準備，明天下午4點以前準備好。8月19日16點，周總理打電話，通知江青明天8點到西郊機場上飛機。[3]

8月20日，通過保密電話，中央辦公廳向各地發出通知。但是只是說開會，卻沒有說到哪裏開會，急事或急件由中央辦公廳轉。

250多位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全部由專機接送。

廬山會議開幕前幾天，廬山峰頂架起了雷達天線，北面的九江機場日夜轟鳴，飛機頻繁起降。按要求，各地的中央委員必須在8月20日上山。專機任務不僅多，而且複雜。因爲九江機場不能降落大型客機伊爾-18，必須在安慶換乘小型客機伊爾-14。林彪當時的專機是英製"子爵"號，也要到安慶換小飛機。爲執行大機群任務，時念堂（專機師師長）專門到安慶坐鎮，組織換乘。[4]

不要說外人，就是與會者，也身處"迷魂陣"中，不知道自己要飛到哪裏。直到坐小汽車過牯嶺，穿過大隧道，進入"禁區"，這才知道來到了廬山。

江青知道是上廬山，她交代秘書不要帶電影片、書籍、

錄音機，但要帶夾大衣、小大衣和薄毛衣。[5]

此時南方正是盛夏，而廬山上卻已經是初秋。

眞不愧是避暑勝地，清風飄飄，眞舒服呀！[6]

"文革"前的中央會議多在外地開，杭州、武昌、鄭州、成都、南寧、北戴河等地都開過。這主要是因爲毛澤東經常周遊"列國"。而"文革"開始，各地亂起來，事情又多又急，所以中央的會議基本"圈"在北京。到了1970年，全國的局勢基本趨向平穩，所以毛澤東決定在廬山舉行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接下來召開四屆人大。

九屆二中全會是建國後的第三次廬山會議，此後，中央的會議再也沒有上過廬山。有人戲說廬山不"吉利"，兩任國防部長都從廬山上栽下來了。那爲什麼毛澤東要把開會地點選在"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廬山？是有心栽花，還是無心插柳？而當時，他們只是知道揪出了陳伯達。[7] 可誰能想到，林彪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了呢？

九屆二中全會開始前風和日麗，沒有一點點滿城風雨近重陽的感覺。[8]

8月20日下午，一身夏裝的周恩來坐專機從杭州飛來，傍晚上山，他是最後一個上山的中央領導人。周恩來似乎沒有什麼警惕性，他住在路旁小賣部附近的一幢普通小樓裏。這裏交通方便，便於與人接觸，也便於打乒乓球、踢足球什麼的。

別墅的分配是這樣的，政治局委員一人住，中央委員兩人住，候補中央委員三人住。每幢別墅配一名服務員，兩幢

別墅配一名廚師。似乎還是"人以群分"的原則，李德生和周恩來、李先念、余秋里是鄰居，朱德和陳伯達是鄰居，林彪與軍委辦事組成員的住地比較近，站在王洪文的門口，可以望見張春橋、姚文元進出。[9]

上山第二天，周恩來就全會議程書面報告毛澤東和林彪，然後分別前往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處談話。

宋雙來（候補中央委員）回憶：會前兩次被告知，這次全會的三項議程很簡單，主要是討論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然後提交四屆人大正式通過後頒佈，另外還要討論一下國民經濟計劃和備戰工作。修改《憲法》的綜合簡報（8 月 10 日）和《修改草案》（8 月 15 日）已印發政治局各成員。國民經濟計劃綱要和計劃會議綜合報告，擬先在政治局討論，通過後再提交全會通過。另外還要討論一下國民經濟計劃和備戰工作，由軍委辦事組起草的備戰工作的文件，擬先由林彪審定後，再提交政治局和全會討論。[10]

像所有的與會者一樣，周恩來感到輕鬆。他滿面笑容地告訴來訪者，會期不長，有三五天就可以了。不少與會者都是第一次上廬山，遺憾時間太短，偌大的廬山還沒玩過來，會就散了。會前中央委員們抓緊時間四處飽覽，姚文元陪江青游了仙人洞，張春橋、姚文元和上海的中央委員在瀑布前合影。葉群邀吳法憲（副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李作鵬（副總參謀長、海軍第一政委）、邱會作（副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遊仙人洞，並合了影。鄧穎超早有計劃，邀請幾位老大姐，會後去井岡山轉一轉。[11]

江青上午上的山，下午就在姚文元的陪同下遊覽仙人洞，很高興地講她是如何拍仙人洞的。第二天，江青和姚文元還遊覽了含鄱口，江青拍了漢陽峰的照片。8 月 22 日上午，江青一起床，就要秘書楊銀祿給她找幾塊小木板和大頭釘，她要做蝴蝶標本。下午江青叫上工作人員到樓後的山林裏捉蝴蝶，並不停地介紹蝴蝶的種類和名字。上山前兩天，江青叫楊銀祿找一本昆蟲辭典，看來她已經做好了玩的準備。[12]

在飛機上，李雪峰得知宋雙來是第一次上廬山，說這次會議不緊張，廬山很美，景點多，文化遺跡也不少，可以多轉轉。會前宋雙來兩次在景點"撞見"李雪峰，可見李雪峰的心情也很輕鬆。[13] 擔任華北組副組長的吳德回憶：初到廬山，氣氛並不緊張，我沒有料到會有一場巨大的風波。[14]

確實，絕大多數與會者都沒有想到，這個"神仙會"拖了半個月，不僅沒有"神仙"一回，還差點把廬山"炸平"了。

在毛澤東眼中，直升機想把廬山炸平

時念堂和尚登峨（空軍航行局局長）專程到九江機場和廬山會場附近勘察地形，為直升機選擇山上的著陸點，然後派兩架伊爾-14 和四五架"雲雀"直升機前去值班。廬山上很難找到一塊空著的平地，好在直升機落地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半個籃球場的地方就夠了。但他們哪裏想到，直升機的

機場選在了"太歲"頭上。[15]

陳長江回憶：那時我是警衛毛主席的中央警衛團一中隊的中隊長。九屆二中全會前，1970 年 8 月中旬，主席要乘火車去南方視察，到底去哪裏，領導上並沒有向我們交底。專列沿京廣線南下，經石家莊、鄭州到達武漢，在那裏住了幾天。又乘車南行，到達湖南省會長沙，又住了幾天。8 月 31 日晚上 9 點到南昌，主席準備在這裏停留一下，再上廬山。主席知道我要上廬山打前站，對我說，長江，我們到了廬山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游泳。在廬山管理局有關人員的引導下，我們檢查了為毛主席安排的住處，佈置好警戒，便去察看準備讓主席游泳的廬山水庫。主席非常喜歡在這裏游泳，1959 年就遊過。這大概是主席在那一段時間裏最好的休息了。[16]

汪東興回憶：廬山會議前，我提前到廬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發現陸軍、空軍也在廬山周圍佈防。上了廬山一看，更嚇了一跳。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邊，正轟隆隆地炸石頭。程世清（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西省軍區政委）事先也沒把這件事告訴我。這是在搞什麼？程世清說，在修飛機場。我不解，怎麼能在這裏修飛機場？程世清說，這塊地方大，直升機降落比較安全。你們在這裏修機場，經過哪裏批准？程世清說，是軍委批准的。什麼時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我馬上到現場去看了一下，飛機場已經快修好了。這個機場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這樣會影響主席休息和辦公。程世清說，那怎麼辦？我當時沒有答覆。回

到杭州，我把修機場的事報告了主席。毛主席馬上警惕起來，問誰下的命令呀？你打電話問問總理，看他知不知道。

周恩來也不知道。汪東興說，這可就麻煩了，你也不知道？周恩來馬上查問，黃永勝（總參謀長）知道。說因為有些老同志要上廬山，坐汽車走盤山路身體受不了，坐飛機又快又安全，空軍就準備了幾架直升機。周恩來問，你這麼決定，報告中央了嗎（意思是你報告毛主席了嗎）？黃永勝說他報告了林副主席。於是，周恩來對汪東興說，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東興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沒再說什麼，點了一下頭。[17]

時念堂回憶：九屆二中全會開會前，胡萍讓尚登峨和我上廬山選直升機場，我帶了一個調度員李何令。直升機降落場一般比籃球場大一點，我們選了好幾個地方，水庫前面，東面一個地方，……最後定在哪裏我不知道。我們準備下山時碰到汪東興，問我們幹什麼，我說看飛機降落地點，汪東興並沒有說什麼，叫我們去吃飯，還叫我留在山上過夜。我說今晚試飛夜航，我要到九江機場指揮，就下山了。我和汪東興比較熟，劉少奇訪問四國時，我們機組也是代表團成員，與汪東興一起呆了一個多月。以後我想他可能要單獨問什麼，可是我當時不知道。不過問我，我也答不出什麼，我只知道選直升機場，別的什麼都不知道。[18] 奉命選直升機場和修直升場的人，更不知道毛澤東上廬山會住在哪裏，自然談不上"陰謀"。

楊銀祿回憶：江青一上山就對我說，叫我把老鄔（鄔吉

成，負責江青警衛）找來，問主席上山了沒有？叫他下山問吳法憲，看主席什麼時候上山，要特別注意主席的安全。老鄔剛下山，我就接到警衛值班室的電話，說主席已經到了山上，到水庫游泳去了。[19]

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過去上廬山，毛澤東都住在蘆林一號招待所，到湖裏游泳方便。不知道是不是因爲"大戰"將臨的緣故，這回汪東興（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把毛澤東安排在有高牆圍起的脂紅路別墅。這是一幢便於保衛的獨立西式城堡，從前是美國亞細亞銀行，半個世紀過去了仍壁壘森嚴。[20] 汪東興回憶：廬山會議後期，我主要是抓了對毛主席的安全保衛和會議的收尾。忠心耿耿的汪東興沒有想到，他自己的"安全"倒出了問題，幸虧毛澤東說他是好人犯錯誤，才平安無事。

8 月 23 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小禮堂舉行開幕式。陳長江回憶：主席住的地方到禮堂有一段路，坐車到禮堂側門，進去就是主席台。出席會議的代表都爲林彪的講話鼓掌，只有主席沒鼓掌，表情悶悶不樂，宣佈散會。主席沒有像往常一樣與各位握手，就從側門出來，乘車回到住處。那幾天，主席睡不好覺，吃不好飯，常常出來散步。他邊走邊對我說，有好幾年不寫文章了，現在不寫不行了，要寫文章反擊。我還聽到主席自言自語，……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出來轉了不過十來分鐘，主席就回去寫文章了，他屋裏的燈一直亮到很晚。[21]

陳長江的這段回憶如果屬實，那麼毛澤東的《我的一點

意見》就不是江青、張春橋等人告狀後才寫的，而是早就開始動筆了。可是按照通常的說法，8 月 31 日，毛澤東整整考慮了三天，才揮筆寫下《我的一點意見》，[22] 這是他生命最後十年中寫得最長的一篇文章。

但不管怎麼說，《我的一點意見》裏面果然有一句"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九屆二中全會閉幕式上，毛澤東講到廬山會議的這場鬥爭，再次強調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我說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幾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爲他們認爲，代表人民的標誌就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以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就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我是不幹。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你有啥辦法呀？[23]

以後毛澤東南巡時對華國鋒談話，除了提到廬山上有人搞突然襲擊，又特意強調"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是有用意的，因爲只有空軍才能炸平。[24]

陳伯達回憶：我確實沒有想到，吳法憲在懷仁堂和張春橋的大吵，竟演變成在廬山會議上的大災。毛主席說炸平廬山，誰能炸平廬山呢？我除了寫文章，什麼都不會，而吳法憲是"空軍司令"，所以我設想他大概能"炸平廬山"吧？[25]

毛澤東反復說"炸平廬山"的"典故"，就出自正在修建的廬山小機場。

幾架小小的直升機，眞能把廬山炸平嗎？

周恩來"追"到黃永勝那裏，沒再往林彪那裏"追"。就是

周恩來"追"到毛家灣，也是葉群接電話。林彪身體不好，一向由林辦主任葉群出面。至於林彪的意見，也要由葉群把關，有時她會提出"更好"的意見。下面向林彪請示，也必須通過葉群，她可以推延或謝絕。毛澤東南巡時特意講到他不贊成老婆當秘書、當辦公室主任，對一些負責人向林彪請示時要經過葉群這類事很不高興。[26]

可是，葉群"代理"林彪，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毛澤東幾次提出，林彪不能來開會，葉群來嘛。

葉群自從九一三事件後，一直被描寫成一個壞女人，對她罵聲很多，甚至把一切罪責都推到她身上。關於葉群的一切，其實人們知道得很少。葉頌（葉群弟弟）回憶：從一開始，葉群就不想擔任她所擔任的職務，幾次對我說，你看蔡大姐、鄧大姐，我算什麼呢？現在出頭露面都要我去。鬥爭那麼激烈，很傷腦筋。可是葉群不來開會，毛澤東不許。1967年，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叫葉群來，葉群不來，說我不是常委，我不合適。毛澤東把會議停下來，葉群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繼續開會。葉群不得不來，毛澤東宣佈：葉群參加中央碰頭會，是中央碰頭會成員。

葉群被推到那麼高的位置，也是身不由己。

那麼林彪知不知道廬山上修機場？如果林彪知道，爲什麼不請示毛澤東呢？

林立果（林彪兒子、1969 年 10 月被任命爲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怎麼也上了廬山呢？雖然林立果在空軍作戰部擔任領導，卻不在作戰部上班，也很少到

作戰部去。這次廬山開會，他以空軍秘書的特殊身份也上了廬山，由"東道主"程世清安排住房。林立果不算與會者，也不算會務組的工作人員，他沒有權利參加會議和各大組的討論，只能在會外活動。所以他在廬山上有點活動，但不多，也有限。會議後期他跑到林彪別墅，向林辦秘書人發了幾句議論。[27]

廬山會議後，林立果一夥確實加緊了軍事活動。但他在廬山會議前把直升機的機場修在毛澤東房子的上頭，恐怕不是有意爲之。從現有資料看，機場一點點大，也不是秘密工程。是爲了政變嗎？似乎沒有證據。這時林彪的地位雖然有些動搖，但矛盾還沒有激化，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廬山會議以後 1971 年 3 月的事情。而毛澤東對林彪的懷疑越來越深，甚至想到飛機轟炸，林彪兵權在握啊。

陳長江回憶：廬山會議進行中，汪東興及時向我們傳達會議的主要情況，中心是要我們提高警惕，值班幹部和哨兵都要加強責任心。部隊要加強應變能力的訓練，確保主席的安全。根據廬山的實際情況、地理環境，我們設想了可能發生的幾種情況，搞了相應的應付突發情況的方案，其中也有對付最嚴重情況的準備，並組織幹部戰士進行了演練。

這時主席仍住在一號樓。那一段時間，差不多每天中午他都到水庫邊新建的那幢房子裏辦公、開會或找人談話。因工作太多，常常到淩晨兩三點才回住處。廬山這個地方，晚間不是大雨就是大霧。那霧又密又濃，上看不見星斗，下看不到腳面。深夜護送主席回住處，即使把車燈全打開，仍然

看不了多遠，這一段路面很窄，車子稍微偏一點就可能掉下深谷。我們警衛不僅要防止敵特的陰謀破壞，還要防止包括車禍在內的各種事故。為了確保行車安全，我們想了個土辦法，用煤油燈為汽車引路。我從管理部門借了一盞普通的防風煤油燈，每逢雨霧夜行車，我就穿一件雨衣，提燈走在汽車前面。毛主席看到這情景，笑著說，這辦法不錯，提著紅燈引路，我們這也是"紅燈記"嘛。雖然有"路燈"，司機仍小心翼翼，開得比牛車還慢。這樣慢的速度在山路行車，後顧之憂就顯得突出了，我派出三個人編為一個小組，跟在車後，以防不測。[28]

張耀祠回憶：拿陳伯達開刀的那天晚上，毛主席忽然提出不在美廬過夜，秘密挪到100多米外的175房。那原是幾家普通民房，大會前居民遷出。房間又小又破，毛主席不准工匠修理，以免走漏風聲。[29]

毛澤東老"收拾"別人，他也害怕別人"收拾"了他。

會前林彪猶豫要不要講話

1970年8月23日15點45分，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人民劇院開幕。

廬山人民劇院建在牯嶺鎮半山腰，可以坐五六百人，1959年曾在這裏舉行過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現在成了九屆二中全會的會場。這次實際到會的中央委員155人，按姓氏筆劃坐在前面，候補中央委員100人，坐在後面。

會議原計劃15點開幕，委員們早早就到了，一直靜靜地等著。

15點45分，毛澤東在前，林彪在後，微笑著從休息室出來，走上主席台，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緊隨其後。全會開幕式由毛澤東主持，宣佈我們的二中全會現在開會，請林副主席講話（另一種說法，毛澤東問常委，你們有什麼說的，林彪說我要講"一點意見"，所以毛澤東後來把自己的文章定題為《我的一點意見》）。[30]

這裏有一個背景鮮為人知。1970年4月，第一顆衛星上天後，毛澤東破天荒地專門到蘇州看望林彪。毛澤東此行還帶著張春橋，本來說到林彪住處，林辦的工作人員都收拾好了。毛澤東沒有來，把林彪和葉群召到專列上，說你身體看來還不錯，今年上山你也上山吧（指九屆二中全會）？林彪說，我身體好就去。並建議：這次上山把一些幹部問題研究一下，"文革"搞了三年半，一些老帥和副總理還沒有解放，這次請主席解決一下，這些人過去跟主席南征北戰，今後搞社會主義建設，還得靠這些人。他們過去忠實主席，今後也會忠實主席。葉群把雙方的對話都記錄下來。葉群記錄的速度很快，事後整理，八九不離十。這件事，林辦秘書都知道，于運深對我說過。葉群回北京在部隊高級幹部中傳達過。[31]

林彪到廬山的下午，與陳伯達談了一個多小時，商量如何對"陸定一式的人物"張春橋發動進攻。8月22日晚，陳伯達又到林彪住處，他非常希望林彪能在會上講話。陳伯達

認爲“九大”以後，無休止的運動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在繼續發展，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長期處在這樣的狀況是極不利的，共和國承受不起。好幹部受不起勞累辛苦，“壞”幹部受不起摧殘折磨，人民也受不起長期的無政府狀態。造成這種局面，在主席那裏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張春橋。江青不能碰，碰碰張春橋還是可以的。張春橋的問題不解決，對黨的事業危害實在太大。陳伯達樂觀地認爲，在羅瑞卿、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賀龍的問題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意見都一致（實際上並不一致）。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張春橋的問題，毛主席肯定會支持。

林彪沒有表態，只說如果要講，明天開會前向主席報告一下。[32]

于運深回憶：林彪要在全會上講話，讓我們準備一個稿，搜集北京突出政治有些什麼效果，還強調要發展經濟，沒有提出設國家主席。[33] 宋德金（林辦秘書）回憶：林彪讓我們準備五個資本主義國家，美英法德日由弱變強的資料。[34]

這些都是對付張春橋的。因爲張春橋反對稱“天才”，所以“武器”就是“天才論”。

8 月 21 日，葉群在秘書給林彪起草講話提綱時說，首長一直堅持天才的提法，有人否認天才，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反對首長。在討論修改《憲法》時，在天才問題上有爭論，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否認天才，否定十一中全會公報，甚至連國家元首的提法也不同意。葉群說，設國家

主席還要堅持。談到天才問題，葉群從皮包裏拿出一把語錄卡片，說如果不講天才，馬列還算不算數？[35]

吳法憲回憶：本來葉群在山下已經讓秘書爲林彪準備好了講話稿，上山後，林彪卻不想講了。[36]

李文普（林彪警衛秘書）回憶：開會前講不講那番話，林彪表現出猶豫不定的樣子。上車前，我在旁邊，曾聽見林彪問葉群，這話今天講還是不講？葉群說，要講！到最後一刻，林彪才決定拿張春橋開刀。[37] 事後林立果打電話給張雲生（林辦秘書），罵葉群瞎指揮，翻“車”了，倒大霉，全怪她指揮錯誤！[38]

爲什麼林彪在講話前猶豫？他害怕什麼呢？

“九大”時毛澤東也曾讓他口頭講政治報告，到最後一刻他還是照本宣讀。他想到 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的口頭講話了嗎？想到他的講話會讓自己死無葬身之地嗎？

林彪講話毛澤東事先知道嗎

一年後毛澤東南巡，說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39]

林彪講話的內容，毛澤東事先真的不知道嗎？

林彪講話全篇除了“吹捧”毛澤東，就是不指名地批判張春橋，毛澤東在會場從頭聽到尾，他爲什麼沒有當場反對，還同意全會再聽林彪錄音，並印發呢？

汪東興回憶：1971 年 9 月 11 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王

洪文（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市委書記）、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說到廬山會議，王洪文說，當時我們心裏就嘀咕，毛澤東說你們嘀咕什麼呀？人家是副主席講話呀！王洪文說，當時我們華東組，除了林彪的一幫人搶著發言外，我們也發了言，我也講了幾句。事後，聽說林彪講話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講的，特別是論"天才"的語錄也以爲是中央搞的。毛澤東說，誰說這個論"天才"的語錄是中央搞的呀？當時我們發了語錄沒有？哪一個文件上說發了語錄呀？哪一個文件上寫有這幾條語錄呀？但是毛澤東沒有反駁王洪文關於"林彪講話是中央同意"這句話。[40]

陳伯達回憶：開會前，毛主席單獨和林彪談話，我們在別的房間等，等的時間不短。毛主席和林彪單獨談話後才開的大會。[41]

從陳伯達披露的材料看，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內容經過毛澤東的同意。開幕前，林彪與毛澤東關在屋子裏單獨談了 45 分鐘。[42] 下廬山後，林彪說他的講話是經過毛主席的，這些話，見到主席也講過。後台講的話，搬到前台去講，講稿上本來沒有，廬山幾天都沒有睡好，他昏昏盹盹講了。[43]

散會後，林彪對陳伯達說，他的講話毛主席是同意的。[44]

葉群在台下悄悄對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說，101（林彪）講話前請示了主席。[45]

開幕式的時間過了，汪東興看毛、林還未出來，就到休息室問。周恩來說，主席和副帥還在談話，再等一會兒吧。

葉群回來說，首長（林彪）開會前與主席談話，她在走廊"放哨"，防止"11 樓"（江青）闖進去，把周恩來和康生都擋住了，沒讓進。[46]

吳法憲回憶：在毛主席和林彪的單獨談話中，林彪問毛主席，可不可以講（張春橋）？林彪說，我聽吳法憲講，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發生了爭論，張春橋不贊成寫上國家機構要以毛澤東思想爲指針，還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了馬列主義，我想講講這個問題。毛主席聽了以後說，這不是張春橋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是江青在背後搞的鬼。你可以講，但不要點名字。[47] 如果吳法憲的話屬實，就很有"陰謀"了。

果然林彪在大會講話時，沒有點張春橋的名。

果然各組討論時，也沒有點張春橋的名。

雖然沒有點名，但張春橋已經魂飛魄散，手一直在抖，手上的香煙掉在地上還不知道。開幕式除了五名常委坐在主席台上，政治局委員都坐在台下第一排，張春橋挨著邱會作。總後的造反派支持張春橋向上海市委奪權，差點把邱會作打死，所以邱會作後來不和張春橋說話。而此時，張春橋掏出一支香煙：老邱，請抽煙！卻忘了邱會作根本不會吸煙。[48]

會後，葉群交代吳法憲串連一些人在各組會上發言支持林彪講話。中午，吳法憲藉口談防空，找王維國（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空四軍第一政委）、陳勵耘（浙江省革委會副

主任、空五軍政委），告訴他們林彪講話有所指，但在發言中不要點名，只講擁護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和有人反對天才這兩個問題。至於指的是什麼人，吳法憲在手上寫了“張、江”兩個字。下午吳法憲對李作鵬、邱會作說，要鼓動本單位的熟人對林彪講話表態，設國家主席問題仍要堅持，並說汪東興打電話告訴他要堅持這個意見。吳法憲說，我已經向空軍的人打了招呼。[49]

8 月 24 日上午，全會重放林彪講話的錄音。早晨剛 7 點，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就到林彪別墅來了。葉群說：我先給你們講講首長的意見。第一，首長的講話是大是大非問題，要宣讀語錄，要在各組表態擁護，堅持天才的觀點；第二，堅持設國家主席，要用眼淚表示自己的無產階級感情；第三，發言中千萬不能點張春橋、康生的名，更不可摸“11 樓”的“屁股”；第四，不要擴大打擊面，打擊面寬了，毛主席那裏通不過。最後葉群說，今天下午分組討論，你們都要發言。如果你們不發言，首長的講話就沒有根據了。要堅持天才觀點，堅持設國家主席，集中攻擊“陸定一式的人物”，但打擊面要小，不能點名，不能涉及康生和江青。要串連空軍、海軍、總後的中央委員們。吳司令，最好你先發言。吳法憲點頭說好。葉群又對邱會作說，你是不是也可以早些發言？邱會作說，我一定要發言，但我們是否有先有後，不要那麼整齊，否則簡報上一登，都是軍委辦事組的人，那樣不一定好。葉群邊說邱部長的意見很好，想得周到，邊看李作鵬。李作鵬說，我的發言好辦，葉主任和我一個組，

可以隨時商量。[50] 看來邱會作和李作鵬就不那麼積極，當然位置也不一樣，黃吳李邱，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黃永勝第一，吳法憲第二嘛。

黃永勝，湖北咸寧縣人，1910 年生，1927 年參加秋收起義，1955 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他一直是軍事幹部，很能打仗。最後一任職務雖然還是軍事幹部，但總參謀長在“文化大革命”中，卻是個比“政工”還“政工”的位置。

吳法憲，中將，江西永豐縣人，1915 年生，1930 年參加紅軍，一路“政工”上來，說是與“軍事”無緣，但實際上吳法憲打仗很有一套，深得林彪的信任，最後一個職務是由劉亞樓臨終前推薦、林彪提名成爲空軍司令員。

李作鵬，中將，江西吉安縣人，1914 年生，1930 年參加紅軍，後來幾乎全在作戰部門和院校工作，與吳法憲相反，從來沒有幹過“政工”，而最後一個職務竟是海軍第一政委。

邱會作，中將，江西興國縣人，1914 年生，1929 年參加紅軍，先幹“後勤”，後與“政工”結緣，最後一個職務還是老本行，總後勤部部長。[51]

“文革”初，四位將軍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衝擊。邱會作最慘，多次被批鬥，被打斷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兩處肌肉撕裂，差點丟了性命。乘看守疏忽，他寫一張紙條，向毛澤東、林彪求救，葉群拿著林彪和陳伯達的手令把他救出來。[52]

因爲這四個人都出身四野，所以葉群“團結”他們。

很快一個小時過去，該去開會了。葉群說，我也要發言，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發言要充滿感情，要用我們的眼淚表達對毛主席的熱愛。

葉群對陳伯達也說了同樣的話。

對於葉群的單兵"教練"，陳伯達半信半疑。當晚他去問林彪，林彪沒有正面回答，反問他聽誰說的，陳伯達說是葉群，林彪說，這事你知道就行了。[53]

林彪講話都有些什麼內容

8月22日下午，毛澤東在住地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商定九屆二中全會的日程和分組、在京值班等事宜。毛澤東建議，除了討論《憲法》和計劃問題外，還要增加一項內容，談一談當前的形勢。毛澤東說據他所知，大家有興趣的問題是形勢問題。康生強調《憲法》修改了很久，《憲法》起草委員會也開過一次會了，全國人民也正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毛澤東說《憲法》修改草案可以發給大家看，但是大家有興趣的還是形勢問題。那時在華沙我們已經開始和美國代表接觸，冰凍幾十年的中美關係正在醞釀解凍。美國想與中國接觸，屢屢放出空氣，在華沙，中國已經開始和美國代表接觸。過去不共戴天的敵人突然成了握手言和的朋友，這個彎子轉得急了點，毛澤東的意思是要給高級幹部打個招呼。

經毛澤東一再說，林彪、周恩來、陳伯達都表示同意，

康生也同意了。毛澤東說，我主持會議，由總理講形勢，修改《憲法》的問題由康生講。康生推脫，《憲法》問題也由總理一道講了吧。毛澤東說，那你們兩個商量好了。[54]

在毛澤東眼中，似乎形勢問題比"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更重要。可是，康生為什麼推脫？"講形勢"是周恩來的任務，周恩來最後也沒有講，而沒有講話任務的林彪8月23日卻講了話。

林彪手裏有個講稿（提綱），但他沒有照本宣科，他一向喜歡自由講。一開始林彪就說：昨天晚上，主席召集了常委會，對這次會議做出了指示。這幾個月來，對於這個《憲法》的問題和人代會的問題都是很關心的。這個人代會的發起，這個會的召開，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認為是很必要，很合時宜。在這次國內、國外很好的革命形勢下來開這個會。

與會者聽了這樣的開場白，幾乎都認為是政治局常委研究決定林彪發言的。整篇講話，都是林彪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大加"頌揚"。他特別強調：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學問，他的實際經驗，不斷地發展出新的東西來。

林彪說：這個會和人代會以及《憲法》，對於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反帝反修的鬥爭，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會是有影響的。全會這次的三個題目，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間的大事，三件大事。這次我研究了這個《憲法》，表現出這樣一種情況的特點，一個是把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

種地位，毛澤東思想作爲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55] 是《憲法》的靈魂。這個《憲法》把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非常好，非常好！這是30條中間最重要的一條，這條反映出我國革命經驗中間最根本的經驗。

林彪接著說：毛主席，是大家所知道的，是我們黨、軍隊、政府、國家的締造者和領導者。毛主席的這種領導可以說是我們勝利的各種因素中間的決定因素。因素總是多種的，不會是平均的，但是，它必然有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客觀的物質條件當然很好，但是很多國家也有很好的條件，他沒有成功。我們是既有這種客觀物質的基礎，加上這種主觀的正確的領導，轉化爲物質力量。所以，使得我們成爲勝利的國家，勝利以後，繼續前進的國家，而不是中途停頓的國家。是繼續革命的國家，是毫無修正主義的這種氣味，沒有被這種世界修正主義的潮流所同流合污。中流砥柱，是很不容易的，擔任這一個逆流，是很不容易的。

毛主席的這種領導的地位是鬥爭中間形成的，是幾十年的鬥爭中間形成的，是在黨內兩條路線的較量中間來比較出來的。所以，這個領導地位，就成爲國內國外除極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認的。中國革命，半個世紀的歷史都證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確的方向，代表歷史發展的要求，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麼陳獨秀呀，李立三哪，瞿秋白呀，王明呀，劉少奇呀，中間還有個張國燾，還有什麼張聞天，這些，照著他們的領導走下去，就會把革命引向失敗，

就會要造成這種革命的重大損失。我們很信任的，在這種各個重要的歷史關頭，看到毛主席扭轉了這種形勢，使它轉危爲安，轉弱爲強，轉敗爲勝。

這是大量的、長時間的、重大的事實所鐵一般地證明了的事情。差不多可以說是我們的工作的前進或後退，是勝利或者是失敗，取決於毛主席對中央的領導地位是鞏固是不鞏固。有的時候是鞏固的，但有些時候是不鞏固的，有些時候是很不鞏固的，而有些時候是被排斥的，是處於一種"下野"狀態的。並不是今天這種情況，完全不是今天這種情況。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貫徹的時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敗。得到貫徹的時候，就蓬勃地發展。可以說這已是我們看慣了的事情，其例子是不勝列舉。而這些經驗，我們同志們必須記住，必須把這種迷迷糊糊的思想，變成自覺的思想。必須，特別是年老的這些同志，要把這些思想向下傳播，傳下去。使這些年輕的同志知道來之不容易，就是勝利絕非偶然，不是那麼簡單的、自然的、必然的就可以成功的。它也可以失敗的。很多國家，像歐洲這些國家都進行過共產黨的革命，聲勢很大，力量很大，都失敗了嘛，有很好的客觀形勢都失敗了。很好的形勢沒有搞起來，或者搞起來失敗了。

勝利以後這20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這個時期以來，繼續和更加證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我的看法是這樣子，老實講，不管什麼地方，不管什麼部門，什麼單位，毛主席的威信比較高一點的地方，對於毛主席的著作比較肯學一點、肯用一點的地方，人的精神面貌就改變，跟之而來

的就是物質的這種面貌強大的變化。不是小小的變化，而是一種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原來認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到了。這就是毛主席的這種革命的精神和實際的精神，也就是說具體的政策、具體的做法、具體的批示，一旦深入群衆的時候，一旦群衆領會的時候，那就是排山倒海的力量來發生變化。主觀世界的變化引起客觀世界的變化。

這一點，各個地方，各個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認識是可能不一樣的。這也是很自然的，一切事物總是不平衡的，總是有差別的。敵人當然是反對了，不屑說得了，就是黨內也是不平衡的。我雖然因為身體不好，不能到基層去跑，但是我也有我的小辦法，我就派些人下去問，碰見都是這麼一種情況。不是別的原因，就是用毛澤東思想教育群衆，同時狠批四舊的思想，走資派的思想，劉少奇的思想，開展階級鬥爭，運用毛主席的這種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存在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鬥私批修的一種指導。

你們大家是不是覺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起作用。另外還有其他的這些具體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學思想，這些都起作用，還有政治思想，多了。幾十年嘛！各種問題都接觸了，各種問題都有指示。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的，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我們這些人都是參加革命嘛，毛主席幾十年寫的東西，我們現在都覺得是比我們現在，比我的水平高，是有創造的。不但說是社會科學方面可以是創造的，自然科學裏面你看哪一天不在創造？毛主席的學說就是科學嘛，社會科學嘛，解放人民的科學嘛，解放無

產階級的科學嘛。他處在新的時代嘛，當然有新的發展。怎麼能夠說沒有發展？說是沒有發展，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說事物是不發展的，思想也是不發展的。這是過去的思想，已經結束的思想，毋用發展嘛，只要舊的就行了嘛。這個在歷史上有很多、很大的思想家常常想做這樣的想法，這樣的看法，想把思想停下來，認為是已經完成。在自然科學方面，社會科學方面都有，不承認這個發展。可是事物總得發展嘛，原來地球就是一團火嘛，然後慢慢地變成又有空氣嘛，水嘛，然後慢慢有低級的生物嘛。然後慢慢有動物嘛，高級動物嘛，低級的社會嘛，高級的社會嘛。現在我們是處在一種世界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崩潰的時代。同一百年前，百把年前的馬克思時代，我們這個時代是前進了很多了，比列寧所處的時代也前進很多了，所遇到的重大事變，跟當時他們所遇到的重大的事變，也多得多，大得多，快得多。如何能說是沒有發展呢？毛主席不是都回答了這些問題嗎？不是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來回答了這些問題嗎？把馬列主義的這種普遍眞理與現在的國際和國內實際情況相結合，毛主席個人的這種天分、學問、經驗來創造出新的東西來。而毛主席這些著作中間所發揮的地方，所具體化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東西，你們翻開馬列著作中間他不可能有的。他沒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這也是很自然的，他沒有那個客觀嘛，因此，不能對於新的問題做出預先的答覆和解決。所以不能說是沒有發展。這還是形而上學的觀點，事物是不動的，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生命的，可變化的，而是隨

著條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這種觀點不符合馬列主義的起碼的原則的，是反馬列主義的。這點值得我們同志們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爲他那個中央不同。在我們這個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共產黨當權的國家，最高的一聲號令，一股風吹下去，就把整個的事情改變面貌，改變面貌，改變面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值得把腦筋靜下來想一想，是不是這回事情？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敢於這樣勇敢地向敵人進攻，來發動革命，狠狠地打擊這些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資派和各種階級敵人，大大地發動工農兵廣大群衆，這個是同毛主席這種高瞻遠矚和革命的這種魄力，一些馬列主義的水平，一些歷史的廣闊的眼界是分不開的。我們不要忘記了，我們這個黨、國家、軍隊今天在國內取得這種地位和在國際上這樣的威望，這個是同毛主席的領導，幾十年來的這種鬥爭是分不開的。這次《憲法》裏面我很感興趣的，就是這個第一點。就是剛才講的第一點。……[56]

林彪翻來覆去講了一個半小時，講得很亂，文句多有不順，而且有些不知所云。汪東興看見毛澤東越聽越坐不住，明顯地表現出不耐煩。[57]

毛澤東真的不耐煩了嗎？爲什麼毛澤東會不耐煩？根據錄音整理的印發稿看，林彪講話都是即興“吹捧”，並沒有說一句設國家主席的事情。這是不是汪東興事後按毛澤東的態度和批林的調子編的呢？從後面的事情發展看，林彪不提國家主席，實在是太“狡猾”了。這樣就產生了第二個疑點，

如果毛澤東真的不耐煩，你汪東興也清清楚楚看到了毛澤東不耐煩，爲什麼還敢在華北組“煽風點火”？看來“文化太低”的汪東興把毛澤東的不耐煩理解錯了，偏偏在華北組大肆“煽動”設國家主席，活該他接二連三檢討不止。

按大會議程，林彪講完後是周恩來講話。

汪東興回憶：主持會議的毛澤東用很不高興的語氣對周恩來說，你講吧。周恩來一看這種情況，不講了，康生也不講了。[58]

確實周恩來在開幕式上沒有講話，但是康生講沒講呢？陳伯達回憶：林彪講話後，康生提議讓我講，我沒有講，康生就講了，還引用了林彪的話。[5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年譜》和《毛澤東傳》都證實康生講了話。

有人追問汪東興，汪東興說記不清了。

記不清就說記不清，爲什麼說康生沒有講呢？

根據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記錄，林彪講完後，康生發言，表示對林彪講話“完全同意，完全擁護”，還說在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的意見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麼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那麼國家主席這一章就不設了。[60]

原來，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的意見出自康生。

林彪講話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掌聲響了好長時間，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瀋陽軍區司令員）等

主動跑上台與林彪握手。[61]

分組討論時，林彪的講話得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擁護。據說，200 多個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只有毛澤東、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少數人沒有發言，其他人都發言了，而且都表示擁護。[62]

當時，除了張春橋幾個，大多數人沒有聽出弦外之"音"。

吳德（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說，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副統帥，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當時認爲他是代表中央講話的，沒有感覺出有什麼特別的意思。[63]

誰提出聽林彪講話的錄音

誰佈置的聽林彪講話的錄音，陳伯達並不知道。[64]

現在流行的說法是，吳法憲在會上建議，明天全會播放"林副主席"的講話錄音，各組要學習。可是知情者說，吳法憲並沒有說聽"錄音"，只是提出要認眞學習"林副主席"的講話。許世友、陳錫聯、李德生隨聲附議，坐在周恩來旁邊的江青吊著臉，一聲不吭。一向趾高氣揚的張春橋、姚文元躲在後面，也沒有表態。

如果吳法憲沒有提出聽"錄音"，那麼是誰提出聽的呢？是汪東興（怎麼又是他）說，再聽一聽林彪講話錄音，因爲有人提出，林副主席的講話有些地方沒有聽清，有些地方口音重，希望再聽聽錄音。吳法憲馬上說：對，我支持這個意

見。周恩來也立即表示同意。[65]

根據大家的意見，周恩來取得毛澤東的同意，決定明天用上午半天的時間開大會聽"錄音"，下午再分組討論林彪的講話。政治局會議同意這個建議。[66]

周恩來提議聽兩遍林彪的錄音。[67]

8 月 24 日上午，連著播放了兩遍林彪錄音。全體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一個不漏，除毛、林外，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都來了，連一向不參加集體活動的江青也來了。所有的人都伸長了耳朵，這回可徹底聽清楚了，可是林彪講話的矛頭究竟指向誰呢？

汪東興回憶：播放錄音時，有人（誰？）提議要將林彪的講話稿印發給每位代表，與會者鼓掌表示同意。周恩來讓我請示毛主席，毛主席說，他們都同意印發，我沒有意見，你就印發吧，還囑咐要由林彪審定後再發。我將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電話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說，你抓緊辦理，先印出清樣，送常委審閱。我讓王良恩去林彪那裏取講話稿，他沒有拿來，25 日又去拿，還是沒有拿來。[68]

因爲林彪講話沒有稿子，很亂，陳伯達叫葉群把記錄稿拿來，由他整理。[69]

8 月 26 日一大早，周恩來就全會印發林彪開幕式講話一事致信康生：爲使林副主席講話不發生任何副作用，請你起來後認眞讀兩遍，有需要改動處，請用鉛筆改，於午前退我親收。此事純屬愛護副帥，忠於黨，忠於領袖，以此共勉，暫勿告人爲懇。午前康生將林彪講話稿退給周恩來，說我看

了兩遍，只在第三頁上改了一個標點。如果林副主席同意發表，我看可以印發給到會同志們學習。[70]

陳伯達編好了"林彪語錄"

人們只知道陳伯達在廬山上編了馬列語錄，卻不知道他還編了"林彪語錄"。

語錄並不是什麼新發明，古代的《論語》就是語錄體。《毛主席語錄》出版前，馬恩列斯毛的各種專題語錄也出版過，陳伯達當過編輯。

林彪主持軍委工作後，指示《解放軍報》：爲了使戰士在各個時期、各種情況下都能及時得到毛主席思想的指導，《解放軍報》應當經常選登毛主席的有關語錄。從 60 年代初起，軍報經常在突出位置發表毛澤東的一段或幾段話。最初散見各版，後來固定到一版右上角的"報眼"，並每天不斷，成爲軍報的特有標誌。到 1965 年底，特別是 1966 年中間，全國的報刊都開始仿效。

最早的"語錄"單行本出現在 1964 年 1 月，書名叫《毛主席語錄 200 條》，16 開的徵求意見本，作爲全軍政工會議的文件發給與會代表。1964 年 5 月，《毛主席語錄》正式出版，根據林彪指示，軍隊幹部每人一本，每個建制班一本。最後擴大到所有的戰士，人手一册。[71]

1965 年 12 月 28 日，代總長楊成武給劉志堅寫信：說毛主席指示陳伯達編寫一本全國通用的毛主席語錄，擬六萬

字左右，現只編寫出一部分，約三萬多字，給我送來一份。陳伯達說，這本語錄是在總政和各地所編寫的主席語錄基礎上編寫的，要徵求總政意見，將來他們討論時還要請總政派人參加。此事我已經向林副主席報告過，林副主席指示，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現將送我的一份稿轉上，請你即報告有關同志先研究，待陳伯達徵求意見時，即可告伯達同志或參加研究。並請將結果告我一下。

最後不知道爲什麼編好了沒印，流行的仍是解放軍報社的那本《毛主席語錄》。不過，編《語錄》對陳伯達來說不再陌生了。

大概是"林彪語錄"比較現成吧，陳伯達很快編了八條林彪講天才的語錄。

1、毛主席個人天賦很高。他記性很強，理解力很強，無論讀書的理解力，或對事物的理解力，從現象看本質的能力，都很強。他的頭腦是非常清楚的，天資很高。（1959 年 9 月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2、19 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20 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爲我們的領袖。（1966 年 5 月 18 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3、毛主席所經歷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多得多。當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偉大的人物。馬克思

活了 64 歲，恩格斯活了 75 歲。他們有很高的預見，他們繼承了人類先進的思想，預見到人類社會的發展。可是他們沒有親身領導過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像毛主席那樣，親臨前線指揮那麼多重大的政治戰役，特別是軍事戰役。列寧只活了 54 歲，十月革命勝利後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沒有經歷過像毛主席那樣長期、那樣複雜、那樣激烈、那樣多方面的鬥爭。中國人口比德國多十倍，比俄國多三倍，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哪一個能超過。毛主席在全國、全世界有最高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天才。（1966 年 5 月 18 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4、毛主席是當代無產階級最傑出的領袖，是最偉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責任感，最現實的革命精神。（1966 年 8 月 8 日接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時的講話）

5、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現在世界上沒有哪一個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1966 年 9 月 18 日關於把學習毛澤東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的講話）

6、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同上）

7、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1966 年 12 月 16 日《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

8、不能離開中心。中心就是太陽，九大行星圍繞太陽旋轉，一切工作圍繞太陽轉。毛主席就是太陽。毛澤東思想就是太陽。（1970 年 5 月 19 日接見總政治部副部長以上幹部時的講話）

本來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手稿中有一句，“陳伯達摘引林彪同志的話多至七（八）條，如獲至寶”。中共中央轉發時，刪去了這句話，因爲林彪語錄並沒有印發。本來林彪語錄是要和馬克思主義的天才語錄一起印的，被林彪給“槍斃”了。[72]

但是，這份沒有出籠的“林彪語錄”爲什麼也到了毛澤東手裏？

“語錄”是如何印製的

陳伯達回憶：開幕式散後，我先去問林彪。出來路過軍委辦事組，就進去了。因爲林彪講話中堅持“天才”，他們問是否可以找一些語錄。我答應這件事，實在太魯莽，因爲上山時我並沒有想這個問題，僅帶了《列寧選集》。我讓秘書連夜從廬山圖書館找，又打電話請北京找。[73]

王保春（時任陳伯達秘書）、王文耀（時任陳伯達秘書）回憶：廬山會議前，陳伯達沒有準備過任何天才的語錄。他由繆俊勝（八三四一部隊幹部，1969 年兼任陳的秘書）陪著上廬山後，在北京的我們才接到繆俊勝從山上打來的電話，要我們與中央政研室的人聯繫，幫助找一下有關天才的語錄。隨後我們將政研室工作人員找到的“語錄”通過中辦收

發室送上廬山。與此同時，隨陳伯達上山的史敬棠等人也幫助找到幾條。

這幾條"語錄"讓陳伯達後悔死了，罵自己太荒唐，害人害己，犯了大罪，不過他怎麼也沒想到被判18年徒刑。

因爲太匆忙，陳伯達沒有查到馬克思論天才的語錄，也只能這樣了。連夜編成七條"語錄"。找到一條就用電話告訴吳法憲，再另外抄好，第二天在（林彪講話錄音）大會上，陳伯達把找到的"天才語錄"交給汪東興，說可以考慮印一下。

汪東興回憶：8月24日中午散會時，陳伯達在禮堂門口塞給我一份材料，他對我說印5份。我問，你是要發給常委嗎？他說是。我一看要印的材料是幾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稱天才的語錄，我考慮常委看完後，可能要發給政治局委員，就交代會議秘書處印20份。[74]

汪東興特別強調：這件事，毛主席、周總理都不知道。

按陳伯達的說法，他是在會上，而不是會後把"語錄"交給的汪東興。

要是陳伯達的話屬實，那事情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這就是說，聽林彪錄音時，汪東興同時接辦兩件事，一件是周恩來交辦的要他請示毛澤東印發林彪講話，另一件就是陳伯達要求印5份"語錄"。汪東興只說毛澤東讓印發林彪講話，而沒有提及"語錄"。

如果眞像汪東興說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不知道，那很可能是汪東興認爲印幾條語錄嘛，還能犯什麼錯誤？所以他就交代會議秘書處印20份。可是"語錄"成了陳伯達的罪狀，你汪東興就一塵不染嗎？按常情，汪東興散會後請示印發林彪講話，不可能"貪汙"印發"語錄"。汪東興屁大一點小事都要彙報，印發"語錄"這樣的大事，怎麼可能不如實彙報呢？而且也沒有"貪汙"的理由嘛。如果汪東興私自印"語錄"，日後一定是一條大罪狀。僅憑這一條，打倒汪東興就有足夠的理由。你和陳伯達穿一條褲子還嫌肥，陳伯達打倒了，你還能跑得掉？更何況在華北組，你汪東興的調門比陳伯達只高不低。可是卻始終沒有追究汪東興印"語錄"之罪。

"語錄"印出來，還沒有發，當晚就風雲突變。各大組的發言匯總上來，有幾個人已經在發言中引用了"語錄"，汪東興感覺有問題。這時整個廬山迷霧重重，你汪東興怎麼可能有比毛澤東還高的覺悟，認識到"語錄"有問題？汪東興自己說，他馬上打電話報告周恩來，說陳伯達讓我印，我還沒有發，怎麼辦？汪東興把"球"踢給周恩來。一向大事小事都請示的周恩來經受住了"考驗"，這回沒有請示，非常堅決，這個"語錄"不能發，封存吧。汪東興馬上把陳伯達提供的"語錄"原稿和已經印好的20份"語錄"全部封存了。

"語錄"終於成了焦點。毛澤東說：誰讓印刷的？辦公廳有壞人。汪東興馬上認識到問題嚴重，在政治局擴大會上兩次口頭檢討後，又急急地寫了三次書面檢討，第三次書面檢討很長。在檢討中汪東興把印"語錄"的責任推得乾乾淨淨，說陳伯達讓我印"語錄"，現在看，是陳伯達的陰謀詭計，可能是要我發言時引用，結果未得逞。[75]

或許從一開始毛澤東就想“放”汪東興“一馬”：你是辦公廳主任，你不是有意要印陳伯達搞的“語錄”，他是常委，他要你印一些東西是可以的。以後也沒有用上。總理讓封存起來，你就封存了，沒有擴散。這是對的。[76]

儘管是“連滾帶爬”，汪東興還是過了關。

按汪東興的說法，“語錄”雖然印好了，但並沒有散發。

是全部封存了嗎？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一開頭就說，這個材料（語錄）是陳伯達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如果按汪東興說的全部封存了，怎麼還可能“欺騙了不少同志”？汪東興顯然撒了謊。首先不管別的，毛澤東那裏就有一份。因爲毛澤東把《我的一點意見》的原文用鉛筆寫在陳伯達搜集的《恩、列、毛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和《林副主席指示》打印稿的空白處，幾乎沒有修改。第一頁空白處寫滿，轉到第二頁，再寫在背面。周恩來校對排印清樣後，讓毛澤東最後審閱，題目《我的一點意見》是毛澤東在審閱批語的抄件時加寫的。[77]

汪東興回憶：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分別在各組帶頭發言，他們在同一時間，引用同樣的語錄，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統一口徑，大肆煽動。[78]

不是都封存了嗎？“他們”怎麼得到的《語錄》？僅僅睡個午覺，就印出來了？

陳伯達事發後，周恩來格外忙碌，爲配合毛澤東查明來龍去脈，調閱了各大組的發言記錄，發現幾個“宣講員”的發言驚人的一致。於是周恩來和康生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追查他們到各組“宣講”的由來，結果查到了陳伯達編選、通過汪東興印發的“語錄”。周恩來將吳法憲手中的“語錄”轉給毛澤東，還特意調閱了存檔在北京的“三個副詞”[79]的檔案原件，供毛澤東和政治局委員參閱。

葉群在檢討中說，8 月 24 日晚我參加中南組的討論，到會時剛好接到辦事組同志寄給我的一份論天才的語錄。發言時爲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幾句。回家後才從辦事組同志的電話中知道是陳伯達連夜搞的。[80]

吳法憲交代，8 月 23 日零點以後，陳伯達找我和李作鵬、邱會作談過關於天才方面的問題。我讓秘書用電話把“語錄”記下來，再印出來。這裏有個疑點，誰印的？是吳法憲印的嗎？可是，他在北京有條件印，上了廬山，他怎麼可能印？那時又不像現在，到處都是電腦，廬山上只有汪東興有印的大權。寫交代材料時陳伯達和吳法憲都已經是犯人，他們怎麼敢揭發仍在高位的汪東興？

據知情人說，汪東興並不是他說的印了 20 份，而是印了 25 份，因爲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是 25 人。汪東興印好，親自給了吳法憲 5 份，讓軍委辦事組先睹爲快。有人說，老汪呀，你搞得眞快呀！汪東興得意地說，我管會務，我有辦公廳嘛，方便得很！[81]

眞不可思議，汪東興爲什麼老給吳法憲吃“小灶”，還嫌吳法憲不夠“胖”嗎？

陳伯達和汪東興，誰的發言更厲害

8月24日下午開始分大組討論林彪講話。所有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按六個大區華北、東北、西北、西南、中南、華東編成六個大組，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插到各組參加討論。按說編組不應該有什麼"機關"，但因爲發生了"反革命"的第六號簡報，再往前看這個編組就顯得大有名堂了。

大會編組是按六個大區來編的，[82] 由汪東興負責的中央辦公廳安排。毛、林、周等沒有編組，江青"自由"，許世友、張春橋、李德生插在華東組，李先念、葉群、李作鵬插在中南組，邱會作、姚文元插在西北組，吳法憲插在西南組，陳錫聯插在東北組，陳伯達、汪東興、李雪峰插在華北組。

一向"盯"著胖子吳法憲的汪東興此時換了目標，"盯"上了老夫子陳伯達。陳伯達在華北組情有可原，他在中央分工華北地區。可汪東興就奇怪了，他負責會務，想在哪個組還不是隨便！爲什麼他哪個組也不去，卻偏偏熱衷於華北組？難道是吳法憲已經消化了"小灶"，而更重要的人物陳伯達還需要再添一把"柴"嗎？無論如何，因爲陳伯達、汪東興的加盟，華北組在六個組中最爲激烈，率先爆發了"原子彈"。

華北組召集人李雪峰，副組長吳德（北京）、解學恭（天津）、陳永貴（山西大寨黨支部書記）、吳濤（內蒙古），鄭維山（北京軍區）。組員郭玉峰（中央組織部）、劉子厚（河北）、陳毅（十大元帥之一、時任外交部長）、鄭任農、彭紹輝、蘇靜、錢學森、吳忠、黃作珍、楊俊生、尤太忠、劉錫昌、馬福全、呂玉蘭、王國藩、李順達、聶元梓等。大部分人發言後，陳伯達來了。主持人打斷正在進行的發言，請伯達同志先講。

陳伯達出口成章。毛主席是天才人物，沒錯，馬恩列斯都承認歷史上有天才人物。陳伯達回憶：我發言的內容已不完全記的，但天才問題是說了的……[83]

陳伯達在發言中說，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語重心長的講話。林副主席說，這次《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爲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寫上這一條是經過很多鬥爭的，可以說是鬥爭的結果。下面我想講一下關於天才的問題。

林副主席經常說，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是當代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

陳伯達引用了林彪幾段論天才的語錄後，說這是多年的話了。林副主席這些話已發表了多年。但是現在竟然有人胡說"毛澤東思想天才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些話是一種諷刺。如果大家不忘記的話，我想大家會記得，林副主席這些話寫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上，是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但是竟有人說這些話是一個諷刺。這樣的人要否定公報，要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吳法憲同志說過一句

很好的話，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這是絕對辦不到的。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已經覺悟了的中國人民，很快就識破了這種陰謀詭計，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取得了偉大勝利之後，有人竟然懷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歷史的翻案。我就提出這個問題。

有人說世界上根本沒有天才，但是他們認爲他自己是天才。我們知道，恩格斯多次稱馬克思是偉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寧多次稱讚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稱馬克思、列寧是天才。我們也稱過斯大林是天才。否認天才，是不是要把馬克思、列寧全盤否定呢？更不用說要把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一筆勾銷。我看這種否認天才的人無非是歷史的蠢才。要趕快覺醒起來，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意志爲轉移的。

列寧說在現代社會中，假如沒有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出來的）、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無論哪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按照列寧的說法，否認天才，就是否認領袖，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我聽了林副主席的講話，發表這樣一點意見。還有其他問題，以後有機會再說。說的不對，請大家批評。[84]

本來張春橋就不得人心，乾柴烈火，200 多中央委員一下就燒起來了。

廬山會議結束後，陳伯達想不通，提出"揪人"的汪東興穩坐官位，作爲黨內問題解決，連處分也沒給，而自己爲什

麼卻成了敵我矛盾。[85] 廬山會議結束後，李雪峰曾當面向毛澤東提出意見，結果李雪峰也被定爲敵我矛盾，被開除黨籍。

江青、張春橋他們先向主席告狀，已獲得勝利。後來毛澤東召集會議，江青、張春橋缺席，而李雪峰和陳伯達雖然出席，卻是充當被告。

但這是陳伯達的罪嗎？

在華北組，汪東興接著陳伯達發言：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的講話。林副主席的講話是很重要的，對這次會議有很大的指導意義。林副主席是我們活學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輝榜樣，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高，學得好，用得好。在關鍵時刻，林副主席的態度是正確的。這種態度代表我們的心意，代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動，堅決向林副主席指出的這個方向前進，並且努力緊跟。剛才伯達同志的發言，我也同意。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野心家，這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是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我看這種思想是最反動的。我們不允許這種思想在我們黨內氾濫。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和他拼到底。林副主席昨天講話中說，毛主席的領導地位，是在幾十年鬥爭中形成的，是在黨內兩條路線較量中比較出來的。這個領導地位。除極端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認的。林副主席還說，毛主席是我們黨、政府、國家、軍隊的締造者。毛主席的領導，是我們取得勝利的各種因素中的決定因素。我還記得林副主席早就說過，沒有毛主席，

也就沒有我們自己。林副主席特別強調，在《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爲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這一條是《憲法》的靈魂，是30條中最重要的一條。這一條是我國革命經驗中最根本的經驗。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這些精闢、透徹的闡述。另有一點建議，根據中央辦公廳和八三四一部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有的說不當國家主席可以減少些事務，如接見外賓等，事實上凡到中國來訪問的外賓，絕大多數主席都接見了，到中國來的外賓，主席不接見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見，影響是巨大的。建議在《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願望，是八三四一部隊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有的人不僅不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連毛澤東思想都不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可以識破這些壞蛋（陳伯達插話，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喜歡得跳起來了）。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把劉少奇篡奪去的權奪回來了，這個權如果再被壞蛋奪走，我們是不甘心的。我們的權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黨中央。[86]

汪東興回憶：當時我的情緒比較激動，本來毛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我是清楚的，有的指示還是我傳達的。但我當時沒有看出林彪、陳伯達等人積極主張設國家主席的險惡用心。在華北組的討論會上，我一聽陳伯達的發言就激動起來，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憲法》中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忘得一乾二淨了。也沒有認真分析考慮修改《憲法》時毛主席講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實質，更不顧自己的身分，以極不慎重的態度，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87]

是這樣嗎？你汪東興發完言，從華北組一出來，碰到了王秉璋（國防科委主任），連忙喊，王主任，抓緊發言喲，我已經發過言了。我們就是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表明我們的態度。汪東興似乎還不放心"軍妮"的吳法憲，立即給他打電話，我已經發言了，你們快點發言，也叫空軍、海軍、總後及其他軍隊同志發言。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今天發言表示你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明天發言就算隨大流了。

8月25日前，汪東興天天與吳法憲、葉群等人通電話，他似乎特別願意把"小道消息"告訴他們。當毛澤東一再追問第六號簡報，汪東興緊張了，立即打電話給軍委辦事組，暫停電話聯繫。[88]

汪東興到底是個什麼角色

于運深回憶：8月25日下午，毛澤東震怒，突然召開會議。林彪走後葉群才知道，立即調車追。車還沒停穩，葉群就急著下車，一屁股坐到地上，腿也擦傷了，盧山會議後半截她一直臥床。葉群對林彪說，如果會上有什麼情況，除了要保吳、李、邱外，千萬要保汪東興。看來葉群對汪東興是眞心實意，她感謝汪東興給她"通風報信"。而她卻沒有想

一想，汪東興是個什麼人物。[89]

因為汪東興是毛澤東的心腹，葉群想方設法與他拉關係。汪東興買大出血，子女當兵，葉群都跑前跑後，汪東興也非常感激，甚至還發幾句牢騷，誰都不管他的死活，只有葉主任關心。葉群的目的很明確，她需要汪東興源源不斷地報告“小道消息”，以便掌握毛澤東的動向，別讓林彪犯“錯誤”。林彪的原則是“緊跟”，很多事情葉群不可能從毛澤東嘴裏往外掏，她只能“曲線救國”。廬山會議葉群之所以敢點火，就是她從汪東興那裏取來了“眞經”。是有些奇怪，廬山上汪東興走得比陳伯達遠多了，而毛澤東對汪東興沒有一句責罵，卻在葉群的檢討上批，愛聽小道消息。可為什麼不查查葉群的“小道消息”從何而來？

葉群哪裏知道，她的一舉一動早在毛澤東的視線之中，她還以為自己多聰明。

楊余傅事件後，汪東興多次把毛澤東的“小道消息”送給毛家灣。邱會作回憶：還常到三座門找我們（黃吳李邱），甚至“抓”我們到家中密談。有一次，林立果也去了，汪東興說，如果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批車爾尼雪夫斯基，你們不要表態，因為毛主席沒有表態。林立果說蘇聯的“司機”有什麼批的，衆人大笑。汪東興說，張春橋最不是東西，又滑膽子又小，他以為巴結了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其實，上海“一月風暴”是主席、總理、伯達他們指揮的。張春橋想在上海搞什麼衛星中心，主席沒有同意。汪東興還說，穩定全國的局勢就靠軍隊了，你們幾位老總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後，不怎麼提中央文革了，這個江青、張春橋，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張春橋能靠邊站，江青也很難有什麼搞頭。[90]

王張江姚四個人中，王洪文年少幼稚，姚文元純粹是個文人，江青呢，好事找不到她，壞事全有她的份，衝鋒陷陣還可以，眞正搞個“陰謀”那可就差遠了。張春橋雖然也是文人，但他非常“陰”。看來只有他還拿得上台面，“九大”後，有人曾聽林立果說，毛主席問林彪：總理年齡大了，你考慮過他的接班人沒有？林彪說沒有。毛主席說：你看小張怎麼樣？林彪什麼也沒有說。[91] 毛澤東還對林彪說：張春橋這個人再看他兩年，兩年以後我不幹了，把班交給你，由你主持工作。林彪沒有說話。[92]

九屆二中全會前，汪東興悄悄從毛澤東辦公室把要求張春橋當總理的文件拿給陳伯達看。這是翻譯《共產黨宣言》的上海名人陳望道給中央的報告，要求讓張春橋當總理。陳望道在毛澤東心中的地位可非同一般。[93] 毛澤東回憶：1919 年 12 月，我第二次到北京，熱切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印象特別深刻，其中之一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本中文版，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以後就沒有動搖過。[94]

汪東興把要求張春橋當總理的文件拿給陳伯達看，不知道是否屬實。如果是眞的，是故意挑起矛盾呢，還是激將法？

8 月 21 日晚，汪東興給吳法憲打電話，邱、李兩個老

總都到了（廬山），你要抓緊給他們通氣，要提議設國家主席。這話汪東興已經和程世清（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軍區第一政委）說過一遍了，他又對文道宏（江西省負責人）說：你告訴程世清在會上要提設國家主席，明天委員們都到齊了，叫他告訴江西的同志們，在會上要提議設國家主席。主席說不當國家主席，是主席的謙虛嘛，那不是真的。不設國家主席，主席怎麼當主席呢？

8月22日一大早，文道宏悄悄告訴了程世清。[95]

汪東興爲什麼要大肆煽動？聯想廬山上，汪東興比陳伯達活躍多了，卻搶先把責任推到陳伯達身上。汪東興從"網"裏逃出來，而爲什麼陳伯達卻被打翻在地？汪東興不可能身在曹營心在漢，真心投靠毛家灣。那麼他是故意套近乎，摸毛家灣的底？還是有另外的背景？

如果都不是，那麼就是汪東興沒有理解毛澤東的意思。

關於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的態度，汪東興最清楚不過，爲什麼連汪東興也受了"騙"呢？爲什麼他如此熱烈地希望毛澤東當國家主席呢？

毛澤東愛看歷史書，城府深不可測，凡事步步爲營，警覺性高，不輕易向人表露內心的情緒，也不肯輕信別人。汪東興掌握著中央警衛團，深得毛澤東的信任。但毛澤東不會把"底"全部兜給汪東興。對毛澤東的種種說法，汪東興也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在毛澤東所有關於國家主席的談話中，只是講自己不當國家主席，卻沒有反對設國家主席。而讓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是好事嘛，爲什麼不舉雙手贊成？可是哪裏

— — — — — — — — — — — — — — —

想到，這同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反對"設"成了革命者，贊成"設"倒成了反革命。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南巡到長沙後，對我說，你在會上沒有念（陳伯達編的）這個語錄。還說，你發言被人利用，這是事實。在湖北（你）檢討以後，我對你比較放心了。你沒有什麼問題。毛澤東多次這樣說，爲我"解脫"。[96]

據知情人說：九一三事件後有人寫了揭發汪東興的材料，材料密封後由周恩來交給毛澤東。毛澤東叫來汪東興，汪東興嚇得跪在毛澤東面前，乞求饒恕。

吳新潮（吳法憲大兒子）回憶：汪東興對不起黃吳李邱，如果沒有汪東興的誤導，吳法憲就不會被張春橋激怒，也不會再激怒林彪，也就沒有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的講話。黃吳李邱的子女都認爲汪東興是壞蛋，他對毛主席犯了大罪。[97]

從廬山上下來，毛澤東在從長沙到武昌的路上，問汪東興在想什麼。汪東興說：我在想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問題。在山上開會忙於會務，沒有時間想。現在有空閒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毛澤東對他的態度比較滿意，說這樣好，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你的心是好心。汪東興參加了華北會議，不敢再自作聰明。他問毛澤東，我要不要發言？毛澤東說：你現在是明白人了，爲什麼不發言？汪東興還是不放心，說我先寫一個東西給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錯了。毛澤東說不用寫了，根據我與你幾次談話的情況，我看你的思想已經通了。你講吧，講錯了，回來我們再商量，毛澤東哈哈

大笑起來，再批判嘛。[98] 看來，汪東興也被蒙在鼓裏，汪東興跟隨毛澤東多年，但毛澤東的心思，他始終沒有捉摸透。你想，連老奸巨猾的康生都暈頭轉向，掉進“迷魂陣”裏，更何況“晚輩”汪東興呢。

那麼，是誰在放長線釣大魚？汪東興是“誘餌”嗎？

也許毛澤東沒有想到，在他死後不到一個月，一向對江青意見極大的汪東興，在逮捕“四人幫”時起了重大作用。

註釋：

[1] [6] [9] [11]　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版，191-192、198-201 頁

[2]　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395 頁

[3] [5] [12] [19]　參見楊銀祿《九屆二中全會時的江青》，載《黨史博覽》2006 年第 1 期

[4] [18]　採訪專機師師長時念堂筆記，2001 年 8 月 11 日、2006 年 1 月 4 日

[7]　採訪中將黃志勇筆記，2000 年 2 月 12 日

[8] [63]　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1995 年 12 月版，128 頁

[10] [13]　採訪中將宋雙來筆記，1996 年 10 月 23 日

[14]　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15]　採訪專機師師長時念堂筆記，2000 年 4 月 14 日；採訪空軍航行局局長尚登峨筆記，1999 年 12 月 27 日

[16] [21] [28]　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124、134 頁、137-139 頁

[17] [40] [54] [57] [58] [68] [74] [75] [78] [87] [98]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23-24、166-167、31-32、38-39、41-44、59、74 頁

[20] 參見張耀祠《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回憶毛澤東》，群眾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版，140 頁

[22] [23] 參見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手稿

[24] [26] [39] 參見《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1971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 12 日，參見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 年 10 月，555 頁

[25] [41] [73] 引自陳曉農編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998 年版，117、118、135 頁

[27] [46] [33] [89] [93] 採訪林彪秘書于運深筆記，2005 年 10 月 25 日

[29] 採訪少將張耀祠筆記，2003 年 2 月 18 日

[30] [32] [45] [48] [50] [52] [61] [65] [81] [88] [90] [95] 採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 年 11 月 16 日

[31] [35] [91] 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一版，231、228、216 頁

[34] 參見宋德金《我在林彪辦公室的前前後後》，載《百年潮》2000 年第 9 期

[36] [43] [47] [62] [92] 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第一版，291、315、296、303 頁

女》1999 年第 2 期

[38] 參見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 2003 年 7 月版，615-619 頁

[42] 參見葉永烈《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523 頁

[44] [59] [64] [69] [83] [85] 採訪陳伯達兒子陳曉農筆記，2006 年 4 月

[49] 採訪陳勵耘筆記，1998 年 12 月 20 日

[51] 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395 頁

[53] 引自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遼寧人民出版社，134 頁

[55] 注：原文如此

[56] 參見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根據錄音整理

[60] [66] [70]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387-392 頁

[67] 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

[71] 參見盧弘著《軍報內部消息》自印本，19 頁

[72] [80] 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3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114-116、143-146 頁

[76] 參見汪東興第二次書面檢查

[77] 參見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手稿

[79] 即：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

[82] 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1570 頁

[84] [86] 參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2002 年

[94] 參見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 1979 年 12 月版，131 頁

[97] 採訪吳法憲大兒子吳新潮筆記，2006 年 1 月 3 日

第二章
第六號簡報

華北組首先"跳"起來了

宋雙來回憶：開幕式上大家看見毛主席不耐煩地宣佈散會，都如同墜入五里霧中。各種猜測，是誰否認毛主席的地位？是誰不承認毛主席是天才？林彪提出的國家元首是過去的提法，是否國家體制要改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8 月 24 日上午休會，我問李雪峰，他也不清楚，說看看再說。[1]

陳伯達的福建口音極重，本來就很難懂，再加上他並沒有直說，華北組在座的人大都半信半疑。可是在毛澤東身邊深得毛澤東信任的汪東興一說，就大不一樣了。3 月下旬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傳達與 7 月下旬接到中央徵求憲法修改草案的意見通知時，兩次聽到的都是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

不當國家主席的建議，都是毛主席在外地讓汪東興回北京向政治局傳達的，所以汪東興違背常情的發言，加上他的特殊身份，使他的話被認為肯定有來頭。原來的疑惑、猜測統統都沒有了，以為摸到了底。[2]

鄭維山（北京軍區司令員）回憶：聽了陳伯達的話，尤其是聽汪東興說有人反對毛主席，大家都很氣憤。聽完林彪錄音後，我對陳先瑞（北京軍區第二政委）說，不是傳達不設國家主席了嗎？怎麼又要設了？這是怎麼回事？要我看，當國家主席，除了毛主席，誰也不行。[3]

林彪講話得到絕大多數中央委員的歡迎，除了幾個人沒有明確表態外，都一致擁護林彪的講話，擁護設國家主席。很多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代表所在的省、市、自治區聯名寫信給毛澤東、林彪，擁護毛主席當國家主席。董必武、李富春、蔡暢等老一輩革命家也簽了名。[4]

宋雙來回憶：記得汪東興剛發完言，一位要去"三北"開戰備會議的老同志立即要求發言，他說在這個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則問題面前，我們決不能含糊，我先表個態，對於反對毛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揪出來示眾，應當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我完全擁護東興同志的發言，強烈要求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擔任副主席。此後的發言都集中在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主席，林彪當副主席，（揪）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人。[5]

除召集人李雪峰和副組長吳德、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等極少數人，幾乎所有的華北組成員都被煽動起來。劉

錫昌、鄭維山、郭玉峰、聶元梓、劉子厚、馬福全、錢學森、鄺任農、吳濤、尤太忠、彭紹輝、陳毅等 13 人發了言，都說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在那個特定的年代，毛澤東的威信那麼高，居然還有人膽敢反對？誰不旗幟鮮明呢？

"火"就這樣燒起來了。

8 月 25 日上午繼續分組開會，這時華北組的發言都集中到有人反對毛澤東的問題上，軍隊的中央委員們更是激動。歷次會議陳毅都在華東組，被戴上"二月逆流"的帽子，尤其是"九大"會上，把他批得"體無完膚"。這次開會，陳毅向周恩來提出換一個組，於是被安排到華北組。陳毅說以前我"錯"了，這回我非跟上不可。他聽了林彪的講話，以為林彪是代表中共中央。再怎麼說，林彪畢竟打過一些好仗，出生入死，為革命立過功勳。你張春橋這些陰謀家算什麼東西！[6] 所以他第一個發言，表示完全同意陳伯達的發言。[7] 沒想到又陷進"二陳合流"（陳伯達、陳毅）。

陳毅說：我到石家莊後，沒有看到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的文件。據我所知，毛主席不願當國家主席，如果他改變了初衷，願意當國家主席，我贊成毛主席當國家主席。講到毛主席的天才，我談談自己一貫對毛主席的看法。從 1927 年認識毛主席起，我犯過錯誤，反對過毛主席。後來我發現毛主席在革命實踐中經過鍛煉，領導中國革命確實有天才，因此我決心跟著毛主席幹革命。天才這個解釋，主要是從實踐中經過鍛煉，鍛煉了人的才能，這樣解釋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毛主席是天才，

是經過幾十年鍛煉出來的天才。現在有人否認毛主席是偉大的天才，這個問題不簡單，我陳毅一聽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後發表這樣的言論，是一種罪惡，不管他是公開的，還是背後講的。說這種話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這種人應該開除黨籍，交群衆批判。他們是什麼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義憤。我犯過三次大錯誤，是犯錯誤的人，我願站在林副主席這一方面參加戰鬥。別以爲我靠邊站我就不能保衛毛主席，不論在什麼地方，就是有人在牆旮旯裏反對毛主席，我陳毅也要把他揪出來！這次我可要堅決與他們[8] 鬥！他們已把我打到陰溝裏，我還是要努力和他們鬥！[9]

有人當場批陳毅，你還有資格講話？

陳毅說：我怎麼沒有資格講話？我沒有保衛毛主席的資格了？

所以陳毅又第二次發言。陳毅的話被概括成一句話收進華北組第二號簡報，說陳毅同志做了擁護陳伯達意見的發言。[10]

華北組包括錢學森都表示擁護，沒有誰不擁護。錢學森首先建議在《憲法》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的條款。接著汪東興建議《憲法》要恢復國家主席一章，大家熱烈鼓掌，表示衷心贊成。馬福全說：我們河北省廣大群衆在討論《憲法》時，一致認爲只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領導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貧下中農、工人階級。

強烈要求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我代表河北省工人階級、貧下中農要求《憲法》上寫上。

這段話成了第六號簡報最後一段。

宋雙來回憶：雖然"鬧"得很凶，但主持會議的李雪峰始終沒有表態。有一位中央委員說，你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不明確表態好不好？李雪峰笑笑，想不清楚啊，怎麼表態？當天晚上和 8 月 25 日的討論，李雪峰仍然沒有個人發言。受他的影響，在會議前期，到口的話我也咽到肚子裏，沒發一次言。由此多年來，我怎麼也想不通，雪峰同志當時那樣的態度，怎麼會與反黨篡權聯繫在一起呢？[11]

8 月 25 日下午，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澤東那裏開會，華北組的會議由副組長吳德繼續主持。

河北省四名勞動模範（候補中央委員）先後發言，口徑一致，對《憲法》不設國家主席提出質疑，認爲《憲法》起草委員會有問題，還點了康生的名。幾名工人（中央委員）也要表態，吳德說：這個態度你們怎麼表？假如問題涉及中央的負責人，按照黨的原則，應該先報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廬山啊。吳德向周恩來彙報，周恩來說你爲什麼不在會上反駁，吳德說他不瞭解情況，不好發言。周恩來說：不是很好講嘛，你們反對《憲法》起草委員會，主任是毛主席，副主任是林彪，這不是反對毛主席嗎？[12]

吳德和陳一夫商量，由陳一夫執筆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反映聶元梓到處串連，"揪"所謂反對毛主席的人，會議有些不正常，請示總理以後的會議怎麼開下去。周恩來將信

批轉政治局傳閱。並指示吳德組織批判聶元梓。[13] 後來吳德對吳忠講：那一次，我們冒了很大的風險，參加會議的政治局成員都看了我的信，毛、林圈閱，林彪如果不垮台，我們的後果不堪設想，恐怕丟烏紗帽都是小事。吳忠說：既然敢向中央反映情況，坐牢都不怕，摘了烏紗帽不算什麼。[14] 或許是此舉得到毛澤東的充分信任，所以毛澤東南巡迴到北京，在豐台召見的四個人中，有吳德、吳忠。

8月25日晚，吳德正在看電影，周恩來派人把他叫去，說他的那封信已經在政治局傳閱了，要他組織代表中的工人同志開個會，批評聶元梓，解決她的串連問題。會後吳德把批評聶元梓的會議情況，手寫了一份簡報，交給周恩來。吳德請示會如何再開下去，周恩來讓他照原計劃繼續開，這說明周恩來也不瞭解內幕。從廬山回到北京不久，周恩來把吳德找去，叫他把寫給他的信和那份批評聶元梓的簡報處理掉。[15]

關於"聶元梓廬山串連"的事情傳得很廣，但聶元梓卻是另一種說法。

周恩來點名讓聶元梓參加"九大"，因爲這時還需要"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發起人，不選上聶元梓，怎麼向毛澤東交代，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這讓一直隔離審查的聶元梓心存感激。到九屆二中全會，聶元梓的處境更加困難。看來她的心情與陳毅差不多，生怕犯錯誤。陳毅在華北組會議上"緊跟"，而聶元梓自己說：不管會上會下我都沒有說話，不知爲什麼又把我揪出來批。在九屆二中全會結束的

一次大會上，周恩來批評有的人不瞭解情況，就亂表態，還有咱們的候補中央委員聶元梓同志也在下邊搞串連等。這是誰向周總理匯報的呢？我眞是有口難辯。[16]

現在看這件事，是有點小題大做。但在當時，"串連"可不是小事！

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

8月25日一大早，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即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印發。

毛澤東南巡時說：你們對廬山會議怎麼看法？比如華北組六號簡報，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爲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17]

簡報說：華北組24日上、下午討論了林副主席極其重要的講話，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組會，都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大家聽了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別是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認爲在經過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黨內還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衆，應該開除黨籍，應該批倒

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大家認爲，不能讓妄圖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主席的陰謀得逞，不能把減少毛主席接待外賓的事務工作作爲藉口，實際上現在絕大多數外賓，毛主席都接見，幾乎到中國的外賓都是毛主席不見不走。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不是一樣在接見外賓嗎！

簡報還提出：大家衷心贊成小組會上有人提出的在《憲法》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和《憲法》要恢復國家主席這一章的建議。[18]

8 月 25 日一大早，華北組的第六號簡報發到各組，整個會議的氣氛緊張起來。堅持設國家主席、叫嚷揪人的呼聲更高更急，幾乎一邊倒。各組都要求揪出反對毛主席的壞人，攻擊矛頭明顯指向了張春橋。有的大組通過決議，《憲法》草案一定要寫上設國家主席，一定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19]

汪東興回憶：第六號簡報反映陳伯達講話的內容不多，卻把別人發言的內容與我發言的內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義大量刊登出來。這個簡報在印前沒有給我看，印發後顯然產生了極不良的影響。[20]

陳伯達回憶：我在華北組表示擁護林彪講話。華北組把我的別人的（話）做成簡報，沒有點名。簡報發前我沒有看過，但我是有責任的。[21]

陳伯達再三請求毛澤東寬大。他幾次打電話求見，毛澤東不是有事，就是已經休息，只得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恩來

說，本來事情或許還可能緩和，汪東興把那個“語錄”一交出去，就沒有辦法了。周恩來的聲音還一如既往，這讓落難的陳伯達終生難忘。[22]

9 月 23 日，陳伯達寫信給毛澤東，檢討自己在廬山會議上所犯的罪過，要求給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但是陳伯達實在搞不清爲什麼要把他揪出來，也搞不清廬山會議有什麼不正常。要說不正常，就是汪東興說“揪人”，說的不是時候，可是汪東興卻平安無事。

陳伯達回憶：華北組簡報惹了大禍，我想是其中有類似“把人揪出來”的句子。事情是自然發生的，也是偶然的，卻不是預謀。黨章規定黨員可以在黨的會議上發表意見，誰能想到天才問題和國家主席問題不能討論。會議惟一的異常是有人要揪張春橋，這不是我說的，也不是李雪峰說的，如果我的記憶不錯，好像是汪東興說的。[23]

汪東興回憶：吃午飯時，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問我看到第六號簡報了沒有？我說剛看到，我是在來的路上才看到的。毛主席說，他們（江、張、姚）已經來過了，他們說第六號簡報影響很大。你汪東興瞭解我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還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傳達過，你怎麼又要我當國家主席呢？我說聽陳伯達發言說，有人聽到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就歡喜地跳起來，我很氣憤。[24] 毛主席嚴肅地說，那就讓他們去高興吧。我說在群衆討論修改《憲法》時，大家都擁護你當國家主席。毛主席嚴厲地說，不當國家主席，就不代表群衆嗎？你強調群衆擁護，難道我不當，群衆就不擁護

了？我就不代表群衆了嗎？談完話，已經14點，毛主席要我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委員15點到牯嶺毛主席辦公處開會。我通知了林、周、陳、康，其他政治局委員由中央辦公廳通知。[25]

毛澤東震怒後，華北組忙著開會批判“陳陳”（陳伯達、陳毅），陳伯達把責任往陳毅身上推。中央委員蘇靜爲陳毅打抱不平，覺得陳伯達這樣做不合適，好漢做事好漢當，幹嘛看風使舵？蘇靜說你們傳達要設國家主席，說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等一大套，陳毅站起來支持怎麼就變成他的了？陳毅也是受了你的騙。

事態變成了這樣，陳毅這回再不敢說話，聽著蘇靜替他辯護。

康生知道陳毅的發言，說“二月逆流”和“八月逆流”匯合。

其實蘇靜不知道廬山會議要打倒陳伯達，也沒有誰事先通氣，只是余秋里和李先念對蘇靜說，現在山上比較複雜，你們不要亂走，一亂串門子就成問題，搞不好就……因爲這時蘇靜已經從總參軍務部到國家計委，算國務院所屬的中央委員，所以才被管國務院工作的余秋里和李先念善意提醒。[26]

在華北組會議上，有的代表發言不同。代表民航的一位中央委員沒批陳伯達，以後單位還專門批他爲什麼不批陳伯達？不過還好，沒把他打倒。

蘇靜說：當時大家都想不通，下廬山後好長時間也搞不懂，但毛主席已經說華北組簡報是“反革命”簡報了，誰也不敢再說什麼。

周恩來說：整個華北組會議，毛主席雖然沒有來，但洞察一切。[27]

此時，陳毅再沒有“文革”初的勇氣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陳毅就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大會小會公開批評。陳毅說：又是一次整人的會喲！上一次整了羅長子，這次又整彭眞，下次還不知道輪到誰頭上。1966年8月23日在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局會上，中央文革逼劉少奇到清華大學向學生交代問題，誰也不說話。陳毅站起來，表示不同意。劉少奇都表態同意去了，陳毅仍說他不贊成這樣做。1966年7、8、9三個月，陳毅在大會小會講話30多次，主旨都是反對動亂。他說：鼓動大亂，這是一步危險的棋喲！[28]

陳毅的話說得非常狠，以致被造反派揪鬥，下不了台。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時，挽著陳毅的胳膊照了相，並握著陳毅的手說：陳老總，我保你。[29]

毛澤東爲什麼要保陳毅？毛澤東在南巡時說：1929年10月初召開的中共第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陳毅在6月22日紅四軍“七大”當選爲前委書記，他根據周恩來[30]多次的談話，起草了“九月來信”，[31]肯定了毛澤東的一系列正確主張，明確

指示，“毛同志應仍爲前委書記”。12 月 28 日，紅四軍“九大”，糾正了黨內的錯誤思想，最後通過了古田會議決議，扭轉了毛澤東遭排擠的局面。毛澤東對汪東興說：陳毅敢於改正錯誤，敢把中央的意見原原本本地傳達，陳毅同志是個襟懷坦白的人，錯誤是有，但是個好同志。[32] 難怪文化大革命中盛傳批鬥陳毅時，陳毅說打開《毛主席語錄》271 頁：陳毅是個好同志。[33]

毛澤東對陳毅的態度是“一批二保”，[34] 但前提是要看陳毅的態度。在周恩來勸說下，1967 年 1 月 24 日下午，陳毅不得不違心在人民大會堂群衆大會上做檢查，檢查稿經周恩來親自修改定稿。因爲這是第一位副總理被“解放”，周恩來顯得興致勃勃。他拉上陳毅，到人民大會堂的各廳與學生見面。[35]

檢查是檢查了，但陳毅心裏並不服氣。

“二月逆流”前四天，1967 年 2 月 12 日，陳毅在機場貴賓室等候外賓，說了一通氣話：逼著我做檢查，我還不認爲我全錯了。前幾天我到外交部開大會，就是要我低頭認罪，我有什麼罪？我要有罪，還當外交部長？不要太猖狂了，太猖狂了沒有好下場！[36]

接著，陳毅向中央文革小組開炮，說“文化大革命”是歷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2 月 19 日淩晨，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沒讓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參加。毛澤東大發雷霆，嚴厲批評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對陳毅批得最厲害。毛澤東說：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麼！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毛澤東退場後，會議決定要陳毅等人請假檢討。[37]

2 月 22 日至 3 月 18 日，周恩來主持在懷仁堂開了七次政治生活會，康生、江青[38] 等給陳毅扣了很多大帽子。終於結束時，陳毅對兩位秘書說：這幾天開會就像紅衛兵批鬥幹部一樣，只是挨批，不容許解釋和回答問題，最後定性了。40 年前的 3 月 18 日，我參加遊行反對北洋軍閥，差點被打死。沒想到參加革命 40 年後的今天又挨批鬥，3 月 18 日眞是個黑暗的日子。[39]

陳毅給毛澤東寫信，想向毛澤東解釋，但遭到毛澤東的拒絕。[40]

3 月 18 日早晨，中南海附近出現打倒陳毅的大字報。

3 月 20 日，江青在審查電影《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時，下令剪去陳毅的鏡頭。[41]

江青在“打”的同時，也在“拉”。閻長貴回憶：4 月中旬，江青把她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爲人民立新功》的講話稿，送給陳毅看，請他批評。江青對我說，陳毅還是要爭取的。陳毅很快把講話稿退回，批了一句，講得很好。[42]

五一節，所有被戴上"二月逆流"帽子的老同志都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來到被稱作五一團結會的會場。[43]

但是，陳毅的厄運並沒有過去。5 月 12 日，外交部要揪鬥陳毅，周恩來緊急召集會議，說"揪"陳毅中央不同意，打倒陳毅的口號不能強加給中央，也不能強加給我。陳毅還沒有罷官，還在參加外事活動，不能採取"揪人"的辦法，有錯誤可以批判，但"揪人"不行。[44]

8 月 12 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阿爾巴尼亞專家時說：我贊成打倒陳毅的口號。我對陳毅也沒有辦法，就是要紅衛兵給點壓力，……將來保陳毅也要靠紅衛兵。[45]

8 月，批判陳毅的大會小會開了八次。人民大會堂還開了兩次批判陳毅的大會，根據事前協定，不要陳毅當場回答問題，但有的發言者仍然質問，陳毅說：我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向毛主席，向林副主席，向中央文革，向周總理，向無產階級革命群眾認罪！[46]

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九屆二中全會，陳毅都一再成爲"靶子"。

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說："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如果不參加，我看是個缺點。陳毅同志，你就以那個"右"的一方面的資格，以這個身分來參加"九大"。[47]

3 月下旬，陳毅才接到中共上海市委給他的參加"九大"的通知。通知很不客氣，說上海市黨員一致推舉你爲"右派代表"參加"九大"。[48]

"九大"主席台上，左側是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陳毅等老帥坐在主席台右側。

陳毅照例被編在華東組，這個組有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張春橋在"九大"前就搜集陳毅的材料，從 1953 年至 1966 年陳毅在上海、北京做的各種報告、講話以及接待外賓的談話，編成《陳毅反動言論小集》，印發"九大"的上海代表，還佈置分頭準備，從不同角度對陳毅進行大批判。[49]

第一次小組會，陳毅說我是犯了錯誤的，承蒙上海黨選舉我爲代表，我一定聽取大家的意見，認眞改正自己的錯誤。有人馬上指責他分裂黨，中國共產黨沒有上海黨、北京黨，你說是上海黨選你爲代表，是企圖分裂中國共產黨。第二天華東小組會翻出 40 年前的老賬，1929 年陳毅在紅四軍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爲前委書記，毛澤東落選，指責陳毅一貫反對毛主席。陳毅說：這個問題中央早做過結論，我同主席之間的隔閡已經消除。代表就起哄吼叫，七嘴八舌圍攻陳毅。[50]

大會雖然選舉陳毅爲中央委員，但排除在中央政治局外。雖然中央軍委常委還有陳毅的名，但中央軍委常委本身已經有名無實，楊余傅事件後被軍委辦事組代替。

"九大"以後，陳毅外交部長的職務沒撤，卻讓他"請病假"，由姬鵬飛代理。1969 年陳毅除參加五一登天安門觀看焰火，八一出席建軍招待會，十一登天安門參加國慶，再沒有其他的國事活動，既沒有會議，能看到的文件也比過去減少。

陳毅說：冤案總會搞清楚，我是有信心的。不過有的冤案實在不該發生。當初，在懷仁堂碰頭會講話，沒有人推舉我作爲老幹部的代表，是我自己跳出來爲老幹部講話的，結果被打成"二月逆流"。這是我自己引火焚身，我不後悔。可是這次廬山會議上，我講了講對主席的敬佩，認爲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有天才這樣一段話，就把我搞成"二陳合流"，眞是莫名其妙，冤枉也！[51]

1969年10月，根據中央統一安排，陳毅和其他一些領導人被戰備疏散到外地。10月20日，陳毅和夫人張茜坐火車到石家莊，被安排在市內橋西招待所，只能看到一般的中央文件、外交通報和新華社編譯的《參考資料》。河北省革委會的領導人對陳毅十分冷淡，沒有來看望，也不向他介紹情況，還嚴格規定了他的行動。每週三個半天去鐵路工廠勞動，外出必須得到省革命委員會的批准。[52]

就這樣被"軟禁"了一年。

1970年7月，陳毅生病，腹部隱痛，伴有腹瀉。10月經周恩來批准，到北京治病。[53]

1971年五一節，陳毅上天安門城樓參加焰火晚會，見到了毛澤東，這是近兩年中陳毅第一次露面。6月12日下午，陳毅夫婦到東交民巷看望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這是他最後一次的外事活動。

1972年1月，陳毅逝世。毛澤東抱病出席陳毅的追悼會，表達了他的歉意。[54]

有人在河邊卻沒有濕"鞋"

九屆二中全會分組討論時，有極少數人沒有發言。他們還摸不著頭腦，林彪爲什麼要堅持毛主席是天才的觀點？堅持，就是說有不同意見，看來還是謹慎爲妙。劉建勳（河南省負責人）沒發言，他有經驗。1962年北戴河會議一邊倒，大家都同意包產到戶，後來毛澤東一講話，搞了幾十年革命，弄了個單幹，反過來了。1959年廬山會議也差不多是這樣。[55]

李德生回憶：1970年春夏，幾次討論《憲法》草案，意見總是對立，我覺得事情越來越複雜了。處在這一場鬥爭中，我只是按照組織原則和政治原則辦事，即使有什麼差錯，也是錯在明處。在廬山上，我除了參加正式會議，不隨便到處走動；除了發給的文件，不隨便打聽消息；除了按原則辦事，不隨便說話批東西。這樣做也符合我的性格，我從來不搞那些拉拉扯扯的事情。總政恢復辦公的半年時間內，沒有批判"閻王殿"，沒有大肆宣傳林彪518講話，討論《憲法》草案時沒有突出反映設國家主席的意見。這在我們來說，是謹慎地按組織原則、政治原則辦事，惟恐犯錯誤，並沒有意識到觸犯了林彪。後來才想通，這就是我在軍委辦事組受到冷落的原因。於是就形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歷史過程，軍委辦事組開始醞釀名單時沒有我，是毛主席加上的，他們發天才語錄又不給我。軍委辦事組後來犯錯誤，毛主席指出李德生除外。[56]

上廬山前，吳忠就有幾點疑問。1968 年 4 月，吳忠被任命爲北京衛戍區第一副司令員。1970 年 7 月，吳忠被任命爲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到職不久，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向毛澤東建議：吳忠、楊俊生（北京衛戍區政委）兼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和副政委，毛澤東馬上搖頭表示不同意。後來周恩來專門委託吳德向吳忠傳達，主席認爲吳、楊不必兼任北京軍區的職務。爲什麼不願意把衛戍區置於北京軍區之下，不願意與北京軍區發生工作上的聯繫呢？吳忠注意到，衛戍區予軍野營拉練的經驗總結報告林彪先批，而毛澤東卻另在一份同樣的報告上批了大段指示。爲什麼不在同一份報告上批？以前都是同一份的，肯定有含義，但吳忠一時又想不清楚。要是過去，聽到有人反對毛主席，吳忠肯定會拍案而起，可這一次，吳忠在華北組會上沒有發言。聶元梓拉人聯名給毛主席寫信，叫吳忠站出來說話，簽名。吳忠不幹，說這種話不能隨便講，講出來要負責任，我不清楚誰反毛主席，所以現在我不能發言，請不要再和我講這個問題。[57]

吳德呢，是另一種情況。1970 年以前他一直被當作叛徒嫌疑被暗中審查，不僅中央的重要決定不告訴他，就是北京市的一些會議也不讓他參加。這次讓他領隊帶北京市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上廬山，他很激動，卻沒想到廬山會風雲突變。因爲整一份很急的材料，吳德沒有參加第一次華北組會議，會後吳忠說：陳伯達和汪東興都講有人反對毛主席。這種事在那個時候相當敏感，吳德忙問誰反對毛主席？吳忠說他們沒點名，不知道是誰。晚上吳德和李雪峰在會場碰到汪東興，吳德問：誰反對毛主席，是什麼人？汪東興說有人，槍桿子，筆桿子。吳德還是不明白，又問李雪峰，李雪峰也搖頭說不知道。以後事情明朗化，吳德才聽說反對毛主席的是張春橋。[58]

廬山上的空氣越來越緊張。

張佐良（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回憶：傍晚散步我偶然聽見王洪文大喊大叫，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我還在奇怪，現在也不是"文革"初期紅衛兵的時候了，怎麼還喊這樣的口號？難道有誰反對毛主席嗎？[59]

看來，大部分中央委員都是霧團重重。

陳永貴（山西大寨黨支部書記，那時號召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是第一次上廬山，很新鮮，也很不適應。他參加華北組的討論，不僅討論的問題生疏，而且委員們南腔北調，聽起來非常吃力。但是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他聽懂了，他認爲講得很好，頌揚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領導是我們勝利的各種因素中間的決定因素。林彪就是講得再重，陳永貴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好，他對毛澤東崇拜得五體投地。陳永貴在與新黨員談話時都要說，從現在起，你的一切都由黨來安排了，你要做不到這個準備，就不要入黨。他還要補充一句，毛主席就是現在要我們去死，我也要去死。聽到有人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陳永貴非常震驚。不僅他和李順達（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這樣的大老粗，幾乎在座者都跟著一起罵。沒想到罵半天，反對毛澤東爲天才的"壞蛋"竟是毛澤東本人。陳永貴簡直暈頭轉向了，陳伯達錯了？

林彪不是也說毛澤東是天才嗎？毛澤東怎麼又說林彪和他的意見一致？過了幾天，陳永貴在大會上又親耳聽毛澤東說他不當國家主席，原來反對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是毛澤東本人。[60]

陳勵耘回憶：直到近一年後，毛主席南巡談話中說了一句"林副主席要保"，我才清楚了一些。林副主席犯了錯誤？沒犯錯誤何必要保？但是，還不敢想兩個主席之間有矛盾，也沒有想到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有錯誤。不知道陳雲、方毅他們是否知道，他們紋絲不動。

陳勵耘在華東組檢討，周恩來、江青都來了。陳勵耘還沒有講完，張春橋就指著他的鼻子，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說，你不聽主席的話，就聽陳伯達的。程世清看不過去，說這個會議是黨的會議，黨員有意見，應該在黨的會議講，不讓他在黨的會議上把話講完，以後誰還敢在黨的會議上講話，應該讓人把話講完。周恩來對江青說，應該讓陳勵耘同志把話講完，陳勵耘說，總理，我沒有什麼話講了。討論《我的一點意見》時，陳勵耘根本沒想到是針對林彪的，許世友也不知道。[61]

廬山會議結束，絕大多數中央委員沒有認爲發生了"政變"，以後才不斷升級。

毛澤東稱陳葉吳李邱是"宣講員"

張雲生回憶：8 月 23 日，葉群從廬山來電話，說首長

在會上即席講了話，根本沒用你們寫的稿子。講話的中心意思，就是堅持毛主席是天才。他講天才是有針對性的，講話後反映很強烈。他講了，我也準備講，在明天的小組會上，我也準備開上一炮。我不想講別的，就是講講毛主席的領袖地位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沒有一個好的領袖行嗎？那肯定不行！蘇聯沒有一個好領袖，結果變修了。印度的客觀條件很好，但印度共產黨沒有一個好領袖，至今革命也沒成功。中國革命如果沒有毛主席這樣偉大的領袖，也不會有今天！所以毛主席是我們的好領袖，毛主席是現代最偉大的天才！誰反對這一條，誰就要倒楣。葉群爲什麼要講這些，原來她想叫姜思毅（在林辦幫助工作）幫助她寫個講話稿。葉群說，今晚叫老姜連夜突擊，文字不要長，但要有分量。明早托中辦送信的飛機帶上廬山……我說的這些，你記錄了嗎？葉群與林彪不同，林彪交代什麼，秘書當面記錄，他從不阻攔。而葉群嚴格規定，她不管說什麼，都不准秘書留下"文字根據"。而這次，她"連珠炮"的話，我想記也跟不上。葉群說，既然沒記，我講的再多也沒用，姜思毅在嗎？我直接和他講講。……[62]

8 月 24 日晚，中南組的火藥味很濃。李作鵬說：林副主席一貫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有偉大功績的，《黨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憲法》上反對提林副主席。所以黨內有股風，是什麼風？是反馬列主義的風，是反毛主席的風，是反林副主席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有人想往下吹。有人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林副主席直接

指揮的，他都反對，這不符合歷史。

李作鵬發言後，葉群發言：林彪同志在很多會議上都講了毛主席是最偉大的天才。說毛主席比馬克思、列寧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難道這些都要收回嗎？堅決不收回，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中南組組長和三位副組長也都先後發言，雖然很短，但都表示回應和支持李作鵬和葉群的發言。

吳法憲在西南組說：林副主席一貫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有偉大功績的，《黨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憲法》上反對提林副主席。所以黨內有股風，是什麼風？是反馬列主義的風，是反毛主席的風，是反林副主席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有人想往下吹。有人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他都反對，這不符合歷史。這次討論修改《憲法》中有人說"三個副詞"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如果這樣，就是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就是推翻了林副主席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肯定下來的，怎麼能不寫呢？……關於天才的說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有過這樣的論述。毛主席對馬克思和列寧也都有過這樣的論述。林副主席關於毛主席是天才的論述，並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邱會作在西北組說：林副主席一貫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有偉大功績的，《黨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憲法》上反對提林副主席。所以黨內有股風，是什麼風？是反馬列主義的風，是反毛主席的風，是反林副主席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有人想往下吹。有人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他都反對，這不符合歷史。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林副主席說，毛主席是天才，毛澤東思想是全面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次他仍然堅持這個觀點。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勝利的二中全會上還講這個呢？一定是有人反對這種提法，有人說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種諷刺，就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63]

康生稱讚邱會作講得好，發言水平高。

周恩來飯後碰見邱會作，說你下午放了一炮，很有力量。[64]

華東組剛開始還風平浪靜

華東組召集人是許世友，副組長是楊得志（濟南軍區司令員）、韓先楚（福州軍區司令員）。組員有王洪文、張春橋、杜平、王震、陳雲、袁升平、王效禹、吳大勝、方毅、程世清、周赤萍、陳勵耘、韋祖珍、彭沖、王秀珍、南萍、馬天水等。

陳雲心臟不好，怕山上空氣稀薄，就沒有上山。王洪文不幹，說陳雲不來不行，為等陳雲上山，華東組 8 月 24 日下午的會就沒開起來。[65]

8 月 25 日下午，華東組第一次開會。

會前上海的中央委員認爲，要堅決擁護毛主席是天才的觀點，聽毛主席的，不設國家主席。至於陳伯達、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我們不瞭解情況，暫不表態。大家都同意由王洪文代表上海小組講，只有王維國提出，各人發各人的言。王洪文弄不清王維國在搞什麼鬼，只好取消了集體發言。

加上兩遍錄音，中央委員連聽了三遍林彪講話，不知道林彪殺氣騰騰指什麼人，下一步怎麼辦？陳勵耘和王維國保持沉默，王洪文不知道林彪指的是誰，決定先看看形勢再說，所以第一次討論時他沒有發言。“安徽組”也覺得把握不定，讓一位來自農村大隊的黨支部書記泛泛說了幾句。與會者一致擁護“天才”，還說了很多吹捧的話。大多數人表示，還是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66]

總之，華東組這時還風平浪靜。

類似情況的還有陳錫聯召集的東北組，周恩來在座。曾紹山、尉鳳英、李素文、王進喜、王淮湘、潘復生、江擁輝、汪家道、張江霖等出席會議。周恩來發言擁護林彪的講話，肯定林彪的講話對《憲法》、對計劃、對戰備有重要意義。同意“天才”的觀點。周恩來說：儘管毛主席叫我們不要總強調“三個里程碑”，但客觀上就是這樣。不過周恩來在發言中沒有提設不設國家主席，更沒有暗示揪人。

西南組的召集人是譚甫仁和吳法憲，聶榮臻、李先念在座。中將黃志勇說：我們組好像挺平靜，發言也是一般性的。從我們的心裏說，我們都希望主席當國家主席，但最後怎麼樣，由主席定。[67]

許世友說，我給“鱷魚眼”一槍

8月24日晚，華東組討論到一半，江青來了，許世友熱情邀請江青坐在前排沙發上。程世清當著江青的面，提出《憲法》還是應該設國家主席。一些人附和、許世友也說：我看還是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吧。江青心裏有數，馬上說：我覺得不設國家主席，可以減少國家機構的層次。關於這個問題，主席已經作過多次指示，你們也都聽過傳達。大家還是尊重主席的意見吧！陳勵耘說：不設國家主席，群衆在感情上通不過。江青說：群衆要我們去做工作嘛！程世清對江青有看法，說話不太客氣，說毛主席也應該聽聽群衆的意見嘛！江青說：我們要看得遠一些，主席不但高瞻遠矚，而且深謀遠慮……江青扶了扶眼鏡，四周看了一圈。要知道，設了一個國家主席的位置，就會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慮到了。至於主席自己，他是堅決不當國家主席的，他說過，不要黃袍加身……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兵變時，部下給他披上黃袍，擁他當皇帝，毛主席不願意別人擁護他當國家主席。

聽了江青如此明確的話，大多數人都不吭聲了。這時江青轉過臉對許世友說：許師傅，你來幫幫我的忙……許世友說：別的事我可以幫你的忙，這件事情我思想還是不通。好了好了，今天就討論到這裏。江青同志，歡迎你什麼時候到南京去……好吧，我們到南京再較量……[68] 江青笑著與許世友握手告別。顯然江青把許世友的態度彙報了。許世友

去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毛澤東在院子裏與他握手：你看我的手涼不涼？許世友說：涼。毛澤東說：你們讓我多活幾年多好啊！還讓我當主席呀？我只能當導演，不能當演員。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選我做國家主席！許世友果斷地說：我聽毛主席的！[69]

關於手涼不涼的話，毛澤東也對李雪峰說過。[70]

8 月 25 日下午，第六號簡報基本上人手一份了。華東組在廬山圖書館旁邊的一幢小樓裏開會。張春橋來了，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他沒有穿"文革"以來一直穿的軍裝，而是穿了一件淺灰色的中山裝。在場的大多數人不知道林彪講話批的就是他，對他還比較客氣。

許世友發言：林副主席是我們的光輝榜樣，這一次又給我們樹立了捍衛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範例。我們就是要像林副主席那樣和一切反對毛主席的野心家鬥，和一切違背毛澤東思想的言行鬥。那些傢伙天天喊造反，你們造誰的反？黨和國家都被你們搞亂了！

接著幾個中央委員泛泛而談的發言，陳勵耘來了個重磅"炸彈"，他挑明林副主席講話有所指。現在有人反對林副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親自指定的接班人，反對林副主席就是反對毛主席。陳勵耘大聲地說：那些反對林副主席的是些什麼狗東西！有些人還反對老幹部，整我們軍隊幹部……這些人應該站出來，有膽量的就站出來，把問題說說清楚！

雖然陳勵耘沒有點名，但許世友聽"懂"了。他非常恨張春橋，曾說造反派沒有一個好東西！許世友坐在陳勵耘前面，回過頭說：老陳，你講得對！我同意你的意見，你的意見代表了大多數軍隊幹部的意見，叫"他"到江蘇農村勞改！

這時有人說：不把反對毛主席的人揪出來，決不收兵！陳勵耘坐在張春橋的左側，他馬上打斷，側過臉衝著張春橋大聲地說：自己站出來嘛！張春橋的臉色非常難看，強作鎮定，把複雜的目光"扔"到地毯上，猛吸香煙，一句話也沒有。[71]

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認爲：林彪的講話說明文化大革命要結束了，要收拾張春橋這幫人了。[72]

王維國發言了。先說林彪的講話很重要，爲全會指明了方向，然後話題一轉：毛主席親自締造、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人民軍隊，堅決打倒一切野心家、陰謀家！把他們揪出來示衆！[73]

這時，穿"海軍服"的浙江省候補中央委員站起來，帶著呼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打倒野心家！打倒陰謀家！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

結果華東組"燒"起來了，幾乎人人搶著發言，搶不到話筒的就喊口號，揪出來示衆！批倒批臭！千刀萬剮！反對毛主席的"野心家"、"陰謀家"是埋在中央的定時炸彈，一定要挖出來。張春橋像霜打的茄子，臉白得像一張紙，坐在那裏低頭抽煙，始終沒有說話。[74]

廬山上揪出張春橋的呼聲越喊越高。

陳伯達回憶：江青、張春橋看見華北組簡報，開始似乎有點恐慌。因爲他們慣於揪人，現在卻有人也想把他們揪出

來。在揪人正盛時，我故意對康生說，我過去不知道，有"揪"字和"砸"字，《康熙詞典》上沒有這兩個字。康生於是把《康熙詞典》中的這兩個字"翻"出來，證明我的"無知"。[75] 現在"揪"字卻落到江、康等人頭上了，眞是中國人的所謂"一報還一報"，我估計誰提議"揪出來"，他們會知道。郭玉峰（中央組織部部長）參加了華北組，他經常到康生、曹軼歐那裏，康、曹同江、張經常在一起，或許他們是從郭玉峰口裏知道的吧？[76]

王洪文發言，說林副主席講話非常重要，給我們敲了警鐘。不承認天才，就是不承認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但喊到揪人了，王洪文似乎嚇了一大跳，"啞巴"了。

也有人發言乾脆就念第六號簡報，可是所有的人都不點名。郭沫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編入華東組，他戴著助聽器，很困難地聽著。聽到一半，郭沫若也要求發言，說我是"懵懂"派，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今天看了華北組的簡報，又聽了剛才幾位的發言，才知道全會上出了大事……

陳勵耘站起來去衛生間，一腦袋問號的馬天水跟上去。陳勵耘說誰是野心家陰謀家，就"揪"誰！馬天水心裏說，這小子看來知道底細，不肯對我們說。[77]

會間休息，楊得志問：老陳你講的"有人"，到底是誰？陳勵耘說：什麼人反對毛主席就指誰！晚飯後，陳勵耘到韋祖珍的房間串門，韓先楚也來了，問：老陳，你到底在說誰？陳勵耘還是打啞謎：你看我說誰？我不是說了嘛，誰反對毛主席我就說誰！韓先楚走後，韋祖珍說老陳，你說得對，張春橋算老幾，他有什麼資格，是他反對毛主席。[78]

後來許世友告訴韓先楚："鱷魚眼"嘛！誰是"鱷魚眼"？許世友用手做成眼鏡：上海那個帶眼鏡的！許世友在江蘇小組給毛澤東、林彪的信中寫道，幾個犯錯誤的人不能留在中央工作，而應該下基層鍛煉。[79] 8 月 25 日，許世友拿著信對韓先楚說：那個"鱷魚眼"的壽數到了，我再給他補一槍！韓先楚馬上說：我也要給他補一槍！楊得志也寫了同樣的信。這三封信和南萍、熊應堂等人的信都到了大會會務組，又到了周恩來手裏。周恩來把許世友等人的三封信轉給葉群，並附條子，到此爲止，存你處。事後葉群對吳法憲、邱會作說：我撿到三個"險球"，你們要守口如瓶，我一定要保住三個司令。九一三事件後從北戴河清理出這三封信，毛澤東大怒，叫汪東興查。[80] 三個上將連連檢討，韓先楚和楊得志先解脫了，許世友檢討沒有串連，但信中"犯錯誤的人"是指誰，這讓許世友滿頭大汗。本來許世友指的是張春橋，但在這個風口浪尖上，怎麼敢說"大紅人"？經過秘書提醒，許世友說：犯錯誤的人是指陳伯達，這才算過了關。[81]

註釋：

[1] [5] [11] 採訪中將宋燮來筆記，1996 年 10 月 23 日

[2] 參見《陳先瑞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457 頁

[3] 採訪中將鄭維山筆記，1997 年 6 月 10 日

[4] [55] [65] [78] 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版，234-236、239-240 頁

[6] [9] [29] [35] [39] [52] [53] [54] 參見《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1 年版，617、596、605、611、615、616、619-627 頁

[7] 採訪李雪峰秘書黃道霞筆記，2000 年 8 月 28 日

[8] 引者注：指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夥

[10] [12] [14] [15] [58] 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1995 年 12 月版，130-131、127 頁

[13] [57] 參見曲愛國《百戰將星吳忠少將》，2005 年 5 月版，366-368 頁

[16] 參見《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1 月版，319-328 頁

[17] [32] 參見《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

的談話紀要 1971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 12 日》，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1988 年 10 月，556 頁

[18] 參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2002 年出版

[19] [37] [43]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388、129、961 頁

[20] [25]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45-46 頁

[21] [22] [23] [76] 參見陳曉農編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998 年版，136 頁、124 頁、118、143 頁

[24] 作者注：這句話是在汪東興發言快結束時陳伯達才說的

[26] [27] 採訪中將蘇靜筆記，1996 年 11 月 24 日

[28] [34] [36] [40] [41] [44] [46] [48] [51] 參見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86-90、121、94、98、102、114、180-184、265、267-268 頁

[30] 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組織部長、軍事部長

[31] 注：該信全文刊登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卷，473-490 頁

[33] 注：《毛主席語錄》只有 270 頁；採訪江青秘書閻長貴筆記，2005 年 12 月 27 日

[38] 注：江青是否參加生活會，現在說法不一。據時任江青

秘書的閻長貴考證：中央文獻出版社的《周恩來傳》960 頁，沒提江青；中央文獻出版社的《毛澤東傳》1483 頁，提到江青；關鋒告訴我，江青沒參加，由他和王力向江青彙報。

[42] 採訪江青秘書閻長貴筆記，2005 年 12 月 24 日

[45] 參見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60 頁

[47] [49] [50] [66] [67] [73] [77] 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版，168、172-173、174-181、206、207、213-214 頁

[56] 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394-395 頁

[59] 採訪周恩來保健醫生張佐良筆記，1999 年 8 月 16 日

[60] 參見《老年文摘》2000 年 2 月 24 日第八版，摘自《重慶晚報》

[61] 採訪陳勵耘筆記，1998 年 12 月 20 日

[62] 參見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 2003 年 7 月版，612-615 頁

[63] 參見九屆二中全會記錄

[64] [80] 採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 年 11 月 16 日

[67] 採訪中將黃志勇筆記，2000 年 2 月 12 日

[69] [71] [74] 參見李文卿《近看許世友 1967-198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2 年 4 月版，199-200 頁

[70] 採訪李雪峰子女筆記，2005 年 1 月 22 日

[72] 參見張正隆《戰將》，解放軍出版社，2000 年版，331 頁

[75] 採訪陳伯達秘書王保春筆記，2006 年 3 月 14 日

[79] [81] 參見李文卿《近看許世友 1967-198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2 年版，201-202、240-241 頁



周恩來和陳伯達在天安門城樓上。

宋曉真提供，攝於文化大革命初



中將蘇靜在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沒有站錯隊。

這是採訪蘇靜時，由蘇靜送給我的，攝於1949年開國大典時。



2006年4月，著名黨史專家王年一和何蜀合影。

舒雲攝於北京西郊







這是我和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在廬山仙人洞前。

舒雲提供



1966年，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江青和紅衛兵在一起。

林彪家人提供



毛澤東、林彪和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的女兒、紅衛兵焦守雲合影。

林彪家人提供，攝於文化大革命初。



“文革”初期的林彪和陳伯達。

陳曉農提供



第三章
風雲突變

江張姚一起向毛澤東告狀

8 月 25 日早飯時間，王洪文就拿到了第六號簡報。他六神無主，下午華東組開會，怎麼表態？找張春橋吧，而早晨正是張春橋的“深夜”，但不找又火燒眉毛了。想來想去，還是不能自己作主，於是把張春橋叫醒。張春橋很快和姚文元去找江青。[1]

楊銀祿回憶：張春橋打來電話，問江青起床沒有，如果起床了，我想去一下你們那裏，有急事想跟她說說。我說江青起床了，我去報告她。張春橋急切地說，你快去報告，行與不行，你給我來電話，我等著，請你快一點。張春橋性格內向，平時說話較少，沒有急事他不會那樣著急。我放下電話，馬上報告江青，江青立即說，請他快點來，他肯定有急

事。我準備回辦公室打電話，江青說，爲了抓緊時間，就用我的電話打。很快張春橋就風風火火地來了，他見到我主動握手，說謝謝你了。平時張春橋不愛和工作人員講話，今天是少有的謙虛。半個小時後，張春橋走了，江青叫我進去，從沙發上站起來，大聲問，華北組的簡報你是送給我了還是壓下沒有給我，你老實交代，我怎麼沒有看見？我說給您了，我一邊回答一邊尋找，一眼看見文件夾裏的簡報，說那份就是。江青看了簡報才平靜一些。[2]

江青帶著張、姚直奔毛澤東的住處，講了很長時間。[3]

陳伯達回憶：在事情發展中，我去見過恩來同志。他說，江青、張春橋本來打電話先到我這裏談話的，卻直接到毛主席那裏去了。[4]

楊銀祿回憶：本來江青讓我打電話給周恩來，如果總理有時間，她要到他那裏去一趟。周恩來請江青立即來。我對江青說，小高（高振普，負責總理警衛）那裏請您立即去。江青很高興地走了。小高是周總理的警衛員。過了 15 分鐘，大周（江青警衛員）打電話，說怎麼搞的，主席沒有請江青同志到這裏來吧？主席馬上要休息了，怎麼會叫江青同志來呢？今天咱們非挨批評不可。你也不是不瞭解她，今天的日子可不好過啦。我說，她怎麼會到主席那裏去了呢？是總理請江青同志去的呀。我不是說小高那裏請嗎？要是主席請江青同志去，我會說老高（高必成、毛主席秘書）那裏請。今天這是怎麼了？我害怕極了，也後悔極了，經過反復思考，我決定還是向江青實話實說，決不能說謊報軍情，只能承認

我沒有直接說總理請您去，而是說了小高那裏，語言表達得不明確，這樣才符合當時的眞實情況，不多做解釋，聽天由命吧。這時，錢嘉楝（總理秘書）打電話，說總理叫問一下，江青同志怎麼還沒有來呢？總理等得時間不短了。江青和總理住得很近，只隔一條大馬路，兩三分鐘就能到。我說江青同志到主席那裏去了，她回來以後，我馬上報告她。幾乎就在我放下電話的同時，聽見江青回來了。我急忙跑下樓去，小心謹慎地問道，江青同志回來了？同時，我特別注意了一下她的情緒，看得出她不但沒有表現出任何不高興，反而是洋洋得意的樣子，眞是不可思議。江青高興地說，回來了，總理沒有來電話吧？我說總理剛才來過電話，他請您快點去，他已經等得時間不短了。江青沒有進樓，又到總理那裏去了。這之後，江青始終像打了勝仗一樣高興，直到 1973 年 6 月 11 日江青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趕出釣魚台，也沒有說這件事，這對我一直是一個謎。[5]

那時，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江青要彙報，不能越級到毛澤東那裏，而應該先向周恩來彙報。是江青故意說到周恩來那裏去，卻一開始就想到毛澤東那裏？或者是張春橋的意思，就是到了周恩來那裏，周恩來也不能做主，還要報毛澤東，而且事情十萬火急，哪有時間繞圈子。江青說：春橋有急事找我，他帶來那份華北組簡報。我這裏也收到了，可我還沒看。我們覺得情況嚴重，本來想先找總理。不知道那輛車怎麼搞的，開到主席那兒去了……主席正脫襪子，準備睡覺，他還不知道華北組出了這樣一期簡報。我趕緊報

告，現在各組都有劉少奇的陰魂，“他們”要揪跟你造反的人，你一定要保呀！“他們”是衝著“文化大革命”來的呀！[6]

至於江青和張、姚見毛澤東有兩個版本，另一個版本是汪東興的“演義”。吳法憲回憶：快中午時，我接到葉群的電話。吳司令，有一個情況告訴你，“11 樓”（江青）帶著張、姚到毛主席那裏去了。我忙問，講了什麼。葉群說現在還不知道，不過，這個時候找主席，還能有別的事？毛主席只見了張、姚，沒讓江青進去。這消息可靠嗎？完全可靠，汪東興說的。我不放心，又打電話給汪東興，聽說“11 樓”帶張姚到主席那裏去了？汪東興說，是啊，我問他們談了什麼？汪東興說還正在談，叫我不要緊張，沒什麼問題。汪東興還幸災樂禍地給軍委辦事組打電話，說張春橋、姚文元跪到毛主席腳下，一人抱著一條大腿放聲大哭，這兩個人的眼淚鼻涕把主席的褲子都弄髒了。[7]

邱會作回憶：有一次汪東興從東北出差回來，還沒有休息，就把黃吳李邱叫來聊天。林立果也去了，汪東興和林立果說的最多。汪東興說，江青做了婦科手術後就很少和主席在一起，後來就根本不在一起了。江青經常“氣”主席，主席很痛苦，幾次外出都是掉著眼淚離開北京的。黃吳李邱問，主席和江青究竟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汪東興說，完全是兩回事。[8]

葉群完全相信了汪東興說的“一組”（毛澤東）沒見“11 樓”（江青）。15 點左右，葉群在電話裏告訴吳法憲，要他們照著第六號簡報的調子，集體通過設國家主席的建議。[9]

李德生回憶：8 月 25 日 10 點左右，秘書神色有些緊張地給我送來第六號簡報。因爲他看到裏面的措詞激烈，不同尋常，說對反對毛主席爲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強烈的憤慨”，“應該揪出來示衆”、“應該批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急忙送來了。下午華東組沒有討論，晚上我和李先念、余秋里等國務院業務組的同志，在余秋里住處修改國民經濟計劃（草案），所以當時並不知道他們幾個大組煽風點火的情況。我馬上把簡報從頭到尾仔細地看了兩遍。我從來極少抽煙，這時不知不覺地拿出香煙，狠狠地抽了起來。會上出現的問題，引起我很多的思考，深深感到情況嚴重，鬥爭複雜，這是我到中央工作以來，第一次遇到這樣嚴峻的局面。而且許多問題使人迷惑不解，比如，林彪爲什麼要一直堅持設國家主席？陳伯達爲什麼如此有恃無恐地帶頭發難？陳伯達同張春橋過去經常戰鬥在一起，現在爲什麼又劍拔弩張，勢不兩立？這場矛盾和鬥爭的根源何在？究竟是什麼性質？當時我想，面對這樣複雜的鬥爭現實，最要緊的是要保持頭腦清醒，要光明磊落，要按黨的政治原則和組織原則辦事，不能隨便表態，不要跟著起哄，不要介入非組織活動。不管碰上誰來打與拉，都不動搖。[10]

休會那幾天，王洪文像沒頭的蒼蠅一樣四處探聽消息，他去找政治局候補委員、華北組組長李雪峰，碰了釘子。馬天水去找河北省負責人劉子厚，還找了南萍、陳勵耘等人，也沒撈到什麼“稻草”。江青對王洪文說：聽說你們華東組開

會，有些人很凶呀。江青的聲音降了八度。看來老夫子後面有"幾條槍"，他們要老夫子搞一份領袖稱天才的"語錄"。8月24日那天，他們都充當了"宣講員"。所以，問題不僅僅是華北組，因此主席決定休會。[11]

王洪文不懂：汪東興爲什麼要那樣發言？江青說：汪東興也收到了"語錄"，不過他事先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動。聽了陳伯達的發言，不知怎麼搞的，他的頭腦發熱起來。老汪已經向主席檢討，那份"語錄"也交了，毛主席保護他。主席已經批評那"幾條槍"了，任何情況主席總有辦法處理。

江青大笑起來：那"幾條槍"[12]這麼一鬧，我的頭痛反倒好多了……

四面楚歌的江青一夥，由於毛澤東"拉"了一把，居然"翻了身"。王洪文高興極了，一口氣將半瓶茅台灌進肚子裏。[13]

沒想到一夜之間，風向根本變了

8月25日15點前，工作人員匆匆把各大組召集人叫走了。

許世友臨走時對華東組宣佈：大家等一等，休息一下，等我回來。許世友一走，張春橋也走了。到底是怎麼回事？誰也捉摸不透。[14]

會前毛澤東逐一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談話。

15點，毛澤東主持召開有各大組召集人參加的政治局

常委擴大會議。嚴厲批評陳伯達等人在華北組的發言違背了"九大"方針，提出要按"九大"的精神團結起來，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毛主席在會上宣佈：剛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認爲各組討論的問題不符合全會原定的三項議程，關於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當國家主席就是要我早點死。如果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毛澤東在同康生談話時，生氣地說他不當中央主席了，這個會讓林彪去開，他下山不參加會了。[15] 會議決定分組會立即休會，毛澤東宣佈了三條：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立即收回會議第六號簡報，沒有發的不要發了，責令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檢討。[16]

當晚，周恩來主持各大組召集人會議，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

許世友回來，一進華東組的會場就大喊：不開了，不開了，散會！大家都愣住了，許世友一把扯開軍裝的扣子，敞著懷，在會場門口不停地走來走去。過了幾分鐘，看大家誰也沒動，又揮揮手，不開會了。剛才我到毛主席那裏去了，這是毛主席的決定，休會！大家回去吧。[17]

李雪峰從政治局開會回來，對吳德說會議立刻停止。吳德覺得意外，問爲什麼停止？李雪峰只是簡單地說這是中央的決定，然後對大家宣佈會議結束。散會的路上，吳德又問李雪峰出了什麼事情，爲什麼會議要停止？李雪峰解釋：毛主席主持各組召集人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評了天

才問題、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並提出中央全會分組會議立刻停止。[18]

李作鵬也說：停一停，咱們中南組的簡報先壓一壓。[19]

曾思玉回來，他首先問我們的簡報出了沒有。聽說沒出，他才如釋重負，說謝天謝地。其實中南組攻擊張春橋也很厲害，但爲什麼沒有像華北組那樣被批判呢？一是簡報沒出，沒造成影響，槍打出頭鳥嘛。二是葉群是中南組的主要發言人，在廬山上毛澤東還沒有"驚動"林彪。如果中南組批葉群，勢必牽涉林彪。如此這般，中南組就平安無事了。[20]

邱會作來到西北組會場，看康生和召集人都不在，得知毛澤東把他們召去開會，便沒敢把第六號簡報從皮包裏取出來。[21]

吳法憲到西南組，看召集人不在，卻沒有引起重視，自以爲取到了"眞經"，膽子越發大起來。他拿出第六號簡報宣讀，並按葉群的佈置，舉手通過了設國家主席的建議。不久，召集人回來，傳達了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內容，決定立即收回第六號簡報。形勢急轉直下，吳法憲頓時傻了。1980 年，他在供詞中說：我聽了以後，情緒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緊張，心涼了半截，後悔莫及，知道犯錯誤了。

林彪開會回來，立即把葉群叫進房間。不一會兒，葉群臉色蒼白跑出來，對工作人員說：首長從主席處開會回來了。主席說，張、姚燒一燒可以，但不要燒焦，現在要降溫了，壓縮一下空氣。[22] 我的書面發言不要整理了，快把草稿給我。葉群還叫人把她在會議上的發言記錄撕下來。晚飯時，吳法憲打電話給邱會作：你發言的簡報發了沒有？情況有變，不要發了。山下的黃永勝也要吳法憲趕快叫工作人員把他的書面發言燒掉。[23]

葉群和李作鵬要收回他們在中南組的發言，兩位記錄人將記錄本編上頁碼，注明幾頁到幾頁誰的發言，被誰撕走。同時向康生報告，康生報告周恩來，周恩來報告毛澤東，8 月 26 日以後，毛澤東要看中南組的會議記錄。因爲李作鵬和葉群的會議記錄被撕走，組織人力整理了兩天，整理好後送周恩來轉毛澤東。[24]

毛澤東南巡時，說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爲有什麼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又慌了手腳。起先那麼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快收回記錄。既然有理，爲什麼收回呢？說明他們空虛恐慌。[25]

由"三個副詞"引發的鬥爭

廬山上的這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實際上在山下就開始了。

"文革"奪權開始後，軍隊的日子就不好過了。黃永勝自 1967 年 3 月"楊余傅事件"後，從廣州調來任軍委辦事組組長，江青就開始處處找茬。"九大"前夕，釣魚台和毛家灣形成兩個對立的營壘，一方的核心人物是江青，一方的核心人物是葉群。"九大"選舉，陳伯達沒投江青的票，葉群也佈置

一些人不投江青的票，結果江青少了六票，嚷嚷著要追查。[26] 而華東組也有人不投葉群的票，葉群大爲不滿。一些代表對江青等人未獲全票、以及有人在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名字上打叉表示"極爲憤慨"，認爲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後，沒有印發這些小組的簡報。5 月 10 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說，少幾票有什麼關係嘛，斤斤計較一兩張票！頭上有幾個叉那又算什麼？[27]

"九大"後，軍委辦事組和中央文革的矛盾越來越深。邱會作請示林彪，吳法憲也幾次見林彪，中央文革的一些做法難辦。林彪支持黃吳李邱，但他又不能和毛澤東作對，說了一句"軟頂"。但是，江青和張春橋一夥欺人太甚。[28]

1970 年 7 月 27 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討論兩報一刊八一社論《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送審稿，陳伯達與張春橋吵起來。送審稿有一個新提法，"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1968 年負責中央宣傳工作的張、姚在十一社論中已經用了這種新的提法，堅持不改。陳伯達主張改回過去一貫的提法，把"毛主席和"刪掉，這是"文革"以來的標準提法，新提法將會引起外界不必要的議論。康生認爲新提法不易譯成外文，周恩來認爲陳伯達的意見更值得考慮，但這個事要請示主席。第二天，周恩來將八一社論送毛澤東審定，同時附信報告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的情況，表示我個人認爲以改回爲好，究竟應如何，請主席決定。

7 月 29 日，周恩來利用在上海陪見外賓時當面請示。毛澤東說這類應景文章，既然已經政治局討論修改過，我就不看了。可以改回去，這無關緊要。讓汪東興代爲劃掉"毛主席和"。汪東興不敢畫圈，他當著周、黃的面問。毛主席說：兩種意見，我都不贊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然後汪東興按毛澤東的意思畫了圈，刪去了"毛主席和"四個字。當晚，周恩來返回北京，7 月 30 日將毛澤東的意見批給康、江、黃、張等。[29]

一年後南巡，毛澤東說，難道"締造者"就不能"指揮"嗎？[30]

1970 年 8 月 13 日下午，毛澤東決定由康生負責召開修改《憲法》的會議，張春橋、陳伯達等人參加。筆桿子握在康生和張春橋的手裏，被支到河北"調查研究"的陳伯達只參加了這一次會。[31]

陳伯達回憶：《憲法》起草由康生主持，主角是張春橋。他們幾乎不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也幾乎不提毛澤東思想，只談"文化大革命"。討論中我到衛生間，聽到吳法憲聲震屋瓦，我回來已經平靜。會後吳法憲說，張春橋否認毛主席是天才，才吵的。[32]

在康生主持下，張春橋執筆，在《憲法》序言部分沒有用"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討論《憲法》草案中的文字修改時，吳法憲和張春橋因"三個副詞"頂起來。吳法憲提出：一定要把"三個副詞"加上去。張春橋不同意，說"九大"圈掉"三個副詞"是毛主席的意見。還要刪掉國

家機構一章中的“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一句，以及在《憲法》上表述“毛澤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句子，因爲《憲法》序言中已有類似內容。張春橋還說，毛主席在一次會見外賓時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是個諷刺”。這句話激怒了吳法憲，這不是指桑罵槐，影射林彪嗎？吳法憲氣得拍了桌子：你把這話再說一遍！說清楚！吳法憲說張春橋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否認毛主席是天才，太過分了！[33]

這是最後一次討論憲法的會議，地點在懷仁堂，出席者只有四個人，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吳法憲。陳伯達“臨陣逃脫”，吳法憲“孤軍作戰”。

康生一看這種情況，說既然這樣，都寫上，都寫上。[34]

吳法憲回憶：康生站在張春橋一邊。會後，我到陳伯達處詳細談了爭吵的情況。陳伯達認爲我對，張春橋可笑，並通過黃永勝報告給林彪。林彪本來要直接給毛澤東寫信，被葉群勸住。葉群說胖子的意見很對，今天抓住了張春橋，抓得好。葉群分別向陳伯達、黃永勝、李作鵬等打招呼，要他們在政治上支持我。周恩來私下也對我說，支持把毛澤東思想爲指針寫入《憲法》。[35]

吳新潮回憶：我父親第一個報告周總理，周恩來說，從來沒有聽說赫魯曉夫說過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他明確表示支持我父親。有了周恩來的支持，我父親第二個打電話給林彪。林彪在北戴河，我也正巧在北戴河，葉群叫我來看電影。看電影中，葉群去接我父親的電話。葉群放下電

話，就去向林彪彙報，接著又給我爸爸打電話。忙完了葉群對我說，你父親放炮了，放了一炮。首長（林彪）說你爸爸放炮放得好，要抓住張春橋的狐狸尾巴不放。很明顯，張春橋是衝著林彪去的，吳法憲被張春橋激怒了，報告葉群，葉群報告林彪，林彪也被激怒了。這才有了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的發言。[36]

“三個副詞”最早見於1966年5月18日林彪的講話，又見於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是林彪的“發明”。1966年12月16日，由林彪署名實際上是張春橋捉刀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照抄了這“三個副詞”[37]。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黨章》，毛澤東兩次圈去《黨章》和政治報告中的“三個副詞”。有人說這是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新《黨章》不寫不好吧？毛澤東說：黨的代表大會有權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三個副詞”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九大”政治報告和新《黨章》中都悄悄消失了。所以毛澤東1971年南巡時說，那幾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的嘛，“九大”的《黨章》已經定了，爲什麼不翻開來看看？[38]

張春橋知道“三個副詞”寫上也會被圈掉，到廬山會議上才挑明：不是我們不寫，是毛主席不讓寫。吳法憲沒有參加“九大”文件的起草，似乎也沒有注意到刪去的“三個副詞”，更不知道不是張春橋，而是毛澤東刪掉的“三個副詞”，只以爲抓住了張春橋的“辮子”。卻沒想到掉進了陷阱。

其實，眞正激怒吳法憲的不僅僅是“三個副詞”。攻擊“三

個副詞”就已經含沙射影把矛頭指向林彪了，但張春橋還怕對方不生氣，又進一步說：不要提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思想的指導方針，提毛澤東思想，不一定就是擁護毛主席，赫魯曉夫也是天才地創造性全面地發展馬列主義。吳法憲頓時火冒三丈，你再說一遍！你說清楚！誰是赫魯曉夫？[39]

張春橋爲什麼臨陣退縮

到九屆二中全會前，毛家灣和釣魚台的關係緊張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葉群擔心林彪的身體熬不過去，又不願意“接班人”的位置被江青、張春橋奪走，眞是急死了。不敢碰江青，張春橋自然就成了眼中釘肉中刺。

吳法憲回憶：林彪囑咐黃永勝和我，要多加小心，這件事沒有完，到廬山會有大的鬥爭。葉群說：不管出現什麼情況，要堅持兩點，一是設國家主席，一是堅持天才的觀點。[40] 8 月 17 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憲法》修改草案最後定稿，估計會上要有一番“血雨腥風”。會前，軍委辦事組特地把在外地檢查工作的李作鵬喊回來，以增加力量。葉群缺席，她從北戴河打電話給陳伯達、黃永勝等人，讓他們準備好。[41]

出乎意料，江青、姚文元金口緊閉，張春橋在會上也一言不發，甚至不再堅持刪掉“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這些詞句。帶有這些詞句的《憲法》修改草案順利通過。周恩來覺得反常，

特意問張春橋有什麼意見，張春橋說我有意見，但不能講，一講又要和吳法憲吵起來。[42]

以後張春橋授意兩名工作人員寫揭發吳法憲的材料，說僅僅是“文字之爭”，而不是像吳法憲所說的“原則之爭”，張春橋同意把這句話寫到《憲法》中去，吳法憲在這個問題說了假話。林彪、周恩來專門講話，說吳法憲不會講假話，才平息了此事。

葉群並不知道張春橋背靠“大樹”，以爲勝利了，林彪則認爲張春橋的反常大有文章。

張春橋爲何臨陣退縮？難道得到……點撥，又在引“蛇”出洞？

可別小看這位生於 1917 年的山東巨野人士。1958 年，他抱著柯慶施的粗腿，掛上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的牌子。1962 年，升爲上海市委候補書記。1965 年，扔掉了“候補”兩個字。“八大”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張某人，“九大”卻大搖大擺進了政治局，搖身變成中共第七號人物。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毛澤東需要軍隊的支援，問林彪，林彪老說要依靠和他一起打天下的“紅小鬼”[43]。“九大”過後，各省市的第一把手基本上都是軍人出身，在毛澤東眼中，林彪把持的軍隊權力越來越大。毛澤東又開始扶植張春橋，造成政治上與林彪爭鋒的陣勢。

1958 年，毛澤東就認識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10 月 11 日，毛澤東在關於轉載張春橋《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給吳冷西（時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

總編輯）的信中，專門爲《人民日報》寫了編者按：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現在轉載於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爲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爲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歷史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讀。[44]

姬應五（時任空四軍第二政委）回憶：七二O事件後，毛澤東飛到上海，對從北京趕過去的張春橋說，假如"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們都去賣酒，再也不說和林彪上井岡山打遊擊了。毛澤東讓張春橋主持，和汪東興、余立金（空軍政委）他們討論，"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下去？會不會成功？

張春橋回答，會成功！因爲群衆擁護"文化大革命"。[45]

在毛澤東眼中，張春橋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功臣。上海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批《海瑞罷官》的文章、一月風暴，張春橋都立下了汗馬功勞。1966 年 5 月 28 日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張春橋被任命爲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

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組說：工作組的材料裝在口袋裏，幾次要報告毛主席，到現在還沒有拿出來。張春橋馬上把劉少奇批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所寫的批語交了上去。毛澤東大怒，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衆，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46] 因此才有了毛澤東的第一張大字報。毛澤東不但大罵劉少奇，還大罵康生，說要康生這樣的人有什麼用處！而告御狀的張春橋一躍進了中央，成爲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到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康生在毛澤東眼中的地位已經低於張春橋。[47] "二月逆流"中，張春橋又率先向毛澤東告狀，不但告了幾位副總理和老帥，也告了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又立"大功"。

毛澤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之一就是"文化大革命"[48]，而中央文革小組是"文化大革命"的代表。1967 年 2 月，毛澤東在反"二月逆流"的政治局會議上，曾堅決地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1971 年毛澤東南巡時在武昌與華國鋒談話，說得更明確了，他們名爲反對張春橋，實際上是反對我。[49]

這就是爲什麼廬山會議上群起攻擊張春橋，毛澤東卻大發雷霆的原因。

但是不是眞的要讓張春橋當接班人呢？從後來看，毛澤東選擇了王洪文、鄧小平，又選擇了華國鋒，到最後還是把張春橋晾在了一邊。1971 年 4 月 1 日，林立果曾說：現在的鬥爭，是爭奪接班人的鬥爭。主席的班，靠誰來接？張春橋他算老幾？一不會做工，二不會種田，三不會打仗，就是會造點輿論。[50] 林立果都看出來了，毛澤東能看不出來嗎？1958 年 5 月 8 日，毛澤東給張聞天的信中說：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對你曾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後，我對陳雲、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

大懂實際。[51] 這話或許也可以對張春橋說。更何況上海的《學習與批判》雜誌鼓吹"張春橋思想"，怎能再有一個"思想"呢？

1980 年審判兩案，江青和張春橋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張春橋在法庭上一言不發。保外就醫後，他還是不寫回憶錄，沉默到死。

1967 年 1 月，1968 年 4 月，上海兩次炮打張春橋，九屆二中全會是第三次炮打。1974 年 4 月 20 日，張春橋給兒子的信中，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他思想上已準備全家被殺了。1976 年 5 月，張春橋在給徐景賢的信中又一次說：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52]

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

在廬山會議的後幾天，毛澤東分別找政治局委員個別談話，進一步瞭解情況。知己知彼，這是毛澤東一貫的工作作風。1958 年 6 月 5 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批"軍隊建設中的教條主義"時，毛澤東有一段批語，我暫時不宜於講話，先要讓他們把問題都放出來。過幾天，我準備找各組召集人分別談一下，調查一下情況，摸一下底。[53]

經過一番調查研究，毛澤東看"清楚"了，認爲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急於奪權。

江青曾說，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主席不當，那麼自然就是林彪當。

可是華北組的陳先瑞說：不管是華北組會上，還是簡報上，都沒有提出讓林彪當國家主席。[54] 林彪也沒有在開幕會的講話中提到設國家主席的問題。

毛澤東把第一槍打向了"天才論"。

曾思玉（時任武漢軍區司令員）回憶：在重大的原則問題上，毛澤東決不讓步。但"九大"才開過一年多，接班人剛剛被寫進《黨章》，又考慮到林彪的"表演"還不那麼充分（他並沒有在講話中提設國家主席），毛澤東決定先從陳伯達開刀。

曾思玉第一次看見毛主席震怒。廬山會議第三天，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作爲中南組第一召集人參加。毛主席把桌子拍得山響，非常嚴厲地批陳伯達：我們共事 30 多年，你陰一套，陽一套，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議不設國家主席，大家沒有發表不同意見。上了山你就變了卦，搞突然襲擊，你是個地地道道的變色龍！我毛澤東是不當這個國家主席的。要當，你陳伯達當好了，你們去當！曾思玉看見陳伯達的臉漲成了豬肝色，一句話也沒說出來。[55]

陳伯達，1904 年 7 月生，福建惠安人，祖輩都是教書先生。他參加過五卅運動、北伐，1927 年加入共產黨，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30 年代寫過有關哲學和新啓蒙運動的文章，產生過較大影響。1937 年 8 月，他經青島到延安，先在陝北公學、後在中央黨校任教員，再調中央宣傳部。

馬列學院成立後兼教員，教授中國革命問題。1939 年春，陳伯達擔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實際上是毛主席的秘書。1943 年 7 月，陳伯達發表評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這是陳伯達的一個主要著作。不僅在解放區，就是在國統區也有很大影響，還被譯成英文。軍委秘書長李六如說：這一本書頂了幾個師的力量。陳伯達還寫過《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等。[56] 由此陳伯達獲得"理論家"的稱號。1951 年，陳伯達陪毛澤東訪蘇回來，開始編輯《毛澤東選集》，由他選擇篇目，再交毛澤東審閱。[57]

因爲一直是文人，陳伯達膽子非常小，老是害怕得罪人。他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以爲摸透了毛澤東的心思。江青老是當面侮辱他，他早就忍無可忍，看毛澤東對林彪好，他覺得"投靠"毛家灣不會有危險。以後陳伯達說，我没有看出林彪和毛主席之間出現裂痕。[58]

8 月 31 日，毛澤東考慮三天，在陳伯達編的語錄上寫下《我的一點意見》，[59] 給陳伯達定了性，各大組馬上轉爲批陳伯達。

《我的一點意見》印發全會前，毛澤東讓林彪看過修改件。[60]

陳伯達編的"語錄"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恩格斯稱馬克思爲天才，恩格斯稱讚馬克思寫的《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一書爲：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第二部分，列寧稱馬克思、恩格斯爲天才。

1、當你讀到這些評論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好像是在

親自聽取這位天才思想家講話一樣。(《卡·馬克思致路·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列寧選集》第一卷第 769 頁)

2、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於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列寧選集》第二卷第 378 頁)

3、馬克思的天才就在於他最先從這裏得出了全世界歷史提示的結論，並且一貫地推行了這個結論。這一結論就是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同上第 382 頁)

4、列寧在《預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談到未來世界大戰時所說的一段話後，讚揚恩格斯：這眞是多麼天才的預見！(《列寧選集》第三卷第 593 頁)

5、在現代社會中，假如没有"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出來的)、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無論哪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怎麼辦？》《列寧選集》第一卷第 422 頁)

第三部分，毛主席稱馬、恩、列、斯爲天才。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所以能夠做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 264 頁)

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中寫道：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裏没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

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裏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 30 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裏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麼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惟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

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61]

鄭維山說，這是毛主席的第二張大字報。[62]

陳伯達回憶：我對有些話不大理解。[63] 他怎麼可能理解呢？他與張春橋爭論的焦點是世界上有沒有天才，毛澤東可不可以被稱為天才？他沒有想到，毛澤東把“天才”當成靶子，他首先中“彈”。

通觀全篇，毛澤東沒有提設不設國家主席，更沒有把矛頭指向林彪。甚至還提到“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明裏把陳伯達與林彪區分開，但暗裏卻是針對林彪“我講一點意見”而來。毛澤東說，什麼論“天才”？（九屆）二中全會做了相當的結論，《我的一點意見》就是專門批天才論的。我並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能靠一個人嗎？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嘛。[64]

毛澤東自己也在談天才，為什麼卻不許別人談天才？

註釋：

[1] [3] [6] [11] [13] [14] [17] [52] 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版 215、217-219、402-403 頁

[2] [5] 參見楊銀祿《九屆二中全會時的江青》，載《黨史博覽》2006 年第 1 期

[4] [31] [32] [56] [57] [58] [63] 採訪陳伯達兒子陳曉農筆記，2006 年 4 月

[7] [8] [21] [43] 採訪邱會作筆記，2000 年 11 月 16 日

[9] 參見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藝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版，70-73 頁

[10] 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第一版，399-400 頁

[12] 注：指黄、吳、李、邱

[15] [40] [46] [60] [64] 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1576、1571、1422、1579、1600 頁

[16] [27] [29] [33] [59] 參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388-389、294、381、385、392 頁

[18] 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1995 年 12 月版，131 頁

[19] [36] 採訪吳法憲大兒子吳新潮筆記，2006 年 1 月 3 日

[20] [24] 參見楊福雲《圍繞設不設國家主席的一場鬥爭的序幕》，載《中國人大》半月刊，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主辦，2003 年 6 月

[22] [35] 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版，300、286 頁

[23]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47 頁

[25] [30] [38] [49] 參見《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1971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 12 日，參見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册，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 年 10 月，555 頁

[26] 採訪林彪秘書于運深筆記，2005 年 10 月 25 日

[28] [34] [39] [41] 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

[37] 參見盧弘《軍報內部消息》自印本，22 頁

[42] 參見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第一版，1972-1974 頁；又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版，287 頁

[44] [51] 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7 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447、212 頁

[45] 參見張聶耳《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一版，135 頁

[47] 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版，713 頁

[48] 注：1976年，毛澤東在住地召見華國鋒等，又一次談起自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他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80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781-1782頁

[50] 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40頁

[53] 毛澤東《在方強對軍委擴大會議開法的意見上的批語》，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年8月版，260頁

[54] 參見《陳先瑞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3月版，458頁

[55] 參見李榮欣等《名將曾思玉》，作家出版社 1998 年 12月版518頁

[61] 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114-115頁

[62] 採訪鄭維山筆記，1991年11月3日

第四章
毛、林分歧

陳伯達的"九大"報告稿被否定了

中央碰頭會決定召開黨的"九大"和起草政治報告。

陳伯達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因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張雲生回憶：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從主席處開會回來，叫我和李春生去，說主席召集會議研究決定，準備最近召開"九大"。主席讓他作政治報告，並說這次報告不用事先寫成稿子，叫他口頭講，然後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對外發表，就摘用記錄稿。林彪提出，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正式作報告，最好請中央文革給寫個稿子。如果必要，可像七千人大會那樣，我另作一個口頭報告，但對外發表，還是以中央正式通過的稿子為準。[1]

毛澤東指定張春橋、姚文元起草《黨章》，指定陳伯達

和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政治報告，由林彪出面抓，時間限定一個月，內容由他們自己考慮。[2]

作爲黨內的大理論家，陳伯達不想和“小字輩”的張、姚合作。

王文耀、王保春回憶：1969 年 1 月底的一天夜裏，陳伯達開會回來，和往常不同，一進大門他不到自己的辦公室，而是興沖沖地到我們的辦公室，沒頭沒腦地說，快給我準備準備！準備材料、紙和筆，中央決定讓我起草“九大”報告。問他有誰參加，他不耐煩地說，還有上海那兩個，主要是我自己寫。那他們來問怎麼辦？不管他，他們自己願意怎麼寫就怎麼寫好了。我們看他一提到“那兩個”就情緒激動，也就不再多說別的了。

2 月下旬，林彪把陳伯達和張姚三個人召到毛家灣，商量“九大”政治報告的起草。林彪會客，不許工作人員在場，只許在門口等待。不到一小時，三個人出來。陳伯達說：你們寫你們的，我寫我的，寫完再把稿子拿到一塊議。[3]

張雲生回憶：我聽見張、姚對陳伯達說，你就先動筆吧，需要我們時就隨時找。[4]

王文耀、王保春回憶：陳伯達向我們講了他要起草的主題設想，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主要的任務應該是抓生產了。你們幫助我搜集這方面的資料，要各地方有關在經濟建設、生產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資料。雖然是林彪在“九大”上報告，但報告內容由陳伯達考慮，林彪沒有多問。陳伯達很快擬好了提綱，題目是《爲把我國建設成爲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下列了幾個小標題。陳伯達帶著這個提綱，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後，改成總題目下面十個小題目，然後由我們抄清。陳伯達親筆給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附上提綱呈報主席。毛澤東很快圈閱退回。

但我們感到最不好辦的是中央決定由三個人起草，而陳伯達甩開張姚自己幹。果然，姚文元來電話問。陳伯達讓我們答覆，覺得該寫什麼就先寫什麼吧，說他有些不舒服。張春橋又來電話，是否談一談，陳伯達也同樣答覆，張、姚再不來電話了。我們對陳伯達說，你這樣把他們拒之門外，他們不會閑著，會向上報告的。陳伯達說不管他，中央決定主要是要我來寫，這次我就是不讓他們參加。陳伯達的態度很堅決，我們也不反對他的想法，但是擔心這樣硬頂，張、姚會找岔子。我們還是希望這個報告能夠寫成，便努力按陳伯達的思路四處搜集資料。除汪東興送來一批北京六廠二校[5]的材料，我們首先是找北京市要資料。陳伯達對北京市抱有很大希望，認爲謝富治會支持他。可是我們打電話向謝富治要生產方面的材料，謝富治說，中央文革要可以給，其他人要不能給。我們碰了釘子，陳伯達還不完全相信，親自向謝富治要材料。謝富治說，伯達同志，你可別怪我呀，中央文革要多少我給多少，可你要我不能給，請你理解我。陳伯達決定向河北省委要，我們從李雪峰那裏要了些。

陳伯達寫“九大”報告寫得很苦，長時間地思考、推敲。規定完稿的時間快到了，陳伯達很著急。只剩最後一點時，中央開會了。[6]

毛澤東2月7日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開會，說搞出第一稿就有辦法了，無非是全部推翻再搞。難道還沒有開始搞就想到了推翻？這個會上，初步商定2月20日交稿，3月15日"九大"開幕。3月3日，陳伯達的政治報告仍然沒有消息，毛澤東很生氣，說還是準備兩手，一個是寫出報告可用，一個是不能用。[7] 3月7日，中央討論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陳伯達才交出四分之三，還差兩個半的問題。主席在會上第一句話就問，"九大"政治報告寫得怎麼樣了？周恩來說：看來恐怕不行吧！主席對陳伯達不能按期交出報告稿表示不滿，說不行就重新搞嘛！請康生主持重搞。就這樣，陳伯達一句話沒說，辛苦了近一個月的報告稿，沒有一個領導人看過，就被否決了。陳伯達非常痛苦，散會後問總理：我那個稿子只剩下一點了，怎麼辦？總理安慰他，那你就寫完，作個紀念也好嘛。當晚總理讓陳伯達先拿出寫完的報告稿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談一下，被張、姚攻擊為鼓吹"唯生產力論"而被否定了。[8]

3月12日，毛澤東提出換人，請康、張、姚三位再寫一個"九大"報告，並點明主題：總之，要提出矛盾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鬥爭，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9] 林彪、周恩來沒吭聲。康生不想夾在毛、林中間，藉口有病。張、姚筆鋒正健，僅一個多星期就"突擊"出一個"抓革命"的初稿。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由中辦送來，陳伯達很快看完，急匆匆來到我們辦公室，很激動地說：他們這個稿子你們看了沒有？他們這是伯恩斯坦[10] 的！就是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他們就是搞運動！運動！運動！你們看看是不是這樣的！[11]

想當年"八大"政治報告就是陳伯達起草的，經過多次修改。陳伯達回憶：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則是在會議進行中搞的，比較倉促。我覺得主要矛盾的句子太長。9月27日下午就要通過決議，我早晨還在考慮如何概括，列寧的一個提法啓發了我。我就寫成"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寫好後已經來不及送毛主席看，就直接在大會上宣讀了。坐在毛主席後面的葉飛後來告訴我，毛主席說，這句話不好，但他還是舉了手。[12]

王光美回憶："八大"閉幕後第三天是國慶，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對劉少奇說，"八大"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錯誤的，主要矛盾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劉少奇說，但是決議已經通過了。[13]

1957年9月至10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1958年5月，八屆二次會議上，劉少奇在工作報告中提出：在整個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此話正式否定了陳伯達的"矛盾"觀。[14]

但陳伯達還是念念不忘"生產"。1962年以後，陳伯達完成農業60條和商業40條後，開始工業調查。除了北京、

天津的科研單位和工廠，還去了大慶油田和攀枝花等地。他根據科研人員的意見，提出以電子技術為中心，開展中國新的工業革命。從 1963 年開始，陳伯達主持起草《工業問題》的文件，四易其稿，1965 年夏，毛澤東看後說：搞了這麼多年，總算找到了一條發展工業的路子。可惜幾天後，被中央常委會否定。陳伯達回憶：這個文件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則毛主席有可能把主要注意力轉到經濟問題上來。[15]

不過，這只是陳伯達的良好願望而已。

1966 年初，陳伯達到三線視察，到過 20 多家工廠。

直到 1969 年，他總算有了用武之地。陳伯達把他所有關於生產的想法，都“堆”到“九大”政治報告稿中。

張、姚的“九大”稿，林彪看也不看

陳伯達“促生產”的初稿和張、姚“抓革命”的初稿都排成清樣，分送毛、林和中央文革小組。而中央文革小組只討論了張、姚的稿子。[16]

中央確定使用張、姚的報告稿後，政治局專門開會，批判陳伯達提出的以發展生產為主要任務的觀點，這是從來沒有過的。陳伯達倒了以後，他們在報上反過來說他是伯恩斯坦。

陳伯達回憶：會上沒有人支持我。最後中央決定仍用他們的稿子。雖然我的稿子“流產”了。毛主席說還是可以，考

慮在報告上添上我的一些意見。[17]但實際上毛澤東曾在一次會上批判陳伯達總是看重經濟，說帝國主義的本性不可改變，陳伯達的本性也不可改變。說有人在大船將要沉時來了個老鼠搬家。延安時，張聞天想留住陳伯達，陳伯達猶豫不決，毛澤東也說過這話。[18]

“九大”前夕，江青和康生以陳伯達封鎖毛主席的聲音為藉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突然召開了一次有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會，江青自己宣佈，她是會議主席，會議的議題是陳伯達做檢討。陳伯達剛說一句話，就被江青打斷了，陳伯達不做檢討，不讓他說了。江青也不讓其他人發言，還要摘掉陳伯達的帽徽領章。[19]

張雲生回憶：林彪讓我們比較一下陳和張、姚的稿子，哪一個好一些呢？不要迷信那些大秀才，你們可以研究一下，他們寫的東西中有哪些可取之處，林彪對我們說，我向來很不習慣念別人寫成的稿子，而只願意順口講，因此我想搞個平行作業，既準備一個正式發表的稿子，又準備一個我口頭講話用的“條子”。在給我拉條子時，把能吸收的吸收過來，但他們作的是官樣文章，這一點不要學。過幾天，張、姚的第二稿送來了，主席又作了較大的修改。林彪只讓把修改處講講。3 月底，周恩來把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通過的“九大”政治報告稿批送林彪。林彪一個字也沒看，就在稿子封頁上批，呈主席審批。周恩來著急地說，怎麼又送給主席了？前天在主席那裏開會，主席講他已親自修改過幾次，他不再看了，請林彪同志最後定稿。這個事葉群是知道的，

爲什麼又送給主席了呢？秘書想追回來，已經過了半小時，來不及了。[20]

看來林彪是非常討厭張、姚的稿子。

張雲生回憶：林彪說，我這次作口頭講話，還是川十二中全會上講的那六個題目，中心意思是國富民強。[21]

于運深回憶：林彪拉"條子"，自己想，想幾天，今天想一條，明天想一條，沒有成句的話，寫在紙上幾個字，兩個字一行，三個字一行，就是一篇，啪丟在地上。體系形成，叫我整理整理就夠了。一個鐘頭後林彪叫我，不要編句子，要原話。林彪腦子好使，上台就講。這個習慣是他在戰爭時期養成的，出口就成章。[22]

印發"九大"政治報告，張春橋提出讓林彪親筆簽字，說這樣效果會更好些，林彪一口回絕，有意讓他碰一鼻子灰。毛主席已經明確表態，林彪不再說話，但私下多次說：張、姚是無名小卒，不知是那裏冒出來的小記者，他們寫什麼是什麼，我林彪一字不改。到最後一刻，林彪決定不作口頭報告了。[23] 但一直到"九大"登台前，林彪一遍也沒有看過張、姚的報告稿，念得結結巴巴。被江青抓住，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提出意見。

陳伯達的稿子怎麼辦？

葉群對林辦秘書說：老夫子的稿子已經不能用了，但他堅持印出來，還托我勸首長看一看。說是首長看，實際上還得靠你們去講。我是同情老夫子的，只能對他說首長已經看過他的稿子了，這是爲了給他一點安慰。但你們給首長講時，不要講得太細，以防止首長腦子一熱，又對老夫子的東西發生了興趣。[24]

王文耀、王保春回憶："九大"開完，陳伯達收到毛主席退回的文件。陳伯達給毛主席的"九大"報告稿第一部分，原封未動，主席用粗鉛筆寫的字很大，佔了整個封面，"退陳伯達同志，毛澤東"，後面寫著日期。我們和陳伯達都愣了，原來主席從未拆開，我們倆一聲不響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陳伯達一人呆坐在屋子裏。[25]

不拆開又如何得知其中的內容呢？毛澤東已經從陳伯達交來的提綱中得知，陳伯達要在"九大"政治報告中大肆鼓吹"生產"，所以他根本不拆。就是要"告訴"陳伯達，我看都不看。憤恨之情，可見一斑。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表面化

林彪早就把毛澤東琢磨透了嗎？1959 年廬山會議後，林彪就說過"憑空胡來"，"說絕了，做絕了，絕則錯"。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至少在表面上林彪還在大唱讚歌[26] 。到 1966 年底毛澤東對林彪還是信任的，似乎沒有什麼大的意見。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時，產生了分歧，林彪支持陳伯達"促生產"，而毛澤東則要"抓革命"，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七八年再來一次。很快毛、林的分歧就越來越多，包括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包括打倒那麼多的老幹部，包括設國家主席，包括稱天才，到九屆二中全會毛、林

分歧達到高潮。

但是林和毛一直沒有發生正面衝突，倒是與江、張等人的矛盾表面化了。

張雲生回憶：毛澤東帶張春橋等人去蘇州前，批評張春橋：林彪在蘇州，你們怎麼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張春橋說，人家保密。

1969 年 10 月，林彪去蘇州，葉群對工作人員宣佈：對外嚴加保密，特別是對上海。葉群怕張春橋知道傳給江青，就添麻煩了。如果江青打電話，就告訴她在南方，不要具體講。葉群自以為聰明，但蘇州距離上海 90 公里，很難瞞住"地頭蛇"。林彪從北京經空路到蘇州，同時調專列駛往上海待命。上海鐵路部門向上海市革委會報告，張春橋佯裝不知，但悄悄報告了釣魚台。果然江青來電話叫葉群回北京，葉群說首長老出"汗"，不能離開，江青說那她就來一趟蘇州。葉群急了，能不能想辦法擋住？警衛秘書李文普說沒辦法，江青想要幹什麼，沒人敢擋。葉群決定搬家。林彪的身體剛剛適應，往哪兒搬？哪裏再找這麼合適的地方？葉群說杭州、無錫都可以考慮。明天派人到杭州、無錫看房子。葉群說，我給"11 樓"（江青）打電話，就說要搬家。如果她不來，就不搬了。

這類"捉迷藏"，是葉群的拿手戲。江青倒是沒來，但沒幾天，通過中央辦公廳，江青的一包絕密文件來了，請林彪支持。這是兩份長材料，一組材料的標題《致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關於文藝問題的一封信》。把"文革"前 17 年說得一無是處，而且把"九大"前後的文藝現狀說得一片漆黑。江青要求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的名義轉發全黨。另一組材料是《周揚鼓吹資產階級文藝復興的一些言論》，"九大"後，江青提出要公開批判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林彪把"文革"與歷史上的三次"文化革命"、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比較，認為"文革"的歷史意義遠遠超過這三次。江青從林彪講話中挑出很多毛病，逐句旁批，並在政治局內部傳閱，要求討論後發給全黨。江青還找政治局委員個別談話，說我這個東西就是要批林彪的講話。

葉群發愁了。從夏天起，"11 樓"（江青）就要求首長"批字"支持。首長批了請中央政治局討論並呈主席批示，後來被主席擋住。事隔數月，又送來批，叫我們怎麼辦呢？葉群抓起電話，我摸摸底再說。過一會兒，葉群說：我向汪東興和總理都摸了底，汪東興說主席上次看了這些東西就很生氣，這次肯定還不會批。總理說，林彪同志無論如何不要再把江青的東西批給中央政治局，不然他不好辦。現在首長夾在當中了，如何是好呢？……不管怎樣，你把江青的信和那兩個附件都給首長講講，看看他說怎麼辦吧，我是拿不出好主意了。

林彪幾次被江青氣得臉色紫青，身上發抖，大罵江青算什麼東西！甚至想找槍，斃了她。林彪當著秘書的面說，我聽見女人的聲音就討厭！要葉群把江青趕走，並要到毛澤東那裏辭職，被葉群拉住。所以林彪一聽是江青的材料，不願

意細聽，還有什麼嗎？葉群看過嗎？葉群說該怎麼辦？主任說請首長拿主意。林彪站起來，在室內踱步，沉吟了一會兒，壓下，不必理睬！不理睬怎麼行呢？葉群走進來，大聲對林彪說：這個人，你能得罪得起嗎？再說，這也不是她一個人的事。文革小組中，除了老夫子以外，都在支持她。聽說她那封長信，是那個小的（姚）起草的，已經改過八遍。人家當成命根子，你把手一揮給壓下了，他們能不恨死你嗎？你說怎麼辦？依我看，你還得批幾個字，這個"球"，總理不願接也不行，還是得踢給他。明知要在主席那裏碰釘子，那就讓他去"碰"好了。林彪說，我批什麼呢？葉群說：還是照上次的辦法，不明確表態，上次你批的是請政治局討論後呈主席批示。你這次可在前邊多寫一個"再"字，再請政治局討論，並呈主席批示。林彪說：好好，就照你說的辦。[27]

不僅毛家灣，軍委辦事組也和釣魚台關係緊張。早在1967年1月19日，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開會，商討軍隊開展"四大"的問題，幾位老帥與江青等發生衝突，葉帥、聶帥退出會場，以示抗議 [28]。吳法憲回憶：第二天繼續開會，得知毛主席不同意揪鬥蕭華的態度後，老帥們紛紛向中央文革開炮。那時還在廣州軍區任司令員的黃永勝說：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29]

官偉勳（空軍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到林辦給葉群講課）回憶：有一次偶然聽見葉群給周總理打電話，總理呀，他們幾個老總也實在可憐。永勝、法憲，他們都是老粗，哪懂什麼京劇團的服裝、佈景？一開會就開到半夜，開到天亮。永勝寫了個紙條給我，問我政治局能不能像討論京劇團穿不穿軍裝這樣，也花這麼多時間去研究我們的軍隊工作。我當時就劃了根火柴，把這個紙條燒掉了。……[30]

中央文革和軍委辦事組的矛盾越來越大。距離"九大"還有兩年多，江青和黃永勝就撕破了臉，甚至到了1980年審判"兩案"時仍然仇恨不減。在法庭上，黃永勝和江青都是"領頭羊"，左右挨著，他們互相瞪圓了眼睛。吳法憲回憶："楊余傅事件"後，黃永勝接任總參謀長，兼軍委辦事組組長。軍委辦事組關於軍隊調動的請示報告，要列上毛、林、周及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等，傳閱週期長，容易誤事。請示毛主席後，有關軍隊調動的事情就不再報送中央文革了。江青大爲不滿，認爲黃永勝在搞"獨立王國"，目無中央，對她封鎖消息。1968年5月，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江青宣稱"老娘就是中央"，停止黃永勝、吳法憲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清理思想。[31]

邱會作回憶：雙方的關係越來越緊張。江青在會上指著黃永勝的鼻子，大罵軍委辦事組妄想搞"軍黨論"。如果軍隊要黨的領導，就請黃總長向主席、林副主席建議，讓我擔任軍委副主席。軍隊的事情由我向主席報告，肯定能得到主席的支持。黃永勝說，誰想當，誰向主席建議！江青大怒，繼而大哭，黃永勝拂袖而去。林彪對黃吳李邱說，還是那句話，對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他們搞什麼就讓他們搞吧，但軍隊不能亂，軍隊穩定了，地方亂一點，

天塌不下來，軍隊亂了，就不得了了。軍隊絕對不能讓他們（江青一夥）進來搗蛋。[32]

江青身體不好，聲明一個月內不看文件。結果黃永勝先在一份文件上畫了圈，江青氣壞了，他有什麼資格越過我先批？這不是奪我的"權"嗎？黃永勝有政治野心，大帽子就扣上去了。1968 年黃永勝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江青堅決不同意。周恩來向毛澤東彙報，黃吳李邱也分別向毛、林彙報，告江青想抓軍權的狀。毛澤東批評了江青，說不要理她，讓黃永勝照樣當團長，率團出訪。[33] 爲了緩和，周恩來帶黃永勝、吳法憲、葉群到釣魚台拜訪江青。等了好一會兒，江青才從樓上姍姍下來，站在樓梯上就指責，你們戴著紅五星，兩面紅旗，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紅五星是老娘我給你們爭來的！在場的康生、姚文元也狐假虎威。來前周恩來已經給黃、吳打過"預防針"，不管江青說什麼，都不能當面頂撞，要講團結。所以，黃、吳一聲不吭。等江青的火發完，周恩來故意問黃永勝，什麼時候動身啊？並宣佈從明天起恢復黃、吳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毛澤東要周恩來主持開會，讓江青爲此事檢討。會前周恩來又給黃、吳等人打了"預防針"，無論江青講好講壞，你們都不要講話。江青檢討時，周恩來兩隻眼睛緊緊盯住黃、吳，防止他們"走了火"。[34]

毛澤東和斯諾談"四個偉大"討嫌

"九大"後，林、江的矛盾開始激化，毛、林的關係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那時毛澤東認爲，在個人崇拜上應該降溫了。他說，"萬歲"翻譯成英語是"長壽"的意思，對年輕人可以喊，對年紀大的人就不要喊了。把我的像到處掛，我已說過多少次了，不要這樣做了。[35] 毛澤東讓周恩來把人民大會堂掛的語錄牌統統摘下來，當著林彪的面，毛澤東說，這些王八蛋的東西沒有了。[36] 明顯表現出對林彪的不滿。

1966 年 7 月 25 日，毛澤東在新華社通訊稿上批示：此件看過，可用。在第五頁上將"最高指示"改爲"指導方向"。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37] 陶鑄召集首都主要報刊負責人討論後，7 月 29 日向毛澤東報告：使用"最高最活等語言，是完全合乎實際的，是全國全世界革命人民心坎裏的要求"，"不宜突然全部停止使用"。毛澤東同意了這個報告。[38]

1967 年 12 月 29 日，毛澤東對兩報一刊[39] 元旦稿《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的批語：姚文元同志，看了一遍，覺得可用。去掉了幾個浮誇的形容詞，請你們酌定，刪去"衷心祝願我們的偉大導師、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一句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和後一個"萬壽無疆"。[40]

1968 年 1 月 6 日，毛澤東刪去成立江西省革委會的新聞稿和社論稿中"句句是眞理，一句頂一萬句。水平最高，威力最大"等句子。[41]

5 月 21 日，毛澤東對《堅決支持法國工人和學生革命

鬥爭的聲明》稿批道：最後一句口號可以去掉，中間有幾句自吹的話也去掉。刪去"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還刪去"是以毛澤東思想爲偉大旗幟的世界革命的新時代。毛澤東思想在全世界的廣泛傳播，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給予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鬥爭以極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力量"幾句。[42] 12 月，毛澤東在中央軍委關於同意核試驗中使用飛機給國防科委並空軍的覆電稿上批註：請注意以後不要寫這類語句"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並刪去。[43]

1970 年 4 月 3 日，毛澤東審閱兩報一刊《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一文時批語：關於我的話，刪掉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寫這類話，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有人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毛澤東刪掉的幾乎全是林彪吹捧他的話。刪掉"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毛澤東同志……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同志就是當代的列寧"等吹捧的句子。周恩來批示：將毛澤東的批件先在政治局範圍內傳閱，正在蘇州的林彪沒有表態。[44]

"不要寫這類話，都講了一百次了，可是沒有人聽，不知是何道理"？從這些話中，可以明顯看出毛澤東的反感。張春橋都感覺出來了，林彪能感覺不出來嗎？

1970 年 9 月，美國記者斯諾和夫人應邀來到北京，周恩來安排斯諾夫婦參觀、訪問老朋友。國慶日毛澤東在天安

門城樓與斯諾夫婦合影。[45] 斯諾是第一個向外報導毛澤東的外國記者，在延安就與毛澤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文化大革命"中，外國人在中國幾乎絕跡，而他居然能來到中國，居然還能讓毛澤東接受採訪，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但毛澤東不急著見他，讓林彪先見。

林彪就是不見。家人問他爲什麼，林彪說斯諾是熟人，在延安見過。知道這些外國記者，問這問那，有些問題也不好回答。跟外國人說話要特別注意，不管你說什麼，他們都會給你登報發表。[46] 剛從廬山上"逃"下來的林彪很爲難，就一推再推。[47]

周恩來只能出面與斯諾談話，談及中國的針灸麻醉、核子試驗等。還提到"文化大革命把我打敗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爲睡得少，我健康減弱了，近四年心臟有毛病，年紀已近 73 了。"[48]

而林彪還是不見斯諾，毛澤東很生氣，只得他先見斯諾。[49]

12 月 18 日，毛澤東會見斯諾，回答他提出的有關"文化大革命"、中美關係等問題。[50]

從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記錄看，毛澤東似乎氣還沒消，話說得非常狠，矛頭直指林彪。斯諾問，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的口號最響、揮動旗子最起勁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說的）在打著紅旗反紅旗？毛澤東點點頭，說這些人分三種，第一種人是眞的，第二種人是隨大流，"你們大家要叫萬歲嘛"，第三種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毛澤東對斯諾說，所謂"四個偉大"——對毛本人的稱號——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導師"這個詞，就是教員。[51]斯諾說：毛澤東歷來是當教員的，甚至在他成爲共產主義者之前，他就是長沙的一個小學教員。[52]

于運深回憶：1970 年 12 月 18 日斯諾與毛澤東談話的文件，我認爲很重要，在"講"文件時作爲重點。我把討嫌"四個偉大"劃出來了，摘要講給林彪，林彪非常注意聽，還特別把二三十頁的文件留下，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可見林彪非常重視。[53]

註釋：

[1] [4] 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版，210-211 頁

[2] 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1545 頁

[3] [6] [8] [11] [16] [25] 引自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載《中共黨史研究》第 2 期 2003 年 3 月

[5]六廠二校是毛澤東在鬥批改中親自抓的"點"，派八三四一部隊和首都工人毛澤東宣傳隊進駐。1969 年 12 月 21 日《人民日報》報導：六廠二校鬥、批、改的先進經驗，在首都開花結果。六廠：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新華印刷廠、北京化工三廠、北京北郊木材廠、北京二七車輛工廠、北京南口機車車輛機械廠，二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7] [9] 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1545-1547 頁

[10]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右派首領、修正主義主要代表人物。1895 年，恩格斯逝世後，伯恩斯坦公開篡改馬克思主義。

[12] [15] [18] [19] 採訪陳伯達兒子陳曉農筆記，2006 年 4 月

[13] 採訪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筆記

[14] 參見八屆二次會議記錄

[17] 引自陳曉農編著《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998 年第一版，114 頁

[20] [23] [24] [26] [33] 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一版，212-215、225、201-209 頁

[21] [27] 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 2003 年 7 月第一版，462、577-582 頁

[22] [47] [49] [53] 採訪林辦秘書于運深筆記，2005 年 10 月 25 日

[28] 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115 頁

[29] [32] [34] 採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 年 11 月 16 日

[30] 官偉勳著《我所知道的葉群》，中國文學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版，108 頁

[31] [36] 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版，265、275 頁

[35]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161 頁

[37] [40] [41] [42] [43] 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2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85、460、462、498-499、609 頁

[38] 參見《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版，126 頁

[39] 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

[44] 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3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版，90 頁

[45] [48] [50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397、402、421 頁

[46] 參見李文普《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 年第 2 期

[51] 參見《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經毛澤東審閱)，1970 年 12 月 18 日，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498 頁

[52] 參見蘭州軍區政治部印《時事學習參考材料〈斯諾訪華的七篇文章〉》，1971 年 7 月版，16 頁



林彪（左）和陶鑄，很快陶鑄就被打倒了。

林彪家人提供，攝於文化大革命初



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廬山上。

邱路光提供



2000年月11月16日，邱會作夫婦和我。

舒雲提供，攝於北京豐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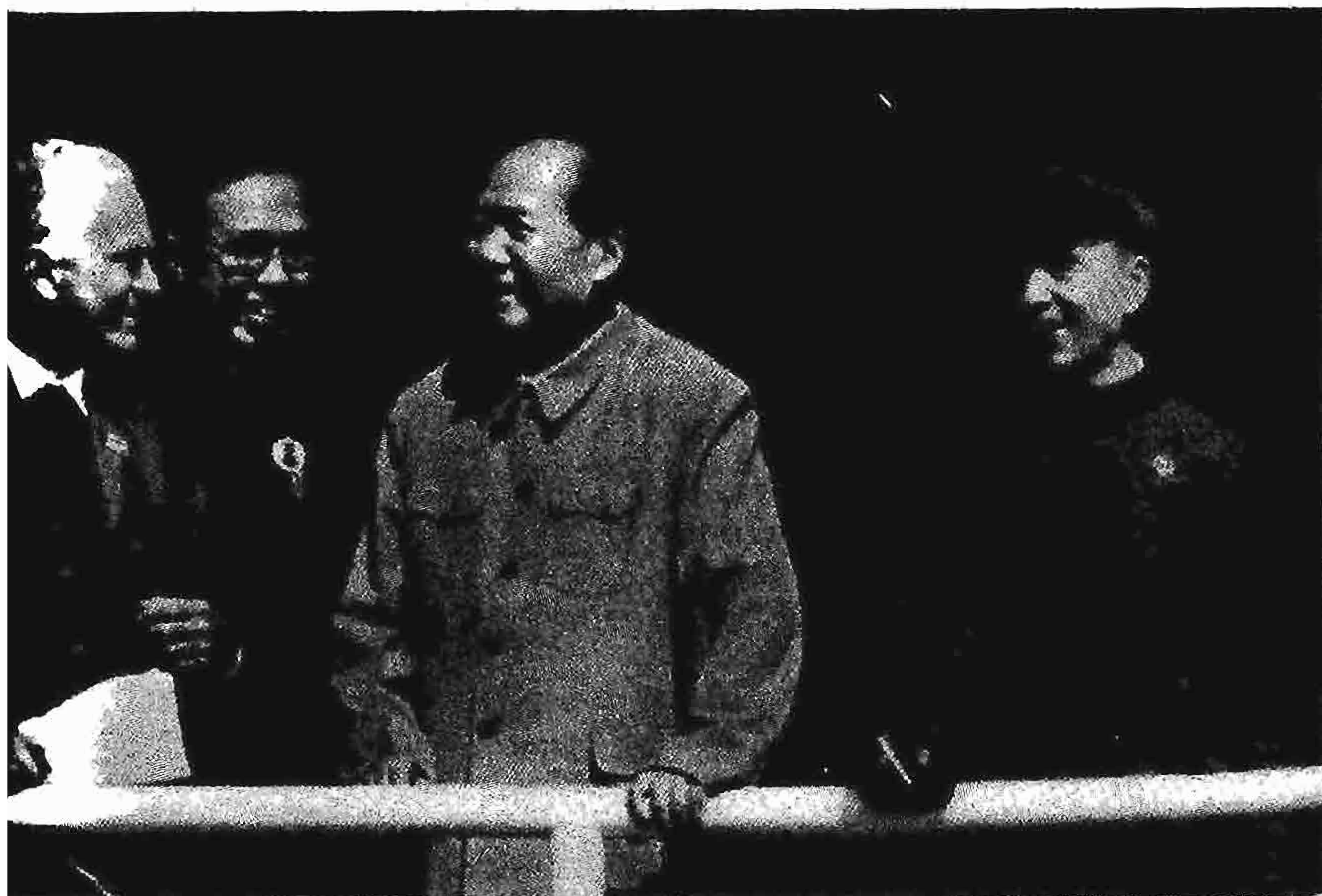






我和林豆豆正在看四野的照片。

孟昭瑞攝影，攝於1999年，北京



毛澤東和美國朋友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交談，林彪在右。

林彪家人提供

林彪事件完整調查



林彪一家50年代的照片，從未發表過。林彪家人保存的林彪、葉群的照片在九一三後被全部收繳，這一張僥倖漏網。



林彪和葉群的生活照，這張照片也是漏網之“魚”。

林彪家人提供，攝於60年代



第五章
表面上波瀾不驚

在廬山會議休會的幾天裏

8月25日，毛澤東召見了葉劍英，又召見了一些人，吹了一點“風”。

8月26日，毛澤東宣佈休會。各大組都接到了中央辦公廳關於26、27日暫停會議的通知。宣佈分頭看文件，修改《憲法》，還安排了白天遊廬山、晚上看電影和看戲。放映《日本海大海戰》、《山本五十六》、《啊海軍》等電影。[1]周恩來、康生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批評了他們，要吳法憲檢討。

李德生回憶：8月26日晚，在毛主席住地一間不大的會議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陳伯達、吳法憲檢討，周總理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而林彪還爲陳伯達辯護。

會議雖然只是“批陳”，但可以看出毛主席對林彪明顯不滿，說我是一方面軍的，可是我身邊沒有一方面軍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邊沒有湖南人。還批評了“一句頂一萬句”，“四個偉大”。當時我就想，這不是指林彪重用黃吳李邱，搞自己的山頭嗎？8 月 28 日上午，全會以大組爲單位，聽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錄音，放了兩遍，大家完全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和鬥爭的性質。8 月 29 日上午，周總理通知我和李先念第二天下山，回北京擔任中央值班。

上廬山前，毛澤東指名紀登奎（國務院副總理）和黃永勝在北京值班，主持國務院和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其他人全部上山，過幾天由李先念和吳法憲換他們。因爲吳法憲在廬山上出了事，毛澤東決定李先念、李德生下山，換紀登奎、黃永勝上山。[2]

先讓黃永勝留在山下，又讓吳法憲換黃永勝上山，這體現了毛澤東的什麼考慮？是分而治之嗎？

毛澤東懷疑幾個“槍桿子”事先有預謀。他在杭州問陳勵耘：在廬山會議上你們有什麼錯？聽說吳法憲找你們談了。說不是有八個人嘛，其中有你一個，還有上海的王什麼，還有福建的那個叫什麼，是不是就是這幾個人，你們空軍有八個中央委員嘛。陳勵耘否認，上山前不知道。毛澤東說：軍隊要謹慎，首先不要搞山頭主義。[3]

8 月 31 日 13 點 40 分，黃永勝剛上山，就被叫到毛澤東的住處。

邱會作回憶：毛澤東說，張春橋手無寸鐵，你們搞他幹什麼？黃永勝說，張春橋不得人心。後來毛澤東在會上說，他們（指張江姚）是手無寸鐵的喲，你們有飛機大炮，有原子彈，你們能不能再讓我看張春橋三年，不要急於下結論。黃永勝說，群衆意見很大。毛澤東說什麼群衆，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委屈的人嘛，還有你們幾員大將。黃吳李邱低頭不語。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是我搞起來的，“九大”路線是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你們爲什麼不團結起來批判劉少奇？[4]

葉群向黃永勝介紹這幾天的情況。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也先後來了，幾個人談了近四個小時。葉群強調山上山下沒有聯繫，發言中不要涉及林彪、黃永勝和她，也不要互相涉及。最後葉群說，這場鬥爭有得有失，大家不要著急。

黃永勝上山後已經停止發言，他的書面發言也早早燒掉了，卻一樣要檢討，說他們在思想上是一致的。[5]

8 月 30 日，周恩來連續數次去毛澤東、林彪、康生處談話。[6]

8 月 31 日，周恩來先後與黃、林、康、江、張、姚等談話。深夜到次日淩晨，到毛澤東處取來《我的一點意見》，給張春橋看，並同張春橋談話。

9 月 1 日，周恩來、康生去林彪處，將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稿交給林彪看，林彪表示同意。周恩來馬上到毛澤東處對文稿，作個別文字修改，然後決定付印，並將印件送給陳伯達看。[7]

9 月 1 日晚政治局進行討論，江青、康生、張春橋、姚

文元眉飛色舞走進會場。姚文元說：毛澤東思想是無價之寶，可以戰勝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戰勝權威人士（暗指林彪），我們要學習毛主席這一重要指示。張春橋說：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是偉大的馬列主義的又一光輝文獻。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打倒了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司令部。同樣，毛主席發表的《我的一點意見》也一定戰無不勝。我們要以批判"天才論"爲中心，學習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建議姚文元連夜寫個大綱出來。吳、李、邱除了表示擁護，没有多說。姚文元說：不表態本身也是一種表態！頓時，吳、李、邱的火竄上來了，邱會作說：表了態，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態度。周恩來怕雙方吵起來，連忙岔開話題。會後，張春橋在住處召集華東地區的造反派開慶功會，江青、康生、姚文元、王洪文等參加。

姚文元在東北組發言，批天才論，批了五個小時，其他組造反派出身的中央委員也跑到東北組去聽。張春橋活躍極了，到各個組去發言，華北組有人請他批判天才論，張春橋說：只有兩個人有資格講天才論，一個是唯心主義大師馮友蘭，一個是黨内理論家陳伯達。

江、康、張、姚在各組會上揪住吳、李、邱的"尾巴"不放，讓其交代後台。周恩來立即找吳、李、邱談話，說主席的話，分量相當重，但主席是講陳伯達，和你們有區別，你們不要過慮，不過講話要慎重，别人豎著耳朵聽你們講話，搞不好要影響林副主席。[8]

陳伯達被揪出來以後

廬山會議的形勢越來越嚴峻。1970 年 10 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陳伯達是個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揭發過，又同個别同志打過招呼。還說：凡是在這次廬山會議上犯了錯誤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評。[9]

9 月 1 日，毛澤東在有各組召集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凡是在這次廬山會議上發言犯了錯誤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評、檢查。會上毛澤東點了陳伯達的名，要他作檢查，還要林彪召集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開會，聽取他們檢查。[10]

全會集中批陳伯達，炮火猛烈，連著開了四五次會。

陳伯達檢討了 24 日在華北組會上作了煽動性的發言，不聽毛主席的話，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歪曲了林彪講話，引起大家思想混亂，以及講天才問題等。毛澤東閱後，建議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討論一下。周恩來批示同意，將修改稿送康生閱後，退陳伯達，並告中辦負責人待陳伯達閱後，以嚴格保密的方式印六份交我。[11]

8 月 29 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陳伯達、吳法憲等人的檢討。會上，周恩來與康生傳達毛澤東幾天來的一系列講話，著重講了團結問題 [12]。吳法憲回憶：周恩來曾三次給主持會議的林彪寫條子，希望他在講話中表揚張春橋、姚文元幾句，以利團結。但林彪根本不理，令他碰了一鼻子灰[13]。周恩來在會上說：從全會一開始的分組討論

中，陳伯達、吳法憲等作了有代表性的錯誤發言，把修改《憲法》的討論引導到了一個錯誤的方向去，以華北組最爲突出。8 月 25 日主席召集常委擴大會議之後，才扭轉了這一錯誤偏向。直到今天開會前，一直到停止了分組會，我們這幾天的工作就是要說服一個個犯錯誤的同志作初步的檢討。在聯繫歷史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進行自我解剖、批判後，強調毛主席對犯錯誤同志的態度是一貫的，這就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要給犯錯誤的同志認識、改正錯誤的時間，對他們還要看，不能急。全會還有兩項議程，不能耽擱久了。因此，大家要下決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這次會議開好。[14]

9 月 1 日晚，林彪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並批判了陳伯達。陳伯達的檢討基本是康生授意，周恩來和康生修改的。陳伯達檢討時，周恩來想爲陳伯達“翻譯”，張春橋主動說我來。陳伯達發完言，張春橋就開始批判。吳法憲檢討後，張春橋說：以吳法憲爲戒，努力學習，努力工作。

“文革”中，身處高位的陳伯達處處不勝“寒”。毛澤東對陳伯達很不滿意，經常批評他拿不住事，就怕得罪人。江青更是放肆地說：你說你是小小老百姓，不是謙虛，是推卸責任[15]。以前劉少奇閒談說他缺秘書，陳伯達隨口說我可以當。江青經常“拎”出這件事，說陳伯達不願意給毛主席當秘書了。

陳伯達夾在各種政治力量之間，有苦說不出，他曾動過自殺的念頭。[16]

9 月 5 日，毛澤東找陳伯達談話，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

陳伯達回憶：見面握手後，毛主席責備這幾年官做大了，不來了，也不寫文章了。其實我一直想見他，卻總也見不到，這個時候也不能解釋。他批評我參加“軍事俱樂部”。我本想遏制張春橋、江青，怎麼就是參加“軍事俱樂部”了呢？我說我願意檢討。毛主席說很好，還問了我幾個人的情況。我感覺毛主席在考慮人事安排。最後毛主席說，你可以找那幾個和你共過事的人談談。[17]

陳伯達回憶：因爲毛主席問我，他女兒李訥在哪裏，我只能去問江青。如果不是因爲毛主席，誰理她呀！到廬山後，這是第一次到她那裏，江青“劈劈啪啪”罵起來，你們名義上擁護林副主席，實際上是要推翻林副主席……張春橋、姚文元也罵我。……周總理、康生幫助我做檢討。康生提的意見特別多，我都記錄下來。在我做檢討的會上，我非常感謝周總理替我念康生授意的稿子。會後我高興地向總理表示感謝，總理要我感謝康生。康生很冷淡地說，不要怕醜。

我覺得事情完了，回家務農吧。遊了廬山，這是到廬山後最高興的一天。但有人說，陳伯達並不沉痛，還遊山玩水。於是又開會。這時我只能看簡報。後來聽說，有人批我在大的問題上沒有同毛主席配合。恩來同志解釋，不是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沒有配合，在反對蔣介石的時候就配合了。我感到他對事對人的公正。[18]

有人發愁，有人高興

9月2日以後，各組結合學習"意見"，開始集中批判陳伯達。林彪表示，我不同意毛主席對張春橋的庇護，也不干擾。

毛澤東叫林彪組織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開會。[19] 毛澤東讓汪東興參加這個會兩個目的，一是瞭解一些情況，因爲他們這些人是不會把情況全部如實彙報的；二是汪東興在華北組也發了言，按毛澤東指示在華北組檢討後就請了假，也要接受批評教育。

林彪在住處召集陳伯達等六人開了三次會。林彪說：今天給你們開個會，主席要我同你們各位談談，做點思想工作，每次會議的情況請汪東興向主席報告，我就不另寫書面報告了。你們在會上爲什麼要在同一個時間發言？爲什麼都引用了同樣的語錄？你們要坦白，要交代。林彪講完，誰也不說話，有汪東興這個大"間諜"在場，誰敢多講？各自拿著《我的一點意見》在看。靜了一段時間，林彪又說：嗯，爲什麼沒有人發言？汪東興向毛澤東彙報：這時我發言了，我認爲華北組的討論就是陳伯達放炮後搞亂的。其他一些人也七嘴八舌講了幾句，會議很快就散了。

邱會作回憶：汪東興在這個會上根本沒有發言。[20]

汪東興回憶：毛主席哈哈大笑，問我會還開不開？我說林彪打了個招呼，說再開會就通知，不通知就不開了。9月3日，林彪又開了一次會，沒有通知我參加，直到九屆二中全會散會，也沒有通知我參加他們的會議。

毛澤東說，不要你了，說明你不是那個圈子裏的人。[21]

邱會作回憶：其實，9月3日，汪東興躲了，吳法憲打了幾個電話，根本找不到他。[22]

不管怎麼說，在毛澤東的保護下，汪東興順利過關。

這幾天江青的情緒特別好，頭也不痛了，讓護士替她在山上撲蝴蝶。江青舉著她的戰利品對工作人員說：這叫玉帶鳳蝶，翅膀下邊有兩條玉帶……這叫黑蝴蝶，翅膀紅白相間，昆蟲辭典上說比較稀少……說著江青想起了什麼，突然"煞車"，你們別以爲這場鬥爭結束了，還早著呢，那幾條"槍桿子"可厲害著哪！[23]

張玉鳳回憶：廬山上毛澤東與林彪談過幾次話，9月4日談得最長，談怎樣打倒陳伯達[24]。關於與毛澤東的談話，林彪只露過一句，毛主席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25]！林彪聽不懂，葉群也聽不懂，讓李春生打電話叫張雲生查。楊尚奎（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查出這句古語的意思和出處，意思是紂王雖然不好，但並不如人們說的那麼壞。紂王指誰？大概毛澤東怕林彪聽不懂，乾脆對林彪說：下山開一次生活會，問題不帶下山。

毛澤東在北京也曾親口對黃吳李邱說：你們的檢討到我這裏就爲止了。[26]

是這樣嗎？

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中有一句話值得注意：我們兩人還認爲，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

續研究，並不認爲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

林立果說：這個事情壞在幾個老總身上，也怪“葉老胖”，根本沒有理解首長的意圖。本來首長只是說拉一下就行了，這次打是打不倒的，結果搞得很被動。丘八鬥不過秀才，看來這個鬥爭還長。[27]

楊銀祿回憶：8 月 27 日下午，葉群和江青談了半個小時左右。 [28] 自從江青從毛主席那裏回來以後，可以說是“春風得意”，也可以說是“幸災樂禍”。覺也睡得好了，飯也吃得香了，頭也不暈了，也不出虛汗了，也很少發脾氣了，好像換了一個人。8 月 27 日下午，江青起床以後，在辦公室看了 10 分鐘的文件，叫我來，請我坐。我想她怎麼客氣起來了，從她嘴裏說一個“請”字可眞的不容易。江青說她這幾天心情不好，有許多爲難的事情，又不好對你們講。就拿葉群同志來說吧，她犯了錯誤，三番五次叫我向主席說情。她是副主席、副統帥的老婆，不去爲她說情吧，怕林副主席不高興；去吧，又怕主席懷疑我和她之間有什麼關係，將來說不清、洗不淨。這件事，實在使我爲難，想來想去，我還是硬著頭皮見見她，聽聽她說些什麼。江青嘴上這麼說，但我看出她心裏還是很高興的。江青站起來，說不定今天下午葉群就會來找我，她如果來了，你報告我，我再考慮考慮見還是不見。我從江青辦公室出來後，也就 10 分鐘，葉群就急匆匆地來了，說我請求江青同志見見我，你們秘書知道不少情況，不怕你見笑，我是請求江青同志批評幫助的。謝謝

你，楊秘書。江青聽後沉默了足足五分鐘，才說葉群這個人哪，嗨，不說了。又等了一會兒，江青站起來，說顧不得那麼多了，决定見，你請她進來。看來江青是想讓葉群坐坐冷板凳，也是想讓我看，不是她主動找葉群的。大約半個小時後，江青和葉群手挽手高興地走出來，葉群對江青說，江青同志今天見了我，使我很受感動，您對我的幫助，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江青說，請你回去代我問候林副主席。葉群說，一定一定，謝謝江青同志，也請江青同志保重身體，您的身體健康，是我們的福氣。葉群走後，江青眉飛色舞地對我說，葉群這樣精明的人，多年在林副主席身邊工作和受林副主席的薰陶，竟然也上了陳伯達的當！我看不僅僅是上當受騙吧？哈哈哈，她也會有犯錯誤的時候。[29]

送走葉群，江青立即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教訓她：在關鍵時刻頭腦要清醒，屁股別坐錯了位置。

邱會作回憶：9 月 5 日晚上，葉群提出林彪應該去看望江青。林彪給了葉群一耳光。葉群哭著說：101，我非常對不起你和幾個老總。我們都上了汪東興的當。主席和江青的關係不是不好，而是很好，這次就是很好的證明。他寧願不給你面子，也要給江青面子。因此，這次一定要去，去是給主席看的，說明你的誠心。林彪終於被說服，說了一句：主席是好心當成驢肝肺。[30]

9 月 6 日 20 點，江青打電話給“林辦”，問林副主席累不累，我想去看他。林彪回答，江青同志就不要來了，葉群馬上去看你。[31]

楊銀祿回憶：9 月 6 日晚上，葉群打來電話，楊秘書，請你報告江青同志，林彪同志問候江青同志，請江青同志保重身體，他叫我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同志去看望江青同志，我們等你的電話。我報告江青後，江青略加思索後，高興地說，既然是林副主席派他們來，請他們現在就來，我快去回電話。我要走，江青又說，小楊，你是知道這次會議情況的，你也知道他們在會上犯了錯誤，受了批評，中央責令他們作了檢查。他們來了以後，你不要走，聽聽他們講些什麼，我講了些什麼，以後你可以給我作證。否則，以後我一個人說不清楚，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當然，我也不怕，怕的話，我還不見呢。晚上 8 點左右，葉群帶著"四大將"來了。[32] 看來，江青對付黃吳李邱是另一副嘴臉，但江青還是不明白廬山的迷霧迷在哪裏。

邱會作回憶：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叫黃吳李邱也去看望江青。吳法憲說：他們可能不願意去。葉群說：首長都去了，去做做樣子嘛。葉群帶上黃吳李邱到江青住處。足足等了半個小時，江青才穿著一件睡衣從樓上下來。從江青別墅一出來，窩著一肚子火的黃吳李邱一起大罵：戲子！戲子！真他媽窩囊！[33]

楊銀祿回憶：江青見葉群他們來了，熱情地握手，讓座，好似久別的戰友重逢一樣高興。江青說，林副主席身體不太好，本來我要去看望林副主席的，可是林副主席說你們要來，我就沒有去。恭敬不如從命，謝謝林副主席，也謝謝你們來看我。葉群說，林彪同志如果知道江青同志要去看他的

話，他會很高興的。當然，是我們應該來看您，一來是向江青同志話別，再有一兩天咱們就要下山了；二來是聽取並接受江青同志的批評幫助的。這次我們在會上上了陳伯達的當，犯了錯誤，林彪同志多次批評我們，說我們頭腦簡單、發熱，起了不好的作用，辜負了主席的長期教導，也對不起江青同志，一定要我們向江青同志好好學習，向江青同志道歉，也請江青同志原諒。江青笑著說，葉群同志，你這話就言過其實了，見外了。你們這次犯錯誤，我心裏也難過，也覺得不是個滋味。我們是一條戰壕裏並肩作戰的戰友。這件事是陳夫子搞的，本來陳夫子同小張、小姚有矛盾，他們是文人相輕，利用了我們。我們沒有及時識破陳伯達的陰謀，上了他的當。我們不能上他的當，接受教訓就是了。我們過去是親密戰友，今後還是親密戰友。葉群說，林彪同志講，江青同志總是在關鍵的時候幫助我們，指出努力的方向，總是給我說好話、做工作，所以要我約他們四位同志一起來向江青同志表示感謝。江青同志虛懷若谷、海納百川，您不但沒有責怪我們，而是熱情地鼓勵我們改正錯誤，繼續努力爲黨工作。葉群轉過臉對"四位大將"說，你們要牢牢記住今天晚上江青同志對咱們的諄諄教導。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是。[34]

邱會作回憶：葉群則連連說上了陳伯達的當，並向江青和張春橋道歉。葉群說，這次全會，我們上了陳伯達的當，犯了嚴重錯誤，辜負了主席的教導，請江青同志嚴肅批評。吳法憲連連說，我們對不起江青同志，對不起春橋同志，向

你們道歉。江青像女皇一樣邊走邊說，這次你們不聽我的話，犯了錯誤。我向來是反對陳伯達的，你們又不是不知道。現在舒服了吧，今後聽我的話就是了。咱們畢竟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當年打倒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咱們並肩戰鬥過，對你們的錯誤我不計較，小張也不會計較。主席和我對你們的態度還是和過去一樣的。[35]

江青越說越興奮：謝謝林副主席，我們都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小學生，我們要更好地緊跟毛主席、林副主席，聽他們的話，就會少犯錯誤，甚至不犯錯誤。我是不折不扣地按照主席的指示辦事的，所以很少走彎路。江青還對黃吳李邱說：這次你們聽信了陳夫子的話，不聽主席的話，所以犯了錯誤，今後主席不會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你們接受教訓，聽主席的話就是了。黃吳李邱聽了連連點頭。楊銀祿認爲江青說的不是聽“我”的話，而是不聽“主席”的話，因爲江青再狂妄自大，目中無人，也不會驕傲到那個程度。她始終把毛主席作爲惟一的正確者，惟一的支持者，惟一的靠山，她不會自居于毛主席之上。[36]

分析一下江青這位不可一世的女人，很有意思。雖然是中國一號人物的夫人，但江青只敢在有限的時間地點狐假虎威，她深知毛澤東的“厲害”，在關鍵性的問題上，她不敢越“雷池”一步，因爲她始終不明白毛澤東的“戰略部署”。

九屆二中全會快結束了，毛澤東特意對張春橋說，要在廬山請許司令吃一次飯。毛澤東知道許世友和張春橋是“死對頭”，早在“文革”初期，張春橋兼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和上

海警備區第一政委，支持上海警備區的軍內造反派造南京軍區的反，許世友非常生氣。1967 年夏，毛澤東視察華東地區，要張春橋用直升機把躲在大別山的許世友接到上海，促進他們的團結。這一回在廬山，毛澤東親自做工作，先後找許世友、張春橋談話。張春橋說：這次會上揪人，許司令倒没有出面，他也不知道這件事，只是開始時他也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他並不瞭解陳伯達他們的活動，後來主席找他談了話，他馬上把華東組的會停了下來。

張春橋在別墅安排了豐盛的宴席，十個菜，包括廬山名菜“三石”，石雞、石魚和石耳，鄭重邀請許世友。許世友知道這是毛澤東的意思，二話没說赴了宴。只有他們兩個人，許世友喝茅台有名，張春橋也喝得很凶，把張春橋櫃子裏的茅台全喝光了。

全會快結束，各大組分別搞了會餐，華東組的會餐地點設在山坡上的俱樂部裏，許世友特意叫張春橋來，作爲回請。喝到一半，陳勵耘舉著茅台酒過來，說春橋同志，對不起，多多冒犯，請允許我敬你一杯！張春橋略帶微笑，我不在乎，兩人碰杯把酒喝乾了。[37]

九屆二中全會平靜閉幕

9 月 5 日下午，毛澤東與周恩來、康生談如何結束會議等問題。

9 月 4 日晚，在毛澤東處，政治局召開各組組長會議。

商量九屆二中全會的結束問題，周恩來提出，明天閉會太倉促了，後天（6日）結束爲宜。毛澤東提出，關於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稿，不要花多少時間討論了。[38]

9月6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閉幕。

陳長江回憶：廬山會議後半段，是我記憶中掌聲最少的會議，人們對掌聲顯得謹慎多了。只有毛主席講話，周總理（實際上是林彪，作者注）宣佈開會和閉幕時才有掌聲。到閉幕這一天，主席台發生了令我驚訝的變化，中央只放著一個座位，是毛主席的位置。旁邊是主持人周恩來，他宣佈對陳伯達隔離審查。其他三個常委林彪、陳伯達、康生的位子去掉了，他們都坐到了台下。[39]

毛澤東穿著中山裝，神采飛揚。林彪穿著軍裝，除了按毛澤東要求主持會議外，一聲不響。康生和周恩來分別講話。康生從理論上分析了“天才論”，就毛澤東提出的幹部學習馬列的問題，做了較長的補充發言。周恩來進一步部署“批陳整風”的工作，強調黨內團結問題，還提出要學好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接著草草通過《憲法》修改草案，批准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和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的報告。

周恩來、康生發言後，毛澤東講了較長時間的話，講了黨的路線教育、高級幹部學習和黨內外團結等問題，講到高級幹部要讀馬列的幾本書，說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不讀好了，人家就搬出什麼第三版呀，就照著吹呀，那麼，你讀過沒有？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陳伯達）的當。主持會議的林彪最後簡單講了幾句，這個會議整個進程中間都是

主席親自指導的。會議中間出現的問題，主席很敏銳地發現了，順利地解決了。這個會，可能成一個是團結的會，還是個分裂的會？經過主席的這種指導，依然變成了一個團結的會、勝利的會。[40]

會上宣佈對陳伯達的歷史進行審查。毛澤東再次提出對陳伯達還要再看一看，有些問題再研究一下，保留他的中央委員。毛澤東並公開給紅秀才（張春橋）撐腰。

散會後，服務員從地上拾到“打倒張春橋”等人的條子。[41]

9月7日，林彪下山。周恩來去看望林彪，一句話沒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下到九江機場送別林彪，合影留念。林彪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照常吃飯，照常睡覺，照常工作，最多是個彭德懷第二。你們有事多向周總理請示報告。

吳法憲回憶：林彪情緒還和過去一樣，若無其事的樣子。

林彪先去北戴河住了幾天，然後轉回北京。

林彪走後，黃永勝等人也很快離開廬山。

9月8日，各省、大軍區負責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康、張、江等人走了。

9月9日下午，毛澤東下山。下山前毛澤東接見爲全會服務的會務人員。那天下雨，安排在廬山禮堂，後來雨停了，又改在室外。毛澤東走出會場，夾道歡迎的人群擁上來，歡呼萬歲，並要求和毛主席合影。

毛澤東說：孔夫子打牌，和爲貴。意思是最後還是要團

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

最後幾天，周恩來安排張、姚起草、改定九屆二中全會公報稿，並安排印刷。出於安全的考慮，等廬山別墅全都人去樓空，9 月 9 日晚，九屆二中全會公報才公開發表。9 月 10 日，《人民日報》登載，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在會上講了話，到會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根據會議的議程，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全會認爲，在當前國內外大好形勢下，召開四屆人大，是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全會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進行必要的籌備工作，以便在適當時候召開四屆人大。最後一句是在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42]

儘管廬山上“電閃雷鳴”，全會的公報卻“風平浪靜”。

註釋：

[1] 參見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藝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版，79 頁

[2] 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7 年版，401 頁

[3] [21] [24]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151、51-52 頁

[4] [8] [19] [20] [22] [26] [30] [31] [33] [35] [41] 採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 年 11 月 16 日

[5] [27] 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版，246、248 頁

[6] [11] [12] [14] [38]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389-390、392 頁

[7]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391 頁

[9] [15] [16] [17] 採訪陳伯達兒子陳曉農筆記，2006 年 4 月

[10] [40] 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1579-1581 頁

[13] 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版，

299 頁

[18] 參見陳曉農編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998 年第一版 123-124 頁

[23] [37] 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版，224-226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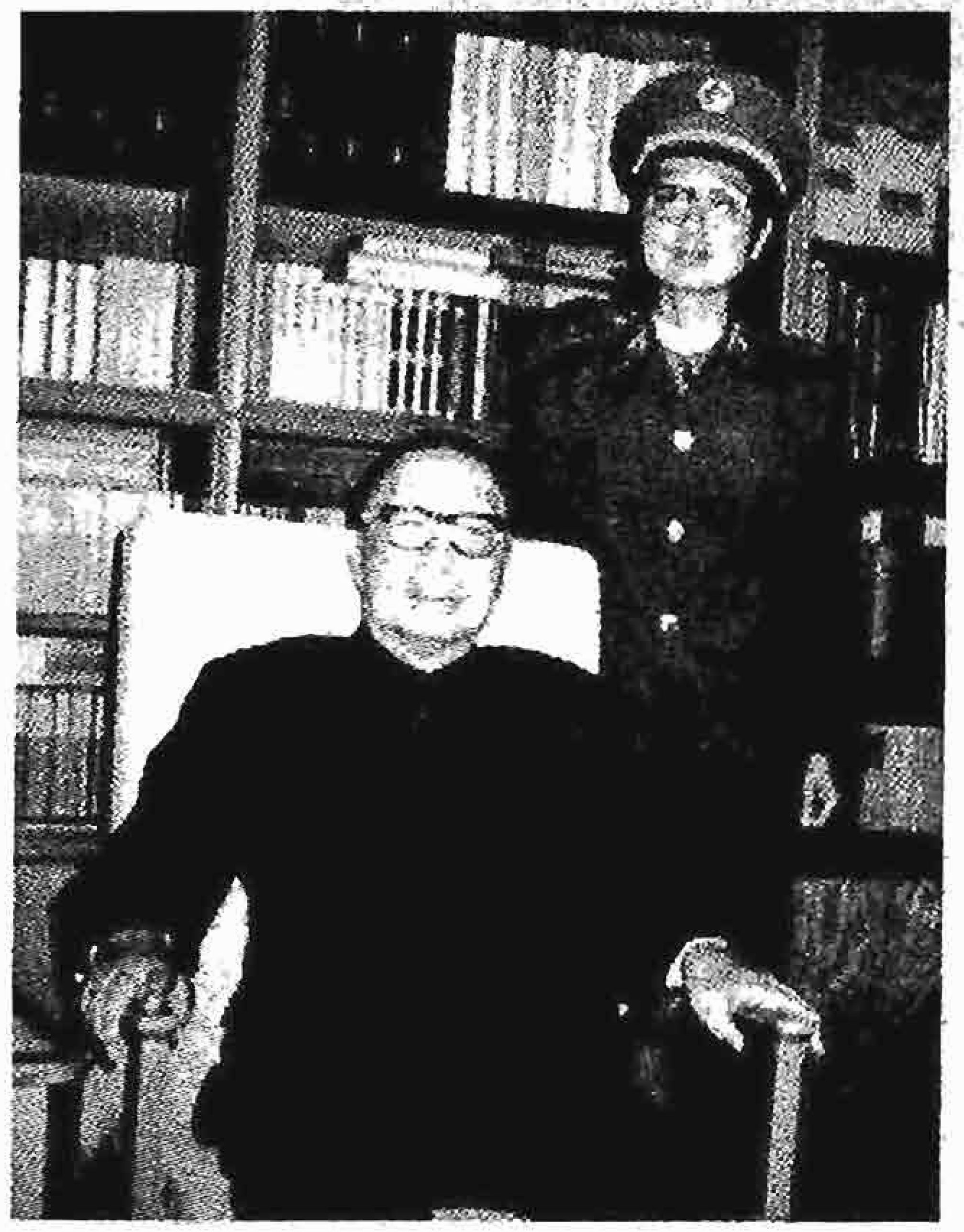
[25] 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版，396 頁

[28] 參見楊銀祿《江青與林彪》，載《百年潮》1999 年第 4 期

[29] [32] [34] [36] 參見楊銀祿《九屆二中全會時的江青》，載《黨史博覽》2006 年第 1 期

[39] 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139 頁

[42] 《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1988 年 10 月，477 頁



1987 年，我調到聶帥傳記組，負責撰寫建國初期和"文革"兩章。

舒雲提供，攝於聶帥家中





曾任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接受我的採訪。

舒雲提供，攝於北京傅崇碧家中



孫毅將軍向我講述"文革"中的事情。

舒雲提供，由孫毅秘書攝影，北京西郊



毛澤東和林彪接見紅衛兵。 *林彪家人提供*



高牆裏曾經是林彪的家。 *舒雲攝影，攝於2006年春北京毛家灣*







以前這是有名的毛家灣。九一三事件後，中央政治局委員們誰也不願意搬到這裏，於是地上面給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輯委員會，地下面給了保存毛澤東遺體研究組。現在這裡成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林彪會見阿爾巴尼亞貴賓巴盧庫。 *林彪家人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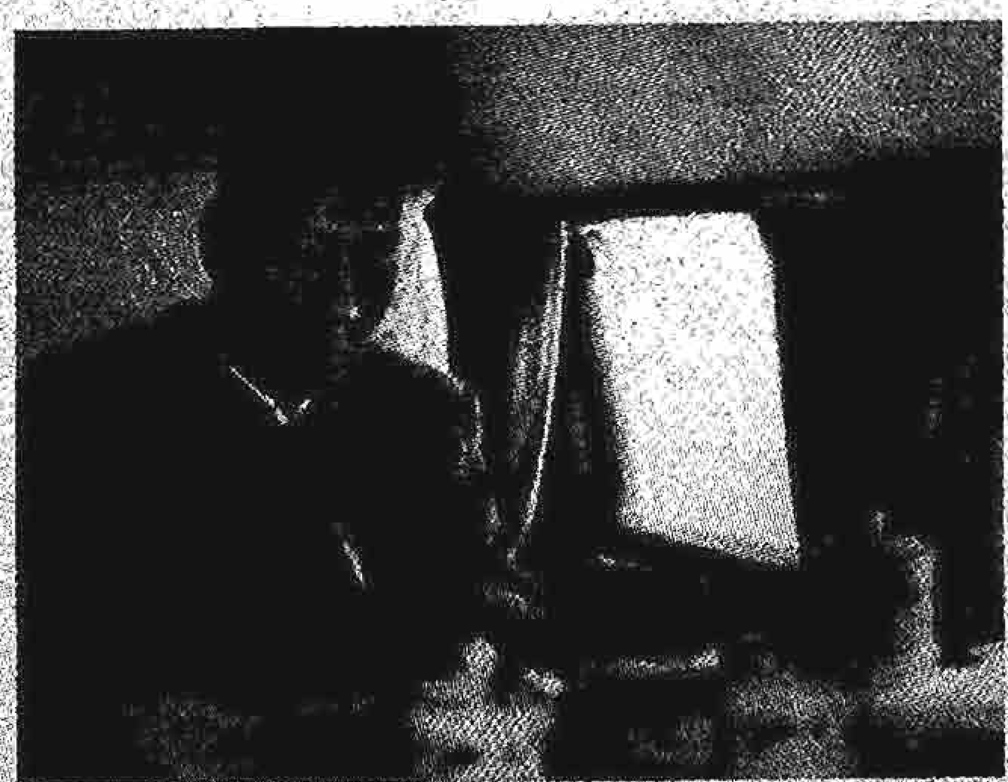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元帥接見外國軍事代表團。林彪非常不願意與外國人打交道，所以這樣的接見外賓的照片非常罕見。

林彪家人提供



1966年8月18日，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

林彪家人提供



1959年11月，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伊爾-14型專機上辦公。

時念堂提供



第六章
國家主席

毛澤東堅決辭去國家主席

陳伯達被軟禁在米糧庫胡同的家中。1970 年冬至 1971 年夏開展的“批陳整風”運動，沒有讓他看過任何文件，也沒有對他進行任何提審。

盧山上毛澤東並沒有提出國家主席的問題，一年後，才在他的南巡講話中成了反黨綱領，自然陳伯達蒙在鼓裏。1983 年初冬，陳伯達對兒子陳曉農說：我感覺毛主席不想再用我，但我想不通毛主席爲什麼要打倒我？我又沒有得罪他。雖然在起草“九大”報告時，我主張抓生產，在其他事情上也提過不同看法，但都是好意。在他那裏工作，我很小心。盧山上說他是天才，那也是好話嘛，緊著說好話也不行。爲什麼非要把我和林彪連在一起？我和林彪沒有多少接觸，對林彪並不瞭解。我是因爲毛主席信任林彪，才相信林彪的。

看來，陳伯達講的倒是眞話。

1984 年 9 月，陳伯達在北京衛戍區住院，他想請中紀委說清楚：我究竟和林彪有什麼關係，把我搞到這樣地步，對黨有什麼好處？簡直莫名其妙！[1]

陳伯達認爲自己的垮台，主要是和江青發生衝突。

可是自己没有功勞，也有大大的苦勞啊。

1953 年下半年，陳伯達負責起草《憲法》草案，以後隨毛澤東到杭州，參加草案的修改。回北京後，他在衆人修改的基礎上統稿。爲了趕在全國人大召開前完稿，拼命加班，導致嚴重失眠。[2]

1954 年 9 月，在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誕生，毛澤東當選爲第一任國家主席，很快他就煩了。國事太繁忙，尤其是遞交國書，還要穿戴整齊，一板一眼地念國書，簡直是繁文縟節！

陳伯達回憶：解放初，我陪毛主席在玉泉山休養，毛主席曾問我是在前台直接主持國事好呢？還是退到後面坐而論道好？[3]

這說明毛澤東當上國家主席不久，就在考慮退位的問題。

毛澤東多次說：我們是“老夫人”了，唱“紅娘”就是總理他們了。[4]

“八大”前，毛澤東決定摘下主席的“帽子”。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雲同志跟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登台演主角，没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麼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爲我現在打“退堂鼓”，想不幹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於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爲他資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台演說，就不行了。……我是準備好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任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幹事呢？照樣幹事，只要能夠幹的都幹。[5]

“八大”毛澤東没有能如願，他再次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黨章》正式設立名譽主席一條。這是毛澤東退居幕後的一個台階，他想先辭去國家主席。

1958 年 1 月，南寧會議後，毛澤東在會上做了結論。會後以這個結論爲基礎，增加一些內容，寫成《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作爲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在第六十條中，毛澤東提出：今年 9 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先在各級幹部中間，然後在工廠和合作社中間，組織一次鳴放辯論，徵求幹部和群衆的意見，取得多數人的同意。這是因爲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做黨中央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於我的身體狀況也較爲適宜。如果在辯論中群衆發生抵觸情緒，不贊成這個建議，可以向他們說明，在將來國家有緊急需要的時候，只要黨有決定，我還是可以出任這種國家職務的。現在和平時期，以去掉一個主席職務較爲有利。

關於這個請求，已經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許多同志的同意，認爲這是一個好主意。所以這些，請向幹部和群衆解釋清楚，免除誤會。[6]

1958 年 7 月 31 日，毛澤東寫信給宦鄉（時任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代辦）：6 月 20 日你給外交部的電報我看了。所傳辭職事是眞正的。我決心辭去國家主席一職，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認爲有利，正向地縣區幹部通知，並展開辯論，以免臨時顯得突然。國內民主黨派已通知並醞釀一年多了。在華外人，如蘇、新使節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魯等亦已談過。請你通過新華社記者在倫敦的新聞記者中相機陸續放出一點空氣。要是非正式的，以閒談方式出之。經過"英共"記者，或更好些。逐步使人們不當作謠言，而當作事實。[7]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任職將滿的毛澤東力排衆議，堅決辭去國家主席。中共中央同意他提出的退居二線多研究重大問題，通過《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8]

12 月 18 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共中央同意毛澤東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決定。文章說，幾年以來，毛澤東同志曾經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繼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務，中央全會在經過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慮以後，決定同意毛澤東同志這個提議，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不再提他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候選人。中央全會認爲，這完全是一個積極的建議。因爲毛澤東同志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專做黨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夠集中精力來處理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路線的問題，也有可能使他騰出較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而並不妨礙他對於國家工作繼續發揮領導作用。這樣，對於全黨和全國人民都更爲有利。毛澤東同志是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在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以後，他仍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在將來，如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再擔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仍然可以根據人民的意見和黨的決定，再提他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各級黨委應當根據這些理由，在黨的適當會議上，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在工礦企業工人的集會上，在人民公社的集會上，在機關、學校、部隊的集會上，向黨內黨外的幹部和群衆進行充分的解釋，以便大家瞭解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誤解。[9]

1959 年 4 月，毛澤東正式向人大二屆一次會議提出，爲了集中精力考慮一些重大問題，請求辭去國家主席職務，劉少奇被選爲第二任國家主席，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劉少奇倒台，毛澤東回到第一線

根據《憲法》第 40 條，國家主席將根據人大和人大常委會決定，公佈法律和法令，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秘書長、任免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委員，……

第 41 條，國家主席對外代表中國，接受外國使節；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准同外國締結條約。

第 42 條，國家主席統帥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林彪的接班人是個空架子，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沒有一點實權，決策權在毛，執行權在周。而劉少奇的國家主席卻是大權獨攬，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實際上是第一把手。毛澤東退居二線沒多久，似乎就後悔了。他原來以爲國家主席無關緊要，但一旦讓權，卻發現國家主席還是有相當大的權力。他明顯感到大權旁落，被架空了。

1964 年，毛澤東一再號召各級領導幹部下去蹲點，沒有誰響應，只當耳旁風。而劉少奇讓中央組織部安排，不下去蹲點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第一把手。馬上聞風而動，僅北京司局級以上的幹部就下去了 1000 多人。

接著蘇聯的赫魯曉夫下台，中國有沒有赫魯曉夫呢？

11 月底，毛澤東在會上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10]

12 月 15 日，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講話時毛澤東插話，才講幾句，就被劉少奇打斷。曾志（陶鑄夫人）回憶：會議結束，江青請我們在人民大會堂的小禮堂看京劇《紅燈記》。開演前，我們在休息室看見毛主席。主席

問陶鑄，你們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然退居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麼！毛澤東命令走的人全回來，繼續開會。[11]

其實，劉少奇並沒有和毛澤東在會上爭論。據在場的鄧力群說：會上只是毛、劉各說各的。

劉少奇雖然是“一線”，毛澤東是“二線”，但劉少奇在毛澤東面前，還不至於、也不敢那麼“猖狂”。只是毛澤東感覺劉少奇騎在他頭上拉屎了。

12 月 28 日，毛澤東來到會場，舉著《黨章》、《憲法》，說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如果算，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准不准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這裏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我有黨員權利。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你們一個（鄧小平）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劉少奇）不讓我發言，違反《憲法》。接著，毛澤東的話就說得狠了：據我看，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12]

1966 年 10 月 25 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上講話，說到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澤東說：要想使國家安全，鑒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來，不那麼好，一進城就不那麼集中了，結果很分散，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再主持日常工作，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

做，想讓他們在群衆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麼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麼好。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的問題，就做了改變。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制度已經改變了，但紅衛兵還不知道已經改變了。我也有責任，爲什麼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裏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引起警覺，還是"23 條"的那個時候。從許多問題看來，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解決，中央的第一線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發出警告說，北京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這是去年 9、10 月間說的。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爲什麼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呢？北京沒人幹這件事，就在上海發起。……[13]

毛澤東認爲中國共產黨內形成了兩個司令部。1970 年 12 月 18 日，美國記者斯諾問：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說：那就早了。1965 年 1 月（剛開過人大三屆一次會議，劉少奇連任國家主席），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 23 條，"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毛澤東決定更換接班人。[14]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開始，6 月，毛澤東同胡志明談話中說：我們都是 70 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15]

很快劉少奇被打倒，毛澤東回到第一線。

1968 年 10 月，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劉少奇被開除出黨，1969 年冤死於河南開封。

國家主席一直空缺。

一個國家設立國家元首，是施政的需要，也是國際慣例。在中國，國家主席主要是用於外交。國際交往講究對等，人家元首來了，你用黨的主席或者總理去接待，顯然不合適，好像瞧不起人家似的。好在"文革"中與外國的交往也不多，偶爾有個國事，就由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代理。

不當國家主席，毛澤東爲什麼要講六遍

1970 年 3 月，毛澤東考慮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16]。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全面展開。新《憲法》的制定表明我們的國家想跳出"文革"的圈子。幾年的革命，把經濟"革"得一塌糊塗，這一次再不能拖了，要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從"文革"轉向經濟建設。

但國家主席怎麼辦？從毛澤東的本意，好不容易把劉少奇打倒了，不能再樹一個"敵人"。但不設又說不過去，設了誰當呢？他是不能再當了，66 歲身心疲憊辭去國家主席，不能 77 歲時再當。但既然設了國家主席，就會有人伸手，眞是矛盾啊。

毛澤東對林彪說：國家主席還是不設爲好。一個主席會累垮，兩個主席會打架，我勸你也不要當。[17]

3 月 8 日，在武漢的毛澤東在看過周恩來送來的《憲法》修改草案後，對汪東興說：《憲法》中不要設國家主席這章，我也不當國家主席。毛澤東派汪東興回北京傳達他的意見。同時提出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當晚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一致擁護毛澤東的建議，決定立即著手籌備。由周恩來、張春橋、黃永勝、謝富治、汪東興組成工作小組，負責四屆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事宜；由康生、張春橋、吳法憲、紀登奎組成工作小組，負責修改《憲法》；由周恩來、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報告，集中講當前政策和計劃問題。[18]

3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憲法》的指導思想和修改《憲法》中的一些原則性問題，給毛澤東寫了《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毛澤東在批示中再次明確：不設國家主席。[19]

4 月 28 日，周恩來在毛澤東再次表示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後，同前來的林彪談話（談的什麼不知道）。[20] 4 月下旬毛澤東從武漢趕回北京，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重申他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毛澤東引用《三國志·魏書》中"武帝紀第一"的典故，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毛澤東說：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毛澤東再次對林彪說：我勸你也別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去當。

7 月 17 日至 22 日，周恩來主持會議，宣佈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由毛澤東任主任，林彪任副主任，委員 57 人。[21] 中央軍委辦事組向林彪彙報有關《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一節時，針對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是否由林來當的問題，林彪明確表示，我不當國家主席，這不合適。林彪說：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這是很合理的。中國是個大國，如果沒有象徵性的國家元首來代表就不太合適了，毛主席應是國家主席的惟一候選人。當然主席年齡大了，不適於出訪外國，我們可以設幾位副主席代表主席出訪。我身體不行不宜當副主席。我無法出席公眾活動或去國外訪問。總之，毛主席應當國家主席。[22]

7 月 18 日，周恩來在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東北、西南組會上發言，提出修改《憲法》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突出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黨是我們國家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國武裝部隊的統帥，林副主席是副統帥；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23]

討論中仍有人主張設國家主席。

毛澤東得知，再一次提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24]

《憲法》修改草案已經發給與會成員，最重要的一處修改是不設國家主席，而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爲國家元首，總理爲政府首腦。這條修改意見是毛澤東提出來的，經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同意。當時的計劃是到 8 月 20 日，將基本完成四屆人大有關文件的起草和其他各項準備工作；8 月 21 日至 28 日，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9 月 15 日至 24 日，召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25]

九屆二中全會倒是如期召開，但會期拖長，而四屆人大則遙遙無期了。

是“不設”，還是“不當”

這個國家主席眞是“罪魁禍首”，從 1970 年 3 月至 8 月，讓百忙中的毛澤東連講六遍，還扔不進歷史的垃圾堆，還翻來覆去提上議事日程。在那個時代，老人家的話不是一句頂一萬句嗎？講一句足矣，講了六句（六萬句），怎麼就等於零了呢？

林彪處理中央傳閱件的原則是毛澤東畫圈我畫圈，幾乎沒有自己的意見。于運深回憶：在“文革”中，看不到林彪對中央處理重大問題時的表態與主席有任何抵觸之處。林彪很謹慎，小小的事情都要請示，從不做主。見到毛澤東，都要先敬禮，尊敬極了。林彪一直是“步步緊跟”的呀，那爲什麼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要與毛澤東“唱反調”？[26]

8 月 22 日下午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談到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時，五名常委，除毛澤東外，四名常委都提出，根據群衆的願望和要求，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27]毛澤東在會上仍堅持不當國家主席，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28]

8 月 25 日，毛澤東又說：誰堅持設，誰就去當，反正

我不當！[29]

難怪“藕斷絲連”，原來毛澤東並沒有“一刀兩斷”啊。

毛澤東“不當”是堅決的，“不設”卻遠沒有“不當”來得堅決。如果毛澤東堅決“不當”，也堅決“不設”，中央政治局五個常委中的四個常委，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決不會同意設國家主席，更不會試圖以全黨、全國人民的意志來說服毛澤東。正因爲毛澤東並沒有關上“不設”的大門，所以除毛澤東外的四名常委都提出，根據群衆的願望和要求，應該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周恩來說：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時，可由國家主席授權別人代行。[30]一向善於揣摸毛澤東心理的周恩來以爲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是怕煩瑣的國事活動，但是他想錯了！

康生說明中央黨政機關和全國 29 個省市自治區反映上來的討論結果：廣大群衆都熱切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中時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如果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那就不要。最後到底怎麼樣，請毛主席定。[31]

康生負責《憲法》的修改，他專門研究過世界各國的《憲法》，可是他仍然不敢表態。

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陳伯達講後，林彪附和。[32]

誰說了也不算，因爲毛澤東提議不設國家主席，這樣就

要修改《憲法》，改變國家體制。8 月 23 日晚，在研究播放林彪講話錄音時，周恩來對張春橋說：《憲法》修改草案有關國家主席的章節，要準備一下，備用。張春橋說：現成的，已經準備好了，請總理放心。

周恩來要陳伯達準備一個設"國家主席"的條文。8 月 23 日晚，陳伯達組織人編寫有關"國家主席"的憲法條文。也就是這天晚天，陳伯達還編了有關天才的"語錄"。[33]

聽完林彪講話的錄音，葉群對汪東興、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說：昨晚總理交代張春橋準備《憲法》草案中設國家主席的章節，這對我們有很大啓發，我們要向總理學習。[34]

陳伯達回憶：討論設國家主席時，我贊成毛主席當。這是多數人的願望，毛主席後來否定了這個意見。周總理說，有些人主張還要設國家主席，叫我寫個條文，再看看毛主席的意見。我把《憲法》的有關條文抄下來。自從毛主席講明他不擔任國家主席的道理，我就把抄的條扯了，也没有再建議了。[35]

其實，周恩來多次向毛澤東反映要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周恩來也很希望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林彪擔任副主席，以體現黨和國家的一元化領導。毛主席實在不願意，由林彪擔任也未嘗不可，這絲毫不影響毛主席的最高地位，也可以反映林彪作爲接班人和副統帥的身分，主持《憲法》修改工作的康生也同意。

此後，在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憲法》草案有兩個版本，一個"設"，一個"不設"。

毛澤東幾次與周恩來單獨談話，此後周恩來不再提議設國家主席。

但在廬山會議前，是否設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見。主張設的意見佔大多數，包括周恩來、康生在内都主張設國家主席，當時議論讓董必武當。毛澤東認爲國家還是要有個頭，而他自己只能當黨的主席。國家主席這個頭由政治局常委中產生，這一想法在 1969 年 8 月和 11 月的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過。[36] 陳伯達回憶：毛主席說過，中國農民多，要設國家主席，可以讓陳永貴當。[37] 毛澤東甚至對國家副主席的人選有過考慮。

細想起來，"不當"和"不設"是兩個概念，而我們似乎把"不當"和"不設"混淆，好像毛澤東說"不當"，就是"不設"。但實際上，"不當"，是自己不當，"不設"是不讓別人當。無論如何，"不當"和"不設"不應該是一回事吧？

毛澤東説讓林彪當國家主席

建國以後，毛澤東可以不當國家主席，甚至可以不當黨中央主席，卻從來没有說過不當軍委主席。推舉"九大"的主席團主席時，當著全體代表的面，毛澤東反復推薦林彪當。林彪毫無準備，但他反應很快，馬上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澤東又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林彪急了：怎麼能毛澤東當副主席，他當主席，這不是"犯上作亂"嗎？林彪站起來，向全體代表呼籲選毛主席爲主席

團主席，並帶頭舉手高呼毛主席萬歲，這才全票通過了由毛澤東爲主席團主席，林彪當大會副主席。[38] 不要小瞧大會主席團主席，一般黨的大會主席團主席就是黨的主席，而毛澤東公開讓林彪當大會主席，是試探，是圈套，還是開玩笑，不得而知，但毛澤東從來沒有拿軍委主席開玩笑。他一直兼著中央軍委主席，他要求軍隊的重大問題必須要向他報告，甚至營連排的軍隊調動也要經過他批准。

1970 年 3 月 8 日，汪東興從杭州回到北京，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關於"國家主席"的意見。講了好幾個問題，戰備，四屆人大等。葉群和黃、吳、李聽了汪東興傳達毛主席關於"國家主席"的意見。大意是：要開四屆人大，選舉國家領導人，重要的一項工作是修改《憲法》，政治局要立即著手做準備工作，《憲法》草案有 70 多條，主席建議《憲法》修改草案搞個短的，30 多條。毛澤東說：第一我不會再當國家主席；第二國家機關究竟設不設國家主席要考慮，我建議不設。如果大家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由誰當好？我是不再當國家主席了，現在看來，這個國家主席也只有林彪同志來當。但我的意見是不設爲好。周恩來在會上對葉群說：葉群同志，你要聽清，我就不向林副主席報告了，由你向林副主席報告[39]。汪東興非常興奮，對葉群說：你趕快回蘇州，把毛主席讓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的這個消息親自告訴林副主席。餘興未盡，汪東興特意把黃永勝、葉群和吳法憲約到中南海他的家中，繼續暢談。[40]

吳新潮回憶：我媽（陳綏圻）接的電話，正好我在家，

叫我也一起去了。到了中南海汪東興家，我看見除了葉群和黃吳李邱，林立果也去了。汪東興很高興請大家吃飯，把家裏的好東西都拿出來了，還請大家吃紅薯。汪東興說了很多。汪東興說，讓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主席這個安排好。不知誰說，不知道林副主席肯不肯當。毛主席讓林彪當國家主席的話，汪東興還在三座門（軍委辦公廳住地）還說過一次。那麼多人在場，汪東興想賴也賴不掉。九一三事件後我被抓了起來，要求見管專案的毛遠新（毛澤東侄子），毛遠新說不見了，寫出來吧。我寫了揭發汪東興的材料，毛遠新說不能交給專案組，密封後送周恩來。周恩來看得很細，問毛遠新，怎麼少了一頁？毛遠新緊張了，第二天周恩來打電話，說吳新潮編頁碼編錯了。以後毛遠新說，周恩來親自交給毛主席。毛主席叫毛遠新站在一邊，叫來汪東興，說兩隻小老鼠（陳伯達、汪東興），凡是想改換門庭的人，滾他媽的蛋！汪東興嚇得跪在毛主席面前求饒。汪東興在毛身邊，與江青的關係很僵，他倒不一定想"背叛"毛澤東，而是看林彪成了接班人，他找靠山。[41]

黃永勝還不放心，問主席是這麼說的嗎？汪東興肯定地說：主席的的確確是這麼說的！還是一模一樣的幾句話，葉群高興死了。

3 月 9 日，滿載著"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的葉群興沖沖趕回蘇州，順利拿到林彪的"令箭"，她迫不及待地打電話給黃永勝、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要他們製造設國家主席的輿論。其實，從毛澤東的話中，還是可以聽

出毛澤東並不想"設"，只是"大家堅持"，他才無可奈何地說，要"設"，就由林彪當。但他最後又補了一句，我的意見是不設爲好。而葉群卻沒有琢磨這最後一句的意思，只是聽進去了讓林彪當國家主席一句。

這一切緣於汪東興的"誤導"，是有人誤導了汪東興，還是汪東興故意誤導黃吳葉李邱？

3 月 17 日至 20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問題。會上多數人贊同毛澤東關於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也有人仍然希望毛澤東重新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專門委託葉群將有關戰備、《憲法》起草、國民經濟以及四屆人大的安排等向正在蘇州養病的林彪通報。[42]

林彪明確表示：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也不當國家副主席。[43]

林彪讓秘書給主席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主席則讓秘書回電話，問候林彪同志好！[44]

這是什麼意思？毛澤東回避了林彪的建議，但也沒有反對。

4 月 11 日，林彪讓秘書于運深打電話給正在長沙的毛澤東，提了三條建議。

1、關於這次人大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建議仍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比較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2、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爲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

3、林彪同志認爲，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45]

林彪的這個電話記錄同時傳給中央政治局。

陳伯達回憶：葉群到過我那裏一次，她說的話我現在已記不清了。大意是，江青說過，毛主席還在，林彪如當國家主席，也不好。我說，沒有提過讓林彪當國家主席這個問題吧？以後有人以爲我擁護林彪當國家主席，其實我從來沒有說過。[46]

4 月 12 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林彪關於設"國家主席"的三條意見。會上相當一部分政治局委員附合林彪的意見。會後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中，提議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還提到政治局同意林彪關於新《憲法》中增設國家主席一節，並建議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的建議。毛澤東旁批：此議不妥，我不宜再做此事。[47]

于運深回憶：確實江青在周恩來 4 月 12 日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說過。當時討論林彪關於要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的意見，大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仍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沒有提出異議。江青在會上表示：毛主席還在，林彪如當國家主席，也不好，並將討論結果報告毛澤東。高必成（毛辦秘書）打電話給林辦，說他已向主席轉報，主席聽後笑了，說設國家主席，誰來當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當了。你不當，我不當，那就讓董老來當吧！再找兩個年輕人當副主席，紀登奎和汪東興。

于運深一字不差地記了下來，報告葉群。

如此機密，又如此錦上添花的事情，葉群一向願意自己報告林彪，于運深本來不應該知道，無奈林彪正在生葉群的氣。事情是江青引起的，江青屁大一點事都要找葉群，讓軍隊辦，像她照相的器材啦，要海軍的軍裝啦……。有些事情葉群不敢自己做主，就請示林彪。剛開始林彪對待江青畢恭畢敬，畢竟她是第一夫人嘛。後來林彪煩了，就不批。這一不批，就得罪了江青。葉群夾在中間，很不好做人，就說了兩句。林彪一生氣，說我就管打仗，不管別的事！林彪的氣是沖著江青的，但他只能沖著葉群發火，說一聽女人的聲音就頭痛，宣佈一星期不見葉群。"毛辦"來電話時，林彪規定不見葉群的期限還沒到，葉群只能讓于運深把毛澤東秘書高必成的電話報告林彪。林彪聽了以後，相當重視，讓于運深把電話記錄抄兩份存文件。毛澤東辦公室那邊也肯定有這份毛澤東口授的電話記錄。[48]

4 月 16 日，李作鵬在海軍常委會上說：林副主席向毛主席寫了建議，毛主席現在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所以我們準備了一個設"國家主席"的稿子。[49]

8 月 5 日，邱會作說：設不設國家主席，中央討論有兩種意見，總後黨委的報告，還是按《憲法》草案的意見報。[50]

4 月 25 日，毛澤東坐專列從上海到蘇州去看望林彪。說要在蘇州下火車，汪東興張羅，在林彪住處騰出了房間。但到了蘇州，毛澤東又不下火車了，就在專列上，召林彪去

談話。毛澤東行事從來不會無緣無故。他的一舉一動，都有著深刻的含義。毛澤東專程到蘇州就有點奇怪，他一向不串門，對黨內同志甚至送客都很少送出門外，爲什麼帶著上海一大群頭頭腦腦來看望林彪？是來表示張春橋是他的心腹？還是來撮合林彪和張春橋的關係？不管怎麼說，這裏似乎總有些什麼不對，應該是林彪去看望毛澤東才合乎邏輯呀。

毛、林會見的氣氛很好，有說有笑。那時東方紅衛星剛上天，國防科委用專機送了一盤東方紅衛星的錄音帶給林彪，林彪給毛澤東送去，毛澤東很高興，說很好[51]。官偉勳（林辦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問林彪怎樣才能防止出修正主義時，林彪回答：還是要靠黃吳李邱這些從小跟著毛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52]。上廬山前，毛澤東還在說軍隊的好話，說都是從小跟他幹革命的紅小鬼。我就是信任革命了幾十年的紅軍幹部，我就是信任軍委辦事組這幾個跟我出生入死幾十年的紅小鬼。葉群馬上轉告黃吳李邱，有毛澤東支持，他們與江青、張春橋鬥爭的決心更大了。[53]

上廬山的最初幾天，葉群的情緒相當好，還沒有上山她已經從汪東興那裏摸來的底數。汪東興肯定地對葉群說：毛主席沒有反對設"國家主席"。這些話葉群和"林辦"的幾個秘書都講過，好消息葉群向來願意"洩密"。

看來汪東興沒有"造謠"。這才好解釋他爲什麼在華北組會議上代表八三四一部隊全體官兵熱烈擁護毛澤東當國家

主席，否則借給他三個膽子也不敢。

本來嘛，設"國家主席"是國家體制的一個具體問題，建議、醞釀、討論，都無可非議。就算林彪想當國家主席，黨的一個副主席想當國家主席，就是"反黨""反革命"嗎？黨史專家王年一說過，在黨的會議上，在中央全會上，一個黨的副主席，爲什麼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一個意見對也罷，錯也罷，爲什麼不由全會做出討論，做出判斷？[54]

誰提出設國家主席，誰就是想當國家主席，這是什麼邏輯？

林彪想當國家主席嗎

毛澤東對林彪說：我勸你也別當國家主席。

林彪擁護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同時又明確表示不當國家副主席。那麼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林彪是不是想當國家主席呢？林彪從來沒有說過想當國家主席，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惟一的證據是葉群說過一句話，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1971 年 10 月 21 日，吳法憲在監獄裏親筆交代：1970 年 7 月，葉群當面說過這句話。衆所周知，吳法憲的交代多有不實，他自己也承認。1980 年審判"兩案"時，吳法憲曾圈圈點點改正了不少。更何況吳法憲是聽葉群說，沒有聽到林彪親口講過自己要當國家主席的話。[55]

吳法憲自由以後，說葉群根本沒說過林彪往哪擺這句話。[56]

據知情人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其實是汪東興說的。

1970 年 8 月 19 日，毛澤東乘專列到達九江市，吳法憲和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剛下飛機的汪東興和他們寒暄了一兩句，就急急地進入正題，說討論《憲法》時，要提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不設國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裏擺？[57] 後來吳法憲成了囚犯，當然不敢把仍在高位的汪東興供出來，就推到葉群頭上。反正葉群死了，死人又不會說話。如果葉群說過，爲什麼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都不知道，只有吳法憲一個人知道？如此"有份量"的一句話葉群不會只對吳法憲一個人說。

李文普回憶：我沒有聽葉群說過"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這樣的話。我們倒是從林彪那裏聽過他連副主席也不願當，還有讓毛主席當主席，他不當國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記得是叫秘書于運深寫的。我們認爲他不願當副主席，從他的身體狀況、不願接見外賓和他對當"接班人"的態度來看是有可能的。[58]

林彪當上接班人，關光烈（林彪秘書、河南洛陽某陸軍師政委）曾問過李文普，首長願意不願意？李文普說：你還不知道？他沒有那麼大的官癮，林彪幾次說不想幹。從 1964 年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會那時起，林彪就藉口有病不參加。[59]

王力回憶："文化大革命"前，林彪不參加黨和國家的活動。我從 1964 年列席劉少奇主持的常委會那時起，從未見

過林彪出席會議。[60]

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當了接班人，他的態度仍是毛主席不到會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會議他不主持，他經常引用毛主席語錄來講話，他自己冒出來的話也總是掛著毛主席。林彪雖是接班人，地位跟劉少奇不一樣，劉少奇做第二把手時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時毛主席退居二線。林彪不是這樣，因爲毛主席回到了一線，所以林彪什麼事都往後退。[61]

林彪在"文革"中，雖然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實際上他是"甩手掌櫃"。"文革"中他除了"緊跟"、"照辦"，在重大問題上沒有自己的"創造"。

紀登奎發現中央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聽不到這位副統帥的意見。毛主席的意見很多，各方面的問題都能聽到他的指示。可是中央討論工業，討論農業，討論財貿，討論政治問題，比如整黨，都沒有林彪的意見，在中央文件上批示林彪也總是"完全同意主席意見"之類的幾個字。紀登奎以爲他在考慮什麼重大的軍事戰略問題。可是，後來紀登奎到軍隊任職，還是沒有副統帥的指示。1971 年夏，周恩來帶黃永勝、張春橋和紀登奎一起到北戴河向林彪彙報工作。紀登奎彙報軍隊冗員太多，一個單位七八個副司令、副政委。林總，您是打過仗的人，軍隊現在這個樣子，眞有了戰爭，還能打仗嗎？林彪說：就是啊，那怎麼辦呢？就這麼一句，沒有下文了。[62]

張雲生回憶：我在林彪身邊工作了四年多，因爲要"講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見他一面。然而我親眼見到的林彪，在"文革"中要麼是遇事不表態，要麼講些"絕"話，要麼就是對他份内之責"大撒手"。林彪受毛澤東之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實際上，他參加主持的記錄屈指可數，特別是"文革"開始以後，他把軍委的日常工作委託給軍委秘書長葉劍英，葉帥"靠邊站"後，軍內上層一時群龍無首，虧得有個以楊成武、吳法憲爲正副組長的軍委辦事組照應日常軍務，林彪則對他們的活動很少過問。軍委辦事組自 1967 年夏成立，到 1968 年 3 月改組，再到"九大"後正式成形，直到 1970 年 10 月我調離"林辦"，我沒見到林彪接見軍委辦事組的全體成員，沒有聽到他對軍委辦事組的全面工作給予一次像樣的指示。從 1967 年到 1970 年，林彪在住地毛家灣的會客廳只召見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四員大將一次，談的是怕蘇聯趁我國慶對我實施突然襲擊的事，而且只有 20 多分鐘。黃永勝擔任軍委辦事組組長和總參謀長前後，林彪只見過他兩次。吳法憲可算林彪的親信，但自從軍委辦事組改組後，林彪在住地從未單獨接見過他。……林彪與李作鵬並無私交，只是在 1966 年 9 月海軍內部出現紛爭，林彪偏向"高舉"、"突擊"、"有幹勁"的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因而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過一次李作鵬夫婦。從那以後，林彪與李作鵬再也沒有單獨接觸。邱會作在"文革"期間從未得到單獨面見林彪的機會。

林彪當國防部長這麼多年，每年八一招待會他都不出席，更極少參加外事活動。張雲生在林辦四年多，林彪只接

見過兩次外賓，一次是越南總理范文同和國防部長武元甲，他們非要見中國傳奇式的國防部長林彪。經毛澤東批准，並在外交部安排下，越南客人的願望得到滿足。張雲生看過他們的談話記錄。林彪所談的中心內容是一個"熬"字，他對越南客人說了一句話：面對強大的美國，"熬"就是勝利。另一次是 1968 年 10 月接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林彪推說身體不好。外賓提出一起照個相也行，林彪只好出面。人家一上來就擁抱，然後照像，再通過翻譯，勉強講了四五分鐘。林彪回到家就說，和洋人打交道，實在受不了。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訪華，毛澤東指定林彪陪同，林彪推說"出汗"。毛澤東執意要林彪出面，葉群跪著哭求，林彪才勉強去了。賓主剛客套完，林彪就退到外面大廳的角落裏，一直到會見結束。[63]

林彪不願意見外賓，一個重要原因身體不好，他身體瘦弱，臉色蒼白。爲什麼那時舉國上下都在喊祝身體健康，就因爲林彪身體不健康嘛。李文普回憶：林彪吃飯簡單，吃肉吃菜感覺不舒服就拉稀，以後就不吃。他幾乎整天枯坐在屋子裏，不說話，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的工作就是每天聽 30 分鐘的"講文件"，秘書要坐在離他四五米的地方，怕翻紙翻起"風"來。他甚至不願意陪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可是你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不陪又不行，有時到了難以支撐的程度。有一次林彪陪毛澤東走下金水橋，與紅衛兵見面，累得幾乎走不回來。[64]

這樣的身體怎麼可能勝任繁重的外事活動？林彪的"武器"是稱病不出。大事小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從來不主動表態。用他自己的話就是"大事不麻煩，小事不干擾。葉群在《工作手册》總結"三不主義"：1 不干擾人之決心（不負責），2 不批評（不建言），3 不報壞消息（不得罪）。三要：要回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

林彪說，要不垮，辦法有三條，第一條就是緊跟毛主席[65]。他反對"副統帥"，"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一類的提法，像"副統帥"、"三忠於的光輝榜樣"，他都要秘書一律劃掉。林彪幾次說，不能出版《林彪語錄》，出版的要一律没收。[66]

關鋒回憶：1967 年 6 月 16 日夜，在人民大會堂看樣板戲，毛、林在前排，我坐在他們後面，報幕員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後，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毛主席轉過頭對林彪說，你聽，說你呢。林彪微微一笑。當晚，林彪給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近一個多月來，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都有"萬壽無疆"和"永遠健康"這兩個口號並提的情況。我認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個口號完全正確的，非常必要的。爲了在黨內外、國內外突出毛主席的偉大作用，樹立毛主席絕對威信，但不宜提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只有突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符合於全國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觀實際。今後一切演出、一切會議、一切文件、一切報刊以及其他宣傳形式，都應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與毛主席並提。盼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們今後幫助注意掌握這一點，並希望將我這封信轉發到縣團級，由他們傳達到所

有的基層組織和革命群衆組織。[67]

中央文革小組專門討論了林彪的這封信，有爭論。關鋒說：我管宣傳，我的意見是恭敬不如從命。此後，中央報刊基本上沒有這個提法了。[68]

1967 年 11 月 25 日，林彪電話交代：通報稿中第二頁第三段（要大力宣傳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好學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並寫入“九大”報告和決議中，進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全文刪去，或者改寫得輕淡一些爲好。

毛澤東批：刪去不好，也不必改寫。[69]

林彪怎樣當上黨中央惟一的副主席

林彪的“官”是毛澤東封的。

1956 年，林彪在“八大”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8 年 2 月，毛澤東到上海看望林彪，坐了將近一小時。秘書全都退到外面，葉群有時在場。[70]　5 月，八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提議，林彪補選爲中央副主席，進入常委。5 月 26 日，《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大幅標題報導“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增選林彪同志爲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就是沒有 1959 年的廬山會議，林彪在元帥中的排位事實上已經越過彭德懷，僅次於朱德。常委排名已是毛劉周朱陳林鄧了。

這時，彭德懷還沒有從廬山上“栽”下來。

一年後，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關光烈回憶：雖然“官帽”扣在頭上，卻沒有具體分工，所以林彪還是候鳥一樣冬天飛到廣州，春天飛到上海、蘇州，夏天飛到北戴河。這時林彪身體好一些了，出來多一些。但中央政治局開常委會，他還是不去。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反軍隊教條主義”，林彪親筆給毛澤東寫信，說自己身體不好，不能參加。信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澤東簽字後退回。以前羅榮桓活著時林彪就請他向毛澤東說過他不想幹，毛澤東批示，還讓他幹。

1959 年廬山會議開到一半，毛澤東命令林彪上山，秘書關光烈跟著去了。周恩來找林彪談話，傳達毛澤東的意見，由林彪擔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全軍的事都要管。關光烈回憶：林彪叫我給總理打電話，說他的身體擔當不了國防部長。林彪在樓上住，我在樓下住，我要去打電話，被樓上的葉群攔住，不讓我打。葉群對林彪說，主席說了，你再說什麼也沒用，乾脆別說，我來幫你。後來林彪沒再談這個事。[71]

1959 年 9 月 17 日，林彪被任命爲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

1960 年春，林彪叫關光烈給軍委辦公廳的蕭向榮主任打個電話，讓葉群當辦公室主任。林辦秘書都知道，林辦的大權握在葉群手裏。[72]

張雲生回憶：葉群身爲林彪夫人兼辦公室主任，對林彪的影響不可小看。林彪晚年疾病纏身，又長期脫離實際，脫

離人群。而葉群正處中年，不僅把林彪當作“靠山”和招牌，還“幫助”林彪“發明”了一套“緊跟”術：毛主席畫圈我畫圈。上天安門，交代警衛人員必須讓毛主席走在前面。林彪批文件，不能寫“送”，只能寫“呈”。提醒林彪在公開場合帶《毛主席語錄》等。我不止一次聽葉群說，秘書給首長“講文件”，千萬不能從“右”耳朵往裏吹風，以免首長犯“右”的錯誤。特別是首長在中央傳閱件上畫的那個“圈”，千萬要幫助“把住關”。葉群規定的“原則”，不論多麼重大的事項，林彪都不能先表態。即使同意，那個“圈”也只能等她“把關”後才能畫。這樣，林彪的“畫圈”權實際上掌握在葉群手裏。我初到林辦時，就聽葉群吹噓過，林彪能過“二月提綱”那一關，全是她的“功勞”。1966 年 2 月，彭眞等人搞的“二月提綱”傳到“林辦”，劉、周、鄧等畫了圈，林彪本來想畫圈的。葉群“火眼金睛”，看到康生沒畫，認爲這裏面有是非，也沒讓林彪畫，說先等主席表態。果然毛澤東徹底否定，彭眞因此背上罪名，不久被打倒。葉群說，如果不是她把關，林彪早就犯“錯誤”了。葉群由此得到了林彪的賞識，這是他後來放手讓葉群“把關”的一個因素。[73]

八屆十一中全會過半，林彪勉強出席

1966 年 8 月 1 日，宣告“文革”全面發動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林彪還是像往常一樣請病假。7 月 24 日通知八屆十一中全會時，林彪躲在大連療養。毛澤東決定林彪取代劉少奇，讓汪東興幾次打電話催林彪馬上回北京，並讓周恩來安排專機。林彪一再告誡自己，不要輕易騎上去。林彪知道，“騎”上去就下不來了，推辭再三，還正式寫了請假的書面報告。[74]

林彪把有毛澤東批示的報告撕毀扔進痰盂，以示他的堅決，葉群則小心地把碎片從痰盂裏撈出來粘好。

八屆十一中全會開了一些天，毛澤東還是堅決要林彪“出山”。

官偉勳回憶：毛主席讓林彪當接班人，林彪說他有病，身體不行，不能出席會議。毛主席說重要會議你來，一般會議讓葉群代表你來參加就行了。[75]

毛澤東爲什麼堅決要林彪出山呢？

8 月 1 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張大字報。8 月 2、3 日下午的大會，很多人對撤工作組思想不通。8 月 4 日，出現異常情況，原定會議議程是召開大會，與會者到會後改開小組會。下午卻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說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明顯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還說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 20 世紀 60 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當劉少奇說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後根據毛澤東的

意見，各組傳達、討論他的講話，全會議程爲之改變。

8 月 5 日，本來是全會閉幕的日子[76]。這一天不但沒有閉幕，還發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毛澤東對《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批註："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該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這個批註，作爲全會文件印發。《紅旗》雜誌 1966 年第 11 期轉載《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時，加上"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

第二件，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發出文件：1966 年 6 月 20 日批發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簡報（第 9 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

第三件，毛澤東突然在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說中央有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聯繫到 1962 年的右傾和 1964 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毛澤東的大字報沒有點名，但明顯是對著劉少奇的。

但是，8 月 4 日至 6 日，全會的小組會上並沒有出現重要的發言——沒有有分量的自我批評、批評、評論，沒有對毛澤東 8 月 4 日講話的熱烈擁護。[77]

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都表示不理解，認爲不能亂。

甚至有人質疑，爲什麼給紅衛兵寫信？

毛澤東得不到多數的支持，所以一定要搬林彪這個"援

兵"。

8 月 4 日，還在開會，毛澤東就讓秘書給林彪打電話，爭取林彪的支持。晚上林彪讓秘書回電話，表示擁護毛主席的意見，但是他身體不好，不能出席會議。

爲什麼林彪堅決不出山呢？像 1959 年的廬山會議，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毛澤東都是搬的林彪的援兵，林彪也是一叫就到。這次爲什麼一而再，再而三推辭呢？5 月 18 日，按照毛澤東的安排，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有個講話。7 月 8 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表示這種提法過去還沒有過，感到不安。如果這單單是一封家信也就罷了，毛澤東偏偏讓周恩來拿給林彪看，試想林彪看了以後還能再"出山"嗎？

爲什麼林彪又"出山"了呢？

葉鎭回憶：1968 年，空軍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林彪身體不好，不來，毛澤東讓會議停了 20 多天，說我等。一千多位與會者都在那裏學習，等了二三十天，直到林彪能出席會議，才接著開會，由毛澤東和林彪一起接見。

"文化大革命"搞起來，林彪不願意當副統帥，毛澤東非要他當。爲了讓林彪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專機停在大連三天，林彪就是不上飛機。毛澤東發火，說林彪不配合。江青說：這樣主席不高興，林彪還是不從命。毛澤東不得不採取老一套，會議停下來，死等。什麼時候林彪到北京，什麼時候八屆十一中全會繼續開會。那時趙爾陸（中央委員、國防

工辦常務副主任）也參加了中央全會，有一天他突然回來了，秘書問：趙主任怎麼來上班了？他說會議停了。葉鎮回憶：8 月 6 日下午，中央文件來了，趙爾陸給我看，明天全會恢復開會。重排席位。林彪排到第二位。我說林彪沒參加會議。因爲去大連前葉群對我說，他們要去東北。後來我聽說，周總理打電話給林彪，我現在處境很困難，你不來，我就更不好辦。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出於"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不得不來。[78]

從事後的發展看，毛澤東給林彪許了願，說準備把他的518 講話印發全會，並印發全黨。這不是等於否定毛澤東自己對林彪 518 講話的批判嗎？再則，毛澤東可能說，你就是不來，也要讓你當第二號人物。從事後林彪要求選舉結果不公佈，並將此寫進 1966 年 8 月 14 日中共中央通知[79]，說明林彪是想出面來擋一擋。不公開宣佈嘛，就有迴旋的餘地。這種事，他不親自來是辦不成的。

周恩來親自勸林彪，江青也給葉群打電話，叫葉群和兒子林立果一起回北京。8 月 5 日，毛澤東把他的大字報內容通過電話告訴了林彪。8 月 6 日上午，毛澤東讓秘書徐業夫打電話，一定要林彪來。直到這時，林彪才答應下午到北京。[80]

這時大連已經發生武鬥，外面很亂。林彪沒辦法，只好說：不讓林立果回北京，叫葉群回去就行了。林彪臨走，對林立果說：你在這裏好好復習功課，過一段大學開學，好好上課。林彪對女兒林豆豆說：你先不要回北京，好好呆著，

我過幾天就回來[81]。實際上林彪一去不回頭。

吳新潮回憶：我父親接到命令，派專機立即接林彪到北京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82]

1966 年 8 月 7 日，林彪坐專機從大連到北京，周總理、汪東興和我父親到機場接。專機沒有開到停機坪，而是停在跑道盡頭，周總理和汪東興上機艙與林彪談話。吳法憲本來想討個好，見林彪臉色陰沉，嚇得連話也沒敢講，趕快溜掉了。[83]

吳新潮回憶：我父親沒被允許上專機。他們從專機上下來，周恩來陪著林彪先走了。汪東興陪著葉群，我父親也在這輛車上。路上汪東興對葉群說，主席已經同意李訥（毛澤東女兒）到解放軍報社了。葉群說主席對我們這麼信任，我們一定幹好。[84]

林彪一到北京，立刻被接到人民大會堂，這時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開始一個星期了。汪東興安排林彪住進有空調的浙江廳，毛澤東親自登門看望。林彪還是說身體有病，不願當接班人[85]。毛澤東罵林彪想當明世宗[86]，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87]

爲什麼毛澤東再三再四要請出林彪呢？1967 年 5 月，毛澤東與外賓談話時說：（發動"文化大革命"）當時有很多人思想仍然不通，我只好將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才得到半數多一點的同意[88]。從會議的時間上也可以說明問題，鄧小平宣佈，毛澤東決定正式會議開 5 天。實際上會議又延長了 7 天。[89]

吳新潮回憶：父親接林彪回來，接到通知，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有蕭華、楊成武等，周恩來主持，他從兜裏掏出一張紙，這是毛主席的大字報。父親說，雖然是一張紙，字字千鈞，把我嚇了一大跳。當時我一聽，哪個能擔當得起。毛主席和周總理兩個人討論，劉少奇不行，要拿掉，誰來？周總理提出，讓林彪來。[90]

林彪到北京的時間，是 1966 年 8 月 6 日下午。毛澤東寫第一張大字報已經一天了，還沒有公佈。有了林彪的支持，8 月 7 日，毛澤東把他的大字報印發全會，並小範圍地初步商定了重新排序的中央領導名單。[91]

原來，毛澤東得不到多數的支持，所以一定搬林彪這個“援兵”。

林彪回北京的第二天，8 月 8 日晚，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講話，表示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8 月 12 日，在全會閉幕會上，林彪說：最近心情很沉重，中央給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92] 。8 月 13 日，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是不稱職的，我意料是要出錯誤的，但是要力求減少錯誤，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體同志，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以主席為軸心，我們做磨盤，一切按主席指示辦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兩個方針，兩個司令部，不能以想當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對台戲，要一元化，緊跟主席。主席處理問題，有全盤考慮，高瞻遠矚，還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們是不瞭解的。我們對主席的

指示要堅決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我沒有別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沒有別的本事，就是依靠群衆的智慧。就是依靠領袖和依靠群衆。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請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辦事。大事不干擾，小事不麻煩。我們就是這樣去做，有時也免不了要犯錯誤，跟不上主席思想。怎麼辦？辦法是朝令夕改，不堅持錯誤，隨時修正錯誤。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們同他比較差別很大，錯了趕快改。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但是，現在主席和中央既已決定了，我只好服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93]

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周恩來出面向全會提議，全會一致通過，由“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作為惟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澤東批的重新排名的文件上，雖然沒有罷免黨中央副主席，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四位副主席的烏紗帽卻被悄悄拿掉了。[94]

雖然林彪在全會上宣佈，改選結果不見報（大概想給自己留條退路）[95]。但 8 月 18 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就泄了“密”。林彪站在毛澤東身邊，發表經過毛澤東審閱的重要講話，這已經“不打自招”，說明黨中央在人事上有重要變動。會後新華社報導了重排的座次，劉少奇降至第八位，林彪“跳”到第二位，中國第二號人物就這樣滿世界皆知了。

1968 年 9 月 24 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談到“九

大”，毛澤東說：接班人當然是林彪[96]。10 月 13 日至 31 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決議，宣佈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通過了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負責起草，周恩來主持討論、毛澤東多次修改的新《黨章》草案，其中明確寫進了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康生在會上說：這是百年大計，是關係到我黨、我國今後命運，關係到我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謙虛，他要求把《黨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刪去，我們的意見，這一段必須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是會上公認的，是當之無愧的。[97]

1969 年 4 月 14 日，林彪在“九大”會上有一次插話：同志們，我没有準備講話，但是我要插兩句話，聽了總理剛才的講話，事先我不知道他講話的內容，他對毛主席的這種評價是非常正確的，是非常合乎實際的，没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就没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没有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間現在這樣的地位，……毛主席是我們最偉大的領袖。至於我個人覺得很慚愧，在我年輕的時候，很早在井岡山同毛主席會合，那時年紀輕，並不知道很多的事情，就是跟毛主席就是了，在一切領導人中間，比較起來，前前後後我比來比去，我那時候就認爲應該擁護毛主席，歸根到底毛主席他很高明，我僅僅只有這麼一點覺悟，並不是像總理說的那麼高瞻遠矚，全面地看問題，没有達到那個水平，說老實話，我幾十年來確實擁護毛主席的，我整個思想水平可以

說很低很低的，不像總理說的那麼高，後來在工作中略爲有些成績，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取得的。没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不僅我們黨没有今天的勝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這個人。我的能夠存在爲黨貢獻自己一點工作，全靠毛主席，在每一個時候的重大問題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們跟著幹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決定因素，那種偉大的力量是毛主席，毛主席起了偉大的作用，我個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這裏僅僅向同志們作這麼一點簡單的聲明。

1970 年 4 月 18 日，康生對新黨章作了說明：新黨章中有這樣一段話，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康生說：新黨章明確規定這一條，這是關係到我們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一件大事，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運的一件大事，這是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永遠不變顏色，徹底地遵照毛主席的思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永遠沿著毛澤東思想的航道勝利前進的根本保證。[98]

“接班人”的會，林彪没去，葉群去的。“接班人”的那個文件，李春生（林辦秘書）送給林彪看。林彪想也没想，就用紅油筆把“接班人”那一段勾掉了。這個由康生起草的傳閱件，已經被毛澤東畫了圈，林彪只能在上面畫圈，不能塗改。葉群訓李春生爲什麼不奪過林彪的筆？爲什麼讓他在傳閱件上畫？可是誰敢去奪林彪的筆？如果毛澤東没有畫圈，還

可以從中央辦公廳再找一份，現在怎麼辦？李春生嚇壞了，跪在地上擦。油墨都滲進紙漿裏了，哪裏擦得掉？急得李春生直掉眼淚。要不是幾個老秘書幫著說好話，李春生早就被砸了“飯碗”。[99]

“九大”毛澤東確定林彪是他的接班人，並破天荒地塞進《黨章》。但毛澤東並沒有把“寶”全押在林彪身上，他同時又下了幾步棋。

吳法憲回憶：毛澤東提名周恩來任黨的副主席，只是後來被周恩來本人堅決反掉了。爲了有意打破（林彪）一方面軍的一統天下，毛澤東安排四方面軍的兩位大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陳錫聯進入中央政治局，並親自指定四方面軍的李德生爲軍委辦事組成員。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上寫過劉鄧路線的話，毛澤東批示：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爲鄧小平的復出埋下了“伏筆”。周恩來曾對王稼祥說，將來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元帥，或者是鄧總書記。“八大”選舉的領導機構，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而這時林彪只是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對鄧小平評價很高，說人家要打倒嘛，就打倒一下吧！打倒一年，頂多兩年。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和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毛澤東始終不同意將鄧小平開除出黨，這是他掌握的一匹“黑馬”[100]。1967 年 8 月，毛澤東對“筆桿子”王力說：鄧小平“文”可與少奇、恩來相比，“武”可與林、彭相比，一個人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只有鄧小平。林彪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小平出來[101]。此後，毛澤東

對林彪已經有了很大的意見。吳法憲回憶：“九大”後，周恩來察覺到毛澤東對林彪日益不滿，託人勸說林彪不要老呆在家裏，出來做點工作，到下面走走，搞點調查研究。林彪婉拒，謝絕總理的好意，說我的身體確實不行，連出去轉車都不敢了。[102]

《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指出：毛澤東尖銳地提出林彪問題，表明他不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認爲林彪已成爲反對他的另一個司令部的頭頭。1972 年 7 月，毛澤東會見法國外長舒曼，說我們開了那個盧山會議，1970 年 8 月 23 日一天，24 日一天，25 日半天。第三天下午，我就說不行了，不能幹了，下了一滴酒精。一滴酒精下去，“細菌”就不活動了。

這時，毛澤東已經決定把林彪從接班人的位置上趕下來了。

註釋：

[1] [2] [3] [35] [37] [46] 採訪陳伯達兒子陳曉農筆記，2006 年 4 月

[4] 採訪江青秘書閻長貴筆記，2005 年 12 月 21 日

[5] [10] 參見蕭冬連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紅旗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88、1100 頁

[6] [8] [9] 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7 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64、65、634-635 頁

[7] 引自毛澤東《關於相機透露毛澤東準備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給宦鄉》，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7 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332 頁

[11] 參見李靜主編《實話實説豐澤園》，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0 年 6 月版，290 頁

[12] [77] 參見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9 月版，254、180 頁

[13] [15] [16] [25] [29] [47] [89] [91] [94] 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1450-1451、1418、1565、1569、1576、1572、1427、1429 頁

[14] 參見蘭州軍區政治部印《時事學習參考材料〈斯諾訪華的七篇文章〉》，1971 年 7 月版，6 頁

[17] 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版，207 頁

[18] [19] [20] [21] [23] [27] [28] [30] [33] [96]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353、354、364、380、386-387、388、191 頁

[22] 《吳法憲回憶錄》手稿，轉引自 Jin Qiu"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ge121

[24]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26 頁

[26] [44] [45] [48] [81] [99] 採訪林辦秘書于運深筆記，2005 年 10 月 25 日

[31] 參見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版，1974 頁

[32]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387 頁

[34] [40] [42] [53] [57] 採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 年 11 月 16 日

[36] [49] [50] [51] 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版，212、221-212、225、213 頁

[38] [63] [65] [66] 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版，214、329-330、227、234-236 頁

[39] [43] [56] [84] [90] 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

[41] [82] 採訪吳法憲大兒子吳新潮筆記，2006 年 1 月 3 日

[54] 引自王年一《對林彪集團的再認識》，載《重審林彪罪案》香港明鏡出版社 2004 年版，10 頁

[55] 參見高德明《吳法憲在秦城監獄內外》，載《中華兒女》1999 年第 9 期

[58] [64] [85] [92] 參見李文普《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華兒女》1999 年第 2 期

[59] 採訪林彪秘書關光烈筆記，2000 年 9 月 9 日

[60] [61] [101] 參見王力著《王力反思錄》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版，934、711、1030 頁

[62] 參見《南方週末》2003 年 11 月 6 日

[67] [79] [88] 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373、52-55、62 頁

[68] 採訪江青秘書閻長貴筆記，2005 年 12 月 1 日

[69] 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2 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446 頁

[70] [71] [72] 採訪林彪秘書關光烈筆記，2000 年 9 月 9 日

[73] 參見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 2003 年 7 月版，424-425 頁

[74]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152 頁

[75] [76] 參見官偉勳著《我所知道的葉群》，中國文學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版，215、218 頁

[78] 採訪葉鎮筆記，2006 年 5 月 9 日

[80] 參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紀錄

[83] 參見張寧著《塵劫》，香港明報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版，328 頁

[86] 明嘉靖皇帝，虔誠道教，不問政事

[87] [100] [102] 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版，260-261、323、280 頁

[93] 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册，1988 年 10 月，85 頁

[95] 參見圖們、孔弟《共和國最大冤案》，法律出版社 1993 年 8 月，19 頁

[97] 參見葉永烈著《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453 頁

[98] 參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2002 年出版



林豆豆和當年空軍專機師的女兵一起回憶當年。

舒雲攝於1999年，北京



林彪侄子林欣然，連林豆豆都說，他非常像林彪。

舒雲攝於2005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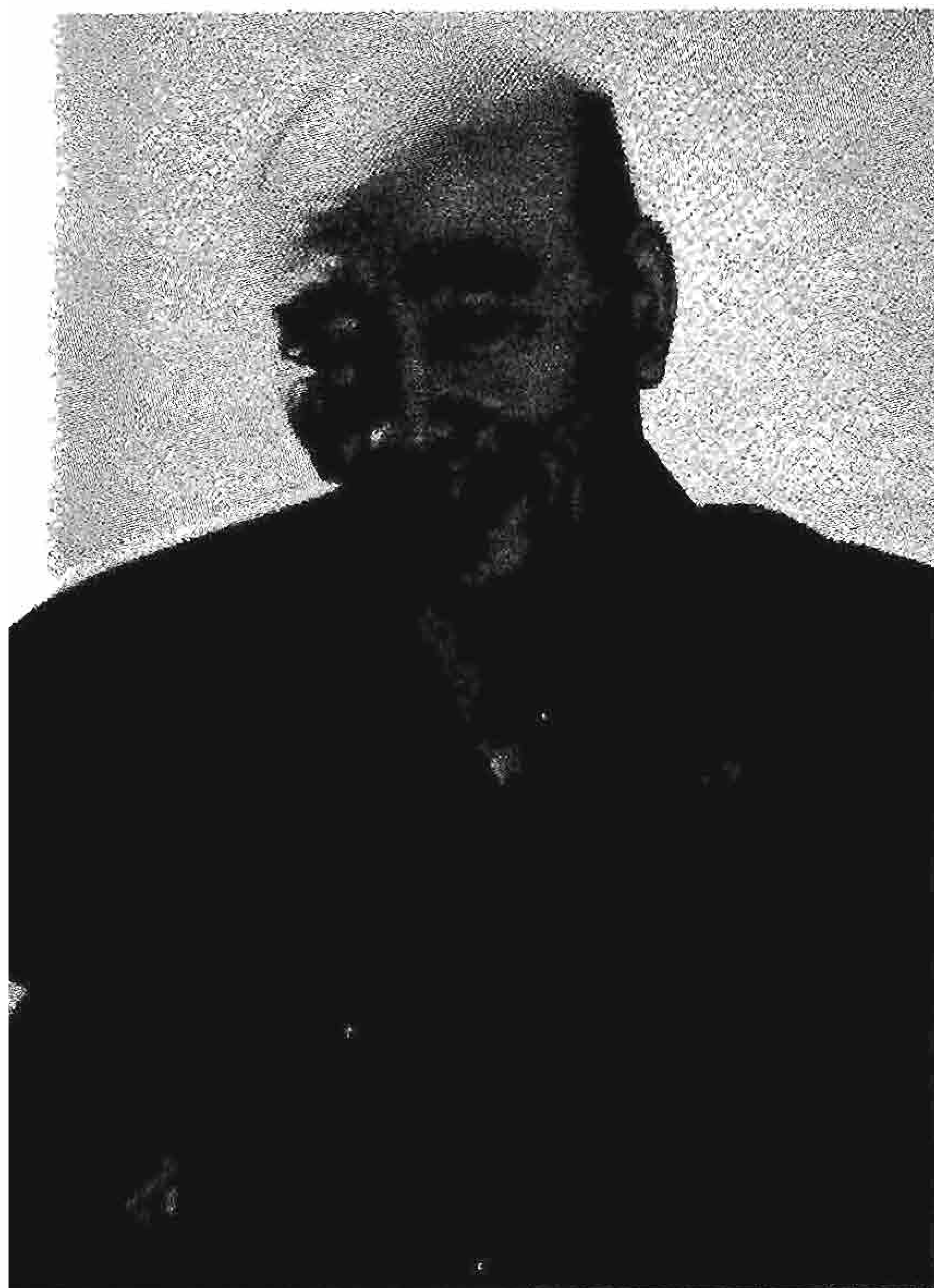






林彪侄子林欣然和我

舒雲提供，攝於1999年，北京北極寺



從廬山上下來，林彪一直想找毛澤東談談，但毛澤東不見他。為了能見上毛澤東，最不愛照相的他不得不去求江青，江青給他拍了這張照片，但最後還是沒有見上毛澤東。

林彪家人提供



這是1968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毛澤東和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看
火，那時，兩個人是多麼親密啊。

林彪家人提供





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他整理了父親的遺稿。

舒雲攝於2006年，北京東

第七章
廬山會議後

第六號簡報成了反革命簡報

廬山上的事情果然還沒有完。

九屆二中全會的“調子”越來越高，直到被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文件稱爲“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變”。

1971年1月24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指示，宣佈中央決定：將李雪峰、鄭維山兩同志調離原職，繼續進行檢查學習，接受群衆教育，待有成效後，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1月26日，鄭維山、李雪峰作了檢查。

4月，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

8月，毛澤東南巡時對“諸侯”說：你們對廬山會議怎麼看法？比如華北組第六號簡報，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爲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我說

的這些，是當作個人意見提出來，同你們吹吹風的。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做。[1]

1973年7月10日，中央專案組提出報告，華北組第六號簡報被戴上"反革命簡報"的帽子，華北組召集人李雪峰在劫難逃了。

從廬山上下來，李雪峰的秘書黃道霞連夜整理了一個材料，講明李雪峰爲什麼在廬山會議上對第六號簡報比較積極。黃道霞認爲李雪峰有個錯覺，認爲陳伯達、汪東興說的反對毛主席是天才，不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是康生，他並不知道他們反的是張春橋。李雪峰還奇怪，康生主持起草《憲法》，怎麼陳伯達與康生打翻了？當時黃道霞也是這個看法。

打倒康生，李雪峰當然積極，他與康生有點恩怨。"文革"開始康生找李雪峰的茬，李雪峰到北京新市委任職，與康生在工作組的問題上發生爭論，康生在北京大學講話要奉陪到底。1966年8月，康生和陳伯達寫了報告給毛澤東，講了很多，說應當撤了李雪峰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職。毛澤東把這個報告給李雪峰看，過了兩天果然把李雪峰撤了。毛澤東對李雪峰說：他們要撤，我認爲不要撤，你不要管事，名義上管一管，實際讓吳德他們管。這樣，李雪峰對康生有意見。黃道霞講這個背景，是爲了說明李雪峰對康生不滿，也說明陳伯達會前並沒有與李雪峰打招呼。不用多說，自然就否定了他們是反黨集團的說法。

黃道霞重點講，第六號簡報都是正常手續，没計劃没準備，上邊没弄清就批了。中央全會，各個組都要出簡報，但

毛澤東懷疑，你華北組已經出過一份簡報了，六個大組，一個大組出一份簡報，再排到華北組出第二份簡報最快也應該是第七號簡報，爲什麼第六號？明明是搶先，明明是陰謀。各個大組還没輪一遍，你華北組又搶先出了第二份簡報，而且一二三期簡報印出來了，四五號簡報編了號還没印發，你六號簡報就出了籠，不僅印出來，還發下去，這不是陰謀是什麼？

李雪峰因此被打倒。他據理力爭：簡報由中央辦公廳負責，是汪東興的事情，他們排第幾號就是第幾號。更何況我們没有著急，而是中央辦公廳催。

這中間或許是有陰謀，但是誰的陰謀？要說說清楚。黃道霞說：簡報由中央辦公廳機要局管，這還牽扯印刷，因爲在江西地界，人不能很多，怕失密。撿字只有一個工人，印刷兩三個人。所以四、五號簡報送了編了，但排字没排出來，所以就没發。而第六號簡報爲什麼"加塞"？毛澤東的懷疑不能說没有道理。有人假設了一個情況，李雪峰打電話讓第六號簡報快發快印。確實是有人給排字工人下命令，要快印第六號簡報。誰有這麼大的權力？誰能打這個電話？黃道霞證明，李雪峰絕没有打這個電話。當時在廬山上李雪峰和黃道霞住在一棟別墅，李雪峰住在裏間，黃道霞住在外間，李雪峰的裏間没有電話，電話在黃道霞的外間，發簡報的當晚李雪峰吃了安眠藥睡了，黃道霞也睡了，誰都没打電話，是誰打的這個電話？實際上很好查，一問排字工人就知道了。[2]

簡報印刷之類的會務工作是中央辦公廳的事情。但從目

前看，汪東興推得乾乾淨淨。

汪東興在檢討中說：我懷疑陳伯達事先看過修改過的華北組簡報，他利用簡報擴大到各組煽動欺騙人。我建議中央派人追查陳伯達，事先是否看過修改過這期簡報，這期簡報發出最早最快，而且簡報內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陰謀。毛澤東對汪東興說：第六號簡報要抓緊核實，你懷疑陳伯達看過改過，應找會議主持同志，還有王良恩同志和記錄印發的人，爲什麼不經你看過，發出最早最快？由總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實爲好。

汪東興說：關於第六號簡報，1970 年 8 月 24 日晚，25 日晨，王良恩兩次打電話給負責簡報的幹部，詢問簡報印的如何，要求快印快發。會議有明確規定，會上發言整理成簡報，要送本人看。廬山會議主席指示將這個簡報查一下，我給王良恩談過，他不查，說這個問題說不清。[3]

中央全會或工作會議，按慣例都要出簡報，刊登會議動態和各組討論情況，送毛、林及政治局委員，同時分發各省、市、自治區與會者。每期簡報有個總的編號，報頭同時說明是哪個組的第幾號簡報。凡是簡報上的重要發言紀錄，特別是政治局委員的發言，都要經本人過目，修改審定，據王良恩子女說：在九屆二中全會前，總理主持的預備會議上，規定各組討論後，只要有組長、副組長簽字，大會秘書處就可以出簡報。

于運深回憶：毛澤東認爲，中央辦公廳裏有壞人。[4]

中央辦公廳誰是壞人呢？

事後，王良恩檢討：我負責會議的簡報。當時我參加東北組會議，23 點到秘書組，我看了簡報。當時就聽到有些組氣氛較緊張，特別是中南組，葉群還發了言，引了語錄。我處理時應該謹慎，尤其有汪東興、陳伯達的發言，沒有送審，爲反革命第六號簡報的印發開了綠燈。

汪東興、張耀祠（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團長）的檢討過了關，王良恩的檢討卻沒有過關。王良恩是從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的位置上調到中央辦公廳的，年輕有爲、原則性極強，但他"侍候"上邊的經驗還不多。其實王良恩說不太清楚的問題並不多，也不是那麼嚴重，而且沒有他參與陰謀的證據。[5]

也可能是逼得太緊吧，王良恩在家中自殺，升級爲"林彪死黨"，1979 年底平反。

李雪峰秘書黃道霞談簡報"出籠"

第六號簡報是黃道霞寫的，不是李雪峰寫的，也不是李雪峰交代寫的。不錯，黃道霞是李雪峰的秘書，李雪峰的秘書中只有黃道霞上了廬山。上廬山的人數限制比較嚴，規定元帥只帶一個秘書，所以一個大區也只准帶一個秘書。黃道霞 50 年代在工業交通部研究室，實際上是辦公廳的秘書。李雪峰那時兼著工業交通部的部長，黃道霞經常跟著李雪峰出差，到了 60 年代，就正式做了李雪峰的秘書。但這次在廬山上黃道霞不是以李雪峰秘書的身分，而是作爲中辦簡報

組工作人員在華北簡報組工作。華北組負責簡報的有三個人，中央派了兩個人，一個是軍委辦公廳秘書王振，一個是吳德的秘書，加上黃道霞。當時吳德的秘書另有任務，林彪讓他寫"活學活用"的經驗材料。寫簡報的事情就是王振和黃道霞，王振是部隊來的，寫簡報是新手，他就推給黃道霞，華北組第一個簡報也是黃道霞寫的。

說到這兒，簡報到底誰負責就很清楚了，不是李雪峰的華北組，而是中央辦公廳。具體負責人是中辦副主任王良恩，王良恩的直接上級是汪東興。由中辦負責召集簡報組交代任務，提出要求。簡報寫好後，由中辦主任汪東興和中辦副主任王良恩最後簽字，才能付印。廬山會議前王良恩到周恩來那裏和汪東興一起研究過出會議簡報的事情，因會期不長，王良恩提議出綜合簡報，但周恩來和汪東興都主張分組出。在反映華北組討論情況的第六號簡報印發登記上，有組長李雪峰、副組長解學恭、吳德的簽字，也有王良恩履行的手續。但是沒有汪東興的簽字。

黃道霞講了寫這個簡報的過程。按照慣例，分組開會後各組都要搞出簡報。爲了及時反映會議動態，汪東興講要快發簡報。8 月 24 日午飯後黃道霞就開始寫，晚上還接著寫，寫了大半個鐘頭，寫完了。這麼趕，主要是黃道霞還想聽一聽 20 點的討論會。當晚的會議李雪峰沒有參加，他到政治局開會去了。開會前黃道霞把寫好的簡報交給他，李雪峰說先放那裏，等我開完會回來再看。那天晚上政治局的會議臨時決定不開了，李雪峰回到華北組，會議還在進行，黃道霞

把簡報給他。李雪峰問陳伯達的簡報稿送來沒有。下午發言後，陳伯達要發簡報，說快發快發，黃道霞編好了他的發言稿，陳伯達說還要再看一看，就拿走了。到下午會快開完了，陳伯達還沒有送回來，說還沒有改好。這樣，李雪峰又把簡報稿放下沒看，坐在那裏聽大家發言。會議一直開到 23 點多，黃道霞 19 點多寫好的簡報稿在李雪峰那裏壓了四個多小時還沒有簽發。

這說明李雪峰沒有陰謀，也不是趕時間趕快簽發。

華北組的會議結束，李雪峰、鄭維山、汪東興、謝學恭、吳德等都沒走，大家都是一肚子問號。李雪峰問汪東興：今天這事毛主席知道嗎？汪東興說知道，看樣子汪東興是不想答覆，他起身就走。吳德、謝學恭都在場，黃道霞也在場。

陳毅連連問汪東興：汪主任，汪主任，我是不是又犯錯誤了？汪東興說：沒你的事，老實呆著！汪東興的聲音很大，雖然散了會，但是好多人都聽到了。

鄭維山也忐忑不安，拉住汪東興。汪主任，事情有變啊？汪東興說：你這個鄭維山，再也不要糊裏糊塗了，同志你要知道，問題嚴重呢，我們林副主席眞是了不起，要不是他發覺得早，又一次出來捍衛主席，問題可就嚴重了。

那麼主席知道這件事嗎？

知道，不讓點名。

海軍大將蕭勁光看汪東興走，又追問一句：汪主任，這是怎麼一回事？汪東興半開玩笑半不耐煩地說了一句：你老糊塗，"筆桿子"壓"槍桿子"，厲害著哪。

說完，汪東興就走了。

汪東興走後，蕭勁光也走了，李雪峰、解學恭、吳德等幾人就去吃夜餐，黃道霞也去了。吃完夜餐，黃道霞還惦記著簡報，就問李雪峰簽了沒有。李雪峰又問陳伯達的簡報呢？黃道霞說：催了，秘書說還沒有弄好。李雪峰說：這個簡報我還沒看，學恭你年輕，眼睛好，你看一看。華北組副組長解學恭就看了，提了兩條。陳伯達的稿子另發，這一句勾掉，他還沒送來，就不提了，免得提了留個伏筆。他的稿子來了，他發他的就行了。

還有一個是陳毅在華北組有兩次發言，簡報上說了兩句。因爲大家都聽到汪東興說陳毅的話，解學恭就說簡報上別提陳毅了，把這兩句勾掉。李雪峰同意，黃道霞就勾掉了。簡報內容就是陳伯達和汪東興的講話實錄，本來簡報還要讓李雪峰再看看，李雪峰說沒帶老花眼鏡，反正是如實記錄會上的發言，你們就簽字吧。解學恭改了幾個字，先簽了，李雪峰也簽了，叫吳德也簽。吳德對李雪峰說，我就不簽了，我沒有參加會，具體情況也不瞭解，你們簽字就行了。李雪峰說：簡報是本著有文必錄的原則整理的，簽字付印是照例工作，最好三個人都簽字，你就簽一個吧。這樣，吳德也在簡報上簽了個“吳”字。華北組六個副組長，還有三個副組長沒有簽。黃道霞給陳永貴打電話時已經零點，陳永貴睡了，鄭維山也睡了，黃道霞就沒有再找吳濤，他把簡報親自送到簡報組，算完成任務了。

簡報送到中央辦公廳，連夜印好發了。這就是九屆二中全會的第六號簡報，也就是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後來被毛澤東定爲反革命簡報的出籠經過。

這麼一說基本把第六號簡報說清楚了，李雪峰對於簡報積極是積極，但第六號簡報並不是搶先，起碼拖了四五個鐘頭。黃道霞說他倒是有搶先的情緒，因爲根據簡報要及時的要求，是想快點發，但實際上並沒有搶先。周恩來在政治局會上表揚了黃道霞，說這個秘書實事求是，有黨性，他講的和我們分析得差不多。因爲是當時發生的事情，當事人都在場，誰也不可能編造，一問就一清二楚了。[6]

毛澤東不相信李雪峰的檢討

李雪峰在會上的檢討稿也是黃道霞寫的，在政治局會議上李雪峰對周恩來說，他心裏很亂，寫不出來，叫黃道霞幫我寫。周恩來同意，說你有什麼想法你說，讓黃道霞幫你整理。李雪峰檢討犯了錯誤，讓陳伯達在華北亂說亂跑，成了太上皇，上了陳伯達的當，陳伯達要發言，就讓他發言。除了反黨集團，除了預謀，李雪峰什麼都承認了。所有的與會者包括周恩來、江青都相信了，都認爲李雪峰說清楚了。到了“十大”，包括周恩來，甚至包括張春橋、姚文元都認爲李雪峰沒什麼大事，不應該劃爲“大將”。只有毛澤東一人不相信。南巡時毛澤東說：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

當時專案組副組長紀登奎曾對周恩來說：李雪峰的問題

是不是和毛主席說一說。周恩來說：你代表我們去說。毛澤東聽了紀登奎的求情，說不能原諒，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意思是李雪峰没說實話。黃道霞講完第六號簡報原由的第二天，紀登奎找黃道霞談話，他相信黃道霞講的，說簡報江青都看了，送給毛主席，毛主席不信。毛澤東還是想打倒李雪峰，還想劃成"集團"。這時，毛澤東也有點懷疑汪東興了，說你怎麼還在華北組？是不是在山下時他們就同你商量了？汪東興堅決否認。

第二次紀登奎代表江青又找黃道霞，說江青覺得你講得很好，但還要再深入一些揭發，有什麼遺漏？紀登奎問李雪峰爲什麼讓你回石家莊取材料。黃道霞說：時間太長李雪峰記不住了，擔心成他揑造的，所以要找當時的紀錄。叫我回石家莊去找有關的文件和檔案，但還没有來得及翻找，就叫尾隨的人將這些材料全部没收，並抄了李雪峰的家。

紀登奎認爲恐怕没這麼簡單，是準備翻案的吧？紀登奎讓黃道霞把會上發言的那些人，排個次序，都有誰發言，講了些什麼。這一次談話没談完，紀登奎的秘書說毛主席叫他，紀登奎就走了。第二天紀登奎又來找黃道霞第三次談話，這一次紀登奎的口氣變了，說毛主席認爲没那麼簡單。毛主席最大的不相信還是認爲第六號簡報有問題。後來開批判會，周恩來加了黃道霞的名字，叫他大會發言，進一步揭發。黃道霞很爲難，他已經把所知道的全在會上說了，再没有別的可說，只好大而化之，說了些階級鬥爭理論，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之類的空話套話，聯繫陳伯達在華北的活動，

應付過去。

這時候，陳伯達已經被拋出來了，明確說他是反革命。從廬山上下來，已經有揪林彪的苗頭了，李雪峰和黃道霞都明白，又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周恩來作結論，開了一個小會，十幾個有關人員參加，周恩來首先問黃道霞是哪一個？雖然見過多次，但印象不深。黃道霞站起來，周恩來問你有什麼意見？黃道霞說：對結論没意見，同意，還補了一句，我也有錯誤。周恩來没聽清，黃道霞又說了一遍：我也有錯誤。周恩來點點頭。這時已經決定讓劉子厚接李雪峰的班，李雪峰三個秘書，留在北京，那時黃道霞編制在北京軍區司令部，還穿著軍裝，他提出脫軍裝回河北。周恩來批，軍裝先不要脫。周恩來保黃道霞過了關。黃道霞以爲脫了軍裝，事情就算完了，現在不讓脫，也算完也不算完。因爲開始也不放過陳先瑞（北京軍區政委）、蕭文玖（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他們，第二、三把手有數的幾個，不可能不知道。黃道霞把簡報說清楚了，解脫了北京軍區的一大幫人。在周恩來眼裏，黃道霞有黨性，是立了功的。

陳伯達的問題株連到李雪峰和鄭維山。剛開始批判時李雪峰認爲，這是中央全會，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什麼意見，可以自由發言。直到後來，李雪峰也不服氣，明明簡報是綜合大家的發言，怎麼就成了他的問題了？但問題越搞越大，李雪峰也不由不緊張起來。[7]

周恩來叫吳德等人去幫助李雪峰。吳德認爲李雪峰和陳伯達没有特殊關係，李雪峰雖然到北京市工作還不到 70

天，但吳德知道他與陳伯達爲首的中央文革有對立情緒。但這個時候，誰也保不了李雪峰了，毛澤東讓李雪峰自己在會上檢討，李雪峰就把自己大罵了一頓，說我兩面三刀狼心狗肺……全是四六句，讓整簡報的人都沒辦法整。

1971 年 1 月 24 日，李雪峰被撤掉了職務，開除了黨籍，關到安徽的農場去了。[8]

鄭維山也被免了職，關了起來。

陳伯達爲什麼插手華北地區

其實上邊給了李雪峰好多機會，李雪峰沒有意識到。因爲本來沒有陰謀嘛，他不知道說什麼，也不知道怎麼說能說明白。如果在廬山上向毛澤東揭發陳伯達，或者毛澤東路過石家莊和毛澤東說了，恐怕都會好得多。

廬山上毛澤東說李雪峰你這個組長怎麼當的，路過石家莊時毛澤東已經懷疑陳伯達在第六號簡報中起了什麼作用。直到後來各地寫的揭發陳伯達和李雪峰關係的報告，李雪峰都有機會把自己“說清楚”，卻一而再、再而三地錯過了。最後到華北會議上說，已經晚了，再說就有變成集團的危險，只能不說。[9]

1970 年 12 月 16 日，毛澤東在中共陸軍三十八軍委員會的《關於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上批，陳伯達千方百計地突出自己，不擇手段地插手軍隊，搞宗派活動，妄圖亂軍、奪權。此件請你們討論一下，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討論爲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託他解決北京軍區及華北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10]

毛澤東最懷疑的就是陳伯達爲什麼和北京軍區勾結到了一起。

其實，李雪峰那時只要揭發陳伯達，就可能平安，但他實在不知道揭發什麼。[11]

1967 年毛澤東提出奪權，各省市的領導班子都推倒重來，建立領導幹部、軍隊代表和群衆組織代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全國除台灣外 29 個省市自治區，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進行了分工，張春橋、姚文元參與華東問題，康生參與內蒙、山西問題。陳伯達回憶：我負責天津、河北。後來山西和內蒙古沒有解決好，形勢不穩定，中央改讓我參與。

這就是陳伯達過問河北問題的起因。

陳伯達回憶：1967 年 12 月，中央開會研究，要我和李雪峰、鄭維山（北京軍區代司令員）到河北的幾個地方，爲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做準備。我們到了唐山、保定、石家莊，到邯鄲時，中央來電話要我回北京處理戚本禹的問題。我向中央彙報。考慮到天津已經恢復爲直轄市，而河北各地區中石家莊的形勢最穩定，生產情況也很好，是 1967 年全國惟一完成國家生產計劃的中等以上的工業城市，我建議河北省的省會可以遷移到石家莊。毛主席說，石家莊不僅是軍

事重地，還是交通樞紐，位置很重要，省會遷到石家莊好。

1968 年 2 月，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1970 年 7 月，陳伯達第二次華北之行，主要解決華北地區生產方面的一些問題，行前陳伯達在會上請示毛主席批准，又同周恩來商定先到天津，再到石家莊，後來發展到山西、內蒙古，沒有預先請示，是犯了罪的[12]。一路上，李雪峰、劉子厚等一直陪同陳伯達，邊視察邊商談生產方面的事。天津市領導解學恭和劉政（六十六軍軍長）陪陳伯達到了石家莊。

在太原，陳伯達參觀了太原鋼鐵廠、太原重型機器廠等，與一些幹部座談生產存在的問題。謝振華（時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六十九軍軍長兼省軍區司令員）負責接待。

離開太原，陳伯達、解學恭、劉政、謝振華一行乘火車到大同，李雪峰乘飛機從石家莊趕來，一起視察大同煤礦，並下礦井瞭解工人的生產情況。陳伯達一直走在前面，井下很窄，爬著走了一段，陳伯達坐下來休息，對李雪峰說，雪峰啊，把你拖垮了，對不起了。

離開大同，他們乘火車到包頭。叫來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一起視察了包頭鋼鐵廠和白雲鄂博鐵礦。在北京軍區領導的建議和安排下，他們觀看了當地駐軍的小規模軍事技術表演，陳伯達並對部隊簡短講話，主要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戰備工作，防備蘇聯入侵。

7 月下旬，陳伯達給中央寫了一封彙報信。因為東北入關的客流、貨物經常要繞道北京，北京鐵路壓力很大。建議從天津至保定或天津至石家莊，修建一條鐵路。[13]

毛澤東南巡在杭州談話時說：北京軍區隊伍多，有幾個軍，還有炮兵、工程兵，裝甲兵也多。他們整這個軍、那個軍。陳伯達在華北幾十天，周遊華北，到處遊說。[14]

毛澤東在杭州的另一次談話中說：他們先整了二十四軍，又整了二十一軍、六十九軍，最後整了三十八軍，有的採取了組織調整的辦法。二十一軍調到陝西時，胡煒（二十一軍政委、軍長，後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陝西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書記）就講這下可好了，脫離了他們的指揮。都高興離開北京軍區。對六十六軍就說不服，他們的前軍長就頂住了，就是不讓他們鑽到天津革委會裏去。北京衛戍區他們就插不進去，因為有謝富治、吳德、吳忠，不聽他們那一套。[15]

華北之行完全是工作，李雪峰沒有發現陳伯達搞什麼陰謀。那為什麼同行的軍人這麼多？因為重新奪權後，各省市的第一把手多是軍人，當然軍人多了。但他們不是代表軍人，而是代表地方。如此這般，李雪峰怎麼能揭發出來？

陳伯達反黨集團只剩下一個人

李雪峰的檢討為什麼過不了關？想了很久，黃道霞總算明白了，毛澤東要求李雪峰講清楚和陳伯達的關係，陳伯達為什麼"抓"軍隊？當時要在李雪峰的檢討上多寫幾句就好了，但黃道霞給李雪峰設計的檢討完全沒寫這個。

當時捅破這個很容易。可是黃道霞自己不能說，他一說，就成了揭發。而李雪峰可以說，當然後來說就晚了。那時只有一個機會，知道江青、康生打三十八軍的主意，趕快起來揭發陳伯達。可是清清白白的李雪峰哪裏想到這麼多，錯過了這個機會，到三十八軍的報告被毛澤東批了才意識到這個形勢，早就晚了"三秋"了。

黃道霞回到河北爲劉子厚寫檢討時，才恍然大悟，你要符合毛澤東的意思，爲什麼跟著陳伯達跑？講明白了這一點，就能順利過關。所以黃道霞寫李雪峰緊跟陳伯達，劉子厚緊跟李雪峰，還寫了陳伯達說分工河北就相信了，陳伯達在河北指手劃腳，認爲是爲河北好，相信是爲解決河北的派性，一碗水端平，解決河北的武鬥問題。毛澤東對劉子厚的檢討是滿意的，認爲他的檢討很好，說了一點心裏話。毛澤東批了"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一段。而對於李雪峰的檢討，毛澤東抓住一點，李雪峰沒說這個，沒說心裏話。[16]

3 月 30 日，毛澤東在劉子厚的檢討上批示：上了陳伯達的賊船，年深日久，雖有廬山以來半年的時間，經過各種批判會議，到 3 月 19 日才講出幾句眞話，眞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人一輸了理（就是走錯了路線），就怕揭，廬山會議上的那種猖狂進攻的勇氣，不知跑到哪裏去了[17]。3 月 31 日，周恩來將毛澤東對劉子厚的批示作爲急件派專人送軍委辦事組，並批告傳閱。[18]

毛澤東南巡時說：我是哪裏有石頭抓起來就打，在廬山陳伯達搞的那個騙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塊石頭，濟南軍區

三破三立的報告也是一塊石頭，三十八軍的報告是一塊大石頭。以後又有劉子厚的檢討。[19]

檢討過關了，劉子厚被任命爲河北省委第一書記。[20]

而李雪峰卻沒有這樣幸運，九一三事件後他先被軟禁在家中，10 月底被押到安徽六安。1976 年懷疑胃癌，1979 年 1 月，經中央同意回北京治病。李雪峰提出申訴，要求重新審查。1981 年 4 月，面對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調查人員，李雪峰情緒激昂，一連說了 8 天，爲什麼說我奪了華北局的權？爲什麼第六號簡報的責任要加在我的頭上？出簡報是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具體掌握，我李雪峰有什麼權力搶先發佈？簡報寫的是小組會上的發言，我自始至終沒有發言，爲什麼把我劃入陳伯達反黨集團？爲什麼把我劃到林彪反黨集團？爲什麼開除我的黨籍？爲什麼剝奪我的工作權利？……[21]

在華北會議上，北京軍區政委陳先瑞雖然沒有免職，但作爲鄭維山的同夥，也受到面對面的批判，多年他一直在思考三十八軍的報告和毛澤東"太上皇"的批示。陳先瑞認爲陳伯達在北京軍區的影響很小，毛主席對他的活動爲什麼估計如此之高，作出如此嚴厲的批評？顯然包含著對軍隊、特別是對北京軍區領導幹部的不信任。[22]

在當時"左"的思想指導下，列舉的種種"罪行"以及揭發批判多有不實。李雪峰、鄭維山工作上有缺點、錯誤，但與陳伯達是一般的工作關係，說他們參與陳伯達的反黨活動是沒有根據的。話又說回來，陳伯達又何嘗進行過反黨活動？

1982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恢復李雪峰同志黨籍的決定》。1973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決議（中發[1973] 34 號文件）：根據調查證明，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印發的華北組簡報（主要內容是擁護林彪的講話），是按照當時會議的規定，由記錄人員根據華北組同志的發言，如實整理的。簡報寫出後，經華北組負責人李雪峰、吳德和解學恭同志共同簽閱，大會秘書組印發的。因此，不能說華北組的簡報就是林彪、陳伯達指使李雪峰炮製的。因此決定，撤銷 1973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央專案組《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中，把李雪峰定爲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永遠開除黨籍的決定。恢復李雪峰同志黨籍。

1983 年 4 月，李雪峰被選爲六屆政協常委，1985 年 9 月被選爲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1 年離休。

在當時的中共中央文件被定爲陳伯達反黨集團文武二將的李雪峰、鄭維山，“文革”後先後平反，陳伯達反黨集團只剩下陳伯達一個人。

九一三之夜，在押的陳伯達被半夜轉移到監獄。

這時，陳伯達反黨集團變成了林陳反黨集團。1972 年 1 月和 7 月經毛澤東批准下發的“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將林陳反黨集團改成林彪反黨集團，陳伯達被降爲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

陳伯達回憶：從廬山回到北京，連著幾個晚上，爲排遣苦悶，我到郊外散步。隨後就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理由是國慶日將到，怕碰見外國人。從此我被軟禁家中。幾天後，我的秘書王保春和王文耀也關起來了，五年後才釋放。我的司機俞子雲也被關了三年。上小學的兒子與保姆被關到衛戍區，關了三年。

陳曉農（陳伯達兒子）回憶：父親被軟禁在家中近一年，沒有任何人向他調查廬山會議的情況。九一三事件後關進秦城，也沒有人專門問他與林彪的關係，或讓他揭發林彪。過了很久，郭玉峰（中央組織部部長）等專案負責人才草草地審問了一次。[23]

九一三事件後，陳伯達被定爲林陳集團的主犯。

可是，1980 年審判時陳伯達卻成了江青集團的主犯。

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點了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反面人物的名字，沒有點陳伯達的名。

1989 年 9 月 20 日，85 歲的陳伯達默默去世。

汪東興的五次檢討

汪東興在廬山上“跳”得那麼高，他是怎樣順利過關的呢？

檢討都是檢討，但檢討的層次和規模大不一樣。陳伯達是在中型會議也就是所謂各大組長各省負責人的會上作了檢討，重點是批陳伯達，同時也批吳法憲。在陳伯達檢討的這個中型會議上，汪東興沒有檢討，汪東興檢討的範圍很

小，就在六七個人的華北組正副組長會上作了檢討。張春橋也在會上做了檢討，因爲事先打過招呼，也叫張春橋草草檢討幾句。傳達他們的檢討也是有區別的，陳伯達和吳法憲的檢討被各組組長傳達到每一位與會者，而張春橋的檢討沒傳達，所以很多與會者並不知道張春橋的檢討。

汪東興回憶：毛主席和我談話後，我認識到自己犯錯誤了，就考慮寫檢查報告，周總理也提出這個問題，說你爭取第一個檢查吧。8 月 27 日，我寫好第一份書面檢查，檢討了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做法。我沒有聽毛主席的話，我干擾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也違反了政治局會議的意見，這是無組織無紀律的行動。我的內心極感沉痛，要接受這次教訓。毛主席看過我的書面檢討後，說這個檢討書可以發到全會上。經周恩來批閱，在全會印發。我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華北組討論會上做了一次口頭檢查，內容和書面檢討差不多。[24]

從廬山下來，毛澤東問汪東興，你在想什麼？汪東興說：我在想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問題。毛澤東高興地說：這好嘛。汪東興說：在山上開會，忙於會務，沒有時間想自己的問題。現在有空閒時間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毛澤東說：這樣好，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你的心是好心。

雖然毛澤東保了汪東興，但汪東興仍感到不安，他不能等到被打倒，要爭取主動。第一次檢查還不深刻，認識也是初步的，當時對許多現象的本質問題都還沒有認識清楚。1970 年 9 月 15 日，汪東興給毛澤東寫了第二次檢討。

在這次檢討中，汪東興大批陳伯達，說我沒有識破陳伯達。他的手段特別陰險、惡毒，利用九屆二中全會搞突然襲擊，造謠和詭辯，欺騙不少同志。他打著論天才的旗號，其實要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奪毛主席的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我在九屆二中全會中前三天被陳伯達利用欺騙，在華北組他突然的又是有計劃的發言，利用我的無能，而我心情非常激動，又不加分析，更不顧自己的身分，就起來發言，結果當了陳伯達壞人的炮手。……由於我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遇事易激動，缺乏冷靜的考慮分析問題，……因此遇到陳伯達這樣的陰謀家、野心家，我不僅沒有識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毛澤東看過後表示滿意，批示此件請汪東興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關同志一閱，進行教育，詳由東興面談。在第一頁信紙的左右空白處，毛澤東批：陳案另是一個問題，應弄清楚。

9 月 16 日晚，毛澤東讓吳旭君（護士長）通知汪東興去談話。毛澤東說：你寫的信我看過了，信中對問題的認識很好，接受教訓。我看有些同志還不通，上了當，現在不通，慢慢總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馬列主義，自己都沒有看過馬列主義這一方面的書，發言時又要引用。我看還是要進行教育，還是要 250 多人（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指定讀點馬列主義的書，30 多本太多，可在 30 本書內選些章節出來。此事請總理、康老辦。我還可以提選一些。不讀馬列主義怎麼行呢？不行的。結果就被陳伯達擺弄了。毛澤東

說：軍委辦事組內有幾位同志也上當了。發言時一個口徑，用一樣的語錄，連林彪也受他們的騙。……我勸林彪應好好地想一想，表一個態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後表態也可以。要他們不要再上陳伯達的當了，有錯誤就改正。毛澤東一邊抽煙喝茶，一邊慢慢與汪東興談：你說他們在各組一起動作、煽動，他們幾個，還有黃永勝報名要發言，都用了語錄，但他們的簡報未發，一說不行了，記錄就收回，這當中好像是有點名堂，你清不清楚？汪東興說我不清楚。毛澤東問：你跟我出來了，他們在北京是否在陳伯達處商量過？汪東興還說不清楚。毛澤東若有所思地說：誰知陳伯達住在何處，有何活動？誰能知道？我在簡報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發言中說，懷疑他們都在 24 日下午發言，是統一部署的。[25]

9 月 22 日，周恩來看到毛澤東 9 月 21 日對汪東興書面檢討的批件後，同康生到林彪那裏，將毛澤東的批件送給他看，提議黃吳李邱在一起閱讀該件，在他們想通了後，應給主席、林副主席寫一個書面檢討，揭露事實眞相，與陳伯達完全決裂。周恩來指出：這樣做，對黨對己都極有利，林彪同意由周恩來、康生約黃永勝等談話。[26]

9 月 29 日，周恩來、康生到毛澤東處談話。毛澤東說：汪東興的檢討是汪東興自己要寫的，別人沒想通，不忙寫檢討；這些人的錯誤與陳案性質不同。[27]

吳法憲看了汪東興的書面檢討和毛澤東的批示，寫出第一次書面檢討。

吳法憲寫給毛澤東的檢討信

康生向林彪彙報：這次會議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哄，陳毅跳出來。林彪說：吳法憲這個人我瞭解，從紅一軍團到四野跟我幾十年，沒有發現他造過謠。並私下對吳法憲說：你沒有錯，不要檢討。[28]

葉群藉口有病，不見任何人，卻幾次打電話給吳法憲：你爲了捍衛主席思想，主觀動機是好的，不要檢討。後來看不檢討過不了關，又說：你犯錯誤不要緊，只要不牽扯首長和黃總長，大鍋裏有飯，小鍋裏好辦。林總在主席那裏說話了，你的職務不會動。黃永勝對吳法憲說：林總講你没有說假話，你就要頂住，不能承認說了假話。不然，林總的話就站不住了。李作鵬和邱會作也多次幫助吳法憲，檢討中不要涉及葉群和我們，不能過線。叫他檢討時照稿子念，不能多說一句，說漏嘴就麻煩了。

吳法憲回憶：周總理勸我爭取主動儘快寫檢討，爲林彪講話承擔責任。周總理說，現在要保副帥，這是由副帥講話引起的。法憲，你出來做個檢討，承擔責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帥頭上了。周總理並給我出主意，在檢討中要重點寫自己對林彪講話"理解錯了"。全會轉入批陳伯達，西南組把矛頭對準吳法憲。周恩來親自坐鎮，凡是涉及到吳法憲的地方，都以"主席指示要重點批陳"爲由擋回去。甚至稍後毛澤東爲批陳伯達而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原先有一段涉及到吳法

憲的內容，也經周的進言後給刪掉了。

周恩來在追查中，示意吳法憲應該在政治局決定全會討論林彪講話的問題上替他講幾句話，還一再要吳法憲證明他當初曾批評黃永勝不願留守北京，非要上廬山這件事。以便讓毛澤東知道他並沒有上林彪這條船，事先並不知情，而是有過鬥爭。[29]

9 月 29 日，吳法憲檢討。直到看到了葉群的檢討，10 月 14 日毛澤東才批：此件已閱，我願意看見其他"宣講員"的意見。

吳法憲檢討中說：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我犯了嚴重的錯誤，干擾了主席，干擾了主席親自主持的二中全會。破壞了主席教導的要把全會開成團結的會，勝利的會的方針。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是一篇最精闢的馬列主義的光輝文獻。一針見血，深刻揭露了陳伯達的反動本質，學習後，我受到了極大的教育，使我猛醒過來，認清了陳伯達這個野心家、陰謀家、僞君子、假馬克思主義者的眞面目和他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妄圖分裂黨，奪毛主席、黨中央權的罪惡陰謀，明白自己上了大壞蛋陳伯達的當。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中引用的論天才的材料，沒有查證核實，沒有同對方正式商量交談，又沒有準備稿子，由於我有錯誤的認識和錯誤的情緒，話匣子打開後，越講越多，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在莊嚴的二中全會上講這樣關係全局的原則性的大問題，事先沒有請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請示報告，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毛澤東

在後一句下劃杠：作爲一個共產黨人，爲什麼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 200 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

我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不從全局考慮，不顧影響，不考慮後果，這是極不嚴肅、極不愼重的不負責任的態度。（毛澤東劃杠：這些話似乎不眞實。）

這次九屆二中全會，揪出了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反黨分子陳伯達。（毛澤東劃杠，是個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會議揭發過。又同個別同志（林彪）打過招呼。）

陳伯達 1970 年 8 月 26 日打電話給我，說主席要陳伯達找我和李作鵬、邱會作談談。談話中陳伯達說到主席批評了他，還說主席也批評了你們。我們問他，主席批評了什麼，他不肯說。當時陳伯達神態異常，說話支支吾吾。（毛澤東劃杠：無非是想再騙你們一次，企圖挽救他自己。）

陳伯達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曾問我講過有人利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這句話沒有。（毛澤東在偉大謙虛下劃杠：什麼偉大謙虛，在原則性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要敢於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廬山，我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我在 1970 年 8 月 27 日晚上看到陳伯達在發言稿上"造謠說"，中央委員會也有鬥爭。（毛澤東劃杠：這句話沒有錯，中央委員會有嚴重的鬥爭。有鬥爭是正常生活。）

陳伯達 1970 年 8 月 24 日晚上打電話找我，要我的秘書轉告，陳伯達想把他對《憲法》的修改意見劃一份出來送呈

主席看。吳法憲告訴秘書，不要答覆他。（毛澤東在不要答覆他下面劃杠：這樣對。）

（毛澤東批：林、周、康及其他有關同志閱。閱後存中央辦公廳。）[30]

10 月 15 日、16 日，周恩來同康生到林彪處，將毛澤東對吳法憲、葉群檢討的批示件送給林彪，並根據毛澤東意見，同林彪商量約黃永勝等人談話。

葉群給毛澤東的檢討信

張雲生回憶：葉群從廬山上打電話回毛家灣找姜思毅後，一連七八天廬山沒有消息。過去葉群差不多每天都要打一兩次長途，要這問那，而這回，葉群像變了啞巴，廬山其他工作人員也像斷了線的風箏。秘書郭連凱不住地在辦公室念叨，怎麼搞的？一個多星期了，廬山那邊怎麼一次電話也不來？出什麼事了嗎？我雖然不像老郭那樣焦急，但也覺得情況有些反常，莫非真的出了什麼事？我們正疑惑，廬山來電話了，李春生說首長讓查典故，別的電話上不好講。于運深來電話，說這是件好事，具體情況你別在電話上問，我也不好說，等回去後再講吧。9 月初一天夜裏，林立果打開保密機，挑明了，我告訴你，廬山這裏出事了！主任煽風點火，惹了一場大亂子。陳伯達帶頭跳出來，被主席抓住，已經挨批了。黃吳李邱汪都在會上做了檢討。他媽的，都是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車，我打心裏高興，但他媽的這個代價太大，

連首長的聲望也受到了損失。……不管怎樣，主任今後再也神氣不起來了。……還暴躁個屁，林立果幸災樂禍，她現在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在首長面前，她總是哭鼻子。這怪誰？都怪她自己！首長事先不知道嗎？首長不知道，但也不能說首長沒有一點責任。由於主任惹了亂子，首長還在會上做了幾句自我批評。最後主席保了首長。現在是集中批陳伯達，但陳伯達的後台是主任。林立果讓我把這些話轉給姐姐林豆豆。

葉群終於從廬山上來了電話，二中全會的主要精神是號召加強學習，讓黨的高級幹部多懂點馬列，主席還叫我多學點哲學。爲了抓緊學習，葉群讓毛家灣收縮。只留一兩個幫助看馬列書的就夠了，其餘幫助工作的人一律打發回原單位去。在外面找人的人，也一律撤回來，免得分散精力。

沒幾天，林彪辦公室幫助工作的人員樹倒猢猻散。[31]

10 月 13 日，葉群給毛澤東寫了檢討信：我這次犯的錯誤是嚴重的，是路線性的。（10 月 15 日，毛批：此件已閱。在“是路線性”下劃杠：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葉群寫道：黃永勝、吳法憲 1970 年 8 月中旬給林彪和她打電話，反映中央修改《憲法》小組會上關於“天才”問題的爭論情況，在北戴河時連續接了幾個這方面的電話，他們當時是出於熱愛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澤東在“連續接了幾個這方面的電話”下面劃杠：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

葉群寫道：主席講過，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毛澤東在後一句下劃杠：這是馬克思的話，我不過是復述一遍而已。）

葉群寫道：主席講過矛盾以揭露爲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掩蓋矛盾是不符合辯證法的。由於自己沒有提到政治原則和組織原則來認識這個問題，總以淺淺之見勸林彪同志不生氣，和稀泥，力求息事寧人，結果幫了倒忙。（毛澤東在引文和結果幫了倒忙一句下劃杠：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九大"勝利，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雲外，反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佔了上風了。請同志們研究一下，是不是這樣的呢？）

葉群寫道：據最近揭發材料，陳伯達可能是個叛徒、內奸、裏通外國分子；他 1970 年 8 月 23 日未打招呼就來見林彪，現在看來他這次闖來是別有用心的，是想乘機搞陰謀的；陳伯達的老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堅決拒絕參加嚴慰冰專案組的工作，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毛澤東劃杠：不上當是不會轉過來的，所以上當是好事。陳伯達是一個十分可疑的人。）

葉群寫道：由於自己路線覺悟政治水平低，對陳伯達的反動本質認識不足，警惕不夠，因而過去對他的鬥爭是不夠有力的。（毛澤東在後一句劃杠：鬥爭過嗎？在思想上政治上聽他的話，怎麼會去同他鬥爭？）

葉群寫道：今後我一定要努力活學活用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學著作），並按主席教導認眞讀幾本馬、恩、列、斯著作。（毛澤東在後一句劃杠：這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共產黨人不讀一點馬、列，怎麼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擔負高級職務的人。）

最後毛澤東批：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伯達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32]

可以看出，葉群的檢討是想丟車保帥。

林彪爲什麼讓江青照相

1970 年的廬山會議又步了 1959 年廬山會議的後塵。

毛澤東最怕的就是身邊的"赫魯曉夫"。第一次廬山會議，一摸底，彭德懷的講話得到大多數將帥的支持，認爲是"軍人俱樂部"，決定了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命運。第二次廬山會議黃吳李邱"四大金剛"，又是一個"軍事俱樂部"，決定了彭德懷的繼任國防部長的命運。兩次廬山會議有著極其相似的背景，都是先開"神仙會"，都是國防部長"跳出來"，都是整個中央委員會一邊倒，都是毛澤東突然"反潮流"。 整個形勢急轉直下，不要說中央委員們感到突然，就是兩位國防部長本人也感到突然。

從廬山上下來，毛澤東一直在等待林彪檢討。

毛澤東就是喜歡別人檢討嗎？

李文普回憶：林彪個性很強，從不服軟，與毛主席的關係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林彪下了廬山，先去北戴河住了幾天，然後轉回北京。1971 年 2 月，林彪到蘇州養病，5 月，回北京開會。[33]

林彪穩坐在颱風眼的中心，絲毫沒有檢討的意思。

李文普回憶：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曾讓新調來的秘書王煥禮幫忙寫檢討。[34]

于運深回憶：我不知道林彪要檢討的事。[35]

王煥禮是新調來的秘書，不負責“講文件”，林彪有事也不找他。如果王煥禮替林彪寫檢討，十有八九也是葉群的主意，她打著林彪的旗號行事，林彪知道不知道還是個問題。

總之，林彪一直沒有拿出檢討。

11 月 13 日，毛澤東嚴厲批評了黃永勝：一天到晚不抓大事，不參不謀，什麼總參謀長，打起仗來，我就是總參謀長。這一段時間，毛澤東連續批評軍隊，要反驕破滿，糾正不正之風，利用冬季實行長途野營拉練，稱如不這樣訓練，就會變成老爺兵。

但毛澤東南巡中反復說：對林彪還是要保，還是教育的方針。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36]

怎麼是林彪不找毛澤東呢？

李文普回憶：實際上林彪還是很想與毛主席好好談談的。給毛主席那邊的電話一般是葉群打，“林辦”有傳聞，林

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見毛主席，談一談，但是毛澤東長時間不作答覆。林彪見不上毛澤東，過去是沒有的。過去林彪只要說見毛澤東，毛澤東都要見。[37]

而廬山會議後，毛澤東爲何不見林彪？

“林辦”另一位秘書說：據我們所知，林彪找毛澤東好多次，就是見不上，後來沒辦法，才不得不去“討好”江青。他最討厭江青，甚至當面大罵過她。平時儘量躲著。但這個時候走了“麥城”，沒有辦法，因爲林彪想通過江青去見毛澤東。

楊銀祿回憶：6 月 9 日，江青在釣魚台精心佈置了一個照相室。特邀林彪、葉群到釣魚台照相，林彪並沒有思想準備。“林辦”秘書回憶：林彪想見毛主席，所以才耐著性子任江青擺佈，否則他早“炸”了。

林彪一向討厭照相，但此時在人屋簷下，不得不低頭。走得太急，臉都沒刮。楊銀祿回憶：江青把林彪帶到 10 號樓刮鬍子，林彪說：年齡大了，有鬍子沒有關係。葉群連忙勸說：江青同志親自給你照相，不刮鬍子不好，刮了顯得年輕，精神煥發。江青也勸說：你是黨的副主席，解放軍的副統帥，照的相應有領袖氣派。林彪勉強同意，借江青秘書的刮胡刀刮了刮臉。

江青提出要林彪把帽子摘掉照“免冠照”，看樣子林彪不想摘帽子，但是在那種場合又不好說什麼，只好把帽子摘掉，扔給工作人員。江青又突然提出要林彪捧著《毛澤東選集》做出看書的樣子，並命令工作人員跑回 10 號樓把她的《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拿來，讓林彪拿著。林彪被幾個

大燈泡烤得滿頭大汗，江青遞給他一條毛巾擦了擦汗水。好不容易擺弄好姿勢，江青終於按動了快門。

可江青的“痲煩”還沒有完，第二天晚上還叫林彪去照。林彪煩了，葉群反復勸，這才算照了那張題爲《孜孜不倦》看“寶書”的大照片，發表在 8 月 1 日出版的《人民畫報》和《解放軍畫報》7、8 期合刊上。照片拍了，但能不能見上毛澤東，江青說了不算，最後林彪還是沒能和毛澤東面談一次。[38]

1970 年的晚秋，毛家灣以前那種鬧市般的場面不見了，被“收縮”後的荒涼氣氛籠罩著。葉群雖然還“活躍”，但也“變”了。50 多天沒在毛家灣露面的葉群像換了一個人，逢人便笑，比過去多了一些人情味，也比過去“謙虛”了許多，不再發脾氣。葉群對沒上山的秘書說：首長去開會，我只是做個助手。這個助手可不容易當啊！這次上廬山，首長原來準備做一次長篇大論的講話，我就勸他少發議論，而應請主席多講一點。有的人在會上亂放炮，結果就出問題了。我一直比較謹慎，結果就比較主動。主席在這次會上號召加強學習，特別是高級幹部要多讀一點馬列原著，學一點哲學。我以前就積極幫助首長學習，證明這樣做就對了。不學習，多危險啊。

葉群以爲秘書們還不知道。

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一直稱病不出。張雲生回憶：本來就沉默寡言的林彪更是沉默，很少會客，也不願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談什麼，除了聽于運深“講”中央的傳閱件外，幾乎

不聽其他文件。有時看場電影，但只讓李文普從中外的故事片中選些近戰的鏡頭。平時不是出去轉車，就是獨自一人在室內踱步。[39]

10 月 1 日，40 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21 周年，毛澤東登上天安門，林彪代表毛澤東、中共中央在慶祝大會上講話。葉群檢討了一個多月，一直灰頭土臉。毛澤東批准她上天安門亮了個相，這才算勉強出來。國慶日後那幾天，葉群的情緒又見“高漲”，原因是她在天安門城樓上見了毛主席，回來後得意地說：主席對我很關心，還鼓勵我多看點馬列……

但此後，葉群不再天天往釣魚台跑，也很少出去活動。

在得到毛澤東南巡講話後，葉群又開始“討好”江青。

楊銀祿回憶：9 月 8 日，葉群從北戴河給江青打電話，格外熱情，林彪同志問候江青同志，請江青同志保重。林彪同志今天給江青同志送去幾個大西瓜，請江青同志嘗嘗。江青看了電話紀錄，也立即叫秘書回電話，請林副主席放心，我現在身體還好，感謝林副主席的關心，也請林副主席保重身體。[40]

西瓜由林彪司機楊振剛的妻子王蘭多帶回北京。

楊銀祿回憶：9 月 12 日下午，江青特意帶上林彪、葉群送的四個大西瓜，到頤和園遊玩。她十分得意地對那裏的幹部、職工說，你們看，這幾個大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給我的，我再送給同志們，這是林副主席對我們的關心，讓我們大家一起感謝林副主席。[41]

當晚，在葉群接到周恩來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彪的電話前，留守毛家灣的秘書于運深電話請示，別人送的幾隻王八怎麼辦？葉群特意關照送給江青。當然沒有送成，葉群出逃了，毛家灣當晚就被圍了起來。[42]

毛澤東的“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角”

廬山會議後，到九一三事件前，一年多一點的時間，林彪沒有動靜。只是在1970年國慶在天安門上露了個臉，念別人寫好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1周年的講話》。這個講話和九屆二中全會公報一樣，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套話，看不出別的。快結束時，林彪說：我們要用各條戰線上的新勝利，迎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43] 兩報一刊國慶社論也提到：在國內外大好形勢下，毛主席親自主持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總結了黨的“九大”以來取得的成績，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各項任務，提出了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建議。[44]

九屆二中全會開成那個樣子，怎麼有心思開四屆人大？

果然四屆人大的召開，拖到了1975年1月。

而毛澤東從廬山上下來後，採取了一系列戰略部署，超乎尋常的活躍。

1970年9月9日，毛澤東從廬山下來，專列先到了長沙，毛澤東在專列上與華國鋒談話。9月15日專列到武昌，

毛澤東與劉豐等人談話。專列在路過河北時，毛澤東專門與李雪峰談話。之後，毛澤東回到北京，把他的批示和汪東興的檢討傳達給政治局。吳法憲9月29日寫出第一份檢討，但直到10月12日看到葉群的檢討後，毛澤東才在吳、葉的檢討上批了很多很重的話。[45]

10月毛澤東還在貴州省關於“三支兩軍”問題的報告上批示，提出要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

11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級幹部學習問題的通知》，傳達了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關於黨的高級幹部要擠出時間讀一些馬列主義著作的指示。

11月16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並印發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要求各單位要由主要負責同志親自傳達陳伯達反黨的問題。陳伯達歷史複雜，是一個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審查他的問題。各單位在傳達時，要號召瞭解他的情況和問題的同志，進行檢舉和揭發，並將揭發材料妥送中央。[46]

12月16日，毛澤東對三十八軍黨委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批示。[47]

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48]

12月19日，毛澤東對周恩來關於開好華北會議的請示報告批示，建議黃永勝、李作鵬應同李德生、紀登奎二同志參加會議。[49]

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6日，按照毛澤東指示，在北京召開以揭露陳伯達罪行爲主要內容的華北會議，除毛澤

東、林彪外，政治局成員都參加了，周恩來代表中央參加。到會的有北京軍區、華北各省軍區、北京衛戍區、天津警備區及華北地區有關單位負責人共 449 人。從 1 月 9 日起，出席中央軍委座談會的 143 人也參加了華北會議。[50]

毛澤東批示“軍隊要謹慎”後，林彪批示：現在更要特別注意謙虛謹慎。1971 年 1 月 8 日，毛澤東對濟南軍區政治部 1 月 5 日給中央軍委和總政的《關於學習貫徹毛主席“軍隊要謹慎”指示的情況報告》上批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講清了問題。請你們看一下，是否可以轉發全軍。如同意，請總理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宣讀、討論、通過，並加上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軍委總政治部的幾句指示，即可發出。除軍隊外，中央機關和地方黨、政機關也要發出。我軍和地方多年沒有從這一方面的錯誤思想整風，現在是進行一場自我教育的極好時機了。林彪批示：完全同意，希望按主席批示認眞落實。[51]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總政發出《關於貫徹毛主席 1 月 8 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1 月 24 日，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軍區，李德生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紀登奎任第二政委；謝富治任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李德生任第二書記，紀登奎任第三書記。任命前，毛澤東曾找李德生談話。[52]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發《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

2 月 19 日，毛澤東在關於開展“批陳整風”運動的指示中說：請告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會議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雪峰)、鄭（ 維山 ）主持時期那樣。[53]

2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擴大傳達反黨分子陳伯達問題的通知》。軍委辦事組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寫了表態性的報告，毛澤東批示：你們幾個同志，在批陳問題上爲什麼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想，採取步驟，變被動爲主動。[54]

2 月 23 日，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轉發他的關於“批陳整風”的指示。

3 月 15 日，毛澤東對《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一文批示：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唯物論，什麼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55]

3 月，邱會作、李作鵬交出書面檢討。3 月 21 日，黃永勝交出書面檢討，3 月 24 日，毛澤東在黃永勝的書面檢討上批示：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三同志的檢討都看了，我認爲寫得都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56] 毛澤東在這三份檢討上，只在黃永勝檢討的第二頁說到陳伯達叛變和特務時，有一個注語：請各同志注意。毛澤東並通過江青轉告，由周、康、江先商量一下，給黃永勝等人創造一次機會，讓他們在一定範圍內作檢討，不要再失去機會了。下午周恩來與康生、江青商定再召開一次中央“批陳整風”會議，

進一步批陳，並聯繫自我教育。回報毛澤東後，毛澤東提出：此事應向林彪彙報。3 月 25 日周恩來約軍委辦事組成員開會，商量按毛澤東意見修改黃永勝等三人的檢討。

3 月 30 日，毛澤東對劉子厚在河北省"批陳整風"會議上的檢討批示。

4 月 18 日，毛澤東看了汪東興的第三次書面檢討，對汪東興說：你的幾份檢討有階段性，火候掌握得好，廬山會議後，大家到現在還跟不上氣候，看來你跟上了。[57]

7 月 1 日，兩報一刊社論《紀念中國共產黨五十周年》，很長，系統回顧了黨的歷史。

7 月 31 日，《人民日報》報導：爲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 50 周年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44 周年，《人民畫報》第七、八期合刊和《解放軍畫報》合刊出版。兩本畫報都以單頁篇幅刊登了毛澤東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照片，這張照片把林副主席無限忠於毛主席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生動形象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給了人們巨大的激勵和鼓舞。[58]

拿毛澤東自己的話說，"甩石頭"（批發了一些文件）；"摻沙子"（派紀登奎、張才千參加軍委辦事組）；"挖牆角"（改組北京軍區）。[59]

毛澤東和林彪的最後一面

在華北會議的基礎上，中央召開了"批陳整風"彙報會。

"批陳"即"批林"，這是人所共知的，林彪當然心知肚明。

黃永勝說："事情"是吳法憲挑起來的，不檢討不行。周恩來也幾次要吳法憲檢討，並說林彪檢討幾句就行了。吳法憲把話傳給林彪，林彪說：吳法憲有什麼錯？反正我不檢討。周恩來對吳法憲說，你檢討，是替副帥擔責任。吳法憲明白：不僅僅是替副帥，也是替周恩來擔責任，九一三事件前，周恩來、汪東興和黃吳李邱密不可分，周恩來很大一部分工作是靠黃永勝的軍委辦事組支撐的。吳法憲也明白：夾在幾個人中間，非常困難。張春橋和康生對吳法憲講，周恩來怎麼不好。林彪對吳法憲說：胖子，他們讓你當炮筒子，搞周恩來。國家沒有我可以，沒有周恩來不行[60]。在吳法憲心中，毛、林都是"祖宗"。他從小參加紅軍，長期以來形成的對毛澤東的熱愛，黨就是主席，主席就是黨，心目中早就把黨和毛澤東合爲一體了，他不可能反對毛澤東。聽到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吳法憲當場暈倒在地，他一直認爲會原諒他。就是在他去世前，經歷了那麼多的關押，他仍然對毛澤東有著濃厚的感情。吳法憲是比較聰明的人，大智若愚。吳新潮回憶："文革"中空軍處於風口浪尖，機動性強，汪東興愛用空軍，毛澤東的吃喝、新疆的哈密瓜，南方的楊梅，以及來往文件，幾乎每天都有事。我父親專門有一個秘書應付汪東興，完全身不由己。他非常後悔對中央的情況太不熟悉，犯了這麼大的錯誤。我父親給葉群打電話，要向林彪彙報。林彪說，不要了。[61]

吳法憲不僅感到了林彪的冷落，也感到了黃、李、邱的

冷落。

毛澤東在周恩來就"批陳整風"會議安排的請示報告上批示"同意"。在結尾，周恩來說：我們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開時回到北京，林副主席聽了很高興，要我們代向政治局同志問好。

3 月 26 日，周恩來派人將黃、李、邱三人的檢討送北戴河林彪處，並說準備赴北戴河向林彪彙報召開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的事情。[62]

3 月 30、31 日，周恩來帶著李德生和黃吳李邱去北戴河見林彪，此行的目的，彙報毛澤東對批陳的多次批示和談話，"批陳整風"幾次會議的情況，以及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的安排等。根據談話記錄，林彪口頭上表示：完全擁護毛澤東自廬山會議以來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關於今後的工作方針和措施，都完全擁護和支持，並認爲完全正確，效果顯著。對黃李邱三人的檢討很高興，要求吳法憲、葉群重寫一次書面檢討。還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把"批陳"引向深入。說他没想到陳伯達問題那樣嚴重，這次把陳伯達揪出來，是很大的勝利。[63]

張耀祠回憶：周恩來在路上對李德生說，主席要林彪出來參加一下即將召開的"批陳整風"彙報會，目的是給他一個台階下。[64]

李德生仔細觀察林彪的面孔，他那蒼白的臉上，毫無表情，看不出他心裏究竟怎麼想的。最後，林彪對黃吳李邱說：錯了要好好檢討。一句也不講自己有什麼錯誤，有什麼責

任，他還講他身體不好，明顯不願出席"批陳整風"彙報會。談話冷場，周總理起身告辭。回到北京，周恩來立即帶我們向毛主席彙報。對林彪的態度，毛澤東非常不滿意，當面指著黃吳李邱說：你們已經到了懸崖邊了，是跳下去，還是推下去，還是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拉回來全看你們自己了！[65]

根據記錄，林彪多少作了一點自我批評，承認自己也有"錯誤"，是個"炮筒子"，"講話有氣，順口而出，放了炮"，被陳伯達"利用了"。

4 月 15 日至 29 日，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與會者有中央、地方和部隊的負責人 99 人。

4 月 19 日，林彪從北戴河回到北京。

4 月 20 日，周恩來致信林彪：送去有關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的材料及毛澤東的批示，希望林副主席能夠出席會議，講幾句話。但林彪仍無出席會議之意。[66]

4 月 24 日，周恩來將"批陳整風"彙報會議情況報告送呈毛澤東、林彪。會議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見大家一次，如能給大家講幾句話更好。不過大家又說，不要因此要求，干擾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紀念在天安門上觀看焰火。（毛澤東批示：我這幾天不出門。）[67]

4 月 29 日，周恩來在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全體大會上作總結講話，按毛澤東定下的調子，點了五大將的名，指出軍委辦事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

犯了宗派主義錯誤，站到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上去了。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同反共分子陳伯達的問題性質根本不同。希望他們認真改正錯誤，實踐自己的申明。同時周恩來檢討他在這個問題上督促、幫助不夠。[68]

“批陳整風”彙報會終於“平安”結束。

但是，吳法憲忐忑不安。林彪叫他來談話，當面對他說：我與毛主席剛談完，毛主席說空軍的曹里懷怎麼樣，我說曹里懷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吳法憲是劉亞樓的“徒弟”，是拼命幹工作的。看來主席對你有誤解，你應該找主席當面溝通，再把與張春橋爭吵的事情講清楚。我已經聯繫好了，你回去就與高必成（毛澤東秘書）聯繫。吳法憲回到家馬上打電話，高必成說主席休息了。以後吳法憲連續打了三四次電話，高必成都說主席休息了，吳法憲明白：毛澤東不想見他。他對林彪說，林彪說我也沒辦法了。

五一前後，毛澤東召見了黃吳李邱。毛澤東對吳法憲解釋說：我爲什麼不見你，不是不想見，是想一起見。還說我是保你的，你與陳伯達不一樣。吳法憲的眼淚一下就下來了，連說感謝主席。

從廬山上下來，吳法憲的日子越來越難過。而另外三個，黃、李、邱若無其事，好像廬山上發生的事情與他們無關，黃永勝和李作鵬對吳法憲有意見，亂說話，有意無意地與吳法憲保持距離。南巡講話吳法憲保外就醫後才從媒體上知道。

黃永勝認爲自己沒有什麼錯，他半截上了廬山，也沒有

發言。周恩來讓邱會作去做黃永勝的工作，不是發言沒發言的問題，主要檢討宗派主義，讓主席高興點。黃永勝承認宗派主義是有，從維護毛澤東的角度，才寫了檢討。吳法憲認爲自己應該主動地好好檢討，檢討過了，吳法憲那兩個月工作的幹勁非常大。但吳法憲還是不放心，把毛澤東對自己檢討的批示和對李作鵬檢討的批示比較，說爲什麼我是可以了。李作鵬的檢討是很好。李作鵬說：“很好”也不很好，“可以”也不可以。還是李作鵬看得明白，因爲毛澤東讓黃吳李邱檢討不是目的，而是要逼林彪檢討。毛澤東希望吳法憲“起義”，吳法憲哪裏知道，在他眼中，毛和林都是他的恩人，他怎麼能拉林彪下水？等了十天，吳法憲再作檢討，可是，他揭發不出林彪什麼東西。[69]

這時候，林彪已經很清楚了。從廬山上下來，林彪只接見黃吳李邱一次。黃吳李邱都感覺出來了，毛澤東搞了一系列的動作，林彪有很多苦水，表面上卻無動於衷，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不干擾。他明確對黃吳李邱說：根據我的看法，你們沒錯。你們檢討我不怪你們，也不會生氣。但我不會檢討。[70]

5 月 1 日的焰火晚會，毛澤東到了，林彪還沒到，平時都是林彪先到的呀。周恩來打電話，林辦秘書說，首長身體不好，上午的活動已經參加了，晚上就不參加了。周恩來再三勸說，“文革”中上天安門是“政治亮相”，林彪不出現，馬上國內外就會“地震”。直到晚會開始，林彪才非常不情願地來了，坐在毛澤東身邊。[71]

毛澤東與西哈努克有說有笑，沒有理林彪。林彪悶坐了十多分鐘，悄悄離席而去。這是中國第一號人物和第二號人物的最後一面，雖然坐到了一起，但連個招呼都沒打。[72]三年前的五一節卻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

6 月 15 日，心情陰沉的林彪坐專列又去了北戴河，深居簡出。

7 月 1 日，兩報一刊文章，回顧中國共產黨 50 周年來的歷程，在談及“文革”和與劉少奇的鬥爭時，拿出了《五一六通知》中的話，號召全黨要警惕現在正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說壞人總是僞裝自己，搞陰謀，耍兩面派。他們既然要幹壞事，就不能不暴露。

7 月 10 日，毛澤東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73]

7 月 11 日，毛澤東將吳法憲、葉群重寫的檢討批轉周恩來，一改對黃永勝等人檢討的溫和態度，說我已看過，可以了。並要求連同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的檢討一併向政治局報告，作適當處理。[74]

周恩來傳話說不要多心，說“很好”和“可以了”是一樣的。

張雲生回憶：1966 年 9 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剛結束，在人民大會堂，我親眼看見毛澤東把兩本線裝的《郭嘉傳》、《范曄傳》推薦給林彪，林彪看後口述了感謝主席和簡短的讀後感。我後來查史籍，才明白郭嘉與范曄都是古代重臣，權位與林彪相似，一個英年早逝，一個因參與謀反被殺頭。[75]

毛澤東爲什麼要讓林彪看《郭嘉傳》？

直到南巡，毛澤東才把他的思考端出來。一路上，毛澤東反復同沿途各地黨政軍負責人談黨內十次路線鬥爭，著重講第十次（九屆二中全會）。1959 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毛澤東說：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點責任。……對林彪還是要保。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爲首的，改也難。……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他們心裏有鬼，雖然在北京開了工作會議，幾個大將作了檢討，但吞吞吐吐。林彪不開口，這些人是不會開口的……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陳伯達後面還有人……[76]

毛澤東南巡迴到北京，九一三事件突然爆發。

註釋：

[1] [19] 參見《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1971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 12 日，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册，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 年 10 月，555 頁

[2] [6] [7] [9] [16] [20] 採訪李雪峰秘書黄道霞筆記，2000 年 8 月 28 日

[3] 參見鄔吉成、王凡著《紅色警衛》，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301-304 頁

[4] [35] [42] 採訪林辦秘書于運深筆記，2005 年 10 月 25 日

[5] 參見丁凱文《王良恩是林彪死黨嗎？》，載《重審林彪罪案》香港明鏡出版社 2004 年，858-864 頁

[8] 採訪李雪峰子女筆記，2005 年 1 月 22 日

[10] 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册，493 頁

[12] 引自陳曉農編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版，95 頁

[13] [23] 採訪陳伯達兒子陳曉農筆記，2006 年 4 月

[14] [15] [24] [25] [27] [36] [49] [57] [59] [76]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160、156、47-48、59-66、139、70-84、174、180-181 頁

[17] 參見毛澤東在劉子厚檢討上的批示

[18]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448 頁

[21] 採訪李雪峰子女筆記，2005 年 1 月 22 日

[22] 《陳先瑞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456 頁

[26] [62] [63] [66] [68] [73]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395-396、446、447、452、454、468 頁

[28] [29] [72] 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版，299-300、322 頁

[30] [32] [45] [46] [47] [48] [53] [54] [55] [56] [67] 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3 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137-139、143-146、153、161、163-182、206、208-209、216、219、230 頁

[31] [39] [75] 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 2003 年 7 月版，615-622、445-446 頁

[33] [34] [37] 參見李文普《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 年第 2 期

[38] [40] [41] 參見楊銀祿《江青與林彪》，載《百年潮》1999 年第 4 期

[43] [44] 參見 1970 年 10 月 2 日《人民日報》

[50] [52] [65] 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408、409 頁

[51] 毛澤東關於轉發濟南軍區政治部學習貫徹毛主席“軍隊要謹慎”指示的情況報告給林彪、周恩來、康生的信，手稿，1971 年 1 月 8 日

[58] 《第七、八期〈人民畫報〉合刊和〈解放軍畫報〉合刊八月一日出版》，《人民日報》1971 年 7 月 31 日，參見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 年 10 月，535-536 頁

[60] 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

[61] [69] 採訪吳法憲大兒子吳新潮筆記，2006 年 1 月 3 日

[64] 參見《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97 頁

[70] 採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 年 11 月 16 日

[71] 參見杜修賢《林彪對毛澤東的“不辭而別”》，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版，62-72 頁

[74] 參見毛澤東對吳法憲、葉群第二次書面檢討的批示，1971 年 4 月 11 日

第二部

五七一工程

盧山會議後，1971 年 3 月，林立果組織人馬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紀要》。這只是個草稿，還不能算一個計劃。剛拿到這個“戰利品”時，還看不懂，直到把“小艦隊”的口供和李偉信的口供相對照，才看懂了。[1] 毛澤東認爲：這個手寫的“五七一”草稿爲日後的審判提供了重要證據。

第八章
是誰向林立果泄了密

9 月 12 日，專列突然回到北京

1971 年 9 月 12 日 13 點 10 分，毛澤東的專列秘密停靠在北京豐台車站。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非常吃驚，怎麼不聲不響就回來了？路上怎麼沒有停？原來計劃不是這樣的呀。

11 個小時後，林彪專機突然從北戴河強行起飛。

九一三事件由此發生。

毛澤東南巡與九一三事件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嗎？爲什麼林立果的“三個方案”[2] 每一個都沒有展開，就被毛澤東粉碎？如果沒有千里眼順風耳，毛澤東憑什麼料“敵”如神？

從杭州動身起，毛澤東已經整整三天沒有休息好。他的工作時間一般是從下午到深夜，上午是他的“後半夜”。汪東

興回憶：到9月12日回來，毛主席南巡花費了29天的時間，沿途同各地負責人談話13次，平均每兩天多就談一次。而且幾次談話都是上午，完全打破了主席上午睡覺的生活規律。[3]

高振普（周恩來的衛士長）回憶：9月12日17點，總理起床，一直等候的楊德中（中央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政委）跟著總理進了衛生間，報告主席回來了。總理問，怎麼這麼快就到了豐台？楊德中說，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沒停。總理又問，專列什麼時候進的北京？楊德中說還不清楚。[4]

九一三事件後，林豆豆（林彪女兒）和未婚夫張清林被關在玉泉山寫揭發材料。專案組曾追問他們：林立果爲什麼要跑？林豆豆說，聽說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長。周恩來說，根本沒有這回事，他不知道。[5]

周恩來眞的不知道嗎？他雖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澤東南巡的全部講話內容。9月4日，汪東興曾將他和華國鋒追記、經毛澤東審改過的南巡談話稿（8月16日至27日毛澤東在武漢同湖北、河南、湖南等省負責人的談話）專送周恩來。主要內容講述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揭露黃吳葉李邱以及背後的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分裂黨，急於奪權的陰謀。9月11日，周恩來和回到北京的華國鋒談話，更是完全瞭解了毛澤東的談話內容[6]。難道身經百戰的他沒有意識到"大戰"將要來臨嗎？如果他意識到了，爲什麼對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驚呢？因爲毛澤東離開上海，不一定馬上回北京，路上還可能停留幾個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濟南，比如天津。

專列歸心似"箭"，披星戴月向北京疾駛，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

9月11日18點50分，南京站停車15分鐘，駛過長江大橋，繼續北上。

21點45分到蚌埠，停車5分；

9月12日零點10分到徐州，停車10分；

2點45分到兗州，沒有停車；

5點到濟南，停車50分……[7]

本來毛澤東到北京還應該晚一點。張耀祠回憶：主席準備召見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高秘書提前打電話通知了濟南方面。專列12日淩晨4點到達濟南火車站，車一停，陳長江（八三四一部隊一中隊中隊長）就下去迎接，只來了一位張副司令員。楊得志正在曲阜開會，要五六個小時以後才能趕回來。張副司令員打電話叫來了政委袁升平，汪東興對他們說：主席還沒有起床，天又早，不驚動主席了，列車馬上就開。

此時毛澤東並沒有睡覺，他再也沒有在上海等許世友的那種耐心了，說副司令就不見了，不久在北京開會時再見，請他們回去吧。這時往北京打電話安排下一站活動的張耀祠等人也已上了車，毛澤東交代立即發車。[8]

袁升平（濟南軍區政委）回憶：專列離開濟南時，我立即回宿舍給周恩來打了個電話，報告了主席離開濟南的時

間。[9]

專列跨過黃河，直奔天津。7 點 40 分到德州，停車 20 分；11 點 15 分到天津西站。在天津站停 15 分鐘，加煤加水，檢修機車，然後直接“殺”回北京。但是從天津發車後，毛澤東似乎不再著急，好像勝券在握，傳話在豐台火車站停車。[10]

張耀祠回憶：到天津站時毛主席叫我打電話給中辦值班室，要他們通知李德生（北京軍區司令員）、紀登奎（北京軍區第三政委）、吳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到豐台車站等候。我感到很突然，心想快到北京了，毛主席怎麼不回到中南海安頓下來再找他們開會呢？[11]

吳忠正在家裏吃飯，接到吳德的電話，有重要任務。吳忠馬上趕到吳德家，吳德說：具體情況車上再談。原來要他們馬上到豐台車站，毛主席要和他們談話。毛澤東從外地回來，一般都是夜間，而且很少停靠豐台車站。吳忠一怔，隱隱感到這次談話非同尋常，他小心地問：主席怎麼突然在白天回京，還停靠在豐台車站，我們事先沒有接到通知呀？是不是有什麼重大情況發生？豐台車站的安全保衛工作怎麼辦？還有，主席要聽衛戍區的工作彙報，要不要通知楊（俊生）政委一起去？吳德說：具體情況我也不清楚，中辦值班室打的電話，說是汪東興同志要我們馬上到豐台去，而且只通知你和我兩人去，談什麼，哪些人參加，都沒有說。既然沒有通知衛戍區佈設警戒，肯定是中央另有安排。等到了豐台，見到主席，一切都清楚了。汽車駛入豐台車站，站台上空無一人，過一會兒，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和紀登奎也到了。

13 點 10 分，專列進站，汪東興下車帶他們四人上車。

這是吳忠第一次與毛澤東面對面談話。毛澤東端坐在車廂中央的沙發上，手中夾一支香煙，見到他們，站起來與大家握手。吳忠感覺主席精神很好，見到他們很高興，話也比較多。

吳忠回憶：最初我以爲主席是一般的召見，不會有重要的事情談，緊張的心情一下鬆弛下來。毛澤東先問李德生出訪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的情況，李德生談到阿爾巴尼亞對尼克松訪華的態度，毛澤東說他們是左派，我是右派。衆人哈哈大笑。但毛澤東顯然不想聽李德生再講，問你們打過魚嗎？你講的是目，我要講的是綱，綱舉目張。整個談話過程持續近兩個小時，基本是毛澤東一人講。[12] 毛澤東首先瞭解北京的情況，同時吹了吹風，點出黑手不止陳伯達一個，黑手背後還有黑手。

汪東興回憶：15 點 36 分，專列從豐台車站開出，16 點 5 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車後坐汽車回到中南海。[13]

毛澤東是在白天返回中南海的嗎？

陳長江回憶：專列一直停在豐台站。送走李德生他們，時間已經很晚了，我們才上車吃午飯。我們以爲吃了這頓飯就該走了，誰知過了 17 點，還沒有回家的命令，我們就又在專列上吃晚飯。飯後一切都準備好了，仍然不出發。直到

19 點多，已經是 9 月 12 日的晚上了，我們才接到向北京站開進的命令。毛主席乘坐的這趟專列進入北京站時，像以往一樣，沒有任何首長前來迎接，只有警衛局來的大車小車。回到家了，我們是人熟車熟道路熟，很快便有條不紊地換車上路，順利地回到了中南海住地。[14]

北京已是秋風習習，氣爽宜人的初秋天氣了。對於警衛部隊來說，外出一個多月，大家都很辛苦，但此次外出非同尋常。一路上生怕遇上意外，提心吊膽，隨時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情況，投入戰鬥，流血犧牲......如今，終於平平安安地回到了中南海。陳長江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一種很少感覺到的愉快，頓然注入了全身。

吳連登（毛澤東家庭管理員）回憶：我們是 9 月 12 日天黑回到中南海的。[15]

如果說陳長江記憶有誤的話，不可能吳連登也記錯了。看來汪東興錯了，是故意錯還是無意錯呢？

毛主席身體健康時，每年都要外出巡視。這已經成了規律，一般在 9 月底返程，回北京參加國慶日。[16] 可 1971 年怎麼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更何況豐台已經是北京範圍了，火車行駛不足 20 分鐘的路程就可到達北京火車站，毛澤東以往外出，從來沒有在豐台站停過，為什麼要在豐台逗留這麼長時間呢？隨行人員都很納悶，專列停在家門口，為什麼要等到天黑才回家，到底有什麼意義？

毛澤東命令李德生調一個師到南口待命

對軍事指揮員來說，戰爭中的時間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

豐台車站是專列一路停靠最長的車站。一路上一直快馬加鞭，而到了豐台的家門口，毛澤東卻突然止住了腳步，這是他深思熟慮的一步棋。

廬山會議後，林彪似乎沒有什麼動靜，而他的兒子林立果格外活躍。在廣州、上海等地進行了大量的軍事活動。1971 年 2 月 12 日，林彪和葉群、林立果到了蘇州。[17]

不久，林立果同江騰蛟（少將、空軍政治部黨委書記）、王維國、陳勵耘密談。林立果評價廬山會議：這是一次未來鬥爭的總預演，雙方陣容都亮了相，陳（伯達）是鬥爭中的英雄，吳（法憲）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間脫節，三是沒有一個好的參謀長。這些老總（黃吳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時不學習，到時胸無成竹，沒有一個通盤，指揮軍事戰役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說明這一點，今後的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的領導，眞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裏。[18]

1971 年 3 月，林立果等秘密制訂了《五七一工程計劃》。4 月，上海空四軍成立了教導隊。北戴河修建了直升機場，還運來了水陸兩用坦克。林立果讓心腹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秘密學習駕駛直升機，自己則練習水陸兩用坦克的駕駛。7 月下旬，林立果等人到廣東的深圳、沙頭角

一帶考察地形。他對劉沛豐（空軍司令部一處處長）、于新野（空軍司令部秘書處副處長）、李偉信（上海空四軍秘書處副處長）等人說：萬一情況緊急，可以讓首長到香港指揮。[19]

如此這般，難道不是在瘋狂準備軍事政變嗎？

看起來林立果氣勢洶洶，其實是“紙老虎”。吳新潮回憶：我見過林立果所謂的水陸兩用坦克，其實是 50 年代工程兵的一輛舊吉普車，破破爛爛，好多管子用膠帶纏著。第一次下水就熄了火，我和警衛下水推著走。說來說去就是個大玩具，九一三事件後居然拍成照片，成了政變的工具。那時我被抓了起來，叫我寫交代材料，我沒上到某種“高度”，逼我重寫。我沒辦法，只好開始編，說這個水陸兩用坦克準備開到南韓去。專案組高興了。[20]

毛澤東的一舉一動，都有強烈的目的性。南巡一路，毛澤東講了一路，拿他自己的話說，我正在進行“火力偵察”。離開近一個月了，北京城的情況怎麼樣？是不是兇險莫測？不能保證沒有人駕機轟炸中南海，夜間返回保險係數就大多了。所以警覺性極高的毛澤東沒有馬上進城，他決定先在豐台車站召見北京市黨政軍負責人，暗裏察探動向，直到確定京城確實沒有異常，才返回中南海。

15 點多，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結束，毛澤東單獨交給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一項任務，調三十八軍一個師到南口待命。[21] 這裏要特別說明，軍隊調動權集中在軍委主席毛澤東那裏，軍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調動一個排也要

經毛澤東批准。

李德生立即趕回北京軍區。

李德生任職北京軍區的時間不長，他的總政主任的職務也沒有撤銷。說起來，李德生調進北京的時間也不長。“九大”後李德生被安排在國務院業務組、兼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1967 年夏，安徽省部分地區武鬥，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電話報告林彪（軍委副主席），我們十二軍在蕪湖支左，被造反派圍攻幾天了，他們隨便打罵我們的幹部和戰士，搶我們的槍支。部隊遵照軍委指示，做到了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這樣下去非常危險，部隊的情緒也怕控制不住了。許世友建議把在蕪湖支左的部隊暫時撤出來，請林副主席指示。半小時後林彪交代，主席同意許司令員的建議。但在毛澤東指示前，李德生（時任十二軍軍長）就平息了動亂。拿毛澤東的話說，李德生有兩個絕招，一是造輿論，二是抓帶頭鬧事的壞頭頭。毛澤東非常滿意，林彪也對李德生印象深刻。

1970 年新總政成立。1967 年自總政主任蕭華倒台後，總政也散了攤子。那時毛澤東一直想把張春橋塞到總政，但林彪頂住，一頂就頂了三年，現在，林彪提名李德生當主任，毛澤東馬上同意。5 月 19 日，林彪在毛家灣接見李德生和新總政班子，說調你來當總政主任，是我向主席建議的，我就是要叫丘八管秀才！[22]

就這樣，李德生進了軍委辦事組。

9 月 12 日下午，李德生和陳先瑞等北京軍區領導緊急

研究調動部隊進駐南口。南口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要地，位於北京城西北，再往北就是八達嶺和張家口。“紮”住南口，對即將發生的九一三事件來說，這是一個極端重要的軍事部署，既可防蘇聯入侵，也可以平定北京城裏的動亂，事後看，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雖然包括李德生在內的高級將領們此時還是“不識廬山眞面目”，但他們很快部署完畢。[23]

果然當天晚上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陳先瑞回憶：9 月 13 日淩晨 1 點 30 分，我被電話鈴驚醒，李德生說，老陳，請你立即到人民大會堂來，周總理召開緊急會議。從他那不同尋常的語氣中，我預感到發生了大事情。2 點多，我趕到人民大會堂。這時只有周總理、李德生、紀登奎在場。周總理神情嚴峻地對我說，林彪跑了，現在情況不明，北京軍區立即進入一等戰備。李德生叫我立即回軍區，把作戰、機要、通信和北空指揮所都嚴格控制起來，沒有總理的命令，任何人無權調動軍隊。……那幾天，軍區領導人都住在辦公室，堅守崗位，按照分工抓好自己分管的戰備工作，做到了萬無一失，沒有出任何問題。[24]

中南海和釣魚台也都進入了一等戰備。在釣魚台負責警衛工作的鄔吉成（中央警衛局副局長）說：9 月 12 日 22 點左右，部隊已經熄燈，我也睡了，汪東興來電話，中南海已經進入一等戰備，你負責佈置釣魚台的戰備工作。戰備到什麼程度？汪東興說：一等，把部隊拉出來，布崗，設置路障，挖工事。我一頭霧水，怎麼回事，演習，還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我馬上增派崗哨，門口布上機槍，挖好了工事，

設置釘板之類的路障，阻斷了各樓之間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後來汪東興再找我，找不到了，埋怨緊急戰備怎麼到處亂跑？我說你不是叫我佈置戰備嗎？緊急戰備狀態持續了一個多星期，才自然平靜下來，而戰備結束則在一兩個月之後。[25]

爲什麼除了中南海，釣魚台也進入了緊急戰備？難道得知林立果一夥要攻打釣魚台嗎？要不爲什麼中央警衛團專門成立機炮大隊，一處設在釣魚台，一處設在故宮。本來想把機槍和高炮架在西華門邊的屏風樓上，但安裝時發現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

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馳一句歇斯底里的話：實在不行，我駕直升機去撞天安門。[26] 李偉信供詞：9 月 11 日 22 點，得知毛澤東已經離滬北上。他們開會的房門打開著，我到門口一看，室內氣氛異樣，剛才那種囂張氣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馳、劉沛豐、于新野幾個人目光呆滯，低頭不語。林立果流著淚說：全完了，沒完成首長（林彪）交給的重託，首長把生命交給了我，我拿什麼去見首長？沉默了一陣，周宇馳抓起一個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說難過也沒用。還有一個辦法，到國慶日那天，首長託病不去，老子他媽的駕直升機去撞天安門……[27] 我不得好死，他也別想好活！過一會兒周宇馳又說：還得去一個人僞裝，幫我撒傳單，你們誰能跟我一塊去？開始沒人敢說話，在周宇馳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著我和劉沛豐也表示願意去，林立果說，我不允許這樣做。大家也覺得這種想法不現

實，于新野自言自語，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林立果突然回到北戴河

那是一個奇怪的夜晚，那個奇怪的夜晚是從 9 月 12 日下午開始的。

1971 年 9 月 12 日 19 點 40 分，西郊機場響起巨大的轟鳴聲，二五六號三叉戟秘密從北京飛往山海關機場。因爲是臨時，機組人員 18 點過了才接到訓練飛行的通知。專機任務改爲訓練飛行，飛機尾號二五六在空中聯絡時改爲二五二號。似乎一切都那麼神秘，但實際上對專機來說十分正常，因爲專機目標大，需要保密，常借著訓練作爲掩護。[28]

那時三叉戟還是“新客人”，雜音特別大，再保密，一起飛整個機場都能聽到。

20 點 15 分，李海彬（西郊機場調度室主任，專門到山海關機場負責專機調度）打電話給姜作壽（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大隊長），說有個大飛機從北京來，是哪位首長？怎麼也没有見你們來人接？姜作壽没有接到命令，天都黑了，還有誰來？李海彬急了：你們到底接不接？飛機 15 分鐘後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壽說了算，他說我瞭解一下。林彪警衛秘書李文普在電話裏說得很乾脆：我没有聽說誰要來。那我們去不去車接？没有告訴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確實，這是警衛的一個原則，不該管的不管。[29]

三叉戟馬上就要到了，林彪別墅似乎還一無所知。

葉群大張旗鼓地操辦女兒林豆豆的訂婚儀式，正在 96 樓走廊放映香港愛情電影《甜甜蜜蜜》。“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舞台上只有孤零零的八個樣板戲，所有的“愛情”片全被打入冷宮，更別說看香港愛情片了，“林辦”秘書、警衛員、服務員都被叫來了。[30]

林豆豆回憶：20 點左右，電影放到一半，我正在秘書辦公室。秘書宋德金接到海軍山海關機場的電話，有一架身份不明的飛機即將降落在山海關機場，問“林辦”是不是知道。宋德金說不知道，李文普也說不知道，“林辦”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誰要來，但我想，很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來了。可是奇怪，葉群爲什麼没有派汽車去接？[31]

姜作壽放下電話才三四分鐘，李文普的電話就追來了，急急地說：老虎（林立果）回來了。原來葉群忘了派車，她從內部直線電話告訴李文普，老虎聽說豆豆今天訂婚，很高興，坐飛機趕回來祝賀。[32]

劉吉純（八三四一部隊警衛科副科長）回憶：吃過晚飯，葉群給工作人員散喜糖，我和李春生（林辦秘書）等正在平台上乘涼，邊聊天邊吃糖，忽然聽見天上大飛機的聲音，轟轟吼著，從西南向東北飛來。已經降低了高度，顯然是要在山海關機場降落。我們正在議論哪位首長又來北戴河了，葉群來電話，說老虎從北京回來祝賀豆豆訂婚，要我趕快派車去接。我很生氣，飛機都落地了才告訴，到機場少說也要 40 分鐘，這怎麼能接得上？[33]

劉吉純還是要了林彪常坐的那輛"吉姆"。

司機小寧著急地說：50公里路，怎麼也開不到啊。

姜作壽說：快動身吧，既然已經通知，接不到也要接。

果然沒有接上。

因爲一路上沒有路燈，劉吉純叫司機小寧開慢點，20點35分，過秦皇島市不遠，我們發現對面有車過來，快靠近時開著大燈，目中像是無人。我叫小寧把車停在馬路中間，對面的車也停下來。我剛下車，林立果和劉沛豐一人提一隻小皮箱也下了車。

原來林立果"借"了機場的吉普車。劉吉純表示歉意，林立果說不怨你們，事情急。說著，劉沛豐從吉普車上搬下兩隻手提箱。晚上看不清，劉吉純以爲是祝賀豆豆結婚的禮品，也沒有在意。林立果和劉沛豐上了"吉姆"，揚長而去。劉吉純和司機小寧上了林立果丟下的吉普車，一路追也沒追上。

林立果爲什麼突然回到北戴河？

因爲南巡的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出其不意地打亂了林立果的瘋狂部署。林立果9月8日回到北京，就開始商量在杭州、上海暗殺毛澤東。那個時候，毛澤東威望達到頂峰，要暗殺，又不能讓"殺手"瞭解底細，這是無法解脫的矛盾。事到臨頭，誰也不敢幹，到9月11日還沒有商定出一個辦法。

毛澤東對林立果的行蹤瞭若指掌嗎？

李德生回憶：我們在審理林彪叛逃的經過時，查清的事

實是這樣的。林立果探聽到毛主席確實於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後，在西郊機場秘密據點，對著他們的同夥連聲叫喊，這下完了！這下完了！他手忙腳亂打電話告訴北戴河的葉群，情況變了，要改變計劃，兩個小時後他飛往北戴河；同時要求周宇馳他們實施《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第二套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行動計劃和人員名單。[34]

誰把毛澤東到北京的機密透給林立果

有一個事實似乎還沒有人注意到，毛澤東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得到通知的就是周恩來和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別人不可能知道，那麼北戴河的葉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麼知道的呢？誰透露的？是"內線"？還是……圈套？

這大概是解開九一三事件之謎的一把鑰匙。

北京西郊的空軍學院東北角有兩幢兩層小樓，編號13和14，原是院領導的住宅，所以稱將軍樓。1971年4月底，這裏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據點"。

王蘭義（空軍學院行政處副處長、負責"秘密據點"的生活）回憶：在我接手前，頭一年林立果已經在空軍學院建立了"據點"。負責林立果"據點"生活的劉保文[35] 要調到上海，交給張甲三（空軍學院幹部）。張甲三也要調到民航，就向我交了班，我才知道林立果在我們這裏有個住處。林立

果的身份我知道，1970 年 8 月，空軍 3000 多名處以上幹部在空軍學院開“三代會”，開了一個多月。專門放過林立果在空軍二級部長會上的“講用報告”錄音。領導說，林立果很支持學院的工作，是支持我們這一派[36] 的後台，也是學院領導的後台。

“秘密據點”的接待小組是 1971 年 4 月底成立的，由劉保文找的人。成員有郝廷棣（打字室主任、後任衛生處協理員）、蔡德寧（女、後勤處協理員）、牛戰景（政治部電影放映員、戰士）三個組員，我是組長。劉保文交代，他們來了，吃飯，用什麼東西，負責提供。另外，負責打掃衛生。主要是生活保障，他們的事不能過問，也不能向外說，決不能讓外人知道。“文革”搞了好幾年了，包括中央領導今天這個倒，明天那個倒，誰對誰不對摸不清。那時我認爲，就像毛主席的聯絡員毛遠新一樣，林立果是林彪派到空軍的聯絡員。現在“靠”上林立果，覺得保險。當然，爲這樣的大人物服務，千萬不能出錯，出錯就不得了，腦袋就該掉了。我參加工作以來，一直是先進，立功受獎，不管幹什麼，都幹得最好，也一直很謹慎。沒想到還是跟錯了。[37]

王蘭義高中畢業後參軍，以後在八航校學習，畢業後留校任飛機維護的教員。空軍學院 1958 年批准成立後，王蘭義就調來了。因爲全軍要進行導彈教育，他就到了新兵器教研室。“文革”中空軍學院撤銷，包括王蘭義在內的一批人調往上海空四軍。命令都下了，但王蘭義正在出差，回來後人家都走了，就暫時留了下來。1971 年 5 月，空軍在空軍學院成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王蘭義到行政處任副處長。

王蘭義回憶：接了“秘密據點”後幾天，于新野和劉保文陪著林立果來了。我只聽過林立果的錄音，這是第一次見面。林立果個子中等，感覺他像個大孩子，長得不太像林彪，只有眉毛很像。林立果沒講幾句話，挺客氣。于新野話多，說住在你這，是對你們的信任。劉保文帶頭表態，一定要把接待工作搞好。爲副統帥的兒子服務嘛，神聖光榮。這之後我又接待過四五次，林立果很少說話，最多只是笑一下。

8 月底，這夥人又來了，這次與過去不一樣，過去從來不在這住，這次不僅白天來，夜裏也住在裏邊，分外緊張忙碌，車輛也來往頻繁。來的人也比過去多，而且有幾個沒見過的女兵。9 月 12 日是星期天，本來由我帶學員隊到八達嶺遊覽，頭一個星期天我帶一半學員去過，幾百人，十多輛大轎車。這次還是由我帶另一半的學員去。還沒上車，處長要替我去，我回家已經是上午 8 點多了。因爲這一天空軍學院停水停電。10 點左右，將軍樓打電話要開水和冷水。我讓戰士牛佔景騎著三輪車跑了兩趟，送去一大保溫桶涼水和五六瓶開水，放在門口。11 點多，陳倫和（空軍司辦外事處秘書）打電話，說趕快準備 11 個人的午飯，三位首長的送到這裏，另外有八個人到食堂吃，要爭取 12 點吃上飯。這哪裏來得及？領導規定他們吃飯在空勤灶，他們出來吃飯的時候很少，一般都是送進去。雖然小樓裏也備有米麵和菜，但他們從來沒做過。13 點多午飯好了，我先打電話通知將軍樓，三個人的飯送到樓門口，交給等候在門口的女

兵，然後帶其餘的人去空勤灶吃飯。等了一會兒，將軍樓裏出來五個男軍人，程洪珍、陳倫和等，幾個女兵沒去食堂，林立果和周宇馳、于新野也沒有出來。陳倫和說，他們吃完給帶點回來。14 點多，他們吃完返回將軍樓，我也回家吃飯。剛吃完，陳倫和又來電話，要派個車。過去從來沒要過車，我沒有多問，派好車，騎車到將軍樓，我看見派來的車停在大馬路上，就敲門告訴他們車來了。

然後我推自行車回家，剛走幾步，將軍樓車庫開出一輛"伏爾加"追上來。原來將軍樓沒有車庫，張甲三在樓後給修了個車庫，不用出樓就可以上車。我趕快閃開，清楚地看見裏面坐著三個人。司機是周宇馳，副座是于新野，坐在後面的是林立果，一個個神情緊張。周宇馳回頭看了我一眼，皮笑肉不笑地叫了一聲，啊老王！便加速跑了（去另一個"秘密據點"西郊機場工字房）。[38]

這時是 15 點 10 分左右。毛澤東還在豐台車站，林立果已經得到消息。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機場策劃"第二套方案"。16 點 30 分左右，胡萍（空軍副參謀長兼專機師黨委書記）接到周宇馳安排南飛機群的電話，18 點剛過，二五六號三叉戟機組接到飛往北戴河的命令。[39]

是誰把毛澤東的行蹤洩露給了林立果？

毛澤東一向行蹤不定。他在戰爭環境中生活了幾十年，但除了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沒有上過戰場，沒有使用過槍支，也從來沒有受過槍傷。但他仍然有幾次驚險。延安時警衛員擦槍走火，子彈鑽進他的座椅。而此時他正在炕上睡覺，驚醒後生氣打擾了他的好夢。在河北城南莊，因特務告密，毛澤東住的小院被敵機投下的炸彈擊中，但此時毛澤東已經躲進防空洞，而且炮彈被反戰的工人放進了沙子，沒有爆炸。[40] 這當然是他福大命大造化大了，但很多時候的化險為夷，和他做事謹慎分不開。建國後，他仍然隨時保持著異常的警覺，說走就走，沒有事先計劃，甚至身邊的工作人員也無法預測他的行止。就是"木"已成舟，知情者的圈子也非常小。把毛澤東的行蹤透露給林立果，如果不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他怎麼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九一三事件後馬上就是一條大罪狀，洩露毛澤東的絕密行動，尤其威脅到毛澤東的安全，怎麼可能輕饒告密者？怎麼可能讓"罪犯"逍遙法外？

可是，此案審理經過漫長十年，換了幾撥人馬，好像商量好了一樣，不但不追究，甚至沒有對這個關鍵問題提出質疑。

看來，這個告密電話非常蹊蹺！

到底誰是告密者？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葉群說"，毛澤東回到北京，是汪東興告訴葉群的。[41] 另一種是"民間說"，汪東興報告給周恩來，周恩來告訴了葉群。總之，北戴河的葉群先知道，馬上打電話通知林立果。雖然死無對證，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簡單。查總機的話單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電話是長途，總機需要登記話單，看看那段時間誰給葉群去過電話，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嗎？九一三事件後，軍委一號台的話單倉庫翻了個底朝天，一張一張翻檢過

好幾遍，並記錄了從9月6日至12日北京與北戴河之間的所有通話和通話時間，要找出"罪魁禍首"簡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來，爲什麼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幫"一直想拔掉這顆"眼中釘"。把毛澤東的絕密行動告訴葉群，和林彪穿一條褲子，這是打倒他最有說服力的理由啊！如果是汪東興，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衆所周知，汪東興雖然是毛澤東的心腹，但廬山會議他跳得那麼高，雖說幾次檢討"輕鬆過關"，卻留下一筆抹不掉的賬。如果他不接受"教訓"，又"賊"膽包天把毛澤東的秘密告訴葉群，吃裏扒外，難道不該"千刀萬剮"嗎？

可是奇怪！不論是周恩來，還是汪東興，都平安無事。爲什麼不追究洩密這件事？似乎有些說不過去。難道是打草驚蛇，故意讓北戴河半夜"雞"（機）叫？

在那些驚心動魄的日子裏，毛澤東是否意識到危險正在步步緊逼呢？他爲什麼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嗎？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召開的成都地區座談會成員時說：林彪他們搞反革命活動，誰個曉得？我就不知道嘛。這話他說過多次。是這樣嗎？九一三事件撲朔迷離，如果毛澤東對林立果的行蹤不瞭若指掌，爲什麼突然"殺"回北京？

汪東興說：毛主席對林彪究竟何時察覺？察覺多深？後來也沒向我們講過。但李德生和汪東興在回憶錄中都提到，毛澤東有察覺。但他並沒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況全部告訴我，他老人家沒有作聲，他沉著地待機而動。當時我也發現

有些現象不正常。[42]

毛澤東回到北京和林立果離開北京決不是巧合，他一定知道周恩來、汪東興、李德生他們不知道的更多的"機密情報"，甚至有可能瞭解整個"陰謀"。

註釋：

[1] 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1995 年 12 月版，144 頁

[2] 林立果的三個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謀殺毛澤東，中策南飛廣州，下策北飛蘇聯

[3] [7] [10] [13] [16] [42]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年 11 月版，175、196、179、193 頁

[4] 參見高振普《周總理在接到張耀祠報告之後》，載《中華兒女》2000 年第 4 期

[5] [30] 採訪張清林筆記，1998 年 2 月 20 日

[6] [17] 參見《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480、440 頁

[8] [11] 採訪中央警衛局局長張耀祠筆記，2003 年 2 月 18 日

[9] 採訪濟南軍區政委袁升平筆記，1988 年 9 月 11 日

[12] 參見曲愛國《百戰將星吳忠少將》，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368-370 頁

[14] 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166-173 頁

[15] 參見董保存《毛澤東家庭管理員吳連登訪談錄》，載《名人傳記》2004 年第 1 期上半月

[18] 參見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版，424 頁

[19] 參見邵一海《"艦隊"進入第一線》，載《追求》雜誌 1986 年第 1 期

[20] 採訪吳法憲大兒子吳新潮筆記，2006 年 1 月 3 日

[21] [23] 參見李德生《從廬山會議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憶》，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版，9 頁

[22] [34] 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387-392、416 頁

[24] 參見《陳先瑞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461-462 頁》

[25] 採訪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筆記，2004 年 5 月 9 日

[26] 參見邵一海《"聯合艦隊"的覆沒》，載《林彪事件眞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88 年 9 月第一版，73 頁

[27] 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版，289-290 頁

[28] [39] 採訪二五六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康廷梓筆記，2000 年 7 月 14 日

[29] [32] 採訪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大隊長姜作壽筆記，1997 年 10 月 20 日

[31] [41] 採訪林豆豆筆記，1998 年 3 月 26 日

[33] 採訪八三四一部隊警衛科副科長劉吉純筆記，1996 年 10 月 21 日

[35]原來是教員，“文革”中任空軍學院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革委會副主任

[36] 王蘭義回憶：空軍分成兩派，我們是保黨委的，還有一派是造黨委反的

[37] [38] 採訪王蘭義筆記，2005 年 12 月 13 日

[40] 採訪軍委辦公廳作戰室主任唐永健筆記，1991 年 5 月 11 日

第九章
毛澤東南巡

九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

除了陳伯達，大家都“安全”地下了廬山，但廬山上的硝煙飄到了北京。

看來，毛澤東真的要與林彪分道揚鑣了。

1971 年 8 月 5 日，葉群回北京檢查乳腺癌，找了不少人談話。[1]

8 月 6 日晚，邱會作帶夫人胡敏來到毛家灣，談到深夜。周恩來特意打電話問候，聽說葉群正在接待客人，馬上追問是哪些客人。

陪江青在青島活動的吳法憲，接到夫人陳綏圻的電話，說葉群回北京治病，要他回來看看葉群。當晚 23 點 15 分，吳法憲從青島打來電話，8 月 7 日上午匆匆回京，15 點帶夫

人到毛家灣，與葉群密談。[2]

8 月 8 日下午，黃永勝與葉群密談近三個小時。23 點政治局會議後，吳法憲、邱會作又來到毛家灣，以後邱會作夫人胡敏也來了。葉群請胡敏帶三 O 一醫院的人到毛家灣看電影，表示感謝。電影看完，別人都走了，胡敏到會客廳看葉群正與他們談話，也留了下來。談至 8 月 9 日凌晨 3 點。

密談了這麼長的時間，都談了些什麼？吳法憲回憶：交換了情況，分析了形勢，重點議論怎麼過四屆人大這一關？葉群擔心地說：這次比華北會議大得多，不是那麼容易過關，事情無法預料，那麼多的代表，你們不端林總，別人要端，要追問下去怎麼辦？辦法總會有，天無絕人之路，豁出來了（意思是要硬幹）。不是只保林總的問題，林總和你們分不開，都要保，你們靠林總，林總也靠你們，就這麼幾個“老戰友”，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損失。葉群讓吳法憲除整好空軍外，特別要抓好廣州軍區空軍和武漢空軍的工作（難怪毛澤東南巡的重點是武漢和廣州呢）。葉群還說，林總的身體和毛主席比較起來，差得遠，怎麼也“拖”不過毛主席。這話葉群在 1970 年廬山會議前就講過一次。[3]

邱會作回憶：葉群說，要端就端，把林總端出來就下台了，現在大家把問題好好想一想，看怎麼過關。林總是關心大家的，只要林總没有事，鍋裏有飯，就不愁碗裏空。胡敏（邱會作夫人）回憶：葉群說我們的“關”過得去過不去還是個問題，怎麼辦？這要看主席保林的情況。從現在看，主席保林有個限度，許多跡象表明，可能要把林總往外端。這次開會要早點做與咱們觀點一致的人的工作，經過一場鬥爭，再向主席“請願”整他們，如果主席不答應，就向主席“示威”，求得解決。葉群說，看來咱們是過不去了，主席要把林總往外拿了。把林總往外拿，咱們就都保不住了，得想個辦法。吳法憲說，只有鬥爭。邱會作說，鬥爭還得有鬥爭藝術，要取得勝利，還得給下面做工作。葉群問串連工作做得怎麼樣了，……[4]

8 月 9 日下午，葉群乘專機回北戴河，黃吳李到機場送行。林立果也親自到山海關機場，這讓葉群“受寵若驚”。

8 月 10 日，葉群從北戴河給吳法憲打電話，叫他“不要放炮”。這時，葉群還不知道毛澤東幾天後要南巡，她似乎想再看看動靜。

陳長江回憶：主席對接班人林彪越來越不滿。到 1971 年 8 月，對林彪的不信任達到頂點。謝靜宜的丈夫蘇某在空軍機要局，通過謝靜宜傳來消息，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秘密組織，在作武裝奪權的準備。主席決定南巡，行前主席說，我就不相信，這些司令員會跟著林彪走。難道解放軍都會造反？還是那句老話，如果解放軍不聽指揮，我再上井岡山打遊擊去。[5]

毛澤東過去除了說過帶林彪上井岡山外，還說過帶葉群上井岡山。

但這時不再提帶林彪或葉群了。

李德生回憶：經過“批陳整風”，毛主席從大量揭發材料

看出，林彪一夥進行的一系列活動十分可疑，他決定去南方視察，進一步瞭解情況，並爲即將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做準備。[6]

汪東興回憶：廬山會議揪出了陳伯達，全黨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先後召開了華北會議和“批陳整風”彙報會，但都沒有很好地解決問題。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想推動這個問題得到深入的解決。毛主席在杭州說，陳伯達在華北幾十天，周遊華北，到處遊說。我這次就是學他的辦法，也是到處遊說。我是黨的主席、軍委主席，我能不能到處遊說？陳伯達搞的是反革命遊說，我搞的不同。[7]

8 月 12 日下午，毛澤東南巡前兩天，周恩來從廣州飛回北京，立即到毛澤東那裏面談，請示四屆人大的召開時間，毛澤東提出國慶日後召開四屆人大的設想。8 月 9 日周恩來陪緬甸政府總理奈溫前往廣州參觀訪問，臨行前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安排中央日常工作，並致信毛澤東：主席如有急事，可經吳旭君同志以保密電話告訴我，或者告（王）海容轉告。[8]

毛澤東南巡時說：99 人的會議（“批陳整風”彙報會）你們都到了，總理也作了總結講話，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爲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捂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怎麼行呢？[9]

1972 年 5 月，周恩來在一次會上說：毛澤東爲什麼要南巡？“批陳整風”彙報會，中央文件發給軍事系統 60 多

份，可是軍委辦事組黃永勝他們扣住了，只發了 7 份，傳達範圍非常狹窄。去年 7 月被毛主席發現了，說要繼續跟各地打招呼，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毛澤東南巡時說：1970 年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10]

1971 年 8 月 16 日，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張春橋、紀登奎、黃永勝前往北戴河向林彪彙報工作，分別彙報了宣傳、常務、生產、軍事等情況。彙報結束周恩來說：毛主席提議，黨中央決定國慶前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在各項準備工作正逐步就緒。之後周恩來請示國慶日前召開九屆三中全會，補選幾名中央委員等事宜。毛澤東批：都同意，還要補選常委。[11] 這說明毛澤東已經下決心調整人事了。

“九大”前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不就把劉少奇拋出來了嗎？九屆三中全會是不是要把林彪拋出來呢？無論如何，“北戴河”受到很大震動。林彪心裏怎麼想，不知道。周恩來這次來彙報，林彪有個講話。9 月 1 日，中央辦公廳將林彪講話整理成文，送周恩來審閱。周恩來致信正在杭州的毛澤東，並附上定稿。 9 月 5 日，毛澤東圈閱同意。9 月 9 日，周恩來將審閱後的林彪講話正式定稿作爲特急件，急送王良恩，印發政治局。要不是九一三事件，林彪這一講話將作爲中共中央文件下發。[12] 林彪這一講話的內容是什

麼，目前還不知道。如果有批判價值，似乎不可能石沉大海。

南巡前毛澤東正重病纏身。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到南昌住了兩天。回到北京，到 1971 年 8 月 14 日南巡前，將近一年的時間，他哪裏都沒去，因爲他在廬山上游泳受了風寒。1970 年 10 月下旬，毛澤東的病情越來越重，轉成肺炎。他的保健醫生不在，周恩來派了三名專家級的醫生來。一聽診斷，毛澤東火了，說他們是林彪派來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揮治病。連發了兩天脾氣，連病也不再看了。對高齡病人來說，肺上的病情變化非常快，汪東興不得不召回正在千裏外巡迴醫療的保健醫生李志綏。保健醫生李志綏雖然也認爲是肺炎，但他深知毛澤東的脾氣，說仍是老毛病，慢性支氣管炎急性發作，只要打打針就好了。毛澤東非常高興，用雙拳錘擊前胸，林彪大約希望我的肺臟爛掉。於是，恢復治療。[13]

病中的毛澤東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一場新的“風暴”正在醞釀。

毛澤東南巡第一站選在武漢

8 月 14 日 13 點，78 歲高齡的毛澤東坐專列南下。除了警衛和服務人員，官員中只帶了汪東興一個人，工作人員也比往常少。陳長江回憶：主席一向不擺架子，不講排場，外出從不要任何人送行，包括中央領導人在內。這次也不例外，仍是老規矩，他一上車，專列就啓動了。我們的專列駛出北京火車站，沿京廣路南下。第一個停車點是石家莊火車站，檢修加水，15 分鐘後又走。第二個停車點鄭州，也是例行公務，停車 15 分鐘。就在周恩來赴北戴河向林彪彙報的同一天，8 月 16 日下午到達南巡第一站武漢。換乘汽車，沿武漢大街，過蛇山、龜山和長江大橋，住進東湖賓館梅嶺一號樓。[14]

毛澤東連口氣也沒喘，就與來迎接他的劉豐（武漢軍區政委）談話。連著幾天，毛澤東除了頻頻召集會議，還找一些人談話。毛澤東談到“三要三不要”：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不要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毛澤東說：中國也怪，中國的黨沒有分裂，50 年沒有分裂過。蘇聯的黨分裂過，分裂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中國沒有，有人要分裂我們的黨是困難的。接著毛澤東回顧了黨史。在長沙毛澤東說過，我看還可能分裂 10 次、20 次、30 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

毛澤東很快把話題轉到九屆二中全會：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爲什麼不敢公開呢？可能是心裏有鬼。毛澤東點名批評了黃吳李邱，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還說廬山這件事沒有完，還沒有解決。陳伯達後面還有人，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性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性的錯誤，爲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

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改了沒有？沒有改！毛澤東說：勝利以後，朝鮮戰爭時，我管了一下軍隊，以後就沒有管了。……現在我要抓軍隊的事。毛澤東說：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說穿了是樹他自己。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彪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面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要動軍隊幹壞事，聽你的？

8 月 25 日，毛澤東將已從湖南調國務院的華國鋒從北京召來，話說得更重更透明了。

8 月 27 日 14 點 30 分，毛澤東離開武漢南下，劉豐來送行。

九屆二中全會結束，毛澤東回北京路過武漢，曾同劉豐談過一次，劉豐的態度不明朗。所以這回劉豐忙檢討，說這幾天想得比較多，廬山上我也犯了錯誤，起了哄，干擾了主席。毛澤東說：你沉重什麼？你們就是太急了，你們是屬於上當受騙的，問題不在你們，問題在北京。毛澤東再次向劉豐講起黨內的路線鬥爭，點名陳伯達是反黨集團的人。毛澤東說：我們黨 50 年，10 次分裂。劉豐說：有主席領導，有主席思想，解放軍也是分裂不了的，請主席放心。談到軍隊，毛澤東說：我犯了個錯誤，勝利以後，軍隊的事情我管得不多。劉豐說：主席還是管的。毛澤東說：我要管軍隊了，我光能締造就不能指揮了嗎？他把話題又轉到九屆二中全會上，說明他念念不忘廬山。毛澤東說：又是井岡山和中央蘇

區的人犯錯誤，他們想搞我的山頭。四方面軍的同志從張國燾事件後，比較謹慎一點了。

接著毛澤東談到九屆二中全會後採取的措施，“拋石頭”、“挖牆腳”、“摻沙子”。說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了三個，一點氣都不透。又講到“三要三不要”，說黨的方針是允許改正錯誤的。如某些同志，我們還是信任的。我同林彪談過，你說歐洲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這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麼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我講的話，有時一句頂一句，有時連半句也頂不了，頂個屁！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他們的話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他們才是天才，陳伯達是天才。毛主席對劉豐說，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

毛主席的這些話，在沿途談話中反復說過，但一次比一次說得更明朗。

毛澤東問劉豐看過新印刷的《國際歌》歌詞沒有，劉豐說沒有看到。毛澤東說：要學習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 25 周年那篇文章，要學唱《國際歌》。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國際歌》的歌詞和列寧的文章，全部是馬

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裏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爲眞理而鬥爭，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衆。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 700 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的問題。要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能實現。要團結起來，不能搞宗派主義，不要搞山頭主義。[15]

陳長江回憶：談話結束，服務員進來倒茶，毛主席請她唱《國際歌》。她唱起來，坐在沙發上的毛主席跟著輕聲唱起來，並隨歌聲旋律用手在茶几上打出明顯的節奏。劉豐等人也一起唱。唱完《國際歌》，接著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唱一段講一段，毛澤東說：歌裏頭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條要記清，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你看，就是要步調一致嘛！不一致還行呀？要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切行動聽指揮，你們還聽不聽指揮啊？到了長沙，劉豐與我們分手。這一次爲什麼把劉豐帶到長沙？毛主席沒有講，很長時間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謎，至今也沒有確實的答案。[16]

汪東興認爲：毛澤東這時帶頭唱這兩支歌，是非同尋常的。毛澤東在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時，非常注意觀察對方的態度。被毛澤東叫來談話的高級幹部都知道，此事非同小可。1984 年 5 月，汪東興對訪問者說：毛主席南巡時主要講林彪的問題。……每次談話我都參加了，每次都談廬山會議，說這是黨內第十次路線鬥爭。顯然，毛

澤東對廬山會議上的問題作了十分嚴重的估計，對華北組第六號簡報作了十分嚴重的評價，而且認爲事情還沒有完結。他這次到外地，沒有告訴林彪，這是與過去的做法不一樣的。在外地的談話內容，不僅沒有在中央會議上談過，沒有同林彪談過，而且要求絕對保密。

劉豐得天獨厚，先後聽毛澤東長談三次。毛澤東爲什麼把南巡的第一站選在武漢，爲什麼又格外“厚愛”劉豐？湖北是林彪的家鄉，劉豐曾是武漢空軍司令員。1967 年 8 月 9 日，林彪接見曾思玉、劉豐講話紀錄稿，毛澤東有兩次批示和批改，並轉發。[17] 因此毛澤東對劉豐印象極深，劉豐是不是“死黨”呢？

8 月 18 日至 24 日，整整一個星期，南巡途中的毛澤東“閉門”不出。是在等嗎？看是不是有人把消息透給北戴河？毛澤東叮囑劉豐談話內容先不要傳達，尤其對北京要絕對保密。如果是一般人不敢違抗最高指示，但如果是“死黨”，上刀山下火海也是要報告的。毛澤東南巡到武漢時，曾思玉因腎結石手術正在大連療養。9 月 1 日，劉豐向他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並一再強調要絕對保密。但最後劉豐還是告訴了李作鵬。[18]

劉豐開始遵守“紀律”，沒有往“北京”報告。

爲什麼廣州軍區傳達到師以上幹部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政委劉

興元也談話三次。

8 月 27 日 21 點，毛澤東抵達長沙，住進長沙市蓉園一號樓。這次來長沙，沒有像以往那樣到處走，而是一住下，就召集卜佔亞（湖南省負責人）和隨同到長沙的華國鋒談話。8 月 28 日 21 點，毛澤東將劉興元、丁盛和韋國清（廣西自治區負責人）召到長沙談話。毛澤東對丁盛、劉興元不很熟，談話開始前，分別問了他們的簡歷。丁盛說參加過“七大”，打過錦州，還講了參軍的時間和在紅四軍工作的情況。毛澤東笑著說：你可不要擺老資格，不要搞宗派主義呀！毛澤東又指著劉興元說：你也要注意。隨後還問了幾句有關部隊的情況。旁聽的汪東興認爲這是毛澤東爲了不讓他們太拘束，他卻不知道毛澤東另有用意。毛澤東強調：我很久沒有抓軍隊的工作了，現在要抓軍隊工作。進城以後，管軍隊工作開始是聶榮臻。以後是彭德懷，他是打了勝仗的人嘛。以後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麼多，實際上是賀龍、羅瑞卿管的多。以後是楊成武，再以後是黃永勝當總長，又是軍委辦事組的組長。辦事組裏有一些人，在廬山會議上搞出這麼些事來。我看黃永勝這個人政治上不怎麼強。毛澤東不僅點了黃吳葉李邱，還點了林彪。最後毛澤東說：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秘書和辦公室主任。你們這幾位夫人怎麼樣？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免得誤事。今天就講到這裏。[19]

陳長江回憶：主席與丁盛等人談了兩個多小時。談話要結束了，我上前把門打開，一股清涼的風迎面撲來（會客室安了空調）。他們幾位都站起來，主席與他們一一握手，說國鋒同志這就穿起軍裝，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把軍區的事管起來。又轉向丁盛和劉興元，你們有事要找他商量。丁盛和劉興元一起說，堅決按主席指示辦，請主席放心。華國鋒也說：請主席放心，我一定把（廣州）那裏的工作抓起來。丁盛和劉興元走了，只見他們情緒很好，很有信心的樣子。華國鋒和汪東興送走他們又折回室內，大約過了十幾分鐘，華國鋒才離去。[20]

恐怕連華國鋒本人也忘了他曾兼任過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吧？

其實，這只是毛澤東一個伏筆罷了。

談話後汪東興組織了座談，8 月 29 日，他將座談會的情況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邊聽邊插話。彙報到劉興元、丁盛、韋國清檢討他們在九屆二中全會所犯的錯誤時，毛澤東說：現在看來，是馬列主義沒有學好。你對丁盛、劉興元瞭解不瞭解？汪東興說：不瞭解，只是在開會時有點來往，平常沒有聯繫。通電話也是因爲有事要辦，沒有深談過。這一次他們談得深一點，擺了擺思想問題。[21]

8 月 30 日上午，毛澤東在離開長沙去南昌前，又找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華國鋒、卜佔亞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問，你們座談兩天了吧？怎麼樣？每個人都彙報了一番。

毛澤東說：你們心中要有個數，不要光在報紙上登（我的這些話）。我到處走一走，和你們吹一吹，人數不要太多了。廬山會議上講了要讀書，我希望你們今後多讀點書。毛

澤東指著劉興元問：你會寫文章嗎？劉興元說不會。毛澤東又指著丁盛，你呢？毛澤東只知道丁盛打仗勇猛，曾戲稱他“丁大膽”。丁盛說：我是文盲，主席的書還可以看得懂，外國的書看不懂。毛澤東說：那怎麼樣辦啊？請先生幫。你們都是書記，你們還要當學生。我現在天天當學生，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一點國際知識。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一份《參考消息》，太少。你們沒有時間，可以拿來叫秘書、秘書科長們看，他們看了以後，給你們的耳朵裏吹一吹風。

針對林彪一夥的問題，毛澤東說：現在不要做結論，結論要由中央做。99 人會議你們都到了，總理也做了總結講話，發了五位大將的檢討，還發了李雪峰、鄭維山兩位大將的檢討，都認爲問題解決了，做了總結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談到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說：我看他（林彪）呀，那些人幫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氣。你們經常和我通一通氣，也可以嘛。給你們通氣了沒有（都回答沒有）？我這一次也是給你們通個氣吧！要把腦子裏的東西向人家講出來，把正確的、錯誤的都講出來，就舒服了嘛。像汪東興沾了個邊，他在 1300 人的會上做了幾次檢查，他也沒有倒嘛。你把心裏的話說出來了，倒不了。當然也有少數人幸災樂禍。……毛澤東望著劉興元說：我看你這個人比較爽快，說話不那麼吞吞吐吐。劉興元說：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毛澤東說，我這個人也急，要改。[22]

陳長江回憶：毛主席在長沙住了四天，不斷找人開會，

談話，交代任務，甚爲忙碌。我負責迎送客人，不知道會議內容。大概第二天，汪東興把我們隨行幹部隊召集起來傳達，主席當著許多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質問丁盛和劉興元，你們同黃永勝關係那麼密切，來往那麼多，黃永勝倒了，你們得了？！毛主席還說：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面還有師、團，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這話毛澤東一路上反復說）？！傳達時汪東興沒有說指的是誰，我們也不好細問，但知道毛主席所言肯定是有所指的。我們眞有些擔心啊，不知道在哪裏，誰人身上又出了什麼大問題了。毛主席這幾次談話著重講了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在廬山會議上的表現。汪東興讓我們認眞討論，領會精神實質，還特別強調要結合實際工作，做好警衛，要隨時有打仗的準備。我們警衛幹部研究了幾次，總的印象是情況嚴峻，我們要提高警惕，加強責任心。無論是值班員，還是哨兵，都要做好應急準備，不論發生什麼事情，都要能拉得出，頂得住，確保毛主席的安全。[23]

一直到 9 月初，仍平安無事。

註釋：

[1] 參見宋德金《我在林彪辦公室的前前後後》，載《百年潮》2000 年第 9 期

[2] 參見高德明《吳法憲在秦城監獄內外》，載《中華兒女》1999 年第 9 期

[3] 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

[4] 採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 年 11 月 16 日

[5] [14] [16] [20] [23] 參見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第一版，142-162 頁

[6] 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412 頁

[7] [19] [21] [22]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179、114-121、124、128-136 頁

[8] [11] 參見《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473-475、480 頁

[9] [15] 參見《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1971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 12 日，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 年 10 月版，555 頁

[10] 參見中共中央辦公廳《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談話彙編》，1974 年 1 月

[12]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 1982 年版，159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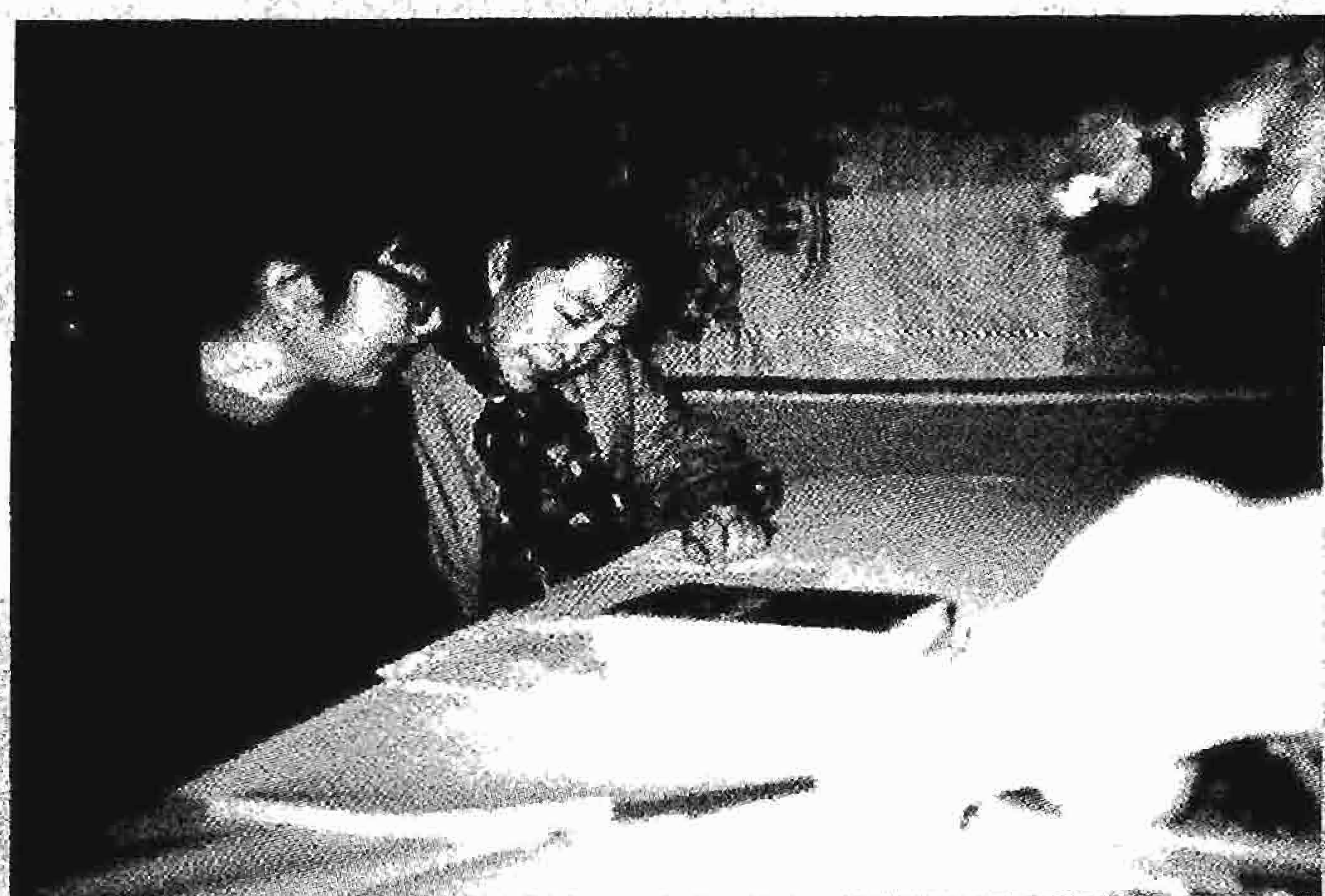
[13] 參見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509 頁

[17] 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第 12 冊 1998 年 1 月版，414-415 頁

[18] 參見李榮欣等《名將曾思玉》，作家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第一版，519-520 頁



“文革”初的林彪和林立果 林彪家人提供



這是我和林豆豆在設在總後的四野戰史編寫組。

董殿錫攝影，攝於1996年10月，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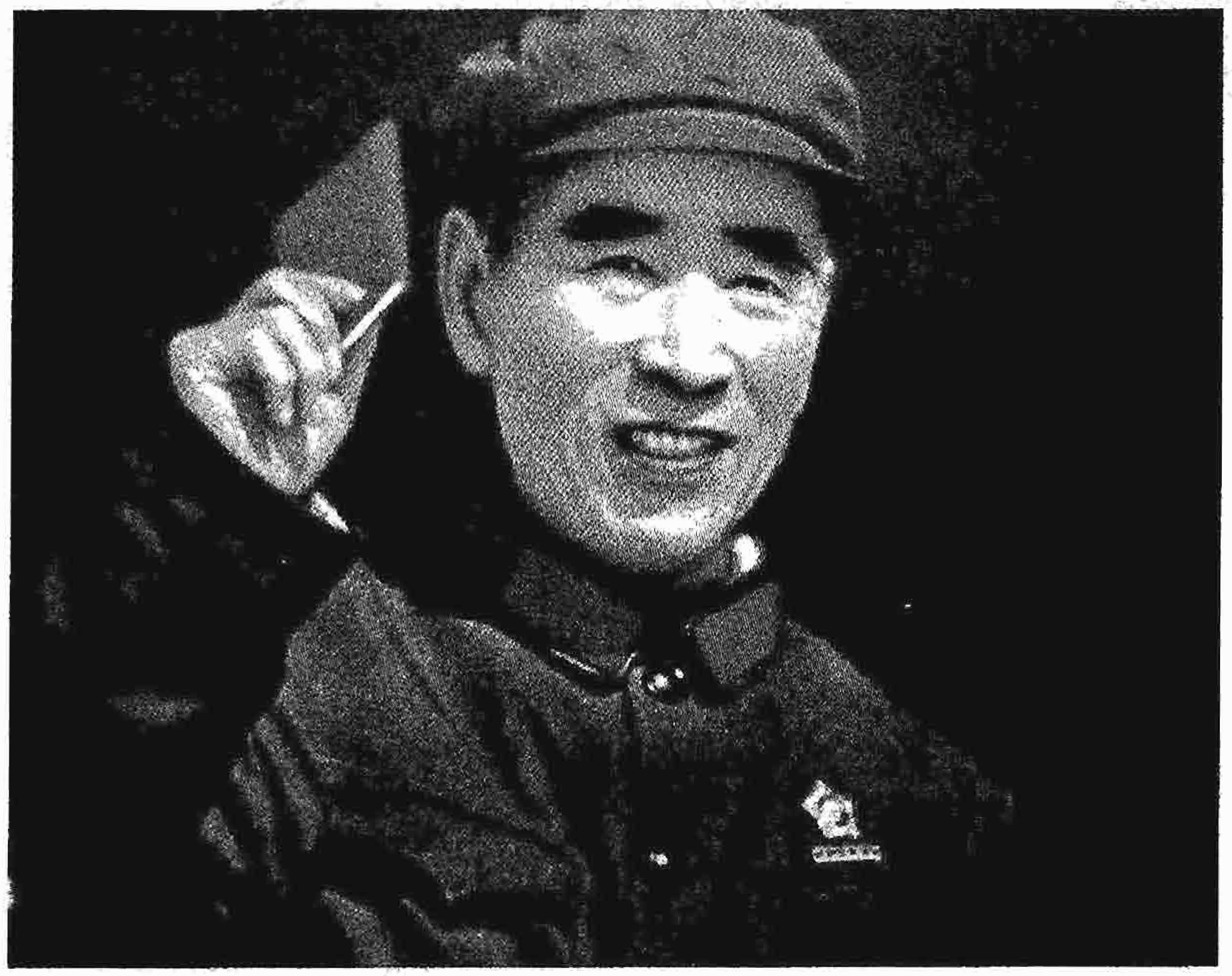


從右到左：葉群、林豆豆、李訥（左四）。

林彪家人提供，攝於文化大革命初



1956年5月3日，毛澤東夫婦坐胡萍（左5）駕駛的專機到廣州。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首次坐飛機。 胡萍家屬提供



林彪的笑容發生了變化。　*林彪家人提供*



毛澤東最後住的中南海游泳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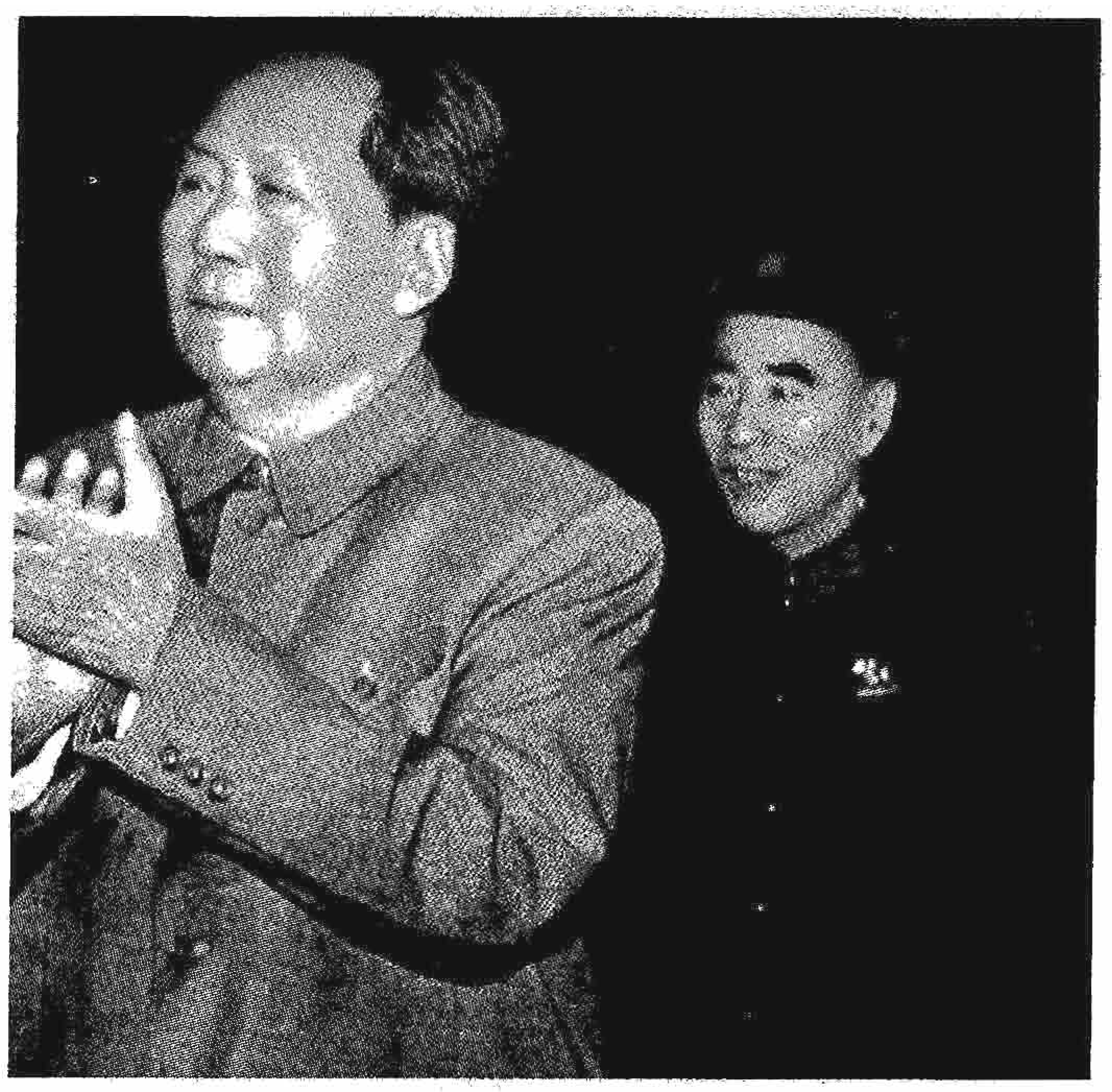
到1970年盧山會議後，林彪再也沒有這樣的燦爛笑容了。

林彪家人提供



接班人林彪的微笑。

林彪家人提供



慢慢地，林彪的笑容就有些勉強了，雖然他還跟在毛澤東的後面。

林彪家人提供





這時候林彪不笑了。

林彪家人提供

第十章
敲山震“虎”

“諸侯”們個個金口緊閉

不知道是不是毛澤東的“預防針”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劉興元在內，“諸侯”們個個金口緊閉。葉群急了，要求吳法憲及時報告毛澤東的行蹤和言行。77 歲高齡的毛澤東“周遊列國”，雖然不坐飛機，但“各方諸侯”要派飛機接送，要得到這方面的“情報”，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得天獨厚。8 月底到 9 月初，吳法憲連續給北戴河打電話，報告毛澤東在武漢、長沙、南昌的行程。可惜吳法憲只知道毛澤東到了哪，專機接了誰，卻“探”不到一星半點的談話內容。而“北戴河”最關心的就是談了什麼？葉群、林立果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他們明明知道毛澤東談話的內容與林彪有關，就是打聽不到。

8 月 26 日，毛澤東離開武漢前一天，林立果召集了一次會議，于新野記錄：成績很大；要看到不足和與形勢不適應的東西；由明鬥轉爲暗鬥；相持、相對，和平友好，醞釀新的"戰爭"；不要麻痺，要有思想準備；由對外鬥爭轉爲鞏固陣地；"戰爭"的突然性很強，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也一樣；思想、組織、行動上加強"戰備"。[1]

此記錄清楚地表明他們還不瞭解毛澤東南巡的內容。

僅憑這一點，林立果"吹"他在毛澤東身邊有"特務"，純粹是瞎說。

試想劉豐如果在 8 月 16 日透露，丁盛、劉興元如果在 8 月 28 日透露，那"九一三"就不是"九一三"了，很可能會提前。但是"可惜"，從 8 月 16 日到 9 月 6 日，毛澤東的談話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鎖"，"大棒"始終沒有揮動起來，北戴河的"蛇"不動，"虎"也不動。這怎麼行呢？總得讓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讓北戴河知道！廣州軍區是四野南下的最後根據地，林彪曾任四野司令員，在四野的部隊中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那麼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鎖"林彪。毛澤東讓汪東興通知丁盛和劉興元，向廣州軍區師以上幹部傳達他南巡談話的主要內容。

9 月 5 日，丁盛、劉興元從長沙回到廣州，按毛澤東的指示傳達。[2] 此舉一箭三雕，既給林彪透了個信，又可以發現"死黨"，同時也給廣州軍區絕大多數幹部打了"預防針"，別跟著林彪跑。

如果沒有"聖旨"，再借給丁盛、劉興元幾個膽子，他們

也不敢開大會傳達。想當年楊勇（北京軍區司令員）就是因爲傳達了高層會議的內容，結果被抓，一關四年多。丁盛等人雖是林彪的老部下，但在毛澤東和林彪之間，他們當然要選擇緊跟毛澤東，而不會緊跟林彪。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周恩來給各大軍區司令員打電話通報，第一個打電話給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丁盛很快回話，請西華廳值班秘書紀東報告總理，他已經遵照周總理的指示辦了。他忠於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聽周總理的，周總理怎麼說，他怎麼辦！[3]

毛澤東說：林彪的問題是全黨的問題。林彪搞了好久，我說了一次（指 1971 年 8、9 月毛澤東南巡講話），廣州軍區開了兩千人師以上的幹部會，林彪就不敢去了，只好往北（蘇聯）走。[4]

難怪毛澤東南巡特別強調廣州。

毛澤東對丁盛、劉興元等人說：你們都說過英明領導吧？當然，沒有領導不行。沒有一個英明領導，那你那個廣東省怎麼能管得起來呢？廣州軍區三個省有一億多人口，你們管得起來嗎？不過你們心裏要有個數，不要在報紙上登（我的這些話）。……不要公開講這次廬山會議，因爲中央還沒有作結論，你們只是說九次路線鬥爭就可以了。這是說現在的路線鬥爭還有些問題，不要像我跟你們說的這一套。但是，我們軍隊應該進行教育，所有的高級幹部都應該弄清楚我和你們吹的這些。軍長、政委這麼多，怕來不及。[5]

九一三事件兩個月後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說：南巡我講了一路，一路都講，無非是講了一點材料，陷得比較深的

是廣州，他們現在搞得比較好，其次是武漢。[6]

9月5日，丁盛、劉興元從長沙回到廣州，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召開廣州軍區 2000 多名師以上幹部大會，[7] 由劉興元"吹風"，傳達毛澤東講話的主要內容，這在毛澤東南巡的省份裏絕無僅有。毛主席說：林彪就不敢去（廣州）了。[8] 別說天高皇帝遠的廣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一個圈子知道最高層的分歧，甚至上了廬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員，都"受騙上了當"。廣州軍區的傳達會議開了一個下午，還沒開完，晚上接著傳達。規定三條紀律，不准記錄，不許傳達，不准向北京報告。

毛澤東南巡講話矛頭直指林彪，而且傳達到廣州軍區師一級了，卻不准往北京傳，不准"林副主席"本人知道。是想完全封鎖南巡講話嗎？是真不想讓林彪知道嗎？不！毛澤東想讓林彪知道，他太想讓林彪知道了。因爲林彪不知道，就不動。不動，就抓不住他的"辮子"。毛澤東南巡一路說了林彪那麼多的"壞話"，每一個字都是"大棒"，就是要打草驚"蛇"，敲山震"虎"。"北戴河"知道了，必然要蹦起"三丈高"，決不會乖乖地把頭伸到案板上挨宰。

這是一種戰術呢？還是一種策略？反正欲擒故縱，毛澤東就不相信，廣州軍區那麼多師以上幹部中就沒有人"狗膽包天"？倒是要看看，誰是林彪的親信？三令五申不准向北京傳話，傳話的人一定和林彪是一夥。

9月6日，"北戴河"終於得知

果然，顧同舟（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鑽進了毛澤東的"圈套"。會議不准記錄，他偷偷往香煙殼上記了幾筆，回家顧不上吃晚飯，先給周宇馳打了個電話。因爲晚上還要接著傳達，約定傳達完後再通電話。23 點 35 分，于新野來電話，聽顧同舟講了一個多小時。要點是十次路線鬥爭；三項基本原則；三條方針；強調幹部多讀一點書，並且加強路線鬥爭的教育；不要老婆當秘書，不要搞吹捧，對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強軍隊的軍事訓練；軍隊要防止驕傲；……

周宇馳原定 9 月 6 日到廣西桂林，臨時改變計劃。9 月 6 日一大早，周宇馳打電話向林立果報告，15 點駕直升機和于新野帶著 15 頁的電話記錄，飛到北戴河。[9]

9 月 6 日晚上，周宇馳給顧同舟打電話：昨晚于新野的記錄我們都看過了，林（立果）副部長也看過了，我們非常感謝你，你在關鍵時刻立了一功（全然不知中了計）。林（立果）副部長讓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來。也是，顧同舟不是當面"聆聽"，而是聽的傳達。林立果聽的是傳達的傳達，難免走樣，還是要爭取最"原始"。顧同舟向王璞（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借來傳達記錄本，親自動手，連夜整理出長達 50 頁的材料，9 月 9 日下午，派妻子張亞青坐專機送到北京[10]。並附上一封信，說傳達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林彪）外，主持會議者丁盛和傳達者劉興元都沒有提到林彪。在那種時候，毛林不可分，怎麼就分了呢？顧同舟想到：主席指示很多，決不止傳達的這些。

確實，毛澤東講話中有些內容涉及到林彪，被劉興元和丁盛"貪汙"了。

非常巧，林立果9月5日夜裏得知，葉群9月6日晚上也從另一渠道得到了毛澤東的"情報"。

9月6日，李作鵬陪朝鮮人民軍代表團訪問武漢。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到車站迎接，終於"金口"大開。李作鵬馬上歸結爲三條：一是廬山會議的事情還沒有完，二是"綱"上得比廬山會議時更高，廬山會議講的是路線問題，而在南巡的多次講話中，毛澤東提到1970年的廬山會議是黨內第十次路線鬥爭。上升到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三是矛頭似乎指向了林彪。因爲毛澤東有一句話，不同意自己老婆當辦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辦公室主任。[11]

李作鵬非常震驚。第一個反應不是沒事了嘛，怎麼又全"兜"出來了？而且"綱"上得更高了。毛澤東南巡前，對黃吳葉李邱的檢討都有批示，除了吳法憲，幾個"大將"都過了關。毛澤東對邱會作說：你這個檢討是你自己寫的嗎？邱會作說是。毛澤東說：我死了以後，你就當國家主席吧。從口氣中聽不出諷刺，倒像有一種讚賞。毛澤東在北京還對黃吳李邱說：你們的檢討到我這就爲止了。幾個人都非常高興，專門到京西賓館吃了一頓飯慶祝。這之後，除了吳法憲和葉群的日子還難過外，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都一身輕鬆，以爲他們的檢討眞過了關。

可是，毛澤東南巡爲什麼又說得這麼重？李作鵬非常緊張。

當天上午，李作鵬陪朝鮮人民軍代表團返回北京。下午最後一次座談結束，黃吳李邱都沒走，離告別晚宴還有一個小時，李作鵬把黃永勝拉到角落說"悄悄話"。

黃永勝說：印象較深的有兩條，一是說廬山會議沒有結束，二是李作鵬說自己現在好比走鋼絲，搞不好就要掉下來。黃永勝等人心中沒底，擔心九屆三中全會再把他們的問題端出來，十分驚慌。

吳法憲湊過去：你們嘀嘀咕咕什麼呢？李作鵬卻不想說。這半年來，吳法憲因在廬山上"衝鋒在前"，日子越來越難過，甚至想到了跳樓自殺。他心急火燎，當然想知道毛澤東南巡講了些什麼。這麼重要的情況，你給我們一起講講嘛。但廬山會議後，他們對吳法憲都不太"放心"，怕他再"放炮"。說你知道了也沒什麼好處，反而增加負擔，吳法憲不得不走開。邱會作也很想知道，在去朝鮮大使館參加晚宴時，他擠進李作鵬的車，"咬"了一路的耳朵。

這樣，"四大將"中只有吳法憲一個人蒙在鼓裏。吳法憲一肚子氣，回去就給葉群打電話告狀，說李作鵬已經得到南巡的內容，卻不向他透露。葉群安慰他：你不要誤會，也不要再打聽了，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但實際上，葉群比吳法憲緊張一百倍。

本來9月12日邱會作和吳法憲約好在京西賓館談毛澤東南巡的講話，但兩個人都有事，沒見上面。這樣，吳法憲直到糊裏糊塗被關進監獄也不知道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12]

晚宴結束黃永勝回到西山，打電話報告給葉群。因爲林立果與葉群正在密談從顧同舟那裏得到的“情報”，所以葉群不接。黃永勝急了，27 分鐘連要三次，最後說有重要事情，總機這才接通了葉群，通話時間長達 58 分鐘。21 點至 23 點，葉群、林立果、周宇馳密談。之後，葉群與林彪密談一個多小時。

1971 年到 1973 年秋以前，黃永勝多次對專案組說：那些交代都是事實，沒有一點虛假，可以爲準。專案組問：李作鵬給你講的內容，你是不是都告訴了葉群？黃永勝說：我基本上都如實告訴了她，我沒有多大保留。但黃永勝又說：有一些話我可能沒有對她講，如老婆不當辦公室主任這話。專案組問：你向葉群報告，造成了什麼後果？黃永勝說：後果當然是不好的，很嚴重的。[13]

1971 年 9 月 17 日，顧同舟被隔離審查，1980 年 7 月被逮捕，1982 年 3 月，軍事法院判決他有期徒刑 11 年，剝奪政治權利 3 年。罪行只有一條“資敵罪”。把毛澤東南巡的內容洩露給了“北戴河”，促使他們提早下決心謀殺毛澤東，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14]

李作鵬在這件事上沒“事”，他向黃永勝彙報，“理直氣壯”。黃永勝是總長，是上級，李作鵬是副總長，當然應該通個氣，他要求黃永勝不要告訴“北戴河”。[15] 但黃永勝回到西山，就“捅”給了葉群。所以黃永勝的罪名有一條和顧同舟一樣。

誰能想到，傳話也傳出“罪”來了。

9 月 6 日，“北戴河”分別接到顧同舟和黃永勝的“情報”。就這樣，“蛇”動了，“虎”也動了。而此時毛澤東正在杭州，幾天來他吃不好飯，睡不好覺，情緒越來越糟糕。尤其是 9 月 6 日這一天，他好像已經預感到了不祥之兆。接下來的六天，一天比一天更驚心動魄。一生中有著豐富軍事、政治鬥爭經驗的毛澤東，對付林立果這個毛孩子和葉群這個婦道人家，簡直是老鷹捉小雞。

許世友和韓先楚“失蹤”了

毛澤東在湖南長沙時，就叫汪東興提前通知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和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到南昌來。8 月 31 日 17 點，汪東興向許世友、韓先楚傳達毛澤東在湖北、湖南的談話內容。21 點，毛澤東到達南昌，說既然車停好了，許世友也剛來不久，那就乾脆在火車上談吧。22 點多，毛澤東與程世清、許世友、韓先楚等開始第一次談話。

毛澤東開門見山講黨的歷史，十次路線鬥爭都是要分裂黨，但沒有分裂成。毛澤東對許世友說：長征路上，張國燾搞分裂，成立僞中央，你是清楚的。許世友趕快聲明：僞中央沒有我，有陳昌浩等人。毛澤東擺擺手，表示並沒有把許世友劃到張國燾一夥中去。接著毛澤東談了陳獨秀搞分裂，又說到去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說：許世友同志啊，你與上海、浙江的關係有些緊張，有些問題呀？許世友馬上說：我與上海（張春橋）關係比較好，“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春

橋一直保我，一直爲我說話，並且有我的大字報時，他還派人去覆蓋。毛澤東說：覆蓋不對。不應該覆蓋嘛，讓人家去看嘛，有什麼關係呢？許世友又補充說：我與王洪文的關係也比較好。

當然，連坐在一邊的汪東興都聽出來了，許世友說的並不是心裏話，他恨死了張春橋。但在那種時候，他不這樣說又怎樣說呢？毛澤東說：你這個許世友呀，應該高抬貴手，刀下留人。汪東興注意到，許世友聽到"刀下留人"，非常緊張。許世友連忙說：哎喲，我和南萍（浙江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政委）的關係請中央派人來調查。浙江問題給毛澤東的印象很深，1969 年 1 月 8 日至 29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解決浙江問題的會議（1 月 4 日周恩來與許世友商定先解決浙江問題），包括許世友在內的南京軍區、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浙江省軍區等 10 位領導幹部參加（名單由許世友擬定，並由周恩來報毛澤東批准）。毛澤東要雙方多做自我批評，不要批評對方。如今兩年多過去了，浙江的武鬥仍沒有停止。毛澤東問許世友：據說舟山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你這個司令員有沒有責任呀？那樣搞武鬥，南萍有責任，但全都是南萍的責任嗎？

毛澤東轉身與韓先楚又說了幾句，韓先楚的情緒比較輕鬆。毛澤東說締造人民解放軍、領導我們軍隊的人，能締造、能領導，就不能指揮嗎？他們把締造和指揮分開，難道締造者就不能指揮嗎？這是不對的。締造者、領導者也不是少數人，也不是我毛澤東一個，也不是你林彪一個，我們黨內還有很多同志是領導兵暴的、領導軍隊的，朱德、周恩來、賀龍、劉伯承、葉挺，這麼多人發動的南昌起義，他們就不能指揮了嗎？張國燾在長征路上搞政變，他也是締造者、指揮者。但是，他指揮軍隊搞分裂，拿軍隊作爲本錢來搞分裂，那就不好了。毛澤東對許世友說：你們和張國燾是一個部隊的，你們要接受這個教訓。

毛澤東屢屢提到張國燾，又提到"締造""指揮"，實在讓許世友心中不安。他轉移了話題，說主席呀，有"516"分子怎麼辦呢？毛澤東說，怎麼又談到"516"啦？許世友說："516"在南京相當厲害。文鳳來是"516"分子，這個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澤東問：毒害我的事，你們查清楚了沒有呀？許世友沒有回答。毛澤東說：這件事，你們要查清楚，不忙做結論。接著毛澤東問許世友：你們南京軍區不是有一個有名的王林鮑（王必成，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林維先，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鮑先志，南京軍區副政委）嗎？還有別的人，他們都是造反派嗎？許世友說：他們都是造杜平（南京軍區政委）的反。毛澤東問：他們爲什麼不造你的反？許世友說：他們不造我的反。毛澤東說：你這個地方缺少一個"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準備另找一個政委幫幫你的忙。毛澤東知道許世友和張春橋（曾任南京軍區政委）的關係很僵。談話進行了一個半小時，零點了，毛澤東要汪東興組織許世友他們先座談一下。

許世友穿白汗衫和綠軍褲，腳上穿一雙用麻繩布條編織的涼鞋，鞋面還綴著一個紅穗子。望著許世友的裝束，毛澤

東突然問：現在還打獵不打了？許世友毫不猶豫地說打！毛澤東哈哈大笑。許世友和韓先楚都是"打獵迷"，兩位好朋友難得碰到一起（許世友最佩服韓先楚，說老韓的膽子比雞蛋大）。9月1日下午開完座談會，他們就高高興興打獵去了。第二天早上，許世友又扛著獵槍到機場附近的草灘打野兔子。

年事已高的毛澤東本來就帶著病，加上連日的奔波和談話，加重了感冒，下午體溫38度多，晚上臥床休息。9月2日上午8點，毛澤東起了床，說我們要走了，怎麼辦？汪東興說：您看呢？毛澤東說：還是見他們一下吧。汪東興馬上通知許世友、韓先楚等，可是怎麼也找不到他們了。汪東興急得夠嗆，心想這下糟糕了。半個小時後，才摸到他們的行蹤。好在跑得不遠，馬上派人把他們叫了回來。

這一次談話時間不長，只有40分鐘。毛澤東說：今天我要走了，汪東興向你們傳達了我在路上的談話，你們也談了談。昨天座談得怎麼樣？有什麼新的意見沒有？韓先楚沒有"包袱"，搶先說：我在座談會上說，要聽毛主席的，九屆二中全會我們大家都起了哄，我們犯了錯誤，我們做自我批評，請主席放心。許世友請示：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們解決（與南萍的矛盾）？毛澤東說：不談這個問題，到浙江不談這個問題啦！許世友問：那我回去嗎？毛澤東說：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16]

南昌，似乎是毛澤東南巡的一個轉折點

8月31日21點，專列離開長沙，調頭東南，朝江西省會南昌開進。毛澤東在南昌的住處是市郊山坡的一棟別墅式建築，距市區約有十餘裏。1962年毛澤東南巡時在這裏住過。程世清（江西省負責人）向汪東興報告周宇馳帶來一輛水陸兩用汽車，讓南昌仿照，第二次來又用飛機拉走了。據總政保衛部偵察和汪東興證實，確有此事，但汪東興說：不過程世清說了些什麼，我不清楚，我讓他直接向毛主席報告。9月1日、2日，程世清兩次單獨向毛澤東彙報。

據程世清交代：他向毛澤東報告的主要內容是，（1）8月24日零點，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打電話要我去彙報華東組的討論情況，並帶我到葉群那裏。我把葉群談的問題報告毛主席。我還說，"四大將"一定是有什麼把柄被葉群抓住，先把"四大將"的問題弄清楚，葉群的問題就搞清了；（2）7月周宇馳曾兩次到南昌，並運來一輛水陸兩用汽車，要江西仿製。7月底再來時很神秘、鬼祟，把改裝的水陸汽車很快用飛機運走，我懷疑他們要逃跑；（3）林豆豆幾次來江西，對我說，你見到主席也說說，葉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開會，瞞著首長（林彪），林立果也不知道在下邊幹些什麼，林豆豆還要我少與林家接觸。從林豆豆的言談中，可以看出她與家人有矛盾；（4）在延安黨校時就有傳說，葉群是特務。也有人懷疑，林彪的病是葉群搞的。林彪這麼多年脫離實際，形而上學的東西很多，比如在部隊搞"四好"、"五好"，

鬧的矛盾很多，相互不團結，事故很多，副作用大。

這個彙報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張耀祠回憶：聽完後，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條線，遠眺窗外，沒有講一句話。以後毛澤東讓程世清寫一個調查報告，並說這些問題非常重要，將來只准報告總理，別人不能講。[17]

從"九大"把林彪樹爲接班人以後，毛澤東就對林彪存有很大的戒心。是不是與蘇聯說中國"軍閥官僚體制"有關？中央委員會與政治局中軍人多，毛澤東又不放心了。毛澤東南巡到杭州時說：過去我就講過，一個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個主要傾向，誰知"三支兩軍"掩蓋著一個廬山會議的主要的傾向[18]。九屆二中全會攤了牌，那一夥"槍桿子"難免"狗急跳牆"。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特別是在新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情況。因而毛澤東一路上處處提防，警覺性極高。

陳長江回憶：九一三事件前，一向開朗的毛主席有一段時間不知爲何陷入了苦悶和抑鬱之中，顯得很是沉重。不知他是發現了什麼不好的徵候，還是預感到什麼不祥的事件，他經常神情沮喪，憂心忡忡，心緒不寧，很少能看到他的笑容，也難以聽到他那充滿自信和富有表現力的風趣而詼諧的話語。連著幾天，他進食很少，更爲突出的是他無論如何也睡不著覺。有一天，天將破曉，毛主席睡不著，出來散步，我像往常一樣，急忙跟在他身後隨著他往前走。到了門口，毛主席看到了門衛哨兵，問我，長江，你們哨兵帶槍和子彈沒有？我不由一驚，以往毛主席可不是這個樣子啊！我們知道，毛主席一向不喜歡警衛佈置上那種荷槍實彈，戒備森嚴，擺架子，抖威風的做法。爲使警衛形式緩和，警衛分隊不僅人數盡可能要少，哨兵大都身著便裝，不帶明槍，當然短槍是有的了。毛主席面前的這個便衣哨兵，兩手空空，就像一個無所事事的閒人，熟悉情況的毛主席一眼望去，便知道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警衛戰士。毛主席對在他附近執行任務的許多警衛戰士，一見面就能直呼出名字，甚至誰上哪一班哨，他的老家在哪裏，家裏有些什麼人，日子過得怎麼樣……也能說出來。可是對於執行警衛任務的哨兵帶不帶子彈，在我的印象中他很少在意，更沒有問過，因爲他對自己的安全可以說從來沒有過什麼擔心，他對警衛戰士的忠誠和能力，也是完全相信的。在人心向背與武器裝備之間，他更相信前者的威力，卻不大計較後者的作用。我這人說話很簡單，但今天對毛主席關心的這個問題倒多說了幾句。我說不僅帶了手槍，還帶了衝鋒槍和機關槍呢，每個人都是長短槍，子彈也帶了很多，敵人來個一兩百，能對付得了！毛主席聽了，滿意地點了點頭，有壞人，要提高警惕……他沒再往下說，沿著院裏的林蔭小道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著。

南巡前，汪東興和張耀祠向我佈置了毛主席外出的警衛任務，要我們迅速做好準備。他們特別強調，去年的廬山會議，問題並沒有解決，現在情況更趨複雜。有些地方還在真槍實彈地武鬥，鐵路沿線的治安也不好，隨行分隊要有隨時投入戰鬥的充分準備。並交代了這次可能遇到的各種情況，以及對這些情況的處置原則和方法，還有注意事項等等。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視，我都隨同前往。警衛分隊剛開始十幾

人，幾十人，最多時一百幾十號人。主要是在住處值班，接送內外賓客。另一項工作，也是老任務了，外出隨行。警衛人員都是根據上級的指示和外出的時間、路線和到達的地點等有關情況，制定出實施方案和計劃。它包括警衛部隊的人員組成，帶多少人，需要準備的物資和裝備，部隊按什麼樣的順序，編成怎樣的隊形，以及中途停留、駐地佈置的兵力組織…… 張耀祠對我說，這次不是新任務，你們也不是第一次外出，但這一次確有許多新情況，可能遇到許多麻煩、困難和危險，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點也不能大意……

就在此間的一天，毛主席在游泳池院裏散步，我習慣地跟在他的身後，和他走在了一起。毛主席情緒深沉地說，軍隊鬧的厲害，有的不聽指揮，要進行改組。我很不理解，在毛主席面前，我一向有什麼說什麼，也沒有什麼顧慮，我說，主席，人民解放軍的幹部戰士，沒有一個不聽你指揮。毛主席說，你不瞭解情況，不知道啊！他沒有進一步講。我呢，不好細問。想來汪、張兩位主任所以把這次外出講得那麼嚴重，自然和這種情況有關。因此，我們準備外出的動員、組織工作，十分仔細認眞。我也把毛主席最近一個時期以來談話的一些內容告訴大家。還傳達了毛主席批評葉群。對我們、對戰士來說，這些話似懂非懂，但因爲是毛主席講的，領導傳達的，因而我們堅信他是正確的。黨內領導層存在矛盾和鬥爭，通常情況下我們是不知道的，現在毛主席講出來了，傳達下來了，這足以說明情況的嚴重性、緊迫性。我們部隊一向以熱愛黨中央、熱愛毛主席教育部隊，因而一動員，就鼓起了大家不惜以鮮血和生命做好警衛工作、保衛毛主席安全的決心。

過去隨毛主席外出，他總嫌人多，每次都有極嚴格的限制，但 1967 年去武漢，特別提出多去一些人。根據這一意圖，我從中隊挑選了 120 餘人，大多數是有經驗的幹部，我帶 40 多人上主車。在武器的配備方面也有意識加強，做到了槍要夠，子彈要足，同時給部隊配發了手榴彈、小鐵鍬和十字鎬等野戰作業方面的器械，做了隨時可以投入戰鬥的準備。對應付可能遇到的不測也制定了預案，多了幾手準備。三個專列，前車，主車和尾車，保證主車的兩節車廂，進退自如。[19]

毛澤東專列的行蹤十分機密，但也不是沒有遇到危險。

王愛梅（專列列車員）回憶：1961 年中央在廣州開會，專列停在白雲機場專用線，不知哪個環節洩密。那天我們正搞車廂衛生，突然車廂外面響起機槍聲，炮聲，火光衝天，我們都驚呆了。正不知所措，專列在沒有任何通知的情況開動了。我們趕快各自跑回車廂，拉下總閘，關閉車內所有的燈光，鎖好車門，拉好窗簾。我來回檢查車廂，發現沒來得及撤掉的電話線扯斷後一頭掛在車窗外，趕緊拉回車廂。從漆黑的車廂往外看，天空硝煙滾滾，火光一片，專列飛快地駛出槍林彈雨，轉入另一條僻靜的專用線。第二天，專列開回白雲機場專用線，做出專列要撤出廣州的架式，隨即開來一串汽車，汽車上下來很多年輕人，每人提著一個大皮箱和一個手風琴箱，原來是八三四一部隊的戰士，箱裏裝的是武

器。毛主席的灰色"吉姆"車也來了，裝上了車，列車又轉入另一條安全的專用線停留。事後才知，白雲機場上空有敵機偵察這一帶地形，我方用機槍和高射炮猛烈射擊。[20]

陳長江回憶：要時刻準備投入戰鬥，我們對所屬人員進行了編組部署，區分各自的任務，指定各部位的指揮員，規定聯絡方式和信號，使前後左右有機地協調配合，相互策應支援，形成一個完整的戰鬥整體。以前我們隨毛主席外出，主要是值勤站崗，很少或沒有搞過軍事訓練，這一次卻不同，不但加強了這方面的內容，而且還在駐地的一些重要部位，構築了簡單的工事，對付突發變故的準備也比較具體。這在我隨毛主席多次外出中應該說是絕無僅有的一次。[21]

一路上，毛澤東反復說：進城那時，我管打仗，也管軍隊。朝鮮戰爭人家打勝了，我就沒有管了，要人家去管。軍隊開始是聶榮臻管的，以後是彭德懷管，後頭是林彪管，但他身體不好，也管不了那麼多，羅瑞卿、楊成武也不聽他的，我幫忙也不夠。現在的幾位大將（黃吳李邱），我也不熟悉，不瞭解，同他們單獨談得不多，集體談得也不多。黃永勝現在思想狀況怎樣，也不清楚。過去我沒有管，現在我要管軍隊的事，我不相信軍隊要造反。[22]

註釋：

[1] 參見于新野 1971 年 8 月 26 日"聯合艦隊"會議記錄

[2] [6] 參見于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干歷史問題的考察》，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版，178、183 頁

[3] 採訪丁盛女兒筆記，2005 年 10 月 18 日

[4] [8] [17] 參見張耀祠著《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版，120、104-105 頁

[5] [16] [18] [22]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134-139、142-150、154-156 頁

[7] [10] 參見 1982 年 2 月 25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顧同舟資敵案公訴詞

[9] [11] [13]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 1982 年版，122-123、113-117 頁

[12] 採訪邱會作大兒子邱路光筆記，2006 年 1 月 5 日

[14] 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刑事判決書[1982] 刑字第 1 號》，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版，第 230 頁

[15] 蕭思科《超級審判——圖門將軍參與審理林彪反革命集團案親歷記》下册，濟南出版社 1992 年 11 月版，648 頁

[19] [21] 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142-162 頁

[20] 李靜主編《實話實說豐澤園》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0 年 6 月版，181 頁

第十一章
神出鬼没

在杭州，是什麼情況引起毛澤東警覺呢

汪東興回憶：現在想來，那時的形勢極其危險。毛主席對林彪陰謀究竟何時察覺，察覺多深，他並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況全部告訴我。[1]

9 月 3 日零點，專列從南昌到達杭州，停在筧橋附近鐵路的專運線上。列車剛停穩，住處還没有安排，毛澤東就在車上找浙江省負責人談話。9 月 4 日、5 日，汪東興奉命向南萍等人傳達毛澤東前幾次的談話內容。這時毛澤東的談話已經不再繞圈子，我們黨搞了十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2]

毛澤東住在杭州西湖邊上的劉莊一號樓。劉莊的院子很

大，陳勵耘（空五軍政委）也住在這裏。陳長江回憶：我還是老習慣，佈置完警戒，便由近及遠地查看周圍地形。這地方，我不是第一次來，地形、佈置等沒有多少明顯的變化。但接觸到的工作人員如服務員、廚師等，熟面孔少了，新人多了。這些新人，無論男女，個個年輕精幹，顯得訓練有素，一問才知道是為這次任務特別挑選來的。後來我又發現我們週邊警衛也有了變化。過去我們來浙江，警衛都是由當地公安機關具體部署和實施。這一次，省公安機關的那些老熟人也不見了。汪東興說：週邊警衛系統和公安系統由陳勵耘負責，掌握著杭州的警備大權，直接指揮毛主席在杭州住地的警衛工作。儘管出面接待的還有好幾位，但眞正說話算數的，是陳勵耘一個人。[3]

汪東興回憶：毛主席得到新的情報，一些多次接待過毛主席的劉莊工作人員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況，陳勵耘佈置他們向他彙報毛主席的活動情況。還有人指責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支線"礙事"，妨礙他們走路，這都是過去沒有過的事情。白宗善（空五軍軍長）暗中派人傳話，有人並不歡迎毛主席到杭州來，並暗自裝備飛機，要毛主席多加小心。[4]

50 年代末，中央辦公廳為完整保留毛澤東的談話檔案，開始安排錄音。1959 年在湖南，就是工作人員反映，毛澤東瞭解到有人"竊聽"，最後"抓"出了楊尚昆[5]。從此，毛澤東格外小心。

當時毛主席沒有對身邊的人講起過，事後也沒有對誰講過。不過能夠感覺到，南巡到南昌，毛主席的行動急了，更加草木皆兵。但眞正緊張是在杭州，毛澤東離開南昌到杭州後，就神出鬼沒了。汪東興說：主席歷來是說走就走，從不讓人送行，他一進車廂，列車就啓動了。但突然改變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規。確實，毛澤東到了杭州，改變了南巡以來的做法，不再像武漢、長沙、南昌那樣，長時間地反復地從容地談話，而是長話短說，行動非常警覺。

在杭州期間，毛主席已經察覺和瞭解到林彪一夥進行陰謀活動的部分新的情況[6]。陳長江回憶：就在這幾天，汪東興找我們幾個幹部開會，說前幾天給你們講"三要三不要"，那是有所指的，有人要分裂黨，有人不聽指揮，現在情況比較複雜，你們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壞。我很想知道是誰在分裂黨，是誰不聽指揮，又是誰在搞破壞，好心中有數，以利於防範。但長期以來做警衛工作養成的習慣，深知此時此刻不宜提出任何問題，重要的是做好應變準備。不過，顯而易見的是我們這次來杭州，確與往日有很大的不同。杭州是毛主席常來的地方，毛主席每在杭州小住，對浙江省委、省公安廳的同志不僅很尊重，很愛護，也很有好感。如今，那些他熟悉的幹部都靠邊站了，整個杭州的警備大權，都是陳勵耘管著，而毛主席不知為什麼，對這個陳勵耘，又很厭惡。[7]

汪東興也說：毛主席對陳勵耘表現出明顯的反感。

陳勵耘，四川成都人，1919 年生，1938 年 2 月到延安，同年入黨，歷任抗大九分校指導員，新四軍一師山炮營政委，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團政治處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

年任空軍某師副政委、政委。能說會道，是當時爲數不多的有才華的師政委。1964 年升任軍政委，與資歷相同的幹部比，他的提升是比較快的。[8]

毛澤東到達杭州，陳勵耘等前去迎接，一走進車廂，陳勵耘就感覺到毛澤東的冷淡。當工作人員介紹他時，毛澤東說：廬山會議你們有什麼錯？聽說吳法憲找你們談了，他搞的那一套，說不是有八個人嗎？毛澤東看著陳勵耘，又問道：其中有你一個，還有上海的王什麼（注：王維國）。陳勵耘一聽緊張起來，慌忙解釋：在廬山，吳法憲找我佈置空中警戒時，陰一句陽一句，這個人說話不算數的。毛澤東聽後說：是啊，說話不準確！陳勵耘說：上山前不知道他們這些事。毛主席說：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軍有，海軍有沒有？他們是不是內部有通知呀？陳勵耘望著毛澤東發怔，沒有回答。[9]

毛澤東突然離開杭州，沒有通知陳勵耘，他卻來了。汪東興認爲，陳勵耘到了車站後，他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裏有鬼，當時神情很不自然。[10]

可是，陳勵耘卻是另一種說法。毛主席和他們談了"摻沙子"、"挖牆腳"等，其中一句話引起陳勵耘的注意。毛澤東說：林副主席要保。這就是說，林副主席犯了錯誤，不犯錯誤，何必保？但是，陳勵耘還不敢想兩個主席之間有矛盾，也沒有想到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有錯誤。談話之後，毛澤東說：我打算在你們這裏休息幾天，你們歡迎不歡迎？陳勵耘說：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請主席下去休息。

毛澤東說：你們歡迎，我就去吧。毛澤東在杭州住了一個星期，走時陳勵耘去送，還有秘書王明鑫和警衛幹事孫世臣。陳勵耘回憶：我在車廂門口送主席。主席上車時，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親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車後，汪東興、張耀祠還站在車廂門下月台上。汪東興招呼我過去，問我還有什麼事嗎？我們要走了。我上去同他們握手，祝他們一路平安。他們上車，我看車子平安開走了，鬆了一口氣。總而言之，沒有一點不正常。有人竟說我企圖帶槍接近毛主席，當時緊張得面孔發白，手發抖，幸虧汪東興發現，把我的手抓住。又說我佈置警衛處的人，在紅房子頂上安了機關槍。眞不知是哪個的胡思亂想。[11]

毛澤東突然決定轉移專列

從 9 月 4 日至 9 日，毛澤東又"閉門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這回有了動靜。

9 月 6 日，"那一夥人"得到了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開始瘋狂的策劃。9 月 8 日上午，于新野從北京飛到上海。在機場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偉信，于新野匆匆說了幾句，現在形勢很緊張，我到上海先給王維國打了個招呼，下午 18 點多于新野坐車從上海到了杭州，21 點多在醫院見到陳勵耘，追問毛澤東到底在杭州講了一些什麼。

以後經過偵察，陳勵耘並沒有洩露毛澤東的談話內容。王維國在法庭上只承認于新野給他看了毛澤東南巡的講話

紀錄，和陳勵耘一樣堅決不承認于新野講了暗殺的事。現在看，林立果的暗殺這時還沒有開始商量。據汪東興後來瞭解到的情況，陳勵耘接待于新野的房子裏掛著一張毛主席像，他一看到毛主席像就發愁。[12] 九一三事件後馬上入獄的陳勵耘承認謀殺，後來翻供，說當時是爲了保護軍裏的其他同志，其實他根本不知道謀殺一事，沒有人對他講，他也沒有想謀殺毛主席。最後陳勵耘被"免於起訴"。[13]

接獲不同渠道反映的種種可疑情況，儘管只是一些蛛絲馬跡，但已經讓正在杭州逗留的毛澤東感到來者不善。陳長江回憶：這次住在杭州，隨著時間的延續，毛主席的情緒越來越不安。不知道他發現了什麼，還是怎麼了，他吃不下去飯，睡不著覺。見毛主席這樣，連我們也覺得不安，儘管並不理解這是爲什麼。有天上午，毛主席出來散步，依然是小商、小吳陪著。當時部隊正集合在禮堂門前一棵高大的樹下，由我講形勢和注意事項，講得最多的還是那個最爲重要的話題，提高警惕，確保安全。幹部戰士身著便服，每人坐一個小馬紮，成排成列，聚精會神。儘管天氣很熱，他們仍然服裝整齊。這時，毛主席來到我們隊前，大家熱烈鼓掌，我說，主席，我們正在學習，講你說的那個"三要三不要"，我講得不好，請主席給大家講一講吧。毛主席向大家擺了擺手，表示不講了，叫我指揮大家唱《國際歌》吧。我這個人不擅長文藝，從來沒有指揮過。不知什麼時候趕來的汪東興對我說，毛主席說了，你又是隊長，不指揮還行！我硬著頭皮指揮，開始還有些緊張，生怕指揮錯了，大家越唱越來勁，

四五十人唱歌，比一百多人的連隊唱得還響，我們一連唱了兩遍。毛主席很高興，說唱得不錯，再唱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唱完了我說，主席，你還有些什麼指示？毛主席揮了揮手，你們的歌唱得很響，不僅要會唱，還要照著去做，一切行動聽指揮嘛。[14]

那麼，毛澤東是不是草木皆兵呢？

這次外出，毛澤東的活動範圍較廣，接觸的人也相當的多，其中有不少人被毛澤東認爲是林彪那一夥的。總之越到後來，毛澤東瞭解到的"可疑"情況也就越多，越覺得"問題"嚴重。9 月 8 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帶著"手令"飛回北京，于新野正和陳勵耘在醫院密談時，毛澤東當機立斷，下令專列從筧橋機場專線上轉移。

汪東興問：向後（金華）還是向前（上海）？他建議轉移到杭州到寧波的一條支線上，離杭州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毛澤東同意，說那樣就可以少走回頭路了。[15]

陳長江回憶：工作人員剛吃過夜餐，毛澤東突然叫小商，要他立即通知專列連夜轉移到杭州和上海之間紹興近旁的一個叉道上。當時以爲我們的三個專列停在一個叉道上，有人認識哪個是毛主席的車，停在那裏顯得目標過大，或是發現了什麼可疑的徵候。當然，這都是我們的猜測分析，到底爲什麼要連夜把專列調走？毛主席一直沒有對任何人講過。[16]

看來，這是個緩兵之計，容易讓"敵人"產生錯覺，毛澤東並沒有離開杭州的意思。

汪東興馬上佈置，打電話給陳勵耘。秘書說陳政委不在，您有什麼事情跟我講。汪東興說：專列要轉移，這個事對你講，你能辦成嗎？能！你可以試著辦一下，不過還是要找到陳政委。汪東興心裏打了個問號，這個時候，陳勵耘到哪裏去了？他對張耀祠說：天氣太熱，專列轉到新的地點後，給主車和餐車上面搭個防曬的棚子。這些情況，汪東興都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這個辦法好。[17]

是巧合嗎？此時林立果在北京商量杭州用轟炸機炸專列，汪東興接著要搭個防曬的棚子，是防曬嗎？是怕轟炸吧？怕轟炸機轟炸，把專列僞裝起來！此舉說明毛澤東對“那一夥人”的一舉一動明察秋毫！

汪東興認爲，這時毛主席還不知道林彪的那個“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夥進行武裝政變的計劃。但是，毛主席憑著他多年高度的警覺性和豐富的鬥爭經驗，在思想上、行動上已做了各種防範準備。不過汪東興也說了，毛澤東知道的比他多。試想如果毛澤東連轟炸專列都知道的話，怎麼可能不知道“手令”？所以不能斷然下結論說毛澤東不知道。

毛澤東不動聲色地採取了種種措施，果斷地擺脫“控制”。

9 月 9 日淩晨，專列轉移到靠近紹興的一條支線上。[18]

毛澤東突然離開杭州到上海

9 月 10 日吃過午飯，毛澤東突然對汪東興說：立即把

專列調回來，馬上走，不要通知陳勵耘他們。毛澤東似乎知道陳勵耘的“活動”，對他分外警惕。汪東興說：不通知不行。爲什麼呀？您不是一般人，來的時候都通知了，走時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還是要靠地方。毛澤東說：那就不讓陳勵耘上車來見，不要他送。汪東興說：那也不行，會打草驚蛇，是不是請南萍、陳勵耘……毛澤東打斷，還有一個，空五軍的軍長白宗善，這個人也請來。爲什麼這次沒有請他見面？毛澤東和白宗善握手時問他：你爲什麼不來看我？陳勵耘趕快解釋，他那天值班。

毛澤東說：廬山問題不那麼好，但沒有廬山會議，也不會有現在的情況。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不徹底，還沒有總結。光開不到一百人的會議不行，軍隊還可擴大到軍長、政委參加，地方也要有相當這一級的同志參加。毛主席進一步談到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和陳伯達的問題。說廬山會議，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國家主席問題，一個是天才問題。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出三個副詞，當時兵荒馬亂，那時還需要嘛。“九大”後就不同了，要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那幾個副詞我圈掉過幾次了，“九大”的《黨章》草案上那三個副詞，我就圈去了。“九大”《黨章》已定了，你們爲什麼不翻開看看？最後毛澤東又談到軍隊問題……

講了那麼多，毛澤東卻沒有告訴他們，他馬上要走。汪東興回憶：在毛主席同浙江省及軍區負責人南萍、熊應堂、陳勵耘談話的一個多小時裏，我忙著調專列。當時我也發現有些現象不正常。杭州我們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轉往上海。

由於我們的行動非常快，使得陳勵耘和王維國等人措手不及。[19]

陳長江回憶：9 月 10 日這一天，就像往日一般，大家該做什麼做什麼，沒有任何特別的安排。這天上午，我們與住地的警衛營打了一場籃球友誼賽，天太熱，上場的隊員個個像水洗一樣，中午又吃的是熱麵條，猶如火上澆油，戰士們剛換上的衣褲馬上濕淋淋的了。午飯後，大家都洗了衣服。中午剛過，毛主席突然說馬上就走，沒說去哪裏。剛洗的衣服還在往下滴水，怎麼辦？我讓戰士用雨衣把濕衣服包起來，全部帶走。馬上登車，所帶東西包括廚具都裝上了車。我們並不明瞭眞正的敵人是誰，在哪裏，但我們很快進入狀態，做好了開行的準備。前衛車和後衛車的分隊人員提前行動，因爲前衛車要提前幾分鐘開，控制車站進出口和登車地點，留下 30 多人隨我跟專列一起行動。毛主席乘一輛小轎車，由汪東興陪著，我和張耀祠坐車在前面開路，警衛戰士乘一輛麵包車緊隨其後。由於毛主席是突然行動，我們又提前控制登車地點，因而從出發到登車都很順利。[20]

臨走沒通知任何人，陳勵耘卻來了。據汪東興說，沒讓陳勵耘上專列，只與他握了握手。陳勵耘問車開後，要不要通知上海？其實汪東興已經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因爲陳勵耘在汪東興的屋子裏，汪東興躲到主席的房裏給王洪文打了一個電話。當然汪東興不能說他已經通知了，他讓陳勵耘打電話給王洪文或王維國，這兩個人都可以，就說我們的車出發了，還是在那個支線上停住。後來汪東興核實，陳勵耘確

實打電話通知了王洪文。[21]

13 點 40 分，專列從紹興返回，14 點 50 分抵達杭州。

16 點毛澤東的專列開出杭州，向上海方向急駛。

18 點 10 分，專列順利開進上海，停在虹橋機場附近的吳家花園專運站。但是，按照汪東興的說法，毛澤東專列是 22 點以前到的上海，路上走了五個多小時。[22]

在上海，毛澤東沒有離開專列一步

此次南巡，情況最爲複雜、最令人擔心的是上海這一站。

張耀祠回憶：1970 年廬山會議性質是什麼，當時會上沒做結論。毛主席沿途打招呼，我們一直很緊張，對接近的人都很警惕。江青也想拉攏我們，我沒有對主席講，對總理和汪東興講過。以後江青告狀，說八三四一部隊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主席說，（八三四一部隊）怎麼是林彪的人？林彪一個也沒帶走？如果是林彪的人，他爲什麼還要成立大小艦隊？[23]

其實江青不知道，在毛澤東眼中，警衛人員比他的兒女還要親。毛澤東生活中有兩個大難題，睡覺和大便。衛士按摩幫他解決睡覺，灌腸幫他解決便秘。每當衛士灌腸，毛澤東總是很難爲情，有一次對衛士李家驥說：家驥呀，我這個家和我本人都離不開你們，你們做了我的孩子都難以做到的事，要不然我就成了廢人，無法生活和工作了。毛澤東曾對張耀祠等人說：你們對我比我的兒女對我都好。我們朝夕相

處，你們比我和孩子的感情還要深[24]。確實是這樣，毛澤東南巡到南昌時，他的女兒李訥正在南昌附近的進賢縣五七幹校，但一直到毛澤東離開南昌，也沒有把會見女兒排上日程。李訥當上《解放軍報》總編組組長，北京市委副書記，毛澤東知道很生氣，一定要她下去勞動鍛煉。李訥和毛遠新被列入"九大"代表名單，毛澤東提筆圈掉，並指定從警衛部隊補選。一中隊副區隊長耿文喜成了"九大"代表。

陳長江回憶：中央警衛團幹部隊個個精選，除少數看家外，多數都隨主席南巡了。要是路途短，坐汽車人就多一點，帶路車前有吉普車，後衛還有大隊部。主席外出都有一套方案，內衛是我們的，道路、山川是當地的。在哪一個省行走，由哪一個省負責，責任都在他頭上。要把橋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都要放上警衛。專列一到上海，汪東興就把上海當地的警衛全撤到週邊去了，在專列的主車周圍全換上中央警衛團的幹部隊，以防不測。[25]

上海安排好了住處，但毛澤東沒下車，就住在專列上，準備隨時出發。

陳長江回憶：往常毛主席到上海都要到市裏住幾天，這已經是 20 多年的習慣了。因此，我們按慣例做了下車的準備。列車停下來了，毛主席卻沒有下車，而是立即把上海市的黨政軍領導找到火車上來，或開會，或談話，記得到車上的有馬天水、王洪文等，毛主席與他們談了約一個多小時，這幾位就都回去了。我們在車上吃晚飯，並安排過夜。晚上 21 點左右，汪東興把我們幾個包括秘書、衛士在內找到一起，拿個小本子，一頁一頁地翻著，有選擇地向我們傳達毛主席與上海領導人的談話內容。要求我們嚴密部署列車周圍的警戒，重點部位要雙哨，幹部加強值班。根據汪東興的要求，我們一下加了五六個哨，還增設了一個由三人組成的巡邏哨，並讓哨兵佩帶了衝鋒槍。[26]

汪東興回憶：在離專列不到 150 米的地方是虹橋機場的一個油庫，要是油庫著火了，我們的專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別派了兩個哨兵在那裏守衛。[27] 汪東興似乎已經瞭解到"那一夥人"要炸油庫，提前做了防範。

看起來，毛澤東真正緊張是在 9 月 8 日，而這個時間正是林立果從北戴河坐飛機到達北京開始策劃"兩謀"。爲什麼林立果 9 月 8 日晚飛回北京剛有"動作"，在杭州的毛澤東深夜也跟著"動作"了？林立果策劃在杭州轟炸專列和在上海引燃油庫，毛澤東馬上命令專列轉移紹興，並對專列進行防空僞裝，然後突然離開杭州。到了上海，就住在專列上，準備隨時出發。同時嚴密看守油庫。看！轟炸專列知道！燒油庫也知道！林立果計劃南飛廣州，立即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另立中央。而毛澤東偏偏讓廣州軍區也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傳達他的南巡講話。包括毛澤東對陳勵耘，對王維國的戒備等，是不是他心裏有一本賬呢？專列突然離開上海，毛澤東提前十幾天回到北京，使林立果一夥的"上策"不攻自破，方寸大亂中拿出"中策"。調三叉戟飛往北戴河，同時北京準備機群，準備 9 月 13 日早晨逃往廣州。然而，當晚"中策"又胎死腹中，不得不改"下策"北飛蘇聯，最後機毀人亡。

爲什麼每一步都如此巧合？是不是有人通風報信呢？

王洪文傳達，主席說“他們”要動手了

9 月 10 日中午，專列從杭州出發前，汪東興就打電話通知王洪文，叫他通知許世友來上海，越快越好，“客人”要同他們談話。專列到達上海，汪東興下車去接，只接到王洪文，許世友沒到。汪東興把王洪文領進車廂，毛澤東問：東興同志打電話給你，要你通知許世友到上海來，怎麼沒有見他來呀？王洪文說：電話我打了，南京說他可能下鄉了，正在設法與他聯繫。毛澤東只與王洪文說了幾句，說等許世友一塊談。

王洪文馬上下車打電話：“客人”急著要見許世友，要他上午趕到，越快越好。[28]

此時是 9 月 11 日淩晨 2 點，許世友在揚州，連個準確地址也沒有。秘書急了，求助揚州市委，這才通知到。爲了保密，上海沒有派專機，坐火車要七八個小時，再快也只能下午才趕到。不知道許世友什麼時候回南京，能不能趕上車次。秘書趕快找作戰部派飛機。許世友 9 月 11 日 9 點 15 分回到南京，劈頭就問：飛機到了沒有？秘書說是值班飛機，許世友馬上批評：毛主席講話（8 月 31 日）你也聽到了，怎麼還要值班飛機？許世友親自打電話問汪東興，確實沒有專機。上午 10 點，雖然天氣不好，但許世友還是坐值班飛機趕到上海，他交代隨行的秘書帶上小型電話保密機和

獵槍。

汪東興、王維國等到機場迎接。

許世友一下飛機，汪東興就把他接走了。王維國想上專列，汪東興一擺手，沒讓他上。[29] 許世友問：主席下不下車？回答主席不下車。

毛澤東住在專列上，這時好像非常緊急，馬上開始與他們談話，簡要談了一個多小時。汪東興分析：一是毛澤東等得太久，二是毛澤東在南昌已經談過了。所以，汪東興只是簡單做了記錄。毛澤東問：許世友，你下鄉啦？去搞什麼呀？調查什麼問題呀？許世友說：我去看大別山附近的軍墾農場（實際上打獵去了）。毛澤東問：去那麼遠了呀？許世友說：坐吉普車去的。毛澤東批評說：怎麼連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這個司令員隨便離開工作崗位，怎麼行呀？向誰請了假呀？要是萬一發生問題，你怎麼樣辦呀？連南京軍區都找不著你！將來這樣的情況你要注意，告訴一下家裏嘛。許世友說：眞對不起，我想主席還會在杭州住幾天，然後才能到我這裏。我昨天夜裏 12 點多才回到南京（其實第二天上午 9 點多才到），先休息了一下，就沒打電話到上海。接著許世友爲了打消毛澤東的疑心，彙報說：今年農業可能會大豐收，軍墾農場也不錯，莊稼長勢很好，豐收在望。毛澤東說：那好嘛，你去看看農業也好嘛。許世友說：軍隊的情緒很好，也比較穩定，亂哄哄的情況也過去了。我帶著那些造反派遊過蘇北。毛澤東問：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許世友說：我把兩派都帶上了。毛澤東再次強調：不能把領導機關

搞亂了，更不能把軍隊搞亂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講了，要“高抬貴手”。許世友說：不會，我正在做他們的工作。毛澤東說，那好。

王洪文埋怨許世友，主席等你快等了 15 個小時了。毛澤東馬上打斷：不要這樣，不要緊嘛。這段時間我們也休息一下，我們還是談正事。對廬山會議你們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決了問題呀？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呀？是不是能解決了呀？我認爲犯點錯誤是不要緊的，有的屬於認識問題，現在有的同志對有些問題還認識不到，那就等待，耐心地等待嘛。認識一點就寫出來，以便改正錯誤。

許世友說：廬山會議的問題，按毛主席的指示辦。毛澤東說：我有什麼指示呀？許世友說：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點意見》。毛澤東說，那個不是在後頭嗎？是你們犯了錯誤後，我想了五天才寫的。你們是什麼時候講的，是 24、25、26 日三天嘛。許世友堅定地說：這個指示我擁護，我就是按您的意見辦的。毛澤東說：不見得吧，我那個意見你學了沒有？我那個意見上說，什麼叫唯心論，什麼叫唯物論，你講一講，我聽聽！許世友哈哈笑起來。毛澤東說：你不是說執行我的那個指示嗎？我要你們學習，你們又不動，人家要搞那個“論天才”，找了幾條稱天才的語錄，你找到了嗎？

王洪文看許世友沒再說什麼，就開始彙報。

毛澤東再一次點了林彪問題的實質，接著又重複講到黨內歷次路線鬥爭。

但顯然，毛澤東有些心不在焉。11 點多，毛澤東說：

我今天不留你們吃飯了。王洪文你請客，陪陪這位老將軍喝幾杯酒，你們都去，我在這裏等候你們。許世友熱情拉汪東興一起去，汪東興謝絕了。

王維國一直在休息室等著。王洪文把他拉上車，和毛澤東在車廂門口握了一下手。汪東興認爲，毛澤東對王維國非常冷淡，連話也沒有講。而王維國不這樣認爲，1971 年 2 月毛澤東到蘇州，林彪去看望，王維國也去了。毛澤東說：哦，王維國，清朝有一個學術權威王國維。王維國認爲毛澤東對他印象還好。

送走他們，毛澤東立即對汪東興說：他們走了沒有？我們走！

汪東興問：不通知他們了吧？

不通知，誰也不通知！馬上開車。

汪東興立即發了前衛車，13 點 12 分，專列悄悄離開上海。[30]

本來許世友想到南京軍區設在上海的延安飯店吃飯，王洪文請客，說錦江飯店準備好了。這時鄭長華（空四軍軍長）趕到了，王洪文問是不是叫王維國和鄭長華，許世友表示同意。這樣王維國也就一起去了。馬天水等人已經在那裏等了好長時間，12 點 30 分飯才上桌，許世友一個勁兒嚷嚷餓。飯桌上非常沉悶，平時七八瓶茅台酒還不夠，今天一瓶也沒有喝完。正吃著，王洪文接到機場保衛人員的電話，說專列走了。許世友說：哎呀怎麼走了？王洪文說：既然走了，我們還是吃飯吧。

許世友已經沒心思吃了，匆匆結束飯局。

15 點多許世友乘飛機趕回南京，16 點 15 分他趕回中山陵 8 號的家中。因爲在上海談話中毛澤東說他光抓“黑”（煤炭），不抓“紅”（政治），他急於證明自己還是努力抓“紅”的，拿上他學習《國家與革命》的心得體會和一包關於“516”的情況報告，就去了南京火車站。李文卿（許世友的秘書）認爲，許世友急著回南京，是想再見毛澤東一面，似乎還想談什麼。[31]

王洪文跟著許世友來到南京。

專列開得很快，18 點 35 分抵達南京下關車站。

陳長江回憶：專車一停，我見許司令員已在車站迎候了，再次問主席下不下車。這時正是吃晚飯的時間，我進了主席房間，見他仍在聚精會神看文件。我說主席，許司令員在下邊，他說要來看一看你。主席已經一天一夜沒有睡覺了，還在那裏看文件，說上午見過了，也都談了，不見了，請他回去休息吧。[32]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說不見，什麼人都不見了，我要休息。許世友把帶來的材料交給我，請我轉交。我們的專列在南京站加煤加水和檢修，僅用了 15 分鐘，便又啓動了。只見許世友還站在那裏，向列車揮手告別。[33]

許世友在上海與毛澤東告別時，說請主席放心，南京軍區全體指揮員聽黨中央的指揮，我們已經做了安排，有了準備。他向蕭永銀（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佈置：從現在起，上海到南京的鐵路要派軍隊巡邏，特別是沿線的涵

洞，更要加強戒備，防止有人破壞（連林立果一夥議論炸橋也得知了）。

9 月 12 日整整一天，許世友哪裏也沒去，門關得緊緊的，守著電話一動不動。在秘書眼中，好像他預感到有大事要發生。一夜“安靜”，9 月 13 日早晨 5 點，周恩來打來電話，要求加密。加了半天加不上，周恩來說：就這樣吧，廬山上第一個發言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跑了。你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從現在起，立即進入緊急戰備。怕許世友反應不過來，周恩來又補了一句，“老病號”跑了。許世友馬上就明白了，似乎早有預料。韓先楚卻一時沒明白周恩來說的“老病號”是誰，周恩來又說：就是第二個張國燾嘛，韓先楚還不大明白。他哪裏想到林彪會跑啊。

許世友馬上按軍委命令佈置一級戰備，派陸軍看住戰區內所有的飛機和艦艇。艦艇不怕，一個人開不跑，飛機就不行了，一個人可以把飛機開上天，許世友下令把卡車開上跑道。[34]

註釋：

[1] [2] [4] [6] [9] [10] [12] [15] [17] [18] [19] [21] [22] [27] [28] [30]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193、150-157、184-188、150-152、193、162-168 頁

[3] [7] [14] [20] [25] [26] 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142-162 頁

[5] 楊尚昆著《楊尚昆日記》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第一版，1-2 頁、26-27 頁

[8] [13] 採訪陳勵耘筆記，1998 年 2 月 20 日

[11] 參見許寅《未被起訴的人——訪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載《"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第一版，413-415 頁

[16] [32] 採訪八三四一部隊中隊長陳長江筆記，2004 年 4 月 6 日

[23] [33] 採訪中央警衛局局長張耀祠筆記，2003 年 2 月 18 日

[24] 李家驥回憶、楊慶旺整理《我做毛澤東衛士十三年》，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版，394-395 頁

[29] [31] [34] 參見李文卿著《近看許世友 1967-198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版，212、214-218 頁

第十二章
紅色拉鏈本

《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如何發現的

《五七一工程紀要》草稿（沒有發現定稿）是在九一三事件 20 多天後上交的。

王蘭義回憶：林立果一夥幾次到空軍學院"秘密據點"活動。他們來，有時說，有時不說，時間也不定。有時連續三五天在裏邊，有時十多天，通常是上午 8 點左右來，晚上 22 點離開。除了這最後一次，他們從來不在這住，也不放東西。只有我們幾個負責伙食和打掃衛生的接待小組成員能進到樓裏，但對樓裏的活動無權過問，並且要絕對保密。因爲規定只要他們在，我們不能進屋。晚上人走樓空，才能進去打掃衛生。除最後一次，中間幾次我印象都不深。8 月底，程洪珍打來電話，說要準備一個星期的東西，吃的用的，衛

生也別打掃了。雖然每次都是他們走了以後小牛才打掃衛生，但以前打掃衛生時碰見過他們。程洪珍強調報紙放到門口，有事打電話找你，沒事別來。報紙過去都是送進去，現在要放在門口，那就放在門口吧。這中間，他們只要過一次飯，再沒找過。這時候剛來好多學員，而且快到國慶日了，我要組織國慶遊行，非常忙。我交代小牛把東西準備好，別的也沒管，只有每天的報紙由我送。報紙是公用報紙，他們來了，從公用報紙抽出《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參考消息》給他們，我下班騎自行車路過小樓，就順手放在台階上。

9 月 12 日我忙完中午那一頓飯後，並沒有覺得異常。17 點多，將軍樓還剩下一些人，劉沛豐打電話，要馬上準備晚飯，簡單點，要快，不用送來，我們到食堂吃。以前從來沒有這麼說過。來吃飯的有四五個人，還有鄭興和（空軍司令部軍務部裝備處處長）、王琢（空軍司令部汽車隊隊長）等，非讓我陪他們吃飯。我推脫不過，和他們一起去食堂。飯吃得很快，我發現他們有些緊張，出門還不放心，左右看，問我有站崗的沒有。我說以前是司令部警衛連站崗，9 月 12 日這天撤了，換成空軍學院的戰士站崗。把他們送回將軍樓，我站在門口，沒進去，劉沛豐說（照相機的）三角架壞了，我說我找人來修一下，他說不用，我就走了。

從那時起再沒有接到將軍樓的電話。這夥人來去無蹤，過去也常有。9 月 13 日上午，我帶學員到房山東方紅煉油廠參觀一天。下午回來我先到辦公室，看沒什麼事，取了當天的報紙，用石塊壓在門口台階上。9 月 14 日 19 點 30 分，

我再去送報紙，看見昨天的報紙還在原地。樓裏黑黑的，樓門露出一條縫，不知 9 月 13 日那天是不是也這樣虛掩著，是不是人走了？我又去看車庫門，也沒鎖，我輕輕拉開車庫門，裏面的救護車不見了，外面卻停著幾輛小汽車，車鑰匙還在車上插著。萬一什麼人闖進來怎麼辦？我圍著將軍樓轉了兩圈，反復權衡，最後認爲保守秘密最重要，我把樓門鎖上，然後去辦公室上班。22 點從辦公室回家，又到將軍樓轉了一圈，還是無聲無息。9 月 15 日白天，我有事外出，19 點 30 分又去送報紙，還是昨天的場景。這夥人至少兩天沒回來，是否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我考慮再三，還是決定進去看看。

拉開門，惡臭撲面而來。我心裏緊張，是不是死了人了？我經歷過洛陽解放，那時死人成堆，來不及掩埋，所以我聞過那種令人難忘的死人味。我趕快打開燈，先找臭味出自哪裏。屋裏亂糟糟，食品架上放著 9 月 12 日中午的飯菜，基本沒動，旁邊還用紅筆寫著紙條，請勿動。正是大熱天，魚長了一兩寸的毛，滿屋臭味就是從這裏散發出來的。靠近門口，有幾張零星的沒有字的白紙。還堆著一些紙箱，裏面裝滿水果和糖果，像是準備運走。再往裏走，原來廚房燒過紙，鍋台上一堆紙灰，一邊還散亂放著一些沒有燒盡的空白筆記本。

我又到前邊的將軍樓，這裏的紙灰更多。好大的一堆灰，不僅伙房間的鍋台上下堆滿了，整個牆都黑了，其他房間也滿地紙灰，紙灰堆裏還扔著三個沒有燒掉的避孕套……

像被搶劫過一樣，這都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過去人走樓空，屋裏乾乾淨淨，這回搞什麼名堂？這亂糟糟的一切使我得出結論，這夥人離開了，走得很急，很匆忙，而且像是再也不回來了。

我又第二次回到前邊的將軍樓。一進門是個小廳，中間放著一個茶几，周圍一圈沙發。第一次進來時我注意過茶几上有幾個本子，因爲只顧尋找臭味，沒顧上翻看。這回我拿起來看了看。當然我怕弄上手印，小心翻開，《五七一工程紀要》，目錄一直寫到底，背面還有。字很正規，用黑墨寫的。我再翻，沒了，白紙，還是白紙，其實這是活頁，後面還有正文。我以爲沒了，所以我從始至終沒有看過"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正文。正因爲我始終沒有看過正文，所以我也沒有在意，認爲是軍事戰略工程、技術革新一類。專案組非說我知道，說我是江田島精神。我沒聽懂，什麼"江騰蛟精神"？還有"江騰蛟精神"？

除了這個紅色拉鏈本，旁邊還有一本《英語》課本，一本《格瓦拉日記》，一個日本進口的空白筆記本。旁邊還放著一個開著口的大包，像是要把這些本子裝走（僞裝得多麼好）。

我立即鎖上門，回到辦公室，向副政委王治松彙報。他和政治處主任高文勇負責將軍樓。王治松說，我正在開會，你馬上回去，叫接待小組去整理房間。我領著接待小組察看了一遍，剛開始打掃，王治松和高文勇來了。我又帶著他們看了一圈。然後我繼續去收拾房間，他們倆坐在客廳的沙發

上，好奇地翻看拉鏈本（因爲只有拉鏈本寫了一些文字）。我回來，也坐到沙發上，我們商量了一下，應該打個電話。先找于新野，不在。又找程洪珍，還是不在。怎麼誰也找不到了？最後找到劉世英（空軍司辦副主任），他冷冷地說，等他們回來再說吧。

王治松把紅色拉鏈本放回原處，丟了怎麼辦？又和報紙放在一起。

小汽車上的車鑰匙也拔了下來，放在茶几上。

我們離開時，已經是夜裏 1 點了。

天快亮時，王治松打電話，叫我到將軍樓去，把車鑰匙放回車上，"本子"拿出來。我是做具體工作的，王副政委不知道，劉保文臨走向我交代任務時說，他們不在，小樓裏面的東西，不准動。聽我這麼一說，王治松沒有再堅持，我只是去把車鑰匙又放回車上，沒拿"本子"。

9 月 15 日晚上，我去空軍司令部參加行政負責人的會議。以前開會，會前都是有說有笑，而這次誰都不吭聲，熟人見面也不打招呼，我覺得很奇怪，後來才知道，很多人已經知道九一三事件了。會議規定，派車要經過單位行政領導批准，以前派車我派就可以了。還要求清查人，要嚴格請假外出。我打電話給政委，晚上開常委會傳達。晚上我到辦公大樓門口，高文勇在等我，對我說：給你說個事，現在馬上叫小牛把本子拿出來放起來。昨天王治松叫我拿，我沒拿，現在又叫我拿，我以爲他們研究了，這次我沒有頂。高文勇特別強調，你別去拿，叫小牛去，別開燈，讓他拿來交給你。

我打電話讓小牛去拿“本子”，讓他用紙袋裝起來，交給我，我不在交給處長張凡。我和張凡都是一派，沒參加造反，關係比較好。等我開完會回到辦公室，張凡說，小牛交給我一袋東西。我說我知道，你放在文件櫃裏，然後我就回家了。

9 月 16 日晚上，還是半夜。張凡總值班，給我打電話，北京衛戍區來了一個副司令員，帶一個師長和一部分衛戍區部隊，在我這，總理派他們來的，要看看小樓，怎麼辦？因爲小樓由我負責，雖然我是副處長，張凡還是要“請示”我，我一聽總理派來的人，就說去看吧，鑰匙在小牛那裏，叫小牛送去。衛戍區部隊當天沒有走，就住在將軍樓前面的 9 號樓，兩座將軍樓由他們負責警衛。

因爲那個紅色拉鏈本已經被拿出來了，所以衛戍區部隊進小樓沒有看到（本來是應該讓他們拿到的）。

國慶日前我很忙，也沒有人再和我聯繫。雖然我沒有看“本子”的內容，但張凡、王治松、高文勇他們看了，很緊張。輪到我總值班那天，張凡來電話，說最近我老在想一個事，我看了一下那個“本子”，裏面寫的“五七一”，是不是“武裝起義”？我馬上說，你瞎說什麼呀。張凡說，王治松講，誰讓把“本子”拿出來的？誰拿誰負責。我說，怎麼這麼說？誰讓拿？就是他最早讓拿的，有什麼了不起。十一那天我在南門替戰士站崗。政治處主任高文勇給我打電話，叫我到辦公室來一趟。我找別人代班，去了。我挺生氣，什麼事？高文勇說，我考慮最大的事是那個“本子”，那個“本子”要出事。我覺得沒什麼。高文勇說，我想，如果將來有人查問“本子”，

你就說你要拿的。也別說我叫你拿的，也別說小牛進去拿的，也別說張凡保存過。高文勇問，現在本子在哪？我說在張處長那裏保管。高文勇說，你去拿回來，就說你去拿，你保管。他們問，你一口咬定是你拿的，他們也沒辦法。我很不高興，說好吧。但心裏想，怎麼這樣？到時再說。

我去找張凡，讓他把“本子”給我。張凡也有點緊張，趕快給了我。我原封不動地放在辦公室的文件櫃裏。我又沒有保險櫃，文件櫃沒有鎖，我的辦公室戰士都可以進，不保險。於是，我把“本子”拿到我家，鎖進皮箱裏。

這個小小的“本子”成了“大包袱”。

10 月 5 日晚，李德生來傳達中央 57 號文件，“叛國”？“謀害”？“南逃”？我懵了，哎呀，糟了！第一個感覺是半輩子沒犯錯誤，這回陷進去了。聽完報告，空軍政委王輝球把處以上幹部留下，點了王治松、高文勇他們三個人，讓他們主動揭發林立果在空軍學院的活動，沒提到我。會後我馬上向殷古風（空軍學院政委）詳細談了接觸將軍樓以及拿“本子”的過程。我從家裏把本子取來交給他，希望馬上報告中央。

10 月 7 日半夜，安平（時任空軍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主任）和殷古風叫我到辦公樓。門口備好了車，把我送到空軍大院。空軍“五人小組”找我談話，說總理打電話來，總理看到了那個“本子”，叫我們找你談一談。相信你，叫你放心，不要有顧慮。交上來是個好事，你馬上寫個材料，怎麼發現的，怎麼保存的。當時王輝球（時任空軍政委）問我什麼職

務，我說我是行政處副處長。王輝球問，什麼行政處？他們自己搞的。我當時很不滿意，怎麼是自己搞的，空軍黨委辦公室宣佈的嘛。

空軍“五人小組”讓我馬上回去寫，夜裏2點我回到辦公室，一直寫到第二天早晨8點。我眼睛近視，字寫得很大，寫了厚厚一摞，沒有底稿。9點交上去。[1]

10月8日19點30分，空軍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主任安平、殷古風寫了一封信給空軍政委王輝球和副司令員曹里懷，送去關於王蘭義收存和上繳的叛國分子林立果的筆記本、調查報告一份，並附有王蘭義本人的交代和揭發材料。

10月9日，九一三事件過去26天，這個本子連同王蘭義寫的材料，經李德生呈報周恩來。李德生回憶：我看了發現，內容是惡毒攻擊毛主席，準備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計劃。但是看不出是什麼時候，是怎麼寫出來的。我派人提審李偉信，才知道這是《五七一工程計劃》。毛主席看後，認爲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這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發政治局各同志閱”。[2]

周恩來指示，要好好保護上交拉鏈本的人。

王蘭義回憶：眞是好好“保護”了。第二天，我就被關起來了，一關五年。先在空軍學院辦“學習班”，又被轉到開封關了一年。其實關進去十多天我就沒什麼可說的了，但專案組不相信我說的，非要說我是反革命，死也要保他們，說手銬腳銬隨時都可以給你戴上。那三個人（王治松、高文勇、牛佔景）也被關起來了。很長一段時間專案組也不露面。我

每天只能看毛主席的《別了，司徒雷登》、《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南京政府向何處去》。

1973年4月，李德生半夜突然把我叫到京西賓館，很客氣，說你們有功，向中央提供了情況，做了件大好事。你們放心，中央認爲你們不是他們的人。李德生問我現在正在幹什麼，我說我正在隔離審查，每天看毛著，看報。李德生說，鄧小平的文件看了沒有？我說沒看。李德生對專案組說，鄧小平都要出來工作了。中央文件還要讓他們看，叫他們幾個人在一起，湊一湊情況，就完事了。但我們還是照樣關著，一個一個審，一個一個放，我們四個人關的時間最長。王平水（空軍政治部副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稱我王蘭義同志。我心裏好激動，當了四年多“敵人”，第一次有人稱“同志”。

那時我們每天向戰士彙報，學了沒有，什麼想法，記錄幾句話。半年時間，一直想讓我承認“兩謀”[3]。你怎麼能不知道？誰相信你沒看過五七一工程？爲什麼不把“本子”交上去？審查不出來，就逼，人家都完事，解脫了，只有我通不過。專案組說別再傻了，就你一個人了。放風時碰到王治松，也勸我，你編一個就算了。專案組說好幾個副參謀長、副主任都檢討了。讓我看白雲（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任學耀（空軍政治部副主任）等人的檢討，說人家都承認上賊船了，你連上賊船都不承認，頑固到底。我說你無限上綱，我怎麼能承認？我就是幹日常工作，我自己對自己最瞭解，對得起黨，對得起自己。這樣又關了我一年多，粉碎“四人

幫”後 1977 年才放我回北京。結論是前兩年的結論，黨內警告，復員回原籍，派人到原籍給我整理房子。

我家屬沒有工作，一直有病，孩子也在北京工作，我帶家屬回老家，兩個重病人不是送死嗎？退休人員有文件，我符合就地安置的條件。人家說，涉案人員一律不許留在北京。我說我是共產黨員，爲什麼不能留在北京？北京有這麼多的老百姓。我一直不服氣，越頂越吃虧。關了那麼長的時間，我的身體也不行了，視神經萎縮，雙眼幾乎失明。從 1973 年開始，脊椎炎造成兩條腿癱瘓，走路只能挪著走。病耽誤了，處於那種情況，也沒法治。我說我沒有工作能力，要求治好病再說。我知道周總理的指示：王蘭義交出《五七一工程紀要》，說明他不是他們的人，對他不能給處分，不予追究，安排工作。我一直堅持，寫信到空軍，不行，又寫給中央，要求落實總理指示。人家要我拿文字材料來，我說我沒有見到正式文件，但空軍政委高厚良都說過這個。單位也有不少人支援我，說我們給你派車，你去闖李德生家。以後突然來個通知，重新修改我的結論：你向中央提供了《五七一工程紀要》，對全黨認識林彪面目，提供了有力物證，是有功的。到 1989 年 5 月，中央批下來，恢復我團職，級別動了一級，在北京安置。雖然還不算徹底解決，但我不再計較了。[4]

爲什麼這麼重要的文件放在茶几上

王蘭義發現的這個紅色拉鏈本，經李偉信、程洪珍、劉世英識別，並同于新野的其他筆跡對照，確認這是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原稿。用鉛筆編了頁碼，從第 1 頁到 24 頁，中間缺第 8 頁，可能是編頁碼時出了錯。[5]

1980 年 10 月 13 日，李偉信在法庭交代：《五七一工程紀要》寫好後，我沒有見過。但是于新野在 1971 年 9 月 11 日，曾誇耀自己說，林立果把“計劃”及一本我最近摘錄的關於武裝起義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長（林彪）和主任（葉群）那裏。[6]

2006 年有人訪問過李偉信。李偉信說：最後收拾將軍樓沒有燒東西，他也沒有在桌上發現那個寫有五七一工程的紅色拉鏈本。這就奇了，最後離開的李偉信說沒有紅色拉鏈本，而在他們離開後第一個進去的王蘭義卻是從將軍樓裏發現的這個紅色拉鏈本，這是爲什麼呢？

這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李偉信確實沒有看見，在李偉信他們離開、王蘭義他們進去之間的幾天裏，有人把這個紅色拉鏈本放在了桌子上。另一個可能就是李偉信撒了謊。這個紅色拉鏈本就是他放的。

這裏還有一個疑點：一般說，既然是草稿，就應該只有一份。要是按李偉信的說法，《五七一工程紀要》應該在北戴河，爲什麼這個“本子”卻出現在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的茶几上？是不是還有一個“副本”？可是北戴河的所有文

件都没有被帶走，全留在了北戴河。爲什麼没有發現“副本”呢？這說明，只有這一個“本子”。那麼，北戴河的“本子”怎麼出現在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裏呢？而且“赤裸裸”地放在李偉信精心善後的屋子裏，這如何解釋？來不及燒掉嗎？粗心嗎？于新野帶到直升機上大批的文件，遠没有這個本子重要的別的筆記本帶走了，爲什麼如此重要的“本子”卻拉下了？非常奇怪！事情還没有到火燒眉毛嘛，爲什麼這麼重要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卻放在桌子上，難道怕別人發現不了嗎？

林立果臨去北戴河前，讓李偉信和王永奎（情報部技術處副處長）把東西收拾一下，空軍學院、西郊機場兩個“秘密據點”的各種機器、器材能帶走的帶走，文件、報刊、書信、材料等能帶的也帶，不能帶走的就燒掉。9 月 12 日傍晚，李偉信和王永奎將器材全部裝箱，然後翻箱倒櫃，大大小小的箱子，東一堆西一堆，到處是散亂的紙片，濃煙滾滾。信和港刊等都統統燒掉了，空白的筆記本和幾包避孕套也扔到火裏，燒不著，又趕快丟進下水道。收拾差不多了，22 點多，李偉信開著“嘎斯”69 到東交民巷空軍招待所，接他弟弟李偉軍和王維國的兒子王大璋。在車上李偉信說：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爲我申張正義，王大璋非常驚訝。23 點，到空軍學院將軍樓，王大璋站在後門外，往房子裏望，全是紙箱，還有幾個手提箱。後門外還有個卡車，上面裝了大半車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爲見過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飯，王大璋認定是林立果的東西。

李偉信打電話讓王琢把大卡車轉移到北郊二高專 7 號樓的“秘密據點”。過了 20 分鐘，李偉信叫王大璋上樓幫忙。二樓有個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龍蚊帳，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處。他們要他把壁櫃撬開，看看裏面有什麼，壁櫃裏只有一個餅乾盒。隔壁房間有很多錄音帶，李偉信正在退磁，說不知道能不能退得乾淨。他叫王大璋把那邊地毯上的木頭渣弄到樓下。一直到 9 月 13 日淩晨零點左右，李偉信和李偉軍才從樓上下來。李偉信對李偉軍說：你和王大璋還是到剛才的地方（東交民巷）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電話，你們就直接去機場，接不到電話，你們自己想辦法回上海。回到東交民巷，電話鈴響了幾次，都是李偉軍接的。但第二天卻不見李偉信的電話，他們就坐火車回到上海。[7]

在這個“據點”裏，最後離開的是周宇馳、于新野和李偉信。但在于新野和周宇馳來之前，李偉信把到廣州的人都打發走了，他弟弟李偉軍和王大璋也被打發走了，只有李偉信一個人最後收拾殘局。[8] 燒了那麼多東西，而且前面的小樓比後面的小樓燒得更多，更徹底，爲什麼寫有《五七一工程紀要》的這麼重要的本子卻完整無缺，擺在如此顯著的位置，生怕別人看不到？怎麼可能“漏掉”這麼重要的本子？

當然，如此重要的“本子”，總不能從天上掉下來吧？

還有一個疑點：這個時候一分一秒都很寶貴，爲什麼李偉信還專門去接王大璋？而且似乎也没讓他幹什麼，倒好像讓王大璋給他作證似的。

空軍有 25 人被認爲是林立果“小艦隊”的人。從專案組

嘴裏，我們知道，這些人中，李偉信、劉世英等人比較合作，特別是李偉信，積極認罪，態度誠懇，和盤托出。他們的供詞成爲查清“小艦隊”犯罪事實的第一批有力證據。[9]

《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如何出籠的

林立果來到上海，王維國派李偉信接待，以後李偉信跟林立果到了北京，成了心腹。林立果和周宇馳、于新野在杭州密談，一共開了六次“兩謀”的會，每次李偉信都在門口侍候。1971 年 3 月 18 日至 24 日，林立果和周宇馳、于新野在上海巨鹿路空軍招待所密謀“五七一”的具體計劃。李偉信除中間有事離開過幾次，一直守在門口。

李偉信沒有參加討論，他在門口轉來轉去，倒個水什麼的。因爲李偉信與空軍機關很少接觸，王飛（空軍副參謀長兼司辦主任）曾問他是什麼人？周宇馳說：這是李偉信，搞錄相技術的。[10]

王蘭義回憶：1971 年 9 月 12 日那天來的人中，李偉信過去沒見過。[11]

李偉信在法庭上交代：3 月 18 日，林立果和于新野從杭州到上海。當晚，林立果在臥室對我和于新野說，根據目前形勢，要設想一個政變計劃。他要立即把周宇馳從北京叫來商量，同時叫于新野暫不要回北京，主要處理這件事。林立果接著說：剛才已經把我們在杭州研究的情況，給“子爵號”（注：林立果給葉群起的代號，英國一種飛機的名字）

說了一下，她說在上海要隱蔽、安全。3 月 20 日，周宇馳到上海。當晚，林立果和周宇馳密談後，叫于新野也去。第二天，開始他們商量，後來叫我也去了。林立果說，這件事與首長談過（但林彪到底知道不知道，再沒有證據），首長叫先搞個計劃。目前從各地區的實力看，首長講話還有一定作用。從全國範圍看，首長的權力、勢力目前佔絕對優勢，是一邊倒的，所以現在是最好的時機。但是，這種優勢有可能逐漸削減，張春橋、姚文元的“文人力量”正在發展。因爲“九大”以後全國局勢基本穩定，在和平時期，文人的力量勢必要發展。從事物的發展規律來說，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轉化，這叫交叉發展規律。B-52（毛澤東）一貫這樣，一會兒用這邊力量，一會兒用那邊力量，這樣可以保持平衡。目前發展趨勢是用張春橋，由張春橋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們研究了林彪的“接班”問題，認爲有三種可能，和平過渡，被人搶班，自己提前搶班。如果和平接班，周宇馳說，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時間還會更短。林立果說，五六年還接不上班呢？B-52 的身體還能支撐一段時間呢。即使五六年，其中的變化也很大，很難說“首長”的地位還一定能保得住，當然和平過渡的辦法最好。周宇馳認爲，目前情況看，首長被趕下台，被人搶班，一下子不可能，最起碼三年以後。林立果認爲很難說，B-52 威信高，他要誰倒還不是一句話，“首長”隨時都有可能被趕下台。于新野說，這可能不那麼容易，首長是他樹起來的。林立果說，劉少奇還不是他樹起來的？“提前搶班”有兩個辦法，或是把張春橋一

夥搞掉，保持“首長”的地位不變，再和平過渡；或是直接謀害 B-52。但 B-52 威信高，以後政治上不好收拾，盡可能不這樣幹。他們商定，先做兩件事，寫個計劃，讓空四軍組建一個“教導隊”。爭取“和平過渡”，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最後又討論了武裝政變計劃的名稱。林立果說，我看就叫“五七一工程”（武裝起義的諧音）。

李偉信回憶：林立果談到 3 月 16 日的上海《文匯報》，他認爲那上面的文章有來頭，應該看成信號，是輿論準備。通過這些談話，我得出一個明確印象，林立果認爲林彪隨時可能被趕下台，因此竭力主張加緊策劃叛亂，提前搶班，一是把文人勢力搞掉，以保證林彪的地位不變，再和平過渡。第二是直接危害毛主席。周宇馳說，如果一定要這樣做，也可以想辦法，例如，把 B-52 軟禁起來談判，也可以在謀害後嫁禍於人，找幾個人替死。那時反正首長掌權，有關事後的處理問題，首長可以出來說話。林立果一夥還密謀，必要時利用可以調動的部隊，控制上海，然後串連全國力量發表支持聲明，逼中央表態。如有人出兵干涉，便保衛上海，形成對峙，再談判。最壞的打算上山打遊擊，先往浙江方向。目前先做兩件工作，第一個是計劃，按杭州商量的框架，林立果讓于新野拉成條文。第二件事是組建一支武裝，林立果說，以培養基層幹部的名義，搞一個 100 人左右的教導隊，要精幹，多配汽車和好槍，增加機動能力，軍事上多學幾手。確定“教導隊”由“上海小組”來抓。

1971 年 4 月 9 日，“教導隊”正式成立。隊員都是精心

挑選，除了政治條件，身體要求也很嚴，身高 1 米 7 上下，爲了保密，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來的，高幹子弟或與高幹子弟有聯繫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一律不要。並規定，正副班長、區隊長和隊幹部，都要審批。武器裝備也非一般，每人配一長一短（步槍或衝鋒槍和手槍），每班一挺機槍，每個區隊一輛卡車，另外還配了兩輛吉普車和三輛摩托車，供訓練用，準備逐步裝備一個摩托車隊。不僅進行一般的戰術技術訓練，還要求會駕駛各種車輛，學會登高，打巷戰，並秘密進行了格鬥訓練。[12]

《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內容

負責九一三專案的紀登奎認爲《五七一工程紀要》裏面很多是罵毛主席的，不能印發。毛澤東說：這一件最重要，必須下發。[13]

毛澤東認爲這是最好的證據。

1971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印發《五七一工程紀要》。《通知》說：這個《紀要》證明，林彪一夥發動這次反革命政變是早有預謀的。現將這個反革命政變綱領的全文及原件影印本編號發給你們，供你們閱讀參考。[14]

3 月 22 至 24 日，于新野執筆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紀要》，分九個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條件；時機；力量；口號和綱領；實施要點；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紀律。

──可能性，9·2（九屆二中全會）後，政局不穩，統治

集團矛盾尖銳，左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衆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衆叛親離。1、一切政治危機正在醞釀；2、奪權正在進行；3、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4、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逐漸的和平演變式的政變；5、這種政變形式是他們慣用手法；6、他們故伎重演；7、政權正朝著有利於筆桿子、不利於槍桿子方向發展；8、因此，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反之，如果我們不用"五七一"阻止和平演變，一旦他們得逞，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中國革命不知要推遲多少年。9、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就會落在別人頭上。

—我方力量，經過幾年準備，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的水平都有相當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在全國，我們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氣蓬勃。革命的領導權落到誰的頭上，未來政權就落在誰的頭上。在中國未來這場政治革命中，我們"艦隊"採取什麼態度？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革命的領導權歷史地落在我們"艦隊"頭上。和國外"五七一"相比，我們的準備和經驗比他們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們比當年蘇維埃也不算小。地理迴旋餘地大，空軍機動能力強。空軍搞"五七一"比較容易得到全國政權，軍區搞地方割據。兩種可能性：全國奪取政權；割據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B-52 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後發制人，軍事行動上先發制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筆桿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馬列主義，爲他們的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當然，我們不否認他在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正因爲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歷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但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爲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歷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個眞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條件，有利條件：國內政治矛盾激化，危機四伏，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鉤心鬥角、幾乎白熱化。軍隊受壓，軍心不（穩），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並且握有兵權。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面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

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配），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國外矛盾激化，中蘇對立。整蘇聯。我們的行動會得到蘇聯支持。最重要的條件：我們有首長的威望、權力和聯合艦隊的力量。從自然條件講，國土遼闊、迴旋力量大，加之空軍機動性強，有利於突襲、串聯、轉移，甚至於撤退。困難：目前我們力量準備還不足，群眾對 B-52 的個人迷信很深，由於 B-52 分而治之，軍隊內部矛盾相當複雜，很難形成被我們掌握的統一的力量。B-52 身（深）居簡出，行動相當鬼（詭）窄（詐），戒備森嚴，給我們行動帶來一定的困難。

——時機。敵我雙方騎虎難下，目前表面上的暫時平衡維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只要他們上台，我們就要下台，進監獄（衛戍區）。或者我們把他們吃掉，或者他們把我們吃掉。戰略上兩種時機，一種是我們準備好了，能吃掉他們的時候；一種是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吃掉我們的時候，我們受到嚴重危險的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有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戰術上兩種時機和手段，B-52 在我手中，敵主力艦均在我手心之中。屬於自投羅網式，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先斬局部爪牙，既成事實，逼迫 B-52 就範。

—逼宮形式，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五四三（一種武器的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的力量。基本力量，聯合艦隊和各分艦隊（上海、北京、廣州）王（維國）、陳（勵耘）、江（騰蛟）掌握的四、五軍，骨幹力量，九師、十八師、二十一坦克團、民航、三十四師。借用力量，國內二十軍、三十八軍、黃（永勝）軍委辦事組、國防科委、廣州、成都、武漢、江西、濟南、福州、新疆、西安。社會力量，農民、紅衛兵、青年學生、機關幹部、工人。國外蘇聯（秘密談判），美國（中美談判），借蘇聯力量鉗制國內外其他各種力量，暫時核保護傘。

——動員群眾口號、綱領，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打倒當代的秦始皇 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對外：全世界眞正的馬列主義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

——我們對外政策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承認現有的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全軍指揮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眞正解放。用眞正的馬列主義作爲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眞正的社會主義，代替 B-52 的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全國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要堅守崗位，努力生產，保護國家財富和檔案，遵守和維護社會秩序。因此，各區、各單位、各部門之間不准串

聯。全國武裝力量要服從統帥部的集中統一指揮，堅決嚴厲鎮壓反革命叛亂和一切反革命破壞活動。

——實施要點，三個階段，第一、準備階段，1、計劃；2、力量，指揮班子江、王、陳。兩套警衛處，公開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組負責新華教導隊、四、五軍部隊訓練（地面訓練）、南京直屬師（十師）的工作，周建平（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負責爭取二十軍（江王陳），擴大艦隊，加速根據地建設（京滬杭蜀穗）。3、物質準備，武器領、自造。通信器材（包括01工程，專門設計的一種收發報機）。4、情報保障，掌握三個環節，搜集、分析、上報。

第二階段實施階段，奇襲式，一個先聯後斬，上面串聯好，然後奇襲；一個先斬後聯；一個上下同時進行。一定要把張春橋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佈他的叛徒罪行。總的兩條：一是奇襲；二是一旦進行開始，堅持到底。第三階段鞏固陣地，擴大戰果，奪取全部政權。1、軍事上首先鞏固陣地，盡力堅守上海，佔領電台、電信局、交通，把上海與外界的聯繫卡斷。力爭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禦固守浙江、江西，掌握空降、空運。2、政治上採取進攻，上面攤牌，掌握輿論工具，開展政治攻勢。3、組織上擴大，迅速擴軍，四方聯繫政策和策略，打著B-52的旗號，打擊B-52的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緩和群衆的輿論，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數，集中打擊B-52及其一小撮獨裁者。我們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數）保護（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撮獨裁者及其身邊的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派，各個擊破。他們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他們這樣做，他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衆鬥群衆，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統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爲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他是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人的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過去對B-52宣傳，有的是出於歷史需要，有的出於顧全民族統一、團結的大局；有的出於抵禦外來之敵；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壓力之下；對廣大群衆來說，主要是有的不瞭解他的內情。對於這些同志，我們都給予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對過去B-52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紀律，此工程屬特級絕密，不經批准不准向

任何人透露。堅決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洩密者、失責者、動搖者、背叛者嚴厲制裁......[15]

"五七一工程"是誰的"傑作"？林立果一個小毛孩子能想得出來嗎？研究者認爲裏面有些話明顯幼稚，有些話卻老謀深算（有些話和思想是林彪的，比如"絞肉機"）。林立果初出茅廬，不可能沒有人在幕後出謀劃策。或者換句話，是誰慫恿的呢？

註釋：

[1] [4] [11] 採訪王蘭義筆記，2005 年 12 月 13 日

[2] 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第一版，429 頁

[3] 注：謀殺毛澤東、南逃廣州

[5] [14] [15] 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册，1988 年 10 月，649-657 頁

[6] [12]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197-201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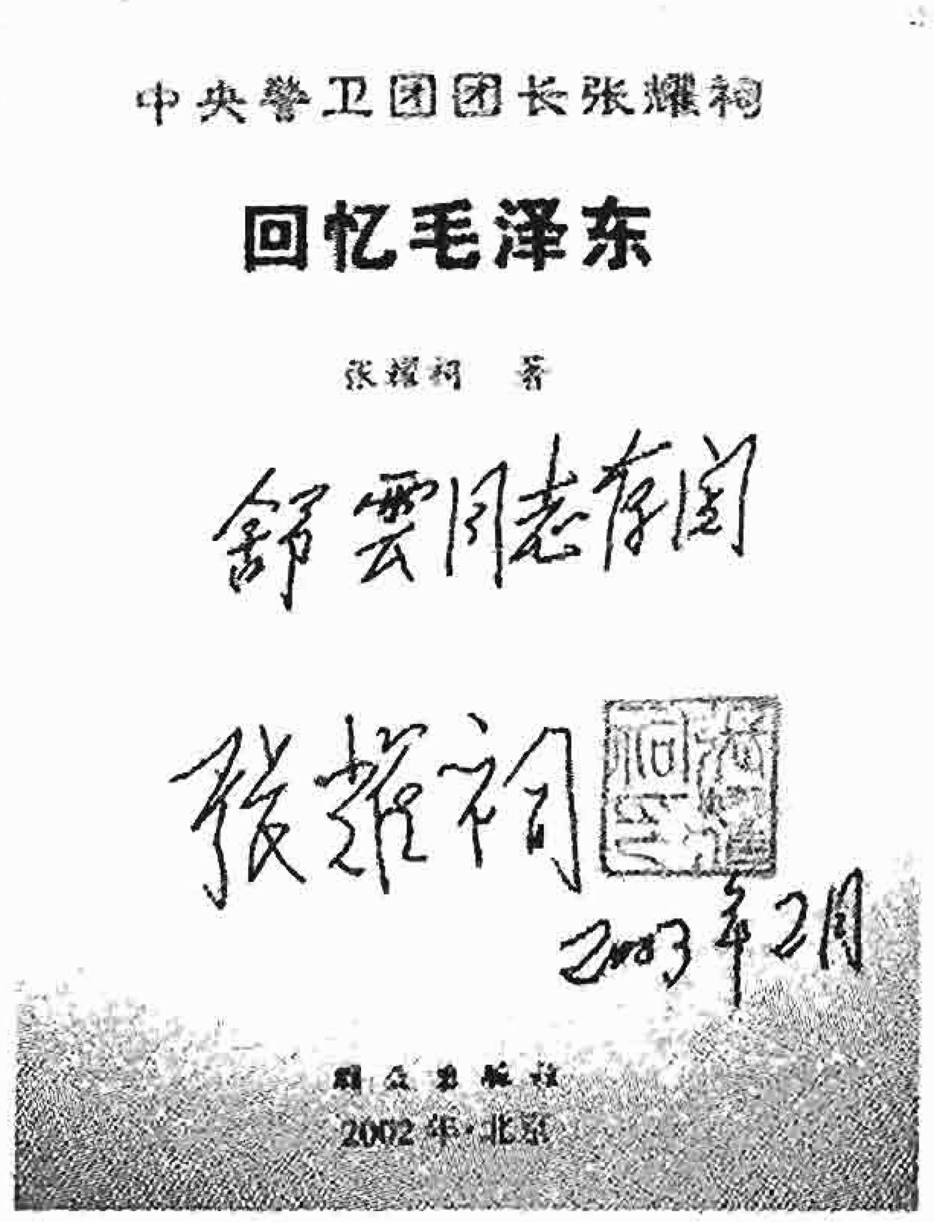
[7] [8] 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版，298 頁

[9] 參見鹿音、赤男《秘密審判林彪"小艦隊"內幕》，載《中華兒女》1999 年第 11 期

[10] 採訪王飛筆記，1998 年 4 月 2 日

[13] 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1995 年 12 月第一版，144 頁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

回忆毛泽东

张耀祠　著

舒云同志存阅

张耀祠

2003年2月

群众出版社

2002年·北京

張耀祠的書

張耀祠把他寫的書送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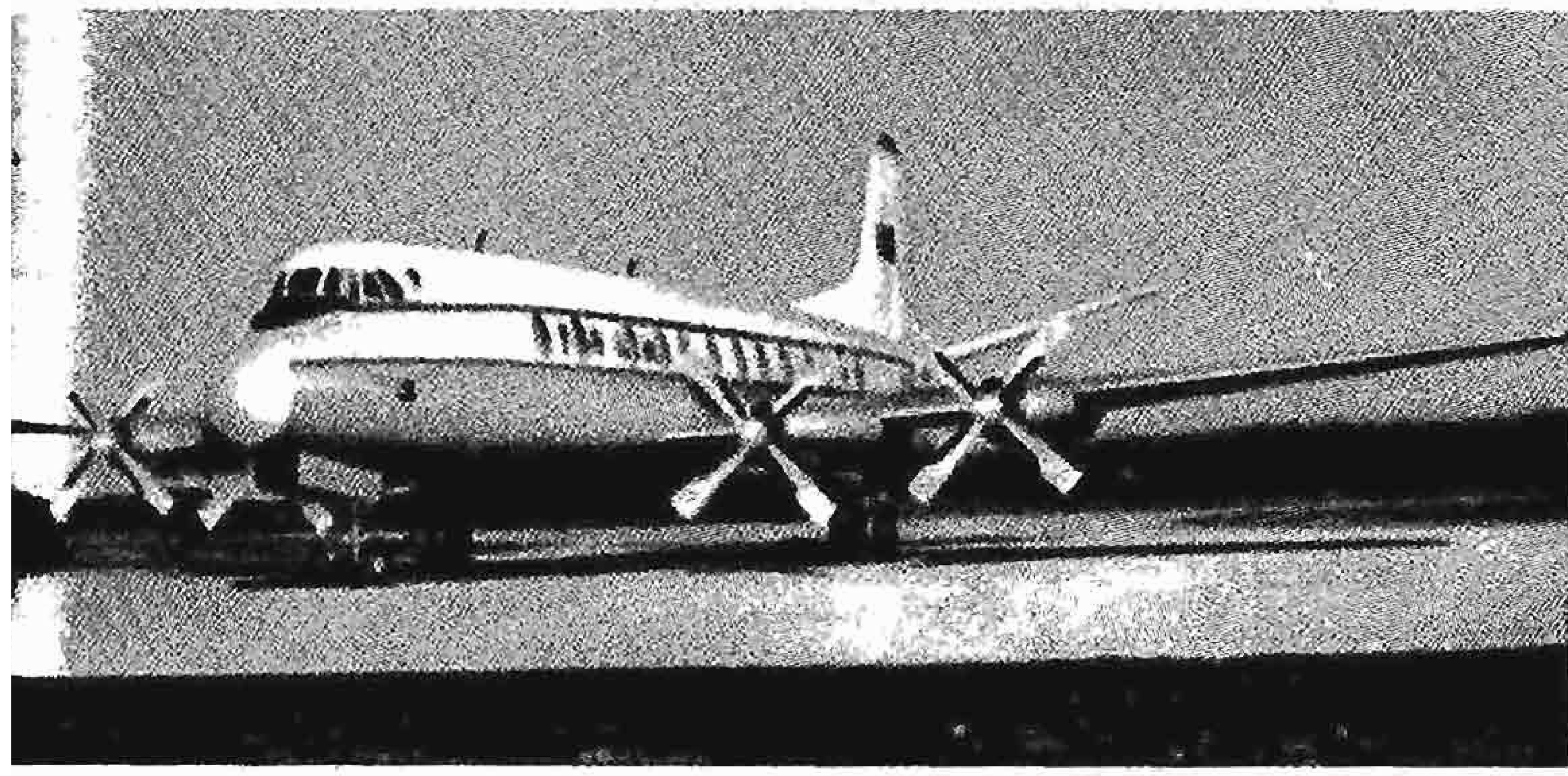


60 年代初，林彪在空軍某機場與飛行員談話。

林彪家人提供







英製子爵號。林彪只坐過一次三叉戟，之前都是坐這架子爵號。如果他坐子爵號，可能就跑不了。

時念堂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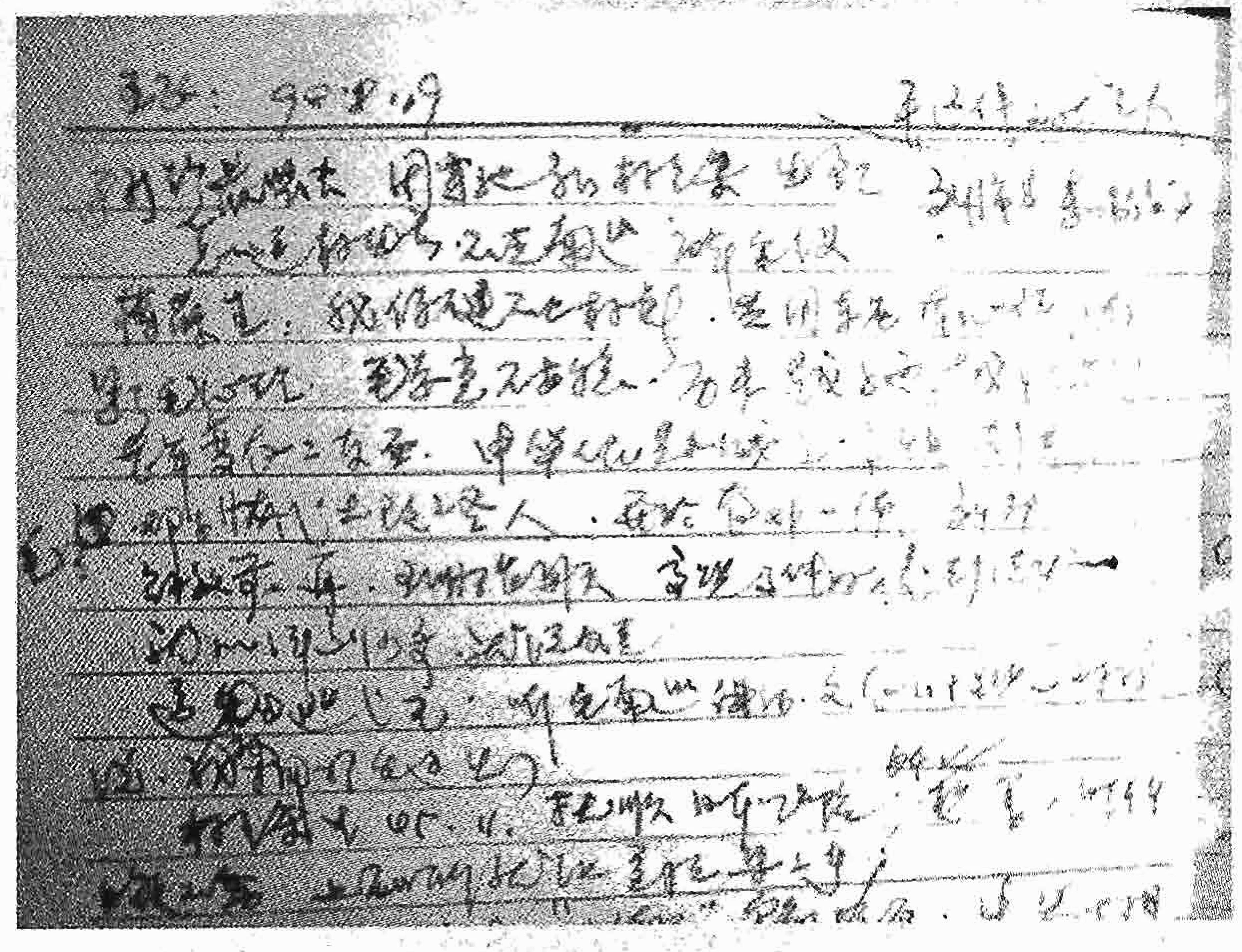


江騰蛟，1919 生，湖北紅安縣人，是經過長征的紅軍老幹部。1955 年被授予少將。現被安置在太原的山西體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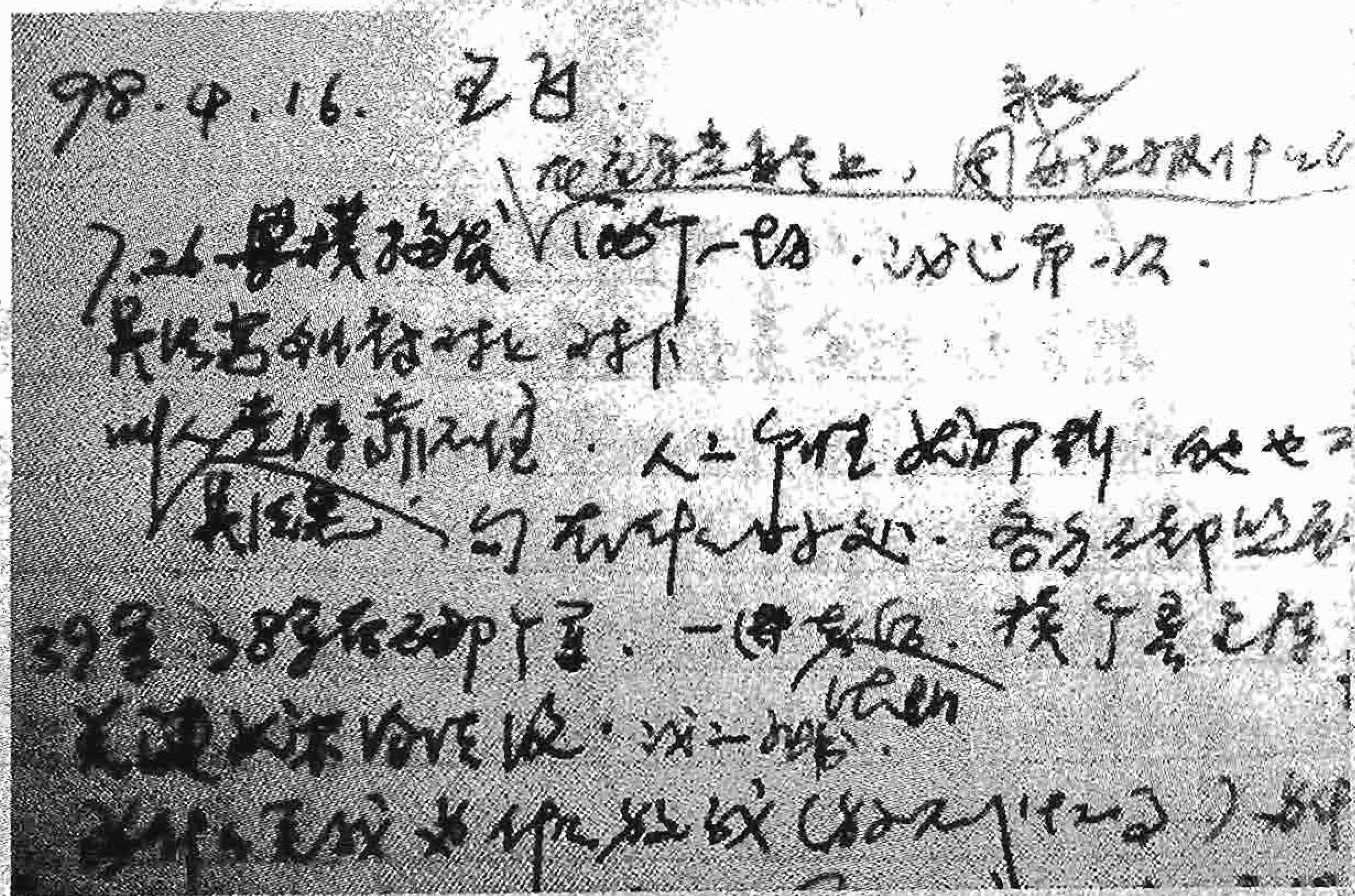


周建平，曾任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

舒雲攝於 1998 年 2 月，上海



這是我多次採訪王飛的筆記之一　舒雲攝影



這是我多次採訪王飛的筆記之二。　舒雲攝影



第十三章
少將江騰蛟

江騰蛟與林家的關係

1980 年"兩案"庭審調查，江騰蛟什麼時候與林彪認識的。他說是 1966 年 11 月初，他見過林彪、葉群六次。果真如此嗎？

1957 年空軍和防空軍合併時，江騰蛟本來是廣州軍區防空軍政委，調到空四軍當政委，降了半級。劉亞樓（空軍司令員）對江騰蛟說，不要看空四軍只是一個軍，它的戰略位置很重要，實力比一些軍區空軍還大。這樣江騰蛟高高興興去了空四軍。1958 年，上面交代，林彪開銷大，和葉群兩個人的工資不夠，讓空四軍給林彪開一份工資。因爲林彪在紅軍時期當過紅四軍軍長，就稱林彪是空四軍的老軍長，空四軍每年給林彪 5000 元[1]。這樣，江騰蛟就與林家掛上

了鉤。

江騰蛟，湖北紅安縣人，1955 年授予少將軍銜。他 11 歲時參加紅軍，當譯電員，天天泡在領導圈裏，小小年紀就學會了看風使舵。

1964 年，葉群到江蘇太倉縣洪涇大隊搞“四清”，江騰蛟經常帶著禮物去看望。

1966 年冬，葉群把兒女送到上海，對江騰蛟說，豆豆、老虎兩個孩子等於首長的兩個眼珠子。現在社會動亂，委託江騰蛟加以照顧、保護。照葉群吩咐，江騰蛟把林豆豆送到杭州空軍療養院，請陳勵耘照顧。而把老虎留在身邊，指定保衛幹事和管理員分別負責安全和生活。林豆豆剛進空軍報社一年多，林立果那時 21 歲，北京大學物理系一年級學生，聰明，會總結，愛擺弄電子設備，無師自通。江騰蛟經常帶著他出席各種會議，同各級領導見面，賣力吹捧林立果政治上成熟早，是優秀的接班人。這樣“保護”了三個多月，1967 年 2 月 8 日，“江叔叔”安全地把林立果送回北京。

1967 年，江騰蛟被提升爲南京軍區空軍政委。

江騰蛟支持反許世友的一派，在南京大搞反“許”活動，鼓動、支持地方和軍事院校造反派衝擊軍隊，造軍區黨委和軍區領導的反。許世友給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寫信，直言江騰蛟是南京地區反黨亂軍勢力的“黑後台”和“黑手”。

以後江騰蛟“逃”到了北京，許世友的揭發材料也接二連三“追”到北京。

1968 年 3 月，南京軍區空軍機關提出要江騰蛟回南京，

接受群衆批判。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沒有林彪的命令，不准江騰蛟離開北京。5 月，毛澤東與空政文工團的團員劉淑媛跳舞時，要劉淑媛轉告吳法憲，江騰蛟這個人不能重用。據吳法憲交代，毛澤東對他說過五六次。中央軍委決定改組南京軍區空軍黨委，免去江騰蛟的職務。

這樣，江騰蛟轉眼間成了“閒人”。

葉群傳話，給江騰蛟打氣，她可以拿出“錢”來幫助他還“賬”。7 月，林立果也傳話，讓江政委放心，不要怕，照常吃飯睡覺。他們有嘴，我們也有嘴，問題總有一天會解決。9 月，林立果讓周宇馳給江騰蛟送去 300 元，說寧可他們苦一點，也要把他“養”起來。

1968 年以後，江騰蛟給林家先後寫了 20 多封效忠信：是首長和主任救了我，沒有首長，就沒有我的一家，沒有我的一切。沒有別的，只有一條誓言，不管任何時候，需要我幹什麼，下命令吧！我江騰蛟絕對不會說出一個難字。7 月 2 日，江騰蛟寫道：立果同志，主任和你力主正義，幫我多方講公道話，極力保護，因此心裏很紮（踏）實，這些是能夠支持我生活和鬥爭的惟一力量，沒有這一條就很難設想了。這是我和我們全家永生不能忘的大恩。……我對首長、對主任是忠實的，對你也是忠實的。過去、現在、將來也永遠是忠實的。立果同志，苦思數日，想不出世界上還有什麼語言，可以表達出我感激首長、主任和你的心，在複雜的階級鬥爭中，教導我的，指點我的，保護我的是誰呢？是首長、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嗎？能不天天念嗎？

費盡心機表了半天的忠心，卻沒有用。到 1969 年上半年，江騰蛟還是個“閒人”。1969 年底，吳法憲透露給江騰蛟，要派他到西南地區抓航空工業。江騰蛟認爲這是變相流放，非常著急，打電話到上海找林立果。林立果馬上飛回北京，1970 年初，林立果、王飛和江騰蛟在江騰蛟家商量對策，決定由江騰蛟給吳法憲寫信，提出不能去西南的理由，要吳法憲將信轉給林彪，然後由葉群出面給江騰蛟說話。葉群對吳法憲說：江騰蛟身體不好，他不能去就別去了，讓他休養治病吧。3 月，林立果讓廣州空軍安排，讓江騰蛟全家到廣州“休養”。江騰蛟對顧同舟說：我們都坐在一條船上，掌舵的是林立果，什麼“風浪”都不怕。

1970 年 12 月 27 日晚，江騰蛟又大“難”臨頭。他正在武漢空降兵活動，通知他第二天回廣州。剛放下電話，劉沛豐又來電話讓他不要去了，明天“王參謀”從廣州乘民航到武漢，有一封信帶給你，你派人到機場取，照信上說的行動。信是由周宇馳從北京通過保密電話傳到廣州，由“王參謀”記錄下來的。信裏說：南京方面已向中央寫了報告，要抓江騰蛟的“516”，那份報告還壓在林彪那裏。現在林立果正做工作，但也要做最困難的準備，信中要求江騰蛟很快離開大城市，到空軍桂林醫院“治病”。當天下午，江騰蛟就離開武漢，躲到湖南大托鋪。在那裏給林立果寫了一封表示感謝的信，叫秘書送往北京。新年時江騰蛟躲在桂林，要求別再吹他，說他政治上被打倒，身體也垮了，已經是無所作爲的人了。1971 年 1 月中旬，江騰蛟接到家屬電話，林立果讓她轉告，抓他“516”那件事，經過林立果做工作，已經“平”了。1 月 20 日，江騰蛟放心離開桂林，到了廣州。

3 月 18 日晚，江騰蛟乘坐安-24 專機到上海機場，吳法憲辦公室調的飛機，特地安排夜間飛行。行前，江騰蛟讓醫生爲他準備了誇大病情的診斷書，作爲他來上海“治病”的藉口，必要時可以拿出來作證。一切都像那麼回事，江騰蛟捂著大口罩，兩個白大褂跑上機艙，把他扶下來，用擔架抬到汽車前，塞進汽車。但是車子沒進醫院，而是到了新華路一號，江騰蛟自己下了車。

3 月 20 日，周宇馳到上海，第二天去看江騰蛟，下午回北京。[2]

特別法庭從調查的種種跡象看，江騰蛟到上海是有預謀的。而江騰蛟據理力爭，說 1971 年 3 月到上海確實是治病，不是去搞陰謀。林立果和他談，讓他到上海找陳勵耘、王維國談談，沒想到搞陰謀。江騰蛟說：在策劃謀害毛主席的過程中，當林立果、周宇馳提出一些建議時，我是不贊成的，有時提出反面意見……

因爲這條罪狀一直沒有取得證據，只好放棄。

江騰蛟這個人非常有意思，不知道毛澤東爲什麼那麼恨他？雖然江騰蛟的職位已經很高，但到毛澤東那裏，還隔著很多層。據瞭解，毛澤東還沒有對軍一級的幹部這樣直接過問過。毛澤東爲什麼格外關注江騰蛟？難道一位空軍高級幹部的任命，僅憑一個文工團的小姑娘傳話嗎？後來，吳法憲按葉群的意思，想安排江騰蛟當空軍政治部主任，但又不

敢。因爲任命軍中職務要經過軍委主席毛澤東。只好任命江騰蛟爲政治部黨委書記，這個黨内職務不用上報，可以繞過毛澤東。江騰蛟說：林立果還考慮讓我當空軍司令員，我當然認爲他是傳達林彪的意圖。看來，林立果對江騰蛟的信任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李偉信說：我所瞭解林立果佈置于新野起草“五七一”，那次會議只有四個人，裏面沒有江騰蛟。江騰蛟也說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一直不知道。到 1971 年 9 月 8 日晚上，李偉信才給我解釋“五七一”。可是，爲什麼策劃“五七一”時江騰蛟不在場，而他在謀殺上又如此積極？好多點子是他想的。這又如何解釋？王飛感覺，這是關係到身家性命的事情，又非常渺茫。年輕人可以理解，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可你江騰蛟是老紅軍，出那麼多餿點子，都靠不住，容易讓自己被動，爲什麼如此輕率？！[3]

審判“兩案”時，“四人幫”加上陳伯達是五個人，林彪集團的主犯黃吳李邱，還缺一個，剛開始安排王飛，因爲王飛得了精神病，才臨時換上江騰蛟。

在九一三事件後被抓獲的“小艦隊”成員中，除了李偉信是個應有盡有的“檔案庫”外，江騰蛟交代的材料也比較多。[4]

可是爲什麼開始把王飛作爲主犯，而放過江騰蛟呢？從策劃“兩謀”的過程看，王飛一直往後縮，而江騰蛟一直積極出主意，江騰蛟才應該是主犯啊。

江騰蛟的辯護律師王舜華在法庭上替江騰蛟辯護：被告

人江騰蛟認罪比較早，9 月 14 日當領導找他談話時，他便主動地交代了自己不少罪行，寫了《謀害毛澤東主席陰謀事件的經過》的書面材料。我們提請法庭注意，這是江騰蛟在不知道林彪等已經外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情況下做的交代。當時他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也主動地揭發了林彪、葉群、林立果、周宇馳、于新野等人的罪行。這對於查清案件的情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希望給他一個贖罪的機會，我們作爲他的辯護律師，有責任把他的要求向法庭提出，請法庭在量刑時予以從輕考慮。

在法庭，江騰蛟一直沒爲自己辯護。最後，審判長問江騰蛟還有什麼意見，他還是表示我沒有什麼辯護的，我的罪行累累，鐵證如山，我只有老老實實低頭認罪、服法，願意接受任何我應該得到的懲罰。審判長伍修權宣佈：被告人江騰蛟最後簡單地表明了他的意見，等候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評議後宣佈判決。[5]

伍修權曾說：江騰蛟的態度很好。

另外，江騰蛟在監獄裏吃得特別好，想吃什麼可以吃什麼，牙痛還可以吃豆腐腦。

無論如何，發生在江騰蛟身上的奇怪事情使葉群和林立果把江騰蛟更加當成“自己人”。

可是，發生在江騰蛟身上的一切，是不是“苦肉計”呢？

三國四方會議子虛烏有

所謂“三國四方”[6] 會議子虛烏有。

1980 年審判“兩案”，認定 1971 年 3 月 31 日在上海召開的秘密會議是《五七一工程紀要》寫出後的組織準備和分工。法庭宣讀了程洪珍當時的日記和 1979 年 8 月 22 日的供詞：會議是成功的，達到預期效果。團結的氣氛比較好，解決了對當前東南形勢的看法、認識。加速我們的準備，組織上明確了三點，每點的頭都有，上海王（維國），杭州陳（勵耘），南京周（建平），互相配合，江（騰蛟）進行三點聯繫，配合、協同作戰。[7]

到底有沒有這個秘密會議呢？

王維國說瞎扯！他堅持說根本不是個會。那天我跑上跑下，“會”怎麼出來的呢？

王維國，河北元氏縣萬年村人。家境較富裕，本人追求進步，1932 年參加組織“反帝大同盟元氏分盟”，1933 年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1938 年在元氏重新參加革命、入黨，1939 年任元氏縣抗日遊擊大隊政委，對敵鬥爭勇敢。

在監獄裏，王維國態度最“壞”，所以他被加長了刑期。

周建平（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也認為不是“會”。他是淩晨 3 點多才被叫去的。那天晚上來電話叫他不要出去，要談一談，根本沒說開會。到零點，看還沒人來找，他就睡了。2 點來人接他，司機路不熟，黑燈瞎火還走錯了。到了一看，屋裏煙氣騰騰，陳勵耘嘴裏還含著一塊糖。[8]

參加會議的幾個人，包括江騰蛟、陳勵耘也都認為不是會議，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一聊。那麼這個“聊一聊”是不是《五七一工程紀要》後的組織準備和分工呢？確實，這是在《五七一工程紀要》草稿出籠後幾天召開的，但如果江騰蛟的話屬實，他既沒有參加也沒有看到“五七一工程”。他都不知道，別人更不可能知道。在廬山會議後全面敗退的情況下，林立果不可能挑明“五七一工程”。更何況“五七一工程”還只是個提綱，到最後，也沒有形成文字的具體行動方案。

當時毛澤東威信那麼高，林立果怎麼敢公開說謀害毛澤東呢？

3 月 19 日下午，林立果叫江騰蛟來，沒有講要開會，只是要他談一談對王維國、陳勵耘和周建平的看法。江騰蛟說：王維國性格單純、直爽，他除了你們，沒有別的後台，這樣的人最可靠。林立果又問：周建平呢？江騰蛟說：他組織能力比王維國強，但思想有些右傾，在關鍵時刻容易搖擺。陳勵耘與我私人關係不錯，也有能力，但本質不如王維國好，在政治上與王維國也不一樣，既可以坐你這條船，也可以坐別人的船。林立果說：江政委不愧為老領導，知人甚深，看得比較透。不過，我們要多做陳勵耘的工作。陳勵耘和王維國的關係很緊張，在杭州我做了陳勵耘的工作。你現在到上海來養病，趁這個機會也給他們做做工作，可不可以？江騰蛟說可以嘛。周建平那裏我打個電話就可以了，關鍵是陳勵耘，最好用你的名義去請他，這樣他就不好推了。對他的接待規格要高一些，要格外熱情。

這樣，林立果讓于新野到杭州，代表他去見陳勵耘，叫他到上海來一次。

3 月 28 日，于新野到了杭州，對陳勵耘說：江政委在上海，請他去玩。陳勵耘不想去，廬山會議上陳勵耘冒冒失失放了“炮”，沾了一身屎。當然他没有想到兩個主席之間會有什麼矛盾，只認爲自己犯了錯誤，不想再同這些人打交道了，更不想去上海。于新野又搬出林立果，說林副部長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見了，大家談談。陳勵耘還是不想去，推說有病去不了。

1971 年春，陳勵耘就住進空軍杭州四五三醫院。他曾派醫生到上海請專家會診，並要 10 支白蛋白（當時這種藥只有市委常委一級的才有資格用）。空軍上海四五五醫院政委答應給，但貴重藥品由王維國掌握，王維國說誰叫你答應的？話傳到陳勵耘家屬的耳朵裏，說這不是小問題，是路線問題。陳勵耘和王維國的矛盾就這樣產生了，他才不想到王維國控制的地盤上海去呢。

3 月 31 日快 17 點，于新野又來了，說政委該走了吧？他們都在等你。到這份上，陳勵耘再不好再推辭，只得坐汽車去上海。車開到閔行（上海和浙江的分界線，距上海還有 30 公里），王維國夫婦還有一批人帶著三輛車在此隆重迎接。大約 21 點，前呼後擁到了上海岳陽路原少年科技站。王維國的態度怎麼變了呢？原來林立果“修理”了他，說現在我把陳勵耘找來，趁我還在上海，給你做做工作。陳勵耘來時你要高姿態，搞得好點，吃的好點。所以王維國不但隆重

迎接，還把自己控制的少年科技站讓給陳勵耘住。

23 點左右，陳勵耘吃完飯上樓，林立果和江騰蛟在樓梯口迎接他。到二樓會客室坐下，江騰蛟先說：老陳，我簡直把你想死了，你怎麼現在才來！陳勵耘說：我生病，來一次也難。扯了一些閒話，還談到戰備，改裝飛機，没有人說開會的事。看到陳勵耘情緒不高，不知是誰扯到九屆二中全會，陳勵耘說我壓力很大，日子不好過。林立果說：現在軍隊的日子都不好過，黃（永勝）總長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陳勵耘說：我無非是講了張春橋幾句，現在跑不掉了！林立果說：現在的鬥爭是爭奪接班人的鬥爭。陳勵耘說：現在主席還健在，江青、張春橋要想這樣搞也不敢。林立果說：將來百年之後，就是江青、張春橋這些人來接班。江騰蛟一拍大腿，說就是奪權也輪不到他們，還有林副主席呢！林立果說：奪權有兩種形式，一是武裝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們採取的是和平形式。

陳勵耘對他們突然冒出來這些話感到吃驚，不敢再往下接，生怕再踩“地雷”。[9]

魯珉（空軍作戰部部長）回憶：在座的人中，除了陳勵耘與王維國有矛盾，江騰蛟和王維國也有矛盾。由於江騰蛟的“熱情”，葉群買藥買什麼都由空四軍掏腰包。後來王維國接任，就卡住了。因爲買藥要外匯，空四軍没有，江騰蛟讓王維國到上海市革委會要，王維國很爲難。以前空四軍對江騰蛟的一些補助也卡掉了，江騰蛟很有意見，認爲“人走茶涼”。而江騰蛟越過王維國，遙控空四軍的處長，王維國也

很不高興。後來江騰蛟抓空四軍的“選美小組”（爲林立果選對象），不許王維國過問，王維國更不高興。經過林立果解釋，王維國才勉強解開疙瘩。

林立果和江、王、陳談話，談到快淩晨1點了，江騰蛟突然說：是不是把周建平找來。

江騰蛟、陳勵耘、王維國和周建平也有矛盾。周建平1969年秋由空四軍軍長調任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上任後抓空四軍、空五軍，王維國還無所謂，陳勵耘比較“霸道”，不樂意別人插手。最不高興的是江騰蛟，認爲周建平來了，自己說話就不靈了。他告訴空四軍、空五軍，部隊不能讓周建平抓到手。他還調來幾個人寫材料，說周建平是假左派眞右派，周建平給許世友拜年了等等。林立果在材料上批了幾句，很有政治很有策略很有水平，我完全同意。江騰蛟拿著“尚方寶劍”到上海揭發周建平。1970年5月，林立果在上海巨鹿路空軍招待所接見“骨幹”，進行“路線交底”。王維國說周建平把林立果看成小孩，是對林立果的態度問題。暗示“骨幹”們：周建平犯了路線錯誤，要同他劃清界限。陳勵耘以空五軍黨委的名義要周建平檢討，有人還說要與周建平鬥爭到底。7月南空“左派”散佈周建平是可用不可信的人。江騰蛟也說，周建平到南空後向“右”靠了。好長一段時間周建平一直挨整。他因病到上海住院，王維國還不放過，派人盯著，誰去看周建平都要報告。1970年夏，我回上海休假，林立果讓我買些東西，代他去看周建平。我叫上王維國等一起吃了一頓飯，算化解了矛盾。[10]

周建平（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回憶：1971年3月26日，我回上海，一是家屬手術，本來以爲是盲腸炎，但一打開，發現是子宮囊腫，手術做了8個小時。二是搬家，因爲“人走茶涼”，而且現在南京的形勢也穩定一些了，我決定把家搬到南京去。

我並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3月27日天很黑了，于新野來了，說過去大家對你有不少意見，（林）副部長知道了，他正在做工作。本來想先來看看你，但是不方便。準備同你談談，談的時候希望你不要把大家對你的意見都端出來，事情過去了，就不談了。從于新野的談話中，我認爲林立果來上海是解決團結問題的。3月28日晚，王維國拉我去看林立果，江騰蛟也在座。林立果說，有人向中央告狀，材料很多，要把江政委等人打成“516”分子。當然要打倒江政委也不容易，但你們思想上要做好準備，假如江政委被打倒，南空的狀況就要大翻個兒，可能出現楊余傅事件以後那樣的反復，甚至更加困難。江騰蛟說，我打成“516”，你周建平也不好過。

至於1970年廬山會議的情況，我一無所知。[11]

淩晨3點多，周建平才被接來，因爲路遠，司機路又不熟，走錯了。等周建平到時，江、陳、王已經說得差不多了。林立果說他有點事情回去一下，辦完了再來，你們先談談情況吧。周建平介紹了南京軍區空軍貫徹空軍爲解決南空問題的學習班情況。那時南空“左派”亂抓人，吳法憲想辦學習班壓一壓。談完了林立果還沒有回來，周建平又談了南空黨代

會的籌備情況。空四軍、空五軍是重頭，這兩個軍的代表團至關重要，如果他們的觀點不一致，黨代會肯定開不下去。周建平讓陳勵耘、王維國講講他們的意見。陳勵耘講了五點，大意是會議要高舉團結的大旗，要講民主，讓大家把話講完。《工作報告》要爭取通過，上屆黨委書記仍然要選上，會議不能夭折等。王維國也表示了團結的願望。

林立果回來已經快天亮了，劈頭就問：你們在談什麼？江騰蛟說：談南空黨代會。我們談完了，請副部長指示。林立果没頭没腦簡單講了三個問題，第一當前的主要工作是抓好部隊；第二各個地方的情況不同，可以允許有不同的做法；第三團結。最後林立果說：大家扯到這裏了，周副司令來了，就負責南京左派吧。王政委負責上海，陳政委就負責杭州吧，你們老政委在這兒，他來拉總協調。你們有什麼事情可以多找老政委（江騰蛟）商量。江騰蛟說我只能當當參謀，剩下的三個人誰也没說話。不要說周建平，就是王維國和陳勵耘，也根本不知道林立果說的是什麼意思，還以為是講同張春橋的鬥爭。

足足談了三四個鐘頭吧，全談開了，團結問題解決了，皆大歡喜。

早晨4點多吃飯，吃到6點多。[12]

至於“三國四方”會議的由來，有人在會後問起林立果：你們開了一個什麼樣的會？林立果想了想：三國四方會議，周建平在南空，王維國在上海，陳勵耘在杭州，加上老政委江騰蛟總負責。[13]

林立果在那天晚上並没有捅破“窗戶紙”。周建平不知道他們前面都講了些什麼，也始終没有聽到“三國四方”會議這個詞。直到九一三事件後，他被關進學習班，才從專案組的嘴裏知道。[14]

誰把林立果捧為超天才

林立果兩道濃眉，圓臉，比林彪高出10釐米。不愛說話，看起來是一個普通青年，但因為是“副主席”的兒子，就“特殊”極了。因為“文革”，1967年全國都没有接兵，但擋不住“副主席”的兒子穿上軍裝。3月，吳法憲派專車把没有辦入伍手續的林立果接到空軍，先由一名保衛幹事陪著到上海的高炮部隊鍛煉。穿上軍裝才四個月，還是個“新兵蛋子”的林立果由吳法憲和周宇馳介紹入黨。1969年，林立果被任命為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兼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但是他根本不到辦公室上班。[15]

林立果還不是黨員，就被任命為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雖然是秘書，卻配了一輛“伏爾加”，由處級幹部周宇馳負責給他開車，一年後他要學開車，空軍司令部汽車隊隊長王琢教他，練習地點在西郊機場的跑道上。1968年3月19日，林立果辦了張駕照，姓名呂果。

王飛回憶：林立果入伍後，葉群打電話給我（他們在太倉“四清”時認識），小孩子可塑性強，到你那裏，要幫助教育他，最好專門找一個人。那時都是一幫一，一對紅，我考

慮讓周宇馳幫助林立果。

至於劉沛豐怎麼也成了林立果的“秘書”？這是周宇馳的安排。

王飛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16]

劉沛豐，四川人，大學生，1951 年參軍，話很少。文字能力比周宇馳強，辦事認真。他長期在劉亞樓（空軍第一任司令員）身邊當秘書，1965 年劉亞樓病重期間，只有他念文電能簡明扼要地抓住重點，深得劉亞樓的好評。在同事中也很有人緣，外號“錘子”。

與又白又瘦的劉沛豐相反，周宇馳又黑又壯，性格外向。他比劉沛豐大，“三八式”幹部，曾和潘景寅一起報名飛行員，潘景寅選上了，他留在空軍第一航校任宣傳科長。“伺候”林立果後，周宇馳學會了開車，也學會了開直升機，總算過了一把飛機癮。周宇馳還能寫，曾寫過小說。空軍副參謀長姚克佑把他調到空軍黨辦當秘書，周宇馳別的也沒什麼，就是說話口大氣粗，沒多久劉亞樓就把他撵到連隊，認爲他不適宜在高級機關。1965 年劉亞樓去世後他又捲土重來，先在黨辦任秘書，以後又升任副主任。到後來周宇馳說話的口氣更大，因爲他和林立果的關係最好，大家還是高看他一頭。周宇馳在上海講話：要認識林立果是天才，要相信他，相信到林立果說太陽從西邊出來，你就說對，太陽就是從西邊出來這種程度。你們要支持林立果，支持林立果就像你們存錢一樣，零存整取，一本萬利。

林立果喜歡擺弄電子設備，無師自通。魯珉回憶：林立

果要下部隊調查。跟吳法憲講了，請示也好，打招呼也好，吳法憲不能不同意，說你下部隊，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17]。以後這話成了吳法憲的主要罪證。吳法憲在法庭上說：1969 年 10 月 18 日上午，我把林立果、周宇馳、王飛三個人找來，我面對著王飛、周宇馳說，今後空軍的一切要向林立果彙報，可以由林立果指揮、調動[18]。以後這話成了吳法憲的主要罪證。其實，吳法憲是特指林立果下部隊。但話說得不嚴謹，被周宇馳鑽了空子。空軍常委開辦公會議，中間周宇馳去了，傳達了吳法憲的“兩個一切”，變成了林立果在空軍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

會後列席的魯珉問怎麼回事？周宇馳說不管它，就這樣說。[19]

九一三事件後，“兩個一切”的罪名扣到吳法憲頭上。在法庭上，吳法憲自己也承認了。林立果一夥利用“兩個一切”，搞反革命活動。辯護律師周亨元提問：你爲什麼提出“兩個一切”？你對林立果的反革命活動究竟知道不知道？這個問題很關鍵，至少一面是調查，一面是在爲被告辯護。吳法憲說：我當時相信林彪，我死心塌地跟著林彪。我當空軍司令員是林彪提出來的，所以林彪讓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爲了討好林彪，我提出讓林立果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但是，沒想到以後他們作了傳達，越傳越大。傳達了以後，我也不敢否認，怕得罪林彪，得罪葉群。可他們搞的那些事情，我確實不知道。……我把權全交光了，我承認林彪是眞正的空軍司令，我是假的空軍司令。[20]

1981 年 1 月 26 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結束後，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對旁聽開庭宣判的人員講話中，提到“兩個一切”，說 1969 年吳法憲把空軍的一切指揮權、調動權交給林立果，也不能說準備政變。那時林彪才確定爲接班人嘛。因此，法庭没有採用這類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寫法。[21]

那是一個特定的時代，很多事情不可思議。

空軍開黨委擴大會，吃飯時，沈陽空軍司令員對魯珉說：毛遠新（毛澤東侄子）參加遼寧省黨代會，要被選爲省委書記處書記，但他剛從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才是見習技師，頂多是個副排長，行政 23 級，塡表怎麼塡？人家會說空軍怎麼搞的？你給調兩個地空導彈營，我就可以成立導彈獨立師，讓他當師長，我也好交代了。魯珉說我哪有這個權利。你寫個報告，我給吳司令批。以後這個荒謬建議到底没通過，吳法憲批了毛遠新當二炮處長。命令還没下來，空軍就有人通過內部電台祝賀。吳法憲對魯珉說：你跟他們說說，不要亂來。

以後空軍配副參謀長，吳法憲的意思是安排個技術幹部，讓魯珉上。本來都通過了，但林立果不知道通過什麼關係也塞進了副參謀長的行列。報到吳法憲那裏，吳法憲不同意，但他又不敢公開反對，說暫時不議，壓了下來，誰也不批了。後來林立果又活動當作戰部第二部長，又報了上來。正好在京西賓館開會，吳法憲叫魯珉來，支走秘書，說魯珉你們不要亂搞嘛，叫他當副參謀長，我拿掉了，怎麼又叫他當作戰部第二部長？吳法憲說：你跟他們說說，不要亂來，

林立果、林豆豆、毛遠新（毛澤東的侄子）、周秉均（周恩來的侄子，時任團政委）這些人的工作總理說了，要中央討論，我都不好安排，你們怎麼討論？魯珉說空軍司令部常委會他有事没參加，是副部長列席回來傳達的，他事先並不知道林立果當作戰部第二部長的事。吳法憲說：他們不知道，你打打招呼。魯珉想眞是複雜，你堂堂一個司令員不敢說，我一個小小部長就敢說了？那時高幹子弟在空軍究竟有多少人，一時難以統計。但有一條很清楚，凡是路子硬的，都願意把子女送到空軍，空軍是個大軍種，有技術，待遇也比較高。魯珉感歎地說：劉亞樓在，林立果不敢這麼鬧。通過這些事，也可以看出吳法憲這個司令太難當了。林立果後來的“兩謀”，吳法憲自己說不知道，也確實没有查到他知道的證據。

魯珉覺得林立果野心越來越大，在他眼裏，那些老的，包括他父親林彪都過時了。葉群讓他叫秘書叔叔，他很少叫過，也没叫過葉群媽，都叫主任，背後有時叫“葉老胖”。但他從不當面頂撞葉群，背後罵，走著瞧！別人講劉司令，他一口一個劉亞樓，對吳法憲更不放在眼裏，一口一個吳胖子。林立果那個環境，視野開闊，知道得多，這都可能，但眞要幹一番，差得遠啦。你當個團長、師長試試？不要說中央那些老的，就空軍這些老人，人家是不是跟你？要眞跟你幹，你哪兒行！說來說去是個毛娃娃嘛。後來魯珉和空軍的幾個老人也議論過，周宇馳那幾個人幫的是倒忙。歷史發展是延續的嘛，一代一代走嘛，掌管一個國家這樣大的事，哪

裏可能從七八十歲的老人一下子落到 20 多歲的毛娃娃手裏，人民也通不過嘛。[22]

1967 年七二 0 事件剛過，7 月 22 日，《解放軍報》頭版頭條隆重推出署名空軍司令部紅尖兵（林立果）的長文，通欄大標題《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推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周宇馳和劉沛豐捉刀，葉群請“大牌”陳伯達、關鋒幫助修改。同時還發表評論員文章《推薦一篇好文章》，認為提出新觀點，既要敢“革”，又要敢“保”。

没想到毛澤東批評了“抓軍内一小撮”的錯誤提法，“釣魚台”揪“紅尖兵”，葉群嚇壞了。說這篇文章是集體寫的，與林立果無關。最後，周宇馳、劉沛豐寫了篇檢討，“釣魚台”才没有再追究。

1967 年國慶日前，林彪剛從北戴河回來不久，參加完國慶活動，又要到山海關一帶“換換空氣”。林辦秘書張雲生說：這准是老虎（林立果）的點子。林立果先帶周宇馳去了山海關，為林彪探路。還想從山海關機場去興城，看那裏適不適合林彪休息，坐汽車比較遠，也不安全，想請吳司令派一架小飛機。吳法憲不敢做主，午休時來電話，葉群還没有起床。值班的郭秘書說：這是大事，得請示主任才行。過幾天，林立果回來，說這麼點小事，推給主任幹什麼？當著葉群的面，林立果和張雲生辯論起來。張雲生說：你想用飛機，這關係到你的安全，吳司令不敢做主，林辦任何秘書也無權做主。林立果說：空軍派不派飛機，和你們林辦秘書有什麼關係？你們有什麼權力亂插手？張雲生說：林辦秘書當然管

不著空軍派飛機，是吳司令員打電話找我們，而不是我們找他。但既然空軍報告了，這關係到你是否安全的大事，我們只能報給主任。林立果說：你們這是狗咬耗子多管閒事！張雲生說：吳司令不報，我們才樂得清閒呢！好了好了，葉群說我聽明白了，張秘書他們是好意，你是首長的獨生兒子，他們怕你坐飛機不安全，也是出於對你的愛護。張秘書，你回去吧，老虎還是個孩子，希望你們今後對他還要多關心，多愛護。一向霸道的葉群，這回倒是講了一點公道。没過幾分鐘，林立果也來到秘書辦公室，說張秘書，你剛才就是做的不對，怎麼不對？你不該當著主任面和我爭來爭去，我也不該說那麼多。又過一天，葉群領著林立果來到秘書辦公室，說我們今天正式開個會，談談老虎今後乘坐空軍飛機的事，我請示過首長，首長也同意，老虎是空軍的幹部，能不能坐空軍的飛機，由空軍決定，讓吳法憲負責。我今天正式向你們宣佈這個決定，你們秘書今後也不必為這個事為難了，你們看，這樣可以吧？張雲生說：老虎乘坐空軍飛機的事，空軍的吳司令員最好不要向林辦報告。[23]

以後有了周宇馳傳達的“調動一切，指揮一切”，林立果調動飛機就像調動汽車一樣方便了。

1969 年 2 月 16 日，林彪有一封親筆信。

周宇馳、劉沛豐同志：這兩年老虎在你們幫助下能力上已有進步，今後你們可讓老虎多單獨行動，以便鍛煉他的獨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禮，並感謝你們過去對他的幫助。[24]

這封信很可疑，林彪晚年很少動筆，長篇講話也只在紙

上寫幾個字，從不成篇，怎麼就一口氣寫了 70 多字的一封信？還如此熱情，似乎不像林彪的風格，倒很像林立果的口氣。是不是林立果僞造的（林立果專門模仿過林彪的字體）呢？到後期，林立果的翅膀硬了，不甘心再聽周宇馳等人的“指揮”。魯珉曾對周宇馳說：有些事你要提醒林立果，不一定這麼幹，不好嘛。周宇馳說：我也有我的苦處啊，他對我也不像從前了。從前什麼都徵求我的意見，現在他自己就這麼辦了。[25] 由此看來，他們後期也有些矛盾。但不管怎麼說，林立果獨木不成“林”，他還需要“拐棍”，周宇馳是“軍師”，劉沛豐則是“總管”。相比之下，周宇馳更能獨當一面。所以 1971 年 9 月 12 日林立果飛到北戴河，帶著劉沛豐，而讓周宇馳在北京“總負責”。

林立果的所作所爲毛澤東知道嗎？

1970 年 7 月 31 日，林立果在空軍“講用”。8 月 4 日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把錄音拿到空軍“三代會”上放，並吹噓放了一顆“政治衛星”，是“第四個里程碑”，吹噓林立果是“全才、帥才、超群之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第三代接班人”。[26]

汪東興回憶：毛主席得知後非常不高興，在廬山上就多次批過。南巡時毛澤東專門講了天才問題。大家也都認爲陳伯達不對，搞了一個稱天才的語錄。毛主席說，什麼論天才？二中全會做了相當的結論，《我的一點意見》就是專門批“天才論”的。我並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能靠一個人嗎？天才是靠

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嘛。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說“超天才”[27]，對 20 幾歲的人就捧得這樣高，這沒有什麼好處，實際上是害了他。[28]

註釋：

[1] [2] [10] [15] [17] [19] [22] [25] 採訪空軍作戰部長魯珉筆記，2000 年 8 月 18 日，1997 年 9 月 26 日

[3] [16] 採訪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筆記，1998 年 4 月 2 日

[4] 參見鹿音、赤男《秘密審判林彪“小艦隊”內幕》，載《中華兒女》1999 年第 11 期）

[5] [18] [20] [21]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 1982 年版，191-193、85、91、474-475 頁

[6] 1970 年 4 月 24 日至 25 日，柬埔寨、老撾、越南南方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領導人在廣州舉行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通過關於印度支那當前局勢及印支三國人民反對共同敵人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鬥爭的《聯合聲明》。林立果借用了“三國四方”的說法

[7] 參見 1972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計劃材料之二》

[8] [11] [12] [14] 採訪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筆記，1998 年 2 月 16 日

[9] 採訪空五軍政委陳勵耘筆記，1998 年 2 月 20 日

[13] [24] [26] 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版，267-278、207、209 頁

[23] 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 2003 年 7 月版，336 頁

[27] 指林立果

[28]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123 頁

The Complete Investigation on Lin Biao's Incident

(2)

Published in 2006 by Mirror B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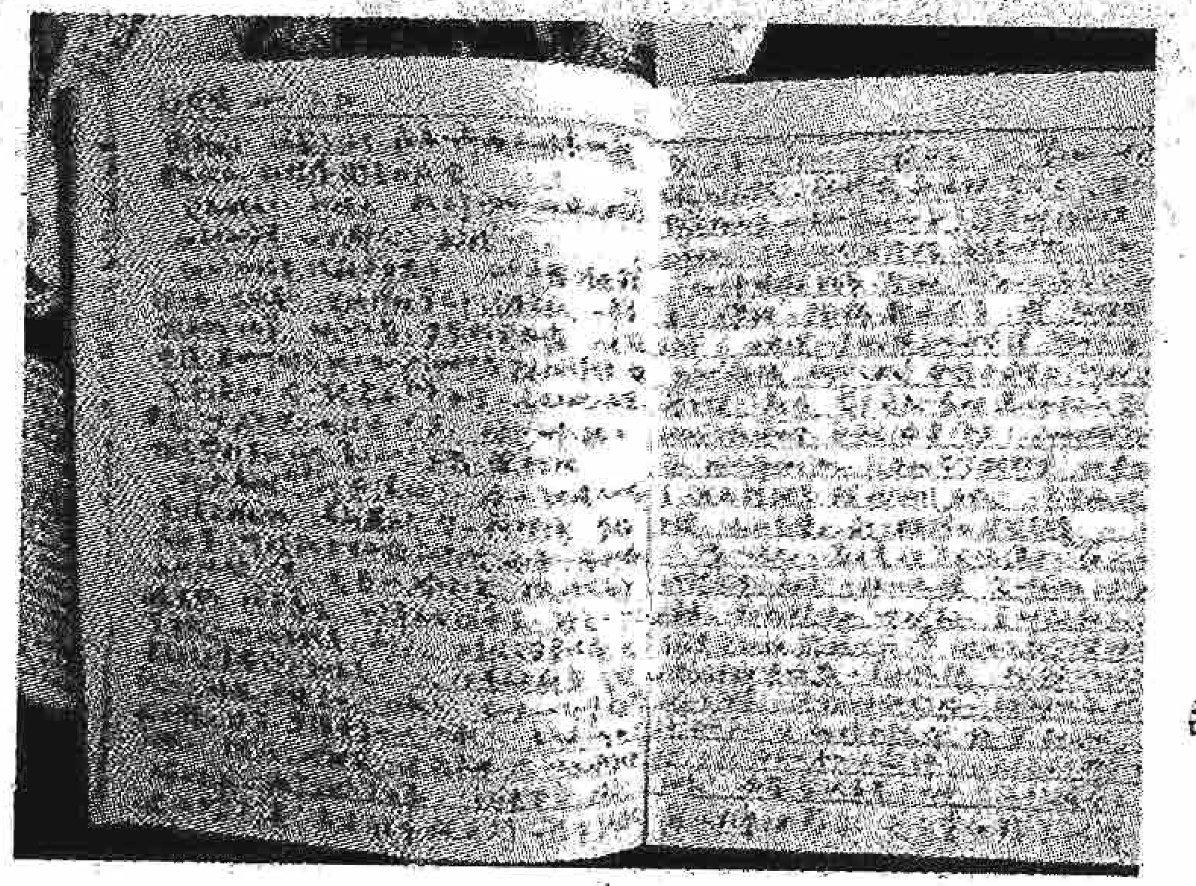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1-932138-42-0

by Shu Yun

Chief Coordinator Ho, Pin
Cover by Yi Hua

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 .S. A.
TEL:(516)338-6976 FAX: (516)338-6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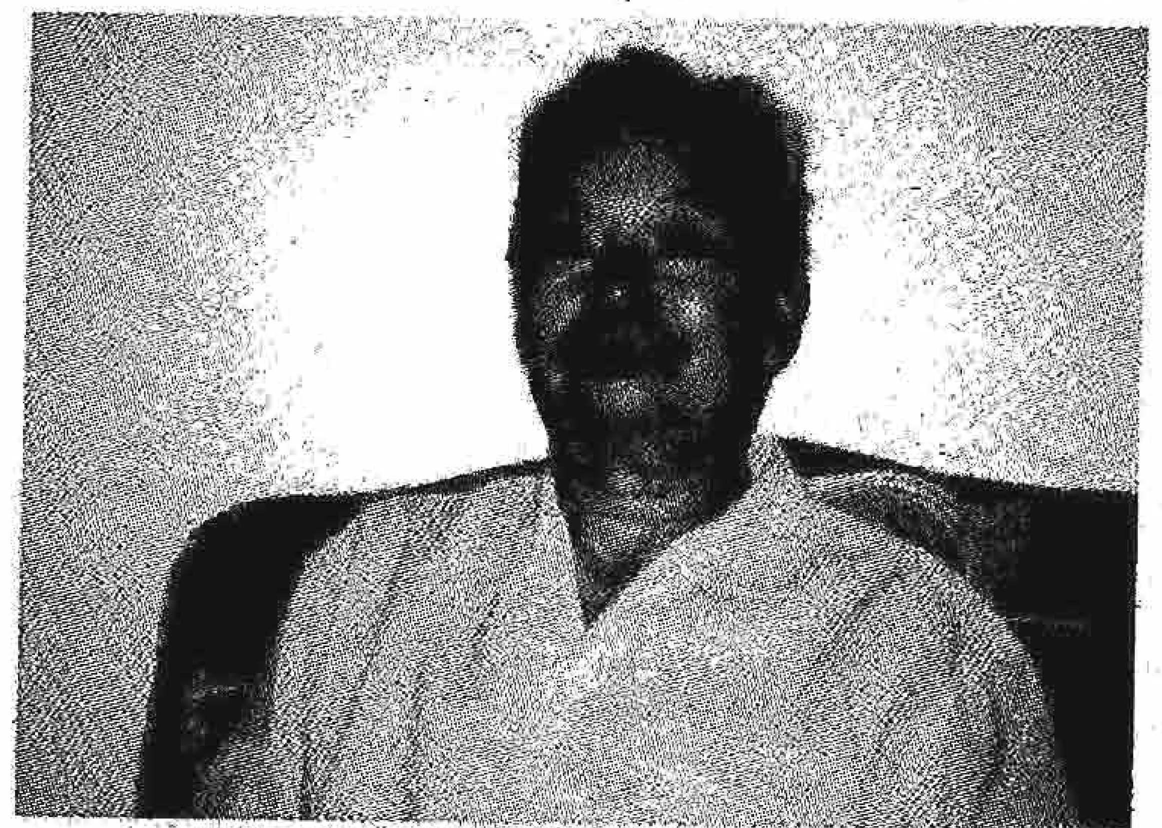
Web: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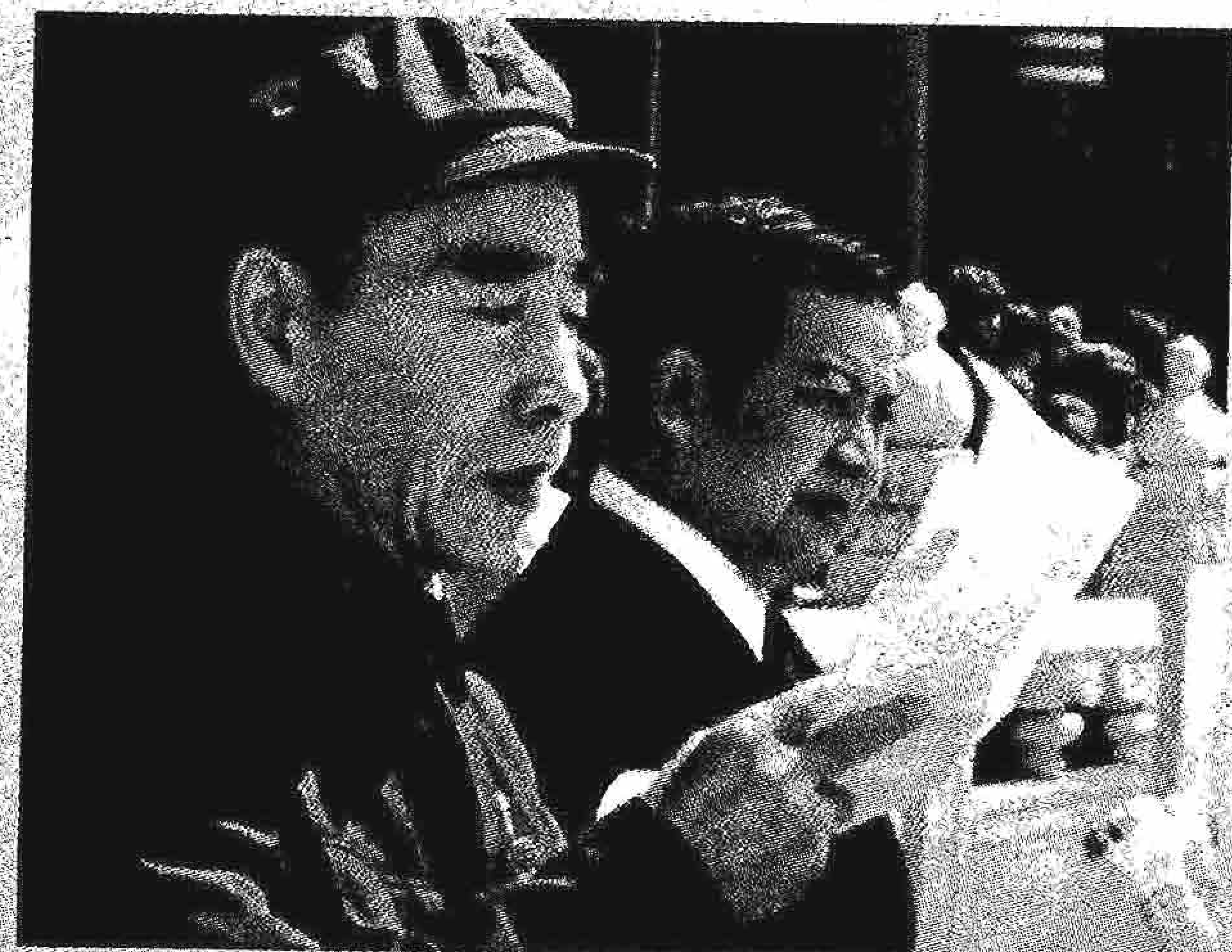
這是我採訪林彪司機初成瑞的筆記。

舒雲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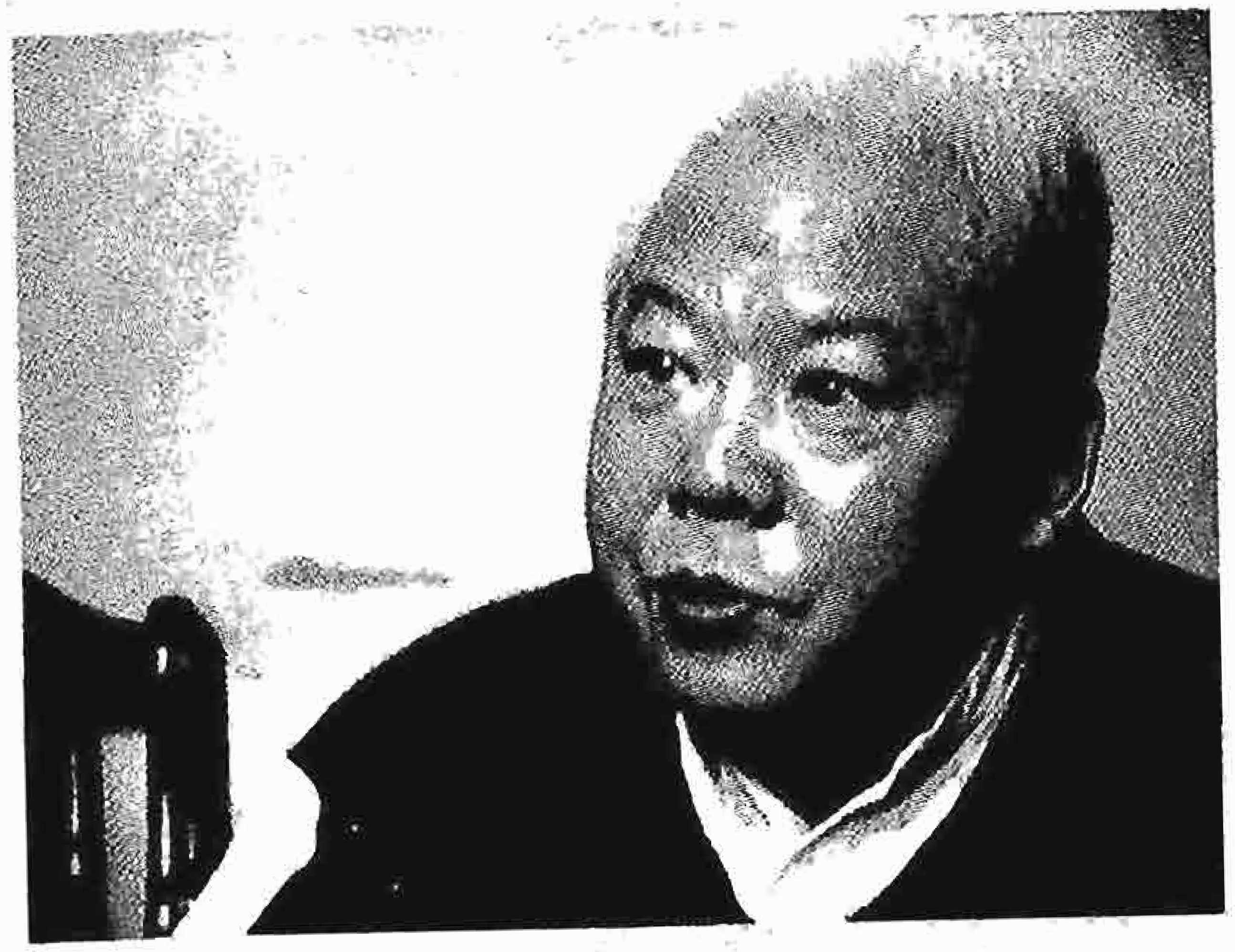
50年代初，初成瑞擔任林彪司機。在林彪重病時，他負責護理林彪。由於他的精心護理，林彪的病情逐漸好轉。

舒雲攝於2000年7月10日，北京地安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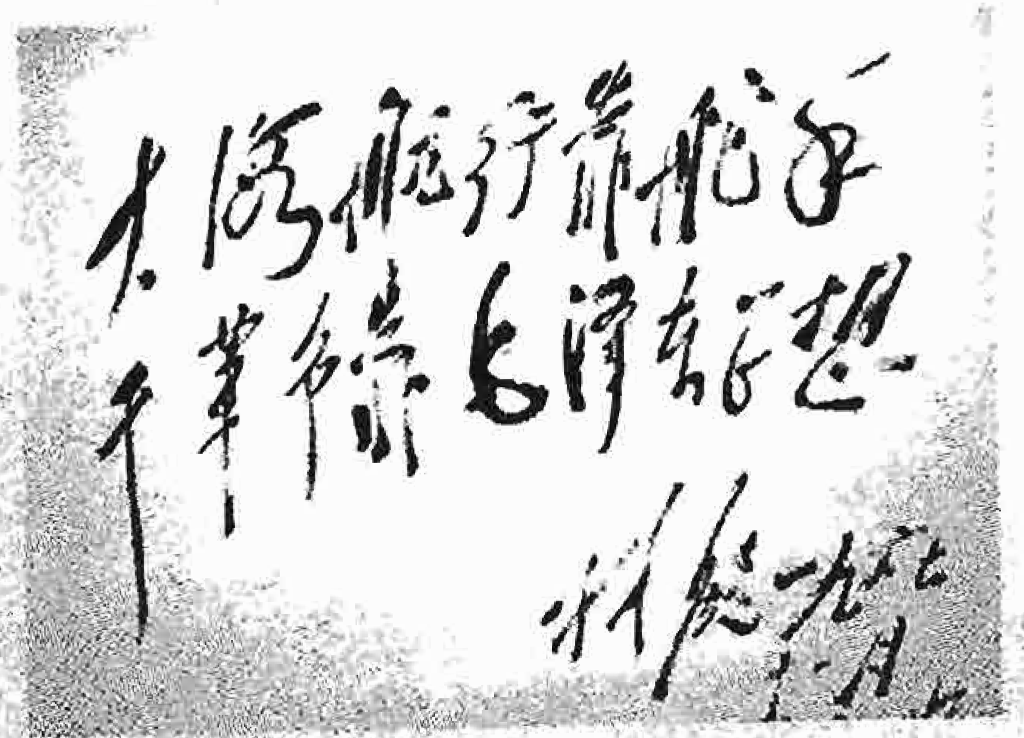
1970年5月20日，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念毛澤東的五二0聲明，因為安眠藥服用過量，念著念著就開始說胡話……

林彪家人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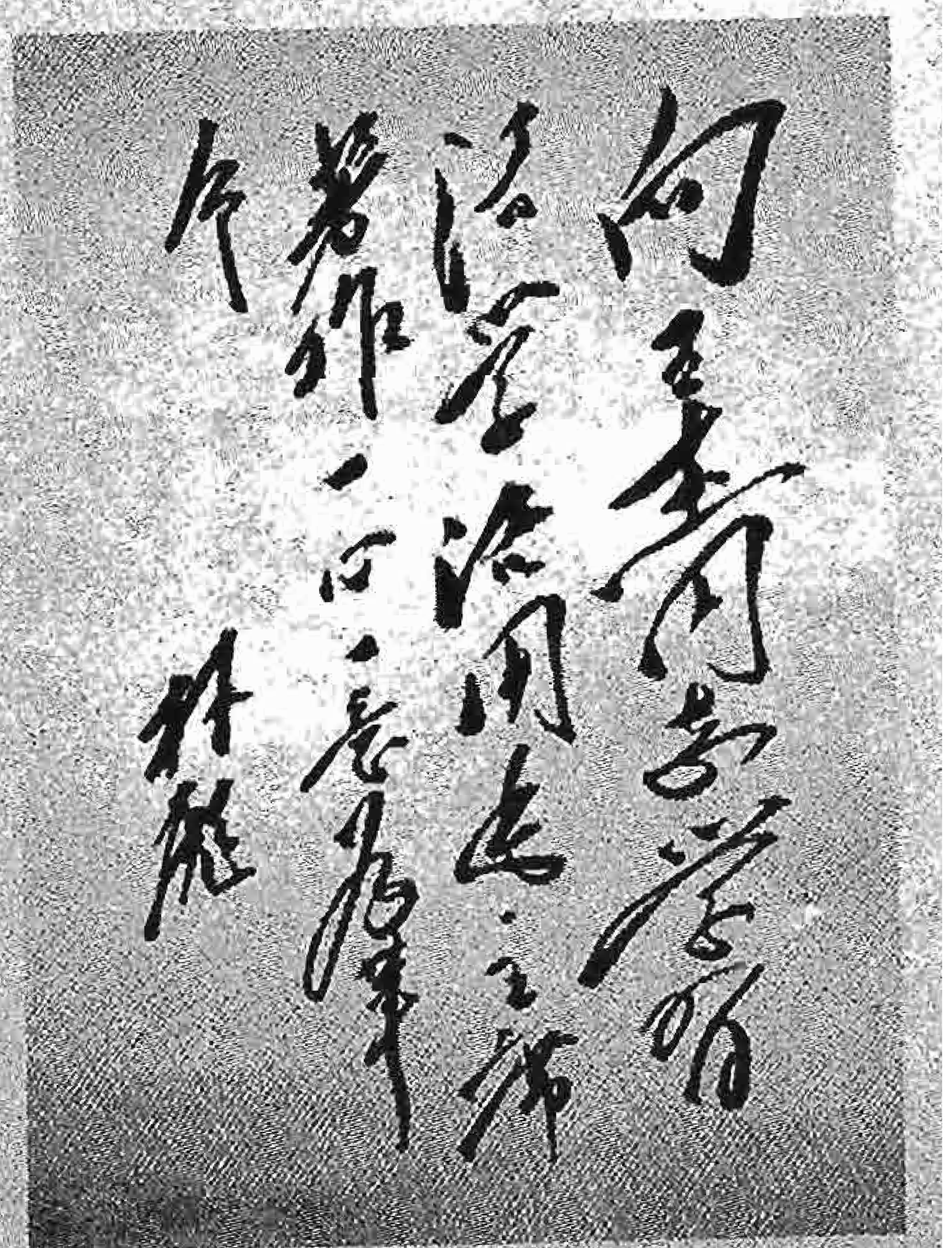
林彪秘書于運深

沈中攝影



林彪為海軍的題詞

舒雲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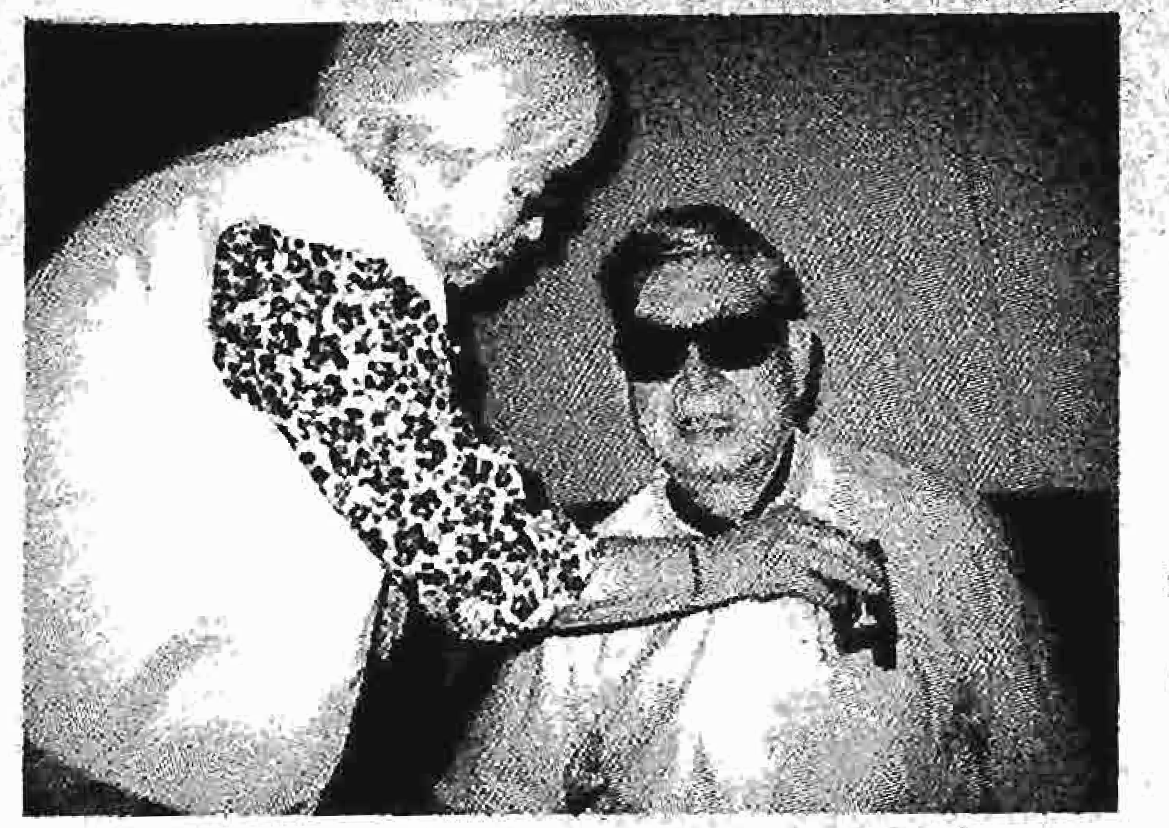


林彪給王傑題詞

舒雲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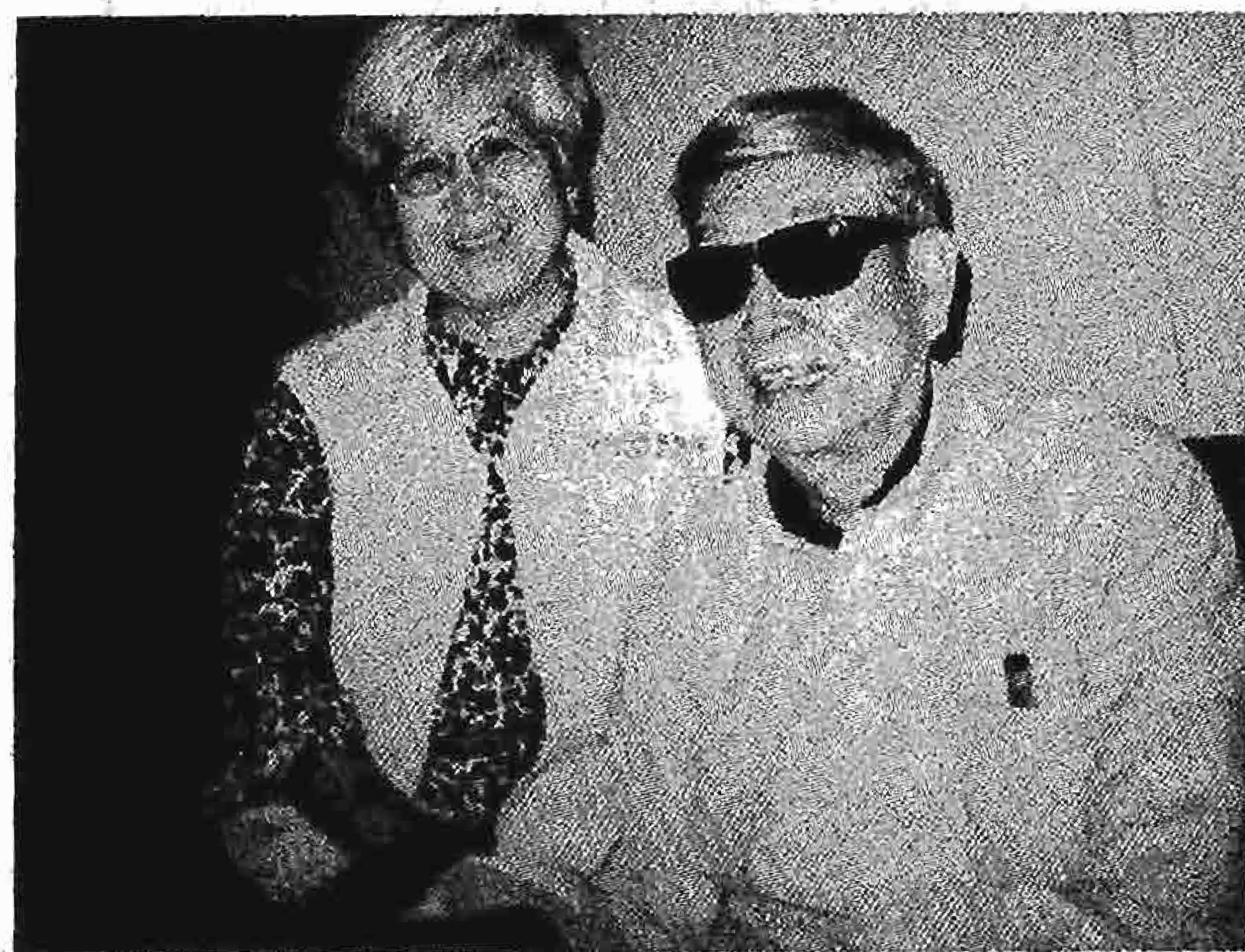






老伴在精心照料已經雙目失明的胡萍。

舒雲攝於1999年11月，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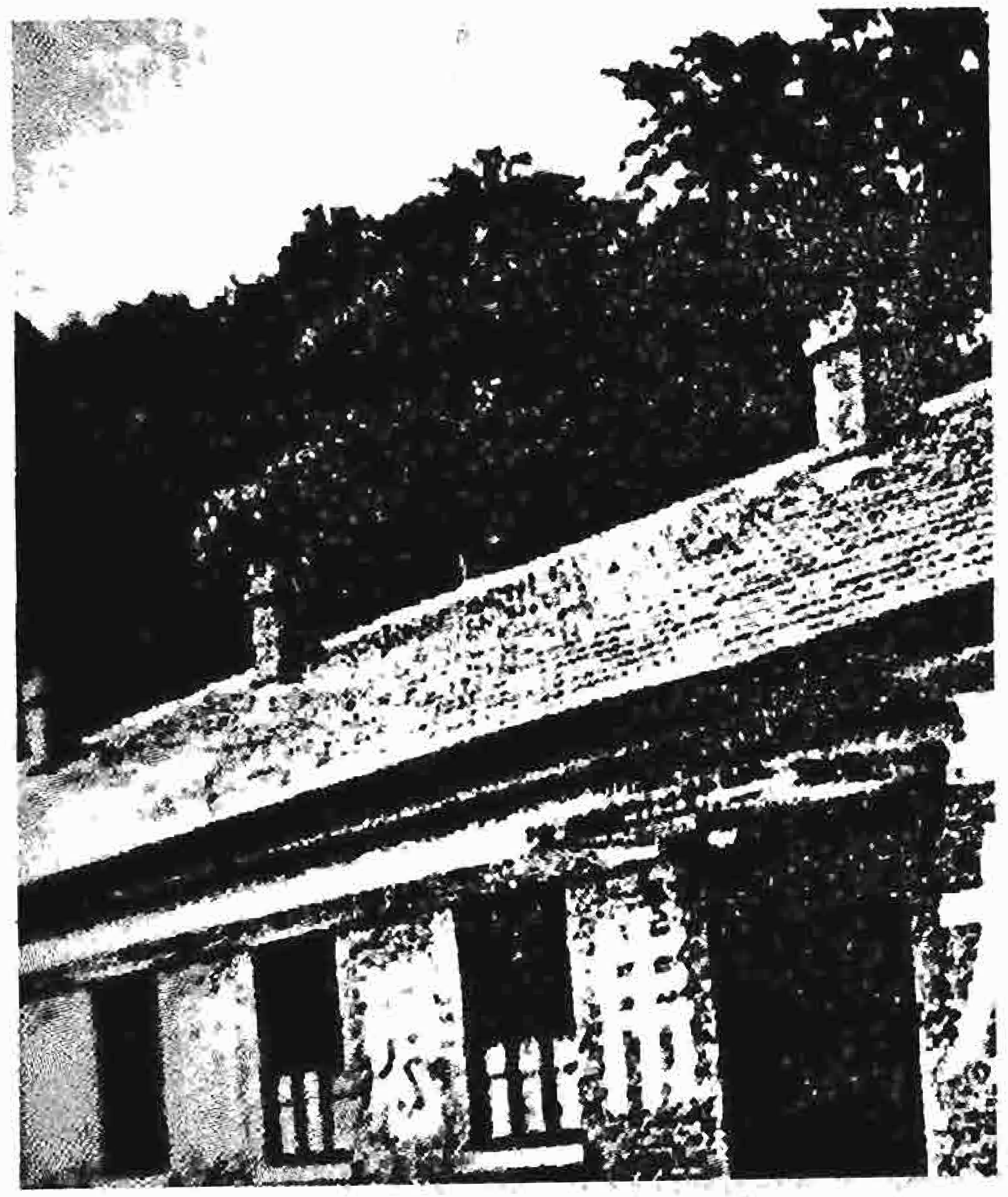


胡萍夫婦

舒雲攝於1999年11月，北京



公佈的林彪手令



西郊機場工字房，林立果從這裏走的。 時念堂提供



王飛在南苑機場。

王飛被獄方診斷為精神病，是“兩案”審理時惟一沒有被判刑的活著的涉案人員。保外就醫後，經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江澤民批准，由空軍安置在南苑機場。至今86歲的他每月的生活費仍是300元，連請保姆都不夠。 舒雲攝於1998年4月，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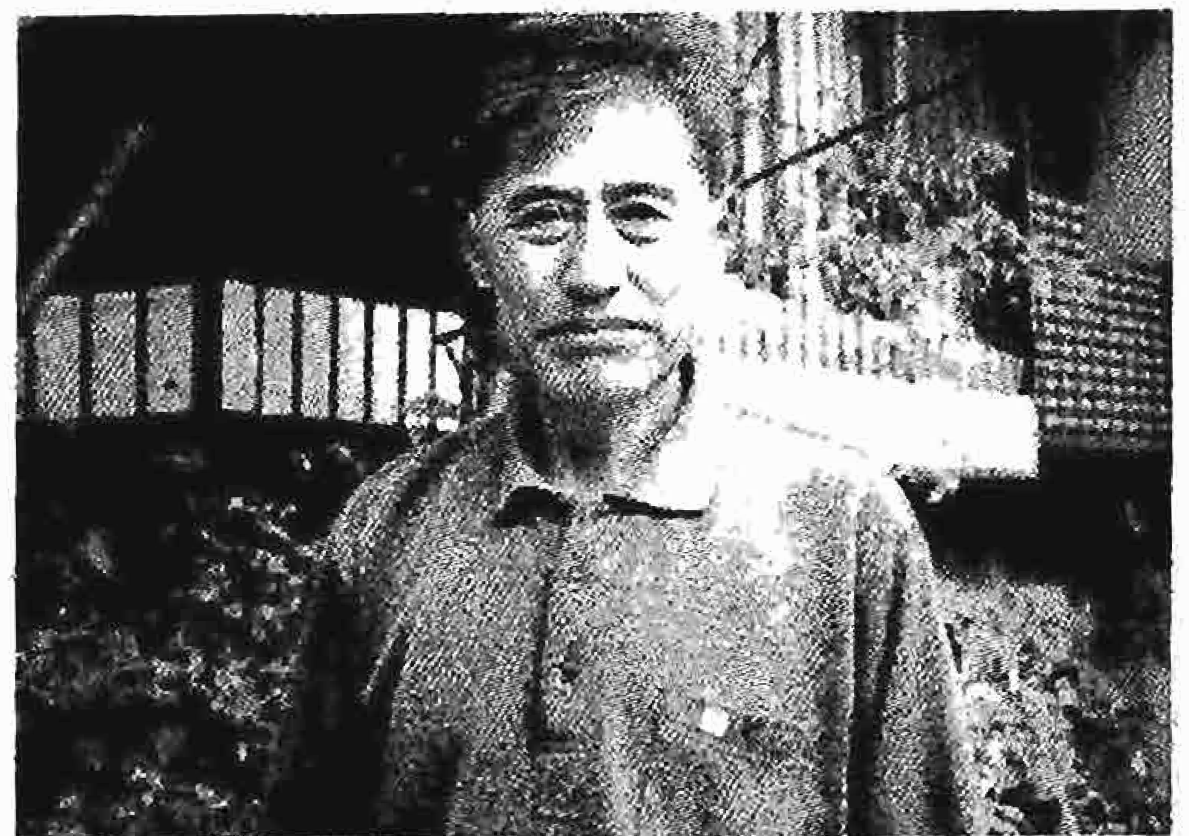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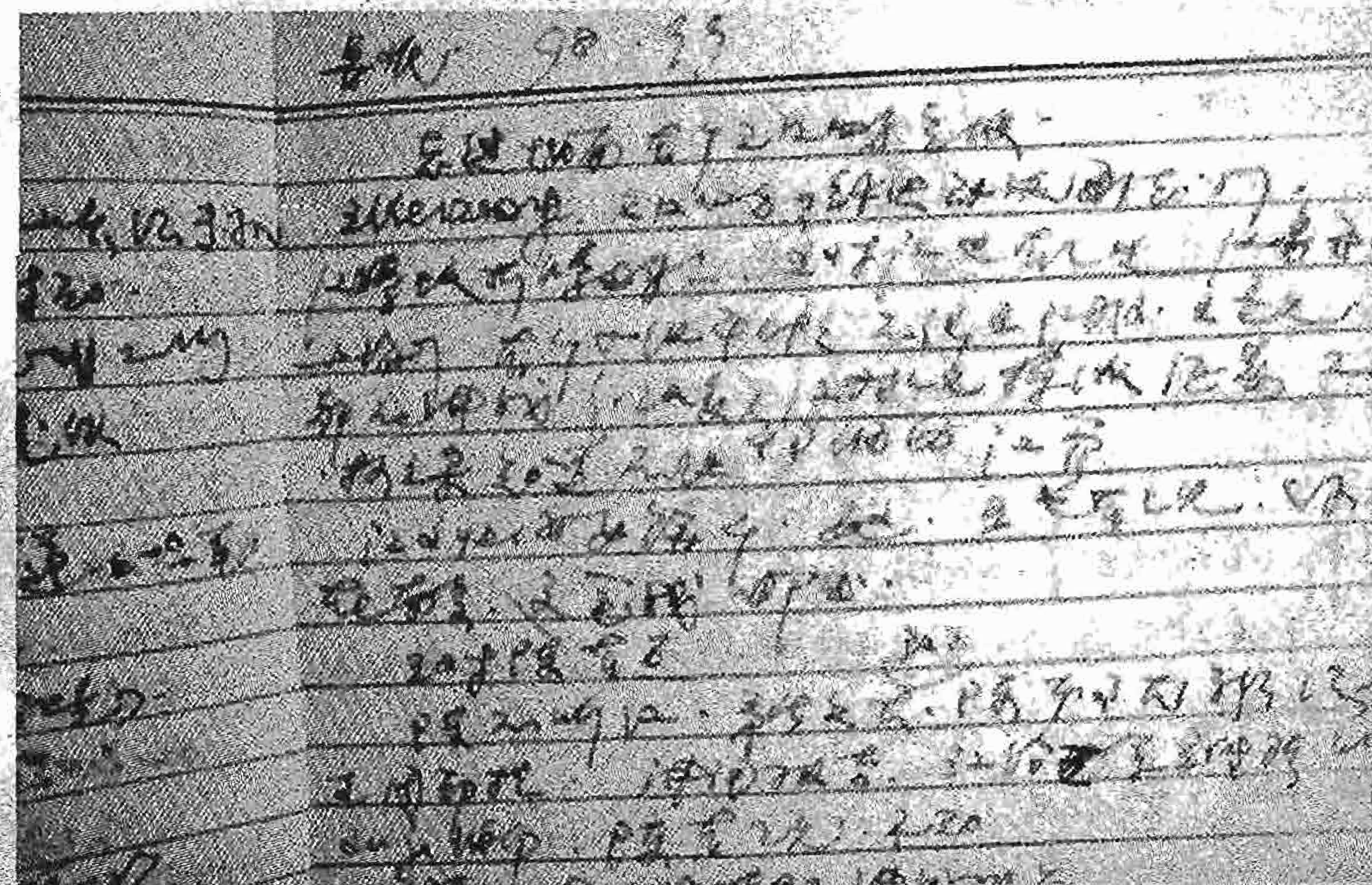
林彪秘書關光烈和妻子姜知傑。

舒雲攝於2000年9月9日，北京



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珉多次接受我的採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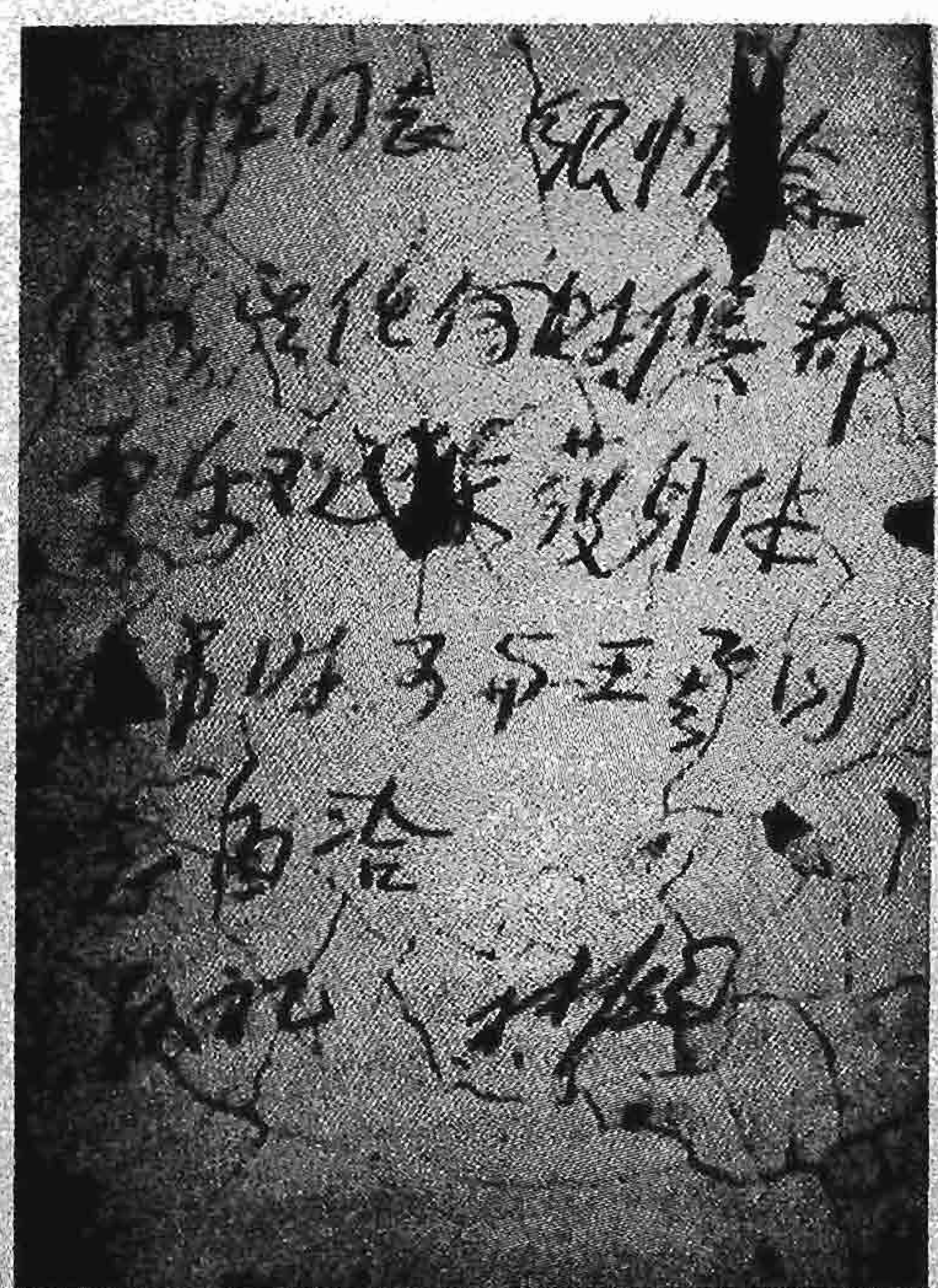
舒雲攝於1998年9月，北京



這是我多次採訪魯珉的筆記之一。 舒雲攝影



釣魚臺北大門　舒雲攝影



林彪給黃永勝的信，由王飛轉交，但黃和王誰也沒見過這封信。



第十四章
林彪的手令

爲什麼要祝……永遠健康

1959 年林彪出山後，工作了兩年，又“縮”回去了。

林彪的病源自平型關戰役後受的槍傷，傷了神經系統。雖然兩次去蘇聯治療，不但没有治好，反而越治越重。加上打仗時常常幾天不睡覺，用腦過度，成了習慣性失眠。爲了睡個好覺，什麼辦法都用上了[1]。初成瑞回憶：林彪自己也看藥典配藥，加上砒霜，吃下去“死”了，都要開追悼會了，又活過來。還有一次林彪吃自己配的藥，半夜裏光著一隻腳跑到雪地裏，警衛員拖都拖不住。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期間，没時間治，乾脆不治了。衡寶戰役對林彪壓力很大，白崇禧 60 萬軍隊，毛澤東讓他全解決，一仗就結束。林彪多少天没睡覺，精神過度緊張，長期失眠造成頭痛，越來越厲

害，痛起來頭直晃，不得不一邊走路，一邊用毛巾按摩頭部。後來又開始拉肚子，就討厭水果了，也不吃菜，又不活動，憋成了頑固性便秘。

1950 年 3 月，林彪病情加重，請示中央，決定讓他離開前線，到北京治療。6 月搬到頤和園的翠雲軒，裏面的路不好，是擔架抬上去的。這時林彪瘦得皮包骨，先是消化不好和怕冷，後來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走路也困難了，臥床不起，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偶爾到毛主席那裏開會，只有十幾米，也走不了，只能讓警衛員揹進去。[2]

抗美援朝，周恩來在一次會上說：如果林彪同志身體好，不會叫彭德懷去的。

林彪本人也不願意去朝鮮打仗，他認爲不應該出國作戰。在政治局會議上，林彪講出了一番"道理"：中國打了二十幾年的仗，老百姓厭煩打仗了。再說，中國的軍力未必比得上美國。

到了 1953 年春，林彪舊病没好，反而又添新病。開始只是怕光，三層厚窗簾，白天進屋像進了山洞，手電筒要用布蒙上。後來怕的東西越來越多，怕光、怕水、怕冷、怕出汗。最怕的是風，內勤走快一點，就說有風，一點點風也不能見，一見風就出汗。怕水，不能住在海邊，常年不洗腳等，甚至一聽到水響就要拉肚子。

李文普回憶：老秘書關光烈向軍委辦公廳負責人蕭向榮彙報林彪怕水、拉稀，連山水畫都不想看，被葉群認爲"洩密"，狠狠批了一頓。[3]

林彪每天最多聽半小時的文件，剩下的時間都是獨自一人坐在暗室裏，一坐好幾個小時，一動不動。從表面上看，林彪瘦弱，臉色蒼白，醫生診斷林彪的主要臟器都没有毛病。可是人除了"臟器"，還有"精神"呢？他對日常活動喪失興趣，幾次自殺未遂。三 O 一醫院專家診斷：林彪的卡路里嚴重缺乏，只有正常人的一半。葉群曾對林豆豆說：幸虧你爸爸身體不好。什麼時候身體好了，什麼時候垮台，我們都得倒楣。1969 年"九大"前夕，葉群對林立果說：你爸爸懷疑自己得了癌症，他活不了多久了，你以後就得全靠媽媽了。[4]

"文革"期間，林彪除了奉毛澤東之命上天安門亮相講話，或偶爾會見外賓外，所有的會議他幾乎都不參加。因爲身體不好，不願陪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不陪又不行，有時到了難以支撐的程度。李文普回憶：林彪陪毛主席到金水橋下接見紅衛兵，累得幾乎走不回來。

但是林彪的心臟、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5]

那爲什麼一天到晚坐在房子裏？這也不是裝的，不是一天兩天，而是成年累月，想裝給誰看呢？

林彪自己也講：他"身體不好"，"神經不好"。

林豆豆回憶：關於林彪的病情，中央保健局有詳細的報告。

當時給林彪吃的藥都是穩定神經的藥。[6]

過去，精神疾病不爲人們認識，檢查不出器質性病變，怎麼叫有病？直到 1980 年至 1984 年，我國第一次大規模地

對國內 12 個地區進行抽樣調查，發現在成年人中各種精神障礙發病率高達 12.7%，據估計，我國至少有 1000 萬精神病患者。

有人把林彪的名字隱去，只說林彪的症狀，精神病院的醫生著急地說：這麼嚴重的精神病，為什麼不趕快送來？

蘇聯專家曾給林彪下過診斷：抑鬱症。[7]

抑鬱症的診斷標準，以心境低落為主要特徵，且持續兩星期以上。在此期間，至少有下述症狀中的四項：

（一）對日常活動喪失興趣或無愉快感；

（二）精力明顯減退，無原因的持續疲勞感；

（三）精神運動遲滯或活動明顯減少；

（四）自我評價過低，或自責，或有內疚感，可達妄想的程度；

（五）聯想困難，或自覺思考能力顯著下降；

（六）反復出現死亡念頭，或有自殺行為；

（七）失眠，或早醒，或睡眠過多；

（八）食欲不振，或體重明顯減輕；

（九）性欲明顯減退。[8]

且不說怕這個，怕那個，一個好好的人，能整天坐在黑屋子裏嗎？一個長時間坐在黑屋子裏的人能算得上精神正常嗎？不要說精神病專家，就是普通人恐怕也會得出結論。

現在看，林彪確實有嚴重的抑鬱症。

林立果的“三個方案”，林彪知道嗎

在林彪的罪證材料中，最重要的一條物證就是《五七一工程紀要》。

在活著的人中，沒有人看過《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定稿。[9]

林彪知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

官方認為林彪知道，惟一的證據是李偉信的交代。

1980 年 11 月 25 日，李偉信在法庭作證：《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在林彪授意下，由林立果在上海制定的。其後，“聯合艦隊”實際就是按照這個計劃，進行武裝政變的準備。于新野對我說，“批陳整風”彙報會時，林彪、葉群要搞“五七一”（武裝起義），黃永勝他們也同意。[10]

在活著的人中，李偉信是九一三事件前惟一看過《五七一工程紀要》草稿和惟一聽過林立果說林彪知道的人。但是，李偉信也沒有見過《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定稿。

在法律上，首先孤證不能成為證據，第二李偉信是聽林立果的“傳達”，是間接證人。這就有了疑點，林彪可能說過，也可能沒有說過。

林立果一向拉大旗作虎皮，如果沒有林彪，他算老幾？

林豆豆回憶：9 月 7 日在與林立果的談話中，我問他形勢真的有那麼糟糕嗎？首長的態度怎麼樣？他知道嗎？林立果說，首長還不知道，事情沒考慮成熟前，不能跟他說。[11]

王飛說：裏面的話很多像是周宇馳說的。[12]

但是，是周宇馳"原創"還是"抄襲"，不得而知。

王年一[13]分析：《五七一工程紀要》假如林彪看過，他會不會同意，這是不難推斷出來的。

從 1980 年"兩案"的審判看，沒有發現林彪密謀殺害毛澤東的行動，也沒有證據證明林彪知道林立果的"兩謀"。甚至林彪與林立果的"聯合艦隊"有無聯繫，有關文件也沒有提出確鑿的證據。

曾在林彪手下當過參謀處長的中將蘇靜說：林彪這個人，打仗還是很厲害的，一個是巧，一個是細，而且很有創意。包括哪裏有幾挺機槍，哪裏配備多少火力，哪裏埋伏一支預備隊，小心極了，"前怕狼後怕虎"，方方面面考慮成熟，才"一錘定音"。這一點確實厲害，你想想，那個年代人的文化水平，他能把千軍萬馬在這大山川裏擺得井井有條，用起來得心應手，很不容易呀[14]。而如今要搞政變了，爲什麼不精心策劃，調動軍隊、控制輿論呢？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華國鋒、葉劍英抓"四人幫"，事先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並且要調動軍隊。而始終是"光杆司令"的林彪在黑屋子裏就能"政變"嗎？

九一三事件的整個過程慌張零亂，哪裏有一絲一毫的大將風度？

那麼，九一三事件前，林彪在幹什麼呢？

林彪秘書回憶：9 月 12 日上午林彪曾詢問尼克松訪華日程方面的進展，我們都沒有感覺林彪情緒上有何異常。

奇怪？林彪到北戴河後就拒絕過問中央的一切事情，卻一反常態，非常關心中美關係的進展，指示秘書一有消息就直接報來。如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中美之間所有的口信來往，中央工作會議發的文件，總理同基辛格會談的簡報，以及總參三部編的國際問題資料等。他還幾次提出要見美國總統尼克松。9 月 12 日上午，林彪又說過一次，他要見尼克松[15]。這就更奇怪了，這天半夜就要"倉皇出逃"了，怎麼還有情緒關心"八竿子打不著"的尼克松？

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的言行鮮爲人知，而林立果卻分外活躍。林立果認爲"步步緊逼"，"林彪"遲早會成爲"劉少奇"，尤其通過秘密渠道得知毛澤東的南巡講話後，只想拼個"魚"死"網"破。林立果在具體策劃"兩謀"時多次講，這次是首長（林彪）下決心要搞，親自在抓。副統帥下了命令，主動進攻，先把 B-52（毛澤東）搞掉。但這一系列的活動以至策劃武裝政變，似乎就是林立果加上葉群沒頭蒼蠅般的到處亂撞。

後來林立果自己決定不搞了。[16] 如果林彪在遙控指揮，林立果敢不請示就擅自不搞嗎？因爲葉群"抽鞭子"，才又接著搞。這裏問題來了，葉群怎麼也"擅自"做主了呢？她就不怕林彪大罵嗎？林彪打仗一向獨斷專行，大權獨攬，怎麼在"兩謀"中如此"大撒把"呢？林立果、葉群都在"擅自"，而林彪卻一如既往呆坐在北戴河的屋子裏。

到 9 月 13 日，林彪在北戴河近三個月，除了八一前坐

飛機到北京參加建軍節招待會外，一直窩在北戴河，哪裏也沒有去過，沒有和任何人接觸，林彪屋裏沒有電話，他連電話也沒有打過一個[17]。據在北戴河警衛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大隊長姜作壽說：我們沒有發現什麼異常現象，只是覺得我們保衛的這位副主席從廬山下來後，情緒不那麼好，整日愁眉苦臉，不見一絲笑容。他外出活動原本就很少，這一段就更少了。張耀祠也說：事先沒感覺林彪搞政變。他那個身體，白天晚上，覺也睡不好，成天蹲在房子裏不出來。[18]

林立果的“三個方案”，上策謀殺毛澤東，中策南飛廣州（香港），下策北飛蘇聯。現在看，上策和中策似乎是林立果的主意，下策似乎是葉群的主意。葉群去過蘇聯，會俄語。那麼，林彪知道嗎？林彪同意去蘇聯嗎？如果同意，爲什麼林彪沒給掌握軍隊大權的黃吳李邱佈置過，也沒有給任何人佈置過，“林辦”工作人員包括時刻在林彪身邊的內勤小陳、小張都沒有聽林彪說過“三個方案”，這似乎有些不合邏輯。

九一三事件後，林彪秘書、警衛、內勤都否認林彪有任何“政變”的跡象。

也就是說，林彪與《五七一工程紀要》的關係還是個謎。

姜作壽說：九一三事件可以說是突然發生的。張耀祠也認爲很突然。突然在哪裏？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主席，計劃還沒出來，主席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緊張了……[19] 如果林立果動手，能搞成嗎？張耀祠說：林立果虛構，不可能！他只是意圖（紙上談兵），搞不成。還是娃娃，把自己力量

看大了。我們給部隊都要講，他根本不可能實現。[20]

“林彪手令”爲什麼有橫豎兩個

于運深回憶：九一三事件前夕，林立果曾以治牙爲名，兩次回北京。9月2日中午，林立果飛回北京，9月4日傍晚飛回北戴河。9月8日21點48分，在葉群的支持下，林立果再次從北戴河飛回北京。葉群打電話給毛家灣，說老虎回北京治牙，要嚴格保密。

在西郊機場落地後，林立果在周宇馳的陪同下，回了一趟毛家灣。

我1964年調到“林辦”，到1971年已經是老秘書了。這時四個秘書調走了三個，幾個秘書的事全壓在我身上，我非常忙，廬山出事根本沒看出來。林立果21點30分就到了毛家灣，掛電話到北戴河向葉群報了平安，並對我說第二天去三0一醫院看牙。聽他說牙痛，我還關心地詢問了幾句。第二天林立果確實去看了牙，拍片，驗血，等檢驗報告出來要兩天。

林立果當晚沒有在毛家灣住，說有電話，就找空軍一號台。他拿了東西就走，我一直在旁邊，跟他去他的房間。在走廊上，林立果從白襯衣口袋裏掏出一張白紙，上面用紅油筆寫著“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林彪，9月8日”，沒有章。這可能是“林彪手令”的第一次亮相。

林辦工作人員中，只有于運深看過“手令”，關在亞療[21]

時，他思想鬥爭了很長時間，說不說。只有林立果和他兩個人知道，林立果已經死了，不說，沒有人知道。說了呢？會不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于運深終於說了。說了以後他心裏很痛快，覺得自己沒有向黨保留什麼。但從此他的問題升級，被單獨關押。林辦工作人員中，單獨關押的只有李文普和他。[22]

這個"手令"是寫給誰的？按什麼"命令"辦？爲什麼只有一句如此含糊的話？

九一三事件前見過"林彪手令"的人比見過《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人多，而且現在不少人包括王飛、李偉信等人都還活著。但是 1980 年審判"兩案"卻沒有注意到"林彪手令"有兩個。這也不奇怪，因爲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馳，再沒有人同時見過兩個"林彪手令"。出現在法庭上的"林彪手令"被公開在報刊上，是周宇馳拿的那張。有關部門將直升機迫降現場搜集到的部分碎片拼對復原，拍成照片，作爲林彪"發動武裝政變"的"鐵證"。這個"林彪手令"的字跡是"豎的"。[23]

于運深回憶：他看到的是"豎的"，不是"橫的"。[24]

魯珉、王飛等人看到的也是"豎的"。[25]

1980 年"兩案"審判，總政保衛部鑒定這個"豎的"是林彪的筆跡。[26]

但林立果身上還有一張橫寫的"林彪手令"。這個"橫的"手令"兩案"審理的法官們並不知道。實在是這個"橫的"手令"藏"得太深，看到的人很少，但至少胡萍和"林辦"老秘書關光烈看過。9 月 12 日傍晚，林立果在去北戴河前，來到候機室，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本"小紅書"，從裏面拿出一張 16 開的白紙，遞給胡萍。說這是首長的親筆"手令"，事關重大，要特別注意保密。胡萍記得很清楚，字跡是"橫的"。

因爲在"兩案"審訊中，只是提到"林彪手令"的內容，卻沒有提到字跡是"橫"是"豎"。在法庭上，雖然出示過"林彪手令"，但胡萍出庭時沒有出示，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會有兩個"手令"。後來胡萍因腦部手術雙目失明，也就無從看見公開發表的那個"豎的"。但關光烈看到了，他從公開的報刊上看見那個"豎的"，非常奇怪，怎麼和自己看到的那個"橫的"不一樣呢？[27]

也難怪，這個"橫的"被林立果帶上二五六號三叉戟。他把這張"橫的"夾在"小紅書"裏，孫一先（中國駐蒙古大使館二秘）在墜機現場看到了"小紅書"，裏面沒有那張神秘的"白紙"。[28] 如此說來，這個"橫的"很可能被蘇聯人拿走了，但願它早日"浮"出水面。

爲什麼"林彪手令"會有"橫的"和"豎的"兩種？"林彪手令"是真實的嗎？換句話說，是林彪寫的嗎？"文革"後林彪幾乎很少動筆，文件圈閱也常常由秘書代筆，怎麼可能連著寫兩張"手令"？就是寫了兩個，也會毀掉一個，似乎不可能讓林立果把兩個都拿走。

現在我們分析一下，"手令"上寫兩個人的名字，與"手令"有兩個不同版本，對誰有利呢？不言而喻，一份"手令"不夠，因爲林立果和周宇馳要分開活動，需要一人拿一個當"聖旨"，於是再"創造"一份。那麼一模一樣不更好嗎？或許

是忙，沒想到那麼多的細節？也可能是先寫了一個“橫的”，不太像，再模仿一個“豎的”。模仿也不那麼容易，所以“橫的”“豎的”都沒捨得丟掉，卻沒有想到，由此露出了破綻。

如果眞是“林彪手令”，爲什麼掌握軍中大權的黃吳李邱穩坐釣魚台？黃永勝這個總參謀長調動過多少部隊？邱會作這個總後部長準備了多少炮彈？更爲可笑的是，爲什麼林彪不向掌握軍權的黃吳李邱下令，卻讓“娃娃們”拿著他的“手令”招搖？

有人說，這事不像林彪辦的。這個“政變”看不出林彪參與其中的痕跡，只能是沒有軍事常識，沒有指揮能力的林立果的“傑作”。

九一三事件發生十天後，周恩來到機場送柬埔寨賓努親王後，在二號樓接見民航幹部。周恩來說：林立果還是個20多歲的娃娃，大學剛畢業就到作戰部當副部長兼黨辦副主任，捧得那麼高。在上海，還專門給他修了一套很漂亮的房子，誰都不知道這些事，簡直不像樣子。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的一次會上憤怒地說：吳法憲，你說說，林立果不過是個娃娃，你們爲什麼把他捧得那麼高？甚至把兵權交給他？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做？吳法憲始終不敢抬頭，不敢正視總理的目光，支支吾吾，沒說出一句完整的話。9月天已經涼了，而他卻汗如雨下，兩手不住地交替擦汗。

吳法憲從來沒有見過“林彪手令”，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也沒有見過[29]。見過“手令”的幾個人中，也沒有人知道傳達的“命令”是什麼？爲什麼從不公佈其內容？說到

底，根本沒有什麼“命令”！

“林彪手令”是林彪寫的嗎

“林彪手令”是林彪政變的惟一物證。

林辦秘書于運深認爲是林彪的字。于運深回憶：我在林辦七年，見過林彪寫字多了。林彪高興時，“哄”他寫個條子很容易。我並沒有把這張紙當成什麼重要的東西，以爲林立果和葉群又鬧什麼矛盾了。

平時林彪寫字用軍委辦公廳服務處發的那種白紙，沒有天地，削好的鉛筆，字的大小一樣。但林彪口述一般都非常具體，而這個“手令”太含糊，沒有確定性，“盼”照“什麼”辦？不知道。而且用了個“盼”字，更不像林彪一貫下命令的口氣。林彪一生中從來沒當過副職，下命令從來是死命令，堅決果斷。“盼”有乞求、祈使、商量的意思，這倒像是沒當過主官的林立果的口氣。[30]

但是，于運深是在走廊裏看的，邊走邊看，不一定會那麼仔細。而且他當時並沒有把張紙當成什麼重要的東西。最重要的是這個“手令”上的字非常像林彪寫的。

黃永勝還沒有被抓時，看過繳獲後拼湊起來的“林彪手令”。周恩來問：像不像？黃永勝說又像又不像。周恩來也說：就是又像又不像。林豆豆在被審查時看到的是“林彪手令”的影印件，她認爲，“手令”和“親筆信”是像林彪的字體，但更像是模仿的字跡。她說“像”，堅決不說“是”。1972 年 5

月，林豆豆就申明過這一點，並始終拒絕寫旁證材料。[31]

林辦一位秘書也說：據我看像林彪的字，還是"像"。

1980年"兩案"預審時，曾讓江騰蛟看過拼起來的"林彪手令"，江騰蛟在法庭上兩次說，他見到的"手令"與這份拼起來的不一樣，字體不像。他見的"林彪手令"寫的很整齊，而這份字更潦草一些。[32]

胡萍回憶：咱們看不出來是不是林彪寫的。就看過題詞，他本人的筆跡咱們也不接觸。很明白的事，現在看，(手令)是假的，我寫材料也寫過。

胡萍曾見過周宇馳苦練林彪的簽名，他當時還奇怪，練那個幹什麼？有一次在機場，周宇馳對胡萍說起開車，說吳法憲不讓我們開車，後來首長（林彪）對這事寫了個命令。他叫程洪珍把材料拿來，紅鉛筆寫的，32開那麼大（與"手令"一樣），五六行字，抬頭寫立果、宇馳，意思是開車在軍事上有好處，掌握一門技術很重要。下面是林彪簽名。當時胡萍不理解，開車這樣的小事還要林彪說話？九一三事件後他才明白，這個意思是叫他看林彪親自寫的，先讓你看這個東西，再叫你看"手令"，你不會懷疑。良苦用心，迷惑你，誰想得到？胡萍說：所以我說這個"手令"是假的，打著林彪旗號。[33]

關光烈回憶：林立果給我看的"林彪手令"是"橫的"，我認為是林立果模仿的。我任林彪秘書時，葉群曾叫我們學林彪的字。可是誰敢學？領袖的字，不敢學。後來我聽說李根清（林彪秘書）學了。以後我問李文普，"手令"是誰寫的？

李文普說，可能是林彪寫的。我說，有人會寫嗎？李文普說，沒人寫。我不相信，那怎麼會有多少個"林彪手令"？這就有假！[34]

為什麼那麼多人都有疑問，因為不止一個人能模仿林彪的字，這在林彪辦公室不是秘密。"文革"中，不止林豆豆一人，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上看到過模仿的林彪字跡。

因為葉群"鼓勵"秘書們模仿林彪的字。

張雲生回憶："文革"開始，一向有病退居二線的林彪活躍起來，需要他"批字"和表態的文件多了起來。用紅色油筆，批上同意，完全同意，送主席閱，呈主席，簽上名。頭幾個月，都由他親自批，後來怕出汗，就由工作人員代勞了。葉群首先選中了我，說首長經常拿筆寫字，是個負擔，他怕涼怕出汗。總拿筆，就會著涼出汗。你作為秘書，能不能幫助首長減輕一下這類負擔？你學學首長的筆體，今後首長批文件，就不用他親自動手，也就不用擔心他出汗了。我說那怎麼行？首長的親筆批件將存入中央檔案館永久保存，我模仿首長的字，檔案中就會有真有假，真假難分，不就亂了嗎？葉群板起臉，這個你不用擔心，我跟首長說過，首長也同意。一切責任不用你來負，你怕什麼？再說你模仿首長的字，也不用多，只模仿"呈主席閱"那幾個字就夠用了。你試試看！我不敢不"試"，但我想，這成什麼了？我一旦模仿像了，最終不會是林彪讓我代勞，而是你葉群利用我。真那樣，我就成了罪人，我決不幹。但是我又不能明說不幹，只能想個"軟"辦法進行抵制。葉群走後，我和其他幾位秘書說了，大家也

都認爲這是葉群的詭計，決不可能是林彪的授意，必須堅決頂住。最好辦法是不硬抗，而是假裝學。我裝模作樣開始練習，葉群來看，說不可能一下子就模仿像，你要堅持練，模仿多了，也就像了。就那麼幾個字，模仿也不難。過了兩天，葉群又來查看，大家都說，仿的不像首長字體，還是“張體”。葉群看了那幾張紙，也笑了，確實不像，那就算了。

葉群又“纏住”保密員李根清。小李是入伍幾年的戰士，“文革”前被選作林彪內勤，河南人，出身貧苦，中專文化，練得一筆好字，性格內向，樸實，不善言談，但工作勤快、刻苦，做什麼都腳踏實地。年紀不大，但作風老成，所以秘書們喜歡稱他“老根”。“林辦”的文件，本來有機要秘書負責，但文件來往量過大，許多傳閱件需要登記，秘書一個人忙不過來，葉群就叫李根清當助手。對“老根”來說，葉群不管交代什麼都是“聖旨”，叫他模仿，他就認眞模仿起來，沒幾天，就模仿“成功”了。葉群拿著小李模仿的“林字”到秘書辦公室，興沖沖地叫秘書看，確實模仿得像極了，以後首長不用怕寫字出汗，我也不犯愁了。我對“老根”說，你模仿首長的字，代替首長批文件，這裏的是非太大，你應當對主任說，這樣做不合適。你不敢提，我幫你去向主任提。于運深也說，算我一份，我和張秘書的看法一樣，這樣幹不合適。

我和于運深一起向葉群進言，讓李根清模仿不合適，理由仍是我提的那條，這會造成檔案的混亂，眞假難辨，後果嚴重。我們心裏都在想，這說不準是葉群搗鬼。她讓一個年輕人模仿，藉口是怕林彪出汗，實際上是想有朝一日當林彪不能被她擺佈時，她要搞點鬼名堂。當然這話沒有說出來，但葉群卻想到了，臉色立刻變了。你們以爲這是我當家，是我叫你們替首長代勞，我可沒有那麼大的膽子！什麼後果嚴重，這個責任我可擔當不起。我告訴你們，這是首長同意的！你們不信，隨我去見見首長，看他是不是這樣說的？葉群不容分說，拉著我和于運深就去找林彪“對證”。到了門口，葉群示意我們在門外停下，她到會客廳，只聽見葉群大聲問，101，因爲怕你寫字出汗，我讓李根清模仿你的筆跡，替你批幾個字，這是不是你同意的？林彪的聲音，是——我同意的——，怎麼了？葉群走出來，把我們拉回走廊，小聲說，怎麼樣？你們聽見了吧？首長說是他同意的。一切由他負責，又有我作證，你們還怕什麼？今後，根清就放心去幹吧！當然，他學會了首長的字體，可不能隨便濫用，不經我同意可不行。

我們回到辦公室，對李根清說，首長同意你模仿他的字體批文件，你不能不辦。我建議你搞個登記本，什麼內容，誰講給首長的，誰交代你替首長“批字”的，你都要一一登記清楚。另外，你把今天主任帶我們見首長的過程，整理成文貼在那個登記本上。這樣，以後如果遇到什麼麻煩，就有據可查，你就能說得清楚了。不然，這將是一本糊塗賬。李根清問，做這樣的登記，是不是報告一下主任？你好糊塗！主任知道你留下文字根據，那還了得？！從此，李根清一直背著葉群登記，九一三事件發生時，他的登記本已經寫得滿滿的。後來中央專案組清理毛家灣的文件時，發現了這個登記

本，讚揚了李根清的這一舉動。

有一次葉群叫李根清模仿，說首長休息了，他身體不太好，我想不讓他過度勞累，就由你代筆。批什麼呢？向無產階級革命家江青同志學習、致敬！評價這麼高？主席批了，首長表態也要明朗，這不會有問題，出了事我頂著。李根清說：這幾個字，我也沒練過呀。你先試試，我看行不行。不多一會兒，葉群回來了：你們看，李根清模仿首長的字，像極了。

林辦秘書達成共識，不能輕易模仿，但是擋得住嗎？

九一三事件發生時李根清不在北戴河，但還有好幾個人能模仿林彪的字。葉群自己就率先練過，林立果也不甘示弱，主任學，他也學。林立果練過好長時間，周宇馳、于新野也練過[35]。關光烈回憶：林彪寫字有特點，快，一般人寫不了，只有他才有這種風格。[36]

熟悉林彪字跡的人中，有好幾個人認爲“手令”不像林彪寫的，林彪的字更“草”一些，倒像是林立果模仿的，比較生澀。

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說：老虎模仿首長的筆跡，我們都很擔心。這個“手令”，葉群也不一定知道。林立果另搞一套，對葉群也很戒備。[37]

林立果曾說：九屆二中全會雙方陣容都亮了相，陳（伯達）是鬥爭的英雄，吳（法憲）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間脫節，三是沒有一個好的參謀長。這些老總們（黃吳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時不學習，到時胸無成竹，沒有一個通

盤，指揮軍事戰役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說明了這一點，今後政治鬥爭不能依靠他們領導，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裏。

9 月 10 日上午，王飛給黃永勝送去葉群的密封件，說林立果讓我送給你的。裏面是一個小小的方盒子，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以後收審在亞療，紀登奎告訴王飛，那個大信袋裏就是一個電動刮胡刀。大戰臨頭，爲什麼不送“彈藥”？看來這是一個試探，試圖在王飛和黃永勝之間建立某種關係。否則，葉群天天與黃永勝通電話，直接送不就得了，爲什麼非要拐個彎？因爲這之後還有一封林彪給黃永勝的“親筆”紙條，信中說永勝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可與王飛同志面洽。敬禮，林彪。[38]

法庭認爲黃永勝收到了這封信，黃永勝在法庭上否認，王飛也不承認看過。兩個當事人都不承認，而這封信卻是從周宇馳那裏繳獲的。這難道還不奇怪嗎？林彪給黃永勝的信，讓王飛轉交。王飛和黃永勝都沒見過，而信卻在毫不相干的周宇馳身上。[39]

而且內容更可笑，就算總參謀長有什麼事與空軍的副參謀長聯繫，還要林彪牽線搭橋？林彪怎麼可能寫這樣的信？這說明什麼？這封信是不是也是林立果僞造的呢？難怪這封信沒有日期，什麼時候交給黃永勝，什麼時候再塡上日期。看來很可能是想在 9 月 13 日早上，把黃永勝騙到西郊機場，再給他出示。如果黃永勝還不“聽話”，就動武。

這是不是也能爲“林彪手令”作個注腳呢？

註釋：

[1] [3] [5] 參見《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説》，載《中華兒女》1999 年第 2 期

[2] 採訪林彪司機初成瑞筆記，2000 年 7 月 10 日

[4] 參見張雲生《打開歷史迷宮的一把鑰匙——淺談林彪的病及其對中國當代史的影響》，載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香港明鏡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544-545 頁

[6] [7] [11] [37] 採訪林豆豆筆記，1998 年 3 月 26 日

[8] 參見人民衛生出版社《精神病學》

[9] [10]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201 頁

[12] [16] 採訪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筆記，1998 年 4 月 2 日

[13] 著名的"文革"史專家，曾任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正師職教員。江蘇省揚州市人，1932 年 3 月生，1949 年 4 月參軍，1960 年大學本科函授畢業。1979 年以來開始研究與教學"文化大革命"，最早把"文革"作爲一門科學，在國内外有廣泛的影響。

[14] 採訪中將蘇靜筆記，1996 年 11 月 24 日

[15] 參見張寧《自己寫自己》，作家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第一版，226、234 頁

[17] 據李文普回憶，除了毛主席、周總理的電話親自接，一般不接其他人的電話。

[18] [19] 採訪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大隊長姜作壽筆記，1997 年 10 月 20 日

[20] 採訪中央警衛局局長張耀祠筆記，2003 年 2 月 18 日

[21] 亞洲療養院，九一三事件後成爲關押與九一三有關人員的地方

[22] [24] [30] [35] 採訪林辦秘書于運深筆記，2005 年 10 月 25 日

[23] 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1995 年 12 月第一版，143 頁

[25] 採訪空軍作戰部長魯珉筆記，2000 年 8 月 18 日、採訪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筆記，1998 年 4 月 2 日

[26] 採訪總政保衛部處長焦志華筆記，2003 年 10 月 5 日

[27] [34] [36] 採訪林辦秘書關光烈筆記，2000 年 9 月 9 日

[28] 採訪中國駐蒙古大使館二秘孫一先筆記，2000 年 8 月 17 日

[29] 採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 年 11 月 16 日；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

[31] 採訪張清林筆記，1998 年 2 月 20 日

[32] [38] 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一版，287 頁

[33] 採訪空軍副參謀長胡萍筆記，2000 年 9 月 7 日

[39]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 1982 年第一版，158 頁

第十五章
瘋狂的策劃

江騰蛟在法庭上的交代

9 月 8 日晚上，林立果秘密回到北京，江騰蛟在機場迎接。

23 點 30 分，林立果、周宇馳、江騰蛟、李偉信等集合在西郊機場“秘密據點”。

在法庭上，審判員高斌問江騰蛟：1971 年 9 月 8 日，你在什麼地方見到過林立果？

在西郊機場，當時還有周宇馳、李偉信。

林立果給你看“林彪手令”沒有？

看了。

法庭宣讀李偉信的證詞：1971 年 9 月 8 日 23 點多，周宇馳來電話要我順道先接江騰蛟到西郊機場，然後立即去空

軍學院的“秘密據點”。我聽見林立果大聲動員，……俗話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現在是用我們的時候了。本來想多抓點部隊，但已經來不及了。你們要全力以赴，一個頂幾個或十幾個用，要堅決服從命令聽指揮。大家紛紛表態，堅決服從命令。林立果說，現在他們正在做黃永勝的工作，攻下了黃永勝，就要搞首長（林彪）。政治局開會，如果要攤牌，黃李邱（沒提吳）首先會開槍，斃了他們。我們總的代號叫“五七一工程”，準備在國慶日前解決問題。江騰蛟是前敵總指揮，王飛和劉世英、魯珉、賀德全把空軍司令部的工作抓起來，劉沛豐、程洪珍負責聯絡，李偉信負責生活。現在就是靠少壯派起家，搞成了論功行賞，王飛是空軍司令，劉世英可以當副司令，李偉信當外貿部長，其他人都要重用。有叛變的，斃了他！他媽的，成敗在此一舉。程洪珍說，勝者王，敗者寇。林立果叫道，敗了也不是寇，搞成了一切都好，失敗了就打遊擊，堅決幹到底！現在形勢很緊張，直接對著首長（林彪），火藥味已經很濃了。我們要誓死捍衛。所以要搞“五七一”，現在首長委託我來處理這件事。林立果還對江騰蛟說，現在請你當東南總指揮，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騰蛟表示，一定堅決按首長和你的指示辦。林立果走到另一間房間，看見有一個靈芝草，就拿去送給江騰蛟，並要他好好保重身體。當時在場的還有周宇馳、劉沛豐、劉世英、程洪珍。[1]

林立果從口袋裏掏出“林彪手令”，劉世英第一個看，劉沛豐第二個看，傳給程洪珍，程洪珍看時李偉信湊上去。江

騰蛟已經看過一遍“林彪手令”，又看了一遍。傳閱完，林立果把“林彪手令”交給李偉信，讓他放到一個大信封裏，妥善保管。

1980 年 11 月 26 日 15 點至 16 點 30 分，特別法庭審問江騰蛟。審判員高斌問：你看了“林彪手令”後怎麼表態的？

江騰蛟說：我講了三句話，爲了正義、爲革命，堅決幹！

林立果給你指定什麼指揮員的名稱沒有？他讓我到上海作第一線指揮。

指揮幹什麼？

指揮謀害毛主席的行動。

審判員任成宏問：1971 年 9 月 7 日下午，周宇馳到過你家嗎？

到過。

他到你家幹什麼？

到我家送顧同舟傳來的毛主席在長沙同廣州軍區領導人談話的記錄。我看完，懷疑是眞的嗎？可靠嗎？周宇馳說還有更厲害的沒傳達呢。周宇馳談了三件事，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謀害毛主席的陰謀計劃，第三件是誰到上海指揮這個陰謀活動。

審判員高斌問：周宇馳怎麼說的？

江騰蛟說：看起來他們要動手了，如果他們這些人上了台，我們就完了，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如先下手爲強。要不，很快開九屆三中全會，開四屆人大，首長就要被架空，說不定被搞垮台。就算首長能過關，黃吳李邱搞下去了，我們再

組織力量也就困難多了。周宇馳說現在一組（毛澤東）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回北京過國慶，現在情況緊急，過了這村就沒有這個店了。一組在杭州已經住了幾天，機不可失，今後很難遇到這樣的機會。一組 9 月 25 日前不會回來，經過上海時就可以動手。我們不動手，將來別人上了台，我們這些人都完蛋，首先殺你江騰蛟。

審判員任成宏問：他叫誰幹？

他當時沒講叫誰幹。我就說你要助手，就叫王維國幹吧，周宇馳講王維國不行，太粗糙。意思就是叫我去，我說那好那好，那只有我去吧。

要你去幹什麼？就是去指揮那個謀殺活動，謀殺毛澤東主席那個活動。

陰謀活動針對誰？

對著毛澤東主席。周宇馳說，江政委能親自去，首長就放心了。事不宜遲，要去就快去，南方現在正是最好的時候。

審判員問：你和周宇馳是 9 月 7 日就商量了要謀害毛澤東主席，是不是事實？

是事實。

林立果沒有說林彪是怎麼向他交代的？沒有說這個嗎？

沒有。

那麼周宇馳這個時候給你說要謀害毛主席，你就贊成嗎？

因爲我當時站在反動立場上，我就同意嘛。

你到上海去是你自告奮勇去的，還是林立果指定你去的？

周宇馳不是講王維國不行嘛，王維國太粗糙，我講我自己去嘍。

那就是說要到上海去謀害毛主席，是你自覺的，主動提出來的，是不是？

那就是。[2]

你先後幾次參加密謀殺害毛主席、策劃武裝政變的陰謀活動？

從9月7日到11日晚，7日一次嘛，8日晚上一次嘛，9日一次嘛，10日同于新野單獨個別活動了一次嘛，11日下午一次嘛，11日晚上一次。

一共有幾次？

一共六次。

看來，9月7日周宇馳在江騰蛟家中，最先談到了謀殺毛澤東。但是現在林立果、周宇馳已死，只有江騰蛟一個人活著，他的話是眞實的嗎？但是法庭經過調查，認定四次無疑。爲什麼江騰蛟要多說兩次，是爲了將來要翻案嗎？[3]

從林立果的角度來說，他不可能聽周宇馳的，卻有可能聽江騰蛟的，畢竟江騰蛟和他父親是一輩的人啊。但在江騰蛟的敘述中，他是完全被動的。[4]這就是說，周宇馳與林立果商量好了。但實際情況呢？有沒有可能是江騰蛟首先提出的暗殺呢？從後面的集體討論中，明知不可能，爲什麼作爲老紅軍的江騰蛟卻那麼積極，積極得有些反常。

9月8日晚，林立果決定在上海動手，講了三條辦法：第一條是用火焰噴射器、40火箭筒打專列。第二條是用100高射炮平射，因爲專列停靠附近有一個高炮連，用電力可以操縱。同時叫上海教導隊以搶救爲名往上衝，趁亂下手。實在不行，第三條要王維國趁接見時帶上手槍在車上動手。江騰蛟說他聽得直出冷汗，認爲這三條都不行。第一空軍沒有火焰噴射器，就是有，我們也不會用。第二誰敢下令打毛澤東的專列？要教導隊去打火車，他們也不一定幹。林立果說：那個“頭”不是給你當過秘書嗎？要他們幹這種事，就不一定聽，還會把下命令的人捆起來。林立果說：火焰噴射器我給你調，戰士不幹可以騙他們說車上有人搞陰謀，要害毛主席，叫他們去救。江騰蛟說向主席專列調高射炮，一動就會被發現。再說專列是防彈玻璃，步槍、機槍子彈都打不進去。車上警衛只要抵抗半小時，附近的部隊就會趕來。第三條要王維國動手，這件事也沒跟王維國說，部隊是他的，具體事情還是要靠他做，部隊不一定聽我指揮。他願意不願意還不知道。即使他願意，槍要是帶不上去又怎麼辦？專列上可能有儀器，一照就照出來了。

三條全推翻了，一時誰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周宇馳問：這三條都用上，能有多大把握？江騰蛟說：可能有六七分。打仗有七分把握就幹，可這和打仗不一樣，必須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林立果說：你再想想更好的辦法，你是第一線指揮員，聽你的。周宇馳又問：杭州到上海有沒有鐵路橋？不行就搞“皇姑屯”。1928年6月日軍暗殺東北

大帥張作霖，就是在皇姑屯炸毀了火車。

江騰蛟說：橋倒是有幾座，都有陸軍把守。

又是一陣沉默，林立果說：如果陳勵耘有膽量，在嘉興車站動手最好。一直出出進進倒水的李偉信（還兼放哨）插話，在杭州幹好，讓陳勵耘幹。幾個人像撈到了“救命稻草”，興奮起來。這個辦法好，把陳勵耘的家屬孩子都弄走，保護起來，解除他的後顧之憂，向他說明厲害，逼著他幹。誰去說服陳勵耘？周宇馳說：江政委帶于新野去。江騰蛟說：還是讓于新野一個人去吧。林立果說： 等明天他從杭州回來，看看是什麼情況再說。

林立果在屋子裏團團轉，周宇馳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突然周宇馳跳起來：機場附近不是有油庫嗎？油庫能不能爆炸？江騰蛟說：油庫是有，但能不能爆炸，我不懂，燒著總可以吧？虹橋機場曾發生過一次油庫燃燒事件。周宇馳說：我們可以把油庫燒著，然後帶著部隊去救火，趁亂把“一組”搶走。他要江騰蛟把油庫和專列的位置畫下來。江騰蛟一邊畫一邊說：這是個好辦法。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車附近，連人帶車都報銷了。畫好交給周宇馳，周宇馳給了林立果。林立果也高興起來：這是個好辦法。周宇馳說：明天我找人瞭解一下，油庫能不能爆炸。主席在杭州已經住了幾天，要快一點，他一走就錯過機會了。

這時江騰蛟潑了一盆涼水，汪東興不會讓任何人接近專列，上海小組的人也不一定幹。專列進入機場後，附近油庫的警衛全換幹部擔任，一般人接近有困難。而且專列掛兩個

車頭，可進可退，油庫燒著了，專列馬上會開走。[5]

研究半天，想了一大堆辦法，都覺得不行，三個人全耷拉了腦袋。過了好一陣，周宇馳看表，已經淩晨 1 點了，說今天先到這裏算了，明天找王飛再研究。好吧，林立果說，先談到這裏，以後再研究。首長說了，誰完成這個任務，誰就是開國元勳。這個事可千萬不能漏出去，漏出去你們都完了，我的腦袋也沒有了。周宇馳說：要特別注意防叛徒。林立果說：誰叛變，就殺他全家。最後約好 9 月 9 日 22 點，到空軍學院“秘密據點”開會。

9 月 9 日，林立果總動員

9 月 9 日下午，林立果、江騰蛟、周宇馳再次集中在西郊機場的“工字房”。

經過一夜考慮，還是炸油庫或炸鐵路橋，主要就是研究這兩條。

周宇馳還在想如何炸鐵路橋，他問從上海到杭州之間有沒有鐵路橋，如果有，炸毀鐵路的辦法最好。江騰蛟說：要炸鐵路，碩放那一段比較合適，這個地方靠近我們的機場，鐵路邊又無其他部隊。周宇馳曾打電話給陳伯羽（廣州軍區空軍管理處長），讓他經過長沙時瞭解一下毛澤東的活動情況，要詳細。陳伯羽到長沙後住進湖南賓館，通過熟人打聽到毛澤東在長沙上下車的地點、住處、安全保衛情況和談話內容。周宇馳對專列的保衛很感興趣，問有沒有掃雷車？陳

伯羽搞不清楚，就胡說沒有。主席的車到長沙前是什麼車壓路？客車，兩列車相距多遠？3個小時。

江騰蛟一反昨天的態度，認爲炸油庫的方式可行。如果專列停在虹橋機場，就炸附近的油庫。同時他認爲炸鐵路橋也可以，碩放那一段比較好，靠近我們的機場，鐵路上又無其他部隊。[6]

爲什麼江騰蛟第一天潑冷水，第二天又開始"燒熱水"？

林立果這時還拿不定主意。

江騰蛟提出兩條辦法：如果一組（毛澤東）到了上海，就說王維國因病住院了，如果離開上海，就說王維國出院了……周宇馳說：你如果到上海去的話，于新野跟你去。討論過程由李偉信記錄。開始說東南方向搞成了，就說王維國病好轉，暫不來北京。之後說有幾種情況，打成了，打而不成，不打等，用病危、病重等代替。後來又說用無線還是有線聯繫，最後說具體方案還沒定，密語先等一等。江騰蛟說：當時研究，如果上海動手了的話，林立果講過有線電、無線電同時使用。而且講得很具體，無線電發報時，就發王飛轉空軍黨委，以這樣的辦法發，有線電藉故有重要事情，把線路佔住，不讓別人用。[7]

林立果交給王永奎兩個任務：研究一下在無人駕駛飛機裏裝上遙控爆炸裝置，用電腦制導，帶上炸彈，直接引爆。美國陸軍有這種飛機，用來偵察前沿陣地。另一個任務研究一下汽油在什麼條件下著火，怎樣使油庫燃燒爆炸。周宇馳說，導彈的戰鬥部可以用化學的，有一種毒氣，一公斤就能殺傷一大片。林立果不同意用毒氣，認爲毒氣不能進房間，持續時間也不長。他問王永奎，用火焰噴射器燒火車怎麼樣？王永奎說，不如火炮。

林立果說，這兩天討論來討論去，方案提了好幾個，但沒有一樣保險。他轉身問李偉信：能不能進口一個小型原子彈？發射完了開汽車就走。李偉信直搖頭：那怎麼行？要是進口一顆小炸彈，那還差不多。

再議不出什麼結果。

因爲9月8日晚上和9月9日上午始終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所以9月9日晚上林立果請王飛到空軍學院"秘密據點"的二樓會議室繼續策劃。只叫了王飛一個人，還有林立果、周宇馳。李偉信不在現場，在裏面聽電話，但可以聽見外面的動靜。

王飛1969年提升爲空軍副參謀長，他非常謹慎，空軍指揮學院"秘密據點"的樓下有車庫，小車可以直接開進樓裏，而王飛不怕"麻煩"，每次都要在稍遠的地方下車，徒步走過去，他怕別人抄去車號。林立果他們的車老換車牌，他的車牌固定，太顯眼。

這是林立果從北戴河回來第一次與王飛正面"交鋒"。王飛9月6日從唐山出差回來，9月8日晚上林立果回到北京沒有找王飛，而是一頭紮到江騰蛟家，只有下班時周宇馳對王飛簡單講了幾句，說"戰友"要找你談談。所以林立果劈頭就問：聞到"火藥味"了嗎？王飛說：沒有聞到，我"感冒"了，"鼻子"不通氣。周宇馳趕快給王飛看"林彪手令"，還通

報了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說我們逼到這份上，非動手不可。王飛很驚訝，也很緊張。他不知道林立果的"三個方案"，也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剛剛從林立果和周宇馳嘴裏聽到主要的精神。談了十幾分鐘，王飛就匆匆走了。

林立果安排南線指揮是江騰蛟（負責謀害毛澤東），北線指揮是王飛，主要是攻打釣魚台（江張姚）。王飛直往後縮，說打釣魚台有些困難，林立果說南線先把"一組"（毛澤東）抓起來，王飛說這不行，還是先禮後兵好。是不是採取開會的辦法，開會談判幾條，老百姓餓死了，一塊打江山的元帥、大將整死了，劉少奇整死了。"文革"中空軍支持抓聯動，"516"本來是抓走資派，又說"516"是反革命分子，讓他承認，口頭承認也好。第二條，九屆二中全會要談，雙方都讓步。林彪沒法徵求同意了，"三個副詞"，毛澤東堅決反對，乾脆撤掉不提。毛澤東把《我的一點意見》去掉，反革命簡報收回去，口頭答應也好，爭取簽字，這就沒有什麼公開矛盾了。第三條，提出"民富國強"的總路線，這是"九大"以前林彪提出來的，陳伯達在他起草的"九大"報告中的思想，停止"文革"。

周宇馳還是堅持炸鐵路橋。

大約22點，林立果給葉群打了一個電話。

林立果問王飛：你想出什麼好辦法沒有？王飛說：除了開會我沒有什麼好辦法。林立果說：我就不信搞不成，他把手繪的釣魚台地圖拿來，我看就坐上大卡車，從這兩個門同時猛衝進去。槍一響，裏面就亂了套。王飛說："藍褲子"

怎麼衝？即使衝進去，那麼高的牆，很快就會被包圍。進去的人想跑也跑不出來，而且不一定能抓到要抓的人。周宇馳也說：硬衝不行，可以小股隱蔽進入。晚上到門口把哨兵一抓，就進去了。王飛說：那必須情況非常熟悉才行，林立果說：老周對那裏熟，他帶你進去，你準備人。王飛說：問題是部隊不好動員，再說晚上鐵門關著，裏面又有哨兵、遊動哨……林立果不高興地說：總能想出辦法。江騰蛟提議把關光烈叫來，從他那個部隊調火焰噴射連到上海去，再調一些部隊到北京來協助王飛攻打釣魚台。

一直說到9月10日1點多，回去睡覺。[8]

關光烈說，調噴火連不行

9月10日7點58分，劉沛豐帶著北京市地圖和許多文件，飛往北戴河，向葉群彙報。林立果則"逍遙"了一天，11點他睡醒了，一個人開車離開空軍學院，不知道上了哪裏。兩天來，林立果主要是在空軍學院將軍樓和西郊機場"工字房"密謀，究竟要不要馬上下手？怎麼下手？由誰下手？在哪裏下手？密謀了多次，卻遲遲定不下來。

程洪珍問李偉信：現在怎麼樣了？李偉信說：有的說幹，有的說不要幹，究竟怎麼樣？他們正在商量，現在還沒有最後定。有的說在杭州幹好，讓陳勵耘幹，因為他負責杭州警備，他接觸"B-52"的機會多，可以用嫁禍於人的辦法，先把"B-52"害了，再把汪東興、張春橋揪出來，就說他們與

王關戚有關係，害了主席。程洪珍說：等“B-52”下次坐專機時，上去一架殲擊機，一傢夥不就幹下來了。李偉信輕輕搖頭，飛機上還有駕駛員和其他人，那怎麼辦？程洪珍恨恨地說：奶奶，幹好！不幹，出叛徒就麻煩了。想幹也幹不成了。接著程洪珍講起二戰時期德國一批軍官企圖推翻希特勒，搞政變，結果出了叛徒，失敗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程洪珍沒有注意到李偉信的臉白了。

一直到 9 月 10 日下午，還是沒有商量出更好的辦法。林立果、周宇馳、王飛三個人再次密謀。王飛覺得太輕率，非常渺茫，提出一系列的困難。雖然這事很重要，面對這些無法解決的難題，毛澤東的動向又弄不清，搞不好是身家性命的事情。周宇馳也有些猶豫了，他以試探的口氣提出：看來，還要從正反兩方面再考慮考慮，究竟搞不搞？林立果說：現在不搞，還能收得住嗎？王飛趕緊說：沒問題，收得住。因爲情況這時並不緊急，大家又都往後縮，林立果無可奈何地說：那就先不搞吧！我給北戴河打個電話，反正搞不搞還得我這個前線司令來確定，這次就算一次思想拉練吧！不過得絕對保密。[9]

9 月 9 日深夜，周宇馳給關光烈打了個電話，騙他說：首長多時沒有見你了，很想見見你，請你立即來北京一趟。9 月 10 日晚上，關光烈乘 10 次特快列車到北京，住在東交民巷空軍招待所。第二天晚上林立果和周宇馳一起去看關光烈，說張、姚很活躍，他們要動手，我們也要做好準備。

他們把希望寄託在關光烈身上。

周宇弛給關光烈看林彪“手令”（橫的），提出調兩個營攻打釣魚台，調一個噴火連到上海，當然周宇弛沒有說噴火連到上海打誰。

關光烈感到非常突然。

林立果說：火焰噴射器有多大威力？打火車行嗎？關光烈說：只要噴進去火，裏面的人統統會燒死。不過它本身連這個木頭門也打不透。如果火車的門關嚴了，就要先用別的武器把目標打穿，再從洞口往裏噴射。周宇弛說：如果先用 40 火箭筒把車廂打穿，再用火焰噴射器，能行嗎？那必須配合好才行。林立果問：從你們那裏調一個噴火連到上海不行嗎？關光烈說：別說一個連，一個排也不行。個人無權調動部隊，除非軍委下命令。而且調動部隊手續很多，一級一級上報，申請火車皮，由軍運部門調撥，才能坐上火車。[10]

以後專案組向關光烈傳達，毛主席說關光烈是個好人，關鍵時刻沒幹。

林立果傻了眼，冒充軍委下令呢？

呼號頻率不一樣，還要配密語，更不好辦。

看來確實不行了，根據林立果的決定，李偉信立即給江騰蛟打電話，傳達林立果的一句話，先不要展開部署，否則就沒有收的餘地了。

江騰蛟愣了半天，他不明白林立果爲什麼“撤火”了？

9 月 11 日淩晨，林立果從北京給葉群打了“撤火”的電話後，葉群的情緒明顯反常。上午 10 點多，葉群焦慮不安地來回走，一會兒拿起文件，一會兒又放下，拿起筆又放下，

再拿茶杯，好一會兒才發現張寧站在一邊，拉著她就往外走，說看首長去，他老一人悶坐著，你去陪陪他。30 分鐘後葉群滿臉烏雲回來，看樣子是在林彪那裏碰了釘子。後來內勤說：張寧走後，葉群一直在林彪身邊坐著，看內勤端上一碗雜面粥，葉群說烹斑鳩好吃，林彪沒理她，吃了幾口就讓端走。內勤聽到葉群對林彪說去大連的事，說把幾個孩子都帶上。林彪沒有一句應答，坐了一會兒，起身往臥室走。葉群跟著，看著內勤給林彪脫衣躺下。直到入睡，林彪始終沒有說一句話。下午葉群情緒更反常，以往每天下午葉群都要當"學生"，聽文史教員講歷史，馬列教員講哲學，軍事情報官老倪講國際形勢。但她取消了所有的課，要內勤整理去大連的衣物。

林彪的內勤說：林彪那裏一點反常跡象也沒有，葉群多次進進出出，不管葉群說話還是不說話，林彪都沒有反應，甚至後來葉群進去時，林彪連眼睛都不睜開。[11]

葉群下決心，只能"前進"，不能後退。

她的"抽鞭子"電話，把林立果驚起，9 月 11 日又開始緊張密謀。

9 月 11 日下午，秘密偵察釣魚台

9 月 11 日 11 點多，周宇馳給王飛打電話：情況有變化。前天晚上我們研究的不行，通不過，葉主任來電話發火了，你趕快來研究一下。先到空軍學院禮堂前面，我派人來接你。林立果也給王飛來了電話，主任給我們"抽鞭子"，她還要給你打電話，少不了也得"抽"幾下，先給你說一下，好有個思想準備。現在勢在必行，不能再動搖了。王飛還沒放下話筒，葉群的電話就來了：聽說你有很大顧慮，總想抽梯子，怕什麼，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我們是為了革命利益，形勢逼人，不能不這樣搞。王飛說：不是怕，我參加革命的時候還沒有想到會活到快 50 歲，是不好搞。人家隊伍很整齊，搞得很嚴密，搞不好把你們也連累了。[12]

王飛，山東臨淄人，1938 年入青年團，1939 年入黨，歷任青年團長，渤海地區文印科長、山東齊河縣委書記。1950 年，因劉亞樓的器重，由空軍政治部秘書科副科長升任黨委秘書科長，司辦副主任，副參謀長兼司辦主任。王飛精明幹練，善於領會上級意圖，會出點子，寫文件，辦事情，有相當的組織領導能力，深得領導的信任。但膽子特別小，非常謹慎，沒有十分的把握不輕易表態。

葉群連忙"打氣"：有困難想辦法克服嘛，哪有不困難的事？你們想想辦法，還有人幫助你們。江騰蛟那裏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他（毛主席）到了我們的"根據地"了，不要坐失良機，要當機立斷。最後葉群說：我們的一切都托給你們了，趕快研究一下，18 點給我一個回話。

9 月 11 日下午繼續在老地方（西郊機場"工字房"）密謀，除了林立果、江騰蛟、周宇馳、王飛，加了個"綠褲子"關光烈。林立果先向大家介紹關光烈，然後直截了當地對關光烈講了兩個問題：你們那個師的火焰噴射器連調到上海，

交給江騰蛟指揮。再調一個營到北京來，協助王飛率領的警衛營攻打釣魚台。關光烈還是表示不能調動部隊，江騰蛟說：一個噴火連有多少人？幾十個人。把使用武器的人調去，好比幾個人有事出差，這總行吧？林立果興奮了：只要調一部分火焰噴射器，一部分火箭筒，到上海歸江政委指揮。坐火車太慢，坐飛機。關光烈說：我們部隊附近沒有機場，再說……林立果說：你們離鄭州有多遠？先到鄭州，我派飛機接。關光烈還是說不行。王飛也說：這樣恐怕不行，動作太大了，容易暴露。林立果說：那打釣魚台就算了。現在不搞是不行了，昨天講的不算數，等於沒有說。現在要抓緊研究怎麼搞，江政委、王副參謀長都來了，你們講講，有什麼想法。[13]

兩個人都皺著眉頭沒吭聲。

林立果說：還是要搞，主任"抽鞭子"了。老實說，主任一抽鞭子就壞事。她搞拉拉扯扯可以，辦正事不行。廬山會議壞了事，固然吳胖子是個草包，沒有用。要不是她瞎指揮，廬山上那麼多大將，還有陳伯達，還不會輸得那麼慘。搞得首長很被動，簡直把首長氣壞了。這回好了，她在那裏乾著急，整天睡不著覺，又哭又鬧，又要上吊，還在電話裏嘮嘮叨叨，一講沒個完。

聽著林立果罵他媽，一時誰也沒吭聲。

江騰蛟說：幹這種事，光"抽鞭子"不行。王飛說：不是我們不幹，我是說，幹這種事要慎重。幹不成，不光我們完蛋，統統完蛋。客廳裏沉默了，一看氣氛不對，林立果趕快

打氣，這次不一樣，是首長下的決心，首長的決心不會有錯。現在決心已定，就是研究如何執行的問題了。這幾天接連研究了幾次，一直定不下來，我看問題的關鍵是沒有最後決斷的勇氣。這次要下孤注一擲的死決心，不能再拖下去了！周宇馳插話：優柔寡斷要誤大事。林立果一拍沙發把手，大聲說，還是兩邊都要搞，南線先搞，北京接著搞，雙管齊下！接著幾個人研究北京怎麼搞。林立果曾想調大炮打釣魚台，王飛不幹，說釣魚台警衛裏三層外三層，進去連門都找不到。林立果說，我們要搞的人都在釣魚台，好搞。只要順利地把釣魚台拿下來，問題就解決了。確定用空軍司令部警衛營冒充陸軍，讓關光烈調 200 條綠褲子，用大卡車從釣魚台兩個大門同時往裏衝。商定代號後，林立果說：繼續討論謀害毛澤東的方案，還是七嘴八舌，雖然又想出一些新辦法，但還是都沒把握。

林立果又不高興了，說現在不研究了，等會兒再說。別太緊張了，趁天還沒黑，出去散散心，領你們逛逛玉淵潭公園。

王飛心裏明白，什麼逛公園，那是到釣魚台看地形去了。[14]

1958 年夏季，周恩來提議修建一座有中國特色的高級國賓館。幾經選址，選在了與玉淵潭一牆之隔的釣魚台，"文化大革命"中這裏成了中央文革的駐地。

林立果說：門這裏可以安一挺機槍，王飛沒有表態。因爲沒說什麼時間幹，主要看南線打響，最後不了了之。

快 18 點，看完地形回來，想不出新招，反而覺得更困難了。

王飛讓林立果向葉群彙報，林立果讓王飛彙報，說怕葉群在電話裏說起來沒完。王飛想推，劉沛豐已經把電話要通，王飛只好接過來：葉主任，立果同志要我向你彙報一下，今天下午，立果同志同周宇馳、江騰蛟和我一起研究了一下釣魚台的問題，又領我們幾個到釣魚台周圍看了一下……不知是誰漏了一句，關光烈也來了。葉群質問：什麼？關光烈？誰叫你們找關光烈？你們爲什麼要找他？這說明，葉群根本不知道，只是在江騰蛟的點撥下，林立果"靈機一動"。

法庭宣讀王飛 1972 年 1 月 4 日的供詞：1971 年 9 月 11 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馳找江騰蛟和我以及關光烈，進一步策劃攻打釣魚台。林立果說林彪決心已定……提出就在上海搞，如果主席住在機場，就用 40 火箭筒配合火焰噴射器幹，住在市裏就叫幾個人用手槍幹，不出車站就在車站裏幹。江騰蛟同意在機場和市裏兩個方案，並說一炸，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北京這邊，林立果提出，讓空司警衛營乘卡車衝釣魚台，我認爲不行，卡車的威力有限，不一定順利。林立果和周宇馳又提出用坦克衝，周宇馳和于新野 7、8 月在北京附近的某坦克部隊學過開坦克。還提出用火箭炮轟，用轟炸機炸，都不行，目標太大。只要與釣魚台警衛一交火，裏面要抓的人（江、張、姚）聽到消息，就會從地道裏跑掉。林立果提出接待外賓時在機場動手，也不行，有國際影響。最後我提出，要林彪召集會議，在會上搞。林立果不同意，說不到萬不得已，不能由首長出面。周宇馳在一邊幫腔，由首長出面，即使搞成了，政治上損失太大，不合算。

王飛始終堅持用開會的辦法，但林立果始終沒有同意。

這裏有一個疑問：林立果不讓林彪出面的理由似乎很充足，但從另一個方面是不是也說明，他們只是打著林彪的旗號。

研究半天，沒有一個可行的辦法。沉默很久，林立果說：這樣吧，實在沒辦法，釣魚台留給黃永勝他們去搞，只好讓他"摘桃子"了。周宇馳也同意，北線我們可以不管了，集中力量研究南線。江騰蛟認爲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炸油庫。如果上海搞不成，就在碩放炸火車，讓魯珉去執行，晚上把魯部長找來研究。[15]

這時林立果還沒有緊張，王飛回去吃飯，晚上沒事。

9 月 11 日晚，魯珉被拉下"水"

9 月 8 日，正在部隊檢查工作的魯珉接到于新野的電話，要他立即坐飛機回北京，票買好了。魯珉以爲是開四屆人大，因爲那時開會保密，魯珉是四屆人大代表。廬山會議後中央一連串會議，華北會議、作戰部長會議……最緊張的"批陳整風"會過去，總算鬆了一口氣。8 月魯珉提出想下去跑跑，這麼多年了，他還沒有去過西北、西南，光在沿海和東北一帶轉，這次檢查作戰會議貫徹情況，是個機會。林立果說，現在形勢緩和了，你可以下去跑一跑。

9 月 9 日，還沒跑完的魯珉就被叫了回來。他到機關見到副參謀長王飛，問爲什麼這麼急？出了什麼事？王飛說：現在空氣比較緊張。9 月 10 日午睡後江騰蛟叫魯珉去他家，在院子裏邊走邊談（怕房子裏有竊聽）。說馬上要開四屆人大了，之前恐怕要開中央全會，可能要整到副統帥頭上了。到那時你站在誰一邊？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喲。魯珉本來對江青印象就不好，加上江青指揮一幫人在京西賓館“揪”葉群和吳法憲，毛主席已經批了過關，他們還抓住不放，沒完沒了。魯珉想《黨章》都定了接班人，江青還有這份野心？太過分了！就說我當然站在林副主席一邊。江騰蛟說：可是這次不一樣了，這次毛主席直接支持他們。魯珉說：那我也站在林副主席一邊，反正不投江青的票。後來魯珉才感覺這話說壞了，如果說站在毛、林一邊，可能就不會有後邊的事了。但他想大不了就是回家種地，還能有什麼，沒想到事情遠不止此。

林立果繞了個彎，通過江騰蛟摸到了魯珉的底。

9 月 11 日 20 點左右，江騰蛟來找魯珉，說林立果有事找他。江騰蛟陪魯珉到了西郊機場“工字房”，林立果、周宇馳，加上江騰蛟、魯珉一共四個人。于新野和李偉信一會兒進來一趟，遞水遞蘋果遞毛巾，熱情得不得了。屋裏很熱，都穿著襯衣，明顯看出他們腰上都別著“傢伙”。

我們的英雄來啦，林立果一見面就說：現在要進攻啦，魯珉莫名其妙（後來被關在亞療聽紀登奎說才知道）。要拼個魚死網破，林立果說他咽不下這口氣，別人不敢反，我就反！林立果說副統帥下了命令，老周，你把首長的“手令”拿給魯部長看看！周宇馳拿出白紙紅字，魯珉只見過牆上的林彪題詞“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手令”到底是誰寫的哪裏知道。魯珉急急忙忙看了一眼，甚至沒注意“手令”上的日期。

林立果談起毛澤東南巡，現在情況很緊張，馬上要開三中全會，再開四屆人大，會一開林副主席就不佔優勢了。副統帥下了命令，要主動進攻，要把“B-52”搞掉……江政委你這個“殲 7”在上海打頭陣，爭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魯部長那個地方的第二次攻擊了。再不成，讓陳勵耘派強擊機轟炸。林立果說以檢查爲名，到那裏去，藉口有些壞人坐著主席的火車到處搞陰謀活動，對碩放就這麼講。江騰蛟插了一句：如果這樣講的話，李世英（碩放 15 師師長）眞可能幹。到那個地方去主要是炸鐵路橋，碩放有的是炸藥，往鐵路上一擺，就是第二個皇姑屯事件……。

這回魯珉聽明白了，腦袋“嗡”一下炸了。不光突然，覺得是對自己很大的侮辱。瞎了眼了！怎麼能讓我搞暗殺呢？把我當成什麼人了？我怎麼能去幹這種事？絕對不幹！

這時沒有一個人說話。大約靜了十幾分鐘，江騰蛟還是逼魯珉表態。

魯珉氣憤得不得了，但又不敢發作，他們人多，拼不過他們。只得說不行，我當兵後一直在空軍幹，空戰次數不少（魯珉是抗美援朝的空軍特級英雄，打下過多架敵機），但沒在陸軍幹過，從來沒弄過炸藥，炸藥什麼樣我都沒見過，如何能響，我也不知道，我幹不了。林立果說：那就派個懂

行的一起去，賀德全幹過陸軍，帶他去。

魯珉覺得江騰蛟事先肯定知道，添油加醋，勸魯珉幹，說跟著毛，沒有好下場。魯珉還是不說話，愣在那裏。這件事不好收場，你說不幹，你已經知道了他們的秘密，如果走漏了風聲，他們不會饒過你，怎麼辦？魯珉換了個角度，說不行，鐵路上保衛工作很嚴密，主席的列車出來，沿途都要派警衛，根本沒辦法接近，送不上去炸藥。林立果說：那就換上工人衣服進去，把鐵路上的工人幹掉。魯珉還是說不行，就算你進去了，炸藥怎麼點燃？你怎麼計算得準爆炸時間？林立果也覺得不行，轉而商量派飛機炸，還是逼魯珉表態。魯珉推脫說：殲擊機根本不行，轟炸機才行。他知道杭州那裏根本就沒有轟炸機。

看魯珉退縮，林立果就講“B-52”怎麼壞，如果你完成這個任務以後，意思是你要升官了。江騰蛟插了一句：那你就不是空軍的作戰部長了。林立果說：到那個時候，北京軍區的政委不是你江騰蛟，我還不放心哪。江騰蛟說：我當政委，老魯當司令。魯珉想，你糊弄誰呢？作戰部長當司令，我又不是三歲孩子。

正沒有辦法收場，于新野衝了進來，說上海電話，林立果出去接，此後再沒回來。後來魯珉才知道，上海（王維國）電話說“一組”今天在上海呆了一天，已經離開上海了。

9 月 11 日下午和晚上，林立果在空軍學院連續開會，會上吵得很厲害，大多數人的怯懦使林立果很失望。他插著腰，邊走邊罵人。聽到毛澤東離開上海了，跳起來，當著李偉信、于新野的面，大罵王維國、陳勵耘是草包、窩囊廢，把首長交辦的事辦壞了。都是廢物，都是叛徒，我們被出賣了，首長被出賣了！

林立果發了頓脾氣，下命令進入一等戰備，就走了。

一會兒周宇馳進來，說情況有變化，到此為止，剛才講的全部作廢，就當沒有講過。你們回去什麼也不能說，這話要傳出去，不但我們要被殺頭，老婆孩子都要被殺頭。他挨個通知任務解除，要嚴守秘密，消滅痕跡，誰暴露機密，按叛徒處理……

魯珉回到家已近 9 月 12 日的零點，他情緒很壞，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在那種時候，他不敢公開反抗，最好把自己的胳膊腿打斷，再讓我幹，我不能動了。魯珉愛人武杠橋是空司門診部的軍醫，說胳膊腿打斷了怎麼辦？把眼睛弄紅，不就行了嗎？就用鹽水為他揉眼睛，魯珉的眼睛馬上紅起來，也看不清東西了。天一亮要了個車就住進了空軍總醫院。聽說魯部長眼睛壞了，一會兒周宇馳來電話，一會兒于新野來電話，一次兩次地問，他們也不放心，怕他去報告，把他監視起來了。[16]

那個時候，毛澤東的威望達到頂峰。要暗殺，又不能讓“殺手”瞭解內情，這是無法解脫的矛盾。辦法想了一大堆，事到臨頭，誰也不敢幹，所以計劃遲遲定不下來。但林立果並不是很著急，因為毛澤東回北京還有一段時間呢。按葉群的說法，“一組”跑了一路，一定很疲勞，可能在杭州休息一段時間，國慶日前才會回北京。沒想到毛澤東突然離開上

海，頓時大驚失色。江騰蛟問：“老頭”在上海停了沒有？周宇馳氣惱地說，現在問這個還有什麼用？摔了話筒。1980年審判“兩案”時，專門問過江騰蛟，林立果是怎麼知道毛澤東離開上海的？ 江騰蛟說：9 月 11 日晚上接到的電話。是什麼人？從什麼地方打的？林立果沒有說。

9 月 12 日早，王維國派兒子到北京報告

9 月 11 日夜，到底是誰給林立果打的電話？是王維國。

毛澤東中午離開上海，王維國和王洪文、許世友等一起吃飯，肯定知道。那爲什麼夜裏才打電話？原來王維國吃完中飯就去了辦公室，一直到 17 點多忙完工作才回家。因爲太疲勞就睡了，到 22 點多，睡醒後給周宇馳打了一個電話，告訴他主席從上海過去了。[17]

王維國在午飯時，下午到辦公室，晚上回到家，都可以給北京打電話，爲什麼非要睡一覺才打？只能說明王維國被蒙在鼓裏，既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的暗殺計劃，更不知道林立果想讓他當殺手。如果知道，如果他願意幹，專列中午一走，他就應該立即報告，不可能一拖再拖，拖到夜裏。

王維國陪剛到上海的許世友，想隨後上專列，汪東興把王維國擋住了，你去休息吧。許世友的秘書注意到，王維國像被“定身”了一樣，愣了好幾秒，才轉身往外走。在休息室，王維國坐到沙發上長歎一聲。看來許世友得到了毛澤東的“眞傳”，他離開上海與衆人握手，握一次說一句“三要三不

要”。握到王維國，提高嗓門說了一句“不要搞陰謀詭計”！事後秘書問他：是不是有意點題？許世友說：毛主席說這個人（王維國）不好，對他說的是另外一些話（緩兵之計）。[18]

王大璋（王維國的兒子）回憶：9 月 12 日 7 點，父親把正在復旦大學物理系讀書的我叫起來，讓我到北京去一趟。拿本子記一下，用幾個字表示就可以了。關於廬山批評的問題。我不解，什麼廬山批評？你不要問了，對林立果、周宇馳一講，他們就知道了。可能三中全會上要重提一下。總理來了個電報給主席，馬上要開三中全會，接著開四屆人大。三中全會開成擴大的，每個軍都要有代表參加。主席講，看來他們一是有點害怕，二是有點硬幹，沒有認眞的檢討。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檢討一下就可以了，跟陳伯達不一樣。因爲主席說，陳伯達就不讓他檢討了。告訴他們早點向主席檢討，這樣好些，你一說他們就知道。[19]

看，多麼和風細雨！既然毛澤東已經認爲王維國“不好”，當然不能驚動他，電話總比火車快，一旦北京“行動”，而毛澤東還在上海，那可就插翅也來不及了。王大璋後來說：爲什麼父親讓我到北京，因爲于新野說，主席到上海，可能有些指示，要父親早點跟他們打個招呼。既然已經答應于新野，總要有個交代，讓他們有點思想準備。他沒想到後來出那樣的事，當然王維國更想不到毛澤東說的“有點硬幹”是什麼意思。

9 月 12 日 15 點，王大璋到首都機場，李偉信開了一輛

嘎斯 69 來接他。一個小時後，到了西郊機場“工字房”，只有于新野在裏邊，正在下麵條。16 點 30 分，汽車響，林立果和周宇馳回來了。王大璋和林立果大約談了半個小時，被于新野送到東交民巷空軍招待所。[20]

現在公開的材料都是說林立果得知毛澤東離開上海，就下決心南逃了。這個情況對不對呢？林立果是 9 月 11 日 22 點接到王維國的電話，已經得知毛澤東離開了上海，爲什麼不連夜策劃，非要等到 9 月 12 日下午才展開第二方案？看來，林立果下決心南逃廣州，是因爲 9 月 12 日下午得到了毛澤東回到北京的密報。

1980 年 11 月 27 日下午，江騰蛟在法庭上交代：9 月 12 日下午策劃飛廣州可能是周宇馳召集的，參加人有周宇馳、王飛，于新野，李偉信，另有兩個人在裏面收拾房子，我不認識。在什麼地點？在空軍學院後面一個小樓（將軍樓）上。周宇馳在會上講林彪在什麼時間，怎麼去廣州？我到樓上，他們已經到齊了，王飛他們都在場（林立果已經走了）。我一坐下，周宇馳就宣佈，現在情況緊張，剛才從上海得到消息，“B-52”在上海說，這幾年我犯了個錯誤，過去軍隊被“彭黃”抓去了，現在被“林黃”抓去了。看樣子，“B-52”回到北京，就要召開三中全會，就要對我們動手了。首長決定，現在轉入第二方案，立即轉移到廣州去，要軍委辦事組黃吳李邱明天都到廣州，形成南北朝的局勢。[21]

9 月 12 日下午，啓動第二方案

9 月 12 日 17 點多，林立果突然打電話叫王飛到空軍學院。

18 點多，王飛到了將軍樓。

這時林立果緊張了，說毛澤東回來了，他要馬上回北戴河，向首長彙報一下。南線不行（這時也不說釣魚台了），叫王飛拉個名單，準備飛廣州。還說江騰蛟有更重要的工作，與上海和廣州聯繫，所以在空軍司令部研究到廣州的名單時江騰蛟沒去。[22]

陳倫和走進來，林立果對他說：我走了，明天你和周宇馳走，一定要走！不走的話，人家要殺掉你！陳倫和嚇了一跳，林立果說：最近有人要搞鬼，反對首長。我坐飛機先走，到（廣州）沙堤去，你們第二批走，聽周宇馳的安排。你們家屬也一起走，今天晚上就領到這裏來等著。你們要帶上槍，家屬也要帶槍。看著陳倫和表情緊張，林立果趕快說，明天飛機上有林副主席。又惡狠狠地補了一句，八三四一部隊操蛋就跟他幹！飛機上左派一定要佔多數。臨出門林立果說，我們要搞一個中國的（印尼）九三 O 事件，把他們的政變陰謀掐死。1965 年 9 月，印尼政變，十幾個將官被殺，只有兩個沒抓到，從地道跑了。

這時林立果又想起一件事，把許秀緒、李偉信和他的弟弟李偉軍叫到面前，交代他們到毛家灣去取三樣東西，“菲力浦”盒式播放機，“德律風”立體聲擴音機，還有三個喇叭

的音箱。因爲林彪很喜歡聽音樂，林立果曾讓程洪珍擦洗過一大批舊唱片，說是要給首長聽。最後林立果說：到廣州後，叫李偉信到香港去，然後繞道日本到蘇聯，叫蘇聯從北極星潛艇上發射導彈，叫他們嘗嘗"山姆大叔"的滋味。林立果做了個鬼臉，說反正是從公海發射，也弄不清是誰幹的。然後他看看表：老周，飛機都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你今天晚上到北戴河坐三叉戟去。好，林立果打斷周宇馳的話：情況緊急，兩個小時後我就到北戴河去。北京由老周總指揮，他看了衆人一眼，具體部署由老周跟你們談吧。說完，就走進裏屋收拾行裝去了。

幾天前，林立果和周宇馳就在考慮往廣州跑了。

9月8日晚上，劉沛豐對顧同舟妻子張亞青就說了去廣州。劉沛豐說有幾句話，請你回去告訴參謀長。不要記，感謝送來的東西，同意你的看法。要保重身體，注意安全，抓好部隊，注意觀察一周內的情況。劉沛豐重複了兩遍，然後說：我們很想來廣州，什麼時候來？還說不好。同時周宇馳在電話裏對顧同舟說：最近幾天，我們可能來廣州，飛機可能在沙堤機場降落。要給你講的事，都給你夫人講了，請她回去轉告。

張亞青怕忘記，等劉沛豐走後，追記在本子上。她本想在北京多呆幾天，看看熟人，畢竟來一趟北京不容易。劉沛豐不同意，當晚就把她送上回廣州的飛機。顧同舟認眞聽了兩遍，注意觀察一周內的情況？估計要發生重大事情，可又搞不清，他決定讓陳伯羽到北京探聽探聽。本來周宇馳計劃

9月6日駕"雲雀"到長沙，顧同舟叫陳伯羽陪同。陳伯羽到長沙等了一天多，9月7日接到顧同舟的電話，說周宇馳不來了。9月8日陳伯羽回到廣州，顧同舟讓他馬上乘16次特快到北京。

9月11日上午，程洪珍把陳伯羽接到西郊機場。眞沒想到這個"特使"太及時了，就在陳伯羽到北京的第二天下午，林立果決定到廣州。在西郊機場"工字房"的客廳裏，不斷有人出出進進，周宇馳、劉沛豐和陳伯羽談話。一會兒是周宇馳，一會兒是劉沛豐，陳伯羽已經搞不清哪句話是哪個人說的了。大意是：你們廣州形勢很好，現在北京形勢很緊張，有人要陷害首長。首長、主任、副部長、黃總長、吳、李、邱副總長，還有空軍一些人，決定最近一兩天去廣州，還要把上海一些人拉到廣州去。回去告訴你們參謀長，做好我們到廣州的準備。主要是保證我們飛機安全落下來。因爲飛機較多，正在研究批次和航線，完了就報給你們。請你們參謀長親自到指揮所，掌握航行預報時間。要掌握電報和指揮系統，凡是對我們不利的電報和命令，都扣下來，保證首長的安全。你要把白雲山的房子準備好，告訴米加農，準備賓館……陳伯羽馬上飛回廣州，向顧同舟報告。

9月12日17點多，顧同舟要求指揮所明天安排他値班。本來不該他値班的，指揮所的紀參謀很奇怪，顧同舟到司令部兩年多，從未主動要求過値班，有時輪到他，還藉故推託，這次爲什麼主動要求値班？本來都通知李副司令値班了，說參謀長非要値，只好再告訴李副司令不値了。19點

多，顧同舟打電話告訴周宇馳，說明天他到指揮所值班。又交代陳伯羽，明天上白雲山準備房子，要控制一下汽車，安排好警衛。

林立果匆匆走後，周宇馳召集開會，說到了廣州，提出條件和北京談判，但估計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同時要立即召開師以上幹部參加的緊急會議，進行動員，宣佈另立中央。如果要動武，就聯合蘇聯，南北夾擊。江騰蛟和王飛兩個人一直不說話，周宇馳又說：現在時間很緊，你們兩位馬上回空軍大院，把機關裏的左派骨幹集中在一起開一個會，把人員編編組，你們的任務就是保證黃吳李邱安全上飛機，飛機直飛廣州沙堤機場著陸，我已經通知顧同舟那裏安排好車輛和房子。王副參謀長、于新野負責組織人員保護黃吳李邱南逃，江政委負責警衛，保證他們安全到達廣州。看他們兩個還發愣，周宇馳有些發火：現在都什麼時候了，叫做燃眉之急嘛，咱們總不能在這兒等著送死吧！你們先通知家屬，讓他們馬上坐火車先到廣州去，以去掉後顧之憂。

周宇馳按了一下電鈴，對進來的于新野說：你讓李偉信給上海方面打個電話，通知他們明早有一架伊爾-18 從北京飛到上海，讓他們把飛機上的八三四一部隊的人全部接下來，換上教導隊和"上海小組"的人，然後直飛廣州沙堤機場。通知王維國到機場，如果他願意走，就隨機走，如果不願走，也可以留在上海。明天（13 日）早上 8 點，首長從北戴河直飛廣州沙堤機場，就坐林副部長回山海關的這架飛機。一部分工作人員包括你們的家屬，明天早上 7 點從西郊機場起飛，直飛廣州沙堤。王副參謀長、江政委、于新野，明天早晨 6 點以前到西郊機場"工字房"，由王副參謀長打電話給黃吳李邱（這時就看到讓王飛轉給黃永勝的林彪信的用處了）。

王飛說：我通知不行，還是你通知吧。

周宇馳說：那好辦，我通知。可以先通知黃總長，說是林彪在某地要開一個會議，他到機場後，再要他通知另外三人。要保證他們安全上飛機，如果不行，就要通長途電話，由林副主席直接同他們談。如個別人不願去，要兩個人"招呼"一個，一塊從西郊機場起飛，到廣州沙堤機場。[23]

審判"兩案"時，副庭長黃玉昆問：你們開會除周宇馳說以外，你們還說了些什麼？江騰蛟說：周宇馳安排了四架飛機，第四架是叫李偉信把上海那一攤子拉到廣州。第三架飛機要王飛、于新野、我帶著黃吳李邱從西郊機場飛廣州沙堤機場。周宇馳對我說，飛機上的警衛你管行不行？我說好嘛，我就是"警衛營長"，指揮人看住他們。但是不准我出面，由王飛出面跟幾位老總攤牌，攤"什麼"他没有說。周宇馳還說，你們的飛機如果到了，林副主席的飛機没到沙堤之前，你們不要先下飛機，等他到了以後你們再下飛機。這架飛機明天早 7 點最遲 8 點起飛。聽明白了嗎？另外李偉信去上海，負責把上海那裏的人都拉走，具體安排這裏就不講了。

周宇馳宣佈：這是命令，大家要堅決執行。現在時間很緊，要抓緊。機關哪些人去廣州，如魯珉、賀德全、劉世英、朱鐵錚（辦公室處長）等都没有問題，還有什麼人，今晚由

王副參謀長、于新野把名單定下來，找他們開個會。你們先去準備，我隨後就來。散時于新野說：去的人都要帶手槍。周宇馳補了一句：還要帶些衝鋒槍，直接給軍務部打個電話，讓他們馬上準備20支手槍和3支衝鋒槍，多準備點子彈。周宇馳讓于新野到空軍大院協助王飛組織人員。江騰蛟交代：最後，周宇馳對我和王飛說，勝敗在此一搏，開始行動吧。

審判員問：林彪到廣州以後，準備幹什麼？

江騰蛟說：等林彪到廣州之後，首先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把問題揭開。接著講還可以利用廣州的電台廣播，說全國老百姓對林彪的聲音是很熟悉的。講到爭取外援的問題嗎？那是最後講的，中間有一段講成立臨時中央，必要的時候還可以爭取外援，林彪在蘇聯還是有他的威望的。

江騰蛟對另立中央沒有表態。他對王飛說：你們去研究名單吧，我不去了。他直接回了家，第一件事告訴家屬，現在情況很緊張，林立果的意思要我們暫時出去，離開北京，到外面一段時間，你可以準備一點東西，準備一點孩子穿的衣服。因爲周宇馳講不准多帶家屬，還告訴他上海的兩個孩子帶不帶由王維國決定，不准他打電話。第二個事是考慮帶誰走，秘書張發雲，還是朱鐵笙，也沒有定，江騰蛟思想上是準備帶張發雲的。但他沒挑明，找張發雲、朱鐵笙來了以後，說今天晚上葉群準備見我的孩子，想要你們兩位也參加一下，時間、地點等候通知。要他們當時住在我家裏（實際上是想帶秘書往廣州跑）。一輛汽車坐不下怎麼辦，秘書說

可以再從司令部汽車隊要一輛車。江騰蛟說算了，就一輛車跑兩次吧。這個講完了以後，于新野來電話，說現在一切活動都停止，消滅一切痕跡……所以，南逃這個事情，江騰蛟始終沒正面和秘書張發雲、朱鐵笙講，也沒正面和他老婆講。[24]

9月12日夜，南逃廣州的會議夭折

王飛也沒顧上吃晚飯，直奔空軍司令部。司令部辦公室人來人往，副司令員鄺任農出差了，他的辦公室在西三樓南側最西頭，很安靜。王飛決定在鄺副司令的辦公室開會。21點多，賀德全、劉世英、朱鐵錚、鄭興和（軍務處副處長）等陸續到了，只有魯珉沒來。王飛說：時間很緊，不等了，先開會。主席的身體現在很不好，有人企圖借機搗鬼，要把林副主席、黃總長等人打成"林黃"反黨集團，所以林副主席有命令，要黃吳李邱出去一下。明天在廣州召集他們談話，還要召集師以上幹部的緊急會議。黃吳李邱要有人護送，光我們幾個人不夠，要從機關各單位選一些人，擬個名單。明天早晨7點到8點起飛，我們的任務是保證他們安全到達廣州。

法庭傳劉世英出庭作證，劉世英說：開始由我負責記錄並抄寫……我們剛剛提出一份名單，于新野就到了會（有監視的意思，因爲王飛老往後縮），他看了一下名單馬上就說，這是去廣州的第一批人員，要精幹，說接著還要組織第二批

人員去廣州，並且帶家屬去。他特別強調，第一批人員除了空司的人員以外，還要把江騰蛟和隨他一塊去的張發雲、朱鐵笙也寫到第一批名單裏去……以後于新野把我負責記錄並抄寫的一份名單拿去，他在一個地方特別寫了一個"江"字，而在另一個地方特別增加了"江家"兩個字。"江"和"江家"都是直接通知江騰蛟的備忘錄……法庭出示南逃人員名單的影印件，這個名單是你寫的吧？劉世英說，這個名單是我寫的，除我寫的以外，都是于新野增加的。周宇馳帶一部分工作人員和家屬，包括我的，于新野的，劉世英的，魯珉的，包括這幾個人。

經過研究，確定了 25 人的名單。分工編組，指定賀德全負責到機場後的現場指揮，魯珉負責掌握飛機的航向，朱鐵錚負責瞭解機關去的人的思想情況，鄭興和安排車輛，還確定了通知辦法和車輛安排，集合地點等。研究了如何處置黃吳李邱的司機、秘書和警衛的問題。到機場後，不讓司機下汽車，秘書和警衛帶到不同的地方，並確定分別負責給這些人"做工作"。著重研究了對付警衛員的辦法，先下他們的槍，再"動員"上飛機。王飛強調，無論遇到什麼情況，在機場不能開槍。于新野掏出一把匕首，交給負責警衛的賀德全。會議中間，王飛叫鄭興和到倉庫取 59 式手槍 30 支，子彈 2000 發。衝鋒槍 2 支，子彈 200 發。爲行動隱蔽，除特殊情況，坐一輛大轎車去，由王琢駕駛。

這時正在住院的魯珉來了。9 月 12 日晚上魯珉回到家，21 點多接到電話，說王副參謀長讓你到辦公室來一趟，有

個中央文件要傳達。魯珉怕被殺人滅口，帶上手槍叫愛人武杠橋跟他一起去，在辦公樓外邊等著，聽見槍響，他不出來，就趕快去報告。那時魯珉相當緊張，他知道早晚林立果要滅掉他，也下了決心，只要他們要殺他，他也掏槍幹。魯珉上去一看，王飛、劉世英、于新野、賀德全、朱鐵錚、鄭興和都在，卻不見林立果。

魯珉問：有什麼重要文件？這時名單已經弄好了，王飛給他看。作戰部除了他，還有兩個人，還有傅英豪夫婦等(好多人並不知道自己上了名單)。王飛把魯珉拉到一邊的大沙發上，說副統帥決定黃吳李邱都到廣州去，讓我們組織一個班子保證他們安全到達廣州。副統帥也去，造成南北對峙的局面，劃江割據，以後再創造條件談判。這話林立果 9 月 11 日也講過，如果不行就去廣州，那裏的電台就是人民廣播電台。到了那裏，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我們都能佔一半。

魯珉一聽又來"這個"，但不敢發作，只好悶著。王飛掏出手槍，說你有沒有這個，魯珉說我有。王飛說每個人都裝備手槍，讓他們到西郊機場，飛機都準備好了。去的辦法由葉群通知黃永勝到西郊機場，再由黃永勝通知吳李邱。黃永勝不走怎麼辦？不走也得走。魯珉不想跟著他們南逃，找個藉口跑到樓下，對愛人說：你先回去，不管哪兒的電話讓走，都不要走，就在家。魯珉再上樓，這時情況發生了變化。[25]

23 點，部署第二天南飛廣州的會議快結束時，周宇馳突然來電話，電話在外屋，于新野接的。周宇馳說總理查問飛機了，北戴河來電話，說暴露了，不搞了，任務取消。剛

才講的全作廢，就當今天什麼也沒有講過，各自回家，趕緊把名單毀掉。賀德全要燒，王飛說，別燒，到處是灰，撕碎從馬桶沖下去[26]。慌亂中卻忘了于新野那裏還有一份名單。因爲名單全憑腦子想，想一個寫一個，太亂，于新野又抄了一份，放在口袋裏，最後被繳獲。

半夜，周宇馳妻子王聖蘭（空司門診部主任）打電話給江騰蛟，說吳司令員的張秘書問周宇馳這幾天白天晚上都在哪裏（吳法憲不敢問林立果，但只要問到了周宇馳，也就知道了林立果的行蹤），我說不知道，我這樣回答行不行？江騰蛟說可以。放下電話，江騰蛟懷疑起來，吳法憲爲什麼突然查問周宇馳？周宇馳老婆爲什麼又來通報情況？是不是暗示不要暴露周宇馳的行蹤？江騰蛟想問問周宇馳到底怎麼回事，往西郊機場"工字房"要了好幾次電話，始終沒人接。家裏沒有，"秘密據點"也沒有，周宇馳究竟到哪裏去了？實在沒辦法，江騰蛟通過總機找到王飛。王飛壓低聲音急急地說：我在指揮所！我在指揮所！我在指揮所！連講了三遍，意思是說話不方便，不讓他講話。江騰蛟徹底迷惑了，又打電話問正在醫院住院的魯珉：今天是王飛值班嗎？不是。那他怎麼在指揮所？魯珉說他也不知道。這時江騰蛟更加懷疑，究竟出了什麼事情？但他再不敢亂打電話，提心吊膽窩了一夜[27]。其實魯珉知道一些情況，只是此時魯珉已經恨死了江騰蛟。要不是江騰蛟出主意，讓他去炸毛澤東的專列，他怎麼會被捲進這個大陰謀中呢？

13 日零點，魯珉剛回到醫院，接到值班參謀的電話，

二五六號三叉戟從北戴河起飛，向北京方向飛來了。過一會兒又報告，飛機沒有在北京降落，向西北方向飛去，剛剛飛出國境，誰坐在裏面還不知道。李德生已經奉總理命令來到指揮所，參謀問魯珉來不來。魯珉心說壞了，無事不登三寶殿，肯定中央發現了。他回答不去了，讓郝副部長去。因爲平時魯珉不去指揮所，指揮所由作戰部副部長在那裏當所長，輪流值班。魯珉心想這事鬧大了，他以爲就是林立果作孽，沒想到林彪會跑。9 月 13 日下午參謀又報告：周宇馳、于新野、李偉信坐一架直升機在空中飛了很久，最後迫降在懷柔附近，飛行員一個負傷一個打死。周宇馳、于新野自殺，這時魯珉斷定林立果跑了。但不知道林彪也跑了，他決定儘快向中央報告。[28]

魯珉自述他是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主動向李德生報告的，但他沒有得到軍事法庭的寬大，被認爲是在已知林彪機毀人亡後才不得不自首的。江騰蛟呢，由律師替他辯護，說他態度好，而且是在不知道林彪機毀人亡的情況下投案自首的，希望法庭在量刑時考慮。

林立果從電話裏要周宇馳北上

9 月 12 日傍晚，周宇馳送走王飛他們，離開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到了西郊機場"工字房"，安排好第二天去廣州的飛機，並與已經到了北戴河的林立果聯繫。23 點左右，他得知周恩來派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封了飛機，趕緊給林立

果打電話。稍後葉群也接到周恩來查問三叉戟的電話。林立果和周宇馳在電話裏把兩邊的情況一湊，知道大事不好。周宇馳放下電話就離開“工字房”，開車回到空軍大院的家中。所以胡萍派人第二次再找他，沒有找到。之前，周宇馳告訴妻子王聖蘭，明早 7 點 30 分到西郊機場坐飛機去廣州。林立果照顧我，讓我帶家屬走，你趕快收拾東西，帶上隨身的衣服，和孩子準備跟我走。王聖蘭正在收拾東西，周宇馳回來了。這時林立果來電話。葉群和林立果決定按第三個方案，到蘇聯去。臨去機場前，給周宇馳打了個電話。

王聖蘭回憶：周宇馳在家接電話都關著門，本來是聽不見的，但因爲天熱，窗戶開著，加上線路不好，他聲音很大，因此從窗戶那裏飄來一些聲音。所以她聽見周宇馳大聲問，上哪兒？上哪兒？哦，北上？北上啊！[29]

在北戴河的李文普聽到林立果打電話，說首長馬上就走，你們越快越好！不知道李文普聽沒聽到林立果說“北上”，既然能聽到“首長馬上就走，你們越快越好”，“北上”也應該能聽到。但“北上”這兩個字很含糊，也可以讓人理解爲去大連，可能是事先有過約定，周宇馳明白了。

這時于新野開車直奔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

空軍學院“秘密據點”前，停著一輛卡車，李偉信、王永奎、許秀緒、王琢正在把器材往車上裝，準備 13 日早上 5 點以前運到西郊機場，再空運到廣州。23 點多，快要裝車完畢，李偉信接到電話，說這個點暴露了，飛機不能起飛了，你們立即轉移到二高專，在那裏待命。李偉信、王永奎、許秀緒、王琢、陳倫和不知如何是好，王永奎提出：這麼多人不安全。需要分散一下，有幾個去二高專“秘密據點”。 于新野表示同意，說李偉信和他留下，其餘的人王永奎、許秀緒、陳倫和、王琢和陳倫和的對象小鬱、小魯（魯珉女兒）一起到二高專去。李偉信對王永奎說：你們到二高專後打個電話，把那裏的電話告訴我。如果天亮時還沒有給你們打電話，就是出事了，你們就自己行動吧。許秀緒摸摸口袋，說我沒帶錢。李偉信掏出 20 元給他，看看王琢、小鬱、小魯，又給他們一人 20 元。王永奎帶著裝上車的大批器材，走了。只剩李偉信一人在小樓裏收拾殘局。

不久，于新野來了，于新野喘了半天粗氣，才說明天去廣州的計劃可能暴露了，那就沒有飛機了，快，快找周宇馳。于新野連打了幾個電話，都沒有找到周宇馳。

此時周宇馳已經匆匆安排好“後事”，幾千元存款早取出來了。說他暫時要離開北京，開車把母親、弟弟和兒子送上去渭南老家的火車，然後把王聖蘭送回空軍大院家中。到樓門口，他沒下車就急急走了，臨走扔下一句話，王聖蘭也沒聽清楚，猜是不用等他。周宇馳的方向非常明確，就是“北上”。因爲他知道有禁飛令，不可能調大飛機了，而直升機飛不了那麼遠，所以他的目標定在烏蘭巴托。[30]

除周宇馳知道方向是蘇聯，在北京的同夥都不知道。

凌晨 1 點多，于新野正著急，周宇馳自己闖來了，臉色陰得嚇人，急急地說：明天去廣州的計劃不行了，肯定沒有飛機了。周宇馳喘著粗氣說，立果他們爭取北上，叫我們也

儘量多組織一些人走。咱們只能用直升機北上了。他看了一下淩亂的房間，許秀緒他們呢？于新野說，他們剛走，到二高專待命去了。周宇馳說，來不及叫他們一起走了，我們坐直升機走。

李偉信試探地說：這麼遠，直升機能跑得出去嗎？于新野也猶豫，就是跑成了，老婆孩子怎麼辦？周宇馳安排了“後事”，而李偉信和于新野都沒有。兩個人“統一”了思想，把周宇馳請上樓來，要周宇馳再考慮考慮。周宇馳過了一會兒，才垂頭喪氣地說：不走就要坐牢，坐牢的滋味就好受呀？接著一陣沉默。于新野鼓起勇氣說：不要走，先等等，看看情況……，周宇馳打斷：那可不行，錯過機會，要走就走不成了。平時忠於、忠於的，關鍵時刻不聽指揮可不行。于新野說：那先和北戴河聯繫一下。周宇馳厲聲說：不用了，你立即到西郊機場把陳士印接來，我在這裏給他打個電話，叫他在門口馬路上等你。

1 點 40 多分，他們帶上內裝 3 萬多美元和許多機密文件的手提包，上了車[31]。這時王永奎從二高專打來電話，周宇馳粗暴地說：沒事別來電話，就扔了話筒。

到廣州的六個人也被抓了回來

9 月 13 日清晨，陳倫和被天上的馬達聲驚醒，見一架直升機在飛。不是說飛機都讓中央給停了嗎？怎麼又有直升機在飛？

他告訴了王永奎。

到天亮，還沒有電話，他們估計林立果他們已經去了廣州。

王永奎決定到廣州去找林立果，通過情報部搞來通行證和火車票。

9 月 13 日 17 點，由王琢開中吉普到北京火車站，六個人上了開往廣州的 15 次特快列車。上車前，王永奎打電話叫妻子于秀芬把孩子送回東北老家後也去廣州找他。

九一三事件後，空軍機關馬上被陸軍接管，機關人員都被告知了四條紀律。

一、要按時上下班，不准外出。外出要請假，經過批准。二、上班時，只許在自己的辦公室裏呆著，不准到別的辦公室串門。三下班回到家中，也不准串門。四、不准打聽消息。自己知道的，也不准向別人傳播。

出差者回來第一件事是到機關聽這四條紀律，然後才能回家。

機關騰出一批辦公室做隔離室。

陸續地，在小灶吃飯的機關幹部越來越少，提飯盒打飯的戰士越來越多。[32]

但是，逃到廣州的那幾個人還一直沒有消息。

9 月 15 日早上 7 點，王永奎等人到達廣州，跑到沙堤撲了個空，根本沒聽說北京有人要來。幾個人沮喪地又開車回廣州。陳伯羽不在，顧同舟情緒沉悶，也沒摸到確切消息。好不容易找到陳伯羽，陳伯羽壓低聲音說：前一兩天中央發

了兩個命令，第一個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簽發的，第二個是主席和總理簽發的，主要講戰備。空軍指揮所原來是吳法憲、曹里懷負責，現在是李德生負責。還有國內一切飛機停飛三天了，今天又有飛機飛，大軍區叫廣空聽他指揮。

這是怎麼回事？王永奎決定，今天先住下，本來想住廣空二所。聽說廣空司令部要扣他們，就住到了外面。

9 月 15 日，廣州軍區空軍向大軍區報告，從北京的空軍司令部跑來幾個人。大軍區命令堅決扣留。13 點下了通緝令，20 點 35 分，周恩來命令，必須把北京去的幾個人找到。

9 月 16 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保衛組向全省公安系統發出了通緝令。

許秀緒、陳倫和家在上海，提出回上海。於是他們向熟人借了 300 元錢和糧票，冒充到上海學習的技術人員，帶著空白介紹信和假證明，改道去了上海。

9 月 17 日淩晨，他們從廣州北的小站源潭上車時被抓獲。[33]

至此，參與九一三事件的主要人員被一網打盡。

註釋：

[1] [2] [5] [6] [7] [15] [17] [21] [24] [27]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 1982 年第一版，121-131、139-148 頁

[3] [4] 蕭思科《超級審判——圖門將軍參與審理林彪反革命集團案親歷記》下冊，濟南出版社 1992 年 11 月第一版，383、384 頁

[8] [9] [12] [14] [22] [23] [26] 採訪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筆記，1998 年 4 月 2 日

[10] [13] 採訪林彪秘書關光烈筆記，2000 年 9 月 9 日

[11] 參見張寧《自己寫自己》，作家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第一版，228-231 頁

[16] [25] [28] 採訪空軍作戰部長魯珉筆記，2000 年 8 月 18 日

[18] 參見李文卿著《近看許世友 1967-198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第一版，212-213 頁

[19] 採訪王維國兒子王大璋筆記，1998 年 2 月 17 日

[20] 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一版，296-299 頁

[29] [30] 採訪周宇馳妻子王聖蘭筆記，2003 年 12 月

[31] 參見大鷹《九一三事件始末記》，載《林彪事件眞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88 年 9 月第一版，149-150 頁

[32] 官偉勳著《我所知道的葉群》，中國文學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第一版，19-20 頁

[33] 參見于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干歷史問題的考察》，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第一版，183 頁

第三部

人民大會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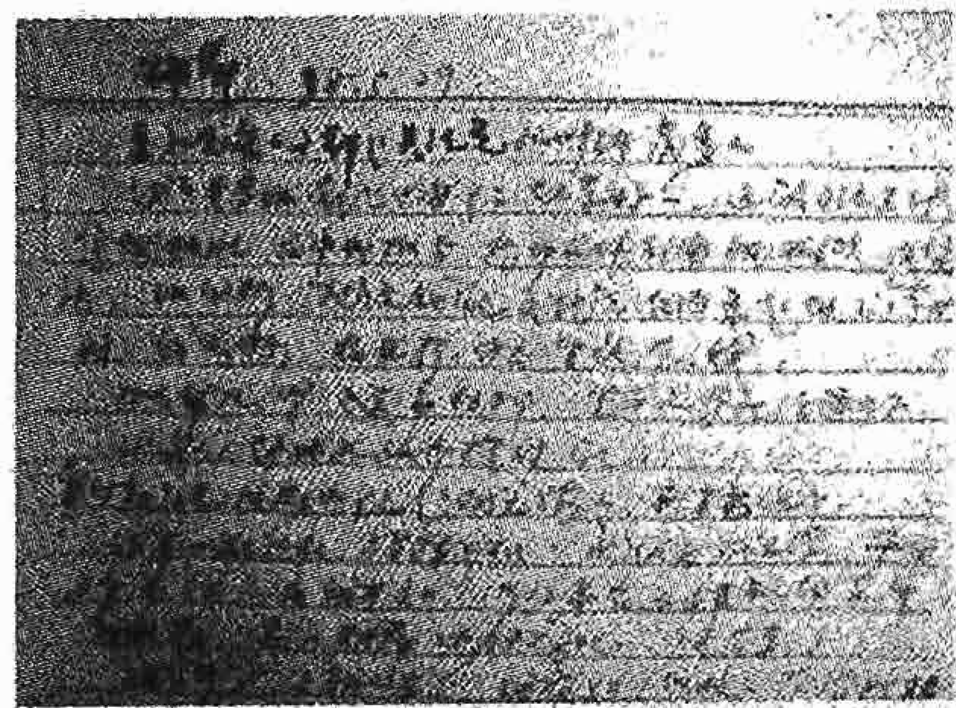
1971年9月13日零點32分，二五六號三叉戟從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周恩來接到報告後，命令李德生前往空軍指揮所，同時周恩來發佈禁空令：關閉全國所有的機場，飛機停飛，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周恩來的承諾通過無線電一遍遍"喊"向夜空，希望林彪飛回來，不論落在北京東郊機場還是西郊機場，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1] 但二五六號三叉戟"頭"也不回，"安靜"地越過中蒙邊境414號界樁，很快從中國雷達的"視線"中消失。在蒙古境內飛行30分鐘後，墜毀在溫都爾汗，機上人員全部死亡。

震驚中外的中共黨史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就這樣發生了！





孫祥凝的娘家。



這是我採訪胡萍筆記。

舒雲攝影



總參謀長黃永勝在九大會上發言。

林彪家人提供，攝於1969年4月



吳法憲（左一）與伊朗王國公主法蒂瑪·巴列維公主在天安門城樓上看焰火。

林彪家人提供



邱會作（中）、紀登奎（右）與馬里共和國貴賓在天安門城樓上看焰火。

林彪家人提供



李作鵬（右一）在天安門城樓上。

林彪家人提供



第十六章
全國"禁空令"

人民大會堂成了軍委指揮部

1971年9月12日，一個平平常常的夜晚。

邱會作回憶：從9月8日起，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大多在爲中共九屆三中全會忙碌。通知9月14日到京西賓館報到，9月15日九屆三中全會正式開幕。[2] 還通知國慶日後召開四屆人大。

高振普（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回憶：和往常一樣，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喝了一杯加雞蛋的豆漿，帶上厚厚的文件包，去了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議20點開始，參加會議的人員是部分政治局委員和有關的部長，內容是討論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從9月6日起，周恩來一直在忙這個事。9月10日又一次對《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修改後，他給

毛澤東寫信：報告已寫出初稿，擬從 9 月 11 日起，由政治局確定幾名成員，以 10 天時間改好送審。[3]

22 點 40 分[4] 秘書突然進來，請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接電話。周恩來壓低聲音問：一定要我去？秘書點點頭。本來福建廳有電話，但電話沒有加密，周恩來明白事情緊急，站起身，做了一個表示歉意的手勢，走出門，討論停了下來。

因爲這個神秘的電話，午夜時分，天安門廣場上彩排國慶遊行的高音喇叭戛然中止，準備國慶遊行的群衆隊伍也提前解散了。

張耀祠在電話裏對周總理說：21 點 20 分，張宏（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從北戴河打來電話，林彪女兒林豆豆來部隊報告，明天早上 6 點，葉群和林立果將"挾持"林彪出逃，先去廣州，再去香港，今晚 20 點已調來了林彪專機。[5]

汪東興的回憶不同：張耀祠是到我的辦公室報告我，我馬上打電話給周總理。周總理有些意外，什麼？葉群、林立果要帶林彪逃跑？是不是又鬧什麼矛盾了？因爲周恩來深知林家矛盾重重。情況可靠嗎？

汪東興說：可靠。

周恩來問：他們要去什麼地方？部隊同志怎麼看？

還弄不清是眞是假。

請告訴張宏同志，派人密切注意動向，及時報告，不要魯莽行動。[6]

事後想，如果溫都爾汗的荒草不是那麼高，或像關内草還綠著，也就不會燃起那麼大的火。這樣，即使飛機爆炸，

有人也可能會活下來。假設林彪活著，那會怎麼樣？孫一先認爲：蘇聯把中國内情瞭解透徹後，就會像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樣，下令壓在中國邊境的百萬大軍大舉入侵，護送林彪回到北京，這並非不可能。

當時的中國確實作了預防蘇軍入侵的軍事部署。

周恩來問張耀祠在什麼地方（實際上是問毛主席在什麼地方，因爲張耀祠專門負責對毛澤東的警衛），張耀祠回答：在中南海游泳池。[7]

費四金（黃永勝的警衛參謀）回憶：他隨黃永勝到了人民大會堂。首長在裏面開會，他在外面大廳坐著，看見周總理兩次出來接保密電話。第二次出來大約夜裏零點多，之後周總理和警衛員走了，事後知道是到毛主席那裏去了。[8]

周恩來叫汪東興打電話給張宏，叫他查一查，是不是北戴河有一架專機。如果有什麼新情況，立即報告。同時周恩來與吳法憲、李作鵬通電話，確實有一架專機，剛飛到北戴河，機組人員正在休息。汪東興也馬上報告過來，周恩來緊張了，叫汪東興不要離開電話機，隨時掌握北戴河方面的情況。

這時，周恩來決定馬上坐車到中南海游泳池，到毛澤東那裏。汪東興叫張耀祠也去，毛澤東屋裏沒有電話，讓他到那裏接聽電話。周恩來向穿著寬大睡衣的毛澤東報告完，建議主席轉移到人民大會堂 118 廳（這是毛澤東召開會議、會見外賓和休息的老地方）。

可是，按照汪東興的回憶，三叉戟起飛時，周恩來在人

民大會堂，而他在中南海的南樓[9]。汪東興回憶：我立即打電話給周總理，說毛主席還不知道這件事，我們在主席那裏碰頭，我叫張耀祠同我一起去。我們和周總理幾乎同時到，正彙報時，吳法憲從西郊機場打電話來，說林彪專機起飛 30 多分鐘了，即將從張家口一帶進入內蒙古。……淩晨 3 點多，我們還在毛主席住地，空軍司令部又打來電話，沙河機場起飛了一架直升機。[10]

張耀祠回憶：二五六號三叉戟還沒有起飛，主席就到了人民大會堂 118 廳。[11]

汪東興是很細心的人，每天的行蹤他都要記日記。他爲什麼要推遲毛澤東緊急轉移到人民大會堂的時間？會不會是張耀祠搞錯了呢？

可是，還有兩個人證明張耀祠的時間是對的。

周福明（毛澤東的理髮師）回憶：9 月 12 日晚上，南巡剛回來的主席吃過飯就睡下了。往常總理來之前都要事先通知，這次匆忙闖來，又神態嚴肅，我憑著多年在主席身邊工作的經驗預感到出了大事。總理對我說，快把主席叫起來，有事向他彙報，林彪要逃跑了。我非常震驚，我知道主席在此以前點過林彪，林彪有些問題，可誰能想到他會逃跑呢？總理進主席臥室彙報去了。不一會兒，總理就出來了，對我們幾個工作人員說，林彪要逃跑了，其他情況目前還不清楚。爲了主席的安全，必須馬上轉移。屋裏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我迅速收拾所需要的東西。汪東興告訴我，在保證主席需要的情況下，輕裝上陣，做好打仗的準備。[12]

吳連登（毛澤東的管理員）回憶：我們剛剛給主席開過飯，不一會兒，汪東興來了，周總理也來了，張耀祠也來了。張耀祠嚴肅地說，趕快準備出發。這才剛剛到家嘛，怎麼又出發？因爲太反常了，我問了一句，沒有回答。我又問，張主任，要帶多少東西？要花多少錢？張耀祠火了，你個吳連登，這個時候你還考慮什麼錢？叫你走就走！我不敢再問，趕快準備東西，叫上廚師上車。車子拉著我們走了沒多遠，我一看到了人民大會堂。[13]

周福明回憶：總理也隨即來到大會堂北邊的江蘇廳，過來向我們工作人員交代，不要出去，不要同外界聯繫，外面的一切情況由總理負責。並具體交代主席的文件一律先給他，由他親自轉交給主席。[14] 就是說，不能暴露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

吳連登回憶：那一天晚上，我們基本上沒睡。這之後一段，我們就被"軟禁"了，不能露面，因爲人家一見我，就知道主席在哪裏。我要買菜什麼的，都是寫條子，由供應處送。[15] 看來毛澤東安全回到北京，卻仍然不放心。

高振普回憶：周總理從中南海回到人民大會堂後，到福建廳宣佈，今天的會議結束，其他人員請回，政治局的同志留下，到新疆廳等一等。總理要求誰也不要離開，也不要往外打電話。周恩來安排了新疆廳外的環境，指定專人把守廳門，無關人員不許進入，所有隨員一律原地休息，誰也不准靠近新疆廳。[16]

滯留在新疆廳的政治局委員按總理分配的房間，休息去

了。他們遵守紀律，誰也沒有離開人民大會堂。除了偶爾在房子裏散步，就是長時間坐在那裏。

爲什麼要“封鎖”新疆廳？新疆廳裏有誰呢？有黃永勝。也就是說，九一三事件發生時，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各自在家“種自留地”，只有黃永勝在人民大會堂出“公差”。

邱會作回憶：9 月 12 日下午，毛主席突然回到北京，黃吳李邱並不知道。總理事先不知道，政治局的成員不知道，甚至江青也不知道。周總理通知黃永勝晚上到人民大會堂來討論政府工作報告。[17] 原定國慶日前後召開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9 月 13 日凌晨，李作鵬和邱會作才被通知來參加緊急會議。

天亮了，吳法憲從西郊機場來到人民大會堂。沒什麼事，江青拿著一把撲克。都什麼時候了，還玩撲克？這時，九一三事件的大致輪廓已經明瞭，吳法憲明白江青在試探他們，反正心裏沒鬼，玩就玩。張春橋和江青一家，黃永勝和吳法憲一家，結果黃永勝和吳法憲贏了。[18]

葉群打電話找不到黃永勝了

這個晚上，在北戴河的葉群忙得不行，不停地打電話。在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前，葉群先和留守毛家灣的林彪秘書于運深說了十多分鐘，又與邱會作的夫人胡敏聊了一個多小

時，中心是林豆豆的婚事。

于運深回憶：9 月 12 日我在毛家灣值班。在二五六號三叉戟起飛前，21 點多，葉群給我打電話，打得很長。都是小事，主要是談林豆豆的婚事。又說裝修小廚房，到大連做衣服。葉群說先到大連，回來過國慶。叫家裏收拾衛生。還說到上海做的尼龍外套破了一個洞，讓在上海的過全（空四軍管理處處長）找人織補一下。最後童管理員讓我問，別人送的那幾隻王八，養了好多天，怕死了，請示主任看怎麼處理。葉群交代很細，說叫小童送給江青[19]。總之，于運深沒有感覺出葉群的緊張，電話裏還笑聲不斷。

葉群放下電話 15 分鐘，23 點 30 分，周恩來的電話到了。

周恩來問：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一架專機？

葉群先說不知道，稍頓了一下，還是“老老實實”地承認是有一架專機，是我兒子坐著來的。如果明天天氣好的話，我們要上天轉一轉。

是不是要到別的地方？

原來想去大連，這時天氣有些冷了。

周恩來說：晚上飛行不安全。

葉群說：我們晚上不飛，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氣好了，再飛。

周恩來說：別飛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氣象情況掌握好。需要的話，我去北戴河去看望林彪同志。

葉群嚇了一大跳，趕快勸總理不要來。[20]

確實，周恩來讓在西郊機場坐鎮的楊德中（中央警衛局政委）準備飛機。[21]

胡萍回憶：吳法憲對我說，準備飛機去北戴河，沒說誰去，我以爲吳法憲去。後來我發現楊德中腰裏別著槍，我覺得有點問題了，已經把吳法憲看起來了，他去可能性不大。我一直有問號，後來才知道是周恩來準備去。[22]

時念堂回憶：吳法憲命令安排兩架專機，送周總理到北戴河。我馬上安排，專機師的戰備做得很好，專機隨時處於待命狀態。很快兩個機組人員帶上飛行用具，跑步到候機室待命。我對機組下達命令，只講北京飛山海關和到山海關落地，因爲吳法憲沒講任務的性質，也沒講誰去，他讓機組原地待命。但到最後也沒派上用場。[23]

那個晚上，周恩來忙得四腳不沾地，看來並沒有打算去北戴河，只是說說而已。

不管官方還是民方，都認爲半夜"機"叫是因爲葉群接了周恩來的這個電話。[24] 但實際上周恩來的電話並沒有讓葉群馬上"跳"起來，她放下電話還足足"安靜"了半個小時。葉群的性格點火就著，如果火燒了"眉毛"，她會馬上一蹦三丈高。尤其在那個分秒必爭的夜晚，她決不可能"安靜"半小時。

葉群在這關鍵的"半個小時"裏，能幹些什麼呢？

雖然葉群堅決要求周恩來不要來，但她心裏還是"毛"了。

中央有過決定，爲了安全，不讓毛澤東坐飛機。一向位

於老二的林彪，在專機上成爲中國"第一號"，當然是想飛哪兒就飛哪兒。林彪是周恩來的"上級"，他坐飛機，還用"下級"批准嗎？正常情況下，"林辦"直接向空軍管專機的副參謀長胡萍打個招呼就行了，別人不過問。[25] 可是，周恩來爲什麼半夜三更突然查問到北戴河的三叉戟？還要到北戴河來看望"林彪同志"，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啊。本來葉群心裏就有那麼多的"鬼"，毛澤東南巡講話已經被他們"偷偷摸摸"知道了，看樣子是要攤"牌"了。

是誰告的密？據葉群內勤說：林立果大罵林豆豆走漏消息，要甩掉她。葉群說不行，少了林豆豆，無法向首長交代。[26]

此時，遠離北京的葉群還沉得住氣，她想看看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問誰？當然是問黃永勝。可是黃永勝找不到了！總參謀長黃永勝怎麼可能找不到呢？這麼晚了，辦公室沒有，家裏也沒有，黃永勝能到哪裏去呢？頭腦簡單的葉群哪裏知道黃永勝正在"悠閒"打撲克呢？在她的腦子裏，只能有一種答案，黃永勝被抓了！黃永勝被抓，林彪還能在"接班人"的寶座上坐下去嗎？也許抓林彪的命令已經下了，再不腳底板抹油，就要成甕中之"鱉"了。難怪葉群把吃了安眠藥的林彪從床上拽起來，說有人要來抓你了，快走快走！

這個被黨史界忽略的重要細節，或許是半夜"機"叫的謎底。

李德生單槍匹馬闖“虎穴”

這個晚上，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的電話鈴聲不斷。

從9月12日19點多到13日早上，周恩來沒有吃一點東西，也沒有問時間，就連天亮了關燈、拉窗簾都沒有注意到，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27]

周恩來查問三叉戟後，吳法憲主動向周恩來要求到西郊機場，周恩來同意了。

22點30分左右，吳法憲打電話找梁璞（空軍司令部參謀長），沒找到。梁璞此時正在天安門國慶遊行的排練現場。白雲（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回憶：9月12日是我在指揮所值班。值班首長是有情況在，沒有情況就回家，到零點我看沒事就回去了。回家不久，打電話叫我，雷達看見飛機，查問飛機是怎麼回事？這是專機師前一天調到山海關機場的三叉戟，航線向北。我看問題重大，打電話叫梁璞回來。[28]

這時，王輝球（空軍政委）、鄺任農（副司令員）、薛少卿（副司令員）等相繼來到指揮所。大家都表情嚴肅，也有些不知所措，只有梁璞在大聲說話。[29]

零點過後，周恩來把李德生叫到電話間，說林彪要乘飛機跑了，要他立即趕到空軍指揮所，代替他坐鎮指揮，24小時不要離開。李德生深為震驚，立即乘車去空軍大院。同時，周恩來讓楊德中去“陪”已經在西郊機場的吳法憲，派紀登奎（北京軍區政委）到北京軍區空軍指揮所。[30]

周恩來打電話問吳法憲在什麼地方，吳法憲說在西郊機場。周恩來說我派警衛局局長楊德中去協助你，吳法憲明白這是監視他了。[31]

零點40分，二五六號三叉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8分鐘後，空軍指揮所接到周恩來辦公室的電話通知，中央決定，派總政主任李德生立即到空軍指揮所，代替總理全權指揮[32]。其實1月24日，李德生已經被任命為北京軍區司令員，這是毛澤東“挖牆角”的重要措施。不過，他總政主任的職務也沒有免掉。指揮空軍一般應該是總參，總政主任也還勉強，而北京軍區司令員的身份來指揮空軍顯然不合適。

空軍指揮所擔任值班的曹里懷（副司令員）和白雲一邊向上報告，一邊派人到門口迎接。很快，李德生就帶著警衛參謀坐車來了[33]。此後，李德生五天五夜沒有合眼。周恩來後來說：當時情況不明，我們派李德生去空軍，他是深入“虎穴”，我們都為他捏了把汗，結果還是我們勝利了。

白雲回憶：怎麼總政的李主任來了？說是毛主席黨中央派來的，看來起飛的三叉戟有重大問題。我與李德生有過幾次接觸，但不好直接問。我和參謀長梁璞商量，要不要打下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飛機上都有誰？也沒有辦法查。我們全蒙在鼓裏，只有李德生心裏有數，但他不說，請示總理，不讓攔截，我們眼睜睜看著飛機飛出國境。[34]

李德生坐在一張很大的寫字台前，桌上有直通周恩來和汪東興的“紅機子”。白雲指著總空情標圖板，不斷向李德生講解三叉戟的飛行動態和特點。李德生將雷達跟蹤的飛機方

位、角度等等情況用電話報告給周恩來。[35]

王飛回憶：那時太緊張，沒想到這局面。9 月 12 日下午林立果說準備廣州、重慶、東北這三個點，明天早上送大家去廣州。我們開會到零點，研究到廣州的人員名單，會沒開完就作廢了。我回到家裏。9 月 13 日 1 點 30 分，我的秘書孫水森來電話，航行局尚局長說林副主席要回來，三叉戟從山海關起飛了。我立即給尚登峨（空軍航行局局長）打電話，得知三叉戟正向西北方向飛，可能偏航了。我心想，不是"作廢"了嗎？怎麼又起飛了？我問誰在調度室？梁參謀長來了，吳司令員到西郊機場去了。不一會兒，尚登峨又來電話，說三叉戟快要飛出國境了。我放下電話就往指揮所跑，看見李德生在我前邊。李德生怎麼也來了？我非常奇怪。這時三叉戟正向西，開始拐大彎，向正北，很快就要出去。我當時不知道林彪在飛機上，梁璞說飛機上是劉沛豐、林立果他們。那時太緊張，沒想到這局面，沒想到林立果和周宇馳要跑。我不知道林立果的第三方案叛逃蘇聯，但聽林立果講過，要搞世界革命，要到蘇聯繼續革命。[36]

時念堂（專機師師長）回憶：三叉戟起飛後，再也沒有返回山海關機場。飛機時速 500 公里，先向西南，14 分鐘後右轉彎，對著北京，我以爲三叉戟要回西郊機場，馬上組織人員準備接機。誰想到，三叉戟在河北遷安上空，突然向北直飛……[37]

王飛回憶：三叉戟飛的不是國際航線，飛國際航線要轉華北，通過二連浩特。我進指揮所時三叉戟向西，還沒有拐

大彎。山海關機場調度室的標圖員戴著耳機，用紅藍鉛筆在標圖桌上描下飛機的航跡，但很快航跡就沒有了。空軍指揮所的標圖板是佈滿整幅牆壁的大螢光屏，航跡是亮點，一閃一閃向前走，飛機的高度、方向一清二楚。剛開始航向很亂，過了河北的遵化才比較清楚，到了內蒙古的西部，航跡突然向北，當時判斷飛機可能要出境。[38]

傅英豪（空軍雷達兵部部長）回憶：飛機過遵化，56 部雷達全部打開，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航圖上基本上是"之"字形，山海關、遷安、多倫、貝勒廟、伊德爾莫格、溫都爾汗……[39]

此時空軍、北京軍區、北京軍區空軍幾個指揮所以及西郊機場調度室都看得清清楚楚。劉建林（北京軍區作戰部值班參謀）回憶：飛機從山海關起飛，一條特別直的直線，按直線最短的原則，直奔蒙古。因爲搞不清敵機我機，請空軍重新再"標"一下，還是一條直線，一點彎也沒有[40]。朱秉秀（空軍指揮所作戰值班參謀）回憶：當時根本判斷不出來，只知道從山海關往北飛，一根直線，航向推測向國外，直向烏蘭巴托。[41]

到底是"之"字形，還是一根直線，看來只能等待當時幾個指揮所標出的航圖"出土"。

尚登峨忽然想起周宇馳要過航圖

整個空軍指揮所，除了李德生外，誰都不知道外逃的三

叉戟上有林彪。

當時知道林彪在三叉戟上的，北戴河那邊只有八三四一部隊的領導張宏和姜作壽以及林豆豆、張清林和“林辦”的工作人員。北京這邊，也只有毛澤東、周恩來及張耀祠、汪東興等極少數人。不要說處於空軍核心指揮位置的吳法憲、梁璞等人，就是多少瞭解一些內情的王飛也蒙在鼓裏。[42]

尚登峨與被二五六號三叉戟拉下的第一副駕駛陳聯炳通電話，問飛機上都有誰，他們也不知道[43]。第二副駕駛康廷梓在山海關機場調度室反復問姜作壽，飛機上都有誰？姜作壽不說。山海關機場的海軍警衛戰士看見林彪上了飛機[44]。但他們不知道是林彪和葉群，說是一個“禿老頭”，一個“胖女人”。

尚登峨回憶：我被叫到指揮所時三叉戟已經起飛了。9月12日下午，胡萍給我交代，林彪專機要到山海關，林彪要動一動。階級鬥爭很複雜，還要派一些飛機，你要掌握一下。23點多，我處理完西郊機場申請去廣州的航線，剛回到家，值班的領航參謀傅本理來電話，說吳司令員問山海關的飛機是什麼飛機？誰批准飛的？我打電話請示胡萍，胡萍說你別管了。既然不讓我管，我就睡覺了。突然電話鈴響，山海關的飛機強行起飛？就潘景寅一個人。再重複一遍！這時三叉戟起飛還不到五分鐘，我嚇了一大跳，趕快起床。平時到指揮所要十分鐘，我五六分鐘就跑到了，馬上給山海關打電話，得知飛行員潘景寅一個人把三叉戟開上了天。李德生仔細詢問潘景寅的情況，什麼時候入伍？什麼時候入黨？

“文革”以來的表現怎樣？……有些我能回答，有些我也答不了。一邊回答李德生的問題，我一邊死死地盯著標圖。雖然還搞不清楚三叉戟往哪裏飛，但越看越不對勁，腦子裏熱乎乎的，像燒開了一鍋水。問號很多，當然不敢說，我嘀咕最大的是潘景寅怎麼一個人就飛了？飛機上還有誰？根本沒想到林彪在上邊，一點沒想到。誰搞鬼呢？原來申請的航線是廣州、重慶、東北，現在既不是廣州，也不是重慶，怎麼往蒙古方向飛？那一段國境線上除赤峰有個小機場，沒有可降落的地方呀！

我忽然想起，9月8日上午，周宇馳說國慶日快要到了，要加強戰備，林副主席1969年視察空軍時，特別提到要防止蘇聯搞突然襲擊。現在是核戰爭時代，要注意蘇聯用航班飛機搞突然襲擊。請我搞一份蘇聯航班地圖，瞭解一下他們的飛行情況，他和林（立果）副部長要向林副主席彙報。因爲這不是什麼秘密文件，經副參謀長王飛同意，我專門找民航局的領航員，繪製了一份二百萬分之一的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的航線圖，並填寫了有關的民航資料，交給周宇馳。想到這兒，哎喲，是不是劫機？頓時一股不祥的感覺彌漫全身，我馬上報告參謀長梁璞。他讓我再畫出一張同樣的航圖，交給李德生。[45]

朱秉秀回憶：那時指揮所裏很有意思，你注意觀察，副參謀長白雲沒事人一樣，特別輕鬆；梁璞也“趾高氣揚”，大聲說話。王飛呢，話都說不出來，手直哆嗦。我雖然不知道三叉戟上都有誰，心裏還是有點數。當然不敢往林彪身上

想，想黨辦那一夥人，那時還不叫"小艦隊"，叫調研組。我們是中間派，看他們兩派"鬥"。後來直升機起飛，西郊機場報過來，是周宇馳和于新野，這就更清楚了。李德生本來是不離開空軍指揮所的，9 月 14 日下午，總理叫他去人民大會堂開會。21 點李德生回來，笑著對大家宣佈，這是件大好事，飛機爆炸了，空軍領導才從李德生嘴裏得知林彪在三叉戟上。這時才明確，但這時空軍指揮所的一般工作人員還是不知道三叉戟上都有誰，9 月 28 日李德生傳達後大家才知道。[46]

毛澤東果斷下達全國"禁空令"

高振普回憶：總理去 118 廳，沒有像平時那樣先問主席休息了沒有，而是回頭看了看，說不要都去，留下人聽電話。總理關上門，單獨和主席談了半個小時，然後回到西大廳的北小廳，這是總理辦公和休息的地方，有軍方和地方的電話機，還有一張床。總理走進去，示意關上門，他拿起電話，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下達"禁空令"。派陸軍進駐全國所有的軍用和民用機場，任何飛機不得起飛，實行全國"禁空"。為確保首都和整個國家的安全，同時下令全國軍隊進入一級戰備。[47]

朱秉秀回憶：李德生向總理報告了雷達最後消失的位置，同時示意我趕快筆錄。李德生複誦中央政治局的命令：從現在起，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黃總

長、吳司令員聯名簽署的命令，一架飛機都不准起飛。記下來後我念了一遍。李德生說沒有錯，這就是"禁空"了，空中發現的飛機就是敵機。

隨後，空軍指揮所接到國務院辦公廳副主任吳慶彤的電話，傳達周恩來禁止飛行的命令，同時包括民航的國內外航班和其他飛行。那時民航歸空軍領導，空軍指揮所向民航傳達時，民航已經接到國務院的通知，擬以技術原因不接受國際航班來中國，也不起飛任何國內、國際航班。[48]

為什麼這個命令中還有"林副主席"？不對吧？在"禁空令"中，確實提到了林彪。據朱秉秀分析，林彪在外逃的三叉戟上，這在當時是絕密，而"禁空令"下達後將涉及成千上萬的人，所以命令上如果不出現林彪，不就"不打自招"了嗎？換句話說，如果非要這五個人聯名簽署，那永遠也不可能起飛任何一架飛機，因為林彪已經不可能和他們一塊簽署命令了。而且後來起飛殲擊機，攔截那架外逃的直升機，只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的命令，也並沒有五人聯名。[49]

中央在處理九一三事件中有兩個"禁空令"，第一個是"禁飛"，只是一般通知。當三叉戟飛越中蒙邊境後，毛澤東果斷下達全國"禁空"。這是第二個"禁空令"。同時下令軍隊進入一級戰備，派陸軍進駐全國所有的軍用和民用機場。

周恩來給吳法憲打電話：決不允許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有飛機來，你我都要掉腦袋！吳法憲嚇得夠嗆。這時三叉戟已經飛出國境，吳法憲當面向專機師師長時念堂交代：三個機場，都不准飛機起飛。同時吳法憲親自打電話向北京軍

區空軍和瀋陽軍區空軍指揮所傳達"禁空令"，立即停止包括夜航訓練在內的各種飛行。[50]

除這兩個重要的方向，其他軍區空軍由空軍指揮所傳達。

梁璞對朱秉秀和另一個作戰參謀徐心德說：趕快要通各軍區空軍、指揮所，要找他們的值班指揮員親自接電話。叫航行局局長尚登峨也來，航行部門也要通知。朱秉秀和徐心德分工，徐心德接通電話，朱秉秀傳達，因爲對方都是高級首長，接電話、記錄、複誦都很費時間，郝昌照（作戰部副部長）主動來幫忙。從 1 點 56 分一直到 2 點 20 分左右，才把"禁空令"傳達完畢。接著幾位空軍首長研究，並報李德生批准，又向各軍區空軍指示，增開地面警戒雷達，嚴密對空監視，發現情況立即報告。[51]

註釋：

[1] 參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481 頁

[2] [17] [18] 採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 年 11 月 16 日

[3] [5] [16] [27] [47] 參見高振普《周總理在接到張耀祠報告之後》，載《中華兒女》2000 年第 4 期

[4] 注：汪東興認爲是 21 點 20 分左右，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203 頁

[6] [9] [10] [20]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203-206、208-209 頁

[7] [11] 採訪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筆記，2003 年 2 月 18 日

[8] 採訪費四金筆記，2000 年 9 月 22 日

[12] [14] 參見周福明等《毛澤東晚年生活瑣記》，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版

[13] [15] 參見董保存《毛澤東家庭管理員吳連登訪談錄》，載《名人傳記》2004 年第 1 期上半月

[19] 採訪林辦秘書于運深筆記，2005 年 10 月 23 日

[21] [23] [37] [50] 採訪專機師師長時念堂筆記，2000 年 4 月

14 日

[22] [25] 採訪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胡萍筆記，1996 年 11 月 23 日

[24] [26] 參見張寧著《自己寫自己》，作家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版，245、247 頁

[28] [34] 採訪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白雲筆記，2003 年 3 月 6 日

[29] [32] [33] [35] [41] [46] [48] [49] [51] 採訪空軍司令部作戰參謀朱秉秀筆記，2000 年 8 月 16 日

[30] 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第一版，419 頁

[31] 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

[36] [38] [42] 採訪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王飛筆記，2003 年 3 月 6 日

[39] 採訪空軍雷達兵部部長傅英豪筆記，1988 年 3 月 6 日

[40] 採訪北京軍區作戰部參謀劉建林筆記，2000 年 5 月 13 日

[43] [45] 採訪空軍航行局局長尚登峨筆記，2001 年 10 月 4 日

[44] 採訪二五六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康廷梓筆記，2000 年 7 月 14 日

第十七章
誰是知情者

飛往蒙古是“有備”還是“無備”

有人說，二五六號三叉戟本來是想到廣州去的，半路才改道往蘇聯飛。

這話不對。有一個情況值得注意，周宇馳在直升機起飛後，說“林副主席”已經坐三叉戟在烏蘭巴托降落了，你們不要害怕，出了國境就行。因爲林立果臨去機場前給周宇馳打過北上的電話。[1]

實際上，林彪別墅早在幾天前就開始做投奔蘇聯的準備了。

9 月 7 日 9 點 50 分，葉群讓公務員通知在毛家灣的秘書李春生，把《俄華字典》、《英華字典》、俄語和英語會話等幾本工具書找出來，叫送林豆豆到北戴河的飛機帶來。當

時離飛機起飛只有十分鐘了，爲了帶這些書，飛機推遲了一個小時起飛。

9 月 7 日 21 點 30 分左右，葉群叫總參二部參謀倪煜去講課。倪煜專門給她講各國的概況，按原計劃，應該講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或美國電影《巴頓將軍》，可葉群突然拿著《世界地圖集》問，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倪參謀回答說有烏蘭巴托、沙音山達、蘇赫巴托爾、科布多等。這些城市有沒有北戴河大？聽去過的同志講，比不上我國的中小城市，房子都是我們幫助蓋的。葉群還多次詢問中蘇邊境的情況，問蒙古哪些地方有蘇聯軍隊？中蘇、中蒙邊境地區有多少蘇聯軍隊？有哪些機場，機場的位置等。看到葉群這麼有“興趣”，倪參謀爲了講得更清楚，還特意從總參二部要了一些圖表資料。

9 月 8 日 9 點，周宇馳打電話給空軍航行局局長尚登峨，要一份北京到伊爾庫茨克的地圖。周宇馳還對情報部技術處副處長王永奎說，叫情報部給我搞一份我國周圍電台的頻率表，明天交給我。大概是太複雜，9 月 11 日，周宇馳又要簡單的周圍各國對華廣播頻率表。

9 月 9 日下午，周宇馳在辦公室對雷達兵部技術處副處長許秀緒說，林副主席要你給他搞一份雷達探測圖和開關時刻表。許秀緒問：要全國的，還是要哪個地區的？周宇馳說：只要“三北”地區的。許秀緒報告了部長後，下午交給了周宇馳。由於雷達站很多，開關機的時刻表比較複雜，許秀緒只是把雷達開關的原則告訴了他。

9 月 11 日 11 點多，葉群讓毛家灣把全軍副軍以上的幹部花名册和部隊部署情況的登記表送來，說首長過幾天要到大連，準備研究一下戰備問題。葉群還讓毛家灣送來一大堆呢子大衣等冬季服裝。[2]

因爲走得太急，葉群專車的後備箱裏，準備好的文件和行李並沒有帶走。[3]

是李作鵬放跑了林彪座機嗎

1980 年“兩案”審理中，沒有證據證實林彪集團主犯黃吳李邱與“兩謀”有關。

1971 年 9 月 12 日，是個平靜的星期天。不要說一般老百姓沒有想到，就是被認爲捲進九一三事件漩渦中的黃吳李邱也沒有想到，第二天即將發生震動新中國歷史的大事件。當然更沒有想到，這一天是他們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天。雖然逮捕（稱離職反省）是在 11 天以後的 9 月 24 日，但從 9 月 13 日起，他們的一舉一動就都被監控了，基本上無所事事。

9 月 12 日軍委辦事組放假，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在幹什麼呢？

李德生回憶：9 月 12 日晚，我正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會議由周總理主持，討論他即將在四屆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4]

黃吳李邱中，只有黃永勝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周恩來主持

的會議，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都不在。因爲這一天軍委辦事組沒有集體活動，各人回去收拾“自留地”。所謂“自留地”，就是各自處理各單位的事情，黃吳李邱除在軍委辦事組任職外，還都兼著各軍兵種的第一把手，黃永勝是總參謀長，吳法憲是空軍司令員，李作鵬是海軍第一政委，邱會作是總後勤部部長。黃永勝、邱會作和吳法憲最近沒外出，除了軍委辦事組的集體活動外，花插著就把“自留地”收拾得差不多了。而李作鵬這一段時間基本上不在家，8 月陪江青到青島去了一段時間，8 月底從青島又到連雲港處理兩派的問題。接著 9 月初又陪朝鮮人民軍代表團的吳振宇到長沙、武漢等地，才回到北京沒幾天。“文革”中的事情很多很亂，幾天不在家，公文就會堆積成山。好不容易碰上“空閒”的星期天，正是李作鵬耕耘“自留地”的大好時光，他在海軍大院 47 樓的辦公室“種”了整整一天的“自留地”，很累。

當晚接到周恩來讓他通知山海關機場的電話時，李作鵬已經吃安眠藥睡下了。[5]

這裏有個問題，李作鵬是海軍第一政委，雖然他也是副總參謀長，但調飛機這一類的事情應該歸海軍司令部，再往上應該是海軍司令員管，李作鵬爲什麼直接打電話通知山海關機場？讓秘書辦不行嗎？或者讓司令部通知？你只是一個政委，也不是司令員，軍事指揮上沒有你的事嘛。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經沒有上下左右了，又是周恩來的“令箭”，李作鵬也沒有多想。李冰天（李作鵬的大兒子）回憶：電話是由李作鵬和夫人董其采、朱秘書三人分別記錄的，核對後，

還特意給周恩來複誦了一遍。複誦時用的是董其采的記錄稿，周總理肯定地回答對，傳達也是按這個記錄稿念的。

周恩來傳達“四人”聯合命令時沒有講“背景”。李作鵬一直在海軍大院，根本不知道人民大會堂和北戴河的前前後後，林彪想去哪？爲什麼不讓林彪的飛機起飛？全沒講。他根本想不到山海關的“風雲變幻”。誰能想到林彪跑？想都不敢想。如果李作鵬事先知道出這樣的大事，他哪裏還有心思在海軍種“自留地”，他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只是照本宣科，一字不差地把周總理的指示傳達給山海關機場。處理完給山海關的電話，李作鵬又吃了安眠藥。因爲吃了雙倍的安眠藥，睡得比較踏實。後半夜還在熟睡，突然被叫到人民大會堂開會。一聽說開會，李作鵬馬上清醒了。政治局開會從來沒有用過後半夜，一般都是前半夜，是不是與昨晚總理那個不讓飛機起飛的電話有關？李作鵬由警衛員扶著，晃晃悠悠到人民大會堂時，安眠藥的勁兒還沒過呢。[6]

之後，這個電話就像“魔鬼”一樣纏著他不放。

特別法庭副庭長伍修權說：李作鵬的要害問題，我們抓的是九一三事件中，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機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宣佈：在 9 月 12 日晚 11 點 35 分和 13 日零點 6 分，李作鵬兩次打電話給山海關機場下達命令。12 點多，周恩來再一次叫李作鵬命令山海關機場，不准停在機場的任何飛機起飛，要設法阻攔。零點 20 分，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站長潘浩已經發現當時情況異常，打電話給李作鵬，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這時李

作鵬仍然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7]

李作鵬說請示周總理，並不是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以後審理“兩案”時說，李作鵬說一人讓起飛就起飛，而李作鵬堅持說他說的是四人讓起飛才起飛，他堅決不承認“篡改”了周總理的指示。但在法庭上，機場幾位當事人都說他“篡改”了，成了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一人”還是“四人”，實際上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山海關機場的跑道燈並沒有打開，調度室也沒給起飛命令，不管是“一人”還是“四人”，都沒有讓三叉戟起飛。三叉戟並沒有經過調度室，是強行起飛。

李作鵬不服氣：爲什麼把三叉戟起飛的責任推到我頭上？如果林彪要起飛，我攔得住嗎？既然是關係到副統帥，我也不知道他往蘇聯飛，他要是往北京、廣州、大連等地飛，什麼白天飛、晚上飛，有什麼了不起。周恩來都說“不能打呀，他是黨的副主席”。毛澤東也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你們都沒辦法我怎麼有辦法？！對我來說，問題的關鍵是林彪走對我有好處，還是不走對我有好處？當然是不走對我有好處嘛，不走他還是副統帥，我還可以大樹底下好乘涼，放他走幹嘛！你周總理爲什麼不親自打電話通知山海關機場？既然讓我通知，爲什麼不告訴我事情的來龍去脈？如果周總理多透露一句話，我也會強調。更何況在緊急情況下，要四位首長共同簽署，能做得到嗎？如果命令警衛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隊攔截，一百個林彪也走不成。爲什麼不命令？七八個問號始終纏繞著李作鵬，他認爲三叉戟起飛不

應該由他來承擔責任。以後李作鵬在關押期間給周恩來寫了三四封信，全都石沉大海，周恩來生前沒作任何解釋。李作鵬說，以我在法庭上最後陳述的四個半小時錄音帶爲准。

9 月 13 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傳達九一三事件，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特別高興，姚文元馬上讓工作人員拿茅台酒慶祝。葉劍英說：國家出了這麼大的事情，這是一種恥辱，你們還有心慶祝？姚文元這才罷了。李作鵬支持葉劍英這一個觀點。毛澤東曾經評價李作鵬不卑不亢。確實李作鵬在法庭很硬，他認爲是他的錯都認，不是他的問題，他死也不認賬。“兩案”審理小組取證組的一位工作人員說，總理不讓飛機走，事後很清楚，如果說李作鵬那時放他們跑，也過分。但是，放跑三叉戟的罪名最終還是算在了他的頭上。[8]

吳法憲和邱會作在忙什麼

9 月 12 日，對於吳法憲來說是最混亂的一天。那個晚上，吳法憲嚇得魂都沒有了。

在黃吳李邱中，他最知情，也嚇得最厲害。墜毀的飛機是他管的，飛機上除了林彪家人和司機都是他的部下，他這個空軍司令員怎麼這麼“倒楣”啊。

9 月 11 日晚上，周恩來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議，吳法憲參加了。毛主席指示，四屆人大召開前要先開三中全會，這個會一直開到淩晨 1 點。這已經是 9 月 12 日了。吳法憲回到西郊住地，在家裏打了一陣乒乓球。臨睡前他告訴夫人陳

綏圻，快要開三中全會了，我要準備在會上再檢討。因爲九屆二中全會上的事情，黃永勝、邱會作和吳法憲都作了檢討。黃、邱的檢討過了關，而爲檢討“熬”成“兔子眼”的吳法憲卻仍“吊”在半空中。

9 月 12 日上午吳法憲睡覺，中午起床後，就叫車和陳綏圻、張秘書回到空軍大院。因爲寫檢討這個事情比較急，要馬上動筆，吳法憲的前兩個檢討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軍大院，所以必須回空軍大院寫。下午陳綏圻找出吳法憲前兩次的檢討材料，琢磨怎麼幫助吳法憲寫第三次檢討。而吳法憲按周恩來指示，仔細閱讀印發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然後抽時間處理了一些空軍事務。晚飯前，他先到京西賓館聽邱會作談毛澤東南巡，這是他最關心的事情。之後吳法憲回到空軍大院辦公樓。

下午就這樣緊緊張張過去了，晚上吳法憲還有一大堆事情。

當時正在開空軍機場和院校的工作會議，20 點他約空軍政委王輝球、副司令員薛少卿一起找來與會的八航校校長、政委談話。談話結束還有一些時間，吳法憲和王輝球就與空軍文工團從部隊調來的六個指導員談話，解決派性問題。這個談話結束已經是 9 月 12 日 23 點多了，周恩來打來電話，問吳法憲是不是知道三叉戟去北戴河了？於是，讓吳法憲魂飛魄散的“九一三事件”從此開始……[9]

邱會作 9 月 12 日這一天非常平靜，上午他在總後召開國防工辦會議，然後到西山看電影。邱會作的大兒子邱路光

的女兒 1971 年 8 月 31 日出生在 301 醫院。

九一三事件前的那一段也巧了，301 醫院婦產科同一間產房連著出生了三個有背景的嬰兒。這三個有背景的嬰兒又先後住同一間病房，在婦產科一進門右拐頭一間，八九平方米，如果不說，和別的產房沒有什麼兩樣。有意思的是，三位產婦都是由一個姓王的老醫生、婦產科副主任接生的。第一個是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總參謀長黃永勝指示，一定要把主席的孫子保下來，每天要報告母親邵華的體溫和狀況，要當成政治任務。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的夫人胡敏是邱辦主任，她指示 301 醫院的院長靳來川親自管理。毛新宇出生的那天，胡敏親自到產房坐鎮，生怕有半點閃失。這還不算，每天還要去產房問長問短。幸虧是毛老人家的寶貝孫子，要是林彪的孫子，那可就壞了，九一三事件後還不成了大罪狀。第二個嬰兒是總參謀長黃永勝的孫子黃小波，這是黃家和劉興元（廣州軍區政委）家的後代。胡敏也一樣，生產的那天一直在產房坐陣。8 月 31 日，到邱會作自己抱孫女時，胡敏還是如此，當然規格不由自主地要降許多，邱家產婦住了四、五天就出了院。這是邱家和張霖之[10] 家的後代。邱會作、胡敏同意這個紅“黑”結合的婚事，眞是難能可貴，周恩來、葉群幫了大忙。9 月 12 日，邱會作的孫女邱燕恒 12 天了，邱家十分熱鬧。按老百姓的說法是嬰兒第十天，要好好慶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老丈母娘來了，在西郊機場工作的邱路光愛人的表姐夫（爲此被關了好幾年，明明是幹部，卻不准轉業，按戰士復員）一家來了，

炊事員老劉師傅也來了。西山上還有個戰士炊事員，做了一大桌子菜，但人多不夠吃，又下掛麵，又買饅頭，吃了一頓熱熱鬧鬧的晚飯。

邱會作下午在京西賓館開國防工辦的會議，會後約吳法憲在京西賓館見面。邱會作從李作鵬那裏得到毛澤東南巡的一些講話內容後，沒有跟吳法憲通氣，怕他再捅漏子。但是兩個人都忙，說好了見面卻沒有見上吳法憲。邱會作到京西賓館開紀委會議。會後邱會作回到總後處理公務。家人吃完晚飯已經是下午 6、7 點鐘，邱會作回來了，他和大兒子邱路光說了會兒話。邱路光拿著謝勝坤（武漢軍區副政委）子女的來信，講給邱會作聽。謝勝坤的愛人陸慧明阿姨還關在南京大學地下室受摧殘，希望邱會作能救救陸阿姨。

邱路光的部隊在新鄉，他是特意請假回來的。因爲第二天要到 301 醫院看牙，邱路光就和母親胡敏下山回總後大院了[11]。邱會作那一段心情不好。黃吳李邱在廬山上摔了跤，之後風聲一陣緊一陣。邱會作雖然按規定每天讀馬列的六本書，聽國防大學講課的錄音。但心裏卻老是忐忑不安，不知命運如何。因爲心煩，邱會作晚上多喝了幾口酒。

9 月 13 日淩晨 3 點左右，除了黃永勝在人民大會堂，吳法憲去了西郊機場外，邱會作和李作鵬分別接到電話，人民大會堂有一個重要會議，請您現在就去。

黃吳李邱都有服安眠藥睡覺的習慣。邱會作到零點後才停止工作，吃了夜餐，睡前公務員張軍給他吃了兩三片安眠藥。剛上床沒多久，淩晨 4 點多，被秘書叫醒，說周恩來總

理來電話，叫他立即到人民大會堂，說有個重要的會。他猜不出總理半夜三更召集政治局委員的緊急會議是什麼內容，只是奇怪，這麼急？聽說周總理、黃永勝他們在人民大會堂修改《政府工作報告》，那也用不著半夜“緊急集合”啊，會不會是倒楣的“廬山”又發作了？從北戴河那邊的情況看，也不大像。幾個小時前，葉群還從北戴河打電話來祝賀邱家有了孫女，稱讚他給孫女起的名字好，還說女兒豆豆訂婚了，要胡敏打個電話祝賀豆豆。看來，不會有什麼麻煩事，要不，葉群哪有心思給女兒辦婚事……可是……邱會作晃晃悠悠被服務員引到會議廳，也沒注意是新疆廳還是四川廳。

李作鵬已經到了，邱會作小聲問，知道什麼事嗎？因爲李作鵬接到過周恩來的電話，要他向山海關機場傳達命令，所以他猜到一點情況。

李作鵬說，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

邱會作想，北戴河？林彪出事了？能出什麼事呢？

5 點左右，周恩來宣佈開會。他對江青的態度大爲轉變，客氣地對江青說：今天晚上發生的事，你不會感到突然吧？（周恩來以爲江青知道了，其實江青不知道，毫無反應）接著他提高嗓門說：林彪跑了，他坐飛機跑了！

周恩來向政治局在京的委員宣佈，今天晚上發生的事，你們幾個不會感到突然吧？接著周恩來提高嗓門說，林彪跑了，他坐飛機跑了！

邱會作大吃一驚。

邱會作回憶：9 月 17 日下午，總理來了一個電話，說

我没有什麼問題，他是保我的，並讓我上西山，去給黃永勝做做工作，要他堅守崗位，不要撂挑子。我和路光到了西山，我讓路光先去看看黃叔叔，黃永勝說要站好最後一班崗。我向黃永勝轉達了總理說保我們的話，黃永勝若有所思地說“話是這麼說呀，文章不一定這麼做。”黃永勝的思想水平是很高的，說“頂多把我和吳胖子抓起來，你和瞎子不會有事，共產黨嘛。你放心，反江青的飛揚跋扈，禍國殃民都推到我一人身上。”我們不願意談這些煩心的事，就談我們在哪裏相識，並肩戰鬥的往事，邊說著我們邊掉淚，後來我們都大哭起來，感到痛快。[12]

九一三事件過去十天，黃吳李邱被叫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宣佈：黃吳李邱暫時離開工作崗位，反省自己的問題。他們被分別軟禁在順義北京衛戍區的營房裏，1972 年 12 月，押到秦城監獄，1980 年由總政保衛部補辦了逮捕手續。在整個九一三事件中，黃吳李邱四大將中只有邱會作最“乾淨”，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黃永勝雖然也不知情，但他是總參謀長，“這一夜”處在“漩渦”中。惟獨邱會作對“這一夜”一無所知。1980 年審理“兩案”時，老戰友萬毅代表中央探監時對他說：你没什麼事，宣判完你就會出去了。邱會作相信了，連律師也沒請，也沒有爲自己辯護，誰知道並沒有放過他。[13]

9 月 12 日，黃永勝接見林立果了嗎

9 月 12 日軍委辦事組没有集體辦公，也就是說黃吳李邱没有聚會。黃永勝住在西山 9 號，他房子下面就是軍委前指。若大的工事，司政後指揮系統，電台、軍委一號台、發電機、水井、一個加強團幾個基數的武器彈藥，3000 人半年的糧食、肉類、菜類罐頭以及被服、藥品，甚至辦公區、警衛區、大禮堂，都一應俱全。如果要搞陰謀活動，好辦得很，黃永勝一個電話幾個人就可以集中，完全以工作名義。而且那時也沒有什麼星期天的概念，只要有事就辦公。

邱會作回憶：當時我們（黃吳李邱）的心情還不錯，一是我們交給毛主席的檢討，過了關；二是我們和江青一夥幾次舌戰，終於迫使他們同意軍隊解放一批幹部，國慶日要上天安門亮相。諸如張宗遜、楊勇、梁必業、蕭向榮、李雪三、張賢約、王諍、王恩茂、吳克華等等；三是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黃吳李邱均有重任。黃永勝爲第一副總理，李作鵬、邱會作和張春橋、李先念、紀登奎等也是副總理，吳法憲是副委員長。只是大家不理解，主席爲什麼要康生當委員長，而不讓朱老總當委員長。總理叮囑我們這幾個將軍在會上不要放炮，主意不是他們（江青、張春橋）幾個的。[14]

黃春光（黃永勝大兒子）回憶：父親在人民大會堂討論四屆人大的文件，9 月 12 日白天放假。上午他去指揮所的理髮室理髮，用去了一個多小時。然後父親與我散步聊天，又用去一個多小時。接著看我兒子，我兒子 1971 年 5 月出

生，這時剛四個月，正是好玩的時候。這就到了中午吃飯的時間，飯後午睡，起床後看文件。直到晚上快 20 點，父親才坐車從西山到人民大會堂，這一去就是三天三夜。

黃春光時任北京軍區空軍防止突然襲擊辦公室副主任，9 月 13 日他一上班，值班參謀報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按一等專機準備的，機上有誰不知道。我想，一等專機，只能與林家有關。怎麼會出這麼大的事？我馬上問我家秘書，也不知道。又問父親回來沒有，沒有回來，我搞不清怎麼回事，更沒有想到林彪在上邊。[15]

邱路光回憶：9 月 14 日，父親回到家，扒著我的耳朵小聲說，林彪跑了！我都懵了，瞎說什麼呢，但老爹不可能在這麼大的事情上開玩笑。不知道黃春光知道不知道，我和他從幼稚園就是同學，一直是哥們。我馬上給黃春光打電話，說電話裏不方便，叫他回西山一趟。黃春光還以爲我叫他玩，說你休假沒事，他還要上班。我說你快過來，眞有事，有什麼要緊事？出大事了！樹林子起火，樹葉子也燒光了。林子！葉子！林（彪）、葉（群）。黃春光恍然大悟，那時沒有汽車[16]，黃春光騎自行車回到西山，這才知道情況如此嚴重。他第一個念頭是看老頭在什麼地方，問一問父親黃永勝。[17]

這時，黃永勝還被"圈"在人民大會堂。

費四金（黃永勝警衛參謀）回憶：9 月 12 日那一天比較平靜。直到晚上快 20 點，黃永勝才坐車從西山到人民大會堂。周總理召集會議一般都是在 20 點 30 分，提前五六分

鐘到就行了。黃永勝住在西山，路上要走 40 多分鐘，時間由我掌握。[18]

爲什麼晚上開會？因爲毛澤東夜間辦公，白天睡覺。"文革"前中央開會，按中辦的安排進行，"文革"開始就不同了，毛澤東回到一線，親自統帥黨政軍。因此要照顧毛澤東的生活習慣，一般都是上午睡覺，中午起來吃早飯，下午 3 點開會或辦公，晚上到人民大會堂吃中午飯，開會到下 2、3 點，然後回去吃夜餐，睡覺。

但那個晚上黃永勝就滯留在人民大會堂。

"四人幫"時代的專案組查來查去，專案組只查到林立果"小艦隊"的活動，卻沒有黃永勝等人的活動。如果林彪搞政變，怎麼可能不依靠既是"死黨"又掌握軍隊大權的黃吳李邱呢？"四人幫"時代的專案組不死心，不知道怎麼查到，9 月 12 日白天黃永勝在京西賓館接見林立果，要警衛參謀費四金證實。費四金是黃永勝的"貼身保鏢"，黃永勝到哪兒，費四金就跟到哪兒，寸步不離。如果黃永勝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與林立果見面，這可是一次極其關鍵的"接見"。說明黃永勝和"小艦隊"有勾結。一旦費四金證實了，黃永勝再否認，也說明黃永勝和"兩謀"有關係。

當時費四金並不知道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他以軍人的忠誠，每小時每分鐘甚至每秒地回憶那一天，黃永勝都幹了些什麼。專案組說黃永勝 9 月 12 日去了京西賓館，見了林立果。費四金說沒有，他也沒有在別的地方見林立果。林立果我認識。

本來專案組想抱個“大金娃娃”，頓時大失所望。但仍不死心，又專門提審過費四金多次，先給“糖衣炮彈”，無非是封官許願、政治前途一類。如果骨頭軟，就會“順竿爬”，反正黃永勝已經倒台了，多扣一個屎盆子又算得了什麼？但是費四金沒有昧著良心。他說，黃永勝沒接見林立果，就是沒接見，我是黨員，是軍人，我要對中央負責，對黃永勝負責，也對我自己負責，我不能作僞證。[19]

黨史專家王年一認爲：比之某些人，費四金眞是了不起，堅持了正義和公正。一人之誠實，不僅救了黃永勝，而且救了很多人。費四金不過是一個小幹部，但他的品質優於許多人，可敬可佩！

專案組還不死心，吹鬍子瞪眼，拍桌子，各種高壓手段都用上了。費四金也非常明白作僞證的“好處”，不僅可以馬上獲得自由，還會有一個很“光明”很“燦爛”的前途。如果堅持說眞話，很可能自己的結局會很悲慘。但費四金堅持，就是被開除黨籍軍籍，也應該有良心，不能說假話。

專案組爲了攻下費四金這個“堡壘”，專門把他押到京西賓館對質。

京西賓館的幹部、服務員，好多人都衆口一詞，說他們看見黃永勝那一天見到林立果了，還拿出那一天的值班記錄。

有那麼多人證實不就行了嗎？爲什麼非要費四金“說話”？

費四金是保衛幹部出身，學過偵察。他一看值班記錄本，馬上說這不是當時的記錄，這是事後補記的。不僅鋼筆水顏色一樣，就是字跡也一樣，一眼可以看出是一個人寫的。不可能好幾個月都是一個人値班吧？費四金說，我認爲這是事後追記的，不是原始記錄，不符合當時的情況。

最後，紀登奎對費四金說：別人都揭發了，就你沒揭發。

費四金說：我懂，我是組織上調來的，過去與黃永勝並不認識，我沒有理由保他。但是也不能因爲黃永勝出了事，就牆倒衆人推，落井下石，把根本沒有的事情說成有。如果黃永勝9月12日見了林立果，我決不會包庇他。

不管有多大的壓力，不管有多嚴重的後果，費四金始終不改口，黃永勝在9月12日這天沒到京西賓館，更沒有見林立果。

由於費四金始終堅持說眞話，不僅“四人幫”時代沒有給黃永勝扣上“兩謀”的帽子，就是到後來審判“兩案”，也無法寫上這一條。否則，大小“艦隊”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見面就有了“鐵證”，黃永勝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20]

9月13日，黃永勝想去廣州嗎

專案組說：黃永勝要到廣州另立中央。讓費四金看飛機編組的名單，上面有黃吳李邱。

費四金還是堅決否認。9月12日那天，黃永勝根本就沒有說第二天去廣州，不要說換洗衣服沒有準備，就是天天要吃的藥也沒有準備。

一般黃永勝出差，都要提前講，瞞不過費四金。因爲出差不是一天兩天，黃永勝起碼要帶換洗衣服以及一堆藥。每次出差前黃永勝都要說：小費，要出差。費四金就準備行李，把要帶的裝進旅行箱，把要吃的藥準備好。但這一次，黃永勝一句話也没說。費四金認爲黃永勝肯定没有去廣州的打算。

9 月 12 日晚上，費四金跟著黃永勝到人民大會堂，一直到第三天才回來。黃永勝情緒低落，回到西山，他燒了一些照片和文件。費四金雖然知道跑了一架大飛機，但他一直不知道是林彪跑了，以爲是吳法憲跑了。因爲黃永勝的秘書老吳那天没去人民大會堂，問小費都誰參加大會堂的會了？費四金没見到吳法憲，所以印象特別深。直到費四金進了學習班，才知道原來黃永勝也有問題。

正像費四金說的那樣，他並不是黃永勝的"心腹"，比起李文普和林彪的漫長關係，費四金和黃永勝要短暫得多。他出身於廣州軍區 41 軍 121 師，1968 年黃永勝從廣州到北京，他也跟來了，是黃永勝辦公室工作人員中時間最長的。跟黃永勝調到北京的工作人員都先後走了，費四金也在交班，準備到軍委辦公廳警衛處。接班的警衛參謀小湯基本上都接手了，只剩下一些經濟賬還没交。如果早兩天費四金走就走了，没想到九一三事件不期而遇，再也没走成。費四金交完班，準備回家結婚。結婚證領了，回家的火車票也拿到了手，喜糖什麼的也買了，卻被突然關了起來。

費四金告訴家裏臨時出差，火車票也退了。這一"臨時"就是四年，喜糖都長了毛。

專案組把費四金當成"重點"。先是關在"亞療"一年，然後關到團河農場三年。解除關押後費四金在基層部隊過渡一下，轉業到地方，最後的職務"升"到北京汽車製造廠再就業中心當主任。不管在部隊還是在地方，揹著黃永勝這個"大包袱"，人家都不敢使用。如果費四金"曲線救國"，那就立了"大功"，決不會是如此遭遇，但費四金至今不悔。[21]

9 月 24 日，黃永勝被叫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從此失去自由。被抓時，黃永勝大叫冤枉，那聲音很多人都聽到了。抓他們的理由是他們不揭發。可是，黃吳李邱揭發什麼呢？他們根本没有想到揭發。尤其是黃永勝，一没上山，二没發言，有什麼錯？非讓檢討，就檢討吧。檢討内容與汪東興差不多，汪東興過關了，他們的檢討卻一遍一遍過不了關。最後總算老人家高抬貴手，過關了。接下來又没有犯新的錯誤，再檢討什麼呢？而且毛澤東南巡時還說要與林彪談談，他們揭發林彪什麼呢？在監獄漫長的十年裏，黃永勝始終不改口。

黃春光回憶：仍被關押的父親對我們說，我不知道，我怎麼知道他們要跑？父親從小打仗，没有政治鬥爭經驗。不是他胡說，他根本不知道謀害毛主席。事實與罪名無關，打倒誰是黃永勝簽字？没有簽過任何一個打倒的文件。黃永勝領導專案組是接過周總理和楊成武的，他們都基本搞定了，没有更多的事了。開除彭德懷黨籍，呈主席、林副主席批示，這就算迫害？九一三事件後，也没有解放彭德懷嘛，彭德懷

慘死，還讓搞化名。他也沒有請律師，請律師有什麼用？不相信律師。其實應該請律師，父親不懂，沒請，他自己爲自己辯護。他始終認爲自己沒事，我們是眞心反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從我們到北京來就抵制，怎麼能與他們是一夥？[22]

黃吳李邱被關在通縣衛戍區的營區，以後又挪到順義。

實際上，黃吳李邱對南逃廣州一無所知。魯珉回憶：9 月 12 日晚上在空軍司令部研究南逃名單時，說假借林彪讓他們到廣州開會，如果黃吳李邱不走，就兩個"架"一個。[23]

1980 年 11 月 27 日下午，第二審判廳審判江騰蛟。江騰蛟交代：9 月 12 日下午在空軍學院後面的小樓上，周宇馳召集開會，有王飛、我、于新野、李偉信。周宇馳說，13 日早晨 7 點，由王飛、于新野和我三個人，先到機場平房，要王飛給黃永勝打電話，說林彪叫他有點事情。黃永勝來了以後，再叫黃永勝把吳、李、邱找來，說林彪要在某地開一個會議，要他們到機場來。等他們來了以後，用兩個人招呼一個，要他們上飛機。[24] 很明顯，這是實施綁架。吳法憲保外就醫後，曾對大兒子吳新潮說，我死也不會走！

1980 年審理"兩案"時已經基本搞清，沒有證據表明黃吳李邱與林彪逃跑有關係[25]，可惜這已是十年鐵窗之後的事情了。

其實，1973 年底，林彪專案組副組長紀登奎就向中央報告了審查結論：黃吳李邱與"兩謀"（謀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毫無關係。總理同葉帥帶紀登奎向毛澤東彙報。毛

澤東說：登奎同志，你比我、總理、葉帥頭上少了幾根白頭髮……但這之後，就沒有人再系統地審黃吳李邱了。1976 年"四人幫"倒台，數黃吳李邱最高興，可是不僅沒放他們，還被關進秦城。升了級。[26]

黃春光回憶：9 月 24 日，我媽給我打電話，你父親出事了，讓咱們搬家，你回來一趟。我還一直沒感覺，十一以後，才發現辦公室兩個參謀像"跟屁蟲"一樣，緊跟著我，寸步不離。很快我就被抓起來，紀登奎問我的第一句就是，你幫助父親燒了什麼？其實我沒燒，我只是幫助整理了一下。也沒有什麼，有一封策反信。紀登奎說，毛主席已經批過了，這有什麼？我說在手裏和不在手裏不一樣，主要是害怕江青借此做文章。

我根本沒什麼事，那也不放人，和費四金一樣關了四年。林辦的秘書，李作鵬的女婿，王秉璋的秘書，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我們都在一起。爲什麼不放我？因爲對父親定不了罪，還想從我這裏"挖"東西。放出來重新給我分配工作，分配到司令部管理處軍糧城生產隊擔任副隊長。生產隊是連級，而我是副團級，我問，是隊長指導員管我，還是我管他們？當然不會讓我幹長，沒多久讓我轉業，三個弟弟也都轉業了。

父親一直沒有消息，1976 年我們才知道他被關在秦城。我們反復要求，要去看。終於說可以看，母親在外地（安徽）勞改，去不了。我們兄弟四人約好，老婆孩子十幾口人，浩浩蕩蕩到了秦城。父親不見，不是監獄不讓見，而是父親

不見我們。自從關進監獄，這麼多年了，父親從來沒有見過家人，他能不想見嗎？但父親說，我不能以這種身份見我的孩子，我要見你們，還我清白以後再見。我們既然千里迢迢來了，不見到父親我們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寫了一封信，懇求父親，說你可以不見兒子，應該見見兒媳婦，你都沒有見過，更沒有見過孫子。父親終於同意了。監獄看得特別嚴，不許照相，別人還有與父親在監獄拍的照片，我們沒有。但那次見面給我印象極深，我第一個進去，父親非常蒼老，說你不該給我寫這樣的信，摧毀了我的感情防線。以後我們又去探過父親幾次，每次半天。

1981 年，父親被安置在青島，生活一年半，我和三弟調過去照顧他。1983 年春節前發現肝癌，很快就報病危，大出血，4 月去世。

死時家裏連冰箱也沒有，只能到外面買些冰塊，把冰放在屍體上，等遠方的弟弟來最後見一面。我問過父親，一生中最好的領導是誰？當然是林彪。跟林彪打仗多，痛快！我打仗怎麼樣？有史可查，父親沒寫東西，不寫。他說人家相信嗎？寫什麼？關於九一三事件我都說了，我寫有什麼用？

父親臨終，我趴在他耳邊，說醫生要搶救你，你最後還有什麼話要說。父親只講了兩句，我沒有反毛主席，我沒有反黨。[27]

註釋：

[1] 採訪周宇馳妻子王聖蘭筆記，2003 年 12 月

[2] 參見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版，446 頁

[3] 採訪張清林筆記，1998 年 5 月 10 日

[4] 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415 頁

[5] 參見《李作鵬回憶錄》，未出版

[6] [8] 採訪李作鵬大兒子李冰天筆記，2000 年 12 月 20 日

[7]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特檢字第一號，載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 1982 年版，34 頁

[9] 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

[10] 煤炭工業部部長，被毛澤東和江青點過名，“文革”中惟一被打死的部長級幹部

[11] [13] [16] [26] 採訪邱會作大兒子邱路光筆記，2004 年 8 月 20 日

[12] [14] 採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 年 11 月 16 日

[15] [17] [22] [27] 採訪黃永勝大兒子黃春光筆記，2000 年 9

月1日

[18] [19] [20] [21] 採訪黃永勝警衛秘書費四金筆記，2004年9月22日

[23] 採訪空軍作戰部長魯珉筆記1997年8月17日

[24] [25]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載熊華源、安建設編《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140、219-227頁；採訪吳法憲大兒子吳新潮筆記2006年1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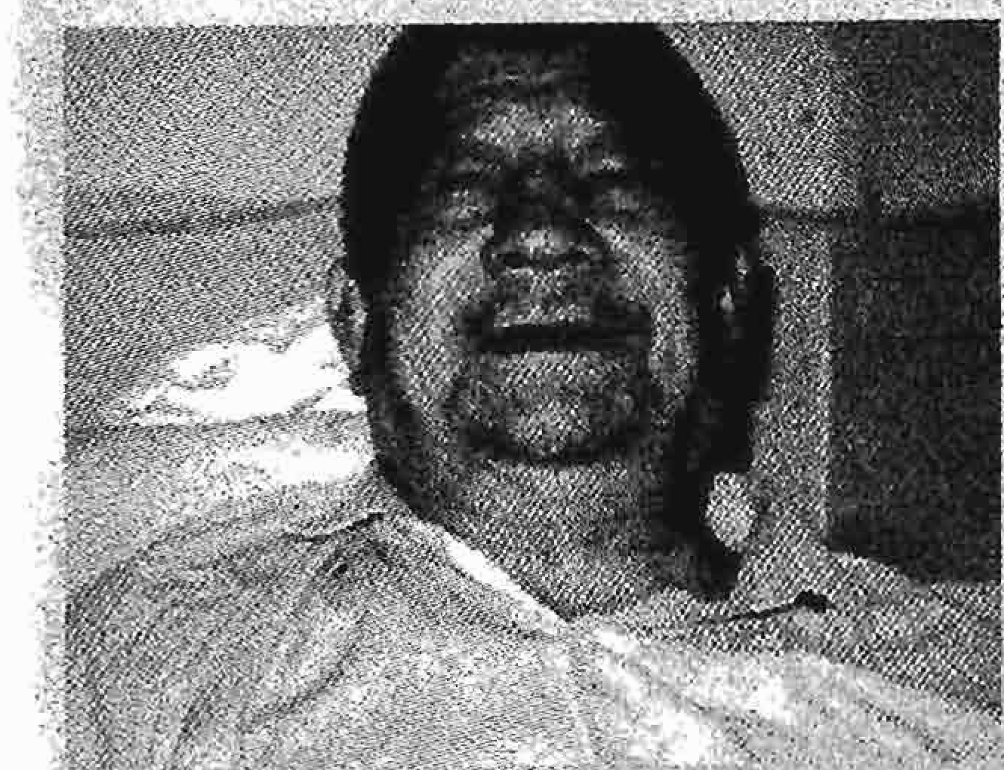
胡萍，第一任專機師師長（從1952年一直到1969年8月），由時念堂接任。雖然他提升為空軍副參謀長，但仍擔任專機駕駛任務。

胡萍家屬提供，攝於50年代



專機師政委馬蘭藻，任期僅一年多（1971年5月至1972年8月）。

時念堂提供



空軍專機師參謀長龍振泉，已經去世，拍攝時他已經高位截癱。

舒雲攝於1997年7月，北京空軍學院



潘景寅和妻子孫祥凝

孫祥凝提供，攝於50年代



這是我在內蒙古界碑前，背後就是蒙古的土地了。

舒雲提供，攝於1992年，內蒙東烏旗邊防



走下專機，周恩來向飛行員時念堂表示感謝。

時念堂提供，攝於1964年12月







專機師第二任師長時念堂。

時念堂提供，攝於1963年



空軍專機師師長時念堂。

舒雲攝影，攝於1997年7月，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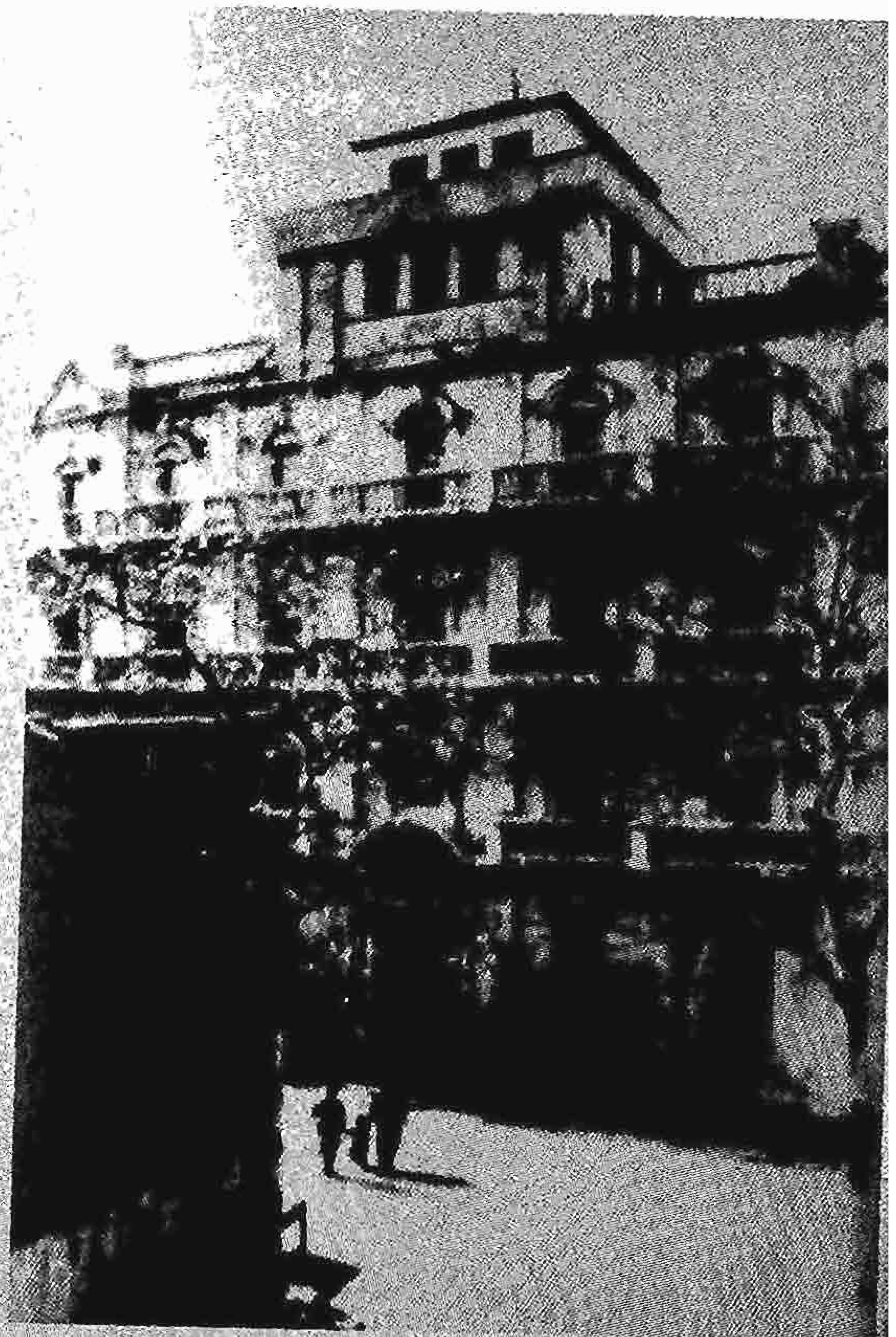
直升機飛行員陳修文被中央軍委授予“忠誠戰士”的光榮稱號。

時念堂提供



這是當年剛從法國引進的雲雀式直升機。周宇馳駕駛雲雀多次往返北戴河。

時念堂提供





西郊機場當年的候機室　時念堂提供

第十八章
西郊機場

吳法憲奉命查問三叉戟

9 月 12 日 23 點 30 分左右，時念堂已經睡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來電話：總理問三叉戟怎麼到山海關了？周恩來接到北戴河的報告，向吳法憲查問：知不知道有一架三叉戟去北戴河了？此時吳法憲在空軍大院，他很肯定地說沒有。周恩來又問：究竟有沒有？吳法憲更加肯定地說，絕對沒有。周恩來說，還是要查一查，吳法憲說好。放下周恩來的電話，吳法憲馬上查問，果然有一架三叉戟飛到了北戴河，他馬上打電話找專機師師長時念堂。

時念堂的心突然一沉，周總理怎麼親自過問專機的事情來了？曹副師長說過，準備執行林彪回北京過國慶日的任務，但還沒有具體派遣。他主管專機，三叉戟飛往北戴河，

他怎麼一點也不知道？可能是他剛從國外回來，還沒接師裏的工作吧？所以時念堂如實地說，報告司令員，我不知道這件事。

你們機場的專機，你怎麼不知道？飛機都飛走了！吳法憲急了。

時念堂說：我不能向司令員說假話，三叉戟的事我確實一點也不知道。

啪，吳法憲再沒說什麼，掛斷了電話。

你住在機場，飛機起飛，那麼大的聲音，怎麼沒聽見呢？這是因爲飛機起飛噪音很大，但噪音只對行進方向產生，而反方向幾乎完全聽不到。時念堂家住在機場東邊，飛機從南向北起飛，剛開始滑行時沒有聲音，等到了空中有了聲音，已經在機場北邊很遠了，所以時念堂沒有聽見。對於吳法憲的突然發問，他也沒敢多想，以爲只是關心中央首長的飛行安全，於是繼續睡覺。隔了幾分鐘，大約是 11 點 40 分，吳法憲第二次來電話，又問三叉戟究竟是怎麼飛到山海關的？這一回是質問，相當嚴肅。時念堂還是如實說不知道，但他感到問題有些嚴重，補充了一句：胡萍可能知道。

吳法憲氣哼哼地說：那好吧，我找他。[1]

因爲胡萍正在住院，所以吳法憲沒找他，其實胡萍此時正在候機室。

龍振泉（專機師參謀長）回憶：9 月 12 日快下班時，我在辦公室，潘景寅臨走對我說，我要出任務了，你別跟他們說。上面來查，你就說"訓練"飛行。我說誰來查？他說不知道。上邊有人查，你就別說別的，就說"訓練"。專機發"訓練"是經常的事，我也沒覺得奇怪。"訓練"我還可以掌握，專機是老曹的事。回到家我喝了兩盅酒就睡了。到了零點什麼時候，吳法憲來了，進來就問，潘景寅飛行幹什麼去了？我說"訓練"飛行，吳法憲大叫，啊？是"訓練"飛行嗎？潘景寅沒說是任務啊？我不清楚，本來調度室應該說，也沒跟我說，作戰科也沒說，我哪兒知道。吳法憲發脾氣，這你不知道，幹什麼吃的？馬蘭藻（專機師政委）來了，吳法憲問他，他聽說有專機任務，怎麼飛了？到哪裏？什麼任務？他也不知道。吳法憲又發脾氣，幹什麼吃的？都不知道，這個那個說一大頓。馬政委召集會，每人都表態，我就知道"訓練"，我沒說。胡萍在場，他也沒有表態。[2]

胡萍回憶：林彪住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飛機，那幾架專機都有準備。林彪"動"都是臨時，打個電話說走就走，坐飛機就像坐汽車一樣。可坐飛機哪裏是那麼簡單，弄不好出點事就嚴重了。九一三事件前一個星期吳法憲來電話，林彪那裏要動一動，作好準備。又過了兩天，李文普打電話，主任說這兩天準備走。到哪兒？說到青島或大連，或到廣州，沒個準兒。我說行，早瞭解情況早告訴我，我好準備。林立果也讓我爲首長準備好飛機，這幾天要離開北戴河，要絕對保證首長的安全。從北京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還有文件，幾乎每天都有來往的飛機爲他們服務。飛機太頻繁，容易洩密，吳法憲不止一次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飛機都以訓練的名義。還說林彪在北戴河，你直接安排，注意保密，飛機呼

號臨時改變，就不要通過他了。具體以訓練的名義，這在專機內部都很平常，别的首長也這樣。我幹這角色，不是一天兩天，没上頭命令，我敢這麼幹？[3]

專機任務再保密，也不可能對有關人員保密。所有的飛行任務包括首長專機，訓練飛行，都有人經手登記，領導批准，一整套嚴密的程式，很容易查。

時念堂打電話問經管航行的幾個人，都說不知道。

一次專機飛行，居然驚動了周恩來，居然讓空軍司令員兩次來電話查問，這是從來没有過的事情。在一般情況下，周恩來不會命令空軍查林彪的專機，而且以前吳法憲也從來不過問專機。現在吳法憲爲什麼對三叉戟起飛如此強烈的不滿？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會這樣驚天動地？

面對這些反常現象，時念堂徹底糊塗了。

責任心使他不能再繼續睡了。雖然時念堂在沙河機場蹲點，又剛從阿爾巴尼亞飛行回來，並没有接師裏的工作，但他畢竟是師長。他讓總機要到三叉戟飛行員潘景寅家，潘景寅家屬平靜地說：老潘飛行去了。啊，原來是潘景寅飛走的三叉戟。十幾分鐘後，候機室來電話，吳司令員到候機室了，叫你馬上過去，時念堂摸黑騎車到了機場候機室。

候機室位於跑道的東側，是首長臨時休息的地方。前面是登機坪，樓上是氣象室和調度室，再上邊是塔台。這裏是機場的指揮中心，也是迎來送往的地方。

除吳法憲和空軍分管專機的副參謀長兼專機師黨委書記的胡萍外，師政委馬蘭藻、參謀長龍振泉都在。時念堂按

平常一樣，報告前先向吳法憲敬了一個禮。吳法憲的臉“吊”得老長，狠狠訓斥說，你當師長的，飛機都跑了，你還不知道，你幹什麼吃的？看吳法憲發這麼大的火，再說什麼也是多餘，時念堂只好沉默。[4]

周恩來說：三叉戟必須馬上回來，不准帶任何人回北京。

吳法憲馬上命令：給山海關打電話，命令飛機馬上飛回北京。

但是，潘景寅報告三叉戟的發動機出了點故障，不能回來。周恩來立即命令：飛機就停在那裏不准動，修好後馬上回來。

雖然西郊機場指揮所的一屋子人都六神無主，但就數吳法憲忙得不行，他不停地出出進進。這電話，那電話，搞得他胖胖的臉上大汗淋漓。看得出他是眞急了，心急如焚，如坐針氈，一會兒打電話，一會兒來回地走，完全是束手無策的樣子。後來電話一個“摞”著一個，越來越多，多得簡直像發生了世界大戰。[5]

龍振泉回憶：來回幾個電話，山海關飛機就起飛了，就亂了。吳法憲在小電話間又罵又嚷：媽的，說不能起飛，怎麼起飛了？一連說了好幾遍。在場的人都摸不到底細，誰也不敢說話。我心說，他起飛，我管不了。吳法憲罵了我，有事還得找我，我就忙起來了。[6]

潘景寅在去北戴河前吃了安眠藥

老潘走的那天，他的妻子孫祥凝永遠不會忘記。

1971 年 9 月 12 日，是個星期日。潘景寅剛出差回來，拿一疊報刊到辦公室去了。他愛學習，《紅旗》雜誌、《解放軍報》、《人民日報》不離身，只要有空就學習。潘景寅的大女兒潘鶯回憶：過個星期日，爸爸也不在家待著，嫌家裏吵，到辦公室看書練字。平時在家裏，不光爸爸不說，媽媽也很自覺，覺得部隊上都是秘密，自己也不是黨員，還是躲遠一點，爸爸拿回來放在桌上的一般文件她也不看一眼。[7]

因爲老潘難得在家裏過個星期日，孫祥凝和兩個女兒以及老舅高高興興包起餃子。鄰居給了半個瓜，潘景寅最愛吃瓜餡，孫祥凝拌了兩種餡，瓜餡捨不得給孩子吃，專門留給老潘。老潘是家裏的重點保護對象，就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老潘在家裏也沒感到有什麼困難，只要他一回家，孫祥凝就把最好的東西給他吃，說他吃空勤灶，在家也不能伙食差。每個月配發的二兩肉，以及飛行員待遇發的巧克力和水果，孫祥凝都捨不得給孩子們吃，全留到星期天給老潘，而她和孩子們吃大蘿蔔條子和紅薯。結婚沒幾年，老潘就吹氣式地胖起來。[8]

潘鶯回憶：爸爸最後從西郊機場走的這天，媽媽叫爸爸取糧票買糧食，爸爸就騎媽媽那輛女式自行車去了。下午，爸爸到理髮室理髮，他本想理完髮好好睡上一覺，沒想到突然有緊急任務。16 點，連著三個電話，都挺著急，說辦公室也沒有，潘副政委到哪裏去了呢？一會兒爸爸回來，瓜餡餃子還沒煮熟。來不及吃了，爸爸換上棕色皮鞋，又找舊布鞋，一扣，提著他裝著牙具、毛巾和拖鞋什麼的小黃皮箱就出了門。他不說到什麼地方，媽媽也不問。臨出門，爸爸說今晚可能回來。爸爸已經知道此行是去北戴河，北戴河在北京正東 279 公里。對飛機來說，太近了，飛一趟也就幾十分鐘。爸爸還說，如果 18 點不起飛，他就回來吃飯。19 點多，我們聽見飛機起飛的聲音。[9]

當天晚上潘景寅沒回來。孫祥凝仍覺得很正常，老潘是說可能回來，那也可能不回來。不回來就不回來吧。這一夜很平靜，第二天早上她和平常一樣去海澱醫院上班，走出機場營門，才發現一些不正常。怎麼機場裏人這麼少，而門口的崗哨卻又這麼多呢？[10]

安治樑（專機團政委）回憶：我對潘景寅印象很好，他當大隊長，我作爲保衛幹事負責審查他，不錯。後來他當團長，我當政委，我們搭檔了好長一段時間，一起商量工作，雙方印象都很好。這個人很正直，沒花花點子，很老實，很穩重。不怎麼說話，一說話就臉紅，聲音不大，軟軟的。9 月 12 日剛吃過晚飯，18 點多，山海關來電話調三叉戟。我剛回到北邊宿舍，又馬上返回機場。老潘對我說，老安，我剛吃了兩片安眠藥，本來想休息了，這勁兒還沒過。也不能怨老潘，因爲你不知道首長什麼時候用飛機，只能見縫插針抓緊休息。可是，飛行員在起飛前吃安眠藥，這可是飛行的大忌，開汽車都很危險，更不要說開飛機了。這個時候也不

可能換飛行員，我只能囑咐第一副駕駛陳聯炳關照一下。天黑下來，跑道燈亮了，我們在停機坪等著林立果，等了一個小時。我和潘景寅閒聊，他情緒正常，一點也不緊張。事後想，如果潘景寅知道內幕，他絕對不會吃安眠藥。[11]

9 月 11 日，機長潘景寅告訴機組有專機任務，留場待命。

康廷梓回憶：9 月 12 日大約 18 點 10 分左右，我剛打上飯，坐那還沒吃，飛行大隊值班員親自到空勤灶喊我，有緊急任務，準備起飛。康廷梓扔下飯碗，跑步到團會議室。[12]

潘景寅向 256 號機組下達命令，準備執行林彪專機的任務。

李成昌正和家人圍著桌子吃餃子。團副參謀長陳聯炳急急忙忙來了，連門也沒進，就說：老李，快走，有緊急任務。李成昌的愛人許君清也是領航員，忙問去哪兒？多長時間？陳副參謀長說：我什麼都不知道，說完就走了。不一會兒，穿著黃色飛行服的李成昌騎上自行車飛奔到大隊領航室，拿領航包。[13]

康廷梓回憶：機組就我一個人在空勤灶吃飯，他們快，我跑到大樓，李成昌已經來了，潘景寅還沒來。潘景寅一來就讓我們到外場值班室等著，輕車熟路。坐小麵包車一起到外場，檢查飛機，做飛行前的準備。這時加油車的油用完，才加了 15 噸，還要再派個油車。我說山海關機場的跑道不平，油多了有危險。陳聯炳也說，加了那麼多油幹什麼？15

噸就夠多了，平時飛機飛北戴河也就加 12 噸油，飛廣州才加 16 噸。潘景寅沒有再堅持，只是說，三叉戟二五六號的飛行任務要準備好，對“副統帥”的任務要保密，使用二五二飛機的代號。康廷梓提醒他，今天的飛行手續還沒有辦。潘景寅肯定地說，不辦了。因爲重要的專機任務保密很嚴，機組人員誰也沒有再說什麼。[14]

9 月 12 日 22 點左右，胡萍叫尚登峨到西郊機場，明天“二五二號”從山海關起飛到廣州，但航行局向外發佈航線發到西安，也可以多發幾條到其他地方的航線。聲東擊西，這在全國最重要的專機任務中司空見慣[15]。專機飛行一向神秘，“文革”前江青到上海，不但正常的任務派遣程式被取消，連飛行實施過程中飛行員進行起碼的空中通信聯絡也被限制，只准按下發話鍵，而不能講話，至於飛機上拉的是什麼人，飛行員根本不知道。[16]

19 點 40 分，二五六號三叉戟飛往北戴河，安全落地。

當它再從北戴河起飛，就一去不返了。

西郊機場以爲三叉戟要回北京

三叉戟強行起飛後，周恩來問空軍指揮所的調度員：用無線電向二五六號飛機呼叫，他們能不能聽到？調度員回答：能聽到。周恩來說，我要對潘景寅講話，請給我接上。調度員說：他開著機器，但不回答。周恩來說：那就請你呼叫，希望他們飛回來，不論北京東郊西郊機場和首都機場都

可以降落。調度員說：他不回答。[17]

吳法憲命令西郊機場呼叫潘景寅，告訴他只要回來，一切都好辦。

時念堂走進指揮所，通知有關人員打開所有的通信設備，同時叫標圖員開始標圖。

地球方向在航圖上被分爲360度，從正北方向順時針逐漸增加，山海關到北京基本上是正西方向。從二五六號三叉戟的航跡看，開始的航向是240多度，幾分鐘後，跟蹤雷達報告280度，這是從北戴河飛回北京的方向。時念堂以爲二五六號三叉戟要飛回北京，又命令外場保障人員迅速打開跑道燈及一切夜間降落的設備，導航台也打開，準備迎接飛機。

這時，專機師整個行動起來。

跑道燈打開了，塔台燈也打開了，機場燈火輝煌，外場指揮車和機場各崗位都按照保證接重要專機任務的規格各就各位。

北京距離山海關300公里，再有十多分鐘，三叉戟就該到了。

直到這時，時念堂還不知道飛機上坐著誰，也不知道二五六號三叉戟變成"二五二"號了。當然他更沒想到三叉戟會跑出國境線。

嗓子都喊劈了，喊啞了，時念堂的呼叫還是沒有回音。

飛機上無線電只要打開，肯定能聽見。但是卻連起碼的動靜也沒有。

秋天晴朗的夜空，靜得讓人心裏直發"毛"。平時音箱裏

總有很多聲音，有本場飛行，也有遠處不知什麼地方的飛機，凡共用一個頻道，在一定範圍内都能聽到。但這天晚上很奇怪，音箱裏没有一點聲音。

再呼叫，還沒有回答。

呼叫不到，吳法憲又罵。

大概飛行員潘景寅也不知道往哪裏飛。十幾分鐘後，零點46分，到唐山北邊遷安縣上空，三叉戟突然轉向340多度，航向多少？時念堂的心咚咚直跳，聽錯了？簡直不敢相信，那是通向西北的方向啊。眞奇怪，三叉戟是要上哪裏去呢？

把守空中防線，是空軍各部隊從組建起就非常重視的重大問題，這在平時飛行中，也是機組非常敏感的話題。難道是……叛逃？

有人猜是不是機組出了問題？

不可能！在我們空軍運輸機部隊中從未發生過這類事件。

時念堂不知道都有誰在飛機上，應該是潘景寅坐在機長的位置，陳聯炳是副駕駛。機長潘景寅和第一副駕駛陳聯炳都是航校七期的學員，飛了十幾年，時念堂同他們執行過多次專機任務，他們都是對黨忠誠的老戰士啊。

可是，確實是朝著蒙古的西部烏蘭巴托至蘇聯伊爾庫茨克的航線偏東一線飛行。[18]

胡萍回憶：三叉戟飛出去，我很奇怪，不是航線啊。我還在想，他出國幹什麼？肯定是雷達報錯了。

當二五六號三叉戟快飛到國境線時，周恩來問：飛機到什麼地方了？吳法憲回答：離中蒙邊境還有 100 多公里，高度 3000 米。我們的雷達大都是短程，只有傅英豪研製的 541 雷達能跟蹤出去，所以雷達掌握不連續。出國境後，我們的地面雷達還交替跟蹤了十幾分鐘，目標高度下降，判斷三叉戟想找地方迫降。

目標從雷達熒幕上消失，標圖沒有了。[19]

事後得知，三叉戟飛到溫都爾汗以南，下降到 2500 米，左右拐彎。

2 點 25 分，蒙古邊防部隊報告，飛行目標消失。

吳法憲向周恩來建議攔截

空軍指揮所裏，氣氛非常緊張。空軍司令部參謀長梁璞望著雷達熒光屏上的三叉戟亮點，說這架飛機飛行不一般，情況異常。李德生問，有什麼特點？梁璞說，第一，三叉戟沒在航線上，就像火車沒在軌道上，飛的不是國際航線，國際航線要轉華北，通過二連浩特。第二，方向朝北，馬上就要出國境到蒙古了；第三，飛的是低空，飛行高度只有 3000 米，耗油量比高空增加許多，但這也正是躲開夜航殲擊機的有效辦法。

梁璞也不知道飛機上都有什麼人，焦急地問怎麼辦？他建議打下來。梁璞和吳法憲幾次通話，並多次請示李德生，對三叉戟採取什麼措施？還可以打，殲擊師有值班飛機，如

果將其擊落還來得及。再拖延下去，附近機場的殲擊機就追不上了。事不宜遲，李德生請示周恩來，要不要派飛機攔截？周恩來回答：在你之前，吳法憲也請示過。[20]

1 點 12 分，二五六號三叉戟飛出國境前 38 分鐘，飛到赤峰附近，滿頭大汗的吳法憲打電話給周恩來，說三叉戟已經起飛半個多小時了，方向不對頭，即將從張家口一帶飛出河北，進入內蒙古，要不要攔截？並提出了攔截方案，建議唐山、遵化、張家口一帶的飛機起飛攔截。後來吳法憲解釋，我說攔截，不是打下來的意思，而是要截回來。

周恩來說不忙，這要請示主席。[21]

二五六號三叉戟在國內飛行了 90 多分鐘，攔截還是有條件的。

張耀祠回憶：二五六號三叉戟強行起飛後，周總理到主席住所作了簡要彙報，問怎麼辦？打不打？還在射程之內。主席說，這架飛機不能打，不能攔截。[22]

汪東興回憶：當時是吳法憲打來電話請示要不要派殲擊機攔截，我報告了主席和總理。要攔截下來，可不得了，會在全國造成不好的影響。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他要飛到哪裏去，做什麼事，攔截專機，我們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把這架專機放過去，這是毛主席的意見。主席說，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

周恩來讓我馬上向吳法憲傳達毛主席不要阻攔的指示。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訴吳法憲一句話，就是不要派飛

機阻攔，其他的話，我沒有告訴他。[23]

就這樣，空軍指揮所沒有採取任何打擊措施。

對林彪等人突然乘機逃走的意圖，周恩來當時還不清楚。事後他說驚險得很，但當時處理並不緊張，因爲他相信絕大多數群衆和幹部。1972 年 8 月 1 日、2 日，周恩來在接見回國述職的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人時說：當時也沒有想到林彪眞的要跑，也可能他上去轉一轉，又下來，所以不好開槍打他。甚至在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孫一先帶著墜機現場照片回北京彙報時，周恩來似乎還是不那麼確信。10 月 1 日下午，周恩來陪西哈努克親王遊園後到西郊機場，師長時念堂領他們到停機坪看眞正的三叉戟。周恩來拿出現場照片，問是不是專機師跑的那架三叉戟，時念堂肯定地說，是的。[24]

梁璞回憶：出境前，三叉戟在位於中蒙邊境的貝爾廟上空轉了一圈。[25]

這有些讓人想不通，好不容易到了國境，還不趕快逃，爲什麼還要轉上一圈？

張耀祠回憶：當時沒想到會摔在溫都爾汗，猜測三叉戟飛行員不想飛出去，也可能是油不夠了。[26]

1972 年 7 月 10 日，毛澤東會見法國外交部長舒曼，說這個林彪啊，他天天吹我，說我怎麼了不起，而實際呢，要殺我的頭。跟他鬥爭了幾十年，後來他變成了“親密戰友”、“副統帥”，結果廬山會議到去年，一年多他就呆不住了。誰也沒有趕他，誰也沒有料到他會跑，坐一架飛機就上天了。

[27]

毛澤東、周恩來、汪東興、張耀祠等都說不知道林彪要往哪裏跑。

眞不知道嗎？

淩晨 1 點 50 分，二五六號三叉戟終於從中蒙邊界 414 號界樁上空飛入蒙古境內，並逐漸降低高度。414 號界樁上空不是國際航線，平時見不到飛機，更看不到飛得如此之低的大飛機，正在野外守夜的知識青年吃驚極了，印象極深。

李德生到空軍指揮所五分鐘後，二五六號三叉戟飛出國境。[28]

9 月 13 日 8 點，空軍指揮所交班，李德生指示，一、昨晚的情況要絕對保密，不得隨意洩露；二、指揮所要加強戰備值班，值班人員要相對固定；三、全國的雷達部隊要加強主要方向上的警戒，發現情況立即上報；四、機關各部局立即清點人數，凡是下落不明者由各大部匯總報告；五、直升機由北京衛戍區負責處理，空軍暫不要管。[29]

註釋：

[1] [4] [5] [18] [21] [24] 採訪專機師師長時念堂筆記，2001 年 8 月 11 日

[2] [6] 採訪專機師參謀長龍振泉筆記，2000 年 8 月 20 日

[3] [19] 採訪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胡萍筆記，1996 年 11 月 16 日

[7] [9] 採訪二五六號三叉戟飛行員潘景寅大女兒潘鷺筆記，2005 年 4 月 29 日

[8] [10] 採訪二五六號三叉戟飛行員潘景寅妻子孫祥凝筆記，2000 年 1 月 7 日

[11] 採訪專機團政委安治樑筆記，2003 年 3 月 26 日

[12] [14] 採訪二五六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康廷梓筆記，2000 年 7 月 14 日

[13] 參見苗曉紅著《我是藍天的女兒》，藍天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版，156 頁

[15] 採訪空軍航行局局長尚登峨筆記，2000 年 7 月 14 日

[16] 採訪二五六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康廷梓筆記，2000 年 7 月 14 日

[17] [20] 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7 年版，420-421 頁

[22] [26] 採訪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筆記，2003 年 2 月 18 日

[23]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208-209 頁

[25] 採訪空軍司令部參謀長梁璞筆記，2001 年 9 月 12 日

[27] 漁歌子編撰《林彪"文化大革命"大事記》，載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1005 頁

[28] 採訪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王飛筆記，1998 年 4 月 2 日

[29] 採訪空軍作戰部參謀朱秉秀筆記，2000 年 8 月 16 日

第十九章
直升機飛回北京

毛澤東下命令打下直升機

專機師師長時念堂自從接了吳法憲的兩個電話，到了指揮所後，就沒再回家。當時指揮所人很多，時念堂又緊張又摸不到頭緒。這種時候，肯定是不能走的，不定什麼時候上邊就會找他，時念堂看看也沒有忙的地方，就和楊德中的秘書在小值班室坐著，東一句西一句地隨便聊天。

事態發展，越來越不可理解。[1]

淩晨3點15分，沙河機場起飛了一架3685號直升機。

朱秉秀回憶：三叉戟起飛後，空軍指揮所一直緊張，打不打？做備降準備，好多事做。忙完這一陣，空軍指揮所安靜下來了，曹里懷、梁璞和李德生剛有點閑，在低聲交談。3點22分，沙河機場報告，起飛了一架直升機。空軍指揮

所的空氣又緊張起來了。李德生急問，是什麼人？我立即打電話給航行調度室的值班參謀傅本理，得知是空軍黨辦副主任周宇馳、秘書處副處長于新野。梁璞說，他們都是林立果身邊的人。

李德生讓梁璞問沙河機場，沒有六個人聯合命令不准起飛，知不知道？

機場回答，是師長時念堂向203團傳達的。

爲什麼接到"禁空令"還讓飛機上天？

周宇馳出示了"林副主席的手令"，調度室就讓直升機起飛了。

梁璞問，什麼時候起飛的？

10分鐘以前。

爲什麼不馬上報告？

周（宇馳）副主任讓推遲報告。

梁璞不好再說什麼。[2]

開始吳法憲傳達的並不是"禁空令"，還能起飛，只是要由周恩來等六人共同簽字才能起飛，"禁空令"是三叉戟飛出國境線後的事情。時念堂接到"禁空令"，馬上到大值班室給作戰部門傳達，並通知了沙河機場。但是周宇馳讓直升機起飛10分鐘後再報告。

一接到沙河機場關於直升機起飛的報告，時念堂馬上說：不能叫它起飛，趕快叫它回來。打電話時，大值班室服務員李明在一邊站著，聽得很清楚。放下電話，時念堂看情況緊急，放下電話跑步到三樓調度室，因爲調度室有一部直

通沙河機場調度室的電話。時念堂問是有飛機起飛嗎？沙河機場調度室值班員小王說是，往西北方向飛了。有多遠？對方說 200 多米，時念堂馬上讓呼叫直升機回來。飛得太遠，呼不到了。時念堂讓他打一顆綠色信號彈。在機場，綠色信號彈是命令飛機著陸的信號。直升機飛行員看見沒看見，不知道，最終直升機也沒有返回來。

時念堂無奈地跑下來報告吳法憲和楊德中。

大飛機跑了一架，就夠讓人火冒三丈的了，小飛機又跑了一架，吳法憲又大罵起來：這是怎麼搞的啊？接下來吳法憲和楊德中就回到小電話間去處理此事，時念堂就和楊德中的秘書在外面等著。[3]

李德生回憶：當時情況十分複雜，王輝球、曹里懷等空軍領導人都不知所措，一個個神色緊張地站在那裏。我也不便於向他們解釋，立即向周總理報告了這一新的情況。3 點 45 分，周總理來電話，說他已經請示了毛主席，一定要把直升機迫降下來，否則就打下來，無論如何不能讓它飛走。要在地面向每一個作戰飛行員講清楚。[4]

吳德回憶：周恩來對我說，林彪外逃了。雷達跟蹤到蒙古境內 200 多公里，飛機不見了。我說，怎麼不打下來？周總理說，打下來就說不清楚了。北京軍區要緊急備戰，另外有一架直升機從沙河機場起飛了，方向也是蒙古，準備迫降它。你們要把北京市郊區各縣民兵緊急動員起來，監視飛機的降落地點。要讓衛戍區派部隊控制北京郊區的幾個機場，防止再有飛機外逃。[5]

這回堅決命令打，直升機速度低，打也困難。[6]

殲擊機為什麼無功而返

這時，總空情圖板上顯示出直升機正在向張家口方向飛行。曹里懷、梁璞等報告李德生，擬組織張家口機場某夜航大隊的殲擊機攔截，內蒙古和河北楊村機場的部隊也做好準備。李德生把作戰方案報告周恩來。李德生向梁璞問了一些技術問題後，立即叫梁璞向北空司令員李際泰交代打直升機，命令張家口機場立即起飛八架殲擊機攔截。[7]

李德生從來沒有在空軍幹過，根本不懂，那麼多殲擊機，又是夜間，不是等著自己撞自己嗎？殲擊師領導問誰的命令？外行嘛。空軍參謀長梁璞火了：吳司令的命令。吳法憲的命令？指揮員心裏還打鼓，打直升機？直升機那時只有專機師有，半夜三更，打專機幹什麼？梁璞說直升機上有壞人，一定擊落。師值班員不能不考慮，究竟是什麼壞人。本來"六人"命令才能起飛，不長時間，吳法憲一個人命令就起飛了？"文革"以來有多少好人判刑、受處分。敵人明確好打，打中央的專機，打錯了，還得了？

這是有歷史教訓的。1955 年，南海上發現英國一架運輸機"霸王"號，以為是敵機，我們的兩架拉-11 輪番攻擊，把它打了下來。以後又向人家道歉，又賠人家多少萬，挺大數字的美元，兩個飛行員都被判了刑。毛澤東下的決心，飛行師長先撤職，後查辦。當時普遍進行了教育，航空兵部隊

都知道。現在突然命令打直升機，“文革”又那麼亂，梁璞傳達，又不是吳司令員親口說的，可不起飛又不行。按二級戰備的要求，打信號彈就開車，半分鐘起飛。而這回三四分鐘才起飛了一架，在機場上空爬高，“消極怠工”。周圍有山，撞山怎麼辦？撞電線怎麼辦？其實完全可以直接起飛，雷達引導就行。起飛半天了，標圖板上還在轉圈。梁璞火了：怎麼總在機場轉，還不出去？磨磨蹭蹭轉什麼？批評了以後，才飛出去。

因為直升機飛得太慢，主要起飛了殲五甲。夜航獨立大隊的作戰水平還是相當高的，頭一年剛擊落過一架敵機。雷達引導，準確向直升機飛去。殲五甲離直升機很近，航跡都重合了，就是報告沒發現目標。按常規條件應該發現，你沒法批評，飛行員就是沒發現，頂多是不主動。引導吧，汽油快燒完了，要返航。不讓回？不讓回，就摔了。回來吧，再起飛一批，兩架，還是沒有“收穫”。

飛行師解釋，直升機和殲擊機速度相差太大，加上從高空往下搜索，地面物體繁星一般都反映在飛機雷達上，又是夜間，直升機也沒有開夜航燈，所以沒有發現目標。[8]

天還沒亮，在首都機場值班室的值班首長張瑞靄，被一陣飛機聲驚醒。他走出室外，看空中殲擊機亂糟糟地穿梭。張瑞靄非常奇怪，按規定，從國際機場上空飛過要預報，可這麼多殲擊機來來往往為什麼一點也不知道，從哪裏來的？去哪裏的？要幹什麼？張瑞靄趕快跑到塔台，打開對空聯絡器，耳機裏全是“回來吧，只有飛回來，才是光明，才有出

路”的聲音。民航北京管理局的幾位領導也都陸續跑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9]

北京軍區作戰部值班參謀劉建林說：指揮所有情況，鬧不清眞假，上邊一般不說來龍去脈。圖板上看不出來，直升機在北京周圍盤旋，還是搞不清敵機我機，殲擊機上去迫降，敵機我機定不了，上邊講不能定性，敵我不能定性。實際上我們知道空軍有情況，特絕密，很久以後才知道。[10]

3 點 30 分，張家口地區某炮師接到軍區空軍命令，雷達開機，進入一等戰備。副師長問：怎麼沒有演習背景？

4 點，雷達發現直升機從張家口以北轉彎，有逐漸向德勝門方向飛行的趨勢。梁璞命令北京城防的高炮和探照燈進入戰鬥準備，決不能讓直升機飛進北京城區。這一著很必要，因為周宇馳發誓，要用直升機去撞天安門。李德生說：高炮射擊要避開高大樓房和古代建築，射擊方向要指向城外，無論如何不能把炮彈落到城裏來。

而下邊對此一無所知。

4 點 55 分，某炮團報：雷達發現“目標”，是否裝填炮彈？裝填！嚴密跟蹤敵機。敵機？不是演習嗎？什麼演習？這是打仗！你們作戰空域無我機，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命令打掉它！幾個炮營一片混亂，火炮不能連動，指揮員無法協調配合。4 點 59 分，目標進入某炮團的火力範圍，副師長下令可以射擊。但陣地火炮故障，指揮儀不能正確指揮，5 點零 3 分，“目標”飛出。

天馬上就亮了，為預防萬一，北京軍區空軍又命令張家

口、楊村機場各起飛了一批戰鬥機，進行空中搜索監視。[11]

劉振華（空軍作戰部領航參謀）報告：按直升機的續航時間計算，已經不可能再飛出國境了。至此，空軍指揮所的氣氛才有所緩和。[12]

直升機飛越清河後，突然轉向十三陵，盤旋開了。

天濛濛亮，時念堂從視窗看見一架直升機從頤和園的萬壽山上空飛來，直升機正往下滑，看樣子是要降落。時念堂判定是逃跑的那架，立即命令警衛連來一個全副武裝的加強排，到候機室。時念堂指著將要落地的直升機馬上命令：只要飛機一降落就包圍起來，勸他們投降，如果抵抗就擊斃。但注意不要傷害飛行員。好啦，準備吧。

直升機向下滑到距離機場一公里處，高度 20 多米，兩次著陸沒有成功，又拉起來往沙河方向飛去。時念堂立即打電話向沙河機場佈置了同一套方案，叫他們的警衛連立即出動，將下來的直升機上的人員全部抓起來。直升機在沙河那邊也試著落了兩次，還是沒落下來。時念堂及時向吳法憲作了報告。

直升機最終放棄著陸動作，向沙河以北的山裏飛去了。[13]

天亮，直升機主動在懷柔附近迫降。

直升機飛行員陳修文

周宇馳拿著“林彪手令”，但此時已經禁飛，只能到沙河

機場“碰碰運氣”。雖然他會開“雲雀”直升機，但“雲雀”小，不如“直五”飛得更遠。

淩晨 1 點 40 分，正在西郊機場待命的直升機三大隊副大隊長陳士印被從床上叫起來，拽進汽車。他問周宇馳：什麼任務這麼緊急？周宇馳說：去北戴河向林副主席彙報。小陳，這次我們帶的東西多，雲雀飛機裝不下，你得找一架“直五”直升機。陳士印說：我改裝“雲雀”後沒再飛過“直五”，有些操縱資料都記不清了，恐怕......

周宇馳晃著手上的紙片：這是林副主席的“手令”，你不能怕擔風險。

陳士印說：那我再找個技術好的飛行員，這樣更保險。

周宇馳打斷他的話：你當副駕駛。這次任務非常緊急，而且要特別保密，你只找一個機長，其他人不要驚動。

這事要不要跟胡（萍）副參謀長說一下？按規定間斷較長飛行必須經上級批准複飛。

周宇馳說：現在胡副參謀長被困住了，沒有辦法與他聯繫。我們馬上走，到沙河機場後，不要與別人講，抓緊時間找到飛行員就走。

陳士印說：我沒帶圖囊，怎麼辦？

沒關係，我給你準備好了。

2 點 30 分，周宇馳駕駛吉普車停在三大隊飛行員宿舍樓下，陳士印跑步去叫陳修文。大陳，有緊急任務。陳修文穿好衣服，抓起圖囊，就往外走。陳修文剛從家回來，主持開了半小時的中隊會，到大隊參加了幹部會，佈置了第二天

的工作。這是六人合住的宿舍，別人都不在，只有陳修文和陳國棟兩個人。陳修文出去後很快又回來，摸黑打開櫃子，拿了兩包香煙。陳國棟問：中隊長，什麼事？陳修文一邊往門外走，一邊說：小陳，起床後幫我把被子疊好。早上陳國棟給陳修文疊被子時，發現陳修文的手錶還在枕頭底下，床前地下扔著兩團從皮鞋裏掏出來的襯紙。[14]

陳修文，直升機團八中隊中隊長，1937 年生，安徽人。家裏很窮，祖輩四代種地主的地。在他出生後第二年，黃河花園口被炸開，家鄉成黃泛區。不久父親被國民黨拉夫拉走，靠母親要飯度日。1956 年陳修文參軍，1959 年被選上飛行員。在專機師，他是駕駛“直五”技術最好的飛行員。[15]

陳士印把中隊長陳修文叫起來，周宇馳打開車廂照明燈，讓陳修文看了手令，說有緊急情況，到北戴河，要絕對保密。

到了機場，陳修文給調度室陳主任打了個招呼。陳修文做完飛行前的例行檢查，和陳士印進了駕駛艙，周宇馳也進來了，坐在陳修文身後。汽車上另兩個人于新野和李偉信各自拎著兩個沉甸甸的大皮箱鑽進了客艙。

陳修文問陳士印：緊急任務到哪兒？陳士印說：北戴河，首長要去向林副主席彙報工作。陳修文啓動發動機，並習慣地打開超短波電台的電門，準備請求調度室放飛。周宇馳從後面伸過手來關上了，說任務十分機密，不許與地面聯絡，也不許打開機外燈光。陳修文不認識周宇馳，正在疑惑，陳士印說：大陳，這是空軍黨辦周主任，這次任務由他空中

指揮。

直升機起飛，進入正常爬升。周宇馳說：航向 320 度，高度 2600 米。陳修文又疑惑了：不是去北戴河嗎？怎麼 320 度？這是上張家口、包頭方向，陳士印首先質疑。

對的，周宇馳肯定地說。

陳修文說：我到底聽你們誰的？

周宇馳說：任務機密，不能直飛，你們不要多問，按我給的航向飛。周宇馳 1971 年 5 月住進沙河機場二號樓，專門學習駕駛從法國進口的輕型直升機“雲雀”。三個多月，飛了 66 個飛行日，75 場次，184 個小時，所以還算內行。

突然正前方出現兩架超低空飛行的殲擊機，陳修文明白了。趁周宇馳往外觀察時，他打開無線電，聽到地面呼叫：往回飛，周總理命令你們往回飛。陳修文馬上按下發話按鈕，說油料不夠了，要下去加油，請回答。周宇馳啪地關上開關，但張家口機場接收下了陳修文要往回飛的聲音。周宇馳惡狠狠地說：不能落地，落下去誰也別想活。國內有人要謀害林副主席，林副主席一家已經乘坐你們師的三叉戟飛到烏蘭巴托了，我們要去那裏與林副主席會合。“兩陳”都瞪大了眼睛。飛出去！周宇馳說：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不老實，就斃了你們！一支五四式手槍頂住了陳修文的後腰。

去烏蘭巴托？“兩陳”大吃一驚，這是專機師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所有空勤人員的航行資料包裹都不許有境外的任何資料，更沒有境外地圖。我有，周宇馳掏出 200 萬分之一的地圖，陳士印接過來，放在陳修文旁邊。地圖上有一條粗重

的紅線，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按周宇馳的要求，飛 2600 米高度，爬高到 3600 米。[16]

周宇馳和于新野自殺

這時，直升機在空中已經盤旋了三個多小時，天開始發亮，可以看見頭頂上有殲擊機飛來飛去。正巧有一架殲擊機從頭頂飛過，陳修文大聲喊：有殲擊機攻擊我們。周宇馳連忙向外張望，陳修文乘機將磁羅盤的指針撥轉 180 度，同時來回壓杆蹬舵，直升機時左時右，扭起了“秧歌”。周宇馳問：你為什麼左右轉彎？陳修文說：避開殲擊機，機動飛行，要不然會被打下來。平飛時，周宇馳看羅盤還是 320 度，就沒有再懷疑。空中任何動作都可能造成飛機失衡甚至墜機，周宇馳這時還不想死，所以沒有激烈動作。陳修文採用側滑與傾斜相結合的動作，轉彎半徑大，但坡度小，不容易感覺出來。

而實際上直升機已經朝北京方向飛了。

經過張家口、宣化，周宇馳看見密集的燈光，氣壞了：你怎麼飛回來了？你騙了我們，你也甭想活！快，飛回去，要不我斃了你。陳修文平靜地說：油不夠了，飛不出去。那就飛釣魚台，快，飛釣魚台！

陳士印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乘著天黑，他幫助陳修文把飛機從張家口方向弄回來。

陳修文幾次想降落都沒有降下來，到懷柔的沙峪，天已

經亮了。這是平原與山區的交界地帶，直升機在這裏搞過野外迫降，技術上有把握。

在懷柔沙峪的一塊空地盤旋了五圈，直升機準備落地。

周宇馳發現根本沒有飛出去，氣急敗壞地抓住陳士印的一隻胳膊。這時，離地面還有百八十米，陳修文側臉看了周宇馳一眼，周宇馳馬上一槍打中陳修文的心臟。陳修文連吭也沒吭，就一動不動歪倒了。

陳修文被定為烈士，中央軍委授予他“忠誠戰士”的榮譽稱號。

飛行大隊長陳士印僥倖沒被打死，他其實也是功臣。

直升機失去控制，馬上進入了螺旋。坐在副駕駛位置上的陳士印眼疾手快穩住飛機，退出螺旋，避免了直升機最危險的“尾衝”。陳士印大喊，為什麼要動槍？直升機一旦墜地就要起火，機上的大量材料就會被燒毀。他試探性地向正前方推駕駛杆，沒穩住，第三次緩解，尾部和右輪先接地，還好，沒側翻。但還是“三點”落地。正常情況，直升機只是兩個輪子著地，而這次迫降，尾部也接了地。

6 點 47 分，總算安全降落在一大片玉米地裏。

陳士印的雙肩被周宇馳死死按住，他迅速關閉發動機和放大開關。這時陳士印感覺窗外有人影，迅速向右前方側過頭，及時躲開。幾乎同時，于新野的槍響了。飛行員體檢時要求具備 180 度的視覺範圍，以及飛行訓練中熟練而全面的注意力分散，否則駕駛艙那麼小，距離又那麼近，根本躲不過這一槍。因為周宇馳的手還拽著陳士印的胳膊，所以子彈

穿過周宇馳的手腕，順陳士印的後背滑向腰部，打進他的夾克，將兩層工作服打穿四個洞，要是陳士印不躲，那子彈將穩穩地穿過他的心臟。

周宇馳手腕流著血，慌忙跳下飛機，血濺了陳士印一身。大概是以爲陳士印也被打中了，就沒再補一槍，跑了。很快民兵圍上來，帶走了陳士印。在民兵押送下，陳士印還給專機師打了個電話，彙報了情況。[17]

周宇馳、于新野、李偉信跳下飛機，往山上跑。聽見四周搜捕的民兵越來越近，商定自殺。周宇馳、于新野自殺身亡，李偉信放了空槍，跑到附近大隊自首，被押送了回來。[18]

9 月 13 日上午 10 點，警衛七團和當地民兵找到了迫降的直升機，繳獲了大批的機密文件、錄影資料、美元和黃金。吳忠指示：嚴密封鎖機降地域，保護好現場，將直升機上的物品和活著的人立即押送衛戍區，要保證路上絕對安全。當時有一支空軍小分隊也到達現場，說是奉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的命令搜尋直升機的。因爲吳忠不知道李德生是周總理派到空軍司令部去的，命令把這個空軍小分隊全部扣起來，槍也被收掉。

報告周恩來後，才知道發生了誤會。[19]

周恩來代理“軍委主席”

9 月 13 日 4、5 點，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的緊急會議，宣佈林彪叛逃事件，研究部署應付各種情況的措施。

周恩來代表毛澤東發佈了一系列調動軍隊的命令，直接控制全國的局勢。

他指定葉劍英處理善後及戰備事項，並讓他轉移到玉泉山 9 號樓待命應變。葉劍英連夜交代秘書準備軍用地圖和卡車，馬上搬家。周恩來還派李先念（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國務院副總理）、邱會作分別到京西賓館、海軍司令部和總後主持工作[20]。並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電報導，研究各種可能情況下的交涉和應對方案。並立即通知各主要新聞單位的負責人，確定近期有關的宣傳策略。周恩來說：如果林彪不摔下來，可能要到蘇聯發表廣播講話。所以還要嚴格保密。那時街上還有林副主席身體健康的大標語，周恩來特意囑咐不讓清理。

上午 9 點，周恩來吃了飯，約軍委和總參作戰部的有關人員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開會。作戰部參謀鋪開地圖，周恩來和大家共同分析，重點是應付國外勢力的入侵，並研究部署各種應變措施，調整部隊部署，首先確保黨和人民的安全。[21]

這一天，周恩來要電話比以往都多，也特別急。短短幾小時，他要了 20 多個電話，聲音都嘶啞了。淩晨 1 點，軍委一號台值班話務員劉淑英按周恩來的要求，幾分鐘內，把已經進入夢鄉的各大軍區司令員們都叫到保密機前，叫他們不要離開，說總理隨時要和你們講話。事後，一位軍委首

長對總機說：你們搞了一次大軍區司令員的"緊急集合"啊。

周恩來親自向 11 個大軍區和 29 個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通報，並要求從現在起，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各地空軍一律聽從大軍區司令員的指揮，關閉全國所有的機場，避免再有飛機外逃，或有人調動飛機來北京危害中央。總之要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

曾思玉（武漢軍區司令員）回憶：我剛入睡不久，電話就急促響起來。是周總理的聲音，你是曾思玉同志嗎？報告總理，我是曾思玉。廬山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你聽清楚了嗎？報告總理，我聽清楚了。你們立即進入指揮所，緊急備戰，你們少數同志知道就行了，封閉所有的機場，你聽懂了嗎？我聽懂了，堅決照辦。我馬上通知劉豐、李化民（副司令員）和唐皎（管作戰的副參謀長）。十多分鐘後，我到達指揮所，通知蕭前（武漢軍區空軍政委），關閉所有的機場，實行空禁，把拖拉機、汽車停在機場的跑道上。

張國華（成都軍區政委）放下周恩來的電話，要通了曾思玉的電話。張國華弄不清誰跑了，又不敢核實，猜是吳法憲，因爲廬山上吳法憲就陷進去了。曾思玉在電話裏也不敢說得太明白，不是那個"胖子"（吳法憲），是那個"瘦子"（林彪）。張國華大吃一驚，是他？！[22]

周恩來給各大軍區司令員佈置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葉劍英共同擬定了緊急戰備的命令，向全軍發出。

許世友第一個給周恩來回電話，他聲音很大：報告總理，我已經派參謀長帶部隊佔領了南京的全部機場，轄區內的其他機場也都同時出動部隊全部佔領。請總理放心，請毛主席放心。

丁盛也不甘落後，第二個向周恩來報告，一切就緒。他是忠於毛主席的，聽毛主席的，聽周總理的，周總理怎麼說，他怎麼辦。[23]

9 月 13 日 22 點 15 分，空軍司令部送來報告：18 點零 4 分，蒙古雷達團團長向所屬各連發報，從 18 點起進入一等戰備。周恩來立刻報告毛澤東，並就緊急戰備部署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附上空軍司令部的報告。信中說：現呈上政治局與總參共同擬定的緊急戰備指示，參加者有（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紀）登奎（李德生去空司指揮）及張才千、閻仲川、王新亭、彭紹輝、陳繼德五位副總長和我，請主席審批。現與各大軍區通電話幾次（如瀋陽、南京、廣州、武漢、昆明、成都），其他也都作了佈置，通了電話。江青參加了第一次會談，現已入睡。（李）先念、（華）國鋒、（李）作鵬、（邱）會作分別到京西賓館、海司、總後工作。附上兩張情報，値得一閱。也許三叉戟飛機逃出去眞燒死了，也許是敵人迷惑我們。[24]

衛士勸周恩來也休息一下，他答應了，坐在北小廳的沙發上，閉上了眼睛。十多分鐘後周恩來叫衛士進去，說睡不著，繼續翻閱文件，不時接到各方面的電話，但卻一直沒有林彪飛機的消息。9 月 14 日上午 11 點，連續工作了 50 多個小時的周恩來在衛士的一再勸說下，才吃了安眠藥，上床很快睡著了。[25]

14 點 20 分，外交部接到駐蒙古大使館關於三叉戟機毀人亡的報告。

總理秘書紀東說：總理按習慣要 4 個小時後才能醒來。

這麼重大的事情，還是要馬上報告。正在開會的外交部部長姬鵬飛立即要王海容當面向周恩來報告。

聽說蒙古大使館來了電報，周恩來連忙起床。

王海容來時，周總理正在衛生間漱口，他忙叫秘書紀東念給他聽。聽到機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時，周總理高興地說了一聲：啊，摔死了。他接過電報，來不及換睡衣拖鞋，馬上去人民大會堂 118 廳向毛主席報告。總理和毛主席談了很久，約下午 4 點多，總理才離開。[26]

汪東興回憶：總理對他說，得到一個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馬上報告毛主席？汪東興跑步過去，把這個消息報告了毛澤東。[27]

李德生在空軍指揮所說，毛澤東聽到三叉戟墜毀的消息，拍著手，高興地笑了。[28]

毛澤東高興地說，這是最理想的結果！[29]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想了一下，問這個消息可靠不可靠？為什麼一定要在空地上墜落下來？是不是沒油了？還是把機場看錯了？汪東興說，飛機到底是什麼情況，現在還不清楚，大使準備去實地勘察。目前還不知道飛機是什麼原因墜落下來的。[30]

9 月 14 日午夜，周恩來開始分批向中央機關、國務院各部委和軍隊系統的主要領導人通報林彪外逃事件，比較詳細地講述了事件的經過。囑咐他們要把握住本單位，緊緊地團結在毛主席周圍，制定防範措施，以應付可能發生的事情。電話一直持續到 15 日下午 4 點才打完，周恩來回到西花廳。

整整三天三夜，加上沙發上幾次小憩，73 歲的周恩來只睡了三個小時。[31]

警衛人員回憶：政治局全體成員集合在福建廳，由周恩來宣佈了這一消息，會場馬上一片輕鬆。周恩來說：要好好吃一頓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和中央政治局委員舉杯歡慶。[32]　還破例喝了茅台酒。

就是在如此高興的時候，周恩來卻突然放聲大哭。

在場的紀登奎不解，周恩來只是說：你不懂，你不懂！[33] 周恩來始終沒有說他為什麼在九一三事件後當衆大哭，令後人猜測不已。不過，周恩來自己的一個反常行動給這次大哭做了一個注腳。張瑞藹（周恩來專機的機長）回憶：10 月 10 日，九一三事件後周總理陪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乘專機由北京飛往上海。上飛機後，周總理反復問我，飛機檢查過了嗎？試飛過嗎？你們都是黨員嗎？飛越長江時，他怎麼也不放心，說不像長江，拿著地圖對了半天，才放心地點了點頭。我飛了這麼多年專機，頭一次見總理這麼謹小慎微，這麼多疑。[34]

故意繞開了總參謀部

吳德回憶：9 月 12 日下午從豐台火車站回來後，我到吳忠家談了很長時間，討論對毛主席提出的第十次路線鬥爭應該怎樣認識。雖然毛主席沒有點名，但提到“陳伯達後面”就很明白了。是不是應該將毛主席的談話先給市委常委或者市委書記吹吹風，以免將來問題出來了，大家沒有思想準備。可是一直到淩晨 1 點多，還沒有想好怎麼傳達，我說，今天恐怕議不出來妥善辦法了，明天再說吧。我回家吃了安眠藥睡了。[35]

吳忠回憶：我和吳德逐句回憶毛澤東的談話，研究每句話的含義。一直討論到 9 月 13 日淩晨 1 點多，也沒有想出傳達的好辦法。吳德回去睡覺。我剛躺下不久，淩晨 2 點半，電話突然響了。是作戰值班室的專線電話，我第一個反應，肯定出事了！秘書李維賽說，周總理要緊急召集北京市和北京衛戍區主要負責人開會。

不到 10 分鐘，我就坐車到了人民大會堂。吳德已經到了，我們倆人分手還不到一個半小時。人民大會堂的氣氛緊張異常，我問紀登奎，總理找我有什麼事？紀登奎指著東大廳旁的小房間，叫我去見總理。周總理正在隔壁給各大軍區司令員打電話，幾乎在喊，廬山會議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跑了，你還聽不懂嗎？吳忠和吳德都騰地站起來，這是真的嗎？吳忠看吳德的嘴張得大大的，一臉驚異，你聽清楚了嗎？總理說的是誰？是不是林

彪？就是林彪，周恩來走進來。吳忠後來說，總理臉色蒼白，神情冷峻，似乎忽然蒼老了許多。我到北京後，多次當面聆聽總理指示，可哪一次都不如這一次印象深刻。我從來沒有見到總理如此震驚、緊張。

周恩來對吳忠、吳德說：叫你們來，是要宣佈一件重大而嚴重的事件，林彪跑了！簡單介紹後，周恩來說：現在已經可以斷定，林彪出逃的目標是蘇聯。停頓一下，周恩來說：黨的副主席外逃，這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嚴重事件，國內外會有什麼反應？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現在還無法預料，毛主席和黨中央已經做好了應付最壞情況發生的準備。現在我宣佈毛主席、黨中央的決定，首都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由你們兩人具體負責執行，你們要對毛主席、黨中央負責，絕對保證毛主席、黨中央和首都的安全！吳德、吳忠同時站起：請毛主席、黨中央放心，我們決不辜負黨的信任。周恩來說：現在情況還不明朗，中央決定對林彪外逃事件要嚴格保密。北京市的範圍內，只限於你們兩人知道，不允許向任何人洩露。當務之急，是要確定首都緊急戰備狀態的實施方案。衛戍區馬上派部隊控制北京郊區的幾個機場，沒有中央命令，任何飛機不准起飛和降落。周恩來最後說：現在是非常時期，你們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從現在起，你們只對我負責，向我直接報告，在發生突然情況時，可以臨時處置，先斬後奏。

吳忠建議楊俊生也參加。周恩來問：他可以信任嗎？吳忠向中央保證：楊俊生絕對可以信任，他是衛戍區政委，有

他參加便於指揮部隊執行任務。吳德介紹楊的情況，衛戍區政委楊俊生 1968 年 9 月升任二炮司令員，到職不到一年，說他是二野的人，打發回衛戍區。周恩來表示同意，同時可以對他說明事件眞相。

接著周恩來佈置了幾項應急措施：(1) 監視和搜索外逃的直升機，要人機並獲，將情況直接報告中央。(2) 派衛戍區部隊封閉北京郊區幾個機場，沒有中央命令，任何飛機不准起飛和降落。沒有接到允許飛機起飛的命令，發現有飛機起飛，要將其擊落。(3) 立即查封林彪集團在北京的所有黑據點，並搜集罪證。(4) 衛戍區要加強對新華社、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等重要目標的警衛工作，對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等附近地區也要增派部隊，加強警衛。(5) 首都所有駐軍進入一級戰備，由衛戍區統一部署指揮，並部署北京地區防空降的作戰任務。[36]

9 月 13 日晨，北京衛戍區部隊全部各就各位。

陳先瑞（北京軍區政委）回憶：9 月 13 日淩晨 1 點 30 分，我被電話鈴聲驚醒。電話是李德生打來的。他說，老陳，請你立即來，周總理召開緊急會議。從他那不同尋常的語氣中，我預感到發生了大事。2 點多，我趕到人民大會堂。這時，只有周總理、李德生、紀登奎在場。周總理神情嚴峻地對我說，林彪跑了，現在情況不明，北京軍區立即進入緊急戰備。李德生司令員看看我說，你立即回軍區機關，把作戰、機要、通信部門和北空指揮所嚴格控制起來，沒有總理的命令，任何人都無權調動部隊。我站起來，對著周總理和李德

生說，堅決服從總理的命令。便轉身離開，趕緊驅車急馳軍區機關。這時天還沒亮，我讓作戰值班室立即通知軍區領導，馬上召開軍區常委會。會上，我傳達了周總理的批示和李德生司令員的意見，大家都表示在關鍵時刻，堅決聽從黨的指揮。[37]

當晚，根據中央指示，爲加強北京地區的戰備力量，北京軍區命令三十八軍的三個機械化師、坦克一師和炮兵六師等六個師開進北京，由北京衛戍區統一指揮，執行北京地區緊急戰備任務。這樣，加上北京衛戍區的四個師，衛戍北京的部隊就達到十個師了。

那時不知道還會再出什麼事，不知道還會不會再有飛機起飛，非常緊張。首長駐地增加崗哨，負責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的部隊，迅速隱蔽進入指定位置。重點防禦區域，北至南口，東到首都機場一帶，南達保定以北。並以最快速度部署北京地區的反空降部隊，迅速封閉東郊、西郊、南苑、沙河、良鄉五個機場和北京的周圍。

北京衛戍區按一級戰備的規格，作戰值班室配雙套幹部，各級主官在指揮位置待命。確保一聲令下，迅即出動。

吳忠向各機場負責人傳達中央指示，要求密切配合衛戍區部隊執行命令。

進駐機場的部隊，第一，封鎖機場各部位，控制塔台、機庫、油庫等重要目標。眞槍實彈對準跑道，如有飛機強行起飛，可以開槍開炮擊毀。第二，在機場跑道上設置木頭等障礙物，把大卡車橫在跑道上，禁止一切飛機起飛和著陸。

第三，將所有飛機的油料全部抽掉，增派武裝部隊，嚴密看守油庫。

9 月 13 日凌晨，衛戍區已經派部隊把西郊機場看管起來。停機坪周圍、跑道、機場大門都是陸軍和空軍雙崗，院子裏特別安靜，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儘是"綠褲子"。很多人都奇怪，爲什麼機場來了"綠褲子"（陸軍）站崗？平時都是"藍褲子"（空軍）呀！

當時不要說機場，就是空軍司令部大院，也被"綠褲子"接管。

這一系列的應急措施，實際上是內防政變，外防侵略，主要是怕蘇聯乘虛而入。像這樣重大的戰略部署，按照慣例，應該由軍委辦事組下達，而且周恩來在軍隊沒有職務，爲什麼周恩來直接下達命令呢？爲什麼周恩來不讓衛戍區向中央軍委、各總部請示報告呢？吳德、吳忠、楊俊生分析：黃吳李邱都是軍委辦事組的成員，他們和林彪是一夥的，雖然對他們還沒有採取措施，但不等於他們就沒有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衛戍區機關與軍委辦事組、各總部暫時保持距離，以確保衛戍區部隊置於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揮之下。吳忠通知衛戍區作戰值班室，只執行來自周恩來辦公室和他們三人下達的命令，對來自軍委辦事組、總部的所有電報、電話，只接聽，不回復。衛戍區的任何部署，一律不上報軍委和總部。

當時強調保密，下邊面對如此的反常，老有人問，很不好辦。爲了更好地執行任務，經周恩來同意，9 月 14 日，

衛戍區召開師以上的幹部會議，空軍司令部也在空軍大院召集了師以上的幹部會議，捅破了"窗戶紙"。[38]

與會者都大吃一驚，林彪是副統帥啊，怎麼說跑就跑了呢？

註釋：

[1] [3] [6] [13] [15] 採訪專機師師長時念堂筆記，2001 年 8 月 11 日

[2] [12] [28] 採訪空軍作戰部參謀朱秉秀筆記，2000 年 8 月 16 日

[4] [7] [18] 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422-424 頁

[5] 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1995 年 12 月版，138 頁

[8] [11] [24] 採訪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王飛筆記，1998 年 4 月 2 日

[9] [34] 張瑞藹《我爲總理飛專機，悠悠往事長相憶》，載程華編《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3 年版，497 頁

[10] 採訪北京軍區作戰部參謀劉建林筆記，2000 年 5 月 13 日

[14] [16] [17] 採訪二五六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康廷梓筆記，2000 年 7 月 14 日

[19] [29] [32] [36] [38] 參見曲愛國著《百戰將星吳忠少將》，2005 年 5 月第一版，383-384、372-378 頁

[20] 採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 年 11 月 16 日

[21] [23] [26] [31] 參見高振普《周總理在接到張耀祠報告之後》，載《中華兒女》2000 年第 4 期

[22] 李榮欣等著《名將曾思玉》，作家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519 頁

[25]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482 頁

[27] [30]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212 頁

[33] 參見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330 頁

[35] 參見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版，137-138 頁

[37] 參見《陳先瑞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461-462 頁

第四部

北戴河之夜

林彪爲什麼要跑？非常意外，墜毀更是蹊蹺。有人説林彪座機到了蒙蘇邊境，可是，怎麼卻墜毀在溫都爾汗？到目前爲止，九一三事件當事人的回憶雖然已經不少，但關鍵的東西還是缺失，未知數太多……





牆裏面是林彪在北戴河最後住的地方。

舒雲攝於2000年7月，北戴河聯峰山



林豆豆和“乾媽”王淑媛。

舒雲攝於1999年，北京



林豆豆陪我採訪專機師服務隊的女兵們。

舒雲提供，攝於1998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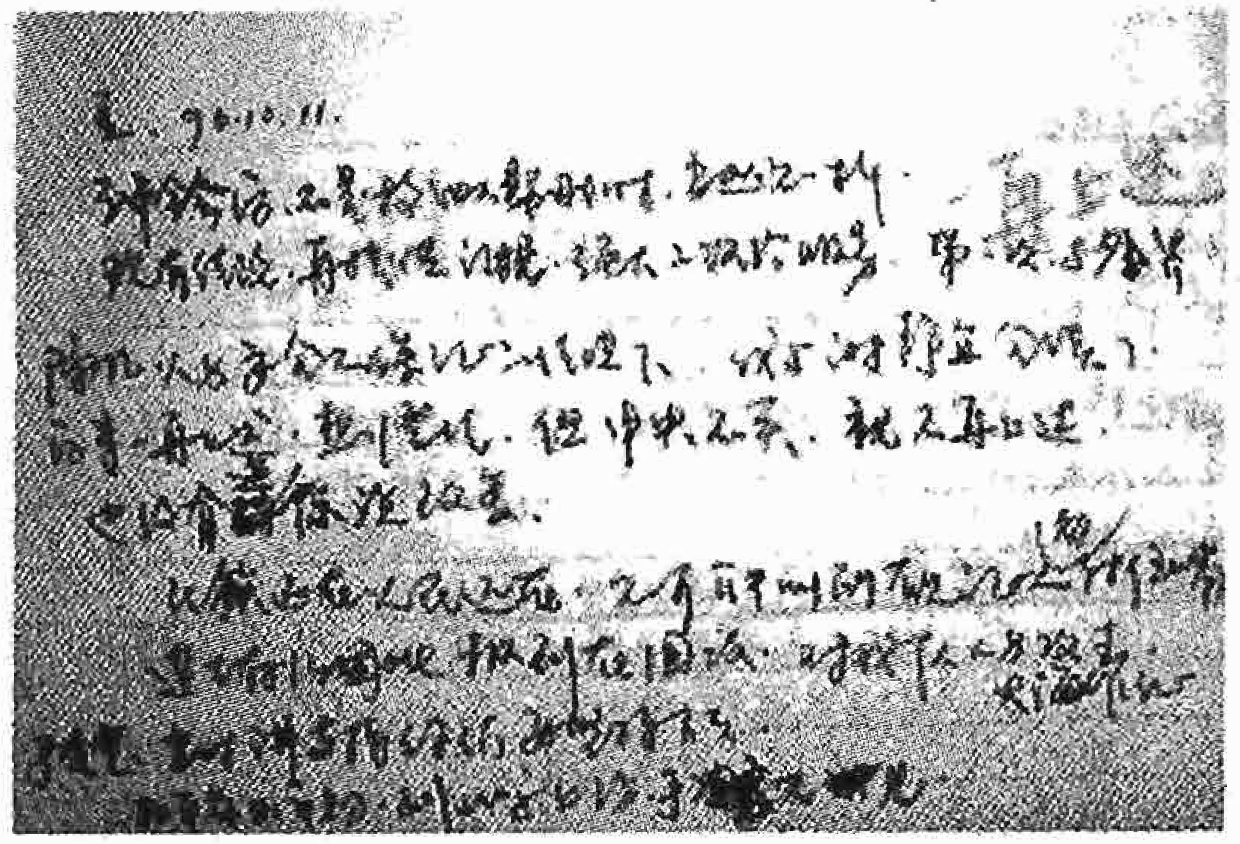


林欣然和林豆豆　舒雲攝於1999年，北京北極寺



林豆豆　舒雲攝於1999年，北京







採訪林豆豆的筆記。

舒雲攝影



林豆豆和“乾媽”王淑媛。　舒雲攝於2005年，北京



毛家灣警衛負責人劉吉純。　述中攝影

第二十章
林豆豆去了北戴河

林立果向姐姐露了底

9 月 6 日，林立果從北戴河給姐姐林豆豆打電話：你找了個對象，也不讓家裏見見。林豆豆表示身體不舒服，暫時不想去。林立果又說：爸爸病了，你一定要來看看。並讓她把在 301 醫院學習的張寧（林立果未婚妻）也帶來。[1]

張清林是黃永勝夫人項惠芳介紹給林豆豆的對象，為了不讓葉群無休止地挑選下去，林豆豆表示同意。張清林是湖南邵陽小鎮的農家子弟，廣州軍區總醫院外科醫生，高大帥氣，也很樸實。

9 月 7 日上午 10 點半，林彪秘書于運深送他們到西郊機場，乘專機到北戴河。[2]

一路上他們幾乎沒有說話。[3]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

個看似平常的旅行把他們捲進了險象環生的政治漩渦中。

距離北戴河西海灘兩公里，是北戴河的風景名勝聯峰山。林彪別墅坐落在聯峰山的夾溝裏，警衛編號 96 樓。這是一棟建造在山坡上的工字形青磚平房，十分隱蔽，也便於警衛。格局與毛家灣相似，林彪住在東邊，葉群住在西邊，中間的長廊是工作人員的辦公室。[4]

林豆豆他們三人被安排在距 96 樓 400 米的一幢黃色小樓裏，警衛編號 56 樓。林立果的 57 樓在 50 米外的小柏油路對面。

剛到北戴河，還沒有見到林彪，林豆豆就被迫不及待的林立果攔在中央警衛團二大隊的駐地 58 樓，用車接走了。

林豆豆問：為什麼叫我來？

林立果說：自從廬山會議後，一組（毛澤東）揪住主任（葉群）不放，幾次檢討通不過，現在趁首長（林彪）在北戴河休養，跑到南方打招呼，最終目的要打倒首長。首長身體差，又不肯服軟，劉少奇、彭德懷的例子擺在那。與其等死，不如拼一下。[5]

張清林回憶：主任（葉群）想跑到蘇聯，當寓公，寫回憶錄。這時，林立果和葉群還在醞釀，往哪裏走，去蘇聯？去香港？如何把林彪騙走？……[6]

既然要“走”，當然不能把林豆豆一個人留下，這是把林豆豆叫到北戴河的原因。

李文普回憶：11 點多，林豆豆他們剛到不久，林彪要見林豆豆。我到 57 樓，被劉沛豐擋在門口，不讓進，說林

立果和林豆豆在談話。我說是首長要見，才讓我進去。[7]

談了半個小時，林立果没有說服林豆豆，因林彪插了一杠子而打斷。

林豆豆回憶：午飯後又接著談，我才知道9月5日黃永勝已將毛主席的南巡講話告訴了主任，所以老虎（林立果）才打電話把我叫來商量。主任要跑，老虎不同意，提出“三個方案”，上策是謀殺毛澤東；中策是搞封建割據，到廣州另立政府；下策是逃往蘇聯。我三條都反對，我認爲哪兒也不要去，就待在北戴河最安全，我說父親能不能像朱老總那樣當甩手掌櫃。

老虎認爲做不到，說有人要害首長，老頭“猴”一樣，關不了三個月就得死。老虎說他手裏掌握著這個軍，那個軍，還說某某某是他的内線，可以裏應外合。對於老虎的話，我好多不相信，事後證明好多話都是假的。不過這時我明白了，老虎找我是叫我跟父親說，父親誰的話也不聽，有時我的話他還聽，所以叫我來勸他。我不讓老虎這麼幹，說別急，再想想辦法。因爲我没有思想準備，林立果的“攤牌”，使我大吃一驚，我馬上表示反對。没談兩句就暴露了意見分歧，老虎就不再對我講眞話，怕我萬一不同意，“捅”給首長。

當時老虎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從他神態和話裏也可以看出來。但他那種念頭和企圖已經很危險，所以我勸林立果留在北戴河。只要阻止他回北京活動，就是最安全最保險的辦法。最後老虎對我說，你裝作不知道，這件事主任不讓告訴你。

林立果感覺毛澤東要把林彪抛出來了，形勢非常不利。坐著等死不如主動出擊，說不定還有一線希望。他決定到北京看看形勢，實在不行就魚死網破。

林豆豆感覺林立果的念頭很危險，勸他千萬不要什麼事都聽主任的，她說話不準，又愛在首長面前說謊，頭腦不冷静，給首長造成錯覺。林立果根本聽不進去，林豆豆覺得弟弟當了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後，變化不小，與葉群越走越近。原來姐弟兩人關係很好，林立果無話不對姐姐說，共同抗衡葉群。但現在林立果在一些問題上對姐姐有了保留。林豆豆一直怕葉群把林立果帶壞，這樣林彪的日子就難過了。[8]

本來林立果馬上要坐送林豆豆來的那架專機回北京，因爲林豆豆的極力反對，這一天他暫時没走。林豆豆回憶：老虎說回北京看牙齒，我不太相信他的話，他後來學的和主任一樣，會說謊，虛虛實實。我很擔心他回北京會對首長有什麼不利的行動，可又阻止不了他，只得叫他看完牙齒早點回來。[9]

程洪珍在特別法庭上交代：9月7日下午，林立果在北戴河空軍療養院對我和陳倫和說，我們馬上返航，回北京……現在“艦隊”進入一等戰備……

張清林說，快把老虎和葉群抓起來

張清林回憶：豆豆再次與老虎談話之前，悄悄對我說，如果我出不來，你就去報告。所以，豆豆上去與老虎談話，

我就一直站在外面。

左等不來，右等不來，我急了，我知道老虎這時還不敢害豆豆，但可能軟禁。當時快 2 點了，我跑到 58 樓西南角，去找負責警衛豆豆的楊森（空軍保衛部副處長），說搞不好豆豆就出不來了，不報告不行。你叫姜作壽來，就說有事，別說什麼事。

負責警衛林彪的大隊長姜作壽來了，我們正說話，好像是林立果的黑車過來了，我們趕緊臥倒在路邊的沙坑裏，怕被他發現。等車過去，我們躲到樹林裏繼續說。[10]

劉吉純回憶：林豆豆她們來北戴河，是我派車去機場接的。吃過午飯後，我剛休息，楊森和張清林叫姜作壽來找我，說豆豆找你。我是 1971 年 7 月 16 日隨林彪一起到北戴河的，負責管理和組織八三四一部隊對林彪的警衛工作，李文普管內衛，我管外衛。我來到林豆豆住的 56 樓前，張清林著急地對我說，老虎把豆豆弄走了，不知道弄到哪裏去了。你趕快把葉群和老虎抓起來！我大吃一驚，說有什麼事？我敢抓他們？突如其來的事變，把我弄懵了。我說，哪兒會有這種事，不會吧？因爲我不知道前邊的事情，但看到張清林急得臉都白了，我一時不知所措，只好說，你們等著，我去看看。我馬上到林立果的房子外面看，注意到林立果的車子在院子裏，心想怎麼回事？我就去找林彪的警衛秘書李文普，他是當時在北戴河的負責人。李文普也在睡覺，我把他叫到外面。李文普不相信，怎麼會有這種事？你別聽他們的，沒有這回事。我不敢再問，但更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

1971 年夏，林彪、葉群及隨行工作人員從北京到北戴河，我的任務和平時一樣，協同警衛部隊把警衛安全工作做好。我是 1966 年初從總政保衛部到毛家灣的，本來我不想去，我在建國初曾在一位高級幹部家做過警衛，知道很不好幹。但是領導已經定了，我只好服從。林彪倒好“伺候”，主要是葉群，我小心再小心，還是被她訓過幾次。

所以我不敢再回去答覆他們，就回到自己房裏繼續睡覺。但再也睡不著了，想不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11]

劉吉純一去不回頭，張清林決定讓姜作壽再去看看。

張清林回憶：葉群哭著對我說過不止一次，豆豆精神受過刺激，不正常，你多關心點，有什麼事跟我說。我過去一直在下邊，一點也不瞭解上層鬥爭的複雜，生怕哪一句話說錯了。我琢磨怎麼跟姜作壽講，不敢說葉群，只說林立果。副統帥的兒子嘛，萬一沒有這樣的事，也不至於掉腦袋。最後我決定先不說別的，只是說，姜大隊長，麻煩你到 56 樓看一看，豆豆回來沒有？姜作壽很奇怪，你們自己怎麼不敢看？我說，我們想散散步。姜作壽說，那好，我去。一會兒，他回來說豆豆叫你們別在外面逛，都回去。[12]

劉吉純回憶：一下午沒事。當晚，林豆豆叫我到她屋裏，屋裏只有她一個人。她問我，他們給你講什麼了，又問你給別人講了沒有。我沒敢說已經對李文普講了，就說沒講，然後問她出了什麼事。林豆豆說，主任、老虎他們在外面做了壞事，被上面知道了，怕整他們，在北京待不住了，要劫持首長到外地去，你知不知道？我說不知道。那怎麼辦，是不

是去報告。向誰報告？只有向汪東興、張耀祠、楊德中他們。她馬上說，汪東興在廬山上也受了批評，也有問題……現在誰都不要給他們講。我想，北戴河什麼事也沒有，沒有什麼反常嘛，但我不敢再說什麼。林豆豆說，首長國慶日還要上天安門。我一聽，離國慶日還有 20 多天，再等幾天看看。最後我們商議，她在裏面，我在外面，觀察一下，再說。[13]

這樣，9 月 7 日就沒有報告。如果報了，不知道會出現什麼情況。[14]

張寧回憶：林立果沒來吃晚飯，說夜裏要游泳，姐姐（林豆豆）來了。我一下午沒見到她，她像生了一場大病，林豆豆只吃了幾口，卻像吃飯似的吞了一大把藥。我嚇了一跳，我自幼體弱，也是個藥簍子，可沒見過這麼吃藥的。我問她哪裏不舒服，她搖頭不語。是不是與張清林鬧彆扭了，可是看張清林也是一臉的猜疑。看來不是病，要不張清林早忙上了。多年以後，我和林豆豆劫後重逢，她才親口向我講述了 9 月 7 日下午的情況。[15]

9 月 8 日晚，老虎回北京看牙

9 月 8 日 19 點多，飯都準備好了，林立果沒吃，來到 56 樓，與林豆豆又單獨談了 20 多分鐘。葉群叫司機小慕按喇叭，又叫警衛員小徐來催，說是快 20 點了，飛機要起飛。林立果這才匆匆上車去機場。這次談話是林豆豆提出來的，並要求瞞著葉群。但林立果直到出發，葉群始終寸步不離，

他只好中途停車來見林豆豆。

林豆豆問：形勢眞的這麼糟？首長態度怎麼樣？他知道嗎？

林立果說：首長還不知道，事情沒考慮成熟前，不能跟他說。

林豆豆意識到事態嚴重，警告林立果：你可不能幫著主任騙首長！不經首長點頭，誰也不能輕舉妄動，你不要相信主任的話，惹出事來你也跑不掉，首長不會原諒你！

林立果說：依著你，那就坐著等死啊！我咽不下這口氣，一組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想整誰就整誰，別人不敢反，我就反！你就眼睜睜地看著首長挨整？！[16]

林豆豆還是想阻止林立果回北京。

但無論林豆豆怎麼說，林立果都不開口。不過神情上卻流露出一點點猶豫。

張清林回憶：我當時與楊森商量把老虎扣住，楊森不表態，就算了。[17]

李文普回憶：林立果突然去北京看牙，葉群對我說要瞞著林彪。晚上，林立果從北京打電話，說平安到達。我馬上報告林彪、葉群，林彪點頭說好。當時我感到林彪是知道的，葉群有意說假話騙我。[18]

在當時，林立果返回北京看牙是件平常的事，9 月 2 日林立果就回北京看過牙。只因爲他在北京策劃政變，才使他返回北京成了“政治”。而當時李文普不可能拿“政治”的眼光去想這件事。所以李文普的這段話非常矛盾，林立果看牙，

葉群爲什麼要瞞著林彪？既然葉群要瞞林彪，對李文普又有交代，李文普就不可能當著林彪的面對葉群說林立果平安到北京了，他敢違背葉群的意思？本來李文普和葉群的矛盾就很深，要是依著葉群的意思，早把李文普趕走了，只是林彪離不開李文普，葉群沒辦法。退一萬步說，就算李文普當著葉群和林彪的面說林立果返回北京看牙，林彪一向面無表情，誰能看出他知道還是不知道。就算林彪知道，又有什麼呢？他知道不知道林立果借看牙到北京搞“兩謀”呢？

劉吉純回憶：老虎走後，我和李文普趕緊去他房裏查看。屋裏空空的，只留下一把水果刀。林豆豆與我談了以後，我發現李文普有事老躲著我。林彪要去大連，李文普直接找姜作壽，沒有通過我。按說應該找我，我是警衛科長，我管部隊，由我跟部隊說。下午姜作壽來找我，說要加強警衛，還說李文普對他說，林豆豆精神不正常。[19]

林豆豆並不知道葉群背後的散佈，她擔心的是另外的問題。根據她以往的經驗，光是葉群一個人並不可怕，如果老虎和主任“團結”在一起，事情就嚴重了。[20]

註釋：

[1] [6] [10] [12] [14] [17] 採訪張清林筆記，1998 年 2 月 20 日

[2] 採訪林彪秘書于運深筆記，2005 年 10 月 25 日

[3] [5] [8] [15] [16] [20] 參見張寧著《自己寫自己》，作家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版，181、185-187 頁

[4] 採訪八三四一部隊大隊長姜作壽筆記，1997 年 10 月 20 日

[7] [18] 參見《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 年第 2 期

[9] 採訪林豆豆筆記，1999 年 10 月 11 日

[11] [13] [19] 採訪八三四一部隊警衛科長劉吉純筆記，1996 年 10 月 21 日

第二十一章
林彪別墅

9月12日晚，依然“歌舞昇平”

林豆豆剛到北戴河，就知道了葉群和林立果的計劃，但她没有向林彪報告。

本來林豆豆決定向八三四一部隊報告，但她很快又決定不報告，最好能在“林辦”工作人員中把問題解决。[1]

張清林回憶：豆豆爲什麼不和首長說呢？我責問，那就聽任首長的安全受到威脅？乾脆你去把情況向首長捅開。豆豆說，當時情況不明，光有想法，没有行動，和首長說了只能惹他生氣。他那種身體，再經不起刺激，準得大病一場。再說，只聽老虎說，口說無憑，對首長講了恐怕他不相信。如果他一氣之下，把主任和老虎找來，他們肯定不承認，反而是我挑撥離間了。而我們又不知道他們的下一步計劃，反

而讓主任有了防備，我們就更難掌握證據了。以後說話，首長也不會再相信我們。

來北戴河之前，豆豆跟我講了一些事，這時又講了好多事。9月7日中午，豆豆與老虎談完找我，說她是不同意跑的，但老虎就想把首長弄走。我說趕快和首長講。豆豆說不能講，現在没有證據。[2]

官偉勳回憶：林豆豆曾對我說，葉群嚴格限制她與林彪接近，以免她向林彪透露葉群封鎖他的、不想讓他知道的東西。林豆豆說，我想多給他講一點情況，開始還可以，後來越來越不行了。一是葉群限制得越來越嚴，再就是老虎知道了也不高興。所以我有時去北戴河，都不能在那裏多住。多住幾天，李某某他們就催我走，說再不走，老虎有意見。還有就是，你給他（林彪）講什麼，過一會兒他就忘了，忘得乾乾淨淨。有一次我告訴他一件事，囑咐他千萬不要和主任講。我剛走，他就忘了。忽然想起這件事，把主任叫來問是怎麼回事。主任一聽就知道是我講的，下來又是罵又是打，把我收拾了一頓。從那以後，我就更不敢給他（林彪）講什麼事了，他記不住。[3]

張清林回憶：豆豆說，眞要是有那麼回事，報告了，反過來他們會把她看起來，甚至害了，這在過去已經有過多次了。這樣以後就再没有機會，他們可能就跑成了。[4]

林豆豆回憶：我和張清林察看住地的地形。林彪的96樓在半山坡上，往下300米是我們的57樓和林立果的56樓，再往下是八三四一部隊的58樓。林彪的車往下走，必

經八三四一部隊的大門口，這使我比較放心了。[5]

9 月 9 日，林豆豆兩頓飯沒吃，又一夜未眠，與張清林、楊森商量，卻想不出好對策。[6]

宋德金（林彪秘書）回憶：大約 9 月 10 日，劉吉純悄悄告訴我，豆豆說，主任和老虎要"挾持"首長外逃，怎麼辦？我大吃一驚，這怎麼可能呢？或許是他們家庭內部鬧矛盾？[7]

9 月 10 日，林豆豆睡到 14 點，然後與張清林和張寧去山海關、秦皇島遊玩。張寧給林彪買了一隻小鳥，林豆豆給林彪買了一個機械兵。上足了發條，這個小兵就可以扛槍、匍匐，瞄準射擊，林彪笑得很開心。一看小兵不動了，拿起來左看右看，好奇地問怎麼動的？林豆豆蹲在林彪身邊上發條，小兵又活動起來，林彪彎下腰，很有興趣地看著。[8]

劉吉純回憶：9 月 10 日，我與林豆豆又碰了一次頭，我們都沒有發現新的情況，只聽說準備去大連。[9]

張清林回憶：從 9 月 9 日到 11 日，日落日出，我們一直在提心吊膽中度過的，老想著別發生什麼事。後來我想和楊森把林立果抓起來，捆到廁所，打個麻藥，把林彪救出來，跑回北京。還想了很多……我非常焦急，又建議向中央報告。豆豆認爲情況不明朗，向中央報告怎麼說？萬一老虎回來什麼動作也沒有，怎麼向中央解釋？怎麼向首長交代？豈不是成了"狼來了"？今後眞的再有什麼事，中央也不會再相信她的話了。

我提出四條防衛措施：

（一）調動警衛部隊砍樹攔車，防備他們突然出走；

（二）派人去機場破壞飛機；

（三）老虎一回來，借談話爲由先把他綁起來；

（四）等首長清晨出來轉車，把他救走。

四條都被豆豆否定，她認爲情況不明先行動，一定會遭到主任反撲，說不定會被扣上殺人、企圖謀害首長的罪名。最不利於自己一方的是沒有任何一個警衛敢這麼幹，雖然一個是母親，一個是弟弟，但職務上一個是政治局委員，一個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沒有證據，誰敢亂抓他們？搞不好所有的人都會認爲是我們謀反。

我問，首長有沒有可能知道老虎的想法？豆豆說，看樣子不知道，老虎跟我說連他自己都拿不定主意，不可能跟首長商量過。我在屋裏轉，歎口氣，現在的形勢，老虎最危險，主任最荒唐，首長最痛苦，你最難辦。豆豆沉默很久沒有說話。最後我們取得共識，由豆豆出面先找少數工作人員秘密打招呼，讓他們知道老虎和葉群對首長的安全造成威脅，要他們注意老虎回來後的動向，保護首長。

參加談話的有宋德金，李文普，劉吉純。

衆人十分震驚，紛紛問有什麼證據？這不是你們家庭鬧矛盾開玩笑。林豆豆強調主任說是去大連，不一定去大連，最好讓首長別動，哪裏都不去最保險。

衆人還是不理解，劉吉純問：首長和主任不去大連去哪裏？

這時候林豆豆還不能說得那麼明白。[10]

北戴河表面上平靜極了，善良的人們並不知道一場"大地震"即將發生。

一連緊張工作了三天，林豆豆太累了，到 9 月 11 日，她睡了一天。[11]

9 月 11 日凌晨，葉群接到林立果從北京打來的電話，情緒明顯反常。一上午，葉群焦慮不安，不停地來回走，一會兒拿起文件，一會兒放下文件又拿筆，一會兒放下筆又拿茶杯，好像丟了魂一般。[12]

林彪內勤說：9 月 12 日這一天，似乎沒看出林彪那裏有什麼反常。葉群不斷往林彪那裏去，有時嘀咕，有時站著一言不發，站一會兒就走，隔一會兒又來，不管葉群說話還是不說話，林彪始終不開口，甚至連眼睛也不睜。葉群呢，火燒屁股一般，20 點了，又要散步，又要打乒乓球。但沒打幾個回合，就突然沉下臉，說不打了，回去！誰也不理就走進門。葉群經常發無名火，身邊工作人員誰也不敢多問。[13]

9 月 12 日中午，林豆豆得知林立果晚上回北戴河，分析他一定有所動作。[14]

這一天的白天，林彪別墅還是"歌舞昇平"。

劉吉純回憶：9 月 12 日午飯後，葉群叫我去她的辦公室，李文普在那裏。葉群突然問我，現在部隊情況怎麼樣？我沒加思考，就說部隊很好，沒問題。葉群很嚴肅地看著我，說沒別的事，隨便問問。我說沒事我就走吧，起身離開她的辦公室。回來我考慮葉群爲什麼要問部隊情況，是否對部隊不放心。

下午我看到葉群叫工作人員爲林豆豆、張清林訂婚，並放風說要去大連。[15]

林豆豆回憶：17 點左右，主任在首長面前爲我訂婚。[16]

林立果"裝模作樣"地給姐姐帶來一束塑膠花。

那個大大的"陰謀"正在悄悄彌漫。

劉吉純回憶：接回林立果後，我一直沒有見到他和劉沛豐的面，我開始懷疑他們這次回來一定有別的事，根本不像是爲林豆豆訂婚回來的樣子。爲防意外，我沒有參加訂婚，正好碰到李文普，我說，他們可能走不了，要在這兒住，他們的房子準備好了沒有？我們倆就下去看林立果的房子。回到 96 樓的院子裏，坐了一會兒，我看李文普不說話，我就說，我看老虎這次回來有點不對勁，是不是要出事？李文普說，不會有什麼事，上了飛機再說吧。我說上了飛機就晚啦，工作人員中就咱倆有槍，爲防止出問題，是不是從部隊挑幾個戰士上去？李文普沒有表態。[17]

李文普爲什麼不相信林豆豆

林豆豆回憶：我從 9 月 7 日開始，分別找劉吉純、李文普、林彪身邊的兩個衛生員等人反復談話。你們要忠於首長，要保衛首長，發生任何事情都要對首長負責。其中找李文普談得最多，請他密切注意觀察情況，因爲他是關鍵人物。林辦工作人員都知道，林彪對李文普的信任超過對主任

和老虎的信任。有許多事情，林彪不對主任和老虎說，但對李文普說。

李文普開始不願意聽我說（他認爲我精神不正常嘛）。自從“文革”以來，我一直被他視爲給他們工作人員“捅漏子”、“闖大禍”的人。同時他和“林辦”工作人員一樣，雖然完全相信我決不是那種說假話的人，但不相信我從老虎那裏聽到的事情。後來他也感到事情不對頭，並對我說了主任和老虎瞞著林彪幹的一些事。我請他一定要組織好工作人員，準備好對付各種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注意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什麼藥，確保林彪的神志清楚和人身安全等。

9 月 12 日 21 點左右，主任讓許多人陪我和張清林在通往她住房的走廊看電影。應我的請求，幫助我掌握情況的林彪內勤張恒昌告訴我，他聽見主任說，去廣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小張始終沒聽到首長的任何聲音。接著我碰見老虎，便問他，他說馬上去廣州。

我知道在此之前，林彪一直對我們說，過幾天他帶我們去大連。[18]

9 月 12 日上午，林彪讓警衛秘書李文普收拾一下東西，還是說準備去大連。

而現在，怎麼變了呢？

內勤小陳進到林彪屋裏幾次，都被林立果趕了出來，他不得不拿著毛巾裝作擦廁所，通過一道走廊，從另外的門進去，貼著牆壁斷斷續續聽見幾句。[19]

林豆豆回憶：我又去問李文普。李文普說，主任叫我安

排明早 6 點去廣州，先不要通知八三四一部隊（過去他們到哪裏，都是事先報告總理，同時通知八三四一部隊領導人的）。首長只知道換個環境去廣州養病。

這時候，我發動和組織工作人員的工作，特別是對李文普這個關鍵人物的工作還沒有做到確實有把握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爲防萬一，便決定找八三四一部隊大隊部了，以此作爲第二手準備。因爲我通過瞭解，聽說長期守衛林彪和其他中央領導的駐北戴河的八三四一部隊並不知道什麼事情。過去葉群對我和工作人員說過，“九大”以後汪東興主動向林彪、葉群提出，要求李文普兼任八三四一部隊的副團長，林彪、葉群始終沒有同意。汪東興他們又說，以後李文普有權爲林彪的安全調動八三四一部隊。他們並爲此通過了決議。照過去的慣例，李文普當然有權調動正在守衛林彪安全的大隊部。

決定去找八三四一大隊部之前，我先和警衛科長劉吉純商議，由劉吉純把李文普叫到院子的僻靜處，我對李文普、劉吉純簡單地說了一下情況。

爲了證實我對林彪的瞭解，我再次問李文普，首長是否知道老虎對我說的事。

李文普說：首長哪裏會知道！我一直守在首長身邊，這我還不清楚？首長肯定不知道！

林豆豆說：既然如此，你能調動“大隊部”保證首長的安全嗎？

李文普說：這沒問題，我能保證。汪東興、張耀祠他們

原來要我兼任八三四一部隊的領導職務，他們黨委做出決議，規定我有權爲首長的安全調動八三四一部隊。

林豆豆強調說：我給你談了幾天了，要提高警惕，不要麻痺，要防止今晚出事。你能保證首長不被弄上車嗎？

李文普說：能保證，你放心就好了。

林豆豆還是不放心，你有把握嗎？

李文普說：這不成問題，我們有這麼多人。主任、老虎要跑，我們就是拼了，也不能讓首長被弄走。

林豆豆說：你跟八三四一部隊經常打交道，有工作關係，又很熟；我常年不在家，不認識他們。找八三四一部隊，我去不合適，還是你親自去調動大隊部吧，你有這個職權。

李文普卻不同意去報告。現在“林辦”與八三四一部隊的關係不太好，也還搞不清情況，要是沒有發生什麼事，那可不是一般的問題了，那可不得了！

林豆豆說：首長身體長期不好，你身體也不好，你辛辛苦苦，一直帶病堅持在首長身邊守護了20年。大家都知道，首長那樣信任你，你爲首長的病和他那樣被騙，掉了不少眼淚，吃了不少苦頭。你對首長是忠誠的。你對工作人員經常說要忠誠保護首長，現在是保衛首長安全的關鍵時刻，你要是沒負起責任，那你20年不都白守護了嗎？你平時口口聲聲要忠誠首長，到這時候，你怎麼又猶豫起來了？你過去幫助欺騙首長那麼多年，那也是不得已，怪不了你。你本質上還是同情和忠誠首長的。可是，我早就對你們說過，首長被騙，總有一天要被揭穿的。在這個時候，難道你還幫助騙首長？騙到底嗎？

林豆豆回憶：9月7日以後，我一再對李文普說這些話。

我還說，你再不去就晚了，你還等什麼時候？主任把你的女兒送到空軍當兵，你不要被主任“搞”過去了。你也許是怕，但你怕也沒有用！首長的安全如果出了事，你逃脫不了責任，因爲你是這裏的負責人。到時候，我看你怎麼向中央交代！你要跟著走，那你就是叛徒！你要是沒有保護好首長的安全，你就是沒走，也要爲一切嚴重後果承擔一切責任！

林豆豆與李文普談了不止一次，談得最深。李文普似乎已經被說服，他甚至還和林豆豆交換“情報”。[20]

李文普是怎麼想的呢？他感到非常突然。

李文普回憶：9月12日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緊張、思想鬥爭最激烈的一天。上午還在準備往大連去，沒想到下午，林豆豆突然對我說，老虎盡幹壞事，要害毛主席，他們要去廣州，萬一不行就讓首長去香港，你不能讓首長上飛機。

當時我不相信的原因有幾條，林彪讓我準備到大連，並沒有說到廣州。我知道林豆豆與葉群感情不好，林豆豆曾因爲對象問題以死抗爭，吃了一大瓶安眠藥，幸虧公務員王淑媛及時發現，送到301醫院搶救，才免於一死。林豆豆與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葉群到處散佈林豆豆有精神病，現在突然冒出這麼大個“陰謀”來，我嚇了一大跳，首先想這是林家母女又鬧矛盾了。長期在“林辦”，對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見得多了，也見怪不怪了。所以九一三事件前發生的諸多事情，我們都沒有很大的警惕。儘管我很吃驚，但心裏還是

没吃緊，因爲林豆豆不說任何證據，我當然不會很相信了。我有什麼理由不讓林彪上飛機？如果他要上，我能強行阻止嗎？不讓他上，能行嗎？[21]

可是據知情人說，林豆豆要向林彪報告，李文普不同意。

是李文普不同意林豆豆向林彪報告？還是李文普不同意林豆豆讓他向林彪報告？反正李文普不想去說。李文普認爲：這麼大的事，爲什麼你自己不去向林彪報告？只要林彪說句話，"林辦"工作人員都會聽林彪的指揮。你不敢向林彪查問，卻要我阻止首長上飛機，把責任推給我們這些不知底細的工作人員。我從來没有幹過這樣的事，負不起這個責任。

以前在杭州，毛家灣打電話說了一些林家的事，葉群要求"封鎖"林彪。林彪知道北京來電話就問，李文普按葉群的話回答，林彪發了大火，說我槍斃了你！後來知道是葉群搞鬼，林彪又向李文普道歉。但從此葉群對李文普恨之入骨。[22]

伴君如伴虎，從李文普的角度考慮，他不願意向林彪報告似乎是比較可信的。李文普 50 年代就是林彪副官，管行政和內勤。那時林彪要選個警衛班長，將來升成副官。跟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說了，從東北來的警衛團找，就找到了李文普。李文普也願意來，說光榮啊，當警衛班長，確實不錯。以後李文普調走了，新來的副官不太合適，林彪又叫李文普回來。在林彪眼中，李文普老實，不言不語。李文普這樣評價自己，文化不高，頭腦簡單，對高層鬥爭不大關心，整天爲林彪的衣食住行服務。但實際上李文普決不是"大老

粗"。調到林彪身邊前他是很好的副指導員。50 年代初能當上副指導員，肯定是有一定的文化。而且從以後的很多事情看，李文普很有心計，深得林彪的喜愛。所以，雖然葉群老想趕走李文普，但奈何不了林彪這塊"擋箭牌"。[23]

劉吉純保護林豆豆去報告

9 月 12 日晚上，李文普在值班室值班，林豆豆把他叫到小廁所，再次講了不能讓林彪上飛機。李文普心裏還是没有底。没有證據，我一個普通工作人員怎麼好不讓首長上飛機？[24]

劉吉純回憶：當晚 22 點半左右，林豆豆從裏面出來，看到李文普和我，把我們叫到屋後面，說是小張剛聽來的，他們要走，要到廣州去，到香港去。這不是要外逃嗎？我大吃一驚。林豆豆要趕快去報告。我叫李文普一起去，李文普不去，反復強調，問題是我搞不清楚呀！情況是你從林立果那聽來的，如果眞有什麼事，到時候還可以在飛機上採取措施，反正我們人多，我差不多對工作人員已經佈置好了。[25]

林豆豆回憶：我和在場的劉吉純都不同意"上飛機"。但我明白李文普是叫我自己去找八三四一部隊。我去大隊部，雖然没有李文普合適，但我要不挺身而出，他們就更不相信我對他們講的情況了。於是我斷然對李文普說，你不去，我去！李文普馬上表示贊同，說那好，你去吧！我在上面守著。

林豆豆問：現在負責警衛部隊的是誰？

李文普說：張宏，他負責北戴河整個地區中央首長的安全。他是老紅軍，職務是副團長，但是個軍級幹部。

林豆豆問：這個人怎麼樣？找他行不行？

李文普說：聽說還可以。

林豆豆問：他平常在哪裏？

李文普說：主要在大隊部。你見了張宏，就說我同意你去找他們的，是我派劉吉純陪你去的，叫張宏和我聯繫。李文普讓在場的劉吉純護送我，先找姜大隊長。他是這個地區的頭兒，比較精幹。然後再找張宏談。

李文普還專門交代劉吉純出面給張宏說一下情況。

林豆豆說：我找張宏談了以後，由你負責同他聯繫，因爲你有權代表首長調動和指揮部隊。

李文普說：那好，就這樣辦吧。

林豆豆說：叫張宏帶部隊上來，請他們出面阻攔。在部隊沒有上車之前，你無論如何要盡一切努力保證首長不被弄上車，不然就麻煩了！

李文普說：那當然嘍，我儘量拖延時間。司機老楊不知道什麼事，我已經給他佈置好了，他聽我的，這不成問題。

林豆豆說：你知道林立果、劉沛豐都會開車。

李文普說：這我知道。好，就按你說的辦，在張宏沒帶部隊上來之前，我一定保證首長不被弄上車。

林豆豆回憶：最後我又問李文普帶槍了沒有，李文普說沒有。我說，你們平時都經常帶槍，到這時候，爲什麼不帶槍了？李文普說，槍放在宿舍，馬上就帶。[26]

哪裏想到，李文普帶上槍，卻發生了本來很清楚卻至今沒有搞清的一個"謎"。

林豆豆回憶：將近 22 點，我和劉吉純跑到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部的外邊。劉吉純在大隊部和姜大隊長談了一會兒，陪著姜作壽出來見我。[27]

劉吉純回憶：我領著林豆豆順著黑森森的小路下去，來到八三四一部隊大隊部，我先把林豆豆安置在小樹林裏，我去聯繫。部隊已經休息，沒找到副團長張宏，看見大隊長姜作壽和衛生員小陸正在下象棋，我把姜作壽叫出來，說林豆豆有重要事情向中央報告，你快去。我把他帶進小樹林，我說你們談吧，我回去看看動靜。[28]

姜作壽回憶：林立果 9 月 8 日走時，葉群就關照，老虎他們回北京，誰也不准對外講。司機小寧把林立果和劉佩豐送到機場，回來對我說，一路上，林立果和劉佩豐不斷回頭望，好像怕有人釘梢。9 月 12 日晚上，林立果突然從北京回來，事先也沒有通知。22 點了，林彪住的 96 樓一反往常，仍是燈火通明。我們的五部警衛車，被他調走了四部，爲林豆豆訂婚出出進進。林彪的"大紅旗"和葉群的"卡迪拉克"都停在各自的門前，司機得到通知，不准離開自己的車，看來他們隨時準備出發。可是我這個負責警衛帶隊的人卻沒有得到通知。萬一首長行動，拉不出去怎麼辦？我打電話問李文普，是不是要行動？李文普說，現在沒有，有事會通知你。是不是給我們下來幾輛車？李文普拒絕了。

我覺得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緊張，決定上去"偵察"一番。

在 96 樓門前，林彪內勤小陳告訴我，劉沛豐把著門，連我也不讓進。平時小陳是隨時可以出入林彪的房間的。接著我又碰見林彪秘書宋德金，他有些不安地說，聽說明早 6 點走。我檢查了哨位後回到大隊部，已經是 22 點多，劉吉純領著林豆豆來了，說有要緊事。她看著屋裏的值班參謀，不再往下說。我把他們領到隔壁，林豆豆怕被人偷聽，最後我把他們領到小樹林裏。

林豆豆說，大事不好了，葉群、林立果要帶首長逃走，先到廣州，再到香港。我大吃一驚，卻不很相信，誰敢相信？出事前，沒有一點懷疑心。黨的副主席怎麼會跟著老婆孩子到香港呢？你說的這些可靠嗎？林豆豆說，可靠，葉群當面給我佈置的，她讓我馬上回樓準備，跟他們一塊走，我不能跟他們一起走啊。你看我該怎麼辦？我問，這事首長自己知道嗎？林豆豆說，他們騙他，他哪裏知道？[29]

林豆豆回憶：將近 22 點，我和劉吉純跑到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部的外邊。劉吉純在大隊部和姜大隊長談了一會兒，陪著姜作壽出來見我。

我去找大隊部，並不是我對汪東興、張耀祠等人抱有多大希望，只不過認爲必須經過組織程序，而當時只能經過八三四一部隊。同時，我們除了在黨中央和群衆面前把事情捅開，別無它路可走。1972 年 8 月 26 日，周總理對我們說，你們當時也只能那樣做了。

這是我第一次的報告和請求。爲了讓部隊採取措施，我首先明確說，是李文普叫我們來找的。按慣例，不用再說什麼，姜作壽馬上就會明白我的行動代表林彪。接著我說了林立果的意思和林彪內勤當晚告訴我的情況，以及李文普、劉吉純講的大量情況。我們一致認定林彪被騙，決不是要跑。

姜作壽似乎深知內情，說是呀，我們也看出來了，我們爲林副主席裏裏外外守衛這麼多年，也瞭解和聽到不少情況，他具體講了林彪被騙的一些事。

林豆豆說：今晚林立果回來，“林辦”誰也不知道，送林立果的飛機現在還停在機場。

姜作壽說：林立果回來我們知道，是“林辦”叫我們派車去接他的，但沒有接到，我們看見他坐車回來了。

林豆豆回憶：我對姜作壽說，李文普講林彪什麼也不知道，並具體講了李文普、劉吉純等都不同意她給林彪講。姜作壽馬上說，就是不要給林副主席講，我們都知道，林副主席身體不好，免得驚動他。這件事由我們來處理就行了。我說，我是提著腦袋來找你們的，你們相信不相信。你們要是不信，就問問他（指在場的劉吉純），問問李文普。姜作壽點頭說，我們相信，相信，劉科長已經給我們說過了，你放心，不要著急。[30]

副團長張宏的態度非常堅決

林豆豆回憶：到第二天早上 6 點，雖然還有一段時間，但要防止事情提前發生。我具體請求他們調動部隊，採取緊急措施，包圍 57 樓和 96 樓。不行的話，先把葉群、林立果

和劉沛豐扣起來再說。

張宏說，你放心，我們需要好好安排一下。反正一定會確保首長的安全，這一點你儘管放心。現在的問題，要馬上請示中央，向汪東興報告。

我不想讓他們向北京報告，向汪東興報告行嗎？但我最後還是表示由他們決定是否向汪東興報告。張宏說他向周總理報告。出於對總理的信賴和願望，我未加思索馬上表示同意。但我一想到周恩來一點也不知道毛澤東在南方和各省打招呼的事，擔心康生和江青他們對他設陷阱。我不能讓他們利用我的行動對總理發難，或者讓他們撈救命稻草，所以我當即說，北京現在不知道怎麼回事，你給總理報告，時間也來不及了。遠水不解近渴，你們是在這裏專門警衛的，你們要對黨和人民負責，絕對保護首長的安全。請求你們調動部隊，主動採取措施。張宏說，我還得向汪主任報告，他是我們的直接領導。汪主任會向上報告，我一邊報告，一邊採取具體措施就是了。[31]

姜作壽回憶：我提出要向北京的張耀祠和汪東興報告。林豆豆說，他們靠得住嗎？我說靠得住，他們都在毛主席那裏工作，我不向他們報告，向誰報告？林豆豆遲疑片刻，說那好吧，你趕快報告吧。[32]

林豆豆回憶：姜作壽讓我向主持北戴河警衛工作的副團長張宏報告。我又與張宏講了很多。我反復強調，你們能保證首長的安全，保證首長不被弄上車嗎？

張宏說：我們能保證，我們駐在這裏，就是這個任務嘛，

你放心好了。到時候，我們都到 96 樓停車的地方去，在旁邊守著就是了。這還不保險嗎？

林豆豆問：你們有多少兵力？

張宏說：這一片都是我們的部隊，有二中隊、四中隊、六中隊……還有機動部隊，我們還可以迅速從附近調部隊來。

林豆豆說：有多少汽車？

張宏說：我們有專門機動的小車隊和大車隊在這裏，隨時可以出動。

林豆豆說：這麼大的事，你可不能掉以輕心，光嘴上說說呀！你們一定要採取萬無一失的措施！

張宏說：我一邊請示報告，一邊調動部隊，採取措施。

林豆豆說：我的意見最好不要向北京報告，你應該主動承擔這個警衛責任。

林豆豆回憶：我還提到林立果說他在東山有個秘密機場，可以竊聽全國的電話和這裏通向北京的所有電話。這裏和北京只有一條專線，你和北京通電話，他會不會馬上知道？

張宏表示，嗨！什麼秘密機場，我們都知道那個的“土機場”，在我們警衛的範圍之內，我們經常看見他去。我們部隊的專線也完全可靠，經常和北京有聯繫。

我和李文普、劉吉純、楊森等都估計到我一找八三四一部隊，葉群、林立果很快就會知道，因而很可能把時間提前。出於這種估計，我對張宏說，要是事情提前發生，你們怎麼

辦？

張宏說：到時候我們就上去問問。我們是專門負責警衛的，比李處長、劉科長和你們去問還合適些。我們裝作不知道你講的事，上去問，這麼晚了，上哪裏去？這樣安全没保證，勸他們等我們佈置好安全工作再走。

林豆豆強調說：你們去問的時候，一定要有保證措施在後。

張宏說：這當然嘍，這我們比你懂，你放心好了。

林豆豆進一步問：葉群、林立果硬要馬上走，你們怎麼辦？

張宏說：爲了保證林副主席的安全，到時候對他們就不能那麼客氣了，我們就是拼命，也要保證林副主席的安全。

林豆豆說：你們要注意，林立果、劉沛豐身上都帶有手槍。

張宏說：我們到時候多帶幾個人，也帶上槍。

林豆豆說：他們都是好槍。

張宏說：我們的槍，更好！

爲了將來有利於弄清眞相，林豆豆愼重強調：儘量不要開槍就解决問題。開槍保證不了林副主席的安全，打傷打死了誰也不是小事，到時候幾個人對付一個人……

張宏做了一個非常熟練的反綁姿式，繼續說：從後面上去，兩個人把胳膊就這樣一架，就行啦！

林豆豆說：你們要多準備幾個措施。

張宏說：96 樓周圍好幾層，裏裏外外到處都是我們的部隊，路口都是我們的崗哨，你們不是見了幾步一崗嘛。我們再多派一些戰士去加強路口崗哨，每個崗哨都有電話，我們還有電台和步談機指揮嘛，有什麼情況，我們馬上就會掌握，立即指揮的。我們還準備派一些精幹的人上先行車先到機場，這樣，前面後面都是我們的部隊，你儘管放心好了。

林豆豆說：李處長交代我，叫你跟他聯繫。

張宏說：那好，我直接和他聯繫。

林豆豆回憶：我看張副團長態度這樣鮮明，並且考慮這樣周到，條件又這樣好，說得這樣有把握，就趕緊回來了。我感到比較放心了，但當我冷靜下來，想到十多年來黨内鬥爭的咄咄怪事，從根本上對依靠八三四一部隊，我還是不抱多大希望，還是要立足於我們自己解决問題，這是我們的第一手準備。對此我們信心十足，以爲很有把握。因爲“林辦”的工作人員都發動起來了，離明早 6 點還有近 8 個小時的時間來計劃和準備我們和工作人員的行動。[33]

註釋：

[1] [5] [16] [18] [30] [31] [33] 採訪林豆豆筆記，1999 年 10 月 11 日

[2] [4] [10] [11] [14] 採訪張清林筆記，1998 年 2 月 20 日

[3] 官偉勳《我所知道的葉群》，中國文學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版，172-173 頁

[6] [8] [12] [13] [19] 參見張寧著《自己寫自己》，作家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版，206、225-228、243 頁

[7] 參見宋德金《我在林彪辦公室的前前後後》，載《百年潮》2000 年第 9 期

[9] [15] [17] [25] [28] 採訪八三四一部隊警衛科長劉吉純筆記，1996 年 10 月 21 日

[20] [26] [27] 參見《林豆豆關於九一三事件的回憶》

[21] [23] [24] 參見《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 年第 2 期

[22] 採訪林彪秘書關光烈筆記，2000 年 9 月 9 日

[29] [32] 採訪八三四一部隊大隊長姜作壽筆記，1997 年 10 月 20 日

第二十二章
“大連”還是“蘇聯”

林彪突然説，夜航去大連

姜作壽回憶：張宏也給張耀祠打了電話，重復了一遍。張耀祠讓張宏報告林副主席，張宏拔腿要走，姜作壽阻止了他，說現在情況複雜，我們還不完全清楚。他老婆孩子騙他走，林立果和劉沛豐都在上邊，平日裏他家我們是不去的，這個時候去不好。

張宏還是堅持要一個人“深入虎穴”。

姜作壽說：你要去，我就不能不去，一旦你有了問題，部隊誰來管？

張宏說：胡鬧！讓他走不成，我帶兩個人把林立果和葉群抓起來。

不行。

你說怎麼辦？

聽上邊的，反正你不能去。你回不來，我去不去找你？我去了，也回不來，部隊怎麼辦？[1]

這樣，張宏就沒有去對林彪說。

1984 年張清林到河南開會，見到林彪的老秘書關光烈，對他說：林豆豆最佩服你，要是你在，不會發生九一三事件。

關光烈怎麼能有回天之力呢？非常簡單，直接跟林彪說就行了。而北戴河没有一個人敢這麼做。

如果張宏對林彪說了，二五六號三叉戟還會不會半夜“機”叫呢？

那些天林彪別墅裏不斷放出空氣：林彪要“動一動”，“要利用飛機運動運動”，“準備去大連”“國慶日前回北京”等等。宋德金回憶：9 月上旬，在部分工作人員中傳說要換住地。但究竟去哪裏，何時動身，在北戴河的人員是否全部隨行？始終没有聽到正式安排。有的內勤戰士對我說，聽說是去廣州，又聽說是去大連，因為戰士多是北方人，他們很想去大連。那幾天，我眞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做準備不是，不做準備也不是。1970 年上廬山，“林辦”分成三攤，毛家灣，北戴河，廬山，我並不是每次都隨行。過去就有過好幾次說走就走，也不知道上哪兒。因為我隨身帶了一大箱書和寫好的資料，臨時收拾來不及，早收起來，又怕葉群要聽課。“林辦”有規定，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聽的不聽，不該說的不說。没有隨行的通知，又不好問。[2]

劉吉純回憶：到了 21 點多，葉群從她屋裏打電話，是秘書李春生接的，正好我在那裏。聽葉群在電話裏叫我到大連去看房子。以前去大連，都是我打前站，我問怎麼去？葉群說坐火車。我一聽不對勁，坐火車第二天晚上才到，他們坐飛機一個小時就到了，我打什麼前站？我說夜裏没有到大連的火車，葉群也覺得說錯了，馬上改口，飛機場不是有一架小飛機嗎？我還是感覺不對頭，大連的房子，林彪多次住過，根本不用先去人準備，打個電話就行了。按說我不能說不去，但我還是說我不去。葉群說不去就算了。我當時想，叫我去看房子是假的，是想把我支開。事後想，幸虧我没去，如果眞的去了，那我的麻煩就大了，肯定會被押回北京。

大連是林彪常去的地方。中央首長到大連都住在棒槌島，靠海，林彪怕水，不能住。他住過黑石礁招待所，那裏房子小，空氣不好。後來葉群在大連看中副市長住過的兩層小樓，改建了一下，還改造了大連的游泳池。林彪一拉肚子，他就想去大連，說 1965 年在大連時，喝大連的水不拉肚子。林彪對水很敏感，水不好，他就要拉肚子。但葉群不願意讓林彪去大連，但又不能拒絕，只好派人去大連“打前站”。然後彙報假情況，說找醫生化驗了，那裏的水不好，醫生不讓喝，林彪只好打消了去大連的念頭。

這一次林彪又動了去大連的念頭，李文普也没多想什麼。他給大連市交際處打電話，要他們檢查一下房間，調控好林彪住房的溫度，並對其它注意事項提出了要求。同時，李文普收拾了林彪的東西。17 點 30 分左右，葉群對李文普

說：到大連的時間已定，明天早上 6、7 點走。這一回李文普也沒問大連的水能不能喝。[3]

林立果對林豆豆也說去大連。

林彪當時講：放假一塊兒休息，難得聚在一起。

葉群說：首長要到大連去住一段時間，把首長身體搞好，國慶還要上天安門講話，你們也陪首長去大連。

本來林豆豆不想去，後來還是決定一塊去大連。[4]

誰能分清“大連”還是“蘇聯”

9 月 12 日的夜裏，“林辦”的工作人員照例工作到 22 點多。吃完夜餐，正坐在外面聊天，忽然看見林彪的“大紅旗”開上了山。不一會兒，“大紅旗”衝下來了。工作人員還奇怪：什麼事這麼急？都半夜了，匆匆忙忙就走了？第二天警衛部隊包圍了小樓，吃飯被趕到了戰士的大灶，大家更奇怪了：怎麼了？這是幹什麼呢？

一直到這一天快結束的時候，“林辦”的工作人員還以為是去大連。[5]

林彪說去大連，葉群準備去廣州，為什麼卻摔在去蘇聯的半路上？

二五六號三叉戟從山海關起飛後，本意是想去大連？廣州？還是伊爾庫茨克？國內外猜測紛紛。

去大連是假，去廣州是真，“那一夥人”正商量第二天一大早南逃廣州，周恩來的電話打亂了他們的部署，葉群又找

不到黃永勝了，於是半夜就急著要“上天”。

是的，很多人都看見了，林彪是自己上的飛機呀。

確實，林彪是自己上的飛機，沒有人強迫，他也不可能被一個 51 歲的女人和 26 歲的毛孩子“綁架”。林彪最信任的警衛秘書李文普說：“林辦”都知道，林彪常因小事訓斥葉群，寫條子警告她“說話莫囉嗦，做事莫越權”。葉群在林彪面前出了不少壞主意，也經常說假話哄騙林彪，但是她也害怕林彪。林立果也一樣，大事都要由林彪拍板。據我長期觀察，林彪和葉群、葉群和林立果有矛盾，但為了各自的利益和欲望，在政治上又是一致的。如果沒有林彪的指使或點頭，葉群指揮不動林立果。

是這樣嗎？

“林辦”所有的工作人員都經歷過，葉群指揮他們騙林彪。有一次葉群去政治局開會，林彪找葉群，公務員王淑媛說了實話，林彪大發脾氣。葉群回來把王淑媛狠狠罵了一頓，威脅說要趕走她。像這樣的“騙”不計其數。[6]

葉群“動員”林彪去南方，林彪不去。

李文普回憶：我去問首長，首長說廣州太熱，不利於他治病，不去廣州了，還是說一定要去大連。主任問我廣州的房子有沒有冷氣設備，我說有。主任又去勸首長，說廣州住處有冷氣，不熱。首長便把我找去，對我說，去廣州也行。[7]

很顯然，不是“硬綁架”，而是“軟綁架”。林彪上了天，能搞清是“大連”還是“蘇聯”嗎？以前這樣的事情也發生

過。專機人員說：好幾次飛行都是瞞著林彪改變了航向。

1968 年，葉群"導演"了林彪上井岡山，從一個側面折射了九一三事件。

那是一個穿單衣的秋天，草蟲子亂叫，整個專機團傾巢出動，浩浩蕩蕩去了五架飛機。

爲了躲開江青的糾纏，林彪躲到北戴河。江青又要追到北戴河，林彪準備去太行山或五台山、井岡山等。李文普建議去井岡山，葉群說：程世清經常罵江青和"秀才"們，江青也在批江西搞"復舊"，南昌起義紀念館都是按中央文革的調子由"造反派"搞的，首長怎麼能去江西？於是葉群讓李文普安排去太行山或五台山或黃山，李文普安排不了，因爲林彪對住的房子非常挑剔。葉群說：井岡山會師紀念館把朱老總的名字恢復了，那去井岡山也行，但叫李文普不要安排去南昌。就在葉群聽說江青要到北戴河來的前一天晚上，林彪和葉群連夜"逃"離北戴河，臨時住在山海關機場。

葉群把去井岡山一事報告給周恩來，並專門交代吳法憲：一定要"封鎖"程世清。住宿也不經過南昌，都安排在機場。到井岡山後，也不要江西安排警衛。總之，不讓程世清插手。可是你興師動衆到了人家江西的地盤，怎麼能瞞住"地頭蛇"？第二天，林彪到達井岡山，程世清還是知道了，並到山上與林彪談了兩次。程世清越說越氣，大罵中央文革和"上海"。這正對林彪的胃口，葉群攔住程世清：首長身體不好，剛到山上，太疲勞了，大家請休息吧。第一次談了 10 分鐘左右，就把程世清"動員"走了。葉群對李文普、張雲生

說：程世清這個人盡給首長吹"右"風，不准他再來見首長，也不准林豆豆接觸他，並把當地的服務員全調開了。可是程世清還"賴"在山上，葉群只好對他說：首長來這裏只是休息，說不要影響你工作，你下山去吧。終於把程世清"趕"走了。

在山上住了半個月，葉群幾次催林彪回北戴河，林彪不肯下山。最後葉群只好讓工作人員集體對林彪說謊，才如願以償。離開井岡山時，葉群仍然對程世清保密，限 20 分鐘做好準備，突然離開。可是程世清還是來了，葉群奇怪地問：你怎麼知道的？程世清說：你不告訴我，我就不知道了？葉群說：首長自己要走。程世清不信，就自己"闖"進去見林彪。葉群讓林豆豆進去支開他，說首長要是聽他的，又該闖大禍了。程世清對林彪說：這裏空氣好，你就在這裏休養身體吧，你在北京老受江青和"秀才"們的氣，身體不會好，不要讓江青和"秀才"們"專"了你的"政"，也不要聽葉群的。如果你不在山上住，就去南昌看看吧。汪東興曾說毛主席到南昌沒有合適的房子住，叫修兩棟房子。林彪說：你不要給我搞這些，我是不會去住的。林彪反對在南昌給他修房子，但不等於不想去南昌。葉群怕林彪真要到南昌去，馬上進去說，南昌太熱了，我們不去，催促程世清快走。

林彪和葉群坐車下山，半路上被參加會議的幹部圍住。葉群當面對程世清說：這是你搞的"鬼"吧？葉群一邊說一邊下車，同幹部們打招呼。到了吉安機場，程世清又勸林彪：毛主席每次來江西都來南昌，你這次一定要來南昌看看。東

道主如此盛情，參加過南昌起義的林彪當然心癢癢了，立即叫李文普馬上通知去南昌。葉群“兇”李文普：你們的車爲什麼開那麼快？爲什麼不等我？李文普說：這不能怪我呀，首長對你大發脾氣，已經叫我通知機組，馬上去南昌，還說不要等你。葉群急得小聲說：可不能去南昌，重新通知機組改飛北戴河。

吉安有離井岡山最近的機場，這是個小機場，大飛機落不了，還要到樟樹機場換機。李文普和林豆豆都對葉群說：臨時改航線，還要瞭解氣象條件，不知道能不能飛呢。葉群顧不上那麼多了，對李文普說：快快快，來不及了，氣象不好也飛，對首長就說去南昌。

程世清和林彪上了同一架飛機，葉群硬把程世清拽下來，叫他上另一架飛機，先到南昌安排一下。這很合情理，程世清先起飛走了。林彪和葉群的飛機按葉群的旨意往北飛，林彪又“聾”又“瞎”，在機艙裏還問，什麼時候到南昌？因爲有葉群“監視”，林豆豆沒有辦法跟林彪說實話。飛了半天，林彪奇怪了：說怎麼南昌還沒到？

葉群這才實話實說：不去南昌了，我們回北戴河。

林彪火了：我已經通知去南昌，你爲什麼改飛北戴河？還是去南昌！

戰時的林彪說一不二，可現在是和平年代了，大權握在葉群手裏。

葉群說：我早安排去北戴河了，不好改了，來不及改了，這個機組什麼氣象都能飛。

林彪說：航線要改，還是去南昌！

葉群說：江青和“秀才”們正在江西批“復舊”，說程世清與“中央唱對台戲”，你不批轉江青的那篇大文章，江青恨死你了，現在正要抓你，他們有造反派到處監視你。你如果聽了程世清的話去南昌，江青知道你和程世清有來往，又要說你是“復舊”的總後台了。

林彪說：我見見軍隊幹部，光明正大，怕什麼？他們要監視，隨他們監視去。我是南昌起義出來的，難道連南昌都不能去了？

葉群說：你去了南昌，江青會說你手太長，向地方伸“黑手”，壓“造反派”，又該整你了。你現在身體這個樣，你鬥得過他們？

激烈的爭吵中，飛機繼續往北飛。林彪有什麼辦法，只好“乖乖地”到了北戴河。[8]

這一次從北戴河外逃蒙古是不是故伎重演呢？

風雲突變，馬上要走

劉吉純回憶：向八三四一部隊報告後，我害怕林豆豆出事，對姜作壽說，把豆豆留在你們這裏，別再上去了，我當即趕回 96 樓。北戴河每天晚上 22 點都要吃夜餐，我没去，守在門口。我心情很緊張，也没有對別人講，一個人焦急等待上面有什麼指示，眞不知道怎麼辦。雖然 1970 年廬山會議我在山上，但我們警衛人員只看到陳伯達不參加會議，認

爲他可能出了問題，別的情況都不清楚。又怕報告錯了要殺頭，所以心情很緊張，一直坐在院子裏不敢動。[9]

林豆豆回憶：我放心不下，還是回到 96 樓，坐到葉群給我安排的看電影的位置，把找八三四一部隊的情況小聲告訴了張清林。22 點 30 分，我問李文普，他說首長睡了。我說現在應該和首長講了。李文普說不行，首長吃安眠藥睡了。正在這時，葉群的內勤叫我馬上去見葉群。臨走我對張清林和楊森說，你們拼死也不能讓首長被弄走。看見他們點頭，我才去葉群那裏。葉群對我說，你和張清林、張寧，準備明早 6 點去廣州。

我又回到座位上，同張清林商量六七個小時內的行動方案，並叫張清林繼續應付老虎來找我。我馬上把李文普和劉吉純叫到院子裏商談。

林豆豆首先問：你們帶槍了沒有？

他們說帶了。

林豆豆說：給我看看！我摸了摸他們的手槍，然後說，首長現在怎麼樣？

李文普說：首長什麼也不知道，同平常一樣，到 23 點就睡覺了。

林豆豆問：對工作人員的工作做得怎麼樣？

李文普說：正在給他們談，他們都知道了，我們有這麼多人，沒問題！[10]

張恒昌（林彪內勤）回憶：約 22 點 30 分，我和陳佔照商量，準備讓林彪休息。這時葉群來到林彪客廳，同林彪說

話。陳佔照先去吃夜餐，準備吃完夜餐再讓林彪休息。等陳佔照回來後我去吃夜餐，還沒吃完，陳佔照打電話讓我馬上回去，這時大約 23 點 30 分。林彪叫我通知葉群，空軍療養院的兩個護士（在 96 樓照顧林彪）不帶了，讓人把她們送回去。我去告訴葉群，她和林立果在屋子裏說話，劉沛豐守在門口，地上放著幾個皮包。劉沛豐攔住我，不讓我進去。我把林彪的話寫在紙條上，讓劉沛豐轉告。然後我回到內勤值班室，陳佔照說，首長馬上要走，叫趕快收拾東西。陳佔照要我報告林豆豆，我找了一會兒，沒找到。大約 23 點 40 分到 50 分左右，葉群、林立果，還有劉沛豐，一起到林彪客廳。劉沛豐手裏提著三四個皮包。[11]

陳佔照（林彪內勤）回憶：23 點左右，林彪打鈴，我到了客廳，林彪要找小張，我去叫張恒昌。不一會兒，小張從林彪客廳出來，告訴我，林彪馬上要走，要我去告訴葉群，走的時候不要帶空軍療養院的兩個護士。23 點 50 分左右，林立果、葉群、劉沛豐一起到林彪客廳。過了一會兒，葉群和林立果走出來。林彪又打鈴，對我說馬上夜航去大連，不休息了，有些東西可以不帶，夠用就行了。到大連住一個星期就回來，回北京過國慶日。這時，劉沛豐站在客廳門口，一言不發，我還看到沙發上放著三四個黑色手提包。[12]

李文普回憶：大約 23 點以後，葉群叫我到林彪臥室，她先進去跟林彪說了幾句話，然後叫我進去。這時，林彪早已從床上起來穿好衣服，說今晚反正也睡不著了，準備馬上夜航到大連去，到大連一個星期就回來，有些東西可以不帶

了。你準備一下，現在就走。我說要了飛機再走。葉群說，一會兒吳法憲坐飛機來，我們就用那架飛機。我們可以先走，到機場休息室等吳法憲。[13]

李文普認爲葉群騙人。實際上葉群沒有騙。周恩來要到北戴河，她認爲吳法憲會陪著一起來。葉群跟著李文普出來，催他快調車，越快越好，說有人要來抓首長，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林立果也對李文普說，快點吧，有人要來抓首長，什麼東西也別帶了！

林豆豆回憶：在我們找八三四一部隊一個小時後，葉群突然出現在銀幕下，大叫停放電影。葉群的內勤對李文普說，主任找你，叫你馬上去。李文普從葉群處回來後對我說，主任叫我馬上安排去廣州。正在這時，楊森對我說，張清林叫我來找你，可能是因爲主任要找你，叫馬上走。情況突變，我們措手不及，連說幾句話商量一下的時間也沒有了。我急了，對李文普說，你一定要堅守在首長身邊，絕對保證首長不被弄上車，我先去一下放電影的地方，然後馬上去找張宏。李文普神情慌張，忙點頭，當著劉吉純的面對我說，你快去，你叫張宏和我聯繫，你快，快去！[14]

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的衛兵報告，林彪住地很亂，搬東西的人來來往往。

葉群和林立果闖進林彪房間，葉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起來吧，有人來抓你啦。林立果命令小陳和小張快給首長穿衣服。張恒昌回憶：首長吃了安眠藥，比平時晚睡了 15 分鐘，是從床上拽起來。穿衣服時還迷迷糊糊，沒有一點自主動

作，完全由我們倆擺佈。

當時那種情況，林立果還是一個大孩子，没經歷過這樣的突變，做不到處變不驚。他舉著槍，從這屋竄到那屋，嘴裏亂喊。[15]

陳佔照回憶：我走出客廳，看見林立果和葉群像熱鍋上的螞蟻，葉群披頭散髮，林立果跑來跑去，忙著調車，十分著急的樣子。[16]

劉吉純回憶：不久裏邊亂起來，葉群叫人找林豆豆，没找到。我聽見葉群在走廊大喊，快走，快走。林立果此時也一迭聲地說快快快走。我一聽，以爲是去大連，就趕快跑到辦公室，叫李春生給大連打電話。李春生撥通了，將話筒交給我，我剛和大連的保衛部長說了一句，林立果進來，說你幹什麼？我說不是你們要去大連嗎？讓他們準備準備。林立果啪地把電話按下，惡狠狠地說，哪兒也不准打。[17]

李文普回憶：我讓劉吉純給大連打電話，通知做準備。電話剛接通，還没有講話，就被闖進來的林立果壓斷了，我當時懷疑爲什麼不讓我安排飛機，有些反常，究竟往哪裏走？心裏越來越没有底，我給空軍副參謀長胡萍打電話。[18]

平時胡萍都是從李文普那裏打聽消息。現在李文普反過來問胡萍，林彪往哪裏走，胡萍怎麼能知道？

李文普回到秘書值班室，給張宏打電話，說首長馬上就走。張宏剛問怎麼回事，電話就被林立果壓斷了。劉吉純回憶：林立果高喊誰都不准打電話，也不要接電話。林立果把

李文普推出去，說快調車。我聽見李文普喊叫楊振剛（林彪司機）。[19]

陳佔照回憶：汽車調動出庫，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一起出來，林彪走在最後面。走到內勤門口，林彪問，東西都裝車沒有？我說，沒裝車。林彪再沒說什麼，也沒停步，連帽子、大衣都沒帶，就鑽進了汽車。[20]

李文普沒有與張宏取得聯繫，他帶著越來越大的疑團上了“大紅旗”。

林豆豆再次到八三四一部隊報告

姜作壽回憶：決定一個人上去摸摸情況。在林彪住的96 樓前，我遇見林辦秘書宋德金。宋德金說，看來今晚就要走了，小陳正在收拾行李呢。果然林彪房間亮著燈，往常22 點多林彪就上床休息了。我馬上把這個新動向報告北京，北京指示，林副主席上飛機，你們警衛部隊就跟上去。我們商量，如果林彪要走，就由我帶六名戰士上飛機。如果不讓上，就以搬動行李爲由，上去了，就不再下來。

當時情況非常不明朗，可能是“叛逃”，也可能是首長“動一動”，作爲警衛部隊，我們只能兩手準備，既應付意外，又要把警衛跟上去。這眞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已經吹過熄燈號，戰士都睡了，又叫起來打背包，準備出發，這時還沒跟部隊講。[21]

林豆豆回憶：借口拿行李，我離開了 96 樓。當我從院子裏走到通往葉群住房的走廊門口時，見姜大隊長和楊森守在門外，葉群的汽車剛調上來。還有許多人，不便說話，我使勁握住姜大隊長的手，示意他不要守葉群的車，去守林彪的門口和汽車。我目視他守在林彪的房門口，並在門口走動，我放心了。

姜作壽給我們調來一輛車，揮手讓我們快走，讓張宏趕快上來。

在車上我讓張清林留在我們住的 56 樓，應付老虎來找我。下車後，我和楊森徑直跑到八三四一部隊大隊部。

大隊部空無一人。我叫楊森立即去找張宏，好一會兒，張宏等人才來。我說，李處長和姜大隊長叫你趕快到 96 樓去，同他們聯繫，請你立即帶人上去進行干預。我還要求他立即命令部隊，採取截斷和封鎖通往山海關機場的公路等緊急措施，以防萬一。

張宏滿口答應，卻在屋裏走過來走過去，想出去又走回來，猶豫不決，但又看不出他在害怕，忽然他幾步跨出去了。事後我問楊森怎麼回事，楊森說張宏大概是到別的地方同北京通電話去了。等張宏再回到大隊部值班室時，我又對他說，李處長、姜大隊長叫你趕快上去。你開始不是說得好好的，到時候你就帶人上去嗎？我對李處長和姜大隊長都說好了，到這個時候，你爲什麼又不上去了？

張宏不說話。

林豆豆說：你不上去，那你就在這裏打電話同李處長聯繫，李處長說了幾次叫你同他聯繫。

張宏還是一句話也不說。

林豆豆回憶：不論我說什麼，不論我怎樣急切地懇求，都沒有打動他。他這次完全不是我第一次找他時的那種態度了，他這次的態度從根本上變了！只見張宏背著手在屋裏來回踱步，低頭思索什麼，也不像我第二次見他時那樣緊張了。

作爲警衛部隊負責人的張宏，在我兩次找他之後，不僅有專職責任，而且也完全有理由上去進行干預。多年來，林彪、葉群的住所和車庫，從内到外，一直是八三四一部隊嚴密守衛，林彪、葉群身邊的警衛、司機和內勤人員，也都是八三四一部隊指派，汽車調動也必須經過他們。按照慣例，張宏這次不可能不主動過問李文普，這一點，張宏自己也很明白，並且在我第一次找他時，他當衆也已經說得那麼清楚，那麼確定不移。當張宏明明知道李文普和他的部下姜作壽叫他趕快上 96 樓時，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他更沒有任何理由拒絕，拒絕同他明知是代表林彪的李文普直接聯繫。

然而，張宏始終沒有上去。[22]

張清林回憶：當時情況非常緊急，爲了不讓“大紅旗”去機場，豆豆和我提出四條措施：

（一）調一輛大卡車來，把公路堵死；

（二）雙峰山路不寬，兩邊都是松樹，砍掉一棵大樹，把路擋住；

（三）調 20 名警衛戰士攔截車輛；

（四）封鎖去機場的道路。

當時八三四一部隊的領導是同意的，但當林彪等人即將上車時，卻一條也沒有實施。我拍桌子大喊，早向你們報告了情況，爲什麼遲遲不採取行動？現在他們馬上要走，你們必須立即採取措施。首長出了問題，你們要負責，這個責任你們負得了嗎？你們要採取切實有用的辦法，趕快調派部隊去機場，阻止飛機起飛。命令部隊立即把聯峰山沿路兩邊的樹伐倒攔車。

姜作壽也急了：一時上哪兒找那麼多的斧頭。

張清林說：命令部隊排人牆攔車。[23]

林豆豆回憶：我對張宏說，你們在這裏是專門負責保證首長安全的，如果首長被弄走了，你們負得起這個責任嗎？！

張宏還是不吭氣。

這是我們第三次告急和請求，時間是 23 點 30 分左右。

我心急如焚，責問張宏，我兩個小時前就給你們說，你們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調動好部隊？你先命令一些部隊快上！你自己帶一些部隊快上！

張宏仍然沉默。[24]

姜作壽回憶：如果上邊有指示，我可以讓于仁堂（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副大隊長）把“大紅旗”看起來。林彪住在山上，下山就一個路口，卡車開上去，堵一堵，就把路堵死了，除非“大紅旗”插翅，否則別想走。可攔截林彪的“大紅旗”，北京不發話，根本不可能，誰敢？現在想，林彪不跑還眞沒辦法，誰敢上去攔？[25]

誰讓林豆豆他們也上飛機

姜作壽回憶：林豆豆報告後，說她不能回去了，他們肯定會來找的。我把林豆豆安排在隔壁的房間，囑咐她不要開燈，也不要說話，不叫她不要出來。李文普打電話，問豆豆是不是到你們那去了，我說沒有。幾分鐘後，林立果又打來電話，問豆豆來了沒有。我還是回答沒有。林立果顯得很著急，她到哪裏去了？我說不知道。林立果很凶地說，你給我到 56 樓找一找。要是以前，我一定會去找，但此時我要保護林豆豆的安全。[26]

張清林回憶：豆豆與我分工，她去大隊部，我去 56 樓，叫司機待著不動。我把張寧的房門反鎖上，電閘拉了，這是準備對付林立果的。剛要走，電話響了。20 分鐘前我跟張恒昌商量好，有什麼情況馬上打電話。我抓起話筒，小張說，首長睡覺了，又給從床上拽起來，正往汽車裏推，車很快就下來，你們趕快想辦法。[27]

林豆豆回憶：張清林在 56 樓接到張恒昌按照我事先要求打來的電話，說他們（葉群、林立果）正在床上拽首長，情況十分緊急！首長馬上就要被拽走了！汽車再有十分鐘就要開動了！你們快！快呀……[28]

張清林顧不得聽完電話，見樓前一線公路上的部隊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便衝向公路，大喊快堵住！都到公路上來堵住……同時直奔大隊部，氣乎乎地對張宏等人說了小張的電話，情況十萬火急，最多不超過十分鐘，上面的汽車就要

下來了！部隊爲什麼還沒有行動？爲什麼還不進行阻攔……

張宏說：我已經派了先行車去機場了，有的部隊還沒有調來，是不是汽車出故障了？電話也打不通……[29]

劉吉純回憶：……我知道事情真的來了，在這個時候，林立果不敢放槍，但我怕他用刀捅我。我就把槍揣在兜裏，趕快跑到大隊部找姜作壽，讓他趕快組織幾個人先把機場看管起來。很快選好人，叫區隊長黃樹忠帶隊去，我沒有同意，我讓副大隊長于仁堂去。他帶著八名戰士，坐上大屁股吉普先去機場。走時太匆忙，沒想到帶電台，以至最後無法聯繫。[30]

張清林回憶：我分析"大紅旗"很快會下來，不會在這裏停。爲什麼？門口到 58 樓門口都是黑壓壓的八三四一部隊的戰士，揹著背包，一個班挨一個班，馬路兩邊全是槍。我叫司機別動，我下去告訴一下再回來。我這時真急了，邊喊邊跑，車快下來了，快堵住啊。車快下來了，快堵住啊……但是戰士們不知道什麼意思，誰也不動，依然揹著背包站在那裏。我衝進大隊部，豆豆和張宏、姜作壽在那裏爭論。

豆豆建議從反方向派部隊攔截。向北京請示，還是遲遲得不到答覆。張宏接電話後，突然變了態度，叫我別在這裏指手劃腳。我氣壞了，都要發生火拼了。一轉眼張宏又不見了，回來時不慌不忙當著我們許多人的面給北京打電話。只聽見他說了一句，他們剛才說不過十分鐘，汽車就要走了。接著他頻頻點頭，是是是……放下電話，張宏慢條斯理

地對我們說，中央指示你們跟著上飛機，跟著走。張宏的聲音很大，當著很多人的面，我在旁邊，這句話我記得非常清楚。豆豆冷靜地問誰下的命令？沒有回答。

楊森在一邊懇求張宏說：飛機上了天，黑乎乎的，你知道飛到哪裏去了？[31]

林豆豆回憶：眞是咄咄怪事！叫我們跟著上飛機，這大概是早就定了的，可是早不說遲不說，偏偏在這個時候，並且是在部隊沒有採取任何措施的情況下，叫我們跟著上飛機！這又是爲什麼？我們至今也不清楚。我氣憤極了，往值班室的床上一坐，對張宏說，我這樣找你們，這樣苦苦請求你們採取措施，你們就是不聽，李文普也調動不了你們的部隊！原來是這麼回事！我質問張宏，爲什麼叫我們跟著上飛機，跟著走？

張宏說：這是中央指示。

林豆豆質問：中央是誰給你們下這樣的指示？要我上飛機，我就是死在這裏也不上！我坐在這裏就是不走了！要上，你們自己上！

林豆豆反復問：到底是誰叫我們跟著上飛機的呀？

張宏說：中央。

林豆豆問：你剛才同哪位領導通的電話？

張宏不吭聲。

林豆豆進一步問：剛才是不是張耀祠的電話？

張宏非常勉強地點了點頭。

林豆豆回憶：據我所知，在北戴河的八三四一部隊的上級是張耀祠，張耀祠的上級是汪東興，張耀祠和汪東興多年來一直在毛澤東身邊。於是，我指著面前的電話機，急切地要求張宏立即在這裏給張耀祠掛個電話。他不掛，我催促他幾次，他還是不掛。在這種情況下，我一邊抓住話筒，一邊對張宏說，你不掛，那我就掛了。他一聽馬上動手抓過話筒向北京掛電話，說了聲，掛通了，就把話筒遞給我。可是我呼喊了幾聲，也無回音，只聽見總機說，是葉主任嗎？我含糊地哼了一聲，總機說，總理正在開會，馬上就來了。接著我聽見總機不斷地呼叫葉主任，葉主任……我沒吭聲。總機又說，怎麼回事？没聲音了？我立即放下話筒，對張宏說，電話沒打通，請他再向北京掛電話。張宏慢吞吞地對張耀祠說，叫他們跟著上飛機，他們怎麼也不肯。我無法再聽下去，一把從他手裏奪過話筒，對張耀祠簡單地報告了一下緊急情況，強調說林彪是被騙的，不是要跑等等。現在情況十分緊急，請求他下命令叫部隊攔阻……張耀祠答應著。我不斷地急促呼喊，張團長！求求你現在就下命令！現在就下命令！一分鐘也不能耽誤了！他還是嗯……嗯，接著他說他要再請示。

這是我們第四次請求。[32]

張耀祠回憶：警衛另有飛機，我沒有叫姜作壽他們上飛機，那一架專機就是林彪一家子。讓林豆豆上飛機更不可能，我怎麼叫她跟著走？[33]

林豆豆回憶：可是，當時屋子裏不止一個人。我與張宏的所有對話，都不是單獨談的，先後有劉吉純、楊森、張清

林以及姜大隊長、曹中隊長等八三四一部隊的幹部戰士在場。[34]

張清林回憶：豆豆趴在桌上哭開了，很快又站起來，堅定地說，我死也不走，要走你們走。我把從戰士手裏“搶”來的槍推上子彈，叫張參謀馬上跟北京聯繫，一直沒聲音，豆豆奪過電話，中間冒出汪東興的聲音，早找我不就好了？再什麼聲音也没有了。她把話筒摔了，這時外面的槍聲響了。[35]

“大紅旗”馬上就要衝下來了

值班室裏的人越來越多，群情鼎沸。八三四一部隊曹中隊長等幹部和戰士卷著袖子，提著槍，急得嗷嗷叫，跳著喊著，還不下命令衝上去，就來不及了！我們可要衝上去了，衝上去了……快下命令吧！副團長！副團長——

張宏卻始終没有答應讓他們衝出去。

張清林揮舞著拳頭對張宏說，在這麼大的事情面前，你們再也不能猶豫了，汽車馬上就要開動了，如果由你們放跑了，黨和人民決不會容忍你們！在這關鍵時刻，要是你們不攔住，一切嚴重後果由你們負責！……

張宏火了：請你們不要在這裏指揮！我們要聽中央的！[36]

林豆豆回憶：我禁不住哭喊著，中央？首長的安危你們可以不管！難道你們連黨和國家也不管了？！你們開始不是說得好好的嗎？求求你們攔住吧！副團長……你們要再不採取措施，葉群就要把首長帶走了啊。[37]

張宏再次向北京報告：他們已經調汽車了，我們怎麼辦？張耀祠說：你們準備好了没有？準備好了，他們走時，你們要跟上他們，要特別注意他們去的方向。張耀祠回憶：因爲這時還没有報告毛主席，中央還没有指示，我只能交代張宏注意去的方向。[38]

林彪司機楊振剛發動了高級防彈的“大紅旗”，葉群和林立果架著林彪進去，劉沛豐抱著公事包也擠了進去。小陳和小張看見李文普也坐進車裏，不知如何是好。

23 點 40 分，在林彪別墅值勤的警衛戰士用電話向大隊部報告：現在他（林彪）出了房門，向防空洞走去……現在，他在防空洞前上了紅旗車……現在，汽車開出去了……[39]

張耀祠剛放下電話，張宏的電話又來了，說林彪他們出來了，劉沛豐手裏提著四個皮包，先上車，林立果、葉群、林彪都上了車，李文普上車後汽車開走了。[40]

張清林回憶：張恒昌立即給 58 樓打電話，正好豆豆在，說他們都跑了，什麼都没帶。這時，在值班室的曹中隊長等幹部戰士衝著張宏紛紛嘶喊，副團長！副團長！一輛黑車從上邊下來了！……現在還不叫我們衝上去，還等什麼時候？……

車很快就要下來，我大喊，趕快採取措施。要是不攔住，不保證林副主席的安全，被林立果綁架走了的話，你們都會遺臭萬年！話還没說完，“大紅旗”就下來了，也就是不到

10 分鐘的時間。[41]

伸手不見五指，只見一輛“大紅旗”打著刺眼的前燈，高速衝下山。

大隊部的哨兵衝進來報告……在値班室的幹部戰士完全自發地紛紛衝了出去。張清林火了，把隊長一腳踢倒，搶過一支手槍，和中隊長蕭奇明一塊往外衝。[42]

只剩下張宏和一個參謀在屋裏……

因爲周恩來在下令封鎖機場的同時，說林彪要走，就以夜航不安全加以勸阻。所以，當“大紅旗”離開 96 樓一路衝下山時，大隊長姜作壽站在大隊部門口的路中間，做出緊急停車的手勢，大喊停車，快停車！他要執行“勸阻”的指示。但“大紅旗”太兇惡，鳴著短促的喇叭，絲毫沒有減速的意思，又是下坡，狂風一般衝來，姜作壽一看情況不妙，馬上跳到一邊，“大紅旗”擦著他的衣服衝過去，差點壓到腳，好玄呀。以後李文普說，我也怕撞上你，你不躲眞有危險。姜作壽說，我不躲，我傻呀？[43]

張恒昌回憶：打完電話，我從 96 樓出來，就聽到 58 樓附近響起了槍聲。[44]

突然很近的一聲槍響，緊接著又是一聲槍響。“大紅旗”的車速明顯減慢，並煞住了車，李文普就是在離大隊部門口約 30 米的地方下車的。這應該是進行攔阻的好機會，特別是對八三四一部隊這樣訓練有素的中央警衛部隊來說，槍聲就是命令，雖然張宏沒下命令，但槍一響，所有的戰士都站起來，恰在這時，中直機關來了一輛大卡車，姜作壽大聲命令上三個分隊。[45]

但是張宏並沒有下命令。

林豆豆回憶：就在張耀祠在電話裏對我說再請示時，我立即報告了紅旗車從 96 樓下來，開過大門口，接著槍響等緊急情況。我一直拿著話筒沒有中斷電話，哭喊著請求他立即命令部隊從反方向阻攔！並封鎖山海關機場！我說，現在就採取措施！時間還完全來得及！我還具體對他說了山海關附近有海軍、野戰軍和地方等部隊。

這是我們第五次報告和請求。

張耀祠聽後說了一句，那就先叫他們快追吧，我馬上再去請示。我隨即把話筒交給了張宏，張宏和張耀祠說了幾句話後，就邊紮腰帶，邊跑出去了。我拿著話筒，等著張耀祠的請示……我對著話筒不斷地呼喚著，但毫無回音……我一邊等著，一邊用另一架電話給 96 樓打電話，葉群的內勤孫忠堂接了電話，他說人都衝出去了，房子裏沒有幾個人了。我要求他告訴留在家裏的人馬上組織起來，都帶上槍，保護房子和東西，維護現場。[46]

近 30 名全副武裝的戰士上了卡車。姜作壽站在駕駛台的踏板上，宣佈首長被林立果、劉沛豐“劫持”跑了，我們去攔截。還沒講完，大卡車就開動了。[47]

一路上，大卡車沒有見到“大紅旗”的影子。

註釋：

[1] [21] [25] [26] [39] [43] [45] [47] 採訪八三四一部隊大隊長姜作壽筆記，1997 年 10 月 20 日

[2] 參見宋德金《我在林彪辦公室的前前後後》，載《百年潮》2000 年第 9 期

[3] [5] [9] [15] [17] [19] [30] 採訪八三四一部隊警衛科長劉吉純筆記，1996 年 10 月 21 日

[4] [10] [14] [28] [34] [37] [46] 採訪林豆豆筆記，1999 年 10 月 11 日

[6] 採訪林辦工作人員王淑媛筆記，1998 年 2 月 13 日

[7] [13] [18] 參見《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華兒女》1999 年第 2 期

[8] [22] [24] [32] 參見《林豆豆關於九一三事件的回憶》

[11] [44] 參見《林彪內勤公務員張恒昌關於九一三事件的揭發材料》

[12] [16] [20] 參見《林彪內勤公務員陳佔照關於九一三事件的揭發材料》

[23] [27] [29] [31] [35] [36] [41] [42] 採訪張清林筆記，1998 年 5 月 10 日

[33] [38] [40] 採訪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筆記，2003 年 2 月 18 日





請注意，葉群照相很少正面，她總是故意側面對著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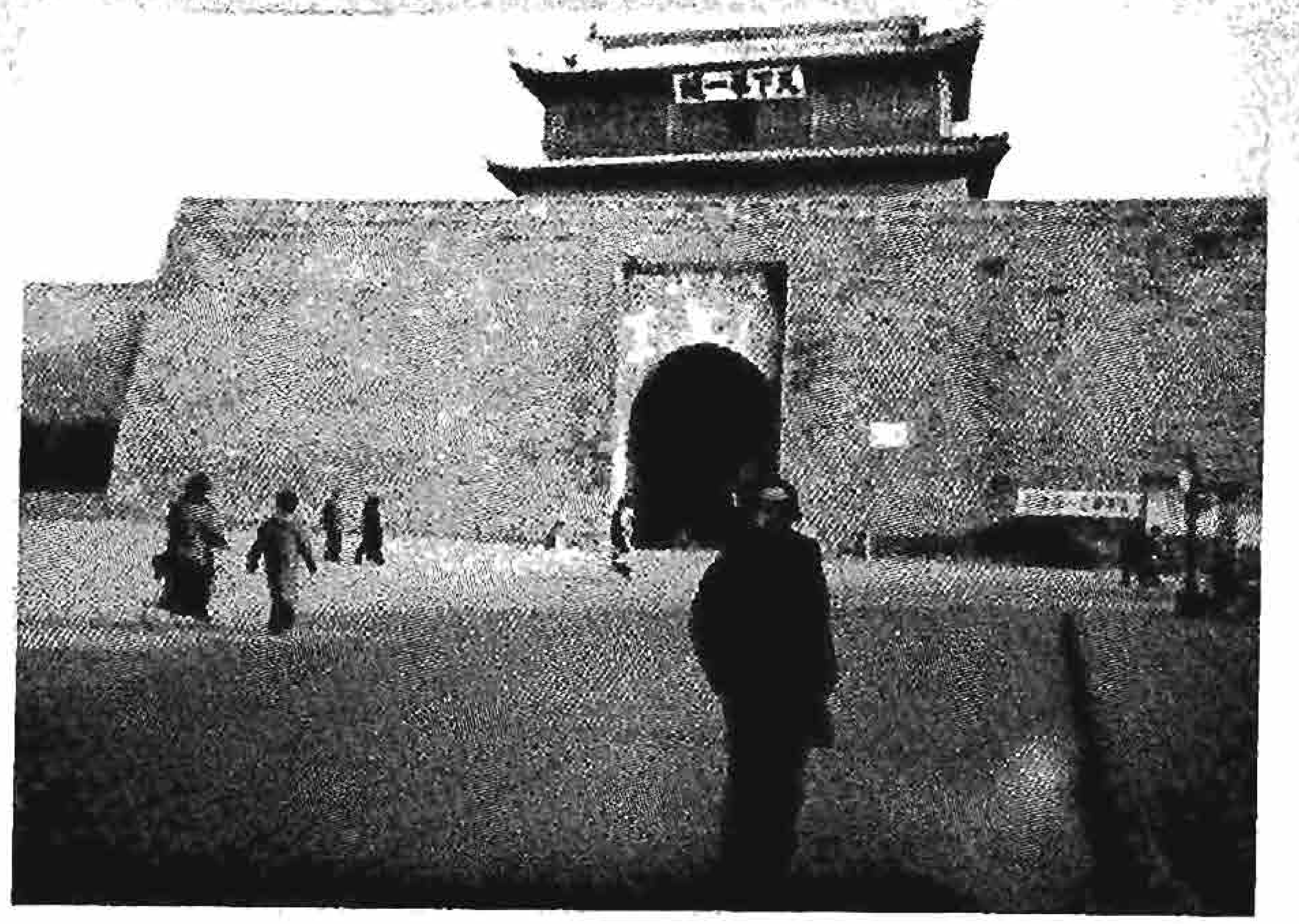
兒葉群和越南南方青年在一起。

林彪家人提供



我陪林豆豆探望四野戰將王東保的愛人林浩。

舒雲提供，攝於 2000 年，北京北太平莊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座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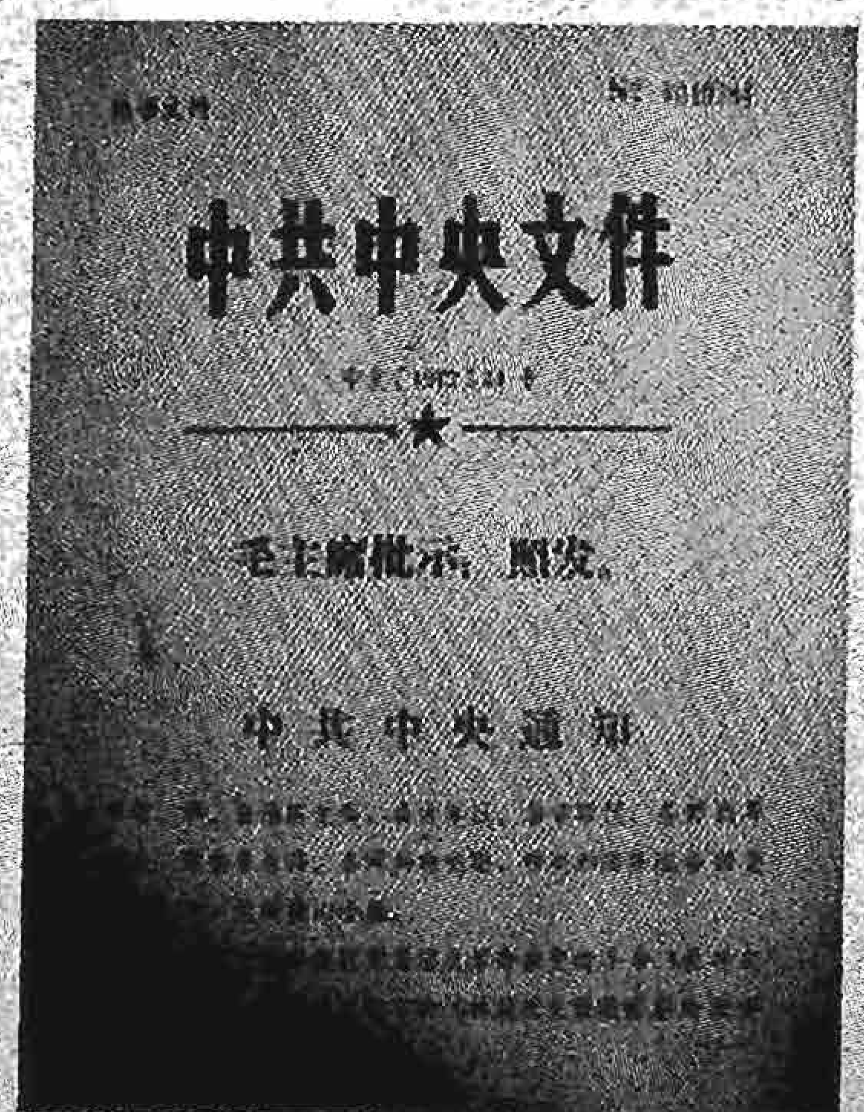
舒雲提供，2000年7月攝影，山海關前



林豆豆

舒雲攝於1996年，北京




中共中央文件

★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中共中央文件





這是三叉戟的登機梯，但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不及卡車載來登機梯，從工作人員的簡便梯上了飛機。

舒雲攝於1999年北京

林彪事件完整調查



天下第一關山海關伸向大海的老龍頭，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專機就是從這裏起飛。

舒雲攝於2000年7月



十大元帥之一聶榮臻。 *攝於1949年開國大典*

第二十三章
“大紅旗”的秘密

誰會問伊爾庫茨克有多遠

“大紅旗”一路狂奔，爲什麼突然煞車了呢？

是因爲車裏坐著的李文普（林彪警衛參謀）突然下了車。

李文普爲什麼中途下車？據他自己說，他是聽林彪問“伊爾庫茨克[1] 有多遠”，不想當叛徒才中途下車的。李文普的這個證詞成了證明林彪知道去蘇聯的惟一證據。

這就使事情更加撲朔迷離了。

九一三事件後，專案組多次集中“林辦”全體人員集體“排查”，不管在會上，還是會下，大家從來沒有聽李文普說過“伊爾庫茨克”。到後來單獨關押，才有了這個“鐵證”。所以大家私下叫李文普是“王連舉”（京劇《紅燈記》中的叛徒）。

試想李文普如果沒有“立功”，怎麼可能對他的處理輕而又輕？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嘛。

九一三事件後，經過審查，周宇馳並沒有拉妻子王聖蘭“入夥”，專案組只要她承認 9 月 12 日深夜是林彪親自從北戴河給周宇馳打電話要他北上的。王聖蘭說：我只知道有人給周宇馳打電話，是誰打的不知道。專案組老是說，對不起來呀，你的態度不如周宇馳。實在挖不出“金銀財寶”，1972 年 1 月才告訴她，周宇馳回家的第二天早晨就死了。因爲王聖蘭不會“編”，被“步步高升”，從學習班到看守所，爲了殺雞給猴看，王聖蘭被公開逮捕，被關到北京市第一監獄，1981 年 12 月 21 日才放出來。關了整整十年不說，還被定爲現行反革命，開除黨籍軍籍[2]。經過王聖蘭不懈的申訴，終於拿到了離休的紅本子。與李文普相比，王聖蘭的問題不知要輕多少倍，但最後的處理卻比李文普重得多，爲什麼？不就是因爲她沒有“順竿爬”嗎？

那麼“大紅旗”裏的林彪說過“伊爾庫茨克”嗎？

有人質疑：林彪怎麼可能問“伊爾庫茨克有多遠”。在“大紅旗”上的六個人，五個人都有可能說，只有林彪不可能說。對於軍事家來說，這簡直是一句外行話。更何況蘇聯西伯利亞這座離中國最近的大城市伊爾庫茨克，對林彪來說，有著一而再、再而三的緣分。

1950 年 7 月 1 日，中蘇民用航空股份公司成立，開闢了以北京爲中心飛往赤塔、伊爾庫茨克和阿拉木圖三條國際

航線，這是新中國民航國際航線的正式開航。也就是說，北京到伊爾庫茨克的航線是新中國最先開闢的國際航線之一。中國決定出兵朝鮮，派林彪和周恩來到蘇聯請求軍事援助，他們坐蘇聯的專機就是走的伊爾庫茨克這條線。既然林彪到過伊爾庫茨克，並在伊爾庫茨克落地，他怎麼能不知道“伊爾庫茨克有多遠”？

林彪打仗前總要做到胸有“地圖”。在東北，他常常五六個小時甚至一天到晚騎在木椅上，一動不動，直到把地圖全“吃”進肚子裏。

張雲生回憶：1969 年 10 月 5 日，爲準備對付蘇聯的進攻，林彪到張家口視察。因爲要看地形，飛機飛得比較低，也比較慢。林彪一直不說話，時而拿望遠鏡望山，時而拿放大鏡看地圖。突然說，前面就是五台山吧？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說是，林副主席很熟吧？林彪說，走過，不過現在這一帶變化了。他邊聽鄭維山講解，邊拿放大鏡從地圖上找他熟悉的地名。[3]

張雲生回憶：1969 年 10 月 20 日中午，蘇聯談判代表團從伊爾庫茨克起飛到北京。林彪平時 12 點前午睡，因爲怕蘇聯突然襲擊，他習慣的午睡也不睡了，等著蘇聯飛機從伊爾庫茨克起飛。何時經過烏蘭巴托，何時進入中國領空，何時到張家口，何時飛臨北京上空，何時在東郊機場降落。北京的報告一次次傳來，秘書一次次報告林彪，直到最後一次報告，蘇聯人從飛機上走下來，並沒有發生突然襲擊，林彪這才放心去午睡。[4]

如果林彪策劃政變，爲什麼林彪身邊的工作人員卻不能像1969年“一號命令”那樣，回憶出林彪那麼多的“軍事行動”呢？

就算林彪老了，忘性大，說過的事情轉身就忘。但逃往蘇聯這麼大的事情，就是忘了“有多遠”，看一眼地圖不就清楚了嗎？打了那麼多年的仗，天天盯著地圖看，不用尺子，也能大致看出“有多遠”吧？不要說林彪沉默如金，他那樣老謀深算，怎麼可能問“伊爾庫茨克有多遠”？就算他想問，他也要想一想，“大紅旗”這一車人中誰能回答他這個問題。

誰有可能問“有多遠”呢？林立果不是軍事家，但總是當過幾年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他既然準備了從北戴河到伊爾庫茨克的航圖，而且一式兩份（就像手令一式兩份一樣，被林立果和周宇馳分別帶上三叉戟和直升機），還能疏忽如此重要的“有多遠”嗎？“保鏢”劉沛豐本來話極少，在那麼多大人物面前，更不可能說話。司機楊振剛也不可能問，他也不會關心“有多遠”這樣的領導考慮的問題，領導命令上哪他就上哪。

說來說去，倒是葉群對“有多遠”既一竅不通，又感興趣。如果不是李文普編“故事”，眞有人說了“伊爾庫茨克有多遠”的話，那這個人很可能是最沉不住氣的葉群。可葉群也不是大傻瓜，車裏六個人，有兩位是工作人員，除了李文普，還有林彪的司機楊振剛，他們一旦知道“首長”要外逃，還會忠心耿耿嗎？周宇馳在調直升機時，也是跟飛行員陳士印和陳修文說要到北戴河向“林副主席”彙報工作，哪敢說外

逃？當然到了天上，生米做成熟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大紅旗”裏的六個人，只有中途下車的李文普還活著，他說林彪說的“伊爾庫茨克有多遠”，沒有旁證。在法律上，孤證不能算作證據。

李文普爲什麼中途下車

李文普“創造”了“伊爾庫茨克有多遠”之謎，還“創造”了另一個謎。

李文普回憶：9 月 12 日下午，我在平台上乘涼，林豆豆突然對我說，林立果盡幹壞事，要害毛主席，他們還要去廣州，萬一不行就讓首長去香港，你不能讓首長上飛機走。對林豆豆這番話，我確實感到突然，不相信。當時我不相信的原因有幾條：一是林彪讓我準備去大連，並沒有說去廣州。另外，林豆豆和葉群感情不好，林豆豆與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現在林豆豆冒出一個這麼大的“陰謀”來，真把我嚇了一大跳。但我首先想這是林家兒女又鬧矛盾了。同時也問有什麼證據。林豆豆不說任何證據，我當然不會很相信了。還有一點，我長期在林辦，對林家眞眞假假的事見多了，聽多了，所以就用平常的心態去對待了[5]。李文普不承認林豆豆反復做他的工作。但據知情人說，李文普的意思是到緊急關頭把“大紅旗”鎖在車庫，說他已經做好林彪司機楊振剛的工作。實在不行，就在飛機上搏鬥。林豆豆不同意，上了飛機，一切都將無可挽回。

李文普認爲沒辦法不讓林彪上車，首長要走，他一個警衛秘書怎麼敢攔？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動，這麼大的事，爲什麼你自己不去報告，卻要讓我不讓首長上飛機，我從來沒有幹過這種事，負不起這個責任。[6]

那你李文普跟著走就是了，可爲什麼半路上你突然下車，不跟著走了呢？你是林彪的貼身警衛，歷來是林彪到哪兒你跟到哪兒。是什麼事情讓你吃了豹子膽，居然敢不跟著“首長”走呢？是不是八三四一部隊攔阻並開槍後，坐在“大紅旗”內的你發生了某種變化呢？使一直不相信林豆豆話的你不僅突然“開竅”，而且還來了一番“苦肉計”。

1980 年，爲審理“兩案”，總政取證組到山西呂梁的礦山，找到李文普。他和“林辦”的工作人員一樣，在“亞療”的審查結束後，集體到團河農場勞動改造，之後分配工作。

李喚勞（1980 年審判“兩案”被抽調到總政取證組）回憶：事隔將近十年，李文普與原來說的基本一樣。他說事先不知道他們往哪裏跑，路過八三四一部隊大隊部的門口，大隊長姜作壽一攔車，車裏邊的人慌了。李文普剛開始把林豆豆的話當成兒戲，但一看這個緊張陣勢，馬上感到不對。[7]

姜作壽爲什麼攔車？還有人大喊停車。林豆豆向部隊報告李文普知道，部隊肯定向中央報告了。如果上邊沒有指示，他們怎麼敢攔林彪的車？李文普上車前想與副團長張宏聯繫，被林立果掐斷了電話，也沒搞清上邊到底是什麼指示。但從姜作壽攔車看，上邊一定是給了“不讓去機場”的命令。

這時李文普的腦子一團亂麻，林豆豆已經和他講了那麼多，“首長”還是上了車，如果出了事，首先他跑不掉。八三四一部隊攔車，葉群爲什麼不讓停車？應該停車，問問清楚。工作人員也不全，不該這麼走！李文普對總政取證組說：當時我就是想下車問問怎麼回事。我是警衛秘書，爲林彪的安全，有權處理。但是車不但不停，還打了我一槍。

原來，李文普“中途下車”的思想如此簡單。

是誰打了李文普一槍

“大紅旗”被八三四一部隊阻攔後，葉群說：八三四一部隊對首長不忠，衝！“大紅旗”沒有停，反而加速衝過去了。[8] 這時響了四槍。除中隊長蕭奇明打了兩槍外，李文普打了一槍，車裏的林立果也打了一槍。蕭奇明的那兩槍沒有爭議，彈著點在“大紅旗”的後擋風玻璃上。而李文普的一槍和林立果的一槍打向了誰？

“大紅旗”從八三四一部隊的攔車處又竄出約 200 米，突然一個急煞車，姜作壽遠遠地看見車裏跳出來一個人，站在車門邊。也有目擊者聽見李文普喊了一聲，怎麼個事嘛？幾乎同時，“當”一聲槍響。幾秒鐘後，又響了一槍。[9]

李文普回憶：聽林彪說要去伊爾庫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連，是要到蘇聯去。腦子裏第一個反應就是叛逃，我跟著跑，這不是當叛徒了嗎？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家屬了嗎？便決心下車，我本能地大喊一聲停車，楊振剛把車停下來，

我立即開門下車，葉群氣衝衝地說，李文普，你想幹什麼？我說，你們究竟要到哪裏去？當叛徒我不去！我轉身朝 58 樓方向喊了一聲，來人哪！與此同時，我聽到了車門響聲和槍栓聲，林立果向我開槍。[10]

張清林回憶：天黑，燈光又微弱，兩邊有樹，也看不清前面的車。我們越追越近，大概在離“大紅旗”15 米到 20 米時，“大紅旗”呼地開跑了。[11]

“大紅旗”的車門也沒關，就加大油門，以每小時 100 公里的速度飛馳而去。

蕭奇明最先趕到，姜作壽在他後面 30 米。他們看見李文普半躺在地上，捂著左大臂的負傷處，嘴裏還在哇哇亂叫：叛徒，叛徒。

誰是叛徒？

李文普說：葉群、林立果。

這種時候，誰也顧不上負傷的李文普，姜作壽跳上隨後趕來的大卡車，往機場追去。[12]

李文普回憶：我自己捂著傷臂走回八三四一部隊大隊部，衛生員小陸給我包紮了傷口。[13]

李文普堅決不承認張清林看過他的傷口，並給他包紮。

可是此時張清林在現場。他又偏偏是廣州軍區總醫院的外科醫生，專門學過野戰外科，熟悉槍傷。試想，和平年代極少能見到槍傷，一般人都會好奇，更何況科班出身的野戰外科醫生呢？張清林藉口衛生員小陸的包紮不好，重新打開，實際上他是想看看傷口。

張清林回憶：給我當助手的是八三四一部隊的衛生員（小陸），我們給李文普脫下軍裝。血流得不多，貫通傷，傷口位於左臂內側，內下外上，前面的傷口細，後面的傷口粗，因爲子彈出口比進口要大，這說明是從前面打進去的。我注意到李文普的胸前有擦傷的血跡，看來子彈是貼著前胸的衣襟穿過去，左臂傷口的袖子上有一圈黑印，明顯是被火藥熏的。李文普說，叛徒打我了，叛徒打我了。我一邊包紮一邊問，誰是叛徒？李文普說，就是林立果。我一看就是自傷，我說了一句，李主任，你自己打的啊。李文普低著頭，不再吭氣。包紮很快，只有兩三分鐘，副團長張宏問我，怎麼打的？我說自傷。

這個過程，張清林當時對林豆豆和楊森都說過。1982年，張清林去看李文普，說我當時給你包紮，我看了傷口，你是自傷。

李文普坐在沙發裏，埋著頭，一句話也沒有說。[14]

不知道是不是因爲張清林的“一針見血”，李文普之後就改口“槍走火”了。

李文普回憶：簡單包紮後，八三四一部隊要送我到空軍療養院，我想女兒剛去那裏當兵，不好說話，就說去北京軍區療養院。經醫生檢查，子彈穿過左大臂，造成粉碎性骨折。醫生問怎麼受的傷，我不好說林彪父子，這是重大機密，只好說“槍走火”。[15]

也就是說，李文普開始也承認是自傷，後來才改的口。他“理直氣壯”地說：我已經從林彪車上跳下來，幹嘛還要自

己打自己一槍？我在幾年監護審查期裏，從來沒有人懷疑過這一槍不是林立果打的。

沒有人懷疑過嗎？

李文普公開發表文章說：當時距離很近，只一米左右。我側著身，手揚著，所以子彈從前胸擦上左臂。受傷後，我倒在路邊。[16]

注意！李文普說的是“子彈”，他把“誰打的”和“子彈”分在兩段裏。上一段說林立果朝我開了槍，下一段說“子彈”打中了我。

玩過槍的人都知道，如果是車裏的林立果開槍，不可能朝天，只能朝下。八三四一部隊天天玩槍，非常熟悉彈道，看彈著點嘛。受傷前李文普是站在“大紅旗”的右邊，子彈可能打到他的腿上，決不可能打到左上臂。八三四一部隊向中央報告：車裏面打了一槍，是林立果打的，子彈打在車的搖把底下，彈洞找到了，子彈殼也在車裏。

林立果和李文普雖然都是手槍，但型號不一樣，彈洞不一樣，子彈殼也不一樣。李文普那一槍的子彈殼掉在車外面，但彈洞沒有找到。[17]

李文普那一槍的彈洞“藏”在哪裏

劉吉純回憶：從機場調度室出來，我看見副團長張宏帶著部隊也趕到機場，他已經把沒有上飛機的機組人員都集中起來了。看機場已經沒有我們的事，我們幾個人就乘車返回

北戴河。我以爲李文普也在飛機上，下車後我才知道，他受傷住進了北京軍區療養院。反正也有車，我和宋德金就去看他。我一看傷處，就知道是他自己打了自己一槍。[18]

李文普的文章說"子彈從前胸擦向左臂"。如果是林立果打的，怎麼可能從"前胸"到"左臂"？李文普坐在司機右邊，林立果的位置在第二排的右邊。李文普下車後，如果面向車門，林立果的子彈只能從"前胸"到"右臂"，而不可能是"左臂"。李文普如果背向車門，林立果的子彈倒是有可能經過"胸部"到"左臂"，可是對不起，這個"胸"是"後胸"，而不可能是"前胸"。難道李文普與別人不一樣？左手在右邊，右手在左邊？或者林立果的子彈有特異功能，會拐彎，經過前胸，不往右臂鑽，掉頭直奔李文普的"左臂"？

眞是天方夜譚啊！

李文普下車後確實打了一槍，打的是誰？他敢打誰？李文普你一個那麼老的警衛幹部，敢向自己保衛的首長開槍？膽子也太大了吧？這時車裏坐著的是中國第二號人物，而你李文普又是專職警衛，竟敢向中國第二號人物開槍？如果"秋後算賬"，你李文普還想不想活？槍斃你一萬次也不爲過，當然向自己開槍無所謂。

我們現在來分析李文普當時的心理，他想好了，在那種情況下，他讓停車，已經觸犯了"龍顏"。可是在他下車時，槍突然"走了火"，他受了傷，當然不能再"鞍前馬後"了，這就給自己找了個可進可退的萬全之計。傷在哪兒？李文普也考慮好了，不能傷五臟六腑，只能沖胳膊腿打。在胳膊腿中，

腿打壞了，走路成了大問題，右胳膊也不行，右手拿槍，只好"委屈"左胳膊了，所以就朝著左胳膊上部打了一槍。

如果按李文普所說，子彈"從前胸擦向左臂"，那麼只能是李文普自己打自己。李文普啊李文普，你眞是一個從來沒有騙過人的"老實人"啊，謊話漏洞百出，永遠"編"不圓。可是你李文普，你承認你在林彪身邊那麼多年，對林彪還是有一定感情的。你"編"出這樣的彌天大謊，就不怕老天報應嗎？

九一三事件剛發生時的中央 57 號文件說：林彪親自開槍打傷跟他多年的警衛人員。後來被官方認可的說法是林立果打了李文普一槍。李文普說：在審查時，從來就沒有人說過我是自傷。很有"道理"啊，其實是不是自傷很容易鑒定。而且當時的"槍戰"，只是車裏車外各打了一槍，其中一槍打在車上，另一槍打在李文普左大臂上，造成粉碎性骨折。[19]

這"大紅旗"並沒有隨林彪一家上天，留在山海關機場。第二天八三四一部隊把"大紅旗"擦了一下，看了一下車，車上還撿到劉沛豐的錢包，裏面有 60 多元，還有小孩照片、工作證。車在，李文普也在，從彈道上很容易鑒定出來，給李文普包紮和檢查傷口的醫生也不止一個，都可以證明，但這些鑒定都沒有做。[20]

官方認爲：李文普沒跟著走，就是好同志。如果鑒定，事情就複雜了。

李文普的槍傷就這樣含糊過去了，沒有權威的鑒定。

張耀祠回憶：我沒有檢查"大紅旗"，這事過去就懶得檢

查。那個情況下不能說自己打的，那時懷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他不願跟他們走，下來就好交代了。[21]

副團長張宏說：走火，不說什麼事，不要鑒定。中央已經發了文件，與中央一個口徑。

汪東興說得更乾脆：算了，小節，不要再干擾。

李文普的槍傷在九一三事件中是小節嗎？

一直沒有接到攔截"大紅旗"的命令

張清林回憶：沒想到"大紅旗"在門外 30 米的地方停了一下，接著好像聽見兩聲模糊的槍響。我和蕭奇明還在往前衝，我說開槍，蕭奇明真當當開了兩槍。八三四一部隊的幹部戰士個個都是神槍手，蕭奇明的兩槍全打在"大紅旗"後擋風玻璃上。但"大紅旗"是防彈車，子彈只在後玻璃上留下兩個白點。要不是高級防彈車，那兩顆子彈不知要打傷打死誰。[22] 事後，受到周恩來的批評，沒有明確指示，怎麼能開槍呢？[23]

手槍的有效距離是 25 米，這時要打壞輪胎就好了。

其實"大紅旗"車體高，底下是鋼板，重五噸，輪胎都是"死"輪胎，夾層玻璃足有半尺厚，車體都是手工敲出來的，別說手槍了，手榴彈都砸不透。所以"大紅旗"十分笨重，毛澤東覺得不舒服，以後他坐蘇聯的"吉斯"。林彪試了一試，很喜歡，因爲"大紅旗"裏面寬敞，拉開座椅就可以休息。於是，"大紅旗"就成了他的"坐騎"。

張清林回憶：我想跟著後面來的汽車去山海關機場，心想拿槍把飛機破壞了，飛機就飛不走了。正好碰上楊森，楊森說：你在這裏太危險，我去機場，你在這裏保護豆豆的安全。我這才返回來。[24]

劉吉純回憶：我趕快回到 96 樓，剛到樓前，林彪的車就出來了。因爲沒看見葉群的車出來，我跑到辦公室，叫李春生去看看葉群在不在。李春生還什麼也不知道，回來說沒看見。葉群的內勤看見葉群只拿了一個小包，以爲她還要回來，就守著一大堆行李等著。內勤說葉群可能在臥室，他再去看看。[25]

林彪內勤小陳和小張懵了好一會兒，奔到院子裏，邊哭邊說：他們都走了，都走了……宋德金問：李處長呢？跟著一起走了。李春生不信，進去看了一圈，跑出來大喊：首長走了！96 樓一片慌亂，去哪兒了？去大連。去大連爲什麼不帶上我們？宋德金說：快快，快調值班車。劉吉純一聽更急了，感到問題的嚴重。還好院子裏有八三四一部隊的一輛"伏爾加"，正好宋德金出來，又叫上了李春生。劉吉純考慮只有他一個人有槍，還叫了一名帶長槍的戰士，直奔山海關機場。

劉吉純回憶：雖然司機開得很快，我們還是叫他再開快點。因爲李文普半路下車，耽誤了一會兒，我們都看見前面的"大紅旗"了。

葉群司機小慕的妻子是葉群內勤，此時正在家休息。小慕還以爲還是第二天早晨出車，聽內勤說要走，拎上牙具

袋，也顧不上妻子和行李，趕到96樓。還沒有下車，葉群內勤喊：主任讓你到56樓接豆豆他們去機場。小慕馬上開車去56樓，看見56樓一片黑暗，以爲人已走，掉頭又回到96樓。跳下車對文書小孫說：你告訴主任，56樓沒有人，怎麼辦？小孫慌亂地說：他們早走了。小慕嚇"死"了，他是葉群的專車司機，遲到了葉群準要罵他，他轉身上車開著空車向機場追去。

劉吉純他們的"伏爾加"追上了小慕的車。小張要開槍打，宋德金說：慢著，萬一裏面有豆豆，打錯了人怎麼辦？要是打出去，小慕准沒命。小慕看見後面"林辦"的車在追，他怕葉群罵，開得更快。通往山海關機場的路上有兩道火車線，前面兩個車剛開過去，一列貨車來了，因爲沒有路燈，離鐵路十幾米司機才發現，因爲車速太快，"伏爾加"司機轉了個大彎，栽到草叢裏，僥倖沒撞上。劉吉純事後說：要不是司機年輕機敏，我們不是撞到火車上，便是翻到路邊溝裏，必死無疑，想起來眞有點後怕。[26]

等長長的貨車駛過，但前邊的"大紅旗"已經跑得沒影了。

八三四一部隊的三部值班車都追出來了。

自從"大紅旗"從北戴河開出後，八三四一部隊遵照周恩來"勸阻林彪不要上飛機"的指示，先後組織了8輛車70多人，由張宏副團長帶隊去追。23點45分左右，二大隊副大隊長于仁堂帶著六名戰士坐兩輛吉普車先出發，到山海關機場控制飛機，不准飛機起飛。張宏交代：要與機場取得聯繫，

有問題請示中央後再定。

八三四一部隊只接到"追"的命令，沒接到"擊"的命令。

本來吉普車比"大紅旗"先走幾分鐘，但一直沒有接到攔截的命令，不但沒有阻攔，反而給"大紅旗"讓開了大路。

過了海邊大橋，"大紅旗"就超過了吉普車。

因爲屁股後面有車追擊，"大紅旗"像受驚的兔子，更快地向前竄去。[27]

開到機場北門，林立果朝著門衛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把大門鎖上。所以後面的吉普車怎麼按喇叭，門衛也不開門，裝聽不見。後來吉普車上的人火了，命令跟上來的卡車硬把鐵門撞開，門扇都給撞翹起來了，現在痕跡還在。

林豆豆回憶：按照慣例，林彪上飛機前，八三四一部隊要派人和先行車到機場佈置安全措施，上飛機檢查，然後武裝守衛。除了派警衛同機跟隨，還要派部隊乘另一架飛機護送。如果目的地沒有八三四一部隊，要先乘飛機或火車前往佈防。多年來，林彪非常厭惡這套繁文縟節，但爲尊重八三四一部隊的安全措施，從未脫離過嚴密守衛和跟隨。但奇怪的是，這次卻始終沒有執行。[28]

劉吉純回憶：小慕的車"咬"著"大紅旗"進了機場，但亂糟糟的場面讓他停住了腳步。

事後有人問小慕：如果叫你上，你上不上？小慕說：當然跟著上。"林辦"惟一目睹三叉戟起飛的只有小慕，而偏偏他事先一無所知。

等劉吉純他們的"伏爾加"開到機場，飛機已經上天。

劉吉純痛罵八三四一部隊的戰士：你們都是死人，爲什麼不攔住？不是命令不准飛機起飛嗎？你們等著挨整吧。

劉吉純回憶：我問于副大隊長呢？戰士說在那邊。我說趕快，上調度室。我埋怨于仁堂怎麼叫他們上了飛機，于仁堂說他的車慢，被後面的車超了過去，他們也是剛到不久。因爲只是向幹部講了，戰士都不知道林彪要跑，所以戰士都站在那裏不敢動。我想了一下，不應該埋怨他們，如果中央早下命令，他們是跑不了的。沒有上面的命令，誰敢動林彪？[29]

註釋：

[1] 蘇聯的邊界城市，中國飛到蘇聯的必經之城

[2] 採訪周宇馳妻子王聖蘭筆記，2003 年 12 月

[3][4] 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版，311-312、319-320 頁

[5] [6] [8] [10] [13] [15] [16] [19] 參見《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 年第 2 期

[7] 採訪總後勤部幹部李喚勞筆記，2003 年 12 月 12 日

[9] [12] [17] [20] [23] [27] 採訪八三四一部隊大隊長姜作壽筆記，1997 年 10 月 20 日

[11] [14] 採訪張清林筆記，1998 年 5 月 10 日

[18] [25] [26] [29] 採訪八三四一部隊警衛科長劉吉純筆記，1996 年 10 月 21 日

[21] 採訪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筆記，2003 年 2 月 18 日

[22] [24] 採訪張清林筆記，1998 年 5 月 10 日

[28] 採訪林豆豆筆記，1999 年 10 月 11 日

第二十四章
山海關機場

深更半夜，林彪爬上三叉戟

1971 年 9 月 12 日深夜，周恩來打電話給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說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停在山海關機場的二五六號三叉戟不要動，要動的話，必須有我、黃永勝、吳法憲和你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1]

怎樣才做到“四個人一起下命令”呢？只有天知道。

雖然二五六號三叉戟被周恩來判了“死刑”，但還是強行起飛了。

9 月 13 日淩晨，張耀祠報告周恩來：林副主席已經離開駐地，去山海關機場。

周恩來爲了證實林彪是不是跑了，零點剛過，他要林彪的電話。軍委總機馬健英接通了 100 號林彪的專線，沒人

接，200 號葉群的專線，也沒人接。這是不可能的呀？怎麼可能没人呢？她以爲線路壞了，中南海故障台檢測後說，電話是好的，有正常的鈴聲。她納悶，怎麼工作人員也都不見了？

周恩來問派出的部隊能否先到達機場，張耀祠不能肯定。周恩來再一次叫李作鵬下令山海關機場，不准停在機場的任何飛機起飛，要設法阻攔。

大約零點 10 分，山海關場站站長潘浩等人到調度室，值班員報告李作鵬來過電話。這時，西郊機場派來的調度室主任李海彬已經爲三叉戟要了兩輛加油車。他們覺得情況緊急，必須再給李作鵬打個電話。

潘站長問：李政委是不是給我們來過幾次電話指示？

是的，李作鵬又重複一遍。

現在飛機正在加油，如果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

李作鵬說：飛機如果強行起飛，可直接報告周總理。

潘站長想：報告周總理，怎麼來得及？飛機能不能起飛，關鍵在飛行員。他又問：中央首長的指示，是不是要給專機師的潘副政委傳達？

李作鵬同意。[2]

這時，跑道還黑著，三叉戟附近亮著一盞聚光燈，兩輛加油車正在加油。

潘站長放下電話，已經是零點 20 分，他和場站史副政委一起，急忙去找潘景寅。

可惜晚了一點點。就在零點 18 分，“大紅旗”已經衝進

機場。

“大紅旗”一直開到三叉戟跟前。沒等車停穩，“年輕的軍人”就下了車，拿著手槍，叫著快快快，飛機快啓動。“胖女人”大喊：有人要害首長，油車快讓開，讓我們走。

目睹過林彪上專機的人說：林彪確實身體不行，面黃肌瘦。小汽車一直停到飛機門口，很熱的天，都要用風衣蒙著腦袋，有風時還要蒙上葉群的頭巾。由警衛員扶著從汽車裏下來，再架上飛機。而最後一次上飛機，什麼也不顧了，好像不想活了似的。9 月中旬的北戴河已經很冷，“禿老頭”光著頭，帽子都沒來得及戴，“胖女人”也沒有戴頭巾。平時葉群都是坐自己的專車，她讓她的專車拉林豆豆他們，事先收拾好的文件都裝在她專車的後備箱裏，但女兒林豆豆沒來，裝文件的專車也沒來，“胖女人”也顧不上了，甚至等不及卡車載來客機的梯子，就和“禿老頭”從駕駛艙的折疊鐵梯爬了上去。機艙門還沒有關，飛機就滑向了跑道。這時充電瓶車的連線插頭還沒拔，硬給撕扯掉了。

專機從來都是機組先到機場等首長，都養成習慣了，從來沒有首長到了而機組還沒到的先例。但潘景寅親眼看見林彪上了飛機，又聽見葉群和林立果大喊有人要害首長，那時林彪還是“林副主席”，他敢不飛？天上下刀子也要起飛啊。

佟玉春（山海關場站參謀長）回憶：一名機組人員（邰起良）正在打電話，我沖他喊，飛機不能飛。他愣愣地看了我一會兒，沒說話。

潘站長等人從場站調度室出來，就看見了三叉戟身邊的“大紅旗”。他們迅速跑到潘景寅的房間，沒有人。再跑到停機坪，只見機組穿皮夾克的細高個兒（邰起良）在拿著槍的“年輕軍人”前面走，樣子有點猶豫。

很快飛機滑動，潘站長想對空鳴槍叫人，已經來不及了。

劉吉純回憶：到了機場，機場一片黑暗，先看見林彪的“大紅旗”停在那裏，在我們前面趕到的八三四一部隊戰士站在車旁。我問他們飛機呢？他們指著前方的跑道說，在跑道上。不是三叉戟，而是另一架小飛機，周圍站著拿槍的戰士。因爲天很暗，看不見，我們準備到前面看看。剛走幾步，大飛機震耳欲聾地滑動了。[3]

這時機場大亂，槍聲，喊叫聲，車輛穿梭聲，伴著飛機的轟鳴聲，整個停機坪混亂到了極點。平時執行專機任務，莊嚴極了，隆重極了。機組先到機場準備飛機，再由先遣人員搬東西，歡送的人車水馬龍，最後才是“姍姍來遲”的首長。怎麼林彪專機就成了這樣的“一鍋粥”呢？焦點肯定在二五六號三叉戟上，是壞人深更半夜把飛機開跑了嗎？可三叉戟引進中國才兩年，除了幾個專門學過的飛行員，沒人能駕馭得了啊。當時大家還沒敢往潘景寅身上想，沒敢想他居然一個人把三叉戟開上了天。

一輛滿載全副武裝戰士的卡車，在停機坪中央煞住。混亂中，有人喊開槍，有人喊不准開槍。一輛吉普車在距離第二副駕駛康廷梓幾米遠的地方停住，跳下一位 40 多歲的陸軍軍官，右手拿著手槍。大概是他看到康廷梓穿著飛行服，

認定他與機場的海軍不同，左手拉著康廷梓，右手舉槍指著遠去的飛機，用濃重的山東口音說：你你，快把飛機攔住！康廷梓想：我連誰在飛機上都不知道，赤手空拳，怎麼把飛機攔住？康廷梓問：是誰在飛機上？陸軍軍官並不回答康廷梓的問題，卻一個勁兒地說，這架飛機不能起飛，把它攔住！康廷梓急中生智，用手指著吉普車，"命令"陸軍軍官：快，把吉普車開到跑道上，對準飛機，堵住它，它就不敢起飛了。陸軍軍官明白了康廷梓的意思，上了吉普車，但已經來不及了。[4]

于仁堂（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副大隊長）回憶：我們的車開到離飛機 100 米的地方，我急忙往調度室跑，跑到半路，飛機已經發動。我先到調度室南門，門不開，又往東繞到後門。剛進門，看見一位海軍同志，我說快告訴調度室，這架飛機要控制，不能起飛。他隨即上樓去了，我又向飛機方向跑，跑了約 30 米，看到飛機在滑行，快進跑道了。我又返回調度室，快到後門時，碰見機場參謀長佟玉春，我急急地說，這架飛機情況不明，無論如何不能讓它起飛，你要採取緊急措施。佟參謀長說，我們剛才也接到了不能起飛的命令，可現在來不及了，飛機已經進跑道了。我邊跑邊掏槍，打了三槍，試圖讓飛機停飛。[5]

佟玉春回憶：我馬上去調警衛連，飛機已經發動，我向值班員借了一把手槍，連開了三槍。井長林（山海關機場警衛連上士）回憶：9 月 12 日零點多，槍聲把我從夢中驚醒，還沒明白，聽見連裏的緊急集合哨，趕快提槍跑出去。連長

張均成說，有專機任務，馬上行動。站專機崗的人選特別嚴格，不但要是黨團員，還要查歷史，因爲人不夠，負責給養的我也被挑選上了。連隊距離調度室 100 米左右，跑步到調度室樓下，調度室前面就是停機坪。這時，三叉戟已經滑出停機坪，我們都非常驚訝，怎麼我們站崗還沒到位，飛機就滑出了呢？這時過來許多陸軍，帶著槍，三五成群在停機坪上彎著腰來回跑動。後來才清楚，他們是八三四一部隊的，奉命阻止飛機起飛。

當時天很黑，跑道燈都沒有打開，各種通信、導航、車輛也沒有到現場，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過的。在場的一些首長都很慌張，來回跑動，只見副站長趙雅輝站在調度室窗外向裏邊喊：快對空聯繫，把飛機喊回來！同時，陸軍把停機坪上的另一架伊爾 14 專機包圍住了。有些陸軍還衝進調度室，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問附近哪個機場有殲擊機。又過了五分鐘，不知是誰的指示，叫警衛連到機場四周站崗。

程洪珍停住腳步，撿了一條命

潘景寅是怎麼上的三叉戟？知情者只有空軍司辦秘書程洪珍。

二五六號三叉戟從西郊機場快到山海關機場時，林立果交代給程洪珍幾件事：明天早晨 7 點首長要與黃永勝通電話，要把機場的保密機準備好。下飛機前，把飛機上的行李往一塊兒歸一歸，免得明天和"子爵號"（葉群）的東西搞混

了。還要瞭解一下飛機維護、加油、警衛等情況。

20 點 15 分，三叉戟平安降落在山海關機場。林立果走進機艙，對機組人員說：明天林副主席要坐這架飛機。人民解放軍戰士要聽林副主席指揮，關鍵時刻要起作用，我代表林副主席謝謝大家。

程洪珍下飛機前，先把從北京帶來的一二十個箱子集中在一起，然後到西郊機場調度室主任李海彬的臨時宿舍。這裏有保密電話，一台通北京，一台通北戴河。程洪珍進行了通話試驗，放下心來。

這時，潘景寅正和李海彬一起觀看全國氣象圖。

程洪珍問：飛機維護好了嗎？

潘景寅說：維護好了，不會有問題。

程洪珍又問：飛機警衛好了嗎？

這個你放心，潘景寅笑了一下。機場的人可聰明了，看到什麼飛機來了，就知道派什麼人警衛。

程洪珍跟著林立果，有好幾天沒怎麼睡覺了。看一切都安排好了，再沒有事情，20 點多，他就去睡覺了。[6]

潘景寅呢？一夜沒睡。按慣例，機組在飛行後要開一個總結會。潘景寅對機組說：明天的航線到什麼地方還不知道，聽指揮就行了。第二副駕駛康廷梓提出：不知道航線，天氣情況如何瞭解？潘景寅說:明天到機場氣象台看一下全國的天氣圖就行了。最後潘景寅說：明天早上 6 點起床，6 點半吃飯，然後早一點到機場準備飛機。現在時候不早了，抓緊時間休息吧。[7]

機組很快熄燈睡了，潘景寅一個人又返回調度室。

調度室主任李海彬當晚也沒有睡覺，陪著潘景寅聊天。

潘景寅接到北京的保密電話，李海彬只聽到他連聲說，好的，好的，最後說明白。放下電話，潘景寅出去把三位機械師叫了起來，並叫李海彬要加油車加油。李海彬問：加多少？加兩噸半。那一個加油車就夠了。潘景寅說：要兩個吧。從潘景寅接電話叫油車到飛機起飛，只有 35 分鐘的時間。

零點 3 分，李海彬要了加油車。

零點 5 分，潘景寅叫機械師起來加油。

這時北戴河八三四一部隊的宋定忠通過專線電話打給李海彬，說有小轎車去山海關機場了，車到了別讓他們走，要卡住。

這是什麼意思？潘景寅和李海彬大眼瞪小眼。

程洪珍正在熟睡，潘景寅和李海彬把他叫醒，問他認識這個宋定忠嗎？程洪珍說不認識。他們都覺得情況嚴重，必須立即報告林立果。

程洪珍往 96 樓打電話，沒人接。他又往北京打，找到周宇馳，報告了剛才的情況。周宇馳急急地說：知道了，知道了，“康曼德”（林立果）已經出發，現在情況緊急，北京正在追查，你快跟他們跑吧。

程洪珍慌了，同潘景寅和李海彬商量怎麼辦。

北京又來電話找潘景寅。潘景寅接過電話，對李海彬說：誰要問這架飛機來幹什麼，就說是訓練。問什麼時候回北京？就說有故障。李海彬說：空軍調度室問了好幾遍，這

架飛機什麼時候回北京？潘景寅氣衝衝地說：老問幹什麼呀？就說還沒有走！

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後，急著要打電話到山海關機場找潘景寅，叫他回北京。電話是打通了，但廬山會議吳法憲"翻了船"，威信一落千丈。空軍流傳吳法憲"反"林彪，所以潘景寅沒有聽他的，按"機"不動。

正不知怎麼辦才好，外面傳來汽車聲，估計是林立果來了，潘景寅立刻往外跑。跑了幾步，看見"大紅旗"正往三叉戟跟前開，潘景寅加快了腳步。程洪珍也跟著跑出來，他跑了沒幾步，看見飛機前亂成一團，突然一股害怕湧上來。

程洪珍站住了，呆呆地望著正在快速移動的三叉戟。[8]

他撿了一條命，但據說他以後得了精神病。

三叉戟終於像醉漢一樣起飛了

林立果在上飛機前，拉著在場的場站政委史岳龍和副站長趙雅輝的手，往三叉戟上拽，說首長要接見他們。林彪上飛機的慌張他們都看到了，再加上接到了"禁空令"，他們覺得不對頭，兩個人也懵了。

事後調查，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就沒上飛機。

如果上了飛機，那就說不清了。大概林立果是讓他們組織機場部隊阻擊吧？在那種時候，爲了保證中央首長的安全，子彈都收上去了，場站警衛連的槍膛裏都沒有子彈。如果眞打起來，不知有多少人會成爲冤死鬼。

二五六號三叉戟是從山海關機場跑的，山海關機場的官兵都覺得對不起黨中央，對不起全國人民，但是，責任很難歸到機場的哪一個人身上。如果林彪不是紅得發紫，就是十個百個也跑不掉。阻止飛機起飛，很簡單，用槍把飛機輪胎打壞，或用幾輛大卡車擋在跑道上，二五六號三叉戟再有天大的本事，也起飛不了。方法倒是一個比一個原始，可誰有膽量執行呢？這個飛機是"林副統帥"坐的呀，海軍山海關機場根本無權過問。機場調度室的調度都是西郊機場派來的，山海關機場連調度權都沒有。

自從林彪一家住到北戴河後，隸屬海軍的山海關機場就成了他們家的專用機場。爲了不影響北京和山海關之間的頻繁飛行，山海關機場的飛機和飛行員都轉場了。只留下機場警衛、通信、調度和後勤保障等場站人員。

更何況那時誰也不知道林彪要逃跑。

當時在場的有站長，有政委，但他們的任務是保證專機安全。出現新情況，必須請示，沒有上邊的意思，誰敢輕舉妄動？不過機場並沒有給二五六號三叉戟開"綠燈"，奉命關閉了夜航燈，也沒有打開通信和導航設備。

當時並沒有明確說一定要把三叉戟擋住。場站參謀長佟玉春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他看見"大紅旗"衝進來，林立果下車大喊大叫，情況反常。他馬上派一位科長和一位助理員分別上了兩輛加油車監督，讓他們到前方擋住飛機。兩輛加油車一輛沒到滑行道，另一輛倒是"勇敢"地迎上去了。但一看三叉戟氣勢洶洶地衝過來，車上的科長藉故下了

車，只剩一個山西新兵劉三兒。在那種時候，上邊沒有明確指示，幹部跑了，新兵劉三兒哪有膽量去攔專機？不要說“攔”，就是碰壞了專機也不是鬧著玩的，沒準兒就要掉腦袋。所以，劉三兒儘量把車往滑行道邊上靠，可三叉戟機翼長，右機翼還是刮壞了加油車的罐口蓋，機翼上的鋁皮掉了，綠色玻璃燈罩和有機玻璃也刮碎了。

劉三兒當場嚇出了“病”。

事後有關責任者都被關起來，沒擋住飛機，誰知道會戴上什麼“帽子”。經過詢問，包括站長、政委、副站長、參謀長和從加油車溜掉的兩個幹部以及劉三兒，都沒受到處分。劉三兒因為神經受了刺激，服役期滿後由部隊出面聯繫了工作，從農村進了縣城，也算因禍得福吧。

在那道惟一的白光照耀下，二五六號三叉戟勢不可擋地滑向跑道。滑到東頭，機頭調轉過來，發動機的聲音增大，開始加速。因為動作太急促太猛烈，像個醉漢，還沒有對正跑道就拐了彎，一個主輪偏出滑行道，開進了黃豆地，將黃豆地軋出一尺多深的溝，割下來的黃豆都被吹跑了。幸虧三叉戟馬力大，要不非“窩”在黃豆地裏。三叉戟從黃豆地裏“掙紮”出來，又軋壞了兩個跑道燈。在正常情況下，大飛機應該從聯絡道開到跑道盡頭才能起飛，而三叉戟在跑道頭 500 米處就強行起飛了。

這時是零點 32 分。

跑道上惟一亮著的照明燈熄滅了，三叉戟也沒有打開翼尖燈和機身上的閃光燈，很快被茫茫夜空“淹沒”。

林豆豆回憶：在我們第五次請求採取緊急措施後，約莫 30 多分鐘，一陣隆隆聲在我們頭頂上盤旋，向南，又向西，後繞到北……[9]

張清林回憶：我和楊森陪著豆豆，她仰著臉，一直望著北方的夜空。那裏黑黑的，什麼也看不見，很快越來越微弱的飛機聲也沒有了。豆豆緩慢地說，都解脫了，再不會痛苦了……她沒有哭泣，也沒有激動，非常平靜，對站在旁邊的我說，你真猜中了。林立果學開飛機，他思想無邊無際，我說過不定哪一天，他開飛機跑到國外去了。這是一句玩笑話，實際上直到這時，我對三叉戟去蘇聯的感覺一點也沒有。[10]

張耀祠回憶：三叉戟起飛後，林豆豆兩次打電話給我，準確的時間沒記清，當時很緊急。頭一次說飛機起飛了，聽到了飛機的聲音。第二次問截住飛機沒有。[11]

張清林回憶：九一三後的幾天，北戴河還算平靜，我們在外面散步。豆豆對我說，好多事都被你說中了。你再說說，三叉戟會怎麼樣？我說會掉下來。你想，它沒有地方可走，只能往北飛。首長清醒，會不讓，然後就是空中搏鬥，飛機還不掉下來？豆豆不太相信又好像不得不信，說如果飛機真飛到莫斯科，首長沒下飛機，就會被活活氣死。……

林豆豆一直在想，也不知道他們到哪裏去了，是不是到廣州啦？[11]

註釋：

[1] 參見于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干歷史問題的考察》，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第一版，188 頁

[2]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 1982 年第一版，157-168 頁

[3] 採訪八三四一部隊警衛科長劉吉純筆記，1996 年 10 月 21 日

[4] [7] 採訪二五六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康廷梓筆記，2000 年 7 月 14 日

[5] 採訪八三四一部隊大隊長姜作壽筆記，1997 年 10 月 20 日

[6] [8] 參見程洪珍關於九一三事件的交代材料

[9] 採訪林豆豆筆記，1999 年 10 月 11 日

[10] [12] 採訪張清林筆記，1998 年 5 月 10 日

[11] 採訪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筆記，2003 年 2 月 18 日

第五部

溫都爾汗

1971年9月13日零點32分，林彪專機在沒有任何地面保障，機組人員不全的情況下，從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爲什麼如此慌張呢？不要說中國第二號人物的專機，就是普通飛機，機場關閉，機組人員不全，也萬萬不能起飛啊。

第二十五章
中國駐蒙古大使館

蒙古外交部突然拜會中國大使

中國大型飛機墜毀蒙古，死亡這麼多人，這在蒙古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墜毀地點在蒙古肯特省貝爾赫礦區以南10公里處，離中蒙邊界至少350公里，是蒙古的縱深地帶，離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不遠。在墜機一天多以後，9月14日上午8點，剛上班，蒙古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電話通知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半個小時後，蒙古外交部副部長額爾敦比列格受政府委託，緊急約見中國駐蒙古大使。[1]

王中遠（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翻譯）回憶：蒙古方面說，有一架中國飛機，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出事故，有9個人，當時提出抗議，讓我們做出解釋。[2]

"文化大革命"十年，九一三事件正好在"文革"中間。受極"左"的影響，中國一直反修，反對蘇修、蒙修，與蘇聯處於敵對狀態。蒙古緊跟蘇修，軍事配合，製造很多事端，兩國關係非常緊張。那時蒙古每天的廣播都有反華的聲音，只要集會，必定要反華。我們翻譯就聽有沒有反華。聽見反華幾個字，後面就不聽了，拍屁股就走，反華退場很多。

以前大使館連大使都沒有，二秘當代辦，後來去了參贊當代辦。

到 9 月兩國關係剛開始緩和，不再像 1969 年珍寶島戰鬥後劍拔弩張，雙方重新互派了大使。1971 年 8 月 20 日，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國際列車抵達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剛到任才 20 多天，因館務繁忙，許文益還沒有拜會蒙古的這位外交部副部長。

正常情況沒有拜會不能約見，事先也沒有預約，顯然事情又重要又急。

但是，完全沒想到是中國噴氣式飛機失事。

一般講，軍用飛機、戰鬥機不可能上九個人，太多了；而客機一般也不會只有九個人，又太少了。看來這架飛機非同尋常。不是戰鬥機，又不是客機，是不是專機？這麼大的飛機，至少不是一般人，肯定是首長。[3]

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工作人員都很吃驚，猜測，很多猜測。

蒙古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額爾敦比列格說：這件事我們通知中國大使館遲了一些。因爲事情發生在夜裏，我們知道得也比較晚，有關部門也是到上午才知道。昨天天氣不好，我們派人去出事地點瞭解了中國噴氣式飛機失事的情況。經多方查證，飛機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乘員九人，包括一名婦女，不幸全部遇難。對中國軍用飛機深入我國領土，我代表我國政府提出口頭抗議。可以認爲是侵犯了我國領空，我有關方面正在繼續調查，我們保留對此事再次進行正式交涉的權利。

蒙古首先抓住主動權，把責任和可能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蒙方不明原因，推託也是可以理解的。小國嘛，中蘇對立，它夾在中間，怕咱們做文章。雖然是摔了，但你是軍用飛機，畢竟還是侵入了人家的領空，先下手爲強嘛。

可是越境的飛機沒有攻擊行爲，而且機毀人亡了呀。

許文益大使是老外交官了，外交經驗豐富，處理過很多重大事件，他思索該如何回答。

額爾敦比列格放緩了口氣：我第一次與您正式見面，很遺憾提出這樣的問題。希望大使轉告中國政府，並希望你們近期內就中國軍用飛機深入我國領土的原因給予正式解釋。

許文益感謝他的通知，說對於副部長提出的口頭抗議，在我沒弄清楚和瞭解事實眞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轉告我國政府。還說正當中蒙兩國關係剛剛開始正常化的時候，我國飛機由於某種原因在蒙古領空失事，這當然很遺

憾。但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我不知道蒙古方面對失事飛機採取了什麼措施？另外出於友好方面的考慮，請蒙古方面幫助瞭解，這架飛機是因爲什麼原因誤入蒙古境内的？今天我與副部長第一次見面，但我希望這不會影響我們兩國關係的改善。

最後，許文益大使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派人到出事地點看看？

額爾敦比列格作了一些解釋後說：飛機失事近兩天了，但只發現九名乘員的屍體，當時沒有一個人活著。現在天氣還熱，較長時間保存屍體比較困難，需要以某種方式掩埋。大使提出派人到現場，我是否可以理解爲這是你們的正式要求？

許文益大使說：可以這樣理解。

額爾敦比列格說：我們可以滿足你們的要求，對於中國飛機進入我國領土的原因，相信大使會做出努力，使中國政府近期做出解答。希望使館儘快通知派什麼人去，何時動身？

如此這般，似乎蒙古發現了失事飛機的某些秘密，急切想知道更多。

蒙方對這次飛機失事的態度還比較克制，雖然口頭抗議，但語氣緩和，很快同意並安排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官員到現場視察。

9 點 30 分，許文益回到大使館，立即向國內報告。

當時大使館沒有電台，只能通過蒙古電報局。但蒙古電

報局說，線路不好，最快也要四個小時以後。急中生智，許大使想到大使館有一條直通北京的專線，那是 50 年代中蘇關係友好時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架設的高頻電話線，北京和烏蘭巴托也順便安裝了一部。後來中蘇關係惡化，專線電話也就關閉了。半個小時後，要通了北京，但北京電話局說外交部的機器壞了。許大使決定先打國際長途電話，通知外交部有重要情況報告，要求啓用專線電話。

經過一番周折，14 點 20 分報回失事飛機的情況。[4]

去墜機現場的時間一拖再拖

9 月 14 日 11 點 50 分，蒙古外交部來電話，同意中國大使館派三個人去現場。並說專機已經準備好，下午即可動身。可是這時還沒有給國內打通電話，到失事現場事關重大，沒得到國內指示前，不能冒昧行動。於是大使館藉口尚未準備好，請求推遲起飛時間。午飯後不久，蒙古外交部又來電話催，說專機已經準備好，13 點左右出發。

中國駐蒙古大使館還是請求推遲。

一直到 18 點，終於盼來國內指示，要許大使親赴現場，詳細觀察飛機失事的原因，飛機殘骸可以拍照取證。如有屍骨應要求帶回，沒燒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轉交我們，寫明清單和收條，並注明如有蒙方取走的物品和文件，也希望查出交還我們。

這封電報有意回避了飛機的性質和死亡者的身份，但許

文益已經感到“事情”比預想的還要嚴重。如果是一般的失事飛機，使館工作人員去看一看就行了，沒有必要“驚動”大使。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先報的人員名單，只是孫一先帶兩名翻譯。

此時蒙古外交部已經下班，他決定打破常規，緊急約見額爾敦比列格。

額爾敦比列格晚上有外事活動，會見安排在 20 點。

許文益大使說：奉政府之命，失事飛機可能是由於迷失方向，誤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境，對此我們表示遺憾。對蒙古政府願意提供飛機並指派領事司長陪我們到現場視察，表示感謝。我將親自率有關人員前往現場，請蒙方給予幫助。

額爾敦比列格馬上問：誤入之說，是否是正式答覆？

許文益大使說：可以這樣認爲。

這是否是最後答覆？

爲什麼這樣緊追不捨？許文益也警覺起來。他思索了一下，說這是我國政府在得到使館的第一次報告後給我的指示，是正式答覆，但我理解不是最後的答覆。

額爾敦比列格問：失事飛機是從哪裏到哪裏？朝哪個方向飛？是怎樣迷失的方向，誤入我國領土的？

許文益大使坦率地說：目前爲止無法答覆。並反問，蒙古方面是否有飛機失事的進一步材料提供給我們？

額爾敦比列格也非常謹慎，說暫時沒有。

其實這時候蒙方是明知故問，他們已經從三叉戟內的航圖上看到了標出的航線，知道飛機是從河北的北戴河穿過失事現場，一直到貝加爾湖附近的伊爾庫茨克。大概是他們想從中國大使嘴裏套出更多的話來。

許文益大使希望明天上午動身，額爾敦比列格表示同意，讓他們作好明天赴現場的準備。他對中方未能及時派人趕赴現場有點抱怨，說飛機失事兩天了，等你們到現場大概要 60 多個小時了，天這麼熱，如果屍體變化太大，我希望你們不會提出更多的問題。

許文益大使馬上將約見情況報告國內，翌日淩晨得到國內指示，儘量爭取火化，將骨灰帶回。如火化有困難，可拍照取證，就地深埋。豎立標誌，以便以後把遺骨運回國內。

這時候蒙古也有些“明白”了，先是遲遲不動身，然後緊急約見蒙古外交部副部長，中國大使又要親自出馬？看來外電的傳聞並非空穴來風，飛機的乘員中肯定有不一般的人物。[5]

王中遠回憶：當時我們感覺到不是一般的事件。具體往誰身上想？誰也不敢想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林彪。林彪紅得發紫，誰敢想林彪呢？後來知道，所有的人都很震驚，爲什麼震驚？都寫進黨章了，老人家還信得過誰呀？反過來，又想爲什麼？那麼多高級領導人，出生入死，都打倒了，就這個寫進黨章的接班人跟老人家，究竟爲什麼？[6]

現在輪到中方催促蒙方了。蒙古人似乎不那麼著急了，藉故一推再推。

孫一先回憶：9 月 15 日早上 8 點，我們每半個小時就催問一次，詢問什麼時候到現場。蒙方先說不知道，後來又

說溫都爾汗天氣不好，不能接受飛機降落。其實天空非常晴朗，萬裏無雲。拖到 13 點 30 分，蒙古外交部終於說，專機 14 點 30 分以後可以起飛。

原來從赤塔飛來的蘇軍直升機眼下正在墜機現場，不能讓他們同中國人"撞車"。直到蘇聯人在現場折騰夠了，中國人才被允許前往。

後來才知道，蘇聯人 9 月 14 日去了一趟，9 月 15 日又去了一趟，所以推遲了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官員前往現場的時間。[7]

蒙方也調整了"戰略部署"，組織起一個龐大的視察班子，有邊防內務軍事務管理局處長桑加上校，外交部領事司司長高陶布，外交部二司專員古爾斯德，國防部副處長達木丁上校，邊防內務管理局桑加上校等官員，還有航空、法律、法醫等方面的專家，法律專家達希澤伯格，民航局專家雲登少校，法醫莫尤，衛生組組長桑加道爾吉大夫、卓乃大夫，肯特省檢察長烏爾金道爾吉，以及報紙和蒙古通訊社的記者，以及電影攝製組等等，足有幾十人，看來蒙方也是相當重視的。

一架伊爾-14 飛機送中國大使等四人和蒙古的龐大班子去墜機現場，起飛時間 14 點 45 分，航程 300 公里。15 點 46 分，到達溫都爾汗"土機場"，飛行時間是 61 分鐘。溫都爾汗"土機場"確實簡易，沒有塔台，只有幾間平房，幾輛電台車。在草地上墊了層紅粘土，就成了跑道。機場周圍看起來非常平坦，沒有土包，也沒有高樹。但是沒有夜航設備，

也就是說，到了夜間，黑乎乎的，機場和草原沒有什麼兩樣。[8]

王中遠回憶：我們在機場坐兩輛嘎斯 69，直奔墜機現場。[9]

孫一先回憶：我們的汽車從溫都爾汗出發，沿東北方向的沙土公路和克魯倫河，行駛一個小時，轉向東北，進入丘陵草原。一路上荒無人煙，除斷續的饅頭形土包外，還有二三十米高的石頭山，汽車在丘陵間顛簸，常被高高彈起。向東北方向走了不到一小時，離開沙土公路，拐入正北一條草叢小路。這裏很少有車輛通過，車胎壓得枯草吱吱直響。小道左邊是一連串較高的山丘，右邊是一片向上的漫坡，坡頂是燒焦的草地。[10]

下午近 18 點，大使許文益和孫一先、沈慶沂、王中遠到達位於溫都爾汗西北的墜機現場。

看來墜機現場的火燒得很大

爬上漫坡，首先進入眼中的是倒梯形的焦黑草地。

站在高處望去，二五六號三叉戟是由北向南迫降，著陸點正好在盆地中央，墜毀在盆地南半部。飛行員對迫降的地點有選擇，飛機從低向上走，以此增加一定的阻力。

這是一塊被牧民稱作蘇布拉嘎的不太規則的長方形盆地，除了西邊是向下的漫坡，其他三面都是起伏的土丘。盆地南北長 3000 多米，東西寬 800 多米，平坦得就像人工鋪

成。到處是 9 月没膝的乾枯茅草，草根盤結，腳踩到沙土上有種軟綿綿的感覺。

許文益問：是否知道飛機失事的具體情況和原因。

蒙方答：飛機發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在蒙方撰寫的《現場調查紀要》中，說該機是在没有外來影響下，而由於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飛行高度，試圖用腹部著陸時，右翼撞地，造成嚴重損壞，因此發生爆炸而失事。

蒙古員警圖瓦尼·久米第一批到現場，他看見三處大火。後來美國新聞記者問他，他不知道哪一處先起火。他從車中下來，没走兩步，幾乎被什麼絆倒，地上是一具背朝上的屍體。

黎明時的現場是一幅可怕的場景，九具屍體散成一線，大火幾乎燒光了他們身上的衣服，只剩下手槍皮套和腰帶，當天從 200 英里外的首都烏蘭巴托趕來的蒙古外交部副部長杜格瑟仁金·額德畢力格說，幾乎不可能辨認出飛機上任何一個人。但飛機印記、毛像章、筆記本等，都表明這是中國人的飛機。

司長高陶布進一步解釋說：凌晨 2 點 30 分左右，貝爾赫螢石礦的夜班工人聽到一聲很響的爆炸，隨即發現東南方一片火光。連忙叫人，分乘兩輛卡車到現場滅火。蒙古政府有規定，草場著火，必須馬上撲滅，否則要受罰。工人到達現場，火勢還很猛，透過火牆看到失事的飛機。他們一面撲火，一面向溫都爾汗當局報告。伊德爾莫格縣的牧民也趕來

了，一齊把火撲滅，這才看見九具屍體。等省裏來人，天已經快亮了，這才調公安部隊看守，並報告烏蘭巴托。

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官員看過現場後說：飛機衝出 1000 多米，第一次落地没爆炸，跳起來。第二次落地折斷了右機翼，機身因此破裂著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衝撞甩出來的，草地上一片狼藉。

從盆地中央開始，由北向南，呈倒梯形，約 800 米，寬 30 至 200 米的草地全部燒焦，散落一塊塊飛機殘骸，靠近焦土的南部，是散落的屍體。盆地中央，有一道由北向南的 S 型擦痕，飛機著陸點以南約 30 米長的草皮被機腹壓實，說明飛機是肚皮擦地著陸。飛機彈跳了 30 多米，才開始進入大片焦土。機身似乎失去平衡，傾斜觸地。西側平行處，是右機翼劃出的深約 20 釐米的一道槽溝。再往南，擦地痕跡消失，進入燃燒區，飛機碎片越來越多，越來越大，面積越來越廣。最北頭飛機翅膀擦地的痕跡很重。飛機肚子擦地平衡，翅膀擦地產生高溫，就產生爆炸，速度很快，一個翅膀擦地翻滾爆炸。標有“256”字樣的翼尖斷成兩半，一個斷機翼上寫有“中國”兩個大字。

最顯眼的是機頭西北 60 米處斜臥的機尾，有三層樓房那麼高，是從中發動機的進氣口處炸斷的，只剩一段發動機外殼與尾部連結。再往前，逐漸看到機身的較大碎片，機身的蒙皮，發動機底部的包皮，很大的弧形機身，連著摔碎的舷窗，炸癟的發動機尾端噴口，一扇門從合頁連接處炸開……

孫一先注意到一個炸掉大部分外殼露出內腔的發動機反推力裝置，機尾沒有著火，末端斷裂處露出一大堆五顏六色的雜亂電線，有的電線露出銅絲，有一條粗電纜連著一個碎片。機尾垂直舵沒有損傷，右水平舵尖捲曲，左水平舵插在泥沙裏，支撐斜臥的整個機尾。垂直舵前豎板上是噴塗的五星紅旗，旗下方是機號二五六。

機頭灰燼前方 80 米處，燒焦的草地頭，有一個從根部炸斷的起落架，起落架上完好的輪胎，滾到南邊 200 米處。它的後面朝北偏西的一條弧線上，散佈著三堆屍體，機尾被遠遠甩到機頭的右後方，靠近燒焦的草地邊。看來機上人員和機尾都是在機身炸開的一瞬間甩開了的。但它們並不在一條直線上，令人有些不解。機尾離機頭大約 60 米，最遠一具屍體離機頭大約 50 米，說明飛機爆炸的猛烈。從機頭到機尾這條東南到西北的斜線上，與三堆屍體朝北偏西那條弧線，大約成 30 至 40 度的夾角，全是飛機上的殘片。

許文益囑咐多拍些照片，仔細觀察失事原因，以便送回國內研究鑒定。

二秘孫一先愛好攝影，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他抓緊黃昏前的光線拍了好多卷。回國彙報時沒帶全部照片，只是挑了一些好的，剩下大量的底片留在大使館。這麼多年了，不知道這些底片還在不在？

墜機現場的屍體大多仰面朝天，四肢叉開，頭部多被燒焦，面部模糊不清。很顯然，這是飛機墜毀摔撞燃燒造成的。孫一先把現場的三堆屍體由北向南編成 1 至 9 號，從各個角

度拍下來。屍體分成非常明顯的三堆，事後查明，機尾的一堆屍體，1 號是林彪座車司機楊振剛，2 號林立果，3 號劉沛豐。中間的一堆屍體，是 4 號特設師邰起良，5 號林彪，6 號機械師張延奎，7 號空勤師李平，這個位置似乎是在位於前艙的高級房間裏。

據林彪秘書介紹，林彪一向怕生人，那爲什麼在準備迫降時，林彪讓素不相識的三位機械師保護他，而不讓兒子或司機保護他呢？兒子和司機也同樣身強力壯啊。當然也可以這樣考慮，大型飛機在野外迫降非常危險。過去林彪一家都是儘量避免坐同一架飛機，這次三個人“擠”到了一起，又趕上危險的野外迫降，要死別全死，分在機艙的三個地方，沒準還有哪位命大者能“僥倖”。可是林彪不讓兒子保護，爲什麼也不讓司機楊振剛保護？

機頭燒成灰燼，駕駛艙的火勢最猛，鋁合金機殼都燒成了灰。位於機頭的是 8 號葉群，她佔據了副駕駛的位置，9 號是駕駛員潘景寅。他頭朝向東，向著燒毀的機頭。潘景寅個子高大，體格魁梧，衣服基本燒光，只剩下褲腰碎布及一截腰帶。兩手掌及手指燒焦，鼻子和眼睛全部焦糊，頭髮燒焦。胸部左右鎖骨上下，各有一大片皮膚綻裂，腹側及兩腿也燒焦了。潘景寅的姿勢是仰面朝天，兩臂上伸過頭頂，手心朝前，兩腿叉開，左腿挺直，右腿彎曲，腳跟蹬地，像是要掙紮著站起來，看來死前非常痛苦。[11]

王中遠回憶：潘景寅燒得最重，奇怪的是與他在一起的葉群燒得最輕，雖然同在機頭，也許是葉群可以躲。而潘景

寅操縱飛機，火再大也只能堅持。再一個潘景寅穿著軍裝，葉群不一定穿軍裝，裏面至少不是的確良。所以葉群簡直就像臥在那裏熟睡，有的皮膚燒紅了，有的皮膚還沒有改變顏色，還是白的，只不過燒光了衣服。葉群的頭髮基本完好，面部沒有燒黑，只有額前略有焦糊，右顴骨連著眼角處，燒焦了銀元大的一塊。左嘴角被火燒歪，露出上排白牙。眉毛燒焦但沒有脫落，眼睛半睁著，似乎向前看，兩臂貼地斜伸，手心向上。左臂内側綻裂酒杯大的傷口，肌肉外翻。估計這位"空中小姐"不年輕了，有 30 歲左右。

我們都沒有處理過飛機爆炸，想像不出來現場是個什麼情況。正常死亡見過，追悼會，死者經過化妝。去前有預案，我到醫院要些手套，消毒品，帶去也没用，我們没碰屍體。印象深刻的是，九具屍體並不像通常飛機失事那樣，摔碎燒焦，而是有頭有腳基本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斷，燒傷嚴重，但沒有燒焦。由於燃燒時一氧化碳中毒，屍體皮下呈櫻桃紅色，亮晶晶如蠟人一般。好在蒙古 9 月天還比較涼，屍體没有太大變化，要是 7、8 月就……[12]

中國人提出要回屍骨，但不了了之

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親自起草給駐蒙古使館的指示電，大意是：請許大使約見蒙古副外長，奉政府指示，講明三叉戟迷失方向，誤入蒙古人民共和國領空，自行墜毀。中國政府對此表示遺憾。對蒙古政府在尋找飛機殘

骸、埋葬死難者遺體和清理死難者遺物等方面所給予的協助，中國政府表示深切的謝意。應死難者家屬的請求，中國政府決定把 9 具死難者遺體運回中國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帶回骨灰。爲此，中國政府請蒙古政府惠予協助，並希望蒙古有關單位將死難者的所有遺物交還我方。[13]

因爲 9 月還比較熱，蒙古方面建議就地安葬。

蒙古方面當時不知道是什麼人在飛機上，由於中國政府道了歉，也没有再爲難。但他們很狡猾，要求中方提供死者名單和身份。周恩來考慮，蘇聯當時還不知道林彪叛逃的情況，怕因運回屍體問題同蒙古發生爭執，會提醒蘇聯，就同意了蒙方的建議。

兩天後許文益催問，要求運回遺體，還催要死者遺物。

蒙方態度又強硬起來，反問爲什麼中方還未就失事飛機做出書面正式解釋？策倫朝達勒司長說：今天已經是 25 日，中國政府還未就中國飛機侵入蒙古領土一事做出正式解釋，對此只能表示遺憾。既然遇難人員的身份已經清楚，死者親屬是有具體人的，因而機上人員究竟是誰也就清楚了。希望中方將他們的姓名、年齡、職務和照片提供蒙方。蒙古政府只有在研究中國政府的正式答覆後，才能考慮對中國政府的要求予以答覆，如果你們拖延答覆，會不會產生不適宜的情况，我對此表示擔憂。

處理國際空難，哪有要死者職務和照片的？有點太"熱心"了吧？還非要對方寫一個爲什麼"誤入"的書面材料。他們明明知道中國不會接受，爲什麼這樣無理要求呢？看來，

蒙方如此強硬，與飛機失事以來國際上的紛紛傳聞不無關係。後來得知，此時蘇聯和蒙古已經從國際傳言中揣測失事飛機上有大人物，究竟是誰還不能斷定。因爲蘇聯要對死者屍體進行檢驗，所以蒙古當局千方百計阻止中國運回屍體。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中國高層首先要保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讓林彪在飛機上的事實擴散。只有保住密，才能把引發戰爭的政治事件化解爲一般的民航事故，迷航嘛，誤入蒙古。所以中國没有堅持要回屍骨。[14]

王中遠回憶：國內沒指示，我們不好行動，包括要回遺物。[15]

在第二堆和第三堆屍體間，有一個方形食品櫃，旁邊是一堆搜集起來的雜物，有一堆鞋子，有飛行人員的兩個圖囊，一個燒剩一半，另一個基本完好。打開看，裏面的航圖没有了，只有幾支紅藍鉛筆和黑鉛筆。圖囊旁是一堆手槍，一共六支，還有一支微形衝鋒槍。子彈散亂放著，還有兩個槍套和幾個空彈夾，没有發現空彈殼。還有一個 64 開的小本子，後來才知道是林立果的"講用報告"。

中國人問：爲什麼要一起堆放？蒙方解釋怕丟失。

估計在中國人到達之前，蒙古人和蘇聯人對現場進行過整理。

機上的人不可能揹空文件包走嘛。

引人注意的是屍體都没有戴手錶，也沒有穿鞋。因爲飛機迫降，衝撞扭曲得很厲害，乘客必須把身上的硬東西，如手錶、鋼筆、眼鏡、手槍等取下來，以防衝撞時扎入人體。也不能穿鞋，緊急出口放下充氣滑梯，穿鞋可能把充氣滑梯扎破，或一旦被絆住要翻跟頭。

這說明機上乘員都做好了迫降的準備。[16]

許文益回憶：對現場的初步看法是，一、蒙古方面基本保持了飛機失事現場，他們用白布覆蓋了屍體，並承認有些文件已經搜集保管起來。草地上還拾到九塊手錶等，個別燒壞，有的還很名貴，已單獨保管起來。二、飛機是由不明原因緊急著陸，機上人員都作了緊急降落準備，但飛機著地時失去平穩，右機翼觸地引起爆炸燃燒。三、飛機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標記"PIA"，說明飛機是從巴基斯坦買來的。但不知機上是何人，爲何在蒙古失事？現場的情景使許文益感到問題重大複雜。視察完畢，天已經黑透，蒙方一再提出蒙古没有火化習慣，屍體只能土葬，提出馬上選擇墓地，連夜挖墓穴，明天安葬。

許文益表示同意。[17]

翻譯王中遠選擇了墓地

王中遠回憶：墳場是我選的。我不懂風水，面朝祖國，朝向東，小山包上。我們不瞭解情況，當九位同志，也許是高級首長。不管怎麼說，是中國飛機，中國人，要處理好，當時我們的心情沉重。在現場草圖上，我用紅鉛筆標出墓地，寫著中國烈士，我們不知道情況，國內對我們不交底，主要爲了保密。[18]

9月16日，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中國大使館的官員第二次去墜機現場。

蒙古司長高陶布問許文益大使，法醫是否可以開始工作。

許文益大使認爲死因十分明顯，死者是由於飛機失事而死亡是清楚的，所以沒有必要進行解剖，不必再折騰了。

因此雙方商定不進行法醫解剖而埋葬。

蒙方士兵連夜挖大坑，長15米，寬3米。

蒙方還趕做了九口白茬棺材，蒙古士兵將每具屍體都用白布包裹，由北向南編爲1至9號，按編號入棺。9號屍體（潘景寅）身軀高大，爆炸瞬間兩手上舉，僵硬了。棺材很小，勉強裝進去，卻不能合蓋。蒙古士兵請示是否可以折斷，高陶布看看許文益大使。許文益大使痛苦地點點頭，只聽咯吱咯吱的骨折聲。

之後蒙古士兵釘上棺蓋，用汽車拉到墓坑邊，按編號逐一下葬。

按蒙古習慣，死者應覆蓋紅邊的長條黑布，然後蓋棺。但是來不及了，只好在九具棺木上覆蓋整幅紅布，上面再覆蓋稍窄的黑布。

高陶布對此表示歉意。

許文益大使問：昨夜提出的關於墓碑和放紀念物的問題是怎樣考慮的？

高陶布說：墓碑暫不定，紀念物可以從飛機殘骸中選一個，不寫字。

小沈出主意，把寫“中國民航”的兩段機翼放在上面，蒙方推說太大，不容易搬動。小王說不如把機尾炸掉的那個發動機進氣環搬來。高陶布和桑加互相交換了眼色，表示同意。蒙古士兵用汽車把進氣環和環中間的分流錐拉來放在墳頭上面。[19]

王中遠回憶：棺材在墓坑裏排成一排，每人一鍬土。

許文益大使和高陶布、桑加上校分別執鍬填土。接著孫一先和小王、小沈也填了土，最後由蒙古士兵填埋，堆起略高出地面的墳頭。每具棺木的頭頂都豎立一塊高出地面的木牌，塗著紅色的阿拉伯數字。寫上中國九同志之墓，只好這樣寫，也不知道姓名。[20]

大火後僅存一份個人證件，是林立果的身份證。

王中遠回憶：我和老孫勘測現場，有一具屍體，衣服燒沒了，的確良軍裝四個兜，兜在底下，裏面有一張底片，看出是在頤和園的冰上，看不出是誰。還有一個出入證，編號0002號，空軍大院林立果，男，24歲。林立果我知道，我在北大讀書時知道他是林彪的兒子。但當時沒多想，而且說了也可能引起別的麻煩。

11點，九名死者被安葬在距失事地點西邊1.1公里的無名高地的東坡，東經111°17’40”，北緯47°41’20”。[21]

30 多年後，有人去找過墓地。找了七八個小時，還沒有找到，都準備放棄了，最後在當地人帶領下才找到。那地方不好找，已經看不見墳頭了。當時墳堆也不是很大，又是鬆土，而且蘇聯人兩次去挖墳。30 多年過去，沒有人上墳

塡土，蒙古的荒原風沙又大，肯定成平地了。

“軍”還是“民”的劇烈之爭

9 月 15 日從墜機現場回到溫都爾汗已經是 22 點多了，吃飯時，司長高陶布說：我們都已經看了現場，應該寫個正式文件。

按中央指示，中方堅持民航飛機誤入。至於是不是被擊傷墜落，因證據不足，只能慎重對待。因此在暫不追究飛機墜毀原因的前提下，爭取達成協定。

但在實質問題上雙方分歧很大。在安葬遺體時，雙方就《安葬紀要》進行過討論，沒有取得一致意見。

9 月 16 日第二次去現場，孫一先注意到，與第一天相比，現場多了一支微型衝鋒槍和一支手槍，還有兩個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一個是工具包，裝著扳手、鉗子等，還有一個機關人員的文件包，也是工具，但裏面還有一支手槍。

這似乎是蒙方埋下的重要“伏筆”。

回到溫都爾汗已經是 17 點多了。當晚 22 點左右，蒙方送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飛行失事的現場調查紀要》，要求連夜會談。沈慶沂（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工作人員）和王中遠馬上翻譯，等文件翻譯出來已經是淩晨 1 點。

蒙方的《現場調查紀要》一口咬定是軍用飛機，抓住出入證、手槍、軍服這些軍人物品死死不放。死者的臉形雖然

分辨不清，但從燒毀衣服的特徵、周圍的武器、某些死者身上沒燒毀而留下的手槍套、子彈帶和從失事地點找到某些證件來看，證明他們是軍事人員。在失事地點有手槍 7 支，自動槍 1 支（實際上是 2 支），有的已經燒毀，子彈 43 發，槍套 8 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貨幣 5 元一張，10 元 6 張，共 65 元，燒了一半和完整留下的軍服、床上用品、椅套、書籍本子、手錶等東西。其中有些東西由地方有關部門保管著。這些跡象證明，失事飛機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

這時，蒙方不再使用“侵犯”和“入侵”，改用“進入”，但仍強調飛機是“軍事人員駕駛”，“軍事人員乘坐”，甚至說是“爲軍事目的服務”。

淩晨 4 點 25 分，雙方在旅館正式會談。

許文益首先發言，對蒙古政府提供的各種方便條件和蒙方人員的友好合作，表示感謝。接著提出十條修改意見。主要三點，提議把“進入”改爲“中國民航飛機由於迷失方向誤入蒙古國境”。不能光講中國國旗和二五六號，要加上“民航”二字。機上有“軍事人員”，也有“非軍事人員”。對於蒙方提交的《安葬紀要》，許文益提議，將序言部分改爲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友好幫助下，中國民航二五六號飛機失事遇難的 9 名人員的遺體按下述方式安葬。……

許文益發言後，蒙方建議休會 10 分鐘。但蒙方並沒有復會，而是到郵局發了電報，一直拖到 9 月 17 日 10 點 15 分才復會。

在等待時，許文益收聽到外電報導，稱中國關閉了所有

的機場，禁止所有的飛機起飛。這是不是與失事飛機有關？許文益考慮形勢緊迫，不宜久拖，要趕快向國內報告現場視察和談判的情況，聽取國內指示。

實際上，國內也很焦急。怎麼大使許文益到現場視察還沒回來？國內急需知道現場的情況，畢竟眼見爲實嘛。9月16日23點30分，一份催問視察情況的電報從國內發到中國駐蒙古大使館，並詢問爲什麼在現場滯留？許文益雖然還不知道國內的這個電報，但他能夠感覺到國內的焦急，提出鑒於我國慶臨近，大使要在今天趕回烏蘭巴托主持館務，建議雙方在烏蘭巴托繼續會談。如果蒙方一定要在這裏談，我方則由孫一先代表大使繼續商談。

蒙方聽說大使要走，有些意外。說我們來這裏的目的是瞭解和分析現場，雙方都有儘快結束這個問題的願望。大使工作很忙，大使也瞭解我們的工作也很忙。關於大使要回烏蘭巴托，我們已經報告上級，上級通知，希望儘快把《安葬紀要》完成，我們一起回去。

又談到9月17日下午，蒙方對中方的修改方案逐一駁回。不同意寫上中國民航因爲"迷失方向"，認爲蒙方沒有這方面的證據，沒有必要，也沒有根據這樣寫。蒙方代表桑加上校說，這架飛機失事沒有受到外來影響下，我們的意見，……證明他們是軍事人員這句話也要，表明死者穿的是軍裝，所以他們是軍事人員這一段要保留。

會談有些僵了。

到第三輪會談，已經是15點20分。蒙方看《現場調查

紀要》達不成協議，轉而討論《安葬紀要》，爭論的焦點還在是"軍"是"民"上。

國內指示電：如蒙方不同意"中國民航"，可以改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二五六號飛機。如蒙方堅持失事飛機是"軍人"，可改爲是中國軍事人員乘坐的中國飛機。在雙方決定不進行法醫解剖而埋葬一句後，應提議加上待運回國內。地方保管後，加上將由蒙古政府歸還中國政府。如果上述改動蒙方同意，可在紀要上簽字，否則繼續交涉。

在第五輪會談中，許文益說：這架飛機失事，蒙古政府已經採取了明確的友好態度。根據我的理解，蒙方不認爲這架飛機對蒙古有什麼不好的行動。因此，這架飛機乘什麼人，做什麼用，那是很次要的問題。關於軍事人員，也是很細小的問題，我不知道蒙古民航是否也是軍事人員管理和駕駛，但我知道有些國家是這樣的。因此，這個問題大的方面已解決，再提是什麼飛機、什麼人乘坐都是次要問題。你們頂多是想說明這架飛機上有軍人乘坐，或者是軍事人員使用的。這個話，從蒙古政府處理這個問題的態度講，我們認爲沒有說明的必要。事實上，現場觀察判斷，我們不否認機上有軍事人員，但也有非軍事人員。例如，那名空中小姐就不是軍人，軍人不會穿白皮鞋，"皮夾克"和"白皮鞋"都不是軍人。所以，爲了要照顧同志們的看法，要寫就把這兩種人都寫上去。孫一先說：我補充一點，我在蒙古工作多年，蒙古的民航也是軍隊領導和管理的，而且駕駛飛機的人都是現役軍人。不能因爲軍人駕駛，就肯定不是民航飛機。

蒙方的桑加上校有點激動說：我們有各方面的材料證明這些人都是軍人。高陶布說：我們有那樣的證件，如果互相不相信的話，那個材料可以公開出來。

最後，蒙方同意寫上失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人員駕駛的二五六號三叉戟 IE 型噴氣機，乘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9 人（8 男 1 女）的遺體，按下列情況安葬。把軍事人員改為公民有進步，但仍未寫上“中國民航”這四個關鍵的字。蒙方說中方是基於實際情況，没有證據證明這是民航飛機，所以只把號碼寫上去。這個號碼衣服上、機翼上都有，但飛機裏的材料没有一點提到中國民航，而都是部隊發給他們的證件。至於“白皮鞋”，也無法證明是那個婦女穿的，而不是放在飛機上的。

許文益說：我們不是怕承認軍事人員，而是從實際出發，要尊重事實。一是民航飛機，二是有軍事人員，也有非軍事人員。

高陶布蠻横地說：如果你們不同意，我們單方面簽字。

孫一先說：你們單方面簽字，不能代表我們，我們也没必要在場。

為避免搞僵，許文益建議大家不要著急，回烏蘭巴托繼續談。《現場調查紀要》通過了，《安葬紀要》自然就解決了，事情可以圓滿結束。

高陶布拒絕，表示他們馬上要單方面簽字。

許文益表示遺憾，最後一輪會談不歡而散。[22]

孫一先回憶：中蒙雙方多年惡化的緊張關係剛剛開始緩和，彼此猜疑仍然很深，雙方在會談中的思想狀態和言談表現，反映了當時兩國關係的現狀。在二五六號三叉戟墜毀原因尚不清楚的情況下，蒙方一再強調飛機墜毀是在没有外來影響下，而由於自身的不明原因造成，給我們的印象似乎他們在躲閃什麼，於是更加重了我們對於飛機可能被擊落的懷疑。而蒙方也懷疑這架軍用飛機無端進入蒙古領空，是否真是迷失航向，還是有意搞偵察破壞活動一類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他們死死咬住“軍”字不放。我們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抓住“民”字來應付，才能避免給對方什麼把柄。當然，由此而失去了達成協定要回死難者遺體和遺物的機會，這是比較可惜的。[23]

法國記者第一個報導了林彪事件

9 月 17 日 20 點 30 分，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向國内報告，大使等人已於 19 點回到烏蘭巴托，並簡要報告了現場情況和延長時間的原因。周恩來指示：速派專人送有關材料回國，當面彙報詳細情況。9 月 18 日凌晨 1 點，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報告：決定派二等秘書孫一先送現場照片、目測示意圖和有關材料回國，並當面彙報。孫一先連夜整理出三個報告：《視察墜機現場概況》、《飛機與屍體狀況》、《安葬死難者情況》。又趕寫兩個《紀要會談情況》的報告，精心繪製現場測量示意圖，死難者屍體位置的放大圖，在蒙古全圖上標繪了現場位置圖。還整理抄清了五次會談記錄，以及蒙方

提出的兩個《紀要》等材料。

向國內發去幾個報告後，許文益大使請示：如果蒙方人員有意無意把中國民航飛機在蒙古墜毀之事散佈到外國使團中去，有人問有無此事，我館如何回答？幾個小時後，周恩來親自批准的外交部覆電發來了，就說"國內正在查實，暫時無可奉告"。

大使館在關於《紀要》會談情況的報告中說：我們初步估計，由於雙方存在分歧，制定文件可能不了了之，當然可能還要繼續談。我們準備同他們談，繼續交涉要求歸還遺物。9 月 19 日上午，中國駐蒙古大使館收到周恩來囑咐發的電報：關於兩個《紀要》問題，你館暫不主動找蒙方繼續會談，等派人回國彙報研究後再說。[24]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做得最好的就是保密工作。

9 月 14 日，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一位幹部回國休假，把中國飛機失事的消息告訴了二連浩特邊防站的王站長。因爲這是大事，王站長立即向內蒙古軍區報告，最後報到北京軍區和總部。周恩來得知，立即指示這個幹部的所在單位將他隔離，並限令北京軍區採取緊急措施，讓得知這個消息的 26 人誰也不許擴散。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沒有立刻宣佈，而是嚴格控制傳達範圍。9 月 18 日傳達到黨內高級幹部，9 月 28 日擴大到地、師一級。

中國強調是民航迷航，主要是嚴密封鎖消息。只有保住密，才可能把引發戰爭的政治事件化解爲一般的民航事故，

迷航嘛，誤入蒙古，這種情況合情合理。

因爲中國"滴水不露"，使得國外只能是胡亂猜測，說什麼的都有。

謎團越來越大，中國是怎麼回事？"禁空"三天，不管軍航民航，全部停飛。後來雖然飛機可以飛了，但仍然嚴格規定：所有的飛機不能進北京，南邊的只能到徐州，北邊的只能到瀋陽，只有國際航班例外。

軍隊進入一等戰備，休假者全被招回。一些外事活動也都取消了。原定 9 月中旬召開的中共九屆三中全會停開，四屆人大的準備中止。9 月 22 日，外交部聲明，國慶日的慶祝活動取消。國慶期間，儘管整個北京城像往常一樣披上節日盛裝，但藉口節省開支和戰備需要，天安門前的慶祝集會以及焰火晚會都被取消，而以遊園代替。這是建國 20 多年的國慶中還是第一次。

中國太反常了，引起世界各國情報部門的注意。

楊達洲回憶：1971 年 9 月 14 日，我在新華社東歐組上班。九一三事件這麼大的事情，林彪座機是怎麼掉下來的？林彪是不是還活著？這時還不知道。軍代表到編輯大小參考的參考新聞編輯部緊急動員，要求俄語室盯著塔斯社，組織收聽廣播。收聽敵台，是總參三部和廣播部門的事情，新華社沒有這個業務。當時指定東歐組收聽，特別是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很快知道民航飛機掉在蒙古，再後來知道是林彪座機。[25]

蒙古也很緊張，不知道怎麼回事，中國一架民航飛機突

然掉下來，也不知道裏面有林彪，當時蘇聯也不知道林彪跑了。蘇聯遠東研究所研究員、曾長期擔任蘇共中央國際部中國處處長的庫里克說，蘇聯當時沒搞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誰摔下來了？因爲不久前，對林彪還是大加讚揚的。我們感到最爲慶幸的，是林彪沒有眞正飛到蘇聯來。

這是政府的想法呢？還是個人的想法？

最敏感的是法新社駐北京的記者。這位記者想起 1971 年 8 月，毛澤東接見外賓，林彪在場。但《人民日報》卻分別發表毛澤東和林彪接見外賓的照片，好像分別接見似的。他感到北京緊張、神秘，於是老在新華社門口、外交部、釣魚台、中南海的外面轉，發現新華社門口牆皮上白底黑字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給塗掉了，馬上猜測林彪出了事。9 月 15 日，法新社記者第一個報導了中國共產黨內部出現危機，危機的挑起人可能是林彪。這才引起蘇蒙方面的重視。

日本政府部門根據法新社消息稱：這架飛機是被擊落的，機內有被黜的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他企圖逃往國外未遂喪命。英國《衛報》10 月 1 日刊登記者萊斯卡薩 9 月 30 日從香港發出的消息，說不管所傳在蒙古發生的飛機墜毀事件的意義如何，這裏的分析家卻認爲，從 9 月中旬以後，中國領導人中發生了重大問題，人們普遍排除了早些時候關於毛澤東患病或去世的推測，而贊成環繞副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其他委員的地位問題的一些說法。林彪一些年來身體一直不好，從 6 月以後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過面。不管是因爲生病或是國內的政治原因，林彪權威的削弱，都有必要使中國最高

領導人重新排隊。軍事領導人最近幾周引人注目地沒有露面，這使許多分析家做出這樣的推測，那就是人民解放軍的領導人特別捲入了當前這場危機；另一方面，周恩來繼續不斷地在公開場合露面，並且看來已完全控制了局勢，他可能比以前更爲有力。

因爲摸不到眞正的“底”，蒙方從失事現場回來後，一連幾天沒有動靜。

9 月 22 日 15 點 30 分，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長緊急約見中國大使。表示奉政府之命，要求中國政府在 9 月 25 日前就失事飛機越境侵入蒙古領空一事，做出正式解釋。蒙方態度強硬，重新使用了“侵入”二字。許文益說：9 月 14 日已經奉命向額爾敦比列格副外長作了正式解釋。但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長說：那不夠，要求你們 9 月 25 日前用書面形式給以正式解釋。卻根本不提繼續會談的事情。[26]

蒙古公佈三叉戟失事的消息

9 月 29 日下午 15 點 30 分，蒙方再次以要事約見許文益，對中國政府未就飛機失事原因做出正式解釋表示遺憾。並稱此事已在蒙古人民中間引起各種傳說和議論，所以蒙古決定發表一條簡短消息，以說明事實眞相。

許文益說：對蒙古政府的要求，中國政府採取了嚴肅認眞的態度，及時作了兩次說明，希望在中蒙關係開始正常化的時候，不要做出與此相違背的事情。

蒙方強調不是發表政府聲明，只是發表一條一般的消息。

兩個小時後，蒙古廣播電台在新聞節目中播出《關於中國飛機失事》的消息。中華人民共和國噴氣式飛機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點50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國領空，在深入我國領空飛行時，於2點30分在肯特省依德爾默格，由於不明原因墜毀。在中國飛機墜毀的地方找到燒得殘缺不全的9人屍體、槍支、文件和物品，證明這架飛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空軍的飛機。已經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館的代表們到現場觀看了失事飛機。就中國飛機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國領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國方面表示了抗議，並要求做出正式解釋。[27]

9月30日，蒙古各報紙和外語廣播都報導了這一消息。蒙古《真理報》將這條消息登在四版很不顯著的位置。

王中遠回憶：蒙方9月29日下午突然公佈消息，我們也很注意，錄音翻譯出來彙報國內。中國飛機侵入蒙古上空，還是這口氣。[28]

許文益分析：雖然蒙古在我國國慶前發表這條消息，對正在改善的兩國關係有不良影響。但從各方面分析，蒙古當局似乎無意利用這件事大做文章。蒙方在我國慶前專門舉行了慶祝中國國慶的電影酒會，還爲中國大使安排了幾場主要拜會，蒙方出席中國大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的領導人比上一年多，規格也高。

看來，蒙古還是想繼續與中國改善關係。

根據國內指示，許文益對出席我招待會的外交部副部長雲登表示，對蒙方發表的失事消息，不利於兩國關係正常化表示遺憾。雲登說：我們覺得應該把這一事件告訴群衆，只發表了一個一般消息。我們對中國政府的要求到一定時候會給予答覆。[29]

王中遠回憶：9月17日我們回到烏蘭巴托，馬上轉入迎接國慶。這對使館來說是很大的活動。國慶招待會上，蒙古國防部外事處處長平時對我們很友好，問我林彪還活著嗎？當時我並不知道，包括外電都傳出來，我們忙著根本顧不上，國慶後傳達才知道。國內指示，如果問起來，一切照舊。他點點頭，很會意地走了，看來他想從我這證實一下。

這說明蒙方已經從國際傳聞和揣測中，猜到死者中有林彪。[30]

國慶日前後，中共中央關於九一三事件的文件逐級下達，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奉命停止向蒙方交涉。以後蒙方也沒有再提及失事飛機。

二五六號三叉戟如何失事，仍然是一個謎。

註釋：

[1] [4] [8] [11] [12] [13] [14] [16] [24] 參見孫一先著《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163-166、178-212、271-272、237-238 頁

[2] [3] [6] [9] [15] [18] [20] [21] [28] [30] 採訪王中遠筆記，2005 年 6 月 15 日

[5] [17] [19] [22] [26] [27] [29] 參見許文益著《歷史賦予我的一項特殊使命》，見中央文獻出版社《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1995 年 6 月版，128-130、136-143、145 頁

[7] [10] [23] 採訪孫一先筆記，2000 年 8 月 17 日

[25] 採訪新華社記者楊達洲筆記，2000 年 8 月 12 日

第二十六章
紙上談“機”

周恩來做出“自行墜毀”的結論

9 月 19 日晚，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向外交部報告，孫一先於 20 日乘 4 次列車離開烏蘭巴托回國。在這天上午，中國駐蒙古大使館還收到國內另外一個指示，要求注意觀察蒙方和駐蒙蘇軍有無戰備動作。孫一先到烏蘭巴托市周圍走馬觀“花”，總的印象是蒙軍和駐蒙蘇軍都有異常。烏市西區陶拉蓋圖的北山溝，蒙軍的導彈發射架都裝上了防空導彈，探測和搜索雷達一直在旋轉。市區蘇軍的軍用汽車比往常增加，鐵路兩旁的蘇軍基地也格外繁忙。距烏蘭巴托市 50 多公里的大型後勤基地，載重汽車進進出出。幾十個戰備油罐群，都被鐵絲網圈了起來，還站上了崗。距烏蘭巴托市 100 公里的巴彥機場，停在滑行道邊的殲擊機都脫掉了“衣服”。

飛機不斷起落，卻不像是平常訓練。喬依爾車站以北 20 多公里有蘇聯空軍的一個大型機場，在密閉的列車裏都能感覺到轟鳴的刺耳。

中國民航飛機墜毀，爲什麼蒙古的蘇軍也湊"熱鬧"呢？

中國邊防城市二連浩特，車站內外軍人也明顯增多，幹部都佩戴著槍。集寧停靠的一列軍用列車正往下卸軍車和重型武器。邊防站的王站長告訴孫一先，現在是一級戰備，孫一先想：難道眞與那架失事飛機有聯繫嗎？

周恩來對孫一先說：你談談現場情況，有沒有帶地圖來？孫一先把自己標的現場位置圖拿出來。周恩來問：離伊爾庫茨克有多遠？直線距離 700 多公里。山海關在什麼地方？多倫呢？貝勒廟呢？周恩來從山海關到溫都爾汗，用力一劃，微微點了點頭。

孫一先大爲吃驚，那架失事飛機不是迷航，而是叛逃！他猜想可能機組人員裏有叛徒。

這時已經是 9 月 22 日淩晨 1 點，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和空軍副司令員兼民航總局局長鄺任農來了。總理只介紹了李德生，讓孫一先繼續彙報，按提綱講。孫一先感覺周恩來似乎對失事飛機不大感興趣，閉著眼睛打了一個盹。

他想，總理太累了。

周恩來聽完孫一先的彙報，指示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主持研究飛機是怎樣墜毀的，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符浩也參加。他們拿著照片到東大廳，與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

泰、公安部長李震等一起分析研究。

李際泰是飛行員出身，仔細看過照片和現場示意圖後，認爲飛機可能是因爲燃料將要耗盡，被迫緊急著陸，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傾斜，觸及地面，肚皮與沙土磨擦，驟然升溫，引起油箱著火，從而導致整機爆炸。從當時的情況看，飛行員駕駛技術很好，選擇了惟一的處理辦法，雖然不排除機件失靈，或被地面防空武器擊傷而緊急著陸，但這些可能性較小。在場的都是外行，一致認爲李際泰說得有道理。

楊德中認爲有必要找一架同類型的飛機，並與駕駛員及有關地勤研究一下。

符浩建議，看飛機時，應該把到過墜機現場的孫一先帶上。[1]

三叉戟是英國原德·哈威蘭公司研製的中短程的三個發動機的客機，根據歐洲各航空公司提出的第二代噴氣客機的要求研製。1957 年設計，1959 年開始生產，1962 年 1 月首次試飛，1964 年春投入航線使用。一共四種機型，共生產了 117 架三叉戟， 其生產線於 1978 年關閉。三叉戟 IE 型是加大航程型，增加了燃油量，載客量也增加到 115 人。

中國先後進口了 30 架三叉戟，用於民航飛行。現在我國進口的三叉戟都已經淘汰。北京的軍事博物館門口，展覽著一架三叉戟。這架在軍事博物館門口展覽的飛機已經飛行了 1.2 萬多小時，本來還可以飛，因爲缺少零件，加上又引進了更先進的波音飛機，這架三叉戟就提前退役了。1995 年 6 月 1 日，被拖到八角地鐵口南 200 米石景山遊樂園東門

口，對遊人開放。以後移到軍事博物館門口。

專機裏面基本保持當年中央首長專機的佈局，辦公室和臥室、茶座都備有空調。機艙按專機原樣擺放，駕駛艙裏三把椅子，副駕駛後面還有一把，駕駛室裏密密麻麻全是儀表，據說有 2300 多個，看得人眼花繚亂。前後艙有個過渡，小小的臥室裏有個單人床，供首長休息。對面是會客室，有六把椅子。中間是個藍布罩著的圓茶几，有兩張沙發圓椅。左邊也是兩把椅子，有一個圓獨角桌。據介紹，坐過這架專機的中央首長包括周恩來、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葉劍英、彭眞、萬里、薄一波等，外國國家元首訪華也坐過。

二五六號三叉戟機組的人員上去看過，說不像我們那架，性能好像不一樣。因爲我國先後進了幾批三叉戟。到底是不是與“九一三事件”中的那一架相同，還不太好肯定。

航空博物館也有一架三叉戟，與軍事博物館門前的三叉戟確實不太一樣。

10 月 1 日淩晨 2 點，一行人去西郊機場看二五二號三叉戟。

空軍參謀長梁璞聽說飛機是擦地皮著陸起火爆炸，有點意外，說在夜裏能找到這麼一大塊平地難度相當大。潘景寅的駕駛技術還是比較高。1970 年從巴基斯坦飛回這批三叉戟，是他帶隊飛回來的。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向國內寫的飛機失事報告，分析周圍無高大目標，迫降場的選擇合理，著陸點到燃燒區有幾十米距離，以及死者軀幹燒傷不重，無高空摔折等，看來飛機不像是空中著火爆炸，而是著地後爆炸起

火。梁參謀長同意這個分析，認爲迫降時速度可能很快，肚皮和右翼尖同時著地，猛一擦地可能“飄”起來。[2]

周恩來根據李際泰等人的紙上談“機”，得出“自行墜毀”的結論。[3]

飛機失事應該怎樣調查

因爲中國沒有按照國際慣例派事故調查組到墜機現場，使這個“一等事故”更加撲朔迷離。

按照“一等”的規則，應該立即封鎖現場，在最快的時間內組成由機務、飛行、領航、調度以及空軍機關的有關人員組成的事故調查組，奔赴現場。

在事故調查中，首先要尋找黑匣子，還要從方方面面去獲取信息，調查的對象要包括與實施飛行有關的全體人員，飛行員、飛行指揮員、管制人員、機務人員以及雷達、通信、導航、油料、航材、警衛等方面的人員。調查的內容還要包括飛行的全過程中飛機與機上人員所處的各種條件，所遭遇的各種問題，包括飛行活動區域的天氣情況，起飛和降落以及備降機場的狀況，飛機空域、航路、航線的狀況，雷達、通信、導航的情況，機場起飛前的準備，檢查、加注燃油、氧氣等情況。前一次飛行飛行員對飛機狀況的反應，起飛前的檢查情況，飛行員飛行座艙、身體情況、技術理論水平、思想狀況、技術，以及機組配合等。逃生的飛行機組成員及旅客，飛行資料記錄器，航空器製造廠家，目擊者和空中交

通管制人員，都要調查到。

除了要求專業人員對現場錄影、拍照和測量，還要化驗屍體血樣，看是否飲酒或服藥，以及飲服的劑量。此外，還要搜集飛機殘油包括燃油滑油液壓油等，以此判明油料質量及機件是否有磨損等。

飛行事故的概率極小，平均十萬次飛行也可能碰不到一次。但一旦發生，就非常嚴重。從理論上講，飛行事故的發生有著嚴格的內在規律性，事故的“隨機”和“偶然”只不過是“確定”或“必然”的外在形式。

事故現場是最重要的“資料庫”。但它散在露天，由於撞擊的高溫，許多殘骸面目全非，加上風沙、雨水、人爲等因素，會很快消失或變態。越早，眞實性就越強，失去了及時性，也就失去了可靠性。事故現場殘骸的分佈和原始位置等，對判明飛機失事時的狀態等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如果不及時加以準確地標定和搜集，被移動，丟失或再次損壞，就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所以儘管空難突然，但調查必須迅速展開。

還要儘快對事故當事人和見證人進行調查。同樣，距事故發生的時間越短，取證的材料準確性、眞實性就越強。人的思維有用想像或用以往的經驗來塡補觀察的特點，同時又有“從衆”即按大多數人的說法來描述自己觀察的特點。如果時間拖長，取證的材料可能更合理全面，但關鍵問題可能失眞。而且目擊者受專業知識等方面的限制，只能提供一些現象。[4]

我國對飛行事故的分類統計大致四類，按飛行事故關聯的密切程度，分爲直接原因、間接原因和根本原因。調查飛行事故要做大量的工作，各部門、各方面的專家合力，要研究各零件的不同特點，涉及到設計、製造、維修、使用各個環節。因此事故調查組要盡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搜集信息要全，飛機殘骸，飛行資料記錄儀、艙音記錄儀、視頻記錄儀等，都能提供事故信息。没有這些，“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勉強做出事故結論，必然缺乏公正性、客觀性、科學性，就很可能是誰官大誰的話就是眞理。

搜集信息是繁重細緻的工作。一架運輸機，僅零部件就有幾百萬個，近百人參與，任何微小的疏忽，都可能導致空難。1988 年 12 月 21 日，美國泛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47 客機在英國蘇格蘭城鎮洛克比墜毀。事故調查人員走訪了 13 個國家，行程 150 萬英里，訪問 1.4 萬人，拍攝了 73.5 萬張照片，電腦分析了數千人搜集的 1.6 萬件殘骸遺物，才找到空中爆炸的確鑿證據，包括能證明定時炸彈爆炸的性質、種類、生產國及該爆炸物使用量的證物，搞清了定時炸彈放在某型錄音機裏，某型錄音機放在飛機前部貨艙的某國購買的某型號衣箱中，爲事故結論提供了可靠依據。

現場調查後，還要在實驗室對每一個破壞件進行研究，對操縱管理材料設計等都要進行綜合分析和故障類比。航空安全就像一塊織物，一根線，甚至兩根三根線斷了，都不會有事，但越來越多的線斷了以後，危險就增加了。絕大多數飛行事故不止一個原因。不能孤立誇大某一個事實，而不顧

及其他。技術、機械、飛行員生理和心理、組織指揮、勤務保障、規章制度、工作決策、部門協調、人際關係等等纏在一起，其直接原因千差萬別，更何況嚴重的後果帶來的行政責任、經濟損失、感情糾葛，也會使客觀的認識帶來主觀的影響。

這就使絕大多數飛行事故不止一個原因，前一個的結果導致後一個的起因，形成長長的"事故鏈"。調查飛行事故，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各種事實進行綜合的全面的分析判斷。一切結論產生於深入調查之後，不能預先定框架。不到最後，你很難確定誰是"肇事件"，有的大空難拖了十年才搞清楚。在特定條件下，允許一時做不出事故結論，不要勉強，更不能牽強附會，但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内開始調查。

二五六號三叉戟摔在蒙古境内，這給現場調查帶來困難，但也不是不可能。1993 年 4 月 6 日，東方航空公司 MD-11 客運班機從上海飛往洛杉磯，在太平洋上空發生強烈震盪，緊急迫降在美國阿留申群島西米亞空軍基地。我國民航委託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進行調查。1994 年 4 月 26 日，台灣中華航空公司一架 A300 客機從台北飛往日本名古屋，降落時墜毀。有關部門迅速前往調查，歐洲空中客車公司也很快派專家調查。

作爲墜機事故調查，最重要的是保護現場，不能破壞，不能移動。可二五六號三叉戟墜毀在國外，牽扯到兩國甚至三國的關係。又因爲二五六號三叉戟是在淩晨墜毀，等蒙古官方去時天已經大亮，而且是老百姓救火之後。

蒙古人移動了屍體和遺物，蘇聯人又大拆大卸。

現場的破壞是絕對無疑的了。

中國駐蒙古大使館赴現場的人員都是外行，他們只是拍了一些照片，沒有去注意飛機上尚存的儀表、油料等，也沒有走訪目擊者，甚至連墜機的準確時間都不知道。

飛機墜毀的時間是蒙方確定的，因爲蒙方收走了機上所有的手錶。[5]

從照片上判斷林彪座機的失事原因

雖然中國做出"自行墜毀"的結論，但總要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

1972 年 5 月，中央專案組邀請空軍有關方面的專家，成立了空軍專家組，對林彪座機墜毀原因作一個系統的分析。由王海（時任空軍軍訓部第二部長）牽頭，組員有何培元（機務部副部長），陸德榮（組織部副部長），王濤（軍訓部副處長）、王季南（軍訓部副處長），趙漢立（機務部參謀）、金華（機務部參謀）。[6]

號稱空軍專家組，有幾個是眞正的三叉戟專家呢？

一個也沒有！

陸德榮是政工幹部，不瞭解航空專業知識。王海、王季南、王濤雖然是飛行員，但卻不是運輸機飛行員，而是殲擊機飛行員。殲擊機和運輸機差別很大，運輸機和運輸機也有很大不同，尤其三叉戟在當時的中國是先進機種，瞭解的人

很少。何培元和趙漢立長期做機務工作，但沒有接觸過三叉戟。在專家組中，只有金華學過三叉戟維護。那時金華剛從專機師調到空司機關，空司機關學過三叉戟的就他一個人。可是，他也僅僅學過三叉戟的維護，所以金華認爲王海不是專家，他也不是。[7]

空軍專家組認定：林彪座機飛行員潘景寅對著陸地點和著陸方向進行了選擇，飛機的飛行方向本來是從東南向西北，而降落方向卻掉頭由北向南，降落場是一片平坦的草地，降落條件較好。其次飛行員作了野外降落的準備，地面的痕跡說明飛機不是大角度撞地。從照片看，打開了前開縫翼，這是著陸前的人工動作，摔打碰撞都不行，必須人工打開。起落架也完整，證明沒放下來。從飛機調頭和機上乘員都摘下手錶和脫去鞋子看，都證明是準備迫降。是有操縱的進行野外降落，但沒有成功，造成飛機破碎，機毀人亡。

爲什麼沒有成功？首先是降落動作不確切，沒做全。造成迫降時的速度較大。尾部先著地，形成跳躍。因爲飛機上先掉下來的部件，是尾部的中發動機底包皮和噴口等。三叉戟是下單翼飛機，根本不適合野外降落，由於兩翼安裝在機身下部，機翼和機身腹部都有較大的油箱，因此不放起落架，腹部和機翼同時著地，極易機翼折斷。雖是草原，但地面仍不平坦，這也是造成飛機跳躍和機翼折斷的原因。右機翼先折斷，然後是左翼尖，接地僅 200 米，就和發動機的噴口摔在一起。接著圓筒狀的機身借慣性繼續往前衝，最後解體，機上人員被甩出。在此過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積

燃燒。

1972 年 5 月 19 日，空軍專家組根據照片，加上各方面的研究，寫出《對林彪叛國外逃所乘三叉戟飛機墜毀原因的分析》，做出“自行墜毀”的正式結論。經中央專案組上報中央，王濤代表空軍專家組，在京西賓館西大廳，掛起飛機墜毀現場的放大示意圖，貼上關鍵性殘骸和屍體的擴印照片，向朱德等 50 多位高級領導人，做了飛機墜毀原因及屍體情況的彙報。[8]

那麼這個結論可靠嗎？

在那個特定的情況下，既沒有馬上成立事故調查小組，更沒有馬上派專家到現場觀察，只是事後見到不是專業人員拍回的現場照片。應該說，現場步測的示意圖和照片，對中央瞭解情況，以及對空軍專家組“紙”上分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拍照前，現場已經被“破壞”，蘇聯人和蒙古人“捷足先登”，挪動並拿走了很多東西。如果我們中國的專家到現場也還可能“亡羊補牢”，但在那個特定的情況下，我們根本就沒提專家到現場的事情，也沒有提要回飛機殘骸。因爲我們不是第一時間到墜機現場，而且到現場的又都不是專家，空軍專家組的金華說：結論很難做。[9]

一場調查，作秀而已。

不過在 1972 年的時候，誰敢說？

註釋：

[1] [3] [5] [8] 參見孫一先著《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244-252、208、276 頁

[2] 採訪時念堂筆記，2000 年 4 月 14 日

[4] [6] [7] [9] 採訪空軍機務部參謀金華筆記，2000 年 1 月 1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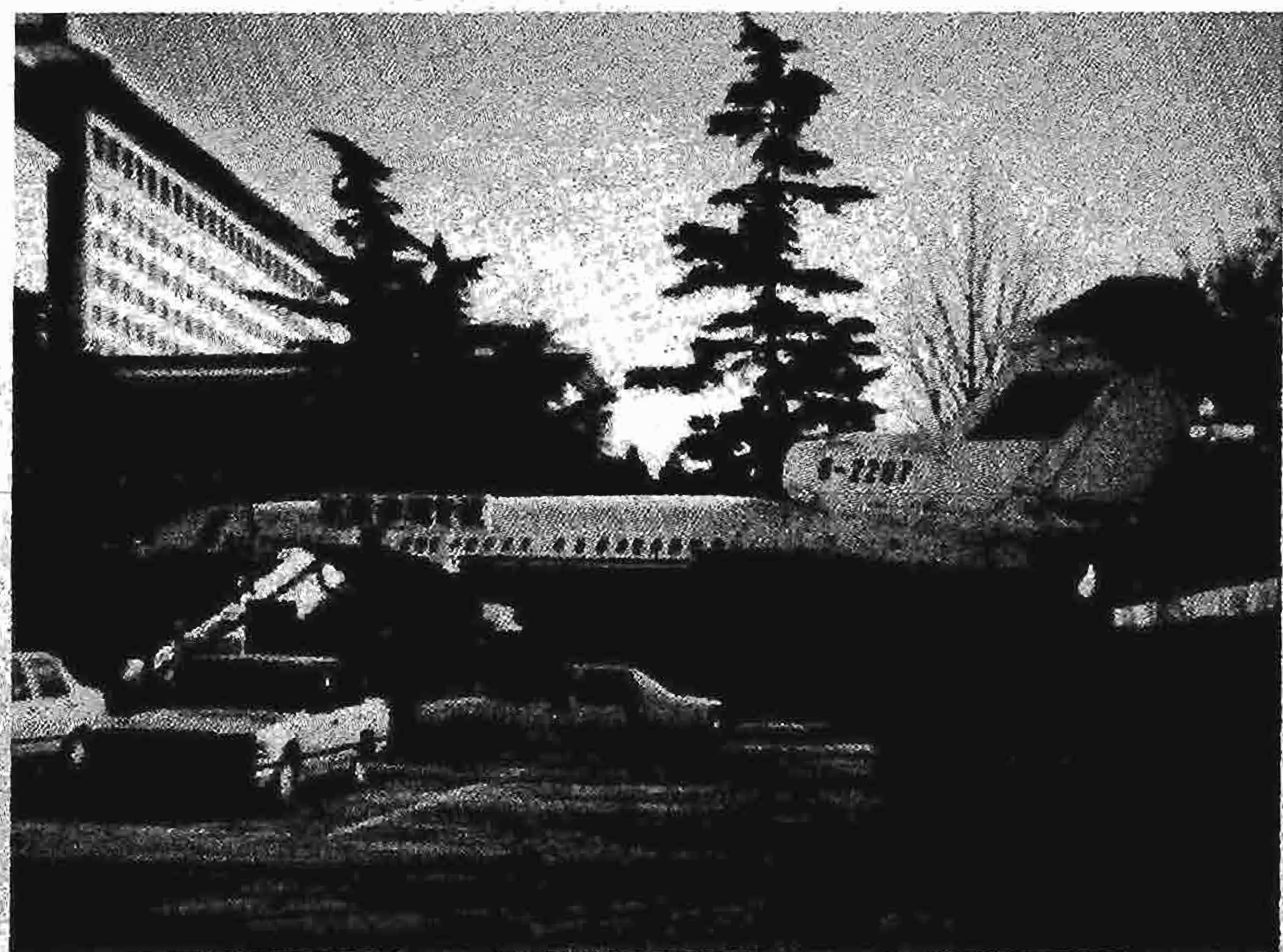
孫祥凝站在望夫石前。　*潘景寅兒子潘鵬提供*



懷仁堂



1967 年毛澤東坐在潘景寅駕駛的專機上。 時念堂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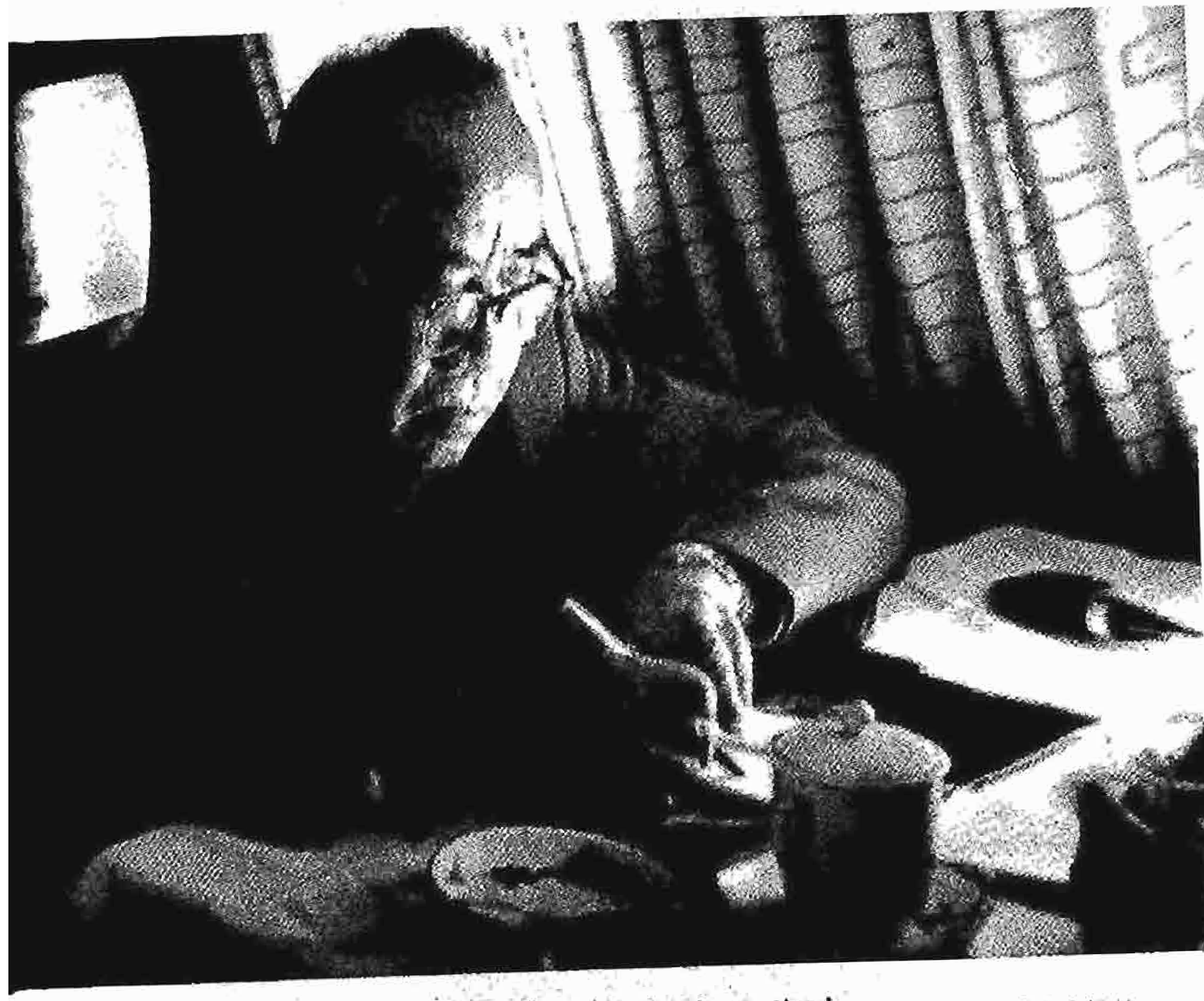


這是位於軍事博物館門口的一架退役三叉戟。但據林彪機組的成員說，機內設施與林彪專機不一樣。

舒雲攝於 1999 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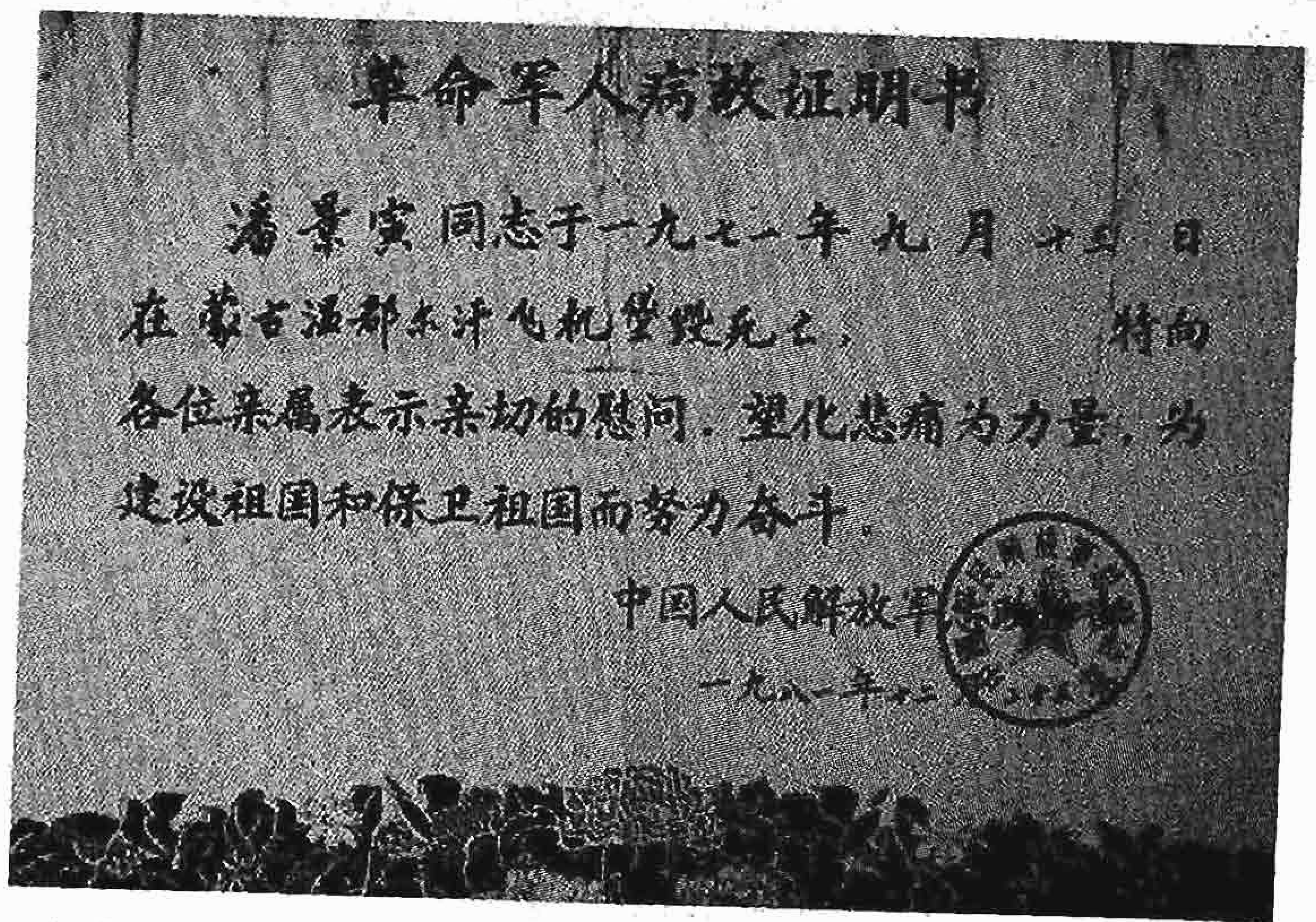


1964 年 11 月 7 日，朱德委員長在專機上作詩。 時念堂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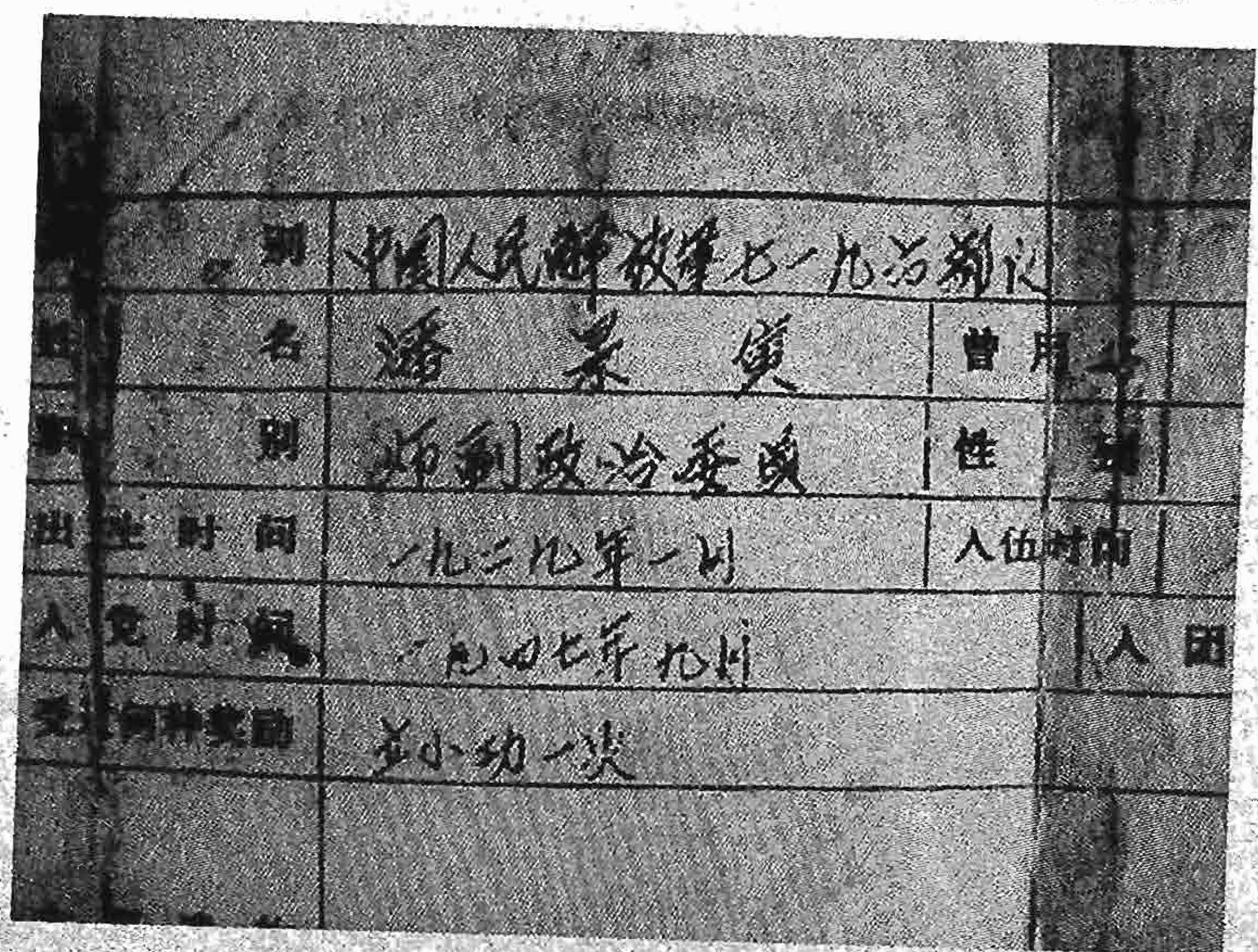
國家主席宋慶齡最願意坐小潘的飛機，九一三事件前幾天，她還要求小潘送她去上海。

時念堂提供



潘景寅死後十年他的家屬得到的革命軍人病故通知書。

舒雲攝影



這是潘景寅病故通知書的背面。

舒雲攝影



第二十七章
二五六機組

潘景寅事先“胸有成竹”嗎

在林彪座機最後一次上天前，飛行員潘景寅只知道往南走。突然在空中改變，他似乎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上天前不知道往哪飛的事情，以前也有過。1967 年 7 月 20 日，武漢七二 O 事件，毛澤東被“困”在武漢。周恩來專門從北京調了兩架專機到漢口，一架有床有桌子，一架只有座，沒說誰用。兩個機組的人員列隊在飛機旁等著首長。

突然看見毛澤東坐汽車來了。

毛澤東沒有猶豫，也沒有任何人指點，直接上了潘景寅的伊爾-18 飛機。

那時潘景寅是副團長，另一位姓王的機長也被調到這架飛機上，臨時組成一個加強機組。到了天上，毛澤東才說去

上海。[1] 如果航線在國內，潘景寅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國內航線，有地面導航，沒有領航員也不怕，可以通過地面導航保持航線。憑一個老飛行員的經驗，如果飛廣州，油不夠了也不怕，中間隨時可以落地加油。可是“林副主席”怎麼命令飛蒙古的烏蘭巴托？大半夜的，強行起飛，機組人員還不全，這是怎麼回事？潘景寅飛伊爾-18 時出國很多次，也幾次飛過蘇聯這條航線，每次都要準備很長時間，哪有到了天上才說去國外的。何況我們與蘇聯已經刀槍相見撕破了臉皮，難道是叛逃嗎？潘景寅的心態，現在已無從知曉，只能等著黑匣子“浮”出水面才能略知一二。但緩慢的航跡似乎可以反映他的心跡，他的思想鬥爭一定非常激烈，他哪裏想到林彪一家（除林豆豆）要跑到國外去？

如果潘景寅事先知道內幕，他絕對不會吃安眠藥。[2] 因爲林立果不會把“三個方案”告訴“司機”。

可是你又不能違抗“林副主席”的命令，真是進退兩難啊。

林彪座機從山海關機場的雷達上消失前，留下了 15 分鐘的航跡。據拉下的機組人員回憶：他們在山海關機場調度室看到最初航跡中有一個很不正常的轉彎。60 度足足浪費了 6 分鐘，是平時轉彎的好幾倍。按說飛機起飛，應該迅速進入預定航線，然後保持直線，持續爬高，到達預定高度後，改爲平直飛行。這樣標在地圖上，只能是一條折線，折角的大小取決於起飛航線與航向之差。但是爲什麼“折線”變成了過程很長的“弧線”呢？飛機上感覺不到轉彎，只能從儀表上

讀出來，又是夜間，儀表板紅光照明，比白天“讀表”更困難。但也不應該是平時轉彎的好幾倍，與正常航跡相差那麼大啊。[3]

第二副駕駛康廷梓從航跡上分析：林彪座機飛行員潘景寅好像非常猶豫，變速很慢，轉彎坡度很小，很遲緩，而且不規則，差點過了頭。一個可能是故意迷惑地面，另一個可能是潘景寅不知情，以爲飛廣州，突然轉向北京方向，他沒有思想準備。由於起飛後操縱動作延遲了 4 分鐘，這就產生了不正常的轉彎。240 多度轉到 280 度，繼續增大，到了 310 度，朝向了西北。但是並沒有穩定在 310 度上，又減小了航向，往西偏北繼續飛行了十幾分鐘，超過 15 度，再飛就成了 360 度，掉頭回山海關去了。直到最後穩定在 325 度的航向上，在唐山以北的遷安向北，經承德、多倫及貝爾廟附近，飛進蒙古。爲什麼要往國境線飛？在飛行員的心目中，國境線太敏感，因爲空中並沒有明顯界限，飛行中如果要繞過雷雨區，也是寧可往國內多靠一靠，也別“不小心”飛出國去惹上“國際麻煩”。[4]

林立果既然想外逃，當然怕被殲擊機打下來。所以肯定要採取聲東擊西的措施。先向北京飛，造成回北京的假像。然後突然北飛，你殲擊機再想起飛就來不及了。

如果說潘景寅不知情，那爲什麼他不回答地面的呼叫？這也是後來把潘景寅打成反革命的一條“過硬”理由。吳法憲命令專機師拿著話筒喊，以周恩來的名義，叫他回來。山海關機場、西郊機場和空軍指揮所，所有的對空台都在用超短

波電台對空呼叫，要三叉戟飛回北京，北京周圍所有機場都打開跑道燈和夜間降落設備，隨時可以落地。那麼，三叉戟上的無線電是不是沒打開呢？正常情況下，飛機啓動後，在滑行前必須打開機上所有的通話設備，因爲飛機的一切活動必須得到機場調度室的許可，才能進行。電台開關就在飛行員頭頂部，輕輕一撥就可以打開，地面的聲音就可以充滿整個機艙。如果無線電打開了，潘景寅馬上就會明白了怎麼回事。[5]

但是，潘景寅爲什麼沒有像直升機飛行員陳修文一樣，把三叉戟飛回來呢？

從雷達標圖看，北戴河向西一段是山區，三叉戟爬高，越來越慢。

胡萍非常奇怪，這是往哪裏飛呢？在唐山以北的遷安開始向北，進入承德、多倫及貝爾廟附近，最終飛進蒙古境內。[6]

一個人把三叉戟開上了天

尚登峨回憶：9 月 13 日凌晨，三叉戟第一副駕駛陳聯炳給我打電話，說潘景寅一個人把飛機飛走了。什麼？一個人？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慢點說，飛機上還有什麼人？除了潘景寅，還有三個機械師。不可能？我不相信，反復問了好幾遍。我是飛行員出身，吃飛行這碗飯 20 多年，只有一名飛行員就飛上天，還從來沒有先例。大型運輸機不像殲擊機，一個人就可以飛上天。大型軍用運輸機必須兩個飛行員飛，一個正駕駛，一個副駕駛，配合操作，就是本場訓練，飛起落這樣簡單的科目，也應該全體人馬都上，一個都不能少。更何況外場，又是夜間。[7]

林彪專機這次飛行配備了三名飛行員，多配了一名副駕駛。

而潘景寅，不僅“丟”下了兩名副駕駛，還“丟”下了領航員和通信員。

殲擊機在空中飛行的時間短，沒有那麼長的航線，光憑地面導航就完全可以。運輸機航線長，加上空中有風的影響，飛機可能會偏離航線。所以除了地面領航外，必須要有空中領航。我嚇壞了，這是林彪的專機呀，怎麼一個人就飛了？機組都有誰？現在你身邊還有誰？陳聯炳告訴我，潘景寅把機械師叫起來加油，等調度室老李叫我們起床時，飛機已經滑出，沒來得及加油，也沒有到調度室辦手續，就起飛了。這時參謀長梁璞上來了，我讓陳聯炳直接報告參謀長。[8]

三叉戟從西郊機場到北戴河，開完飛行總結會，已經很晚了。因爲第二天一大早還要飛行，所以機組除了潘景寅都抓緊時間睡了。要不是特設機械師邰起良打了個電話，機組的五位成員還在沉沉的睡夢中呢。

邰起良打電話給調度室，說首長都到了，機組人員怎麼還沒到？

調度室主任李海彬急了。

零點 20 分左右，領航員李成昌和同屋的第二副駕駛康廷梓被重重的砸門聲驚醒，

外面有人喊：快上機場，首長已經到了。

機組的五位成員幾乎同時從睡夢中驚醒，從床上蹦起來。[9]

飛行員有個習慣，兩隻鞋尖一律朝外，蹬上就可以跑出去。可是，第二副駕駛康廷梓以緊急集合般的速度套上衣服，一隻腳伸進皮鞋裏，第二隻腳還未來得及伸到第二隻皮鞋裏，就聽見飛機發動機啓動的聲音。怎麼會？他連鞋帶也沒繫，衣服也沒扣，就瘋了一樣衝出門。他的航行包就在飛機上放著，沒拿下來，省了一道手續。黑暗中，他看見機組的兩個老同志陳聯炳和陳松鶴跑在他的前面。

剛跑出十來步，就聽到發動機啓動了，緊接著是加大油門的尖叫聲。李成昌急得馬上百米衝刺，還是晚了幾十秒鐘。在距離三叉戟還有 50 多米時，飛機滑行了。要是英製“子爵號”，發動機性子慢得像“老牛”，響半天，才能發動起來。偏偏三叉戟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運輸機，發動機是個急性子，啓動快。緊急情況下，除利用地面專用的啓動車外，還可以利用飛機自帶的壓縮空氣啓動，不受地面專用設備的影響。內行人說，開車，滑行，起飛，機械師肯定幫了忙。平時機械師不管操縱飛機，但因爲機組不全，三個機械師至少有兩個在前面操作。潘景寅利用機上設備啓動中央發動機，然後一邊滑行，一邊利用中央發動機的壓縮空氣啓動另外兩台發動機，這就大大節約了起飛時間。只要滑行中做好駕駛艙內的各種檢查，飛機一旦進入跑道，不需要停機，就可以加大油門直接升空。[10]

被“丟”下的五位機組人員，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傻了一般，望著停機坪。眼看著三叉戟沿著跑道東頭的滑行道越滑越快，接著就嗖地飛上了天。

其實就差一兩分鐘。

是不是在夢中？不是，專機確實是起飛了，停機坪上空空的，飛機早就沒影兒了。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李成昌頓時湧出一身冷汗。作爲專機領航員，專機飛走了，你卻沒上去，萬一因爲沒有領航員，專機出了問題，那可成千古罪人了。李成昌越想越害怕，四下望望，這才發現身邊還有三個機組成員，兩位副駕駛陳聯炳、康廷梓和通信員陳松鶴也被專機“丟掉”了。

機長潘景寅在機組準備飛行的會上，安排得好好的，第二天一早起來到機場做準備，然後吃早飯。沒想到才睡下兩個小時，一切全變了。

二五六號三叉戟編制了九名機組成員，五名重要人物沒有上去。

服務員小魏因爲要提暖水瓶打開水，動作稍慢了一步。她提著兩個暖瓶，望著空空的停機坪，著急地說：我開水還沒打，他們怎麼就起飛了？

四位垂頭喪氣的“難友”頓時覺得自己失了職。

陳聯炳問：怎麼辦？

李成昌是黨小組長，潘景寅不在，他就是機組的頭兒，

他說上調度室。[11]

爲什麼不叫全機組一起準備飛機

帶著一大堆問號，他們又往調度室跑，看看飛機往哪兒飛。目標 290 度、100 公里，目標 315 度、150 公里，250 公里……不久目標消失，五名機組人員茫然回到招待所。

在調度室，他們總算搞明白了一件事，飛機上只有機長潘景寅和三個機械師。

這是怎麼回事？爲什麼這麼急急忙忙地起飛？沒等機組全上去就慌亂起飛，能保證安全嗎？

專機組都知道，準備飛機從來都是全機組一起準備的。飛機落地首長走了，機組還不能走，還要檢查飛機，查得很細，每個地方都要查到。檢查完了還要塞上各處的“眼”，罩上蒙布，才能回去休息。飛機尤其是專機，不像汽車，上了車就開。飛機複雜得很，冬天夜裏那麼冷，要提前一個小時準備好，加溫開車。準備時間起碼要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打開蒙布，取出塞好的“眼”，然後發動機試車，每個部件檢查到，良好了，才能放心。剩點時間還要拿抹布和汽油，裏裏外外擦。然後在機場待命，等待首長。要是發現故障，那時間更長。試車排除故障，排除不了，任務沒了，一天也是它，兩天也是它。那時設備陳舊，不像現在換上個部件就完事，那時得慢慢修。所以專機組最辛苦，沒白天沒黑夜。要是在家，還好一些，地面有一套設備，機械師都在。在外

場，就靠機組幾個人，必須全體到外場，大家一起上陣。對於專機組來說，無論幹什麼，都是機組人員一起行動。可以說，這是一條鐵的“紀律”。[12]

很奇怪，爲什麼潘景寅只叫住在同一房間的三個機械師起來準備飛機，沒叫其他的機組成員呢？

9 月的北戴河，晚上已經很涼，康廷梓只穿了布飛行服，感到挺冷，睡覺時就順手把窗戶關上了。雖然關上了窗戶，但是只隔一道牆，他睡覺又輕，應該能聽見潘景寅叫三個機械師起床，爲什麼一點也沒聽見呢？說明潘景寅叫三個機械師的動作很輕。[13]

是故意不叫，還是因爲太匆忙？因爲機上的四名機組人員全部死亡，黑匣子又一直沒有露面，所以只能是猜測。有人反映九一三事件前潘景寅情緒低落，說他表面上老實，但很有心計，想問題比較多，有些思想不暴露。潘景寅以前愛說，自從反右時差點被打成右派，從此就十分謹慎了。[14]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當然不願意夭折自己的政治生命。有人說他與周宇馳是航校同學，又一塊調到空軍，所以關係很好。可是並沒有查到潘景寅和周宇馳搞陰謀的事實。有人認爲是“精心安排”，潘景寅負有“特殊使命”，故意不叫全體機組人員。還有人猜測林立果打電話給潘景寅，說機組人員越少越好，人多了不好騙。怎麼不好騙？上了天，又是黑夜，飛到哪裏你怎麼知道？

三叉戟裝有各種先進的導航設備，但潘景寅一個人在空中駕駛飛機，不可能騰出手來再測量航線的資料。1 點 50

分飛越國境，是地面雷達提供給指揮所的，潘景寅在空中，不可能那麼準確。雖然“大方向”没錯，但在長達 1000 多公里的飛行中，中間没有導航點對飛機的航跡進行校正，又没有地面領航和空中領航，還没有通信聯絡。而且又是後半夜，大部分電台廣播都已經停播，地面上又黑乎乎一片，想準確地飛下去實在是太困難了。

按照邏輯，如果潘景寅知道飛往國外，他無論如何也要讓全體機組一起上。或許潘景寅知道上邊鬥爭激烈，但他做夢也想不到“鬥爭”會表現在他的飛機上。從林彪座機看，潘景寅傍晚執行了一個航班，從北京西郊機場到北戴河，雖然是短途，不到一個小時的飛行，但加上飛行前的準備和飛行後的工作，也很疲勞。之後他佈置機組抓緊時間休息，他卻一夜未睡，煙灰缸裏堆滿了煙頭。雖然第二天一大早還要飛長途，但潘景寅並不擔心，他知道機組還有兩個技術高超的副駕駛陳聯炳和康廷梓。有他們兩個撐著，潘景寅完全可以放心。本來開完飛行後總結會已經很晚了，而林立果半夜突然命令給飛機加油，潘景寅當然要考慮，三個駕駛員都休息不好，這飛行安全怎麼保證？能讓他們再多睡一分鐘也好啊。所以他輕手輕腳只叫了三位機械師起來加油，讓兩位副駕駛多睡一會兒。但没想到，林彪的“大紅旗”超速來到山海關機場，致使一個機組被生死永遠相隔。

如果三叉戟“賴”在山海關機場呢

現在想，如果飛機“賴”在機場，會是個什麼情況？

時任蘇共聯絡部中國處處長庫里克後來說，我們感到最爲慶幸的，是林彪没有眞的飛到蘇聯來。如果林彪眞的到了蘇聯，中蘇之間的麻煩就大了，也許不僅僅是一場邊境衝突了。

有人說，如果不飛，那就是英雄飛行員立功了，整個專機團都要立功。

如果摔在國内，最起碼西郊機場不會牽連那麼多的人。

那麼，潘景寅爲什麼要慌慌張張起飛呢？

“鬼”催的，一個人怎麼飛？没法飛，迫降是必然。

葉群和林立果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潘景寅也看見林彪上了飛機。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葉群命令快起飛，潘景寅怎麼敢不起飛？爲什麼不飛？說到底，你飛行員不就是相當於汽車司機嘛。首長要專機，不光林家，都是隨叫隨到。專機没有起飛時間，首長來了就是起飛時間。每次都是機組先到機場等首長，都習慣了，從來没有首長到了而機組還没到的先例。[15]

只有一個飛行員和三個機械師，就把這麼大型的運輸機“捅”上了天，實在不可思議。不要說調度室没有給命令，跑道燈也没有打開，而且兩個副駕駛和領航員、通信員都没有上來，飛行條例規定，機組不全不能起飛。不要說專機，就是普通的航班，也從來没聽說機組人員還没有到齊就飛了

的。本場訓練，飛起落這樣簡單的科目，也要等機組人員齊了才能飛，更何況是在外場，又是夜裏。飛機缺少副駕駛、領航員、通信員，一個人怎麼就敢大黑天的起飛呢？

葉群和林立果再催，也要等機組人員全上來再飛啊。急也不急這三兩分鐘嘛，大飛機可不比汽車，如果潘景寅拖延，林立果有可能打死他嗎？林立果也要想想，打死了飛行員，誰會飛三叉戟？他能開"大紅旗"，可是他都沒開，因爲車上有他的父親林彪。三叉戟他只會坐，不會駕駛。所以他敢打死潘景寅嗎？當然最後"魚死網破"，也不是不可能。不過還沒到那個程度，潘景寅稍微解釋一下，等個一兩分鐘，機組就全到了嘛。

潘景寅可以假借發動機有故障，要修一下。雖然林立果學過開飛機，但三叉戟這樣的複雜大飛機，他再有本事也挪動不了。潘景寅也完全可以藉口機組不齊，不能起飛。大型飛機又不是汽車，一個人就開了到處跑。飛機飛了，還要保證安全。沒有安全，飛上去不等於集體自殺嗎？這點道理林彪一家也不是不懂，以前坐飛機，一家人從不坐在一架飛機上，不就怕全家覆沒嘛。潘景寅把沒法飛的道理講了，他們肯定不會再"催命"，前後差不了幾分鐘，畢竟"安全第一"啊，再急也會"耐心"等機組人員到齊。

潘鷺（潘景寅的二女兒）回憶：爸爸喜歡唱京劇樣板戲。他手巧，做了很多毛主席像章。"文革"初很多人造反，他就自封"保皇派"，絕對服從上級。那時弟弟潘鵬一兩歲，爸爸抱著他看遊行隊伍，他學著喊打倒打倒。爸爸馬上制止，說

別打倒這個打倒那個，你爸爸就是個"保皇派"。 [16]

潘景寅家鄉的人說：老潘忠實，膽大，偏偏又不善於"演講"。

由此他破了中國航空運輸史上的記錄。

本來空軍司令部想把潘景寅調到機關的，調令都來了。1969 年我國從巴基斯坦首批買進四架英製三叉戟，編號二五 0、二五二、二五四、二五六。因爲這批三叉戟，潘景寅沒走，以民航身份參加了與巴基斯坦的購機談判。之後，1970 年 6、7 月，由巴基斯坦飛行員帶飛，他在廣州進行了三叉戟的改裝。行政上潘景寅是專機師副政委，在機組中年齡、資歷都是排行第一，業務方面更是三叉戟的技術權威。[17]

吳法憲回憶：周總理打來電話，說林彪乘車離開北戴河，臨走還開槍打傷了警衛員（這是誤傳）。我感到情況嚴重，不過還可以挽救，北戴河到山海關還有幾十分鐘的車程，我馬上叫張秘書打電話給潘景寅，告訴他專機不能起飛，潘景寅滿口答應。[18]

胡萍也給潘景寅打了電話，飛機一概不准動。[19]

按說，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命令潘景寅不要起飛，就不應該起飛了。但是，吳法憲從 1970 年的廬山會議後，被批了整整一年，沒完沒了地寫檢討，空軍很多人都知道吳法憲已經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的人了，還說吳法憲反林彪。在吳法憲和林彪面前，潘景寅當然聽林彪的，而不會聽吳法憲的。性格即命運，作爲全心全意的"保皇派"，在那個關鍵時刻，葉群讓起飛，潘景寅怎麼可能不起飛？如果他稍微想一

想，跑？往哪兒跑？既然有人要抓“首長”，跑到天涯海角也沒用。可惜潘景寅非常緊張，“首長”讓起飛，就快快起飛吧。可是上了天，飛到哪裏你怎麼知道？

機毀人亡，有著一系列的偶然。進口的四架三叉戟雖然是舊的，但這是我國第一次擁有大型噴氣式客機。它航程長，可以從北京直飛海南島或廣州，不用中途落地加油。而且發動機在後面，噪音小。一投入使用，就“馬不停蹄”，中央領導開會都喜歡坐。江青、鄧穎超、謝富治、華國鋒、丁盛等都坐過。林彪的兒子林立果也看上了三叉戟，而林彪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坐三叉戟。1958 年，林彪還沒有到軍委工作，坐飛機到昆明療養。他覺得飛機比較好，首先是非常快，從那以後就開始坐飛機了。那時林彪的座機是“子爵號”，渦輪螺旋槳，時速 450 公里，比三叉戟慢一半，野外迫降，危險肯定比三叉戟小得多。[20]

一個老飛行員的常識告訴他，只靠 12 噸半的油，如果飛到廣州，油不夠了，也不怕，中間可以隨時落地加油。沒有領航員也不怕，一個人也還多少有些把握，可以通過地面導航保持航線。可是他哪想到要在夜裏飛往人生地不熟的異國他鄉？盲人騎瞎馬，稀裏糊塗上了天，可是怎麼稀里糊塗下來呢？

二五六號三叉戟在起飛時，似乎就注定了機毀人亡的命運。

潘景寅一個人能“扛”起三叉戟嗎

天外有天，潘景寅的技術高超，專機師還有比他技術更高超的。在改裝的三叉戟飛行員中，潘景寅技術不如團參謀長李克修和副參謀長陳聯炳。只是因爲潘景寅職務比他們高，李克修和陳聯炳才成了潘景寅的“備份”。[21]

潘景寅開始飛行時，起飛時就遇到一個“下馬威”。

自有飛機以來，飛行事故多發生在起飛和降落這兩個階段。飛機起降時高度低，容易撞上障礙物。萬一飛機發生故障，飛行員也沒有處置的時間。對飛行員來說，飛行高度和速度是飛行員的生命，飛得越低，速度越慢，越危險，稍猶豫就會發生等級事故。所以起落是飛行員的生死關。

那是 1956 年或 1957 年，到瀋陽執行任務，潘景寅是機長，馬和是副駕駛，趙政彬是空中機械師，還有空中通信、領航等。正趕上一場大雪，跑道中間的雪掃掉了一段，前面跑道上還有雪堆。潘景寅看了看，認爲可以起飛，就滑出去了。滑了一段看跑道不夠，又退回來，繼續等了好幾個鐘頭。因爲沒有掃雪機，全是人工掃，好不容易掃出 1000 米的跑道。趙政彬認爲跑道還不夠，但潘景寅認爲夠了。按一般情況是夠了，可是超壓起飛，用了加速度，到了雪堆跟前飛機還沒有拉起來。眼看著飛機衝著雪堆扎進去，幸虧副駕駛馬和身強力壯，用力拉了一把，螺旋槳把雪堆打得飛起來。飛機終於被拉起來了，平安上了天。[22]

到了天上，要收起落架，但表示起落架收起來的顯示燈

不亮。試了幾次，都不行。原來雪堆把起落架上碗口粗的螺杆撞斷了。機械師趙政彬建議先完成任務，因爲飛機剛起飛，油還很多，必須耗掉一些才能降落，這樣落地就是起火，火也不會燒得很大。

空中飛行了兩個小時，幾個人想辦法，如何安全迫降？救護車、滅火車都早早停在跑道盡頭，預防萬一。落地時，趙政彬對潘景寅說，歪一點，用好的起落架接觸地面。飛機一落地，趙政彬立刻把發動機關掉了，飛機雖然向一邊偏，但總算沒有人仰馬翻。空軍來人調查，算了個三等飛行事故。這件事非常典型地說明大型運輸機出現問題要一起商量。如果不是大家努力，也可能就成了機毀人亡的一等事故。[23]

時念堂回憶：潘景寅是專機師副政委，內向，不那麼開朗，話極少。他的優點是非常沉穩，但也由此帶來腦子有點“木”。他飛伊爾-18 時，就飛得不精。1969 年潘景寅駕伊爾-18 飛往山海關機場，“撞”上雷雨，下不來了，怎麼也對不準跑道。那次我在後艙，上去把潘景寅換下來，這才讓飛機落了地。陳聯炳對我說了好幾次，叫我快點飛三叉戟，我們說了不算，意思是潘景寅不行。[24]

這又一次說明，大型運輸機上多一個內行，就多一份安全的希望。

分析潘景寅這兩次險情，起飛時他太著急，落地時他又太著急。而這兩個弱點恰恰造成他最後一次飛行成了不歸之旅。如果他起飛時稍稍停一停，或者機組人員全上去，或者

被警衛部隊攔下，都走不成。而落地時，如果他不那麼著急，再擴大一點盤旋範圍，不就可以落在溫都爾汗的土機場了嗎？

康廷梓認爲：因爲是外行，葉群和林立果的技術準備倉促，沒有得到重要的機場資料，尤其缺乏蒙古邊境的軍用機場資料。機場資料包括機場的位置，跑道方向，跑道兩側導航台的設施，跑道的距離，電台的呼號頻率及其他聯絡方式等。軍用機場資料是絕密材料，不是與飛行有關的人員無法得到，得到了也看不懂。即使葉群問到了蒙古邊境機場的分佈，沒有具體標到航圖上，也不行，飛行員只能根據航圖飛。

在林立果的準備中，最有用的就是周宇馳要到一份北京到烏蘭巴托的航線圖，以及三北地區的雷達分佈圖。周宇馳要蒙古周邊的電台頻率，這是對的。只有掌握了廣播電台的地理位置，飛行中羅盤一旦接收到廣播信號，羅盤指針就會自動引導飛機飛到電台上空。但這是領航員的工作，潘景寅不能離開駕駛台半步。三叉戟上特設師部起良會使用領航員的羅盤接收設備。[25]

三叉戟起飛前的各種準備工作，如加油等，離不開機械師，連飛機艙門的鑰匙都在機械師身上。但一旦起飛動作完成，飛行中不發生故障，機械師就無用武之地了。

但是三個機械師包括邰起良在機艙後面保護林彪，不可能幫助潘景寅操作。

葉群在副駕駛的位置上。她懂俄語，所以她“大搖大擺”地坐到了潘景寅身邊，冒充領航員。[26] 可是，葉群再“聽

明”，又怎麼可能引導三叉戟飛向平安？

也就是說，在近兩個小時的夜航中，沒有人可以與潘景寅商量，一切的一切全由潘景寅一個人“扛”著。面對如此困境，再膽大的飛行員也會縮手縮腳。

飛機一動就孕育著危險，哪怕萬分之一的不小心，也可能導致機毀人亡。

航空專家通過數位分析發現，如果飛機持續夜間飛行，執勤時間越長，飛行員發生飛行事故的概率也越高。“不眠時間段”越長，存在的“隱患”就越大。特別是在一天的後半段，也就是下午至午夜、午夜至清晨，比前半日存在的危險更大。所以飛行事故多發生在下午或夜間，特別是機長在決策和程序方面的錯誤明顯增多。爲此，世界民航界對飛行機組的值勤時間和飛行時間及年齡限制等方面都有嚴格規定。

在飛行這個複雜的系統中，飛行員始終是核心。當過“老飛”的人都知道，飛行是一項繁重的腦體並重的特殊勞動，勞動強度非常大，對飛行員的生理和心理要求極高。長久以來，四分之三的飛行事故都是由於人爲表現不佳引起。七情六欲、疾病、疲勞、不舒適或焦慮等，都會影響人的主觀能力及與客觀環境的匹配和適應，從而產生不良的行爲。

所以飛行員睡好、吃好和心理平衡，是飛行安全的重要保證。

偏偏潘景寅在那一天晚上睡覺、飲食和心理都不好。從西郊機場起飛前他匆匆在候機室吃了“盒飯”，到北戴河落地吃了一頓夜餐。也就是說，潘景寅兩頓飯都沒有吃好。而又一天中連著兩次開飛機，傍晚執行了一個航班，從北京到北戴河，雖然是短途，不到一個小時的飛行，但加上飛行前的準備和飛行後的收尾，時間也拖得很長。之後他佈置機組休息，他卻沒休息，一直坐在調度室裏，連著接了好幾個電話。一夜未睡。沒吃好倒也罷了，沒想到原來說第二天早上的飛行提前到半夜，而且那麼慌亂，連機組人員也沒到齊就飛上了天。[27]

茫茫黑夜，上天就上天吧，夜航也不是一次兩次。可是，爲什麼飛往蒙古？潘景寅心裏的鬥爭沒有辦法不激烈。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北京有他溫暖的家，他爲什麼要跑到國外？跑到國外他算什麼？飛機肯定是開不成了，那他能幹什麼？想再回國也不可能。可是，又不可能永遠在天上飛下去，油不多了，降落到哪裏呢？

飛機上還坐著“林副主席”，實在是心力交瘁啊。

面臨“彈盡糧絕”和“走投無路”，就是三頭六臂，一切也已經無可挽回了。

被“丟掉”的五位機組人員

對於林彪座機來說，被“丟掉”的機組人員都是重要人物。

兩位副駕駛，在別的專機上都是正駕駛，只因爲他們職務低，才“屈”爲副手。陳聯炳和潘景寅是同學，同一批進航校學飛行。他文化雖然不高，但腦子快，飛得好。飛行這事

也是要有天賦的，不承認不行。專機師師長時念堂認爲：康廷梓最大的優勢是年輕。他文化高，又愛鑽研，進步非常快。[28]

第一副駕駛陳聯炳（團副參謀長），安徽人，1947 年入伍，外號“二虎”。作風潑辣，性格豪爽，參加過抗美援朝。他是在朝鮮前線被選上的飛行員，當時他們 100 名候選飛行員分乘兩輛卡車回國。途中一輛卡車被敵機擊中，幸運的老陳在另一輛卡車上，他親眼看見另一車 50 名戰士轉眼間全部犧牲。到 1971 年，陳聯炳已經是技術拔尖的老飛行員了。這位三叉戟的第二號人物，在改飛三叉戟前是圖-124 飛機的技術權威。他除了單獨駕駛三叉戟執行重要的專機任務，還負責三叉戟飛行中隊新飛行員的訓練工作，康廷梓就是他的徒弟。九一三事件後，陳聯炳被關了兩年後，轉業回安徽合肥，在工商局任過副局長。他家屬患有比較嚴重的風濕病，已經去世。陳聯炳的身體也很不好，加上心情的原因，得了胃癌，動過兩次大手術，也已經去世。

第二副駕駛康廷梓（三叉戟中隊中隊長），河南鞏義縣人，時年 32 歲，後起之秀。按機組的業務分工，沒有他的位置，爲了加強林彪專機，多上了一個飛行員。雖然他在一般專機任務中擔任過機長，但在重要專機任務中，只能擔任副駕駛。這架二五六號三叉戟，是康廷梓和中隊的飛行員在廣州白雲機場同巴基斯坦飛行員共同試飛 12000 米的高空性能後，從廣州接回北京的。

通信員陳松鶴（團通信副主任），杭州人，喜歡運動，

乒乓球、籃球都打得好。他性格沉穩，思維敏捷，非常聰明，技術數一數二。他差不多和陳聯炳一樣老，在蘇製伊爾-18 等機種上執行過很多次專機任務。因爲他能說英語，還執行過東南亞、非洲等專機任務。九一三事件後，陳松鶴轉業後在杭州的一個衛生院擔任黨支部書記。他愛人在空軍學院衛生隊當護士，和他一塊轉業。

領航員李成昌（大隊領航副主任），1935 年出生在廣東梅縣的一個貧苦家庭中，1951 年 7 月參軍，1952 年進入長春第二航校學習領航，1953 年 11 月以優異成績畢業，分到西郊機場。先後飛過八個機型的飛機，是我國引進“子爵號”和三叉戟飛機後第一批改裝的領航員，改飛三叉戟前一直在英製“子爵號”上擔任領航。由於他出身好，技術好，多次執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專機任務，以及金日成、胡志明、霍查等外國元首的專機任務。他到過十多個國家，並在越南當了 9 個多月的專家，越南空軍首批專機領航員就是他帶飛出來的。

李成昌的記憶力超群，在空中觀察仔細，反應敏捷，計算精確。他是專機師領航專業的技術權威，被稱作“活地圖”。全國多數機場的電話號碼和導航頻率他都能倒背如流，甚至不拿地圖也可以完成整個領航工作。有人開玩笑，所有的領航資料全都裝在老李光禿禿的腦袋裏。也是，老李用腦太多，30 多歲頭髮就都“溜”掉了。

遇到特殊情況，李成昌都能化險爲夷，是飛行員最信賴

的領航員。只要他領航，飛機既不會偏航，也不會誤點。再壞的天氣，他也能引導飛機穿雲破霧安全落地。在他幾十年的領航記錄中，沒有任何差錯和誤導事故。正因爲他各方面都非常優秀，才被選爲林彪專機的領航員。九一三事件後他停了飛，愛人是第二批女飛行員，也因此停飛一段。後來因愛人家在上海，轉業到上海民航，又繼續飛了一些年。

如果機組全上了飛機呢

負責二五六號三叉戟事故結論的空軍專家組成員金華認爲，飛機墜毀與飛行員操作有關。他斷言：要是副駕駛和領航員都上去就沒事了。[29]

在運輸機中，駕駛員是飛行的飛行員，副駕駛是不飛行的飛行員。左邊的機長能不能飛好每一個起落，與右邊的副駕駛有直接關係。三叉戟的很多操作包括各種速度調整都需要“右座”配合，甚至“主宰”。正因爲副駕駛的位置重要，二五六號三叉戟才配了兩名副駕駛。副駕駛的職責分工是協助機長觀察儀表並輔助操縱，執行飛行檢查單，通過喊話強制機長瞭解飛機狀態，提醒（質疑）機長的錯誤。據統計，機長的戰術決策錯誤 96%是機長個人程序和操縱錯誤。專家指出，可能因爲副駕駛的一句緊急提醒（質疑），很多曾經發生過的空難就可以避免。

朱秉秀回憶：飛機落地，事先要與機場約好電台的波段，要不通不了話。知道電台波長，調到頻率很容易。吳德

認爲，最大的問題是飛機上的“聯絡員”沒帶上，沒有“聯絡員”，通信聯絡不上，飛機到了溫都爾汗找不到烏蘭巴托了。[30]

多次飛過北京到莫斯科航線的老飛行員說：三叉戟選擇的這條航線基本上是沿著北京至烏蘭巴托的國際航線，沿著中蒙蘇三國的鐵路飛，有很明顯的地標，即使夜間也不會迷航。潘景寅過去飛過莫斯科，爲什麼不沿著鐵路飛呢？

是不是鐵路沿線有駐蒙蘇軍的好幾處機場和防空導彈陣地，潘景寅才不得不在鐵路以東自建航線呢？不過，茫茫黑夜，如果沒有明確的燈光地標，空中恐怕也找不到鐵路。他只能根據大致情況，硬著頭皮往前飛。[31]

劉振華（空軍作戰部領航處參謀）回憶：大型運輸機不像殲擊機，一個人就可以飛上天。殲擊機在空中飛行的時間短，沒那麼長的航線，空中用不著導航，光憑地面導航就完全可以。軍用運輸機是個機組，航線那麼長，加上空中有風的影響，航向並不那麼確定，除了地面領航外，必須要有空中領航員。因爲軍用飛機有時要自己在空中臨時選擇航線，如果偏出，領航員要提醒。不像民航，民航是固定航線，地面導航又齊全，上不上領航員無所謂。一般蘇聯老式飛機還有領航員的位置，美國飛機根本就沒有領航員的位置，領航員只能臨時坐在正副駕駛之間。三叉戟裝有各種先進的導航設備，但潘景寅一個人在空中駕駛飛機，不可能騰出手來再測量航線的資料。沒有領航員，潘景寅很難判定自己的位置。[32]

雖然潘景寅飛過莫斯科，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這次起飛前他並沒有準備去蘇聯的航線。機上雖然有雷達，但機上雷達由領航員操作，如果潘景寅不會看反射波，不一定能看得懂。潘景寅也懂領航，但機上看圖，速度多大，飛多少度，多少距離，剩多少油，都需要一番複雜的計算。如果機組人員全，就可以從容分工。但只有潘景寅一個人，他哪裏顧得過來啊。面對陌生的航線，既沒有領航的“眼睛”，又沒有通信的“耳朵”，飛得慢是理所當然的了。可是你不能老在天上飛啊，怎麼落下來？難！如果在國內，如果地面有導航，如果是白天，或許還有一線平安。黑夜飛在異國的荒郊野外，怎麼可能生還！

澳大利亞記者彼得·漢娜姆說：蘇聯專家估計林彪座機接地的速度接近每小時 550 公里。爲什麼這麼大的速度？到現場調查了好幾次的蘇聯專家認爲是操縱失誤。飛機迫降時，起落架、減速板及減速反推力裝置都失靈了。蘇聯專家只是隨便說說而已，人家憑什麼關心你中國飛機的失事調查？起碼起落架失靈不準確，迫降時起落架根本用不著，怎麼能知道失靈不失靈？[33]

空軍專家組根據照片分析：飛行員實施了野外迫降動作，没放起落架，打開了前開縫翼。但迫降動作没有做全。要減速，就要打開減速板和反推力裝置。從照片上看，二五六號三叉戟的減速板没有打開，降低發動機速度的反推力裝置也没有使用。在正常情況下，這兩個動作由副駕駛負責。因爲不是潘景寅的職責範圍，在緊急情況下，他完全有可能

忘記或根本顧不上這兩個並不複雜的操作。使三叉戟在迫降時變成一匹瘋狂的“野馬”。[34]

對於三叉戟這種大型飛機來說，兩翼與“機肚”幾乎是在水平線上，不適於野外迫降。迫降時不能放起落架，那麼大的航速，“大肚皮”擦地產生高溫，繼而引起油箱爆炸。

特別是晚上没有照明，成功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

大型飛機野外迫降從來没有成功過。

有人說操縱不全是因爲機組不全，如果機組人員全，就可以從容分工。在那麼慌亂的情況下，潘景寅飛改裝三叉戟飛機的時間並不長，更何況服過安眠藥，又一夜未睡，連著開飛機，疲勞過度，技術動作非常有可能忘記。內行人說：這麼高速的飛機，又是在晚上，又是在異國，一個人迫降，再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成功。

没有領航，没有通信，也没有副駕駛，只能靠自己一個人“拳打腳踢”了。黑夜茫茫，搞不清飛機的位置，油又不多了，潘景寅的心情没法不糟糕。

爲什麼選擇在溫都爾汗這個地方迫降呢？

專機師師長時念堂分析：從溫都爾汗再往北飛，一直到蘇聯境內，山連著山。烏蘭巴托以南的山區，海拔 2257 米的柏格多汗山，周圍是一道道東西走向的起伏山巒，鐵路從山谷中穿過，這片山區是烏蘭巴托市的天然屏障。萬一油料用完，連塊平地也找不到。飛機可不像汽車，没油了，“乖乖地”原地不動，一旦發動機抽不上來油，飛機立馬從天上掉下來。就是到了機場上空也不行，連建立航線也建立不

了，没有哪個飛行員敢。所以如果還有 20 分鐘的油，飛行員也不敢飛完最後的 20 分鐘，再大的膽子也不敢。三叉戟上一共有 5 塊油量表，油箱設計非常合理，機油大都裝在飛機翅膀裏，飛機翅膀不規則，裏面還有支撑的大樑。爲了把油盡可能用光，裏面安了好多油泵，但還是不能完全抽盡，總會剩下殘油。殘油不應少於 4 噸，因爲到最後油量表就不准了，指針來回晃，警告燈頻頻閃，再有經驗的飛行員也得趕快落地。[35]

像溫都爾汗這樣一個有小緩坡的迫降場，並不是很理想，其實旁邊還有一個更理想的迫降場。但當時潘景寅是從空中選擇迫降場，已經很難得了。表面看没有人爲障礙物，但這正是蒙古草原的險惡之處。在蒙語中，“汗”就是小山丘的意思。這裏的草原看似平坦，卻有緩緩起伏的山丘，更何況還“軟綿綿”的有草有沙。

墜機現場溫都爾汗 300 公里外就是烏蘭巴托，按三叉戟的正常速度，再飛不到 20 分鐘就到了。如果怕來不及，60 公里外就是溫都爾汗的“土機場”，要飛到那裏，油百分之百的夠。空軍專家組認爲，2.5 噸的油量足夠讓三叉戟把盤旋半徑擴大到 60 公里以上，這樣就很容易找到這個“土機場”。跑道是在草原上軋出來的，上面壓了一層很硬的紅土，比沙土地強多了，無論如何，總比迫降在野外安全吧？

朱秉秀認爲：飛到距墜機現場 60 公里外的溫都爾汗土機場，油是夠的。抱著一線希望迫降，没成功，摔零碎了。没山丘可能迫降成功，右機翼碰到山丘，那麼大速度，頂翻了。先燒後炸，誰也没有逃掉。特別晚上無照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少。向左偏一點，没准就迫降成功了。[36]

但空中没有領航，地面没有導航，這就使飛機燃料將盡時，又“聾”又“瞎”的潘景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精確位置。據外電報導，1971 年 9 月 12 日至 13 日的夜裏，溫都爾汗停電。而貝爾赫礦區没有停電，有燈光，或許他把礦區當成了一個小城市？一般大中城市都有機場，而且機場一般都位於郊區燈光較暗的地方。選擇靠近燈光的地方迫降，萬一有傷亡，可以被人早些發現。

大概這就是潘景寅選擇緊急迫降場的原則吧？

假如被“丟掉”的五位機組人員全都上了三叉戟，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八三四一部隊追上來，阻止飛機起飛；另一種可能是機組人員全都上去，兩個副駕駛陳聯炳、康廷梓與潘景寅一起商量，再加上領航員李成昌的神妙計算，通信員陳松鶴的聯絡，三叉戟將平安迫降到 60 公里外的溫都爾汗“土機場”。

毛澤東説，潘景寅像我的兒子毛岸英

二五六號三叉戟上一共九個人，全部死亡。除林彪、葉群夫婦和兒子林立果一家三口，以及跟隨林立果的劉沛豐外，還有五名工作人員。一位是林彪的座車司機楊振剛，另外四位是機組人員，機長潘景寅、主管機械師李平、特設機械師邰起良、機械師張延奎。

改裝好三叉戟後，需要經過多次試飛。潘景寅的女兒大潘鶩因小兒麻痹在長春治療，一個人在外地，吃不好，營養也跟不上，孫祥凝幾次催老潘把女兒接回來。九一三事件前一個星期，潘景寅申請了長春航線，順便把大女兒接回北京。以後還追查潘景寅與這件事的關係，其實根本扯不到一起。不過話說回來，如果潘鶩沒有被接回家，九一三事件後，父親死，母親被關起來，她很可能就回不了家了。[37]

9 月 6 日，二五六號三叉戟才改裝好，被確定爲林彪專機。林彪的專機和別的專機不一樣，需要特別改裝。要按照林彪的生活習慣，隔出單間，安上一張床。還要保持艙內一定的溫度，艙內前後左右全是溫度計。鏡子上也要仔細貼上喬其紗，不能透一絲光。洗手間的台燈是專門爲林彪設計的變速燈，罩上綠金絲絨，光線特別暗，所有的管子都要包上。

安治樑回憶：確定三叉戟給林彪，時間不長。但機組早就組建了，都是專機師各行業中的頂尖人物。

機長潘景寅，專機師副政委，在機組中，無論年齡還是資歷都是排行第一，業務方面更是三叉戟的技術權威。[38]

潘景寅是河北豐潤縣人，1929 年 1 月出生，犧牲時年僅 42 歲。他是個苦孩子，從小沒有母親，跟著姑媽長大，11、12 歲就給地主放豬。1946 年 6 月，村裏過隊伍，他把豬鞭子一扔，頭也不回跟上走了。他這一走不要緊，地主逼潘景寅的父親賠豬，交不出豬來就灌辣椒水，吊起來打，父親差點死去。所以後來潘景寅對父親非常好，總覺得對不住父親。

潘景寅所在的部隊，後來改成四野，仗打得多，提升也快，他當營教導員時才 19 歲。在朝鮮打仗時，他被調到航校政治部當幹事。航校裏選第七期飛行員，潘景寅喜歡攝影，報了空中攝影，但一檢查身體，比飛行員的身體還棒，這樣就學了大型運輸機。但攝影仍是他的業餘愛好，他出差到蘇聯買回一架照相機，業餘時間拍了不少照片。

雖然沒上過學，但潘景寅聰明好學，年紀又輕，調到北京西郊機場，執行過很多重要的專機任務，幾乎所有的中央首長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宋慶齡、王光美、鄧穎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坐過他駕駛的專機。

首長上下飛機都要與機組人員握手，最後還要合影。那時潘景寅當大隊長，身高一米八幾，不胖不瘦。宋慶齡很注重身邊工作人員的儀表，她對小潘機組非常滿意，特別提出要潘景寅給她開飛機。九一三事件前，宋慶齡要用專機，但潘景寅要給林彪開飛機，宋慶齡表示她可以等，當然她再也等不到了。

潘景寅給毛澤東開過三次飛機，包括 1967 年毛澤東最後一次坐飛機。

毛澤東對潘景寅的印象也極深，一見面就特別喜歡，說你長得像我的兒子（毛岸英）。

從潘景寅留下的照片看，不論髮式、臉龐，還是身材，確實都非常像毛澤東的大兒子毛岸英。[39]

毛岸英是毛澤東最鍾愛並著力培養的兒子。

毛岸英，1922 年 10 月出生在湖南長沙市，8 歲時曾和

母親楊開慧一起入獄。母親犧牲後，他和弟弟被救了出來。由於黨組織遭到破壞，他們流浪街頭。毛岸英當過學徒，撿過破爛，賣過報紙，推過人力車。1936 年，被送到蘇聯軍政學校，以後又上了軍事學院。在蘇聯期間，他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冒著槍林彈雨，轉戰歐洲戰場。1946 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入黨。按毛澤東的要求，他在解放區搞過土改，做過宣傳工作，當過秘書。解放初期，又擔任了工廠黨委副書記。不論在哪個崗位上，毛岸英都努力和群衆打成一片。

1950 年，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動要求入朝參戰，擔任志願軍司令部俄語翻譯和秘書。11 月 25 日上午，毛岸英正在作戰室工作，被美軍轟炸機投下的燃燒彈擊中，壯烈犧牲。

多少年了，毛澤東一直不能忘記大兒子毛岸英。

所以，毛澤東願意坐潘景寅的飛機。

1956 年 5 月 3 日，毛澤東解放後第一次坐飛機就遇上險情。飛機進入雷雨區，通信中斷了 40 分鐘。以後爲了毛澤東的安全，中央決定一般情況下不讓毛澤東坐飛機。

第二號人物林彪的專機就成了中國的一號專機。

鄧小平說，飛行員（潘景寅）是個好人

林彪機組由專機師中技術最好的人員組成。條件是出身好，政治可靠，社會關係好，技術高超，渾身上下找不到一點“毛病”，由此可見專機飛行的重要程度。

安治樑回憶：我們執行專機任務也不是一年半年，誰的技術怎麼樣都摸底，政治審查也常常進行。我們團黨委提出意見，上報師黨委批准。按專機師的規定，專機組編有正駕駛（機長）、副駕駛、領航員、通信員、機械師、機械員、特設師、服務員。平時專機機組人員在原單位按行業編制上班，有專機任務再“緊急集合”。臨時也可能有變動，不是完全固定。最後一次飛往北戴河，三叉戟的飛行員中一、二、三號“種子”全去了。[40]

一般專機機組是一個機械師加一個機械員，二五六號三叉戟上了兩個機械師。

主管機械師李平（三大隊機務中隊副中隊長），34 歲，1957 年參軍，天津人，個子不高，能說會道，技術非常好，是一位有著豐富經驗的機務幹部。

張延奎個子瘦小，相對來說年輕些，26 歲，當機械員用。他平時沉默寡言，工作嚴肅認眞，任勞任怨。張延奎的父母都在山東，他新婚不久，愛人是北京百貨大樓的售貨員，已經懷孕，可惜他連自己的孩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吳鑾清（專機師機務主任）回憶：張延奎說來眞冤，我不太認識他，原來他是個機械員，我到幹校後他才提起來。他本來不是這架專機上的，林彪座機的機械師是于景瑞。那一天是星期天，于景瑞家在城裏，請假回了家，臨時找也來不及，就抓了張延奎的差。[41]

作爲重要的專機任務，二五六號三叉戟還比一般專機多上了一個特設機械師邰起良（三大隊機務中隊副中隊長），

管無線電、雷達和液壓系統等。

邰起良，34 歲，吉林人，1956 年或 1957 年的兵，瘦高個兒，很漂亮，不愛說話，經驗豐富，技術也非常好，重要的專機任務非他莫屬。

1971 年 10 月，關於九一三事件的中央 57 號文件沒有提到機組的四個人，在以後的中央文件和任何一級組織，都沒有給三叉戟機組的飛行員們定性。但自然而然的，在那種“左”的背景下，他們被當成反革命分子。幾位飛行員的妻子，尤其是機長潘景寅的妻子孫祥凝，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家屬，關了好幾年。至於死者的工資問題、撫恤問題，都不了了之。機組沒上飛機的五名飛行員在失去自由的“學習班”裏，同“病”相憐，寫了大量的材料，證明上了飛機的四位飛行員在生前與九一三事件沒有任何關係。只可惜他們自己還是“泥菩薩”，被當成反面人物批判不止。替死去的四位飛行員說話，根本就是穿一條褲子，無人理睬。

當然，二五六號三叉戟犧牲的四位飛行員，是烈士，還是叛徒，對他們本人來說，都無所謂了。但是，死者的榮譽是對生者的安慰。在經過長長的苦難之後，1980 年底，鄧小平在與美國《基督教箴言報》總編輯的談話時，說九一三事件中的飛行員是個好人，而這個一錘定音的結論又被登在《人民日報》頭版上，偶然被潘景寅的妻子孫祥凝看見。[42]

戲劇性就這樣出現了。

經過孫祥凝整整一年的上訪，終於解脫了三叉戟機組所有死了的和活著的飛行員。潘景寅和三位機械師的家屬都接

到了由總政治部統一印發的《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並按規定補發了撫恤金。

但是，病故是怎麼回事？人家四名專機飛行員，是專機師身體條件最好的，機毀人亡，怎麼叫病故？這不是開國際玩笑嗎？很明確，他們是因飛機失事犧牲的。

空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只能猜測。他就一個人飛了，誰去找這個原因，死無對證。按正常情況不可能，本來就不可能，非常特殊，非常重大的事件！

似乎這個事件中還有很多的謎。

鄧小平爲什麼要對美國記者說飛行員是好人？是國家安全？政治影響？還是從二五六號三叉戟的結局？[43]

註釋：

[1] [17] [42] 採訪潘景寅妻子孫祥凝筆記，2000 年 1 月 7 日

[2] [3] [21] [38] [39] [40] 採訪專機團政委安治樑筆記，2003 年 3 月 26 日

[4] [5] [6] [24] [28] [31] [35] 採訪專機師師長時念堂筆記，2000 年 4 月 14 日

[7] [8] 採訪空軍航行局局長尚登峨筆記，2001 年 10 月 4 日

[9] [10] [11] [12] [13] [15] [20] [25] 採訪二五六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康廷梓筆記，1999 年 12 月 30 日

[14] [16] [37] 採訪潘景寅女兒潘鷺筆記，2005 年 1 月 8 日

[18] 採訪吳法憲兒子吳新潮筆記。2006 年 1 月 3 日

[19] 採訪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胡萍筆記，1996 年 11 月 23 日

[22] 採訪專機飛行員馬和筆記，2005 年 4 月 21 日

[23] 採訪專機空中機械師趙政彬筆記，2005 年 4 月 11 日

[26] [27] 採訪王中遠筆記，2005 年 6 月 15 日

[29] [34] 採訪空軍機務部參謀金華筆記，2000 年 1 月 13 日

[30] [36] 採訪空軍作戰部參謀朱秉秀筆記，2000 年 8 月 16 日

[32] 採訪空軍作戰部領航處參謀劉振華筆記，2000 年 7 月 12 日

[33] 漢娜姆《解開林彪死亡之謎》，載香港《亞洲週刊》1994 年 2 月 1 日

[41] 採訪專機師機務主任吳鑿清筆記，2000 年 4 月 15 日

[43] 參見《人民日報》1980 年 11 月 15 日新華社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和夫人。11 月 24 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就當前國內外一些重要問題鄧小平答美國記者問》。談到那架三叉戟時，費爾問，根據調查，飛機失事是自然的事故，是由於飛機維修不好呢？還是別的原因？鄧小平回答，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



潘景寅，時任空軍專機師副政委、林彪專機飛行員。

孫祥凝提供，攝於50年代



潘景寅惟一的兒子潘鵬和孫子。

舒雲攝於2005年4月，身後的山上，是潘景寅夫婦的合葬墓。孫祥凝於2004年8月2日去世。



這是潘景寅為毛澤東駕駛的伊爾-18專機，現保存在航空博物館。

時念堂提供







這是我第二次採訪孫祥凝時，在海澱醫院家屬院拍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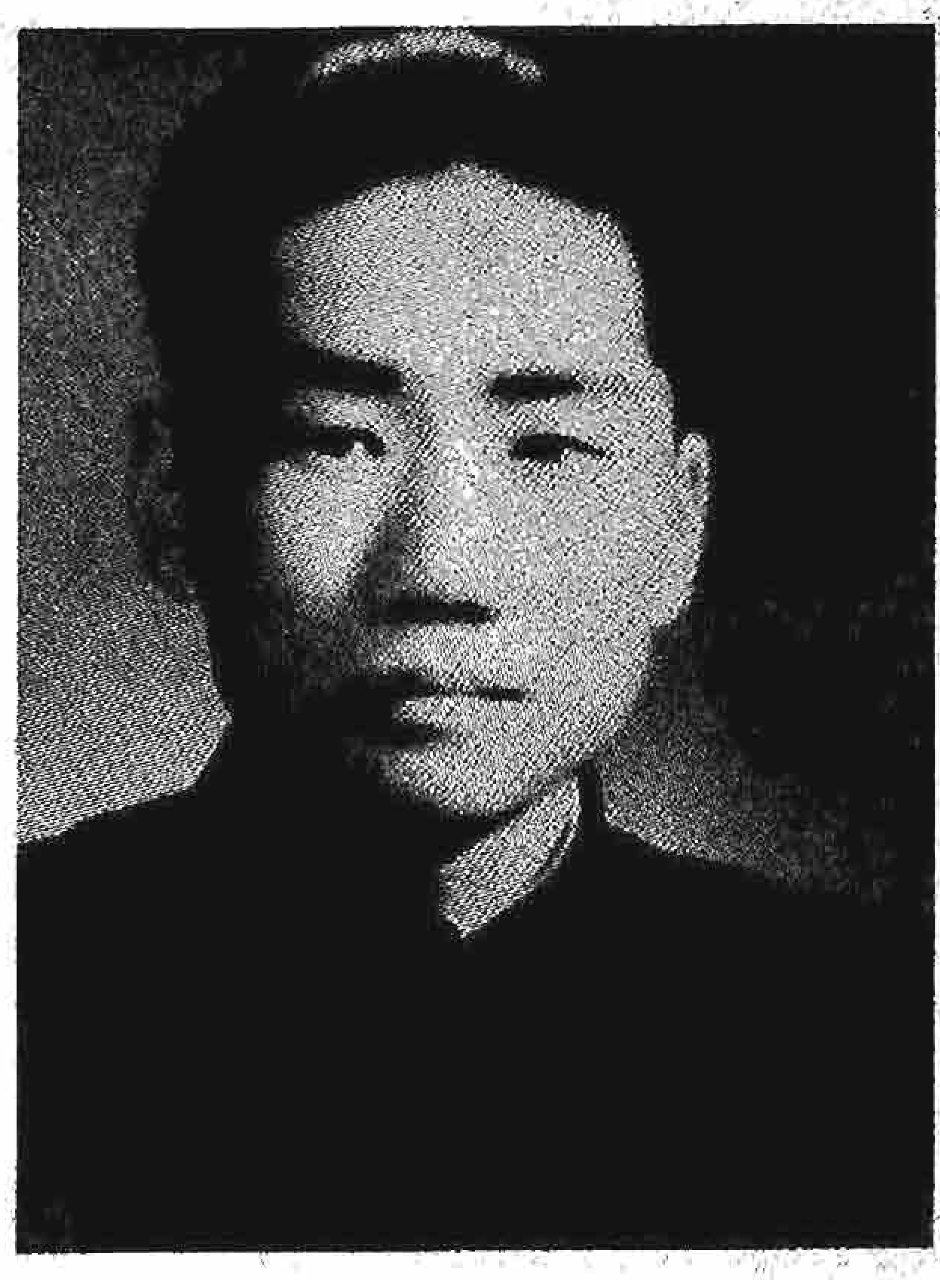
舒雲提供，由新華社記者楊達洲攝於2000年8月，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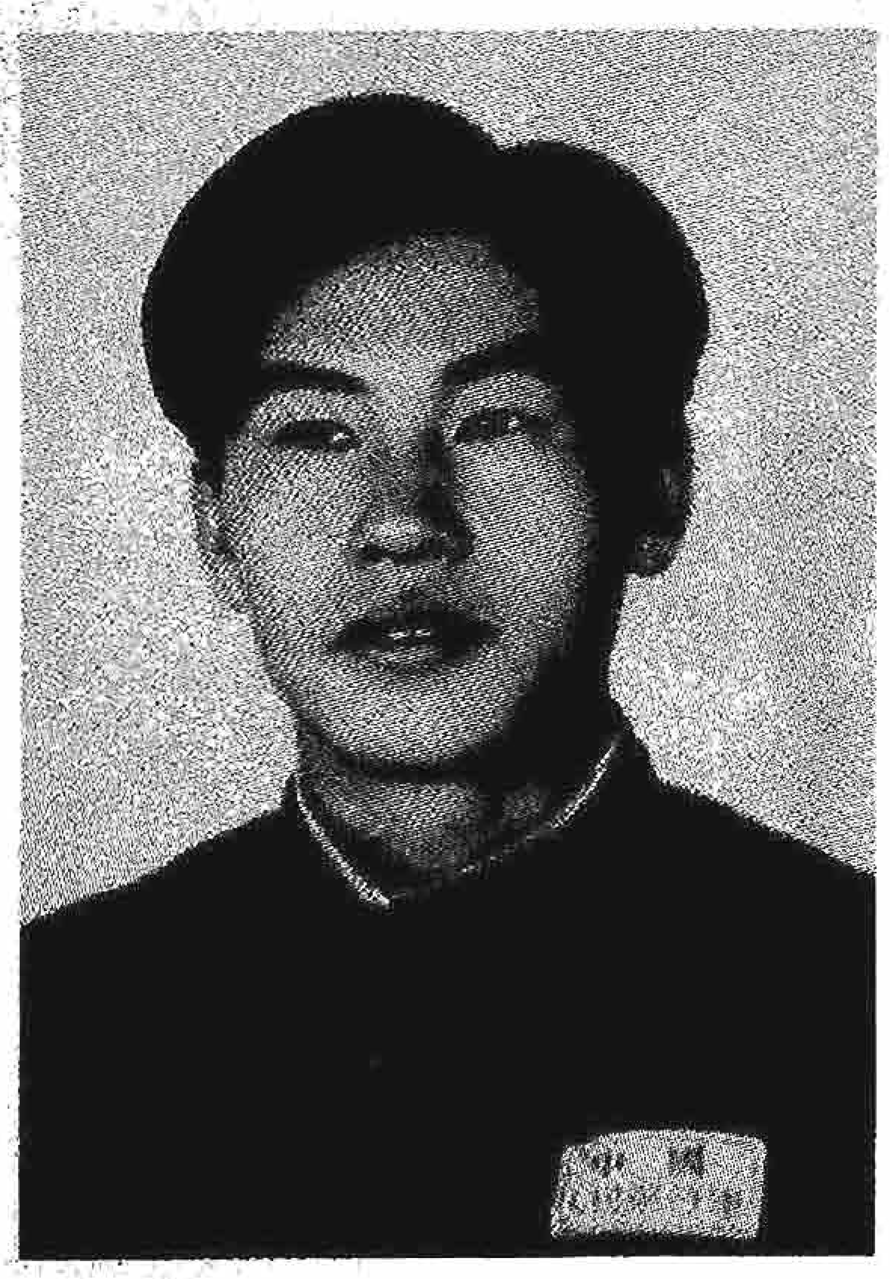


毛澤東和兒子毛岸英。毛岸英的這張照片非常像潘景寅。毛澤東自己也對專機飛行員潘景寅說過：你像我的兒子。



毛澤東的大兒子毛岸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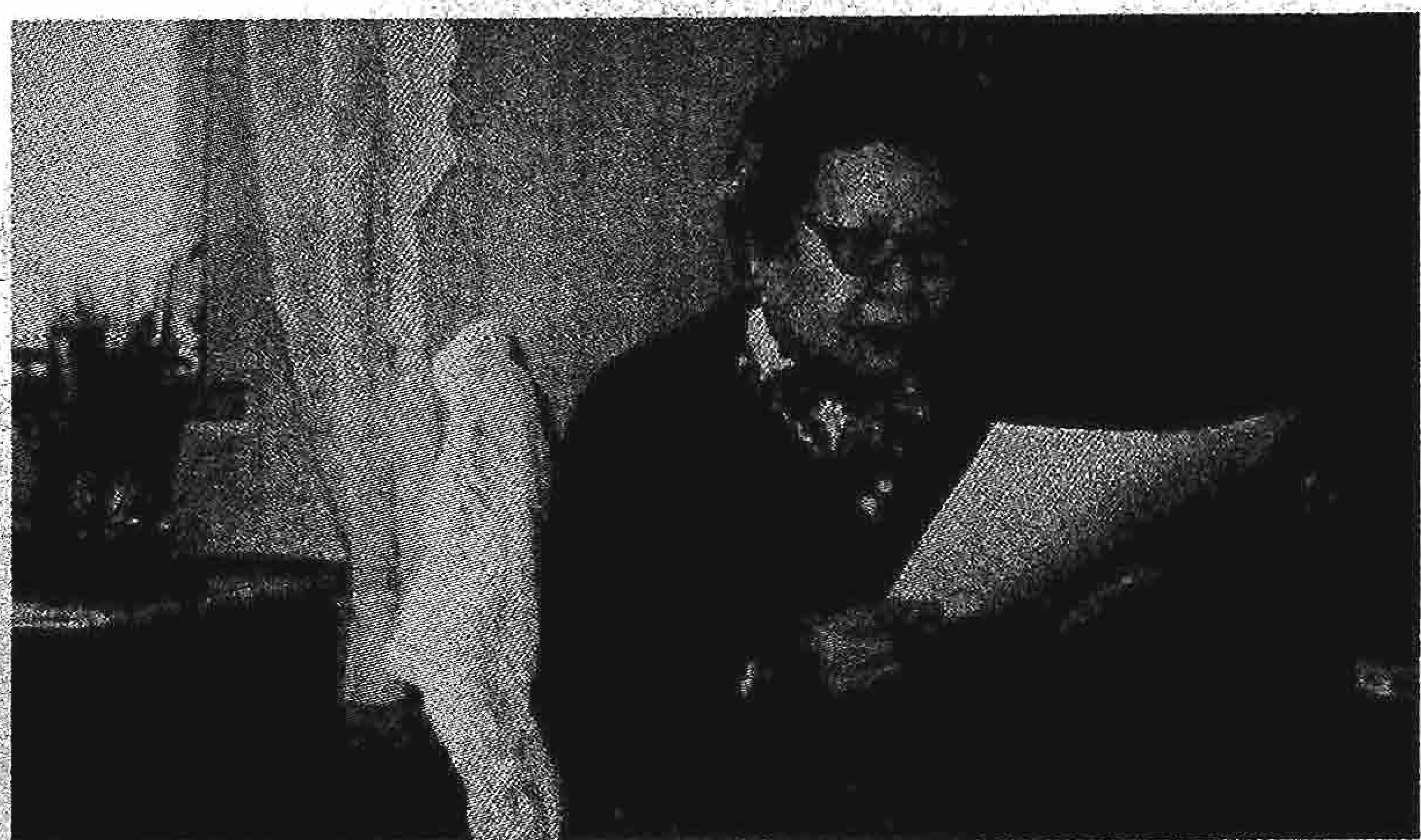




毛澤東的大兒子毛岸英，犧牲在朝鮮戰場。

潘景寅

潘景寅兒子潘鵬提供，攝於50年代



潘景寅的妻子為潘景寅平反奔走，終於好消息傳來。

舒雲攝於1998年，北京海澱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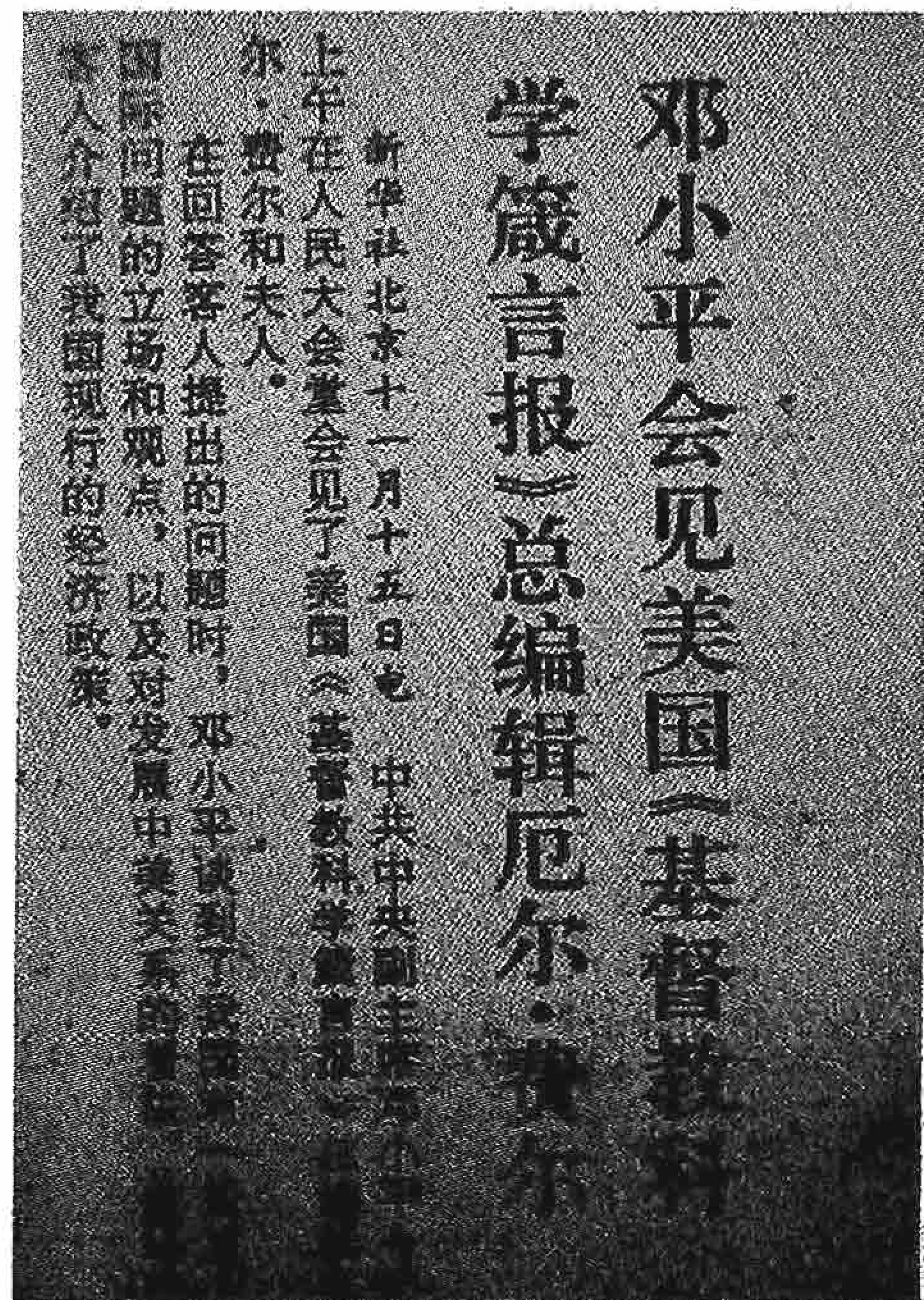
人民日報
RENMIN RIBAO

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



孫祥凝偶然發現了這張救命的《人民日報》。

舒雲攝影



邓小平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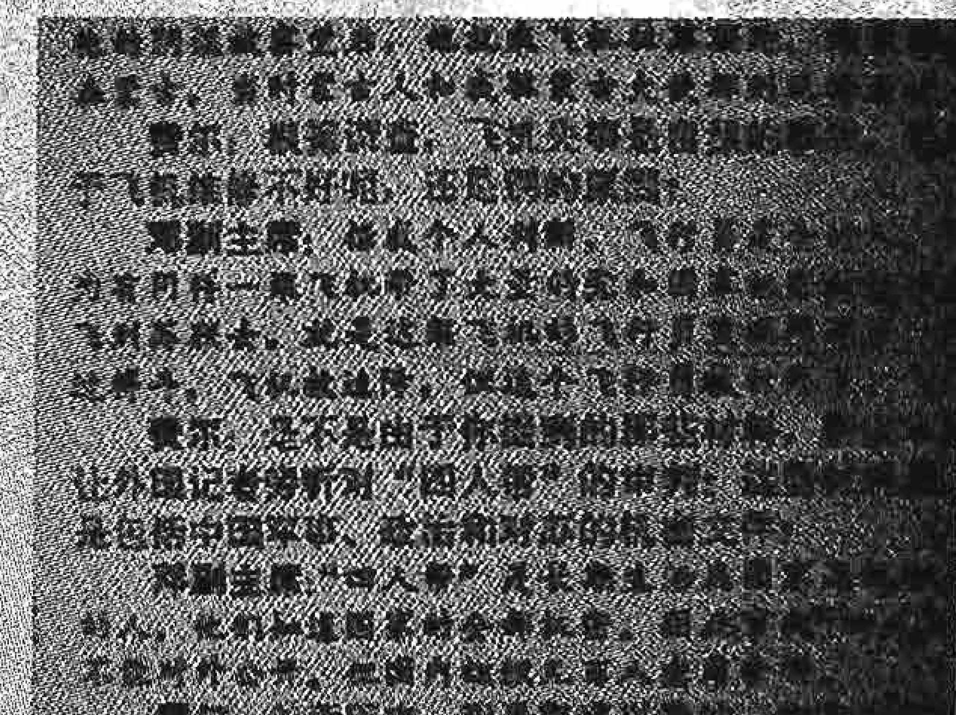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五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尔·费尔和夫人。

在回答客人提出的问题时，邓小平谈到了……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以及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客人介绍了我国现行的经济政策。

林彪事件完整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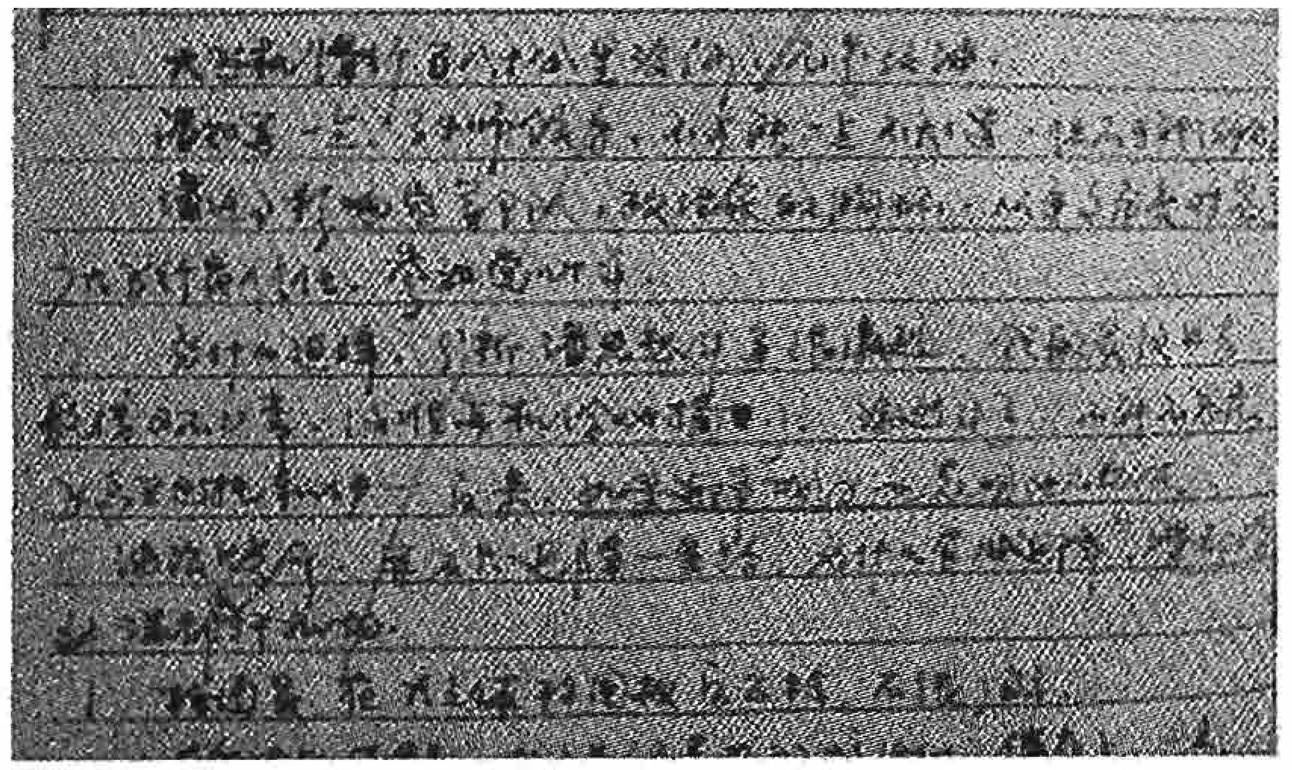
就是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說飛行員（潘景寅）是個好人。

舒雲攝影



《人民日報》刊登鄧小平關於飛行員（潘景寅）是個好人的談話。

舒雲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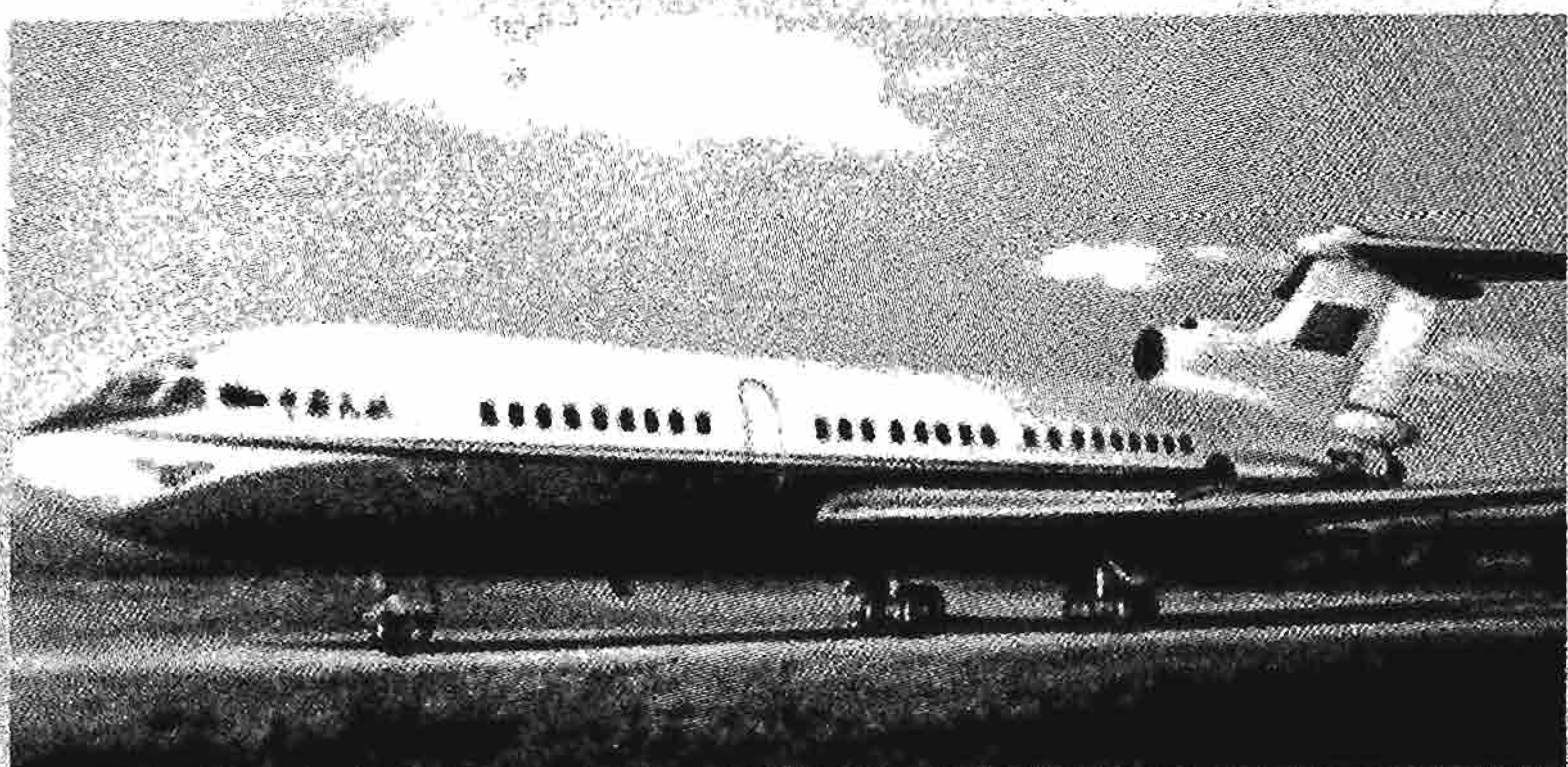


大校陸文至的筆記。　舒雲攝影



《人民日報》高級記者金鳳，她披露，鄧穎超談到1955年克什米公主號爆炸是臺灣特務在飛機油箱裏放了定時炸彈。

舒雲攝於2000年，北京龍潭湖





另一架三叉戟被保存在位於北京小湯山的航空博物館。想當初，林彪專機也是這般威武。　時念堂提供

第二十八章
墜機之謎(一)

在山海關起飛前加油了嗎

林彪座機在西郊機場加了油，這沒有爭議。但是在山海關機場加油了嗎？按照官方的說法，林彪座機在山海關機場沒有加進去油。汪東興說飛機在山海關機場沒有加完油，就起飛了（這話很含糊）。朱秉秀說，到山海關，消耗多少油能計算，但山海關機場加了多少油不知道。因爲三叉戟起飛前的半小時，兩輛加油車正在加油。先是壓力加油，起落架上有個油嘴，小機場油嘴不配套沒加上。但還可以重力加油，從上面加，當時有兩個人已經站到右機翼上去了。[1]

彼得·漢娜姆寫道：葉群司機慕忠文觀察到了很重要的現象，加油車還在跑道前，但是飛機已經加滿了油。[2]

不知道這是彼得·漢娜姆的原意，還是翻譯的原因，總之很可笑。林彪座機又不是你家"油瓶子"，司機小慕又不是

孫悟空，沒有“火眼金睛”，怎麼可能遠遠地看見“透明”的飛機加滿了油？別說飛機，就是汽車，你不看儀表，怎麼能知道加滿了油？

有人質疑：中央領導人經常乘坐飛機來往山海關機場，怎麼就加不上油呢？這裏有個背景，林彪座機是剛從巴基斯坦進口的大型飛機，雖然它多次往返山海關，但都是當天去當天回，從來沒有在山海關機場過夜，也沒有加過油，所以油嘴不配套就不奇怪了。[3]

飛行員都知道，飛機的油量不能多也不能少，油箱不能太滿，太滿“壓”飛機，影響飛機的速度和高度，而且落地時可能引起爆炸。也不能飛到一滴沒有，沒油馬上往下掉。

三叉戟從西郊機場飛到山海關，還剩 12.5 噸油，潘景寅要機械師加到 17 噸。李平發現油嘴不配套，問潘景寅，是不是用其他方法加油。李平的意思是一定要加油嗎？潘景寅思考了一下，說算了，明天早晨再說吧。[4]

半夜，潘景寅又接到加油的命令，要了兩個加油車。林彪座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前，確實調來了兩輛加油車。

深更半夜，機械師被叫起來準備飛機。因爲先說第二天早上 6 點走，所以他們並不知道多麼緊急，潘景寅也不一定知道。

招待所離停機坪很近，幾百米，就算耗時 10 分鐘吧。

據警衛飛機的海軍戰士講，三個機械師到停機坪大約是零點零幾分。

而零點零 5 分，林立果離開北戴河前給潘景寅打電話，

命令馬上走。

潘景寅離開房間是零點 15 分。從潘景寅叫油車加油，到飛機強行起飛，只有短短 35 分鐘的時間。

飛機不像汽車，司機坐上去就走，飛機上所有的“眼”還都堵著，要一一取下來。壓力加油本來很簡單，但油嘴不配套沒加上。不得不採用又笨重又費時的方法，從機翼上面（重力）加油，這比壓力加油慢多了。兩名機械師剛爬上機翼，插上油管，“大紅旗”就急急地來了，叫加油車滾開。平時 40 分鐘的車程，“大紅旗”只用了大約半個小時，留給加油的時間只有 20 分鐘。本來就是在不熟悉的外場加油，又經過“下”和“上”的折騰，就是加進去油也非常有限。[5]

山海關機場到底加了多少油？其實一查油罐車就一目了然，油罐車又沒有飛上天。

尚登峨回憶：當時空軍指揮所反復查問了山海關機場，回答是沒有加進去油。[6]

李德生回憶：林彪座機還在往國境線上飛，總理就反復讓我們查，林彪座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時帶了多少油？在山海關機場究竟有沒有加油？根據飛機所攜帶的油量，究竟能飛多遠的航程？空中耗油量是多少？根據飛機位置，還有多少航油？還能夠飛多長的距離？空軍指揮所根據查實的資料計算後，斷定這架飛機飛不到烏蘭巴托，並將情況和看法彙報給周恩來。[7]

按照官方的說法，林彪座機迫降的原因，是因爲沒有了油。

如果沒油，爲什麼起那麼大的火

林彪座機在迫降時有多少油，這是個關鍵問題。

吳德認爲：也可能還有油，不夠了，溫都爾汗是一個草原，飛機就迫降了。

林彪座機是載客 115 人的英製三叉戟 IE 型，長 34.97 米，翼長 29.87 米，停機高度 8.23 米，最大起飛重量 65 噸，最大飛行高度 1.2 萬米，最大巡航速度 972 公里/小時，最大油料航程 4205 公里。

九一三事件後，空軍參謀長梁璞在周恩來到西郊機場看三叉戟時，翻開本子，說按規定三叉戟裝油 20 噸，續航力 4 小時，其中包括一小時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時耗油 4.5 噸。9 月 12 日 19 點 40 分，從北京西郊機場飛往山海關機場，裝油 15 噸，飛行半小時，耗油較多，耗去 2.5 噸。從山海關起飛前因油嘴不配套，沒加進去油。油箱大約有油 12.5 噸。從山海關到蒙古溫都爾汗，三叉戟共飛行 118 分鐘，航程 1100 公里，飛行高度 2500 至 6500 米。據飛行經驗，在 3000 至 4000 米高度飛行，耗油較多，總耗油量在 9.5 噸至 10 噸。這樣，墜毀時，機上存油只有 2.5 噸。結論是油料不夠，難以繼續飛行。根據飛行高度和飛行時間算，如果繼續飛行，最多只能再堅持 20 多分鐘，這是急於迫降的原因。

對於林彪座機來說，燃油確實是個大問題。國內隨時可

以落地加油，可在國外，你上哪兒加油去？雖然到伊爾庫茨克與到廣州的距離差不多，但林立果沒算過這個賬，對於飛機來說，用油是個變數。起飛、爬高、低空、高空用油都不一樣，甚至與空氣稀薄、風向、溫度、濕度都有關係。林彪座機飛 3000 米，本來可以飛上 8000 米的高空，高度越高，越省油。遇上頂風，耗油就多。平時地面感覺不到風時，空中也有 100 多公里／小時的風，從山海關往伊爾庫茨克飛，正是頂風，所以速度上不去，耗油也大。

爲什麼要採取耗油的低空飛行？空軍專家組報告：雖然低空不能完全避開雷達的"監視"，但可以有效降低地面對空武器的準確度，也能有效地躲開空中殲擊機的搜索和攻擊。林彪座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時，裝 8 噸油的中央油箱已經空了，僅有的 12 噸油分佈在機翼兩邊的四個內外組的油箱裏，而低空飛行又耗掉了本來不多的寶貴的油料。

在以後的幾十年中，不斷有人提出質疑。有人說直升機飛了 3 個半小時，而林彪座機才飛了不到兩個小時，怎麼就沒油了呢？說這話的人實在是外行，直升機和三叉戟怎麼能相比？直升機輕，速度慢，一個小時才 160 或 170 公里，耗油當然少。三叉戟是個"大胖子"，速度又快，怎麼能不大量吃"油"？

但似乎還有一個"胃口不開"的因素，大型噴氣飛機的耗油量在不斷"變化"。小飛機輕，航程短，小時耗油量是個"固定"數，例如伊爾-14 型飛機，不論長短途，每小時按耗油 0.4 噸估算。而大型噴氣式飛機隨著航程的延長，油量耗掉，

"體重"減輕，小時耗油量自然減小，這個數量的增減非常明顯。三叉戟飛機一起飛就少裝了 8 噸油。還少了一個"重量"，三叉戟載客 115 人，卻只上去了 9 名乘員。按每人平均 120 斤算，沒上去的 106 人將近 13 噸。也就是說，三叉戟飛機一起飛就"輕"了 21 噸。IE 型三叉戟的最大起飛重量 65 噸，少了三分之一，剩下 44 噸。油料消耗難道不減少嗎？

如此的話，就是在北戴河沒加上油，三叉戟在迫降時也決不會只剩2.5噸！迫降時的油比估算的要多得多！雖然飛機迫降時爆炸不可避免，但如果不立即起火，到爆炸會有一段短短的時間。從救生充氣滑梯上幾十秒就可以滑到地面，機上人員可以搶在飛機爆炸前逃生。

陸文至（空軍作戰部領航處參謀）說：林彪座機是當時國內最先進的飛機，儀表很完整，有自動駕駛儀，無人操作也可以飛到目的地。中途"摔"下來，怎麼回事？按常理不至於在那地方"摔"。現在根本說不清，如果地面情況平，有可能不起火。儘量讓油少一點，當然不能保證不起火，起碼燒不了那麼大。油把人燒焦，油炸的一樣，證明還有油。大飛機"滑"個百八十公里沒有問題，不是沒油，說沒油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看來，油量不夠並不是惟一的墜毀原因。

林彪座機墜毀在溫都爾汗是主動迫降，這一點似乎沒有爭議。

中國專家私下說：油還是綽綽有餘的。到過墜機現場的蘇聯官員也認爲，林彪座機飛赤塔的油足夠，飛伊爾庫茨克的油也夠。他沒有說明理由，也許是從現場那麼大的火推論出來的？烈火濕柴，鋁皮也燃燒起來了，那麼大的火，本身就說明還有油。既然有油，那爲什麼要選擇危險性很大的野外迫降？

林彪座機爲什麼要帶油迫降

9 月 12 日和 9 月 13 日的夜裏都是好月亮，地又比較平。據烏蘭巴托中央機場氣象台報告，9 月 13 日淩晨 2 點，肯特省伊德爾莫格縣上空沒有危險的氣象情況，無風沙，無霧，只有二至四級的風，天氣相當好。

這就是說，三叉戟墜毀時空中沒有危險的氣象情況。

不過沙漠上空氣流變化無常，有時顛簸得很厲害。

溫都爾汗到烏蘭巴托 290 公里，相當於北京到山海關，沒有幾步遠了。

既然還有比 2.5 噸更多的油，三叉戟又沒有放油裝置，爲什麼不多盤旋幾圈？最大限度的耗掉一些油？爲什麼要帶大量的油迫降？潘景寅"瘋"了嗎？作爲一個有著豐富經驗的老飛行員，他不會不知道帶油的"大肚皮"迫降的極度危險吧？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還是另有原因。

1965 年 6 月，周恩來率團去阿爾及利亞出席第二屆亞非會議。這是周恩來第一次坐我們自己的專機出國訪問，飛行員是潘景寅。會前周恩來訪問了巴基斯坦、伊拉克、蘇丹、坦桑尼亞等國。6 月 19 日，飛往阿爾及爾。剛起飛，空軍

指揮所接到外交部緊急通知，阿爾及爾發生軍事政變，通知專機返航開羅，以防不測。因爲起飛不久，剩下的油還很多。專機在埃及飛行指揮中心規定的空域盤旋了半個多小時，耗去多餘的油量，才安全降落。這件事無疑給了潘景寅深刻的印象，決不可能忘到腦後。

這就提出一種假設：是不是在空中發生了某種情況，不得不緊急迫降呢？

那麼不得不緊急迫降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當時中國高層沒想到摔在溫都爾汗，猜測是飛行員的問題，三叉戟飛行員不想飛出去。 陸文至認爲：分析飛行員心態不好，思想鬥爭非常激烈，領航沒上去，航線也不正常，不能不考慮飛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的後果。當時是什麼心態？是不是想同歸於盡？如果迫降成功，也表明他不想去。

飛行員出身的薛倫（空六軍副軍長）說：油量也夠，飛行員技術也很好，不應該迫降，這眞是個謎，正常迫降也不至於這樣子。軟草地不應該這麼嚴重。散地 200 多米長，不應該。

陸文至認爲：對於潘景寅來說，並不是只有迫降一條路。那爲什麼帶油迫降？繞上三圈，油就可以耗掉，爲什麼沒採取？是機組藉口油不夠？還是機械故障？或者……

方國俊（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參謀長）說：中央不是統一口徑了嗎？依我們飛行員的說法，非正常死亡。

註釋：

[1] 採訪空軍作戰部參謀朱秉秀筆記，2000 年 8 月 16 日

[2] 漢娜姆《解開林彪死亡之謎》，載香港《亞洲週刊》1994 年 2 月 1 日

[3] [5] 採訪專機師師長時念堂筆記，2000 年 4 月 14 日

[4] 採訪二五六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康廷梓筆記，1999 年 12 月 30 日

[6] 採訪空軍航行局局長尚登峨筆記，2001 年 10 月 4 日

[7] 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7 年 8 月，421-422 頁

第二十九章
墜機之謎（二）

當時我們沒有條件打三叉戟

在九一三事件中，毛澤東對兩架外逃飛機的處理截然相反。直升機，果斷命令打，堅決不能讓它飛出去。而對二五六號三叉戟卻"大撒手"。爲什麼不用殲擊機"歡迎"三叉戟迫降，怎麼也不能讓它"暢通無阻"地飛到國外去呀？毛澤東到底是怎麼想的，"成竹在胸"？還是"欲擒故縱"？見諸報端的只是人們的種種猜測，毛澤東並沒有加以說明。

但是，三叉戟機頭正東 20 米處，有一段標著"民航"兩字的右機翼，翼根上面完好，根部正中，"航"字旁有一個直徑 40 釐米的朝下的大洞。很像是地空導彈打的。孫一先看過擊落的 U-2 高空偵察機，導彈從翼根處穿透，打掉了整個機翼。孫一先向周恩來總理彙報時，講到機翼根部的這個

大洞，總理說這個要好好研究一下。

如果是導彈打的，那怎麼解釋這個大洞？

有人說：如果導彈直接命中，飛機就粉碎了。飛機没在空中解體，說明並不是導彈打的。也有人反駁：導彈直接命中目標少，一般都是接近目標就炸。彈片磨擦，這就有可能不發生空中解體。如果被導彈碎片擊中，出現没穿透的大洞，有没有可能呢？

1983 年 8 月 31 日深夜，美國安克雷奇一架波音 747 飛機在飛往漢城的路上，越過蘇聯邊境，在薩哈林島被蘇軍殲擊機的空對空導彈擊傷。此後飛機又飛行了 17 公里。

這說明飛機被導彈擊中，如果不是要害處，也還是可以繼續飛行的。

有人懷疑：是不是我們在邊境打下來的？甚至越境打下來。

據空軍指揮所的目擊者回憶：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已經下令讓附近機場的航空兵部隊和導彈部隊進入一級戰備，準備隨時擊落二五六號三叉戟，但始終没有下打的命令。吳德曾問過周恩來：爲什麼不打下來？周恩來說：不能打，打下來就說不清楚了。以後社會上流傳是周恩來下令把林彪座機打下來的。周恩來去世後，中國某高層領導在會見外國客人時也這樣說，鄧穎超非常不滿，向鄧小平告了一狀。

九一三事件後不久，10 月 12 日、13 日，周恩來兩次聽取廣州軍區關於清查與林彪事件有關聯的情況報告，並簡要講述了九一三事件的經過。周恩來說：我再說一遍，林彪的

座機不是我命令打下來的，確實是迫降時自我爆炸。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軍隊的副統帥，我僅是個政治局常委，在軍隊中又沒有掛職，我怎麼能命令部隊打掉《黨章》規定的接班人？如果命令部隊把林彪打下來，怎麼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交代？只好打開雷達監視飛機的行動，直到飛機飛出國境，才算眞相大白。當然了，林彪飛機外逃時，我是及時向主席報告了的。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的組織紀律性嘛！但主席說他要走，就讓他走吧。主席南巡時也說過，林彪還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認錯誤，還可以給他一個政治局委員。主席對林彪寬宏大量，我爲什麼要置林彪於死地呢？

1972 年春，中央政治局在京西賓館召開四川會議，有人提出中央爲什麼不阻攔林彪飛機，爲什麼讓他跑掉呢？周恩來在接見與會人員時說：林彪是黨的副主席，葉群給我打電話說他（林彪）要在天上轉一轉，當時並不知道他要飛到哪裏去，做什麼事，在這個情況下你們哪一個敢下決心把它攔截下來？

那麼，是我們主動不打，還是打不了呢？

二五六號三叉戟在飛出國境前，在國內徘徊了一個多小時，雖然飛的是低空，那也比直升機高，又“胖”，速度也不大，很容易發現目標。雖然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和參謀長梁璞都提出來攔截，但眞正落實打，怎麼打？吳法憲說攔截是一種政治表態，專機叛逃，空軍司令員的責任非同小可。管它能不能打，先表一個政治態度。不是我不積極打，而是上邊不讓打。如果上邊說打，我先組織力量，打得了打不了再說，

是不是這樣呢？

朱秉秀回憶：吳法憲弄不懂，對付直升機我們完全有手段，打三叉戟，從技術角度看當時沒有手段，我們作戰參謀沒有提出來打。眞正落實打，技術上不能解決。當時高空作戰的夜航大隊是殲五、殲六，沒有裝備空對空導彈。配有空對空導彈的機場不在引導範圍。而且殲擊機起飛不那麼簡單，要有準備的時間。三叉戟的速度不比殲擊機慢，攔截也不可能。地空導彈可以守株待兔，但那時空軍裝備的地空導彈只能發射 40 公里，主要是打台灣的美製 U-2 高空偵察機，都是 2 萬米的高度。而三叉戟高度太低，無線電抓不住，導彈無法制導。[1]

也有傳說是中國自己的戰略導彈打的，打完那支導彈部隊就調走拆散了。不錯，中國 1966 年就組建二炮部隊，可是誰聽說過用戰略導彈打一架飛機呢？戰略導彈發射更是程序複雜，時間漫長，恐怕還沒有等戰略導彈豎起來，三叉戟已經墜毀了。

吳德說：我們沒有打，飛機出境後，我們的雷達很快丟了目標。飛機進到蒙古縱深，邊界都看不見了，肯定不是我們打的。

說來說去，我們的雷達都“無能爲力”，我們的導彈能“有所作爲”嗎？

朱秉秀回憶：看樣子，林立果一夥仔細研究了航線，如何躲過地空導彈和空中殲擊機的打擊。三叉戟自己建立的那條航線，沿途沒有機場，也沒有地空導彈部隊，又是茫茫黑

夜，根本不可能攔截到。當然我們作爲工作人員，只能擺出具體情況，供首長參考。三叉戟與直升機不一樣，直升機起飛就報過來了。三叉戟起飛時，還糊塗著呢，不知道怎麼回事，怎麼會出現這情況？飛出國境，雷達上消失，還懷疑是不是著陸溫都爾汗？李德生向總理報告飛機消失，什麼位置他没有判斷，更没有判斷摔。李德生在空軍指揮所三天三夜，來來往往，當時我記了很多，最後我的記錄本被王洪文調走。調我的記錄本，也應該調標圖，這個本子現在哪裏，我不知道，没見到公開，應該還在。[2]

那麼是不是蒙古或蘇聯打的呢

雖然 1971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 57 號文件表明，三叉戟越出國境後，未見敵人阻擊。但實際上，中國並没有十分的把握。吳法憲在被抓前，把王海(空軍軍訓部第二部長)找去，說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交給他一些照片，叫他在空軍組織一些專家，根據這些照片分析一下，林彪的飛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是自己掉下來的，還是被導彈擊落的呢？爲什麼飛機右翅膀上有一個 40 釐米的大洞？是不是發生過機内搏鬥？是没有油了嗎？還是別的什麼原因。爲什麼要在荒野迫降？究竟是什麼原因墜毀的，要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

這說明，雖然周恩來做了“自行墜毀”的結論，但並没有更有力的證據支持。

聯没有打，也不能肯定當時機上有或者没有搏鬥以及其他一些情況。

二五六號三叉戟進入蒙古境内後，無論蒙軍或蘇軍都没有什麼反應，只有蒙古一個邊防站天亮後向邊防總隊報告，淩晨 2 點發現一個飛行目標在中國的二連以東進入蒙古境内。

孫一先回憶：9 月 13 日後，來自蒙軍和駐蒙蘇軍的一些内部情況表明，他們在縱深没有發現中國飛機越境，因此不可能發射地空導彈，或者起飛殲擊機攔截。9 月 12 日是個星期天，蘇軍和蒙軍的雷達可能没開機。要不，無法解釋蒙軍邊防站爲什麼 9 個小時後才向上報告，而蒙古邊防總隊直到 9 月 13 日 16 點才上報烏蘭巴托。10 月底，蘇聯國土防空軍總司令巴季茨基空軍元帥專門到蒙古整頓蘇、蒙軍的防空系統。[3]

但是，蒙古和蘇聯對二五六號三叉戟眞的一無所知嗎？

幾乎就在墜機同時，9 月 13 日淩晨，《美國之音》就發了消息，中國民用航空公司英製三叉戟飛機失事在蒙古溫都爾汗上空，據分析機上是中共高級人員，現正在調查過程中。還報導了當日淩晨在蒙古首都以東 300 公里的溫都爾汗發生爆炸，隨之火光衝天的消息，這是美國從衛星上“看”到的。國際上的大通訊社像合衆社、路透社、塔斯社也都發了消息，中國武裝部隊一架噴氣飛機在蒙古上空墜毀，有九人死亡。

2000 年，日本《朝日新聞》週刊獨家採訪了 1970 年起擔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長的雲登。這是蒙古高級官員第一次詳細披露對九一三事件採取的措施。雲登說林彪的飛機似乎為了躲開雷達，因此進入蒙古境內一直是低空飛行，當時的說法是蒙古完全不知道。雖然蒙古的雷達沒有發現，但一開始我們便掌握了該機的飛行軌跡，因為該機在極低的低空飛行，轟隆聲音特別響，蒙古邊防軍是循著聲音跟蹤的。9 月 13 日早晨我們就得到了情報部門的第一次報告，當時我們認為是中國飛機出了事故，召見了關係密切的蘇聯大使館臨時代辦。

北京軍區空軍"防突辦"的參謀說：三叉戟越過國境後，蒙古認為是突然襲擊，中共大型飛機侵入，頓時亂了套。星期天，又是那個點，吃完夜餐，非打瞌睡不行。蘇聯指揮蒙古軍隊，一等戰備，飛行員進入機艙。找這個找那個，找不到蒙古指揮官，導航台沒有人，塔台也沒有人。手忙腳亂，還沒找到領導，大型飛機就爆炸了。

吳德認為蒙古方面沒有打。

看來，蒙古人的話是可信的，那麼會不會是擁有強大導彈群的駐蒙蘇軍打的呢？

駐蒙蘇軍的導彈可不是吃"素"的。

1966 年 1 月，蘇聯同蒙古簽訂了為期 20 年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條約》。這項條約同意蘇聯在蒙古駐紮軍隊和設置基地。蘇聯在蒙中邊境部署的軍隊，1964 年為 12 個不滿員師，到 1970 年則增加到了 40 個現代化師。密密麻麻，怎麼可能得不到這一"情報"呢？蒙古用肉眼掌握了飛機的軌跡，更何況軍事先進的蘇軍？會不會發射地空導彈或空對空導彈？

20 世紀 60、70 年代，中蘇和中蒙邊界都是最敏感的禁區。一旦違章進入，很可能遭到武器襲擊，打死就打死了，沒有道理可講。中國通用公司一架里-2 飛機執行專業飛行任務。被我們邊防軍誤認為是蘇聯飛機，開炮警告，幸好未被擊中。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韓國航空公司一架飛機由美國返回韓國，沿著北太平洋航線西飛，誤入蘇聯禁區，遭到蘇軍飛機空襲而墜海。總之闖入禁區非常危險，很有可能會受到導彈的"熱烈歡迎"。

對於這架失事的三叉戟，蒙方生怕賴到他們身上，反復強調沒有外來影響，他們沒有打。蒙古專家分析：中國的這架三叉戟是自己主動迫降的。右機翼在最初著陸的地方強烈擦地著火，因而發生爆炸。

右機翼？這不能不讓人想起右機翼上那個可疑的大洞。

二五六號三叉戟受到導彈攻擊了嗎？種種"小道消息"，不脛而走。

孫一先在去墜機現場的飛機上，注意到烏蘭巴托東北的山上，駐蒙蘇軍的幾部遠端警戒雷達都"活"了。在他印象中，這幾部雷達好像從 1971 年初，有半年之久，只是"單兵教練"，為什麼現在"集體行動"了呢？烏蘭巴托東南那來赫礦區的蘇聯空軍基地，由 3500 米的主跑道和滑行道組成矩形機場，幾十架殲擊機都脫去"衣服"，在陽光照射下放射著

光芒。三叉戟會不會是被這裏的殲擊機用導彈打下來的呢？

蘇聯官員表示他們沒有打。克格勃偵察員紮格沃茲丁和時任蒙古副外長的額德畢力格堅持，飛機不是被擊落的，紮格沃茲丁猜是飛行員爲躲開雷達低空飛行，誤判高度而墜毀。[4]

蘇聯不“坦白”，我們的雷達又看不到了，抓不到“狐狸尾巴”。

三叉戟上發生槍戰了嗎

外電紛紛報導：墜毀的三叉戟的屍體上有彈洞。1972年1月，英國《新觀察家》駐莫斯科記者聽蘇聯人講，蘇聯專家把燒焦的林彪屍體整理出來，發現屍體上中了九顆子彈，呈蜂窩狀。

難道飛機上真的發生搏鬥了嗎？

林彪座機內會不會發生槍戰，只有“天”知道了。

據中國軍方公佈的材料：中國到現場視察的外交官仔細看過屍體，屍體上沒有發現槍洞。三個機械師和飛行員潘景寅都沒有武器，機上有武器的只有林立果和劉沛豐。林立果的手握著腰上的槍，沒拔出來。

至於幾個屍體頭部的血跡，那是飛機爆炸時急速甩出的撞傷。

但是，傳聞太多。

1972 年，中國官方也懷疑機上是否有搏鬥，讓從現場

照片中尋找屍體上的彈洞。空軍五人專家組的成員金華被“隔離”在辦公室裏，三天三夜，仔細看了現場的照片。洞多了，但沒有發現屍身上有任何彈孔，5 號屍體（林彪）更沒有外電所傳的蜂窩狀窟窿。[5]

有的說機械師李平的皮帶上有槍眼。據說李平的皮帶曾拿到西郊機場辨認，因爲李平的腰不好，皮帶是特製的寬皮帶。但到過現場的孫一先肯定地說：現場沒有拿回一件東西。

30 多年後，到過現場的蘇聯專家透露：飛機內無人開槍，所有的槍都沒有發射子彈。

林彪座機上的手槍全被蘇聯人收走了，自然他們有發言權。但是，蘇聯專家的話也極讓人懷疑。飛機上所有的槍都沒有發射子彈嗎？從北戴河往山海關的路上，因警衛秘書李文普半途突然下車，林立果就打了一槍，彈殼還留在“大紅旗”裏。怎麼能說所有的槍都沒有發射子彈呢？

註釋：

[1] [2] 採訪空軍作戰部參謀朱秉秀筆記，2000 年 8 月 16 日

[3] 採訪孫一先筆記，2000 年 8 月 17 日

[4] 參見漢娜姆《解開林彪死亡之謎》，載香港《亞洲週刊》1994 年 2 月 1 日

[5] 採訪空軍機務部參謀金華筆記，2000 年 1 月 13 日

第三十章
墜機之謎（三）

一架大型飛機掉下來了

空軍專家組報告，二五六號三叉戟的飛行高度在 2500 米至 6500 米之間。

三叉戟的飛行高度 3000 米，這是海拔高度。實際上還要減去地面的實際高度。如果當地海拔 600 米，也就是說，飛機才飛 2400 米左右。

如此之低，就是爲了逃避殲擊機的攻擊。

這樣的飛行高度，邊境的雷達監視只有幾十公里。而飛機墜毀在國境線外 360 公里左右。

1 點 50 分，三叉戟飛出國境，下降到 2500 米，左右拐彎。

2 點 30 分，各條線路同時報告，飛行目標消失。

天亮後，空軍指揮所接到報告：二五六號三叉戟在溫都爾汗起火爆炸。

時念堂回憶：外逃的直升機向懷柔飛去時，正在西郊機場的吳法憲向我、馬蘭藻和曹慶章（專機師副師長）宣佈，三叉戟已經在蒙古境內墜毀。[1]

白雲回憶：再沒有什麼情況。9 月 13 日早上 5 點多，天快亮了，技偵八團報告。聽到蒙古邊防檢查站的通話，溫都爾汗有一架大型飛機失火掉下來了，這是最早得到的飛機爆炸的消息，技偵八團因此被記功。蒙古地面指揮所報告，在哪個位置看見一個發光點，可能是爆炸。我馬上聯想到三叉戟，位置與飛機有什麼關係？李德生叫我看，時間和火光有沒有關係？迫降有沒有可能？有沒有可能是蒙古打下來的？指揮所議論，我們找了幾個人，時間、位置這些資料都不完全，時間報來有沒有誤差？好多懸案，只能是可能……[2]

王飛回憶：林彪座機出去後，蒙古有個情報，有一個大型目標從中國方向入侵。兩種含義，這不是殲擊機，是不是轟炸機是個問號。這時蒙古準備作戰完全來得及，以後就沒有什麼消息了。我從指揮所下來之前，又接到蒙古地面報告，大型目標著火了（在空中著火），掉下來了。不是先墜落，後著火，而是空中一個目標燃燒降落，這個情報非常可靠，是技術偵察，後來說的和最初的情報對不上。[3]

佟長仁（總參某部情報室主任）回憶：9 月 13 日凌晨，值班員叫我去，向我報告，是不是空軍有飛機起飛？我打電話問空軍值班室，是不是我軍飛機迷航？答覆空軍沒有飛機起飛，海軍也沒有飛機起飛，估計是民航飛機。我們與民航沒有直接關係，也不需要我們核實。值班員並不瞭解是林彪的專機，只知道蒙古境內有一架飛機墜落，不是咱們的雷達親眼看到的，也不是蒙古雷達看到的，雷達看不到火光。肉眼看空中一團火球，當時有這個反映。通過蒙古邊防部隊看出來，向上報告。他搞不清是什麼，說空中不明物體燃燒降落下來、消失。分析是我們的民航飛機，可能是空中著火。是不是國內飛機迷航越境？過去有過迷航，中蒙邊境緊張，是不是他們擊落的？只能推測。幾個小時後，總理辦公室傳達，全國所有的飛機一律停飛，山海關機場關閉。很奇怪，更細的不知道。到中央文件傳達，才知道林彪出事。[4]

9 月 13 日 22 點 15 分，空軍司令部送來報告：18 點零 4 分，蒙古雷達團團長向所屬各連發報，凌晨 2 點半有一架不明飛機在溫都爾汗起火墜落，因此，從 18 點起進入一等戒備。周恩來立刻報告毛澤東，並就緊急戰備部署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附上空軍司令部的報告。[5]

這就是說，雖然我們已經得到了三叉戟墜毀的情報，但直到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到現場前還不確定，更不知道飛機上的人是否全死了。所以當時周恩來非常著急，要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報告，並要他們派人回北京親自解說。

白雲回憶：空軍指揮所得到飛機墜毀的消息後，李德生說，給大使館打電話，到現場看。可是不好由我們提。不久，蒙古外交部抗議侵犯領空。我們故意說不可能，那你們到現

場看。墜機現場地面不平，撞了，一排人從飛機上掉下來。[6]

是起火後迫降還是迫降後起火

有專家斷言：林彪座機不是空中爆炸解體。這似乎可以肯定，潘景寅較完整地進行了野外降落的動作。如果空中爆炸，殘骸面會更寬，而且飛機燃料會很快在空中燃燒散掉，不致形成大面積的地面燃燒。

王中遠回憶：飛機肯定是地面或接近地面爆炸的，為什麼不是空中爆炸？九個人都在一線，機身一部分，機尾甩出去，幾個人基本連在一起，不是挨在一起，也很近。如幾千米高空打了，人不可能集中一起。他們是飛機從地面蹦起來以後摔傷的，胳膊腿斷了，不是特別高的高空摔下來，遠的也就 20 多米，甩了出來，人摔暈了，再著火，就燒焦了。[7]

蒙古的桑加上校說：飛機發生了不明原因的磨擦，從地面看是機翼擦地翻倒後著火的。孫一先和小王特意站在山頭上向北邊望去，沒有發現草地著火的痕跡。如果空中著火，會落下燃燒物，小王表示同意。

盆地中央的飛機著陸處，有一道由北向南被擦平壓實的草痕，長 29 米，寬 2 米多，形成 S 形的曲線，右邊不遠有一條平行的槽溝，深約 20 釐米，翻倒的草根露出沙土。再往前，擦地的痕跡消失，飛機跳起 30 多米，才開始進入大

片焦土的失事現場。這些跡象證明：飛機不是空中著火摔下來的，而是在盆地中央以肚皮擦地著陸，機身似乎失去平衡，傾斜觸地。

參加空軍專家組調查的金華認為三叉戟是先落地後起的火，箱子、皮夾克等都沒有燒掉嘛，而且人也沒有完全燒焦，說明火並沒有那麼大。如果有空中燃燒，那麼飛機的某些部件會顯示出來。因為飛機還在飛，有風，燃燒狀態與地面燃燒不一樣。[8]

因為中國專家沒到現場，所以只能是一筆糊塗賬。

彼得·漢娜姆從目擊者的嘴裏得知：飛機在降落前尾部起火，並未爆炸，落地後才爆炸。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急急忙忙迫降是不是因為空中起火呢？如果空中起火還很小，還沒到空中散落的份上，更沒有空中解體，這種可能會不會存在呢？

在彼得·漢娜姆的筆下，蒙古東部的天空十分平靜，半個月亮把白光撒在起伏的大草原上，敦吉瑪正在當地的炸藥庫值班。突然，發動機的轟隆聲使她向上看。在一公里外城的那一邊，同樣的聲音也引起哨兵索色的注意。敦吉瑪聽到有汽車發動機的很大聲音，就提著步槍跑了出去。過了一會兒，一架大飛機進入視野。當時她聽到幾聲巨響，不知出了什麼事。結果發現，一架飛機正在墜落，後發動機上噴著熊熊烈焰。22 年了，她仍然記得很清楚，從她的位置，可以看到飛機，直到它墜毀。索色也說他看到飛機有三處著火，他衝回辦公室，打電話報告了上級。

彼得·漢娜姆寫道：這兩個目擊者當時並不知道，他們成了一段歷史的見證人。[9]

還有一位中國商人也到了墜機現場。1991 年 7、8 月，海拉爾某邊貿公司鄔經理到蒙古溫都爾汗談生意，想到墜機現場看看，當地官員回絕，說那裏有專人看管，有鐵絲網，無法靠近。1993 年 3 月，鄔經理再到溫都爾汗，蒙古政局變化，他再次提出去墜機現場。蒙方沒有答覆。鄔經理聽說美國記者要去，就抗議，爲什麼中國人反倒不能去？這才同意。鄔經理找到一位倉庫保管員，他那天正在外面巡視，突然聽到劇烈的爆炸，然後看見一架冒著熊熊烈火的飛機從天上掉下來。

一位名叫巴塔的老人 1990 年後去過墜機現場兩次，他聽說飛機墜毀時差一點把一個蒙古包的天窗刮掉。

另一位在螢石礦工作的目擊者說：那天深夜 2 點 30 分左右，飛機的聲音把他吸引出來，他看見飛機落地時尾巴著火，墜毀地點距離他只有 9 英里，他看見了全過程。

26 年後，終於有一位中國記者也到了墜機現場。

1997 年 11 月 23 日，由《人民日報》主辦的《環球時報》刊登該報特派記者敖其爾的獨家報導《今日溫都爾汗》。敖其爾找到了最早發現飛機墜毀的拉哈瑪大娘。拉哈瑪大娘的家住在蘇布林古山南 20 公里處，離墜機現場只有五公里的拉騰格爾勒，原來住在離墜機現場三公里的地方。她說那是個可怕夜晚，一陣轟隆聲把她驚醒，她急忙穿好衣服，發現這難聽的聲音是從空中傳來的。這時羊群驚散，馬嘶狗叫。她仔細一看，從西南向北飛過來一架冒著大火的飛機，飛得相當低，在巴圖腦爾布蘇木上空，大概不到 20 分鐘，繞圖門山轉了一圈，順著紮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飛行，聲音越來越大，在蘇布林古盆地墜毀。當時沒聽到大的爆炸聲，只看見現場大火連天。天亮以後，墜機的地方還冒著青煙。當地老百姓保護了現場，烏鴉和老鷹一直在空中盤旋。

非常遺憾，我們中國人都是在引用別人的材料，沒有一個人親眼目睹。雖然有外國人和中國人採訪過目擊者，但這些採訪記錄非常不可靠，且互相矛盾，有的說看見飛機燃了三處大火，有的只說燃燒了一處；還有的說聽見幾聲爆炸，有的說聽見一聲，也有的說沒有聽見。因爲這些調查者都不是專業的飛行事故調查專家，他們只是一般地問，而沒有更深入地瞭解。而且訪問都是很多年後，所以，誰的敘述更可靠，誰的　述水分大一些，都不得而知。比如我們不知道目擊者的背景，她（他）的年紀有多大？什麼文化程度？是不是第一次看見飛機墜毀？......

彼得·漢娜姆說：目擊者在一公里外，先聽到嗡嗡的飛機聲音，過了一會兒，飛機進入視野，墜落時尾部著火。這段目擊者的敘述就極不準確，一公里外，怎麼可能光聽見聲音，看不見火光？火光比聲音跑得快，完全應該先看到火光，後聽到聲音。彼得·漢娜姆“吹”他採訪了 24 位目擊者，但他只舉出兩位。當然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他省略了，另一種是大多的目擊者只是墜機後到過現場。彼得·漢娜姆自己說得很明白：我開始尋找一些當時來過現場的人，我開列了

一個名單。[10]

注意！“來過現場”不等於目睹到飛機墜毀。因爲蒙古草原不是城鎮，人口極稀少，又正值淩晨2點多，除了值班者，人們都在睡覺，誰沒事深更半夜傻望著星空呢。

目擊者的敘述，因種種主客觀原因，不可能完全與事實吻合，必須結合其他情況，綜合考慮。孫一先說：敖其爾文中提到的地名、墓地距離等，與他聽蒙方按地圖講的不一樣，這可能是當地牧民約定俗成的叫法。至於拉哈瑪大娘說空中飛來冒著大火的飛機，據空軍專家分析，可能是把機上耀眼的著陸燈當成大火了。迫降要開機翼上的著陸燈，兩個碗大的白色著陸燈非常亮，可以把黑夜變成白天。

拉哈瑪被採訪時67歲，三叉戟失事那年她41歲，還不到“老花眼”的年紀，可能把“燈”和“火”看錯嗎？

是不是小型定時炸彈爆炸了

現在讓我們假設一下，如果是空中起火，那神秘的火是怎樣起來的呢？

這不能不讓人懷疑右機翼根部那個40釐米的大洞。

如果不是導彈打的，那怎麼解釋？

孫一先回憶：我特別注意看了看，大洞的周圍是不規則的“刺”，有朝裏，有朝外。大洞旁邊還有兩個與大洞並不連接的兔耳朵形的小洞。據專家分析，不像是導彈打的。如果導彈打的，應該穿透，而且“刺”會一律朝裏翻，不會既朝裏又朝外。

飛機在接地時跳躍，右機翼先斷裂。[11]

陸文至認爲：右機翼在最初著陸的地方強烈擦地著火，因而發生爆炸。至於爲什麼爆炸，現在分析也分析不出問題。事故原因不明確，飛機的速度、姿態都不清楚，分析原因很難。這中間還有沒有別的事情，只能估計。[12]

很多年後，墜機現場的飛機殘骸成了狼窩，老鷹和禿鷲也都各自搶佔了一塊地盤。加上當地居民的“洗劫”，飛機殘骸所剩無幾，最長的大約只有兩英尺，那個比較完整的尾翼和有可疑大洞的大片機翼，不知道到哪裏去了。

中國官方的說法是油箱衝出來發生爆炸，造成右機翼上的大洞。但這個說法很讓人懷疑，三叉戟機翼兩邊，確實各有兩組油箱。但油箱其實不是油箱，而是機翼內部，如何衝出來？如果說油箱內部爆炸倒有可能，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造成的爆炸呢？

專家普遍認爲大洞是油箱裏面燃燒爆炸形成。因爲機翼大洞處是個油箱，有一個檢查電路和油路的檢查孔。在林彪座機起飛前，有兩個人站在右機翼上加油，而且飛機起飛時，油箱的蓋沒蓋上。

會不會有人“順手”往油箱裏放一個小型的定時炸彈呢？

有人猜想：也許小型炸彈威力不大，所以三叉戟能帶火在空中飛行20多分鐘（也有專家說根本不可能）。又因爲帶火迫降，火越來越大，來不及把剩下的油耗光，只好冒險迫

降，爆炸就在所難免了。

中途加油是最容易做手腳的了。因爲是在外場，飛機的守護自然不會那麼嚴格，誰會對別人的飛機那麼盡心盡力呢？1946 年 4 月 8 日，美軍飛虎隊上尉飛行員蘭奇駕 C-47 運輸機從重慶飛往延安。機上乘客王若飛、秦邦憲、鄧發等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負責人，還有得罪了蔣介石的葉挺將軍。葉挺出獄的第二天，就要求入黨。飛機中途在西安加油，12 點 25 分飛往延安。當時延安飄著小雨，接機的人們包括葉挺的兒子都聽見飛機的嗡嗡聲了。飛機也與正在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的電台聯繫，他們已經到了距離延安 30 里的甘泉附近。但不久，飛機聲消失。第二天得知，飛機在下午 2 點左右因大霧撞在晉西北興縣東南 80 里的黑茶山，機上 13 人全部遇難。本來是向北飛，爲什麼快到延安轉向東北方向？還過了黃河？飛機本來可以飛到 6000 米，爲什麼撞在 2000 米高的黑茶山？

1951 年，周恩來對葉挺的大兒子葉正大說：今天我可以告訴你們，你父親坐的那架飛機肯定有特務破壞。特務把簡單的定時破壞裝置安裝到羅盤和高度表上，到甘泉附近飛機的羅盤和高度表失靈，飛機與地面聯絡時也承認迷航。當時沒有無線電全羅盤和無線電高度表，更沒有衛星定位系統，又因爲大霧看不見地面，飛機拐向東北。那時飛機上還沒有黑匣子，雖然我們懷疑，但沒有證據。

1955 年，周恩來出席萬隆會議。那時我國還沒有自己的專機，租用印度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克什米爾公主號作爲民航從印度飛到香港，在香港改爲中國包機。因爲是公開行爲，台灣特務準備破壞。中國得知，立即通知香港方面加強警衛。但台灣特務還是利用在香港機場加油的機會，把僞裝成中藥包的小型定時炸彈扔進油箱，致使克什米爾公主號在納士納島上空突然爆炸。周恩來臨時改變計劃，沒有登機。機上 11 位乘員中有周恩來的司機、新華社記者和外國記者等。機毀人未全亡，有三名外國人僥倖活了下來。他們提供了飛機墜毀前的各種情況，對順利破案提供了極爲重要的幫助。[13]

1956 年 8 月 1 日，中國一流的大藝術團訪問南美洲的智利、巴西、烏拉圭和阿根廷，這是第一個訪問南美的中國官方團體。到最後一站阿根廷時，匈牙利事件爆發，奉中央命令，藝術團借捷克斯洛伐克的飛機回國。剛飛到瑞士和西德邊境時發生爆炸。機上有藝術團的副秘書長、中央調查部美洲局局長、優秀的外事工作者李德春及三位助手，還有優秀的京劇演員吳鳴生（李少春妹夫）和李幼春（李少春弟弟）等，全部遇難。這可能是一次政治性的破壞事故，但始終沒有查證出來。

如果不是天方夜譚，有人像克什米爾公主號一樣在油箱裏放了炸彈，是誰？爲什麼？

王飛始終懷疑：飛機是不正常掉下來的，是不是內部有什麼爭鬥？但他認爲帶炸彈的可能性不大。[14] 但是你如何解釋爲什麼三叉戟帶著那麼多的油迫降呢？

蘇聯人證實，林彪就在飛機上

蘇聯人說，事前對這架林彪座機一無所知。

墜機現場附近的蒙古老鄉說，當天，就來了不少蘇聯軍人，不讓老百姓靠近。

這就是說，最先到達林彪座機墜毀現場的是蘇聯人。

那麼二五六號三叉戟進入蒙古境內，蘇聯會不會是第一目擊者呢？看見了，採取了什麼"措施"呢？蘇聯對此一直秘而不宣。但很可能在蒙古外交部得到消息前，蘇聯人已經獲悉，否則蘇聯人怎麼能搶先一步到達墜機現場呢？看來，二五六號三叉戟一進入蒙古，就已經在駐蒙蘇軍的全程監視下。但是他們還搞不清這架三叉戟到底是怎麼回事？迷航？叛逃？還是刺探蘇蒙的防空系統？更不知道是中國專機，四五個星期後才確認是林彪乘坐的飛機。

蒙古成立了一個專門調查組調查此事，並寫出報告。根據蒙古的保密法規定，此報告到 2008 年解密。但因爲蒙古人寫報告時還不知道機上到底是誰，所以可能報告中沒有提到林彪。

至於中國官方關於林彪之死的解釋，國外並不相信。

林彪是摔在蒙古荒原嗎？是不是死在國內的某個地方？如果說林彪在三叉戟上，是不是在墜機前就已經死亡？……

在中、蒙、蘇三國中，飛機是中國的飛機，墜毀現場在蒙古境內，中國和蒙古是當事者，而蘇聯應該是"旁觀者"。

可蘇聯好像比中國和蒙古行動更早，更主動，9 月 13 日上午他們就到了墜機現場。第二天他們又去了一趟，搬走了很多重要的"證據"。在中國人到墜機現場前，蘇聯人已捷足先登了兩次。

但是他們開始没理睬那九具屍體。

如果他們知道其中有林彪，屍體早就搬走了。

由於至今還不清楚的原因，來自中國的三叉戟墜毀於蒙古境內，機上人員全部死亡。自此以後，外交官與中國問題專家一直對飛機上乘客到底是誰存在懷疑。數月後，中國政府宣佈了一個奇怪的解釋。

在九一三事件後的幾個月內，美國與歐洲情報機關陸續收到報告，根登山布金·祖奈（蒙古民主議會議員）在失事現場幫助撰寫第一份醫療文件，他寫道：作爲一個在場的醫療專家，我確認没有一個人的年齡超過 50 歲，惟一的女性過於年輕。蒙古的一位英文翻譯告訴彼得·漢娜姆，半夜把他叫到安全部，讓他翻譯避藥品說明書，這是在女屍的皮包裏找到的。蒙古人認爲葉群已經過了避孕的年齡，很可能不是葉群。而林彪當時已經 64 歲，所以西方懷疑林彪是在飛機上嗎？

但是林彪不再露面，黃吳李邱也銷聲匿跡，蘇聯人這才聯想到傳聞可能是眞的。

溫都爾汗墜機 5 個星期後，蘇聯人終於獲悉：中國第二號人物林彪在飛機上。

於是第三次組織陣容強大的克格勃調查組重返墜機現

場，包括蘇聯著名的犯罪偵查學家、國防部法醫學實驗所所長、少將軍醫托米林等。與他們同行的還有克格勃偵察員紮格沃茲丁和他的助手、病理解剖學家沃爾斯基等。他們乘飛機到烏蘭巴托，再到墜機現場。在荒原上找到飛機殘骸，野狼已經築窩。

蘇聯人帶來四隻大箱子，裝著38位九一三事件後未露面的中國高層領導人的資料。這回是大工程了，墓地的棺材全挖出來，細細地逐個檢查。蘇聯病理學家托姆林說：屍體很難檢驗，都燒壞腐爛了。在蒙古專家配合下，首先肯定屍體的所有傷痕都是飛機墜毀造成，排除了乘員在墜機前死亡的可能性。其實在九具屍體中，有幾具是不平常的，潘景寅和林立果有掙紮的痕跡，說明他們兩個在大火燒來時還有氣息。

經過一番緊張艱苦的工作，檢查了所有的屍體，帶回兩個有金牙套的頭顱。

蒙古方面當時負責處理這一事件的原蒙古外交部副部長雲登對記者說：蘇聯方面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就運走了一座引擎並且兩次掘墳，把林彪及夫人的頭骨帶回蘇聯，與蘇聯保存的資料對照，確認是林彪和葉群本人。[15]

11 月中旬，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從一位蒙古朋友那裏得知，有一個汽車司機去貝爾赫礦區，路過墜機現場，看到墓地被挖開了。蒙古老人巴塔說：墓地被蘇聯人挖過兩次，第二次記不得是哪一年，只記得是冬天。蘇聯人在墳墓邊搭起帳篷，再次驗證了那個年歲最大的屍體。

12 月 14 日，香港《快報》刊登來自北京外交界的消息，一名蘇聯外交官對經常在一起打網球的巴基斯坦外交官說：蘇聯當局已經把 9 個人屍體挖出來，進行了仔細的檢驗。

傑留辛（《真理報》派駐新中國的第一個記者、俄國政治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說：林彪 1941 年曾到蘇聯治療肺結核，病歷中有肺結核記錄，1950 年林彪第二次到蘇聯治病，也留有病情記錄。現場在 5 號屍體的右肺上確實找到鈣化的硬塊。林彪還在蘇聯作過牙的模型，醫療檔案裏他的牙照片。經過對照，發現頭顱的上顎少了三顆牙齒，與林彪當年治牙的模型對照上了，X 光片和醫療記錄也對上了子彈打在頭顱上的大致位置。

證實死亡者就是林彪。

但是，蘇聯人把他們的"成果"悄悄地鎖進保險櫃，秘而不宣。

20 多年後，1993 年 5 月，29 歲的澳大利亞自由撰稿記者彼得·漢娜姆得到《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的部分資助，用了六個月的時間，調查林彪死亡之謎。他奔走於蒙古、蘇聯、美國、台灣、香港等地，往返數萬公里，訪問了外交、情報、新聞界的許多人士。

彼得·漢娜姆在烏蘭巴托 200 英里的地方，找到了因喜歡在胸前別著蘇聯勳章和綬帶而得名的"元帥"。"元帥"帶他到了墜機現場。現場大的機件已經不見，燒成黑色的碎片還不少，還有一個寬 20 米、長 30 米的寸草不生的灰堆，裏面有燒毀的各種電器零件，在離灰堆 150 米處，有一堆飛機殘

骸，其中有飛機的後輪支架。

憑藉大量的第一手資料，1994 年初，彼得·漢娜姆和蘇倫斯聯名的調查林彪之死的紀實文章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上發表，立即引起國際新聞界和史學界的極大關注，許多國家的報刊進行轉載和評述。2 月 2 日，香港《亞洲週刊》刊登了彼得·漢娜姆的文章《解開林彪死亡之謎》。《參考消息》轉載了美國《洛杉磯時報》的文章《從蒙古到莫斯科》。這個亞洲最大的謎團之一，第一次由於一位西方記者通過客觀、獨立的調查給予了證實。

彼得·漢娜姆最後在莫斯科一個軍事資料室獲得一份克格勃檔案，檔案記載，蘇聯在事發地點秘密進行過仔細的屍體解剖，證明林彪夫婦和兒子在墜機事件中死亡無疑。這份檔案只有四個人看過，兩位蘇聯病理學家，其中一位叫亞歷山德魯，以及已故的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羅波夫（時任克格勃頭目）。

也就是說，只有四個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眞相。

彼得·漢娜姆採訪到了兩次到失事現場調查林彪之死的蘇聯克格勃小組的一位成員。“克格勃”說：我們花費了一年的時間，才搞清楚林彪死亡的情況。但我們既不能告訴中國人，也不能告訴蒙古人。

由蘇聯克格勃提供的林彪確死於蒙古的結論，澄清了一部分迷霧。但彼得·漢娜姆只是把蘇聯的部分秘密調查公佈了出來。[16] 林彪到底是怎麼死的，還是個謎。

註釋：

[1] 採訪專機師師長時念堂筆記，2000 年 4 月 14 日

[2] [6] 採訪空軍司令部司令部副參謀長白雲筆記，2003 年 2 月 18 日

[3] [5] [14] 採訪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王飛筆記，1998 年 4 月 2 日

[4] 採訪總參二部佟長仁筆記，2000 年 8 月 25 日

[7] 採訪王中遠筆記，2005 年 6 月 15 日

[8] 採訪空軍機務部參謀金華筆記，2000 年 1 月 13 日

[9] [10] [15] [16] 漢娜姆《解開林彪死亡之謎》，載香港《亞洲週刊》1994 年 2 月 1 日

[11] 採訪孫一先筆記，2000 年 8 月 17 日

[12] 採訪空軍司令部編研室陸文至大校筆記，2000 年 6 月 29 日

[13] 採訪《人民日報》高級記者金鳳筆記，2000 年 1 月 29 日

第三十一章
墜機之謎（四）

有人說，林彪座機飛到了蒙蘇邊境

林彪座機的目的地是蘇聯，爲什麼沒有飛到？爲什麼迫降在溫都爾汗的荒漠上？

從地圖上看，山海關到溫都爾汗的直線距離是 1100 多公里，林彪座機的飛行時速 850 至 930 公里。按林彪座機的正常速度，一個小時多一點足夠，爲什麼飛了將近兩個小時？就是低空阻力大速度慢，那也多出來幾十分鐘，是在空中"捉迷藏"嗎？慌慌張張上了飛機，還不"夾著尾巴"快快逃掉，"大搖大擺"在空中"旅遊"什麼呢？

朱秉秀回憶：我地面雷達信號消失在溫都爾汗以南。而二五六號三叉戟墜毀在溫都爾汗的東北。[1]

難道潘景寅飛過了溫都爾汗，又掉頭往回尋找迫降場？

蘇聯安全部門的退休官員說：在距離蘇蒙邊境 50 公里

的赤塔，當地老鄉聽到了飛機聲。我們中國的雷達在林彪座機飛出國境後不久就丟失了目標，三叉戟在蒙古境內的行蹤，只有"拜託"蒙古和蘇聯的雷達了。蒙方說他們的雷達沒有打開，而蘇聯官員強調是聽當地老鄉說的。這眞是一個既狡猾又不負責任的說法，爲什麼是聽當地老鄉說？蘇聯駐蒙古軍隊的那麼多先進的雷達幹什麼吃的？爲什麼沉默至今？

彼得·漢娜姆在他的文章中說：9 月 13 日淩晨 1 點多，蒙古東部肯特省保安司令奧特貢加離開達達勒（赤塔）的假日營地舞廳。這個小城市處於小山地帶，在蘇蒙邊境南 50 公里。當奧特貢加和他兄弟去衛生間時，他們突然聽到頭上有像摩托車一樣的聲音。他對他兄弟說，多奇怪，飛機的聲音這麼大。雖然雲層很厚，他們看不清飛機，這位保安司令確認飛機是向北飛。第二天早晨，他的假期突然中止，被派往西南 200 公里外的墜機地點。克格勃偵察員紮格沃茲丁證實了飛機轉向南飛之前，飛到了距蘇蒙邊境幾公里處。它爲何轉彎，對任何人都是個謎。

蘇聯人認爲：林彪座機墜毀時，不是在尋求庇護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國方向飛行。[2]

但是，飛行的時間對不上。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林彪座機有三個關鍵時間。

除了零點 32 分起飛毫無爭議外，飛越國境線和墜毀時間都有兩種說法。

飛越國境線時，有 1 點 50 分說，有 1 點 55 分說。

墜毀時間也是兩個，2 點 30 分說和 2 點 25 分說。

因爲機上的手錶都被蒙古人收走了，所以我們並不知道準確的墜毀時間。但如果飛越國境線的時間早五分鐘，墜毀時間晚五分鐘，二五六號三叉戟在蒙古境内就多了十分鐘的飛行時間，或許有可能飛到蘇蒙邊境。如果減去 10 分鐘，還有可能嗎？

從時間上看，林彪座機在國內飛行的時間是三分之二，出境後的飛行時間是三分之一。與地圖上的航線正好吻合，從山海關到中蒙邊境的距離是三分之二，從蒙古邊境到溫都爾汗是三分之一。雖然林彪座機選擇的迫降方向是從北向南，而不是它的飛行方向從南向北。但這不能說明是從蘇蒙邊境掉頭，因爲選擇迫降場，需要在迫降場上空重新建立航線，飛機當然要盤旋尋找最佳的迫降方向。

所以，由北向南的迫降方向並不能說明更多。

二五六號三叉戟上的黑匣子

關於二五六號三叉戟的墜毀過程，也許永遠沒有人會知道了吧？

且慢，還有神秘的黑匣子。人都死了，惟一能“說話”的黑匣子沒有“死”。飛機從起飛到摔毀 118 分鐘，差兩分鐘就是兩個小時，在這“長長”的一段時間裏，飛機裏發生了一些什麼？因爲始終沒有公佈飛機上的黑匣子，有些說法就無法令人信服。

國際上關於空難事故的調查，主要有這幾個方面，一、事故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發生的？詳細經過如何？二、如果機組的人活著，採取了哪些應急措施？三、分清事故的責任，是人爲的，還是不可抗拒的？四、事故的教訓經驗。五、爲了避免類似事故再次發生，應當採取哪些措施？爲了使製造廠家和用戶都能從事故中吸取教訓，參加調查的不僅有民航和飛機的用戶，而且也有廠家代表。不管空難發生在何處，都會引起世界廣泛的重視，並立即組成聯合調查組。在調查中不允許有任何弄虛作假的行爲，每一個細節都必須水落石出。

但是，由於空難中首先喪生的往往是駕駛人員，這給事故調查帶來困難。因此，飛機上的黑匣子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寶貝。黑匣子直徑 30 到 40 公分，像個圓球，在安裝和定位裝置等方面都具有最大的自我保護能力，長時間在火中也不會損壞，以使記錄的資料能夠被保存和復原。最初黑匣子是黑色的，因爲失事後黑色的物品不好尋找，就改成桔黃色，以求醒目。但因爲黑匣子叫順口了，就一直叫黑匣子。

黑匣子又叫飛行資料\語音記錄器，是按時間順序記錄飛機飛行全過程信息的記錄儀，尤其是飛機在特殊事件中的行爲信息。爲發現隱患、查找事故原因提供不可缺少的依據，也爲訓練飛行員和進行飛機設計提供必要的眞實參數，所以是不可缺少的機載設備之一。

過去老式飛機上沒有黑匣子，出了事很難查清。20 世紀 40 年代人們已經重視飛機的記錄，50 年代起安裝在飛機

上的是簡單的記錄器，只能記錄幾個參數。由於電腦的發展，60 年代西方國家開始在飛機上裝黑匣子，把飛機上的技術信息編成密碼，記錄下來。

現代飛機上一般有兩個黑匣子，機尾一個，機頭一個。機尾的一個記錄飛行資料，能持續監控和記錄 100 多項，包括飛機的高度、速度、爬高速度、垂直加速、飛機磁偏角、發動機及工作狀態、穩定性能、承受重量、外界溫度、氣壓、風速、機艙內環境等，對飛機事故高發區的起飛和著陸的記錄更加詳細。機頭的語音記錄器記錄飛行員的談話信息，駕駛員的每一個舉動，每一句話，每一次與地面塔台的聯絡、都有詳盡的記錄。到飛機失事止，至少保留前 30 分鐘的所有信息。這無疑是飛機失事原因的不可缺少的判斷材料和分析事故發生過程的寶貴依據。兩個黑匣子對照，在不同高度、不同階段、不同飛行狀態下駕駛艙內所發生的一切，尤其是飛機起飛後和迫降前兩個最爲關鍵的時刻就可以再現出來。

黑匣子能抗高溫和強烈振動，保證信息能拿出來。

飛機失事，首先就是儘快找到黑匣子，這是每一個調查組首要的任務。二五六號三叉戟是在飛出國境 40 分鐘後墜毀的，黑匣子的作用更是非同一般，怎麼就沒人提及呢？

誰也不說，好像這架三叉戟上從來就沒有黑匣子一樣。

黑匣子被誰“收藏”了

林彪座機墜毀的原因到底是什麼？飛機故障？操縱錯誤？機內搏鬥？導彈擊毀？人爲破壞？油箱爆炸？還是飛行員疲勞？因爲根本就沒有進行事故調查，目前惟一的知情者只能是那個黑匣子。

關於黑匣子，有人說二五六號三叉戟上没有裝，這似乎不可能。更多的人包括三叉戟機組的人員都肯定飛機上有黑匣子，不可能不安。空軍必須設備齊全，設備不全不能上天，更何況是中國的第一號專機。

但這一切都是假設，遺憾的是從三叉戟的公開材料裏找不到關於黑匣子的記載。到底二五六號三叉戟上有没有黑匣子？誰也没見過，這就使問題複雜化了。不過，我們可以從另外一些資料中找到一些線索。

中國民用飛機如伊爾-18、安-24、三叉戟和波音 737 等都裝有黑匣子，但結構簡單，記錄參數較少，一般記錄 5-9 種或十幾種參數。

英製三叉戟在 60 年代中期投入航線飛行。現在這種飛機是遠遠落後了，但在 1971 年，還算時髦。但是我們是從巴基斯坦購買的，並没有直接與廠家溝通，因此對三叉戟的性能並不那麼清楚。

據專家講：從三叉戟 IE 型號開始，已經在機尾裝上黑匣子。在二五六號三叉戟摔毀的照片上，可以看到飛機尾翼高高翹起，說明黑匣子應該完好。更何況黑匣子有一層厚厚

的“保護”，火中水中都可以安然無恙。

中國人沒有拿到黑匣子。

或者我們那時根本不知道飛機上還有黑匣子，至少到現場的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官員們對黑匣子一無所知。孫一先回憶：那時我們沒有專業知識，不懂，想不到提這方面的要求，國內也沒有指示我們。以後研究這架三叉戟，也從來沒有提過黑匣子。到了 1972 年，空軍專家分析三叉戟的失事原因，只是憑著照片從技術上分析，仍沒有提及黑匣子。很久以後，人們才知道大型噴氣式飛機上都裝有黑匣子。

孫一先認爲：如果有黑匣子，黑匣子也肯定不在中國人手裏。[3]

蘇聯人兩次到墜機現場，一切他們認爲有用的東西，包括飛機上的發動機，包括林立果從北京帶上飛機的 20 多個箱子，以及手令、航圖等，全被蘇聯人“一網打盡”。

人們推測黑匣子在蘇聯人手裏，蘇聯人在拆走發動機的同時，拿走了黑匣子。蘇聯人連三叉戟上的主發動機都能拆走，一個小小的黑匣子更不在話下。據彼得·漢娜姆的調查，黑匣子是被蘇聯拿走了。爲什麼蘇聯人這麼沉得住氣？他們連林彪的頭顱包括假牙病歷都公佈了，黑匣子爲什麼不公佈？當然，沒有公佈的還有他們兩次在現場拍下的一批照片以及他們拿走的三叉戟上的那一批箱子。

爲什麼時隔 30 多年，黑匣子仍不露面呢？

康廷梓在進行三叉戟理論學習和飛行訓練時，教員沒有提及黑匣子。因爲黑匣子與飛行員飛行無關，正常飛行時它

“袖手旁觀”。而且它“藏”在前艙頂上，只露一個小小的網狀口，連個電門也沒有，不出事誰也想不到它。就像平時放在房間裏的滅火器，一旦失火才成爲“英雄”。如果黑匣子像保險絲一樣可以拔下來，或許可能被破壞，那黑匣子在關鍵時刻就“衝”不上去。所以誰也不能拿下來看看，更不能人爲控制它。但也正因爲這種不可能，黑匣子正常不正常無從知曉。只有在出事後，黑匣子送到實驗室，由專家打開，才能知道黑匣子是不是正常工作。至於密碼能不能被破譯？破譯的密碼能不能解開？都還是未知數。

英美等國專門有關於黑匣子的研究機構。黑匣子很複雜，你用它的飛機，出事要找它翻譯，要花很多錢。蘇聯搞黑匣子很晚，是另一套。也有人說：黑匣子找到也沒用，不能說明爲什麼迫降？另外話音錄音器是不是好，不敢保證。[4]

當然，黑匣子也不是“神仙”，1999 年，埃及航空公司飛機失事的兩個黑匣子先後從大海裏打撈上來，對語音和資料左分析右分析，也沒分析出所以然來。只知道失事前飛行員發現了飛機的某個問題，而且正在設法解決。不過直到飛機失事，飛行員也沒有弄清飛機究竟出了什麼故障。美國有報紙說飛行員要自殺，遭到埃及政府的強烈抗議。

所以，有了黑匣子，事故結論也不一定就能得出來。

如果這個黑匣子在蘇聯手裏，也有幾種可能，或者破譯，或者不感興趣，扔在一邊。如果破譯，是不是應該請英國人幫忙？可是沒有。要是說蘇聯人不感興趣，恐怕也不

會。他們爲什麼又第三次去溫都爾汗荒原，把林彪和葉群的頭顱拿去進行分析呢？很可能他們不相信中國人公開講的那些結論，還要獨立證實一番。那麼他們可能獨自破譯，有結果或者沒有結果。隨著時間推移，如果這個神秘的黑匣子仍"活"在世上的話，那麼，二五六號三叉戟上最後半小時恐怕就會眞相大白。

蘇聯人爲什麼如此積極

似乎蘇聯人比中國人和蒙古人更積極。

後起飛的直升機迫降後，繳獲了大量的機密文件，三叉戟隨身有沒有帶機密文件呢？一時還來不及核對。但中央在給駐蒙古大使館的第一個電報中，就提到未燒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轉交我們。因爲在視察現場，蒙方提出，是否只看不取，待視察完畢，統一移交，許大使同意了。到最後不了了之，現場的遺物一件也沒有移交。

蒙方一口咬定：在這架飛機上除 9 名遇難者的遺體外，沒有發現裝有其他貨物的痕跡。但是很清楚，蘇聯人和蒙古人在中國人到來之前，已經整理過現場。林立果從北京到山海關機場時，藍色"伏爾加"拉了兩趟箱子。"伏爾加"的後備箱特別大，能裝不少東西。機組人員回憶：當時裝上三叉戟的大大小小的箱子有 20 多個。到山海關機場時，除劉沛豐時刻不離身的幾個手提包外，別的箱子都沒有卸下。劉沛豐那幾個寶貝手提包肯定是上了飛機，而且還多了好幾個包。

皮箱子不會燒毀，飛機上的一個機械師穿著皮茄克幾乎完好就可以證明。這二三十個皮箱子都"不翼而飛"了，在誰手裏？蒙古？還是蘇聯？不知道，不過最大可能是被蘇聯拿走了。

關於二五六號三叉戟上的 20 多個箱子，裏面究竟裝了些什麼？蘇聯和蒙古至今都沒有吐露一個字。

但是，關於林彪座機的墜毀，蒙古人和蘇聯人比中國人知道得更多。

九一三事件發生時新華社沒有派駐蒙古的記者。1985 年 1 月 8 日，新華社駐貝爾格萊德分社記者楊達洲從貝爾格萊德發回一條電訊。南通社社長米哈伊爾·沙拉諾維奇最近對記者談到蒙古方面向他介紹的有關林彪在蒙古摔死的情況。楊達洲回憶：年底宴請南通社領導。南通社社長沙拉諾維奇與我年紀差不多，他曾任駐蒙古和朝鮮、中國三方的記者。在北京我們就認識，處得不錯。沙拉諾維奇說，1975 年，當時任南共聯盟中央執行書記的多蘭茨去朝鮮和蒙古訪問，指定當時任南通社駐京記者的他隨團採訪。到蒙古後，蒙古通訊社原駐京記者、當時任蒙古黨中央某局局長的那木斯萊邀請沙拉諾維奇夫婦到家裏做客。那木斯萊的妻子自稱是漢學家，在蒙古公安部主管中文處。據那木斯萊的妻子講，她從頭到尾參與處理林彪飛機案。黑匣子先在蒙古人手裏，因爲蒙方老提抗議，害怕中國說是它打下來的，這樣，她才有機會聽到黑匣子。從"黑匣子"的錄音帶上可以判斷，機上人員在激烈爭吵。跟地面導航站之間也有爭論。過幾分

鐘吵一陣，還有射擊聲。她斷定飛機上有林彪，但最初蘇聯人不相信，後來他們要走了黑匣子。

不管怎麼說，那木斯萊妻子說的黑匣子裏的聲音不對，二五六號三叉戟始終沒有與地面通話，怎麼可能與地面導航站吵架呢？[5]

新華社駐蒙古的記者王義民認爲：完全是捕風捉影。

據彼得·漢娜姆的文章：蘇聯人說，二五六號三叉戟的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鑒定時，沒有發現錄音裏有飛機與地面的通話。確實，二五六號三叉戟就沒有與地面通話。如果有地面領航，三叉戟完全不必冒那麼大的危險迫降野外。[6]

但是，有沒有機內說話的內容呢？

蘇聯人賣了個“關子”，沒有說有，也沒有說沒有。到底有沒有呢？因爲摔毀在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的這一架三叉戟不是一個簡單的飛行事故，而成了政治。加上本身這一架專機就是高度機密，致使黑匣子更加複雜化。

不管怎麼說，只要黑匣子能開口“說話”，中共黨史上最大的謎底就可能被完全揭開。

註釋：

[1] 採訪空軍作戰部參謀朱秉秀筆記，2000 年 8 月 16 日

[2] [6] 參見漢娜姆《解開林彪死亡之謎》，載香港《亞洲週刊》1994 年 2 月 1 日

[3] 採訪孫一先筆記，2000 年 8 月 17 日

[4] 採訪二五六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康廷梓筆記，1999 年 12 月 30 日

[5] 採訪新華社記者楊達洲筆記，2000 年 8 月 12 日

後記

感謝明鏡出版社何頻先生出版此書。

感謝我的朋友王年一、葉鎮、丁凱文、何蜀、閻長貴等仔細審閱我的書稿，並提出寶貴意見。

感謝林彪、陳伯達等家屬對我的採訪和寫作給予支持。

我又一次修訂了 40 萬字的書稿，並補充了重要的史料。林彪一直不願意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爲什麼最後又出席了呢？由此成爲“接班人”，埋下了九一三事件的“種子”。此後幾年，林彪除了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講話，無所作爲，但最後還是落了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本書對林彪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給予了從未披露、卻令人信服的說法。

林彪事件是國內外關注的重大事件之一，雖然已經過去 35 年，但仍有大量的謎團未解。本書試圖通過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揭開這些謎底。

讓我從頭說起。

1987 年 5 月，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調到聶帥傳記組，負責撰寫建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兩章。在採訪中，我聽

一些老同志談了對《聶榮臻回憶錄》的看法，認爲應該實事求是寫林彪，由此使我對“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九一三事件和那個神秘的接班人林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0 年間，我採訪了上百位九一三事件的目擊者，很多人不止一次接受我的採訪。同時我搜集了大量的九一三事件以及林彪一家的資料，並專門到北京的毛家灣、內蒙古草原、北戴河林彪別墅和山海關等地考察。

在此期間，我拿到了我的第二張大學文憑。

但是因爲衆所周知的原因，我遲遲沒有動筆寫書。但是我寫了一系列有關九一三事件的文章。《噩夢九一三》發表在湖北文聯的《報告文學》2002 年 9、12 期。被選進中國作協編的《2002 年報告文學精品選》。《九一三事件眞相探微》發表在《時代文學》2003 年 2、3 期。以上兩篇除了在國內被幾十家報刊轉載外，被收進明鏡出版社出版的丁凱文先生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一書中。

《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謎》發在《時代文學》2004 年第 4 期。《作家文摘》連載，讀者反響強烈。2004 年 9 月 15 日，上海《解放日報》開始連載。此文第一次把毛澤東南巡和林立果的一系列行動聯繫起來，從中發現了重大的秘密。黨史專家王年一認爲，《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謎》是個突破。

《林彪座機墜毀前後的空軍指揮所》發在《黨史博覽》2004 年第 12 期。《作家文摘》選載。此文揭開了 1971 年 9 月 12 日夜，葉群爲什麼在周恩來打電話後半個小時才逃向山海關機場。

《揭開廬山眞面目》發表在《時代文學》2005 年第 1、2 期。此文詳細揭開了廬山上“國家主席”引發的一系列之謎，也被上海《解放日報》連載。

《李雪峰和九屆二中全會》發表在《黨史博覽》2005 年第 2 月，詳細披露了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的內幕。

以上幾篇關於九一三事件的文章都引起強烈反響。

我還寫過一篇《林彪事件百問百答》，沒有發表。

2005 年，我翻閱了我的厚達數尺的採訪筆記，我覺得我應該動筆了。在補充採訪後，我寫出了《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這本書。

卻沒想到此書的出版多災多難。

從 1974 年開始發表作品以來，我已經出版十幾本書了。自以爲經歷了形形色色的盜版，卻從來沒想到我的這本書會在光天化日之下遭遇文化流氓。

2005 年 10 月，本來是我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作訪問學者的時間，但因故未能成行。我決定把我花費了 20 年心血寫成的關於林彪事件的書稿交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該社接到書稿後，提出要加注釋。於是我又花費了四個月的時間，編寫了全部注釋和出處。2006 年 2 月，該社收到書稿後又提出不僅要電子版，還要紙版。我托美國的朋友打印出一份幾百頁的紙版，又花費了 14.80 美元的郵費，從美國紐約寄到香港。該社收到我的書稿紙版後，非常負責任地寄回

一張收條。至今，該書稿的紙版仍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並且有兩位專家審讀後給我寫有書面的審稿意見。

因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審稿週期比較長，一位美國朋友建議我另找一家香港出版社。他 2006 年 3 月到香港中文大學辦事，可以順便幫我牽線。這樣，我在徵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同意後，3 月中旬，我將書稿的電子版寄給這位朋友介紹的香港一家出版公司的老闆，當天他寄來合同。我的律師說這個霸王合同不能簽。我收到合同兩天後，發信表示不簽。但是這位老闆表示：反正書稿在他手裏，不管你作者簽不簽合同，他都要在五一黃金周出版該書。

我專門發信聲明，香港是法制社會，請他遵守法律。4 月中旬，這位老闆通過北京的一個朋友找我談話，我說這本書稿我還要修改。我和我的律師都善良地以爲，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誰能想到，5 月 1 日剛過，我的書被明目張膽地盜版。在此，我保留訴諸法律的權利。

關於照片作者的說明：該書照片除我自己拍攝的以外，部分由被攝者家屬提供。還有三張人物（于運深、閻長貴、劉吉純）照片由青年攝影師沈中拍攝，一張我和林豆豆看她父親畫册的照片是著名攝影師孟昭瑞老師拍攝。此外，還有個別照片，儘管我們千方百計尋找其作者，但因年代久遠，照片又沒有署名，沒有找到。希望照片作者與我們聯繫，以便奉上薄酬和樣書。

作者　2006 年 5 月 19 日於北京

主要參考書目及文章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12 月版

《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版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 年 9 月版

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 年版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年 11 月版

陳曉農編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 年版

周福明等《毛澤東晚年生活瑣記》，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版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5 月版

邵一海《林彪 913 事件始末》，四川文藝出版社，1996 年版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年版

楊銀祿《江青與林彪》，《百年潮》1999 年第 4 期

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 年 7 月版

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 年 6 月版

官偉勳《我所知道的葉群》，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 年 5 月版

李文普《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1999 年 2 月

宋德金《我在林彪辦公室的前前後後》，《百年潮》2000 年 9 期

還參考了陳伯達、王年一、何蜀、林豆豆、王保春、王文耀、丁凱文等人的有關九一三事件的書（文章），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真相》系列(37)

書　　名：林彪事件完整調查　（下冊）
作　　者：舒　雲
發 行 人：何　頻
責任編輯：李小銘
封面設計：一　劃
校　　對：林小貴
出　　版：明鏡出版社
全球資訊網：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訊地址：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 S. A.
電話：(516)338-6976　傳真：(516)338-6982
國際統一書號：ISBN 1-932138-42-0
定　價：HK$ 172(上下二冊)
版　次：2006 年 8 月第一版
2006 年 10 月第二版
2007 年 2 月第三版